

金陵

李健 编著

3

新傳

这里 是抗战火药桶
海战 空战 陆战 是胜战
这里 是数千古冤案
海战 空战 陆战 是一万案
咫尺 几多凶案
西线 几多凶案
两岸民心所向 统一大新传
不图东风能不回



华文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朋友，你知道蒋介石曾三度密谋“反攻大陆”吗？这些行动计划因何搁浅？你知道海峡两岸曾有过三次和谈秘使来往吗？其密谈的内容是什么？你知道对峙中的两岸曾发生过数次举世瞩目的海战、空战、登陆与反登陆战吗？其起因、经过及胜负如何？你知道中、美、苏等国曾因台湾问题而展开了一幕幕出神入化、精彩绝伦的外交大角逐吗？你知道昔日仓皇离开大陆的一代国民党大员的不同归宿吗？你知道台湾当局的新图谋吗？

《金陵新传》生动地再现了上述鲜为人知的历史片断，全景式地勾勒了一幅变幻莫测、扣人心弦的台海风云图……

内容提要

朋友，你知道蒋介石曾三度密谋“反攻大陆”吗？这些行动计划因何搁浅？你知道海峡两岸曾有过三次和谈秘使来往吗？其密谈的内容是什么？你知道对峙中的两岸曾发生过数次举世瞩目的海战、空战、登陆与反登陆战吗？其起因、经过及胜负如何？你知道中、美、苏等国曾因台湾问题而展开了一幕幕出神入化、精彩绝伦的外交大角逐吗？你知道昔日仓皇离开大陆的一代国民党大员的不同归宿吗？你知道台湾当局的新图谋吗？

《金陵新传》生动地再现了上述鲜为人知的历史片断，全景式地勾勒了一幅变幻莫测、扣人心弦的台海风云图……

金陵新传

第八章

毛泽东导演战史奇观，蒋介石高唱“反攻”老调。沿海军民痛击武装特务，海峡两岸空战频发。粉饰门面，台湾戏演“大团结”

第一节 一次特殊的军事行动

中央指定叶飞指挥

1958年7月15日，美国政府派遣海军陆战队入侵黎巴嫩等中东国家，7月16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和抗议美国的侵略行为，要求美国立即从黎巴嫩撤兵。随后，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小城市，纷纷举行反对美国侵略中东地区的示威。但是，台湾国民党当局却一再表示“完全支持”美军侵略黎巴嫩的行动，并叫嚷“加速进行反攻大陆的准备”。国民党空军连日出动飞机对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进行侦察、空投宣传品。根据当时的国际和政治外交斗争的需要，为惩罚国民党军疯狂叫嚷“反攻大陆”的嚣张气焰，打击美国侵略者和声援中东人民的正义斗争，中央军委于1958年7月18日作了炮打金门的决策。

此时正值东南沿海台风季节。这一天，福州军区第一政委叶飞，正同机关、部队一道，帮助当地农民抢收水稻。突然，军区司令部参谋匆匆赶来，请政委回作战室接北京来的保密电话。

叶飞拿起电话，耳机里传来了总参谋部作战部长王尚荣的声音：

“叶政委吗？中央决定炮轰金门，指定由你指挥！”

那时福州军区新任司令员是韩先楚，已经到任接替了叶飞的工作。叶飞虽然仍兼军区第一政委，但工作的重点主要是在地方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应该由军区司令员指挥，为什么要政委来指挥呢？叶飞有点疑问，就问道：

“到底是不是中央决定要我指挥的？”

王尚荣答：“是中央决定。”王尚荣感觉到叶飞有怀疑，就说：“刘培善同志在这里，你可以问问他。”

刘培善接过电话说：“是的，是毛主席决定要你指挥。”

叶飞说：“韩先楚司令员现在在北京，应该由韩司令员指挥啊！”

刘说：“那你就不用问了。”

叶飞只好回答：“既然如此，那行，我接受命令来指挥。”

叶飞接受任务后，立即召开省委会议，安排工作。决定江一真代替他主持省委日常工作，并立即组织前线指挥所。第二天，由福州乘车奔赴厦门，同去的有副司令员张翼翔和副政委刘培善，张兼任前线指挥所参谋长。此时，皮定均副司令员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不在福州。

7月19日叶飞一行到达厦门，迅速展开多项准备工作，24日前完成了一切作战部署。7月27日收到中央军委的电报，内容是毛泽东致彭（德怀）、黄（克诚）的信（注：此时国防部长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黄克诚为总参谋长）：

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中东解决，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这个主意，你们看如何？找几个同志议一议如何？……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以上种种，是不是算得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我战则克，较有把握呢？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必须坚持。如你们同意请将此信电告叶飞，过细考虑一下，以其意见见告。

毛泽东信上所说“中东解决，要有时日”，指的是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人民发动革命，推翻了旧统治集团，美国直接出兵入侵黎巴嫩，随后英国又入侵约旦。同时，美国于7月15日宣布其远东地区陆海空军进入戒备状态。中东形势骤然紧张，成为世界矛盾的焦点。美、英、法介入后，苏联也有所动作。世界进步舆论都声援中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蒋介石集团企图乘机扩大事态，于7月17日宣布所属部队处于“特别戒备状态”。金门、马祖与台湾国民党军先后进行军事演习，同时加强空军对大陆侦察活动和袭击准备。

叶飞接到电报后，立即找张翼翔、刘培善商议，觉得各项准备工作比较紧张，加之福建沿海遭受台风袭击，连续暴雨19天，冲毁大小桥梁43座，公路铁路塌方情况严重；部队在阴雨中昼夜作业，疲劳过度，疾病丛生；特别是空军进入福建前线的转场尚未完成，海军入闽部队尚在调动中，认为推迟炮击时间较为有利。当即复电表示，根据前线情况，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些再进行炮击，较有把握。

由于推迟了炮击时间，又进行一个月的准备工作，完成了地面炮兵的集结和展开。炮兵对金门炮击的所有目标，都进行了现场交叉测量、观察，把目标都一一标在作战图上；也完成了空军的紧急战斗转场、海军舰队和岸炮部队的入闽部署，制定了炮兵、空军、海军协同作战方案，一切作战准备都就绪了。

炮击全门序幕是空战

炮击金门的序幕是空战。没有这场空战掌握了福建前线的制空权，就没有下一步的炮击。当时沿海机场的飞机起飞，不能朝大海方向，只有往后飞，

升空后再调头。如果朝前起飞，就飞到台湾海峡上空了。我空军要在福建前线站住脚，首先必须要战胜敌人的空军，不然，掌握不了制空权。为了加强福建前线空战的指挥，原志愿军空军司令员聂凤智调任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海军进入福建后，彭德清也调来往厦门海军基地司令员。

7月的一天，空军进入福建，看到我们自己的飞机飞临福州上空，人民欢欣鼓舞，机关办公的、工厂做工的、学校上课的、全从屋子里出来，很多人爬到屋顶上欢呼。因为人民群众以前吃够了敌人的空袭的苦头，天天有警报，不得安宁。在福建前线的空战中，美国自己的飞机不来，只是掩护台湾蒋军空军基地，在台湾海峡上空巡逻飞行，掩护蒋军飞机在第一线作战。我军的飞机每次只能出动一半，另一半保护机场。国民党空军没有这个顾虑，机场由美国空军保护。

空战后期，国民党空军使用了响尾蛇空对空导弹。空战中，我军有两架飞机不明不白地被打落了，开始我军不知道是怎么被击落的，后来才弄清是新式武器干的。

这场争夺制空权的空战持续了半个多月，甚为激烈。国民党空军损失50多架，大约占它总数的三分之一。我军损失20多架。空战后，敌人老实了。制空权被我军掌握了，为大批炮兵开进厦门，为炮击金门打下了基础。

接着，炮兵调来约3个师，还有1个坦克团。这次调动都是晚上行动，重炮加上坦克，夜间通过福州开往厦门，轰轰烈烈，连街道都颤动了，空军、海军、大批炮兵和坦克进入福建，老百姓高兴极了，纷纷议论，都认为这一次不但是要解放金门，而且一定是要解放台湾了。

8月上旬，地面炮兵全部进入了阵地。海军130岸炮部署在厦门对岸角尾。炮兵阵地从角尾到厦门、大嶝、小嶝，到泉州湾的围头，呈半圆形，长达30多公里。大金门、小金门及其所有港口、海面，都在我远程火炮的射程之内。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待北京来命令。

毛泽东在北戴河亲自指挥作战

8月20日，北京来电话，要叶飞速去北戴河。他立即乘专机赶去。21日下午3时，毛泽东派人找叶飞去他的住处。叶飞一见到主席，就详细汇报了炮击金门的准备情况，炮兵的数量和部署，以及实施突然猛袭的打法。彭德怀、林彪也参加了汇报会。

毛泽东一面听叶飞汇报，一面看地图，精神非常集中。汇报完后，毛泽东突然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你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呢？”

那时，美国顾问一直配备到国民党部队的营一级。叶飞回答说：“哎呀，那是打得到的啊！”

毛泽东考虑了十几分钟又问：“能不能不打到美国人？”

“主席，那无法避免！”

毛泽东听后，再也不问其它问题，也不作什么指示，就宣布休息。大家知道，这是毛泽东要进一步考虑问题了。

晚饭后，王尚荣拿了一张条子给叶飞，那是林彪写给毛泽东的。林彪这个人很会捉摸毛泽东的意图，他知道毛泽东很注意能否避免打到美国人问题，所以写了这个条子提出：是否可能通过王炳南（正在华沙同美国进行大使级谈判）给美国透露一点消息。林彪此人也有点莫名其妙：告诉美国人就等于告诉台湾，这怎么行呢？看到条子，叶飞很吃惊，便问王尚荣：

“主席把这信交给我看，有没有什么交代？是不是要我表态？”

“主席没说什么，只说拿给你看。”

第二天继续开会。毛泽东下决心了，看来没有理睬林彪的建议。

他说：“那好，照你们的计划打。”并要叶飞留在北戴河指挥，跟彭德怀在一起住。

叶飞心想：自己怎好与彭老总一起住呢？主席究竟是什么意思？叶飞不懂，也不好问。彭德怀也没派参谋来叫他住到他那里去。

晚上叶飞散步后回到房间里，正在发愁，恰好王尚荣来，他说：“老兄，主席不是交代你住到彭老总那里吗？”

叶飞说：“我哪好去住啊？！”

王知道叶飞为难，就说：“我替你想个办法，把专线电话架到你的房间里。”这下就解决问题了。

他们商定，前线直接同叶飞通话，叶飞再通过王尚荣转报毛泽东，毛泽东的指示也由王尚荣转告叶飞。叶飞问：“彭老总那里怎么报告呢？主席交代我同他住一起的呀！”他说：“你别管了，此事由我办。”

所以，炮击金门是在北戴河指挥的。也可以说是毛泽东直接在指挥。前线则由张翼翔、刘培善代叶飞指挥。

万炮齐发调遣美舰

8月23日中午12时，炮击开始。第一次急袭，所有炮兵阵地同时向金门开火，一个小时密集发射了几万发炮弹。火力十分猛烈和密集，整个金门岛笼罩在一片硝烟之中。蒋军猝不及防，死伤惨重。我军的炮火打得很准，一下子摧毁了敌人的许多阵地，特别是集中火力猛击金门胡璉的指挥所，打得非常准确，可惜打早了5分钟！后来得到情报，我军开炮的时候，胡璉和美国顾问刚好走出地下指挥所，炮声一响，赶快缩了回去。没有把他打死。要是晚5分钟，必死无疑。在阵地上的美国顾问被打死2人。对此，美国人一直没有吭声。

毛泽东决定大规模炮击金门，是不是就要解放金门、马祖呢？当时，包括福建前线我军指挥员，还有台湾蒋介石，包括美国艾森豪威尔在内，都没有搞清楚。毛泽东这一重大决策，是同当时不可一世的美国进行较量，是一

个有国际、国内重大意义的战略行动。这是当时一切中国人、外国人都没有弄明白的。

毛泽东选择这个时机大规模炮击金门，摆出我军要解放台湾的姿态，一是警告蒋介石，二是同美国进行较量，把美国的注意力吸引到远东来，以调动当时正在侵略中东的美国第7舰队，支援中东人民的斗争。

福建前线我军实施对金门大规模炮击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3天睡不着觉，摸不清我军此举的意图。他从我空军入闽，在空战中已击败了蒋介石空军，牢牢地夺取了福建前线上空的制空权；我海军入闽，已基本控制了福建沿海的制海权；大批炮兵及坦克部队调入福建，鹰厦铁路已修通，福建前线包括汕头等地已修建大批空军作战基地等种种迹象判断，我军这次大规模炮击金门行动，决不只是要解放金门、马祖，而是要大举渡海解放台湾的前奏，于是下令将地中海美第6舰队一半舰只调到台湾海峡，和第7舰队会合，加强第7舰队，中东局势缓和下来了。

艾森豪威尔不是毛泽东的对手，完全被毛泽东调动了。杜勒斯于9月4日发表声明，公开要扩大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侵略范围，对中国人进行军事挑衅和战争讹诈。美国从中东的第6舰队调来一半舰只，加上从本国和菲律宾调来的，美军在台湾海峡就有航空母舰7艘、重巡洋舰3艘、驱逐舰40艘。美国第46巡逻航空队、第1海军陆战队航空队和其它好几批飞机也调来台湾，美国第一批陆战队3800人已在台湾南部登陆。侵台美军司令部还公然扬言，要在8日的演习中以舰炮封锁我沿海岛屿。

毛泽东把美国的注意力从中东转移到远东来后，地中海紧张局势趋向缓和。

我国外交部于9月4日发表领海线声明，宣布我领海线为12海里，向全世界宣告保卫我领海不受侵犯的坚强决心。后来福建前线部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我国人民的这一立场。

只打蒋舰不打美舰

8月下旬，叶飞由北戴河回到厦门前线，此时大、小金门蒋占岛屿，包括金门唯一的港口料罗湾和海面，全部在我炮火射程之内，完全被我炮火封锁，金门和台湾的海上通道截断了。为了补给金门，台湾从海上运输，以海军护航，我军炮火即转向攻击其海上运输线，专门打它的海上运输船只。蒋军舰只受到严重打击，不断被我海岸炮火击沉击伤，最后，金门海上运输线完全被我截断了。金门不但弹药补给中断了，粮食、燃料的补给也中断了，储备的炮弹也在半个月炮战中消耗得差不多。储备粮只有一个月，也消耗差不多了，于是频频向台湾告急。蒋介石即请求美军护航，以恢复金门的海上补给线。

9月7日，美蒋组成一支海上大编队。美国军舰配置在海上编队左、右

两侧护航，把蒋军舰只和运输船只夹在中间，美舰和蒋军舰只相距仅 2 海里，由台湾向金门开来。美蒋联合编队从台湾一出动，我军在雷达上就看得一清二楚。情况复杂化了，美军已经卷入，怎么办？打不打？如果一打，势必会把美舰一起带上，这就可能把美国拖下水，同美军发生直接冲突。所以，打不打美蒋海军联合编队，事关重大，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行动，这不是前线指挥员有权可以作出决定的，只能由中央、最高统帅毛泽东才能作出决定。叶飞立即请示毛泽东。

毛泽东回答：照打不误。叶飞又请示：是不是连美舰一起打？毛泽东回答：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并且交代要等美蒋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口才打，要叶飞每一小时报告一次美蒋联合编队的位置、编队队形、航行情况，到达金门料罗湾时，要等北京命令才能开火。

叶飞为了准确执行只打蒋舰、不打美舰的命令，又请示：我们不打美舰，但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我们是否还击？毛泽东明确口答：没有命令不准还击。

命令是由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以直达军用专线电话向叶飞转达的。叶飞接到这个电话，极为吃惊，恐怕电话传达命令不准确，铸成大错，再问王尚荣：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我是不是也不还击？回答是毛主席命令不准还击，清清楚楚。这样叶飞就说：明白了，我严格按照毛主席的命令执行。

这一下叶飞就极为紧张了，因为要严格执行毛泽东的命令，只打蒋舰，不准打美舰，这很不好办。美舰和蒋舰相距仅 2 海里，如果哪一个炮群瞄不准确，稍有误差，就会打到美舰。至于如美舰向我开炮，我不予还击，这倒还比较好办。

叶飞为了准确执行毛泽东的命令，就亲自向 31 军及各炮兵群下达命令：待美蒋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北京下了命令后才开炮；各炮群只打蒋舰，不准打美舰；如美舰向我开火，我不予还击！各炮群接到叶飞这个命令，都吃惊了，纷纷追问。叶飞又把命令再复述一次，并问炮群是否都听清楚了，明白了？各炮群回答听清楚了，明白了，按毛主席的命令严格执行。

9 月 7 日中午 12 时正，美蒋海军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运输船只开始在料罗湾港口码头上卸下补给物资。情况直报北京，毛泽东下令开火。全线所有炮群接到命令，即以突然的密集火力攻击蒋舰及其运输船只，集中攻击料罗湾港口码头。没想到我军一开炮，美舰丢下蒋舰及运输船只不顾，立即掉头向台湾方向逃去。这时，金门蒋军和在料罗湾的蒋舰纷纷向台湾告急。台湾问：“美国朋友？美国军舰呢？”蒋舰回答：“什么朋友不朋友？美国军舰已经掉头跑了！”他们大骂“美国人混蛋”，使用报话机通话，连密码都不用，我军的侦听机听得清清楚楚。蒋舰被我军击沉 3 艘、击伤数艘。台湾即下令蒋舰返航。这一场惊险的战斗就这样戏剧性地宣告结束。

试探美蒋合防条约效力

通过9月7日的炮击，中共中央、毛泽东初步摸到美国的底细。当然，美国军舰这一天未敢开火也许有一定的偶然性，美国真正的态度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证实。

9月9日，杜勒斯公开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决定使护航的美舰保持在沿海岛屿3海里之外”，进一步清楚地表明了美国的态度。9月11日，有4艘美国军舰再次掩护国民党的4艘运输舰、7艘作战舰向金门驶来，周恩来立即亲自布置了打击这次护航编队的战斗，准备以这一行动进一步摸清美国的战略底盘。

9月11日11时以后，美蒋混合编队侵入金门海域的中国领海。周恩来下达命令后，从14时57分起，前线解放军炮兵又以40个地面炮兵营又6个海岸炮兵连的强大火力射击驶近料罗湾的国民党军运输舰和金门岛上的目标。这一次国民党军的运输舰吸取了前几天的教训，不再等待美舰的掩护，一遭打击就急忙向外海逃走，因而只有1艘被击伤。美国军舰同9月7日的表现一样，在解放军发炮后马上退向外海，仍一炮未发。

通过9月11日的炮击，中共中央、毛泽东终于摸清了美国的战略底盘。正如叶飞后来所回顾的：

事后我才明白，原来毛主席命令只打蒋舰，不准打美舰，并且规定如美舰向我开火，我军也不予以还击，这一切都是在试探美帝国主义所谓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效力究竟有多大，美军在台湾海峡的介入究竟到了什么程度。经过这一次较量，就把美帝国主义的底全都摸清楚了。美帝国主义虽然貌似凶恶强大，在全世界到处横行霸道，不可一世，其实也是一只纸老虎。所谓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只要涉及美帝自身的利益，要冒和我军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它就不干了，就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了，如此已。

而这时台湾海峡的形势已经非常清楚，蒋介石千方百计想拖美帝下水，而我们则力求避免同美帝发生直接冲突，美帝也极力避免同我发生直接冲突，这就是当时台湾海峡非常微妙的三方形势。

继续封锁打零炮

1958年9月7日和11日两次炮击后，国民党见乞求美国护航已经不能达到预定目的，于是变换方式对金门实施补给，企图在岛上继续坚持下去，并仍想利用金门问题把美国拖入中国内战。美国在对新中国进行军事讹诈未收到效果的情况下，开始实行脱身政策，企图压迫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进而造成台湾和大陆在政治上的彻底分离。针对不断变化的复杂形势，中共中央、毛泽东一面思考新的对策，一面要求人民解放军继续封锁金门，使国民党更加陷入困境，以加深美蒋矛盾，为从长远角度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条件。

9月13日，毛泽东对解放军前线炮兵自月初以来开展的零炮射击活动加

以肯定，电令参战部队炮兵全面开展这一活动，要做到白天黑夜打零炮，每天24小时，特别是料罗湾3海里以内，打零炮（每天打二三百发），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以增强全面封锁的效果。根据这一指示，福建前线炮兵在发现重要目标时才集中火力进行大规模炮击，而平时则转入零星炮击，使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日夜都需要隐蔽在阴暗潮湿的坑道中，岛上的地面活动基本陷入停顿。

由于金门岛上的守军处境日益困难，急需补充粮弹和各种物资。9月13日，台湾国民党军又采用了一种新的运输方式，在天还未亮的凌晨用“美”字号运输舰进行偷运。但是运输舰在接近料罗湾时又遭到解放军猛烈的炮火射击，2艘“美”字号都中弹负伤逃回，补给再次失败。

鉴于由运输舰直接靠岸运输已不可能，国民党海军的运输人员想到了利用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常用的履带式水陆输送车（LVT，台湾军方俗称为“水鸭子”）。当时，解放军的海空军为了避免中美军事冲突奉命不出外海，而海岸边的炮兵火力射程也在20公里左右，国民党海军以装载水陆输送车的大型运输舰于白天驶到金门以南解放军炮兵火力无法达到的海面上，水陆输送车装载货物后再从舰上下水，直接抢滩上岸卸载。9月14日，台湾国民党军首次试用这种补给方式，虽然17辆离舰抢滩的水陆输送车在解放军炮击中损失2辆，但是台湾当局认为还算成功，下令继续实施。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又利用傍晚和夜间对金门守军进行空投。近海施放水陆输送车抢滩和空投，自此成为对金门实行补给的两项基本方式。

9月15日，中央军委对于封锁金门问题也作出新决定，强调：为了进一步封锁金门，炮兵要努力改进射击技术，重点打击驶进料罗湾的运输舰艇及卸载点，切实避免误击美舰，并加强对空投场的炮击；空军要加强大陆沿海上空的巡逻活动，掩护炮兵打击空投的国民党军运输机，并坚决打击进入大陆上空的国民党军战斗机；海军在确不误击美舰的前提下，夜间可予进入料罗湾的国民党军舰艇以打击。根据中央军委加强封锁的精神，从广州军区和其他单位抽调的地面炮兵、高射炮兵部队又陆续入闽，使参加炮击金门的地面炮兵部队达14个团另7个营又14个连，还有海岸炮兵8个连。

9月20日以后，美国又以军舰和航空兵为国民党军护航，不过护航的方式有所改变。美舰再度和国民党军舰混合编队，行驶至金门外海解放军岸上炮火射程之外停泊，再由国民党海军的运输舰放下水陆输送车，涉水上岸卸货。这样，解放军的炮兵已经无法炮击国民党军的舰只，而水陆输送车长度仅几米，目标甚小，又处于运动之中，火炮远距离射击很难命中。美军舰载战斗机则由停泊在台湾海峡的航空母舰上起飞，几乎每天都出动数十架次，掩护国民党空军的运输机飞抵距金门20公里以外的空域（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的领海线以外），然后美机在外面巡逻掩护，国民党军的运输机则迅速飞入金门上空实行空投。这种补给方式，确实给人民解放军实施封锁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

针对国民党补给方式的变化，解放军前线部队相应研究了对策。由于金门斗争牵涉到复杂的国际问题，军事行动必须服从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的需要。9月24日中央军委又向前线部队重申了“以炮击为主，海军空军在确实不误击美舰美机和有把握胜利的原则下相机作战”的方针。当时，由于台风，海面涌大浪高，解放军海军快艇的吨位一般都只有几十吨，这类小艇出海已很困难，因此封锁任务主要由炮兵和空军担负。炮兵根据新的敌情研究了打击国民党的水陆输送车并封锁空投场的新战法；空军则寻找时机，在确保不同美机交战的情况下打击国民党军的运输机。

解放军炮兵为了有效地打击水陆输送车，将部分远射程的火炮和海岸炮前推，增大火力控制范围，迫使国民党军的运输舰在更远的海面停泊，使水陆输送车因增大航程更易遭受打击；同时，迫其在距岸更远的海中下水，在海浪中也容易发生沉没事故。此外，解放军炮兵经周密计算，在料罗湾各主要航道上及沿岸便于水陆输送车着陆的滩头，事先计划移动拦阻射击弹幕和不动拦阻射击火墙，一旦发现水陆输送车或小型登陆艇上岸，马上呼唤火力实施较准确的射击。开始，国民党军的水陆输送车由舰上泛水后，分次成一系列横队抢滩上岸，这样在解放军的炮火打击下每次都有几个目标被毁伤。另外，有的水陆输送车还在海中翻沉。如一辆满载新闻记者的输送车沉没，当场就淹死记者6人（其中有南朝鲜记者1人，日本记者1人），一时在台湾和国外新闻界引起了轰动，同时也更增加国民党的恐慌情绪。

国民党军在其水陆输送车连遭打击的情况下，又不得不改变抢滩上岸的方法。其运输舰在距金门更远的海面放下减少装载量的水陆输送车（这样航渡时可安全些），然后由输送车在多方向以单个下规律的跃进方式上岸。这种运输方式确实可以大大减少遭受炮击的危险，可是运输量同样也大为减少。

由于海上运输量远不能满足金门守军的需要，台湾当局又只得加紧空投运输。自从9月3日金门机场在解放军的炮火打击下起降中断后，国民党空军就一直利用视度较差的天候（黄昏、拂晓或夜间）对金门进行低空空投。解放军炮兵和空军针对这一情况，反复研究了打击运输机和空投场的办法。解放军炮兵以加农饱和中口径高射炮在前沿配置，对金门岛上各空投场构成空中火网，国民党空军的运输机一临空，马上以浓密的炮火射击，使其无法空投或升高盲目空投。敌机逃走后，炮火马上转移打击空投场和着陆物资，杀伤地面人员。针对国民党空军夜间空投的情况，解放军在前沿岛屿和突出部也模拟国民党军的炮光信号，诱使其运输机误投。这样，从9月23日至29日，解放军炮兵不仅击落国民党军运输机1架，击伤2架，而且使国民党空军的运输机投下的物资损失甚多，有许多还投到解放军阵地上来。台湾当局的空投计划没有一天能够如数完成。金门国民党军一天中最多只能得到100余吨空投物资，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随着金门守军遭封锁后处境日益恶化，美蒋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激化了，

已经公开表现出美国企图在金、马脱身，而蒋介石坚持不撤，仍想以金、马把美国拖在中国内战中。

毛泽东为何不取金门

正当美蒋为金门撤守问题激烈争执之时，1958年10月6日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福建前线广播站传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金门暂停炮击的消息，使台湾海峡两岸的军民乃至世界舆论都大感意外。从这时起，炮击金门进入一个打打停停的阶段，作战完全变成一场地地道道的政治战。

早在8月23日开始炮击金门前，毛泽东就确定了“走一步，看一步”的方针，对于是否夺取金门要看形势的发展而后定夺。自9月中旬摸清美国的战略底盘后，毛泽东就一直在思考下一步的方针。9月下旬美蒋在金门撤守问题上的矛盾公开化以后，毛泽东审时度势，从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或“台湾独立”的阴谋，以扩大反美统一战线的长远目标出发，毅然决定改变封锁金门的方针，让金门、马祖继续留在台湾国民党当局手中。这一决定，向台湾方面乃至全世界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再次显示出和平统一祖国的诚意。

毛泽东确定的这一新的方针，是基于我国国家利益、全民族的长远利益，经过对国际国内多种因素反复研究，权衡各种利弊，才最后下定的决心。从当时的某些眼前利益来说，如果逼蒋从金、马撤退或登陆夺取金、马固然有很大好处；但是如果斩断了蒋介石乃至整个台湾当局同大陆有地理关联的这条政治纽带，从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长远目标来看，反倒有可能增加困难。

自1955年浙东沿海作战结束后，中共中央、毛泽东对于夺取金门、马祖的考虑已完全服从解决台湾、实现祖国统一的大局。在大陆战事已结束，台湾海峡两岸的社会情况又有了很大变化之后，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已经改变。在共同维护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共之间重新对话，并建立某种程度的合作，在事实上已经有了可能。因此，自1955年以后中共中央就向台湾当局发出和平谈判和重新实行国共合作的建议。由于台湾当局依仗外国势力拒不接受，中共中央、毛泽东才决定以炮击金门这种军事行动以促进政治上全面解决台、澎、马问题。在炮击封锁金门后，如果只能夺取金、马而不能同时解决台湾问题，那么国共之间在地理上的距离将由不足10公里扩大到100多公里，对话、接触将更为不便。而且蒋介石失去象征其在大陆沿海存在的最后据点，将使得美国更便于制造“两个中国”或支持“台独”。反之，将金门、马祖留在蒋介石手中，不但有可能促进今后两岸关系的改善，也会使蒋介石有资本去抵制“台湾独立”的活动，同时能扩大美蒋矛盾，争取台湾广大军民，建立更广泛的反美统一战线。另外，当时毛泽东还考虑实行牵制美国战略力量的“绞索政策”，留下金门、马祖，可能套住美国，使它在战略上难以脱身。

10月5日8时，毛泽东指示福建前线部队：“不管有无美机、美舰护航，10月6、7两日我军一炮不发，敌方向我炮击也一炮不还。偃旗息鼓，观察两天，再作道理。”

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央军委确定了“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决策。为了向党内军内解释作出这一决策的原因，10月5日晚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指示中说：

我们目前以收复金马还是仍由蒋军占据金马，两者对今后斗争孰较有利，是我们当前必须考虑和决定的问题。当然，早日收复金门、马祖，对解除福建沿海地区的直接威胁，对打开海上交通，发展福建沿海的经济建设，对于鼓舞全国人民和我军的士气有很大好处，如果做到这一点，应该说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但是，把这个胜利和暂时利用金马把敌人套在绞索上，把解放金马和解放台湾统一来解决的长远利益比较起来，则不如把金马暂缓解放仍由蒋军占领似乎较为有利。

军委的指示还要求福建前线部队：在目前，宜减轻对金马的军事压力，使金马蒋军能够生存下去，是必要的。同时又要求仍要使其处于紧张的状态，拖住美国不得抽身。为了打破美国的停火的阴谋，在必要时，我仍可组织像过去那样的大打。总之，临机应变，主动在我。

10月6日凌晨2时，由毛泽东起草、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公开声明暂以7天为期，停止炮击，并向台湾当局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

这份《告台湾同胞书》不仅据理说明了炮击金门的理由，而且划清了台湾问题上内政和对外交涉的界限。这一公告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台湾当局虽然对此不公布，但是台、澎、金、马的军民从暂停炮击的行动、收听广播和口头传闻中也大体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金门岛上的气氛也马上缓和下来。岛上十多万军民从躲藏了40多天的阴暗潮湿的坑道和防炮洞中走出，见到了阳光，都为眼前的危险消除而感到高兴。岛上国民党军的炮兵在解放军的停止炮击期间也一炮不打，台湾军方则抓紧这7天大力运输，不仅运上几十天的补给品，而且运上了美国供给的8英寸（203毫米）重炮，准备长期固守。

对于彭德怀元帅的文告，台湾国民党当局随即表示“这完全是骗局”，对此“不予理会”。但是蒋介石也十分担心这一文告会影响美国对他的支持，因而强调“宁可冒继续炮击封锁的危险，亦不愿美国盟邦退出护航。”可是美国对这一文告的反应却是表示“欢迎”，并宣布从8日起暂停护航。不过美方同时又歪曲这一文告，把中国政府基于民族大义所宣布的暂停炮击和它鼓吹的所谓“停火”混为一谈，并要求实行“永久停火”，即承认它人为制造的海峡两岸分裂的事实。

台湾当局在金门虽然不敢破坏为时 7 天的事实上的休战，但是为显示自己尚有战斗能力，于 10 月 10 日“双十节”这天又出动飞机到大陆上空挑衅。当天，国民党空军共起飞 44 批 182 架作战飞机，至大陆沿海岸线地区，其中有 6 架窜入福建龙田上空。解放军空军当即以航空兵第 14 师一个大队起飞迎击，双方又进行了一场空战。空战中，解放军飞行员杜凤瑞击落 F-86 战斗机 2 架，其中一架的飞行员张乃军跳伞后被俘。杜凤瑞的飞机在空战中也遭击落，他跳伞后在空中被另一架国民党军飞机击中牺牲，这架国民党军飞机又随即被解放军高炮第 105 师击落。这次空战，国民党军被击落战斗机 3 架，解放军被击落歼击机 1 架，此后，国民党军的战斗机基本上不再进入大陆上空，其活动线退到福建的海岸线以外。从解放军空军 7 月末入闽至 10 月，福建上空共进行空战 13 次，解放军航空兵总共击落国民党军飞机 14 架，击伤 9 架。

10 月 12 日午夜，《告台湾同胞书》宣布的 7 天暂停炮击的期限已满，金门国民党军和当地居民又全部进入坑道和掩体。可是解放军一炮未发。13 日凌晨，福建前线广播站又播送了国防部长彭德怀对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的命令。对毛泽东的写作风格有所了解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个命令也出自毛泽东的手笔，命令全文如下：

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同志们：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他们固守。兵不厌诈，这不是诈。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我们这样做，就全局说来，无损于己，有益于人。有益于什么人呢？有益于台、澎、金、马一千万中国人，有益于全民族六亿五千万人，就是不利于美国人。有些共产党人可能暂时还不理解这个道理。怎么打出这样一个主意呢？不懂，不懂！同志们，过一会儿，你们会懂的。呆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美国人，必须滚回去。他们赖在那里是没有理由的，不走是不行的。台、澎、金、马的中国人中，爱国的多，卖国的少。因此要做政治工作，使那里大多数的中国人逐步觉悟过来，孤立少数卖国贼。积以时日，成效自见。在台湾国民党没有同我们举行和平谈判并且获得合理解决以前，内战依然存在。台湾的发言人说：停停打打，打打停停，不过是共产党的一条诡计。停停打打，确是如此，但非诡计。你们不要和谈，打是免不了的。在你们采取现在这种顽固态度期间，我们是有自由权的，要打就打，要停就停。美国人想在我国的内战问题上插进一只手来，他们叫做停火，令人忍俊不禁。美国人有什么资格谈这个问题呢？请问他们代表什么人？什么也不代表。他们代表美国人吗？中美两国没有开战，无火可停。他们代表台湾人吗？台湾当局没有发给他们委任状，国民党领袖根本反对中美会谈。美国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其人民是善良的。他们不要战争，欢迎和平。但是美国政府的工作人员，有一部分例如杜勒斯之流，实在不大高明。

即如所谓停火一说，岂非缺乏常识？台、澎、金、马整个地收复回来，完成祖国统一，这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务。这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过问，联合国也无权过问。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及其走狗，通通都要被埋葬掉，为期不会很远。他们一定逃不掉的。他们想躲到月球里去也不行。寇能往，我亦能往，总是可以抓回来的。一句话，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切切此令！

这一文告发表后，金门地区乃至整个台湾海峡的局势得到进一步缓和。在10月13日以后的一星期里，金门和对岸地区炮声沉寂，金门岛上的军民通过切身体会相信解放军是言而有信的，岛上恢复了正常的地面活动。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实际行动表现出的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以及基于民族大义发出的呼声，台湾当局虽然不响应，但是毕竟控制不住它在岛内的影响。在香港和海外侨胞办的一些报刊上，也纷纷发出重开国共和谈呼声。中共中央以打促和的方针，已经开始收到一定成效。

单日打、双日停的戏剧性战争

从10月6日起至10月20日金门地区休战的时间内，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美国三方都在认真观察各方动态，并继续做出试探，结果最后演变为一种极其特殊的带有戏剧性的作战形式，出现了古今战争史上的奇观。

自10月13日彭德怀的文告宣布人民解放军再停止炮击两一周后，美国官方十分得意，宣称是它的强硬政策才带来台湾海峡的和平。美国官方一方面在对外声明和中美大使级会谈中要求中国方面“永久停火”，一方面又压迫蒋介石撤退或减少在金、马的驻军。蒋介石面对中共方面和平呼吁和美国要其撤退的双重压力，为维持其军心士气，于10月14日在接见澳大利亚记者时公开发表谈话称：“不撤退，不姑息”。这实际上是向美国表示他决不接受撤军的态度。

美国政府为了要蒋介石听从自己的安排，宣布将派杜勒斯于10月21日赴台同蒋介石会谈。10月19日，美国竟又出动了4艘军舰，侵入金门海域为国民党军运输船护航。其实，美国已于10月8日宣布了暂停护航，这时解放军又未恢复炮击，在军事上本无护航必要，采取这一行动的目的，显然在于试探解放军的停止炮击是否会变为永久性的，并在杜勒斯访台前以此安抚一下蒋介石。

美军的护航行动明显违反了彭德怀文告中“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的规定，同时鉴于杜勒斯即将访台，中央军委决定提前恢复炮击。10月20日下午16时，解放军又以32个炮兵营又5个海岸炮兵连猛烈炮击金门，目标为岛上码头、机场和炮兵观察所等处，共发射了8800发炮弹。炮击使国民党军的3艘运输舰、1艘大型货船和1架C—46型运输机中弹，岛上守军

在遭炮击 70 分钟后才开始还击。

解放军对金门的炮击虽然给国民党军带来一定的损失，却也给蒋介石增加了拒绝美国要求停火和撤退金、马的资本。10 月 21 日杜勒斯到达台北，随即和蒋介石开始会谈。杜勒斯仍坚持美国原来的意见，即要蒋介石撤退在金门、马祖的驻军，并停止对大陆使用武力，造成两岸事实上的停火和隔离。结果双方争执起来，蒋介石恼怒地回答说，在我活着的时候不会撤军。最后，在双方都作出让步的基础上达成妥协。美国同意增加对台湾的援助，不再要求国民党从金、马撤退；蒋介石则答应“减少金、马驻军”，不再对大陆使用武力。11 月 23 日杜勒斯离台前，双方依此精神签署了公报并立即发表。可是在公报中对于不使用武力一条，台湾公布的中文本和美国公布的英文本有微小的差别。在英文本中，用的是“not the use of force”，意思很明确地表示“不使用武力”。可是中文本则是“而大量凭藉武力”，用的是比较婉转的语言以维护面子。

看到美蒋矛盾的进一步发展，为了在民族大义的前提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在杜勒斯回华盛顿后的第二天，即 10 月 25 日，由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再告台湾同胞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福建前线广播站播出。

这篇文告，规定了双日对金门“四不打”，即不打飞机场、码头、海滩和船只，是希望自己包围中的对手能长期固守，已属罕见。而文告提出的愿意向同自己作战的对手提供补给品，这更是古今中外战争中的奇闻。到了 10 月 31 日，中央军委又进一步发展了“四不打”的方针，决定：“今后逢双日对任何目标一律不打炮，使国民党军人员能走出工事自由活动，晒太阳，以利其长期固守；逢单日可略为打一点炮，炮弹一般不超过 200 发。”从此，正式确定了“双日不打单日打”的新方针。

这种单日打、双日停的奇特作战方式，一时使全世界的舆论感到惊奇。不过，人们都明白了这种炮击已经是一种政治上象征性的战争。实行象征性的单日打炮，是为了反对美国的“停火”阴谋和蒋介石拒绝谈判的顽固态度，表示战争仍然存在；在双日不打，实际上取消封锁，有意让国民党军固守金门，是为了将美蒋继续拖在金门、马祖这根“绞索”上不能脱身，并向台湾当局和广大军民表示中国共产党的和平解决的诚意。这种打法单纯从军事上看，确实为许多人所大惑不解，但它正是毛泽东的策略思想在战争中的一次生动体现。

在实行“双停单打”方针后，人民解放军于 11 月初又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炮击。这次炮击主要是出于政治上和外交上的考虑。因美国国务卿杜勒斯 10 月下旬在台湾大肆活动返美后，曾宣传金门战斗已经基本“停火”。蒋介石也宣传共产党军队已是“强弩之末”，已无力再打。为了加大美蒋矛盾，表示金门并未“停火”，同时使蒋介石得到拒绝从金、马减少驻军的口实，毛泽东经考虑后，中央军委又于 11 月 3 日下令对金门地区实施比较猛烈的炮

击，这次炮击前，福建前线部队司令部向国民党守军事先作了预告。从3日早上6时起，人民解放军炮兵以33个营又1个连向金门国民党军的阵地实施全面而又有重点的轰击。11月4日因是双日解放军未打炮，5日继续实施炮击，一时又造成“声势大，温度高”的场面。

由于国民党金门守军利用停止炮击的时机补充了弹药，并运进了美制大口径的8英寸（203毫米）重炮，因而又改变了10月6日前很少还炮的态度，在11月3日壮起胆子同解放军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炮战，集中火力轰击解放军的炮兵阵地，但是国民党军炮兵的火力毕竟不如解放军炮兵，当天解放军发炮1.2万发，国民党军还炮2000多发，最后以国民党军炮兵的火力被压制而结束炮战。在这一天炮战中，国民党军伤亡约140人，特别是大金门东半岛的炮兵损失较重。人民解放军的炮兵也有部分损失，在大金门正面的大、小嶝岛上的个别炮阵地因工事不坚固被打坏，部分人员伤亡。吸取了经验教训后，11月5日解放军炮兵扩大了阵地配置正面，并广泛实施了机动，还设置了假阵地迷惑对方。当天，解放军向国民党军炮阵地发炮3000发，又摧毁其炮阵地和观察所一部；国民党军还炮1000发，人民解放军却无一伤亡，成为金门炮战中的一个突出战例。这次炮战不仅达到了预期的政治、外交目的，也使新入闽参加轮战锻炼的炮兵部队经受了实战训练。

1959年元旦过后，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炮兵突然对大嶝岛滥施炮击，造成托儿所31名儿童死亡，17人受伤。为了对这一罪行进行惩罚，中央军委决定于1月7日再对金门实施炮击。为了表示只惩罚少数作恶分子，并利于国民党军继续固守金门，这次炮击只限于金门岛上的炮兵阵地。1月7日下午，解放军炮兵以23个营又8个连猛烈轰击金门，共发射炮弹2.6万发，国民党军还炮约7000发，最后终于以解放军的炮火占压倒优势而结束。这次炮战，实际上成为金门地区最后一次真正的炮战。炮击结束后，1月9日中央军委指示福建前线部队：“今后单日不一定都打炮。”此后单日的炮击也只转入零炮射击，对金门国民党军彻底实行不封不锁，让其悠然固守的方针。这样，在福建前线以炮兵为主体的陆、海、空三军既顶住了美国的战争恫吓，又粉碎了其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诡计。

台风化解了一次炮战

1959年8月23日，是我军炮击金门一周年。这个敏感的日子，从我军指挥系统多方面掌握的情况看，国民党军有可能在这一天对我军采取报复行动。我福建前线指挥员决定采取内紧外松的方法，从各方面做好工作，以求有备无患。

这一年，我军仍沿袭上年的做法，实施零炮射击。在发射实弹时，同时发射大量的宣传弹（实弹和宣传弹都打在无目标的空旷区）。用宣传弹大量散发《告台湾同胞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和《再告台湾同胞

书》等文告。以此不断揭露美国的侵略阴谋，阐明中国政府对台湾海峡局势的立场和我军炮击金门的旨意。前线部队和沿海地区民兵，还利用顺风，把一只只纸鸢、一个个红色气球、一座座矗立着标语牌的竹筏飘洋过海，使大量的图片、画页和宣传单飘落在金门岛上，给国民党军官兵和群众送去大陆上兄弟姊妹的温暖、关心和期待。

部队刚入闽时，修筑的工事都是土木结构的半永久型阵地。从1959年下半年起，我前线部队自己动手，砸石块、筛沙子、和水泥和折编钢筋，逐步建成钢筋水泥结构的永久型工事，至8月23日前，多数连队都有了永久型的阵地。

临近8月23日炮击金门一周年这一天，战争气氛在福建前线沿海地区一天比一天紧张。地方政府抓紧组织群众抢修道路、发动有关部门积极为部队准备粮食、炮弹，种种迹象，使基层官兵判断在这天恐怕会有一场更加激烈的炮战。

我炮兵第六师在北京训练时，各单位使用的是苏制火炮。部队到达福建前线后，即改装为国产130毫米和首批152毫米加农榴弹炮。战士们用上自己国产的火炮，心花怒放。总群领导也把他们使用的火炮视为“拳头”武器，说：“零炮射击，一般不用你们。”这样，平时只能偶尔打上几发，炮手们总觉得不过瘾。在临近炮击一周年之日，战士们早就铆足劲了，个个摩拳擦掌，想显显自己的武艺。

正在此时，福建前线气象站，天天预报要刮12级台风。由于部队指战员都未经历过“12级”台风，对它有多厉害，谁也不清楚，加之战备紧急，大家对“12级”台风警惕并不高。

8月22日晚，指战员在观察所和炮兵阵地严阵以待，密切地注视着金门岛的动静。

23日上午，薄云遮天，风力不大。下午3时许，忽然乌云密布，迅速吞没了阳光大地，疾风暴雨呼啸而来。官兵们只能在炮阵地里看着这惊天动地的狂风暴雨，倾听那狂风暴雨的呼啸。

翌日，天蒙蒙亮，风雨渐渐地见弱。他们走进村庄，映入眼帘的是一栋栋几乎没有瓦片的房顶，许多树木被连根拔起，墙壁坍塌，一片狼籍。

事后，从上级的通报上得悉，这次“12级”台风，使国民党军和我沿海部队都受到某些损失：群众房屋倒塌、农作物被毁坏，最惨的是不少渔民，连人带船被台风吹得无影无踪了。

国民党军原准备在这一天对我军进行报复，我军也铆足劲准备回击国民党军，但一场台风使炮战化为乌有。

炮击迎送美国总统访台

1960年，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风起云涌，反对侵略和殖民的统治

的烽火，日渐扩大。亚洲一些国家的人民不断取得斗争的胜利，美国政府感到形势于己不利。因此，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亲自出马到远东访问，进行干预。6月16日，他离开马尼拉到台湾“访问”。

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自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的第3天，杜鲁门于6月27日命令美国远东军入侵朝鲜的同时，派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至此已整整10年。这段期间，中美大使级会谈，到1960年6月，已开过97次会议，美国始终拒绝在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达成不以武力或者武力威胁解决两国争端的协议。从1958年9月美舰侵入福建沿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提出第一次严重警告，到此时已达108次，可美国政府仍然置之不理，如今艾森豪威尔又窜到台湾来“访问”，中国人民岂能容忍？为了反对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中央军委决定：按照单日打炮的惯例，于6月17日，艾森豪威尔到达台湾的前夕和6月19日艾森豪威尔离开台湾的时候，我军福建前线炮兵举行打炮示威“迎送”；炮击目标是大、小金门面向大陆的滩头、空旷无人地区和无工事的山头。我炮兵6师常委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和福建前指的部署，即召开了党委会议和分群领导干部会议研究炮击示威的具体实施计划。由于准备工作周密，行动隐蔽，金门国民党军事先未能察觉。

6月17日下午5时，福建前线司令部发表《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书》。当广播宣布要进行炮击示威的消息后，金门国民党军大吃一惊，防卫部和美国顾问组争先将文告内容抄报台湾，请示对策。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金门国民党军基本上按文告的要求行事：停泊在料罗湾内的两艘军舰立刻开往外海，金门各雷达站马上停止工作，地面人员进入坑道。

17日，临近20时，各级指挥系统人员在一分一分钟地对表。当秒表咯、嗒、嗒地走到20时整时，一串串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刹那间420余门大炮同时发出雷鸣般的巨响。反对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的炮击示威开始了。总群政委方官富在鹊乌鹊指挥所直接指挥莲河地区的炮击示威，总群群长沈仲文密切地观察敌情的变化。

此时，艾森豪威尔乘坐的军舰正驶抵台湾火烧岛附近，一听说打炮，即加速驶向基隆港，并指责“中共不加选择的炮击”，在我军炮击示威时，金门国民党军纷纷上报说：这次比“八·二三”炮击更猛烈，弹着点都在滩头、水洼和阵地之间。没有伤亡。各部通信人员在联络时，互报平安，个别人在开玩笑说：“老兄，解放军不是打我们的！”在我军炮击示威时，金门国民党军炮兵仅向莲河地区发射了28发炮弹，以示还击。美方对此甚为不满。23时，我军炮兵又向金门进行40分钟的炮击，这一天共发射炮弹3万余发。美国国务院还一反常态地提出抗议。

19日晨，艾森豪威尔即将离开台湾，我军于6时和8时30分两次开炮示威。每次炮击50分钟，共耗弹3.8万余发。炮击一开始，台湾“国防部”即查询弹着情况。40分钟后，金门国民党军进行还击，炮弹也是打在滩头及

田野里。台湾“国防部”再三要求报告还击的具体情况，大、小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只好又装模作样地向大陆打了千余发炮弹。当我军停止炮击后，金门国民党军就恢复了正常状态。黄昏时分，小金门岛上已炊烟袅袅。

金门之战宣告结束

1961年12月中旬，遵照中央军委关于保持台湾海峡局势稳定，不主动打金门国民党军的指示，我福建前线炮兵部队，把单日打实弹改为只打宣传弹。从此，实弹炮击停止。金门国民党军除偶尔打点零炮外，主要打的也是宣传弹。

根据福建前线形势的变化，1962年春季，我部分炮兵部队奉命将武器装备及作战任务移交给兄弟单位炮兵部队，于3月末顺利返回原部队。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断绝了与台湾当局的“政府间”关系。同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国防部长徐向前亦于当日发表《关于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的声明》。声明说：“台湾是我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为了方便台、澎、金、马的军民同胞来往大陆省亲会友、参观访问和在台湾海峡航行、生产等活动，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部队，从今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接到命令后，我军完全停止了对金门打宣传弹的活动。

至此，这场特殊的炮击金门之战宣告结束。

第二节 “反攻”老调

秘密制定“反攻计划”

“8·23”炮战之中，尽管蒋介石宣称据守金、马，但他深知，如果没有美国的护航与协防，据守不过是一句空话。随着台、美“蜜月”的结束，台湾海峡平静了相当长一段时间。60年代初，中国大陆由于连续几年自然灾害，加之政策失误，经济上出现严重危机，台湾国民党当局误以为反攻大陆时机已到，于是，蒋介石亲自出马召开了几次高级军事会议，调集得力干将，布置制定了庞大、周密的反攻计划，即“国光计划”和“旭光计划”，几十万军队日夜演练，蠢蠢欲动。这两项计划属于台湾当局的最高军事机密，初时甚至连美国顾问团也一时被蒙在鼓里，知情人可谓寥若晨星。而今30多年过去了，蒋介石已经作古，反攻大陆的梦想终成泡影，两项绝密的计划方得以陆续曝光。

“国光计划”是蒋介石密令台湾三军“副总参谋长”执行官唐守治中将担任召集人，精选优秀军官，配合参谋本部若干人员，成立了一个作业中心。后来，美国得悉蒋方瞒着他们搞“国光计划”后，勃然大怒，台湾当局只好请美国人也来参与，该项作战计划也随之易名为“旭光作战计划”。该项作战计划设想是国民党军先在闽南粤东地区登陆，迎后续部队到达，攻占福州、海丰等地，建立攻势基地，形成先期有利声势再向内地发展。此时，老蒋不顾70多岁高龄，多次在阳明山和风山基地召开军事会议。在一次会议上，他询问此次“反攻大陆”有无确胜的把握，最先问的是“陆军总司令”罗列，罗答“没有把握！”蒋介石闻言大怒，立即撤了罗列的职务，改由刘安祺担任。刘迎合蒋的意图，大言不惭地说：“一切准备就绪，反攻圣战绝无问题”。蒋介石顿时喜形于色，遂下令“三军”集结高雄附近基地，准备从高雄港登船出发。许多士兵都被逼写好了遗书，随时准备“殉死”。

发出“反攻动员”令

在秘密制定反攻计划的同时，蒋介石还到处散布他的“反攻”神话。

1961年3月29日，蒋介石对台湾青年宣称：

“面对当前反共斗争的新形势，真是报国救民千载一时的机会”。

1962年元旦，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提出“革新、动员、战斗”的口号。何谓“革新、动员、战斗”呢？蒋介石自己解释称：

“革新”包括“心理革新、工作革新、生活革新，而着重在心理建设的上面，要从精神、思想、观念、生活，到实际行动，全面的、彻底的革新”。

“动员”乃是“精神动员和组织动员，要求发挥同志的潜力，以提振全党的活力，并加强组织，深入群众，依循国家动员的轨道，完成一切准备，

以保证全民总动员的贯彻实施”。

“战斗”则是在于“发挥集中统一的战斗精神，结合全党为一个战斗体的组织，并以战斗纪律，保证党的政策、命令贯彻执行，使能在敌前、敌后、政治、经济……各个战场上，展开全面的战斗”。

蒋介石还宣称：

“以革新重启革命的契机”；“以动员集结反共的力量”；“以战斗争取反共革命的胜利”。

1962年3月29日，蒋介石在告青年书中提出：

“今日反共形势，我们已由掌握了复国之钥，进而要打开铁幕之门的时候了”。“青年子弟们必须确切准备”，“响应‘革新、动员、战斗’的号召”。

1962年11月13日，国民党召开八届五中全会，会议决定三大任务，其中首要任务就是进行“反攻复国”的动员与准备。蒋介石对美国记者称：

“目前正是进攻中国大陆的良好时机”。“我可独立反攻”。一旦我们开始反攻大陆，我们预期少则3年，最多5年内，完成我们底定全国的任务”。

“神话”的依据

听蒋介石的口气，好像“反攻圣战”迫在眉睫，他立刻就能扭转乾坤了。蒋介石为什么在1962年前后大肆叫嚣“反攻大陆”呢？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蒋介石错误估计了大陆的形势。蒋介石宣称：

中共“现在是正处于公社失败，工业倒闭，俄援不继，灾荒饥饿，空前的毁灭恐怖的当口；亦就是天灾人祸，交相煎迫的当口”。“陷于全民的反饥饿、反控制、反镇压的大潮大浪之中”。

“中共部队的效忠精神业已愈来愈糟，理由之一，是中共政权无法以较人民为多的食粮配合供应他们的部队。”

大陆民众“所遭受的迫害，已达到不可忍受的程度”，“大多数中国人民，均热切盼望我反攻大陆，推翻匪伪政权”。

大陆发生饥荒是事实，有些人有些怨气也能够使人理解。但决没有蒋介石所说的出现了“反饥饿、反控制、反镇压的大潮大浪”，也没有军队不忠现象，更没有大多数中国人热切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的事实。有的只是中国人民在中共的领导之下，同心同德，改正错误，战胜困难，建设新中国的雄心壮志与实际行动。

第二，蒋介石企图利用中苏之间的意见分歧。蒋介石在回答记者问时宣称：

“这两个共党集团间的分裂，在赫鲁晓夫或是毛泽东任何一人被清除之前，没有弥缝的机会”。中共与苏俄间“争执激烈，如果中华民国军队反攻，苏俄将不会援助中共”。‘中共与苏俄之间的分裂，已为中华民国光复大陆

造成一适当的机会”。

1963年3月4日，蒋介石在《反攻复国的前途》的演说中，专门分析了中苏之间的矛盾，提出：

“今日世界反共形势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赫、毛斗争加剧以后，自由国家如何把握利用这一机势的问题”。

从利用中苏矛盾的角度出发，蒋介石决定“反攻大陆”立即展开。

第三，企图在台海造势，拖住美国。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美国人为了从台湾海峡脱身，重新考虑对华政策，企图松动同中国大陆的关系。特别是肯尼迪入主白宫前后，曾发表言论称：他坚信美国必须保卫台湾，但应划一条清楚的防线，他一直认为金门、马祖对防守台湾并非必不可缺，美国防线应仅仅划在台湾本岛周围。肯尼迪的主张，遭到了蒋介石与“外交部”不点名的批评。肯尼迪上台后，虽然在改变对华政策方面迈出仅仅一小步，但也令蒋介石忧心忡忡。他之所以在两度“海峡危机”之后，再度点起海峡战火，其目的就是企图通过台海局势出现一定程度的紧张，牢牢拖住美国，同时借机试探一下美国对台“反攻大陆”的真实立场究竟如何；还可在政治上造成一定的声势，配合自身的经济发展成就，引起国际上的瞩目。

“反攻圣战”的部署

正是基于上述三个原因，蒋介石认为1962年至1963年是他“反攻”的“决定年”、“胜利年”，遂在新竹召集国民党军队将领会议，具体研讨“反攻”部署。为了切实完成“反攻”，蒋介石并非只说不做，他的具体措施与步骤是：

第一，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筹措反共经费。1962年4月27日，台湾“立法院”根据蒋介石的旨意通过了《国防临时特别捐征收条例》。该条例规定，为完成“反攻圣战”，征税金额：各类货物税的30%，娱乐税的50%，筵席税的50%，地价税的40%，铁路、公路票价的30%，电报电话价的30%。4月30日，蒋介石明令公布此一条例。5月1日起该条例生效。

时任“财政部长”的严家淦，解释“临时国防特别捐”不增加企业负担，只从个人所得税中增加，以增筹国防经费，并不会引起通货膨胀。“行政院长”陈诚也就开征“临时国防特别捐”发表谈话，希望同胞支持当局政策，承受暂时负担，增进集体安全，呼吁工商界人士与当局合作。

尽管台湾各界人士对征收“临时国防特别捐”表示不满，并且根本不相信蒋介石的“反攻”神话，但都怕被扣上一顶红帽子吃官司，故被迫上交，据台报统计：14个月内共征收6000多万美元的“临时国防特别捐”。

第二，设立“反攻”机构，全力进行“反攻”准备。1962年初，国民党当局成立了以蒋介石、陈诚为首的“最高5人小组”（又称“反攻行动委员会”），作为“反攻”大陆的决策机构。

1963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之际，蒋介石在鼓吹“反攻大陆”的同时，提议筹组“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蒋宣称：

“本党中央前后筹组反共联盟及拟订反共建国共同行动纲领之议，当以审虑未周，延未施行，现一切反攻准备，既已新近就绪，而在复国建国整个过程中，尤复经纬万端，非举国意志更加集中，才智更加发挥，行动更加一致，不足以迅赴事功，加速胜利。九全大会，允应掌握时机，恢宏襟袍，以兴海内外仁人志士才智俊贤，推诚合作。中正盱衡全局，深觉此时筹组并召开反共联盟，实为符合全国愿望之举措”。

基于此认识，蒋介石向大会提交了《反共建国共同行动纲领》案，要求大会议决。该案的要点是：

(1) 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以集中海内外意志与力量，提供反共建国大计，争取胜利为主旨；

(2) 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为在现行宪政体制下之全民性结合；

(3) 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以个人为主体。由各民族、各党派、各社团、各侨团、各经济团体、各学术文化团体、各妇女及青年团体——特别是敌后组织，具有声望、成就与代表性之人士参加之；

(4) 拟具反共建国共同行动纲领草案，融会各方意见，提交联盟会议，以为今后共同行动之准据；

(5) 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会议决议事项，其属于政府职权者，经由政府有关方面采择施行；

(6) 责成九届中央委员会根据上项原则，研拟具体方案，付之实施，并望于最短期内达成此一任务。

蒋介石提交的议案无人敢违，自然为大会所通过，并决议“遵照总裁指令积极贯彻”。

翌年4月30日，“行政院”成立“反共建国联盟”筹备委员会，由一生反共的谷正纲挂头牌，其他成员均多为蒋介石的准嫡系与忠臣，如：袁守谦、陶希圣、余井塘、张其昀、黄伯度、阮毅成等。当时还煞有介事地下设秘书处于台北，辖议事、联络、新闻、总务4个组，进行各项筹备具体事项。与此同时，蒋介石、唐纵公开号召海内外人士参加“反共建国联盟”。然而海内外人士相信蒋介石“反攻”神话的越来越少，参加者寥寥无几。

第三，纠集军队、特务准备窜犯大陆。在筹集“反攻”经费与建立“反攻”组织的同时，蒋介石还下达了“征兵动员令”，提前开始下年度的“现役征集”。蒋还令各部门将台湾的各种轮船、渔船和车辆，纳入“船舶、车辆动员编组”。为了吸取在大陆失败的教训，蒋在“反攻”前不断对部下进行“反攻”政治教育。北投的政工千校特别繁忙，临时开设战地政务班，为未来登上大陆培训党政干部；政工部门要求士兵要明确“为谁而战？”要有

献身精神，并在每一个士兵的鞋上和皮带上都刻有“光复大陆”的字样。蒋介石还从日本购进大量血浆，准备与中共决一死战。

美国方面早就得到台湾当局可能发动反攻的情报。见到事态愈发严重，美国总统肯尼迪出面警告说：“台湾如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无异于自杀”，“台湾如出兵大陆，将违背‘中美协防条约’”。蒋介石心虚了，在凤山又一次召开军事会议，以美国不赞同和信守“台美协防条约”作为藉口，不得不宣布暂缓军事反攻，改由情报机构派遣特工人员偷袭大陆。

第三节 幻想成了泡影

叶翔之布置“游击活动”

经蒋介石批准，特务头子、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组主任兼“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叶翔之具体部署了代号为“海威”、“班超”等的派遣武装特务骚扰大陆沿海的情报作战，企图进行“游击活动”与“渗透工作”，建立组织，配合大陆的所谓“抗暴”运动，扰乱社会，颠覆人民政权。

为了执行这两个破坏计划，美蒋特务机关，在台湾北内湖乡开办了“海龙训练班”，在台北淡海村开办了“海威训练班”。叶翔之任“海威训练班”主任，台“国防部情报局”副局长任建鹏任副主任，“国防部情报局监察室”主任项乃光任教育长。在训练班里，对那些搜罗来的特务进行了海上渗透登陆、山地作战、野外生存、策动暴乱、爆破射击、心理作战、搜集情报、电讯联络等各种特务技术的训练。

特务机关为了驱使这些特务娄罗们到大陆来卖命，竭力对他们进行欺骗、蒙蔽和利诱。叶翔之等数次对他们进行“精神讲话”，要他们相信“大陆政权已摇摇欲坠”、“反攻的时机已经成熟”，他鼓励特务们潜回大陆组织反革命武装，策动暴乱，建立所谓“游击走廊”。叶翔之还奉承这些武装特务是“国家的中坚，时代的宠儿，天之骄子，革命的先锋队”。他欺骗说，“只要你们登上大陆，一定会得到大陆同胞的拥护和爱戴”。

为了给这些特务打气，叶翔之亲自给他们授衔、授印，并设宴“欢送”，祝他们“马到成功”。

然而，事实是这样的无情，所有从海上和空中派来的美蒋特务，无一漏网地被我沿海军民歼灭。蒋介石的一切幻想，变成了泡影。

下面所举是几个地方的军民和人民群众歼灭台武装特务的经过。

荒岛上瓮中捉鳖

1962年10月7日天刚破晓，广东省惠阳县港口公社的一艘渔船驶向小星山岛南面的海面打鱼，忽然发现远处漂着一个黑色物体。具有高度警惕的渔民们，马上放下一只小舢板，由杜冯来等4人划着前去查看，发现原来是一只放了气的半浮半沉的橡皮艇，艇里有5支桨和一颗子弹，附近海面上还漂着同一式样的六枝桨。杜冯来立刻想到，可能是台湾特务来了，而且从艇上的5支桨还未漂散、海面上的6支桨也漂流不远等情况来判断，乘船的人还是刚来不久。他又根据海潮、风向和橡皮艇、船桨的位置，判定敌人可能爬上了附近的一个无人荒岛——小星山岛。

情况初步分析判定后，杜冯来等立即掉转渔船驶回港口，向港口公社、公社民兵连和当地公安机关报告。

惠阳县港口公社民兵连得到杜冯来的报告，马上紧急集合。理发师莫镜明、庄同、张耀南都是民兵，他们正在替顾客理发，听到紧急集合的命令，马上停止工作，飞奔到民兵连部报到。搬运工人李灶等也放下正在搬运的货物，跑步前去集合。不久，来自各行各业的民兵就集中到了连部。这些民兵的一部分在港口墟一带布防，准备在特务登陆时给予迎头痛击；另外 21 名民兵和 3 名人民武装警察，由 4 名干部带领，乘坐两艘机动渔船，由杜冯来领航，从港口急驶小星山岛搜捕敌人。

他们在小星山岛登陆后，分三路搜索。有一路负责搜索海岛的山脚地带，他们英勇向前搜捕埋伏在乱草从中的特务，开始了战斗。另一路民兵由人民武装警察助理员滕喜祥和民兵班长李灶率领，抢占小星山岛的制高点。他们听见山下激烈枪声，就赶向枪声响处，在半山腰打死了一个武装特务。接着，又在一个山窝里发现了第二个武装特务，他一见民兵吓得连忙双膝跪下，弃械举手投降，活捉后查明，原来他是这股武装特务的“少校通讯组长”周俊义。接着，他们又和 6 个正要抢占山头的敌人迎面相遇。理发工人莫锐明端起机枪向敌人猛烈扫射，这 6 个特务被迫退到一个山洼里躲藏。滕喜祥、李灶部署了火力，封锁了这个山洼，并向敌人喊话：“你们被包围了，赶快投降！”这 6 个武装特务无路可逃，只好举手投降。

这一路民兵走下山坡和其他两路民兵会合，经过对捕获的特务进行现场审讯，了解到还有 4 个特务没有抓到。他们就在岛上继续搜索。当晚，海军派来了炮艇，封锁了海面。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公安部队、地方干部和民兵，也陆续赶来。第二天天亮，在全岛进行了大搜索，终于把特务全部捉住。

绿豆岭水泄不通

在这以后不久的 10 月 28 日拂晓，又有两股台湾武装特务在广东省西部电白县沿海登陆。这两股武装特务共 22 人，带着 35 支长短枪、2000 多发子弹以及烈性炸药等，乘两只橡皮艇在电白县爵山公社下村海滩登陆。他们刚上岸，就被渔民和民兵发觉。渔民和民兵马上摸黑向附近的民兵队和公社报告，公社民兵立即将特务登陆点附近的交通要道和海面封锁起来，并且占领了控制海面的前岚岭制高点。附近各村庄的男女老少也闻讯赶来，他们拿着木棍、菜刀、鱼叉、禾镰等等，四处搜捕敌人。

天明以后，民兵陈金品发现荒僻的绿豆岭上，有两个人忽隐忽现，在一块石头上还搁着一个背包。陈金品立即向他所在的爵山公社排坡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杨亚基报告。杨亚基带着几个民兵与陈金品一起，跑步登上绿豆岭。22 岁的共青团女支部书记杨亚妙，拿着一把禾叉也跟着上了山。不久，民兵营长杨大应也带领民兵们赶来。他们首先和两个放哨的敌人遭遇，杨大应高声喝令敌人投降。两个特务在威武的民兵面前吓得浑身哆嗦，乖乖地弃枪投降了。藏在附近的另一个特务正想逃跑，被民兵发现。一个民兵赤手空拳地

扑上去，双手卡住特务的脖子，这个特务吓得赶紧举起了双手。民兵们从他身上搜出一支手枪和一枚手榴弹。

这时，闻讯赶来的民兵越来越多。当他们发现第4个特务的时候，22岁贫农出身的民兵杨妹九悄悄地绕到这个敌人的身后，猛然冲向前，一手抢过敌人的冲锋枪，趁势用冲锋枪枪托猛力一击，把这个特务打倒后活捉。在继续搜捕的过程中，民兵们又活捉了4个特务。

这时，天已渐渐黑了。民兵们仍在巡逻搜索。突然，杨大应发现一个石洞内躲藏着两个敌人。他独自一个扑到沿口外一丈远的地方，依着岩石，举枪喝令敌人投降。有一个特务看到跟前只有杨大应一人，便拿出金条和手表来收买他，要他不要开枪。特务们对他说，要金条有金条，要手表有手表。杨大应一听气坏了，他端起枪来就把这个特务的嘴巴打伤了。其他民兵闻声赶来，冲进石洞抓住了这两个特务。

民兵们这时已抓到10个特务，对这些特务进行现场审讯后，知道还有12个特务躲藏在这条弯弯曲曲到处是大石头的沟壑内，这时，附近几个村庄的群众也都拿着刀枪等各种武器到来，把若大的一座绿豆岭围得水泄不通。民兵和群众怕特务利用夜色逃跑，就点起五盏大汽灯，挂在绿豆岭上的沟壑附近，把那里照得通明。附近村庄的老大娘和媳妇、闺女们，也纷纷烧茶煮粥，成群结队地挑到绿豆岭，给正在围捕特务的乡亲们吃。许多妇女还从家里带来了捆缚一百个特务也用不完的绳索。躲藏在沟壑内的最后12个特务看到无路可走，只好一个个举着手钻出来投降。当民兵押解到这两股特务回县城的时候，沿途村庄的老大爷、老大娘们，都气呼呼地一边骂，一边拿着木棍、扫把要打这批胆敢爬上大陆来捣乱的台特，有些老大娘还哭着要替解放前被国民党反动派害死的亲人报仇，特务们个个吓得浑身发抖。

“光杆司令”的下场

10月8日，有一股武装特务爬上惠来县海滩不久，沿海的渔村里就到处响起了报警的螺角声。带队的“广东反共救国军独立第一纵队”的“司令”吴纯彬，吓得丢掉了帽子和地图，在登陆点附近乱窜。有几个武装特务不久就掉了队。当天，他带着剩下的特务在野地里伏了一天。到了晚上，他看到交通要道上已经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更吓得手足无措，赶紧叫特务们丢掉电台等笨重装备，分头逃命。

吴纯彬带着一个特务找路逃生。在四处乱窜的时候，他和那个特务又在躲避巡逻的民兵时走散。他慌慌张张地钻进一处小高地下面的石头缝里，提心吊胆地挨过了一夜和一个白天。到了晚上，他实在冻饿难当，就爬出石头缝想到地里挖几个番薯充饥。他刚一出来，就被在这个高地顶上放哨的三个民兵发现了。民兵们拦住了吴纯彬的去路，高声喝问：“口令？”他抖抖索索地说：“我是惠来人”。民兵一听对方答非所问，接着又喊：“不准跑，

你开枪就打死你！”吴纯彬被吓得连连鞠躬，结结巴巴地说：“兄弟狗胆包天也不敢开枪，更不敢跑，要跑现在也跑不动啦，从上陆到现在，我一口饭还没有吃呢！”

这个特务纵队“司令”被押到大队部以后，惊魂未定地说：“大陆上全民皆兵真吓人呀！就像是天罗地网，不说我一个吴纯彬，就是千万个吴纯彬也逃不出你们的手心啊！”

深山密林歼伞特

1963年6月以后的一个时期，我广东、福建、浙江、山东、江苏等沿海军民又连续歼灭了9股台偷渡登陆和空降武装特务90人，再一次粉碎了美蒋当局对沿海地区进行小股武装骚扰的罪恶阴谋。

6月下旬的一天，海南山区的各族人民正在欢度收获节，一架美蒋间谍飞机，以夜幕作掩护，偷偷地潜入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上空，在陵水县山区空投了一股武装特务。

敌人窜扰的罪恶行径立即激起了山区周围各族人民的无比愤怒，人们一听到消息，立即拿起山刀和枪枝，纷纷上山，奔向敌人空降地区。黎族、苗族的民兵和猎手们，熟悉地形，一马当先。曾在解放初期剿匪战斗中立过功的黎族民兵连长谭才英、副连长吴亚保，刚刚从广州开完全省民兵代表会议回来，放下行李，立即星夜出发。许多在主岛落户建设的复员军人，也雄赳赳地赶上山来。在附近执行任务的解放军边防部队某部的战士，闻讯后日夜兼程挺进。

一个围歼空降特务的天罗地网就这样迅速撒开了。

各族民兵和战士们到达敌人空降地区后，连夜设岗布哨，把各个山头、溪涧、小路都控制起来。

在某山头上放哨的凌水和保亭县交界的某生产队的黎族民兵班长黄生朝，民兵黄大祥、黄大崇三人，埋伏在灌木丛里监视着山坡的路。夜半，对面山坡上忽然传来脚步声，黄生朝等马上警惕起来。脚步声越来越近，在寂静的山林里听得特别清楚。三个人带的只是三支火药枪，大家忙把机头打开，每个人心里都热呼呼的。

一个黑影看得见了，沉着的黄生朝一动也不动的，也没有发口令，这个二十一岁的共青团员，心里已准备好了对策，要给敌人打个措手不及。

“站住！”黄生朝等敌人行至距他们只有五六步时，才大喝一声，三个人一齐跃身冲出灌木丛，举枪对准这个家伙——空降特工符锦富。

与此同时，一个黎族村庄——陵水县的小妹生产队，人们已经熄灯休息了，只有生产队长黄其英的茅屋里，还有微弱的火光。

这个只有四十多户人家的小村，青壮年人大都上山搜索敌人去了，黄其英一家三兄弟就去了两个，三弟其元因身体不适，留在家里，他年老的母亲

按照黎族人民的风俗正忙着酿酒准备欢度收获节。这时候，突然一个身材高大的陌生人摸进屋里来，有气无力地说：“有水吗？给我水喝。”黄其元一听这个口音，就知道他不是本地人。他一面递上一碗饭汤，一面仔细地打量一下这个不速之客，还带着一支枪。他差点没叫出声来。

“可能是空降特务，决不能让他跑掉！”

黄其元一家是在旧社会的苦海里泡大的。他两岁便失去了父亲，身体还没有牛屁股高就给地主放牛了。母子四人被国民党军队迫得出走异乡，连仅有的一口铁锅也卖了。全家老小替地主做牛做马，直到解放以后才开始过幸福的生活。他三兄弟都参加了民兵，现在，仇人相见，恨不得一下把敌人抓住。

这时候，茅屋里只有他母子两人，手无寸铁。黄其元苦苦思索着活捉敌人的对策。他故意装作热情地和敌人搭讪，一面又给敌人递上白饭，又装着给敌人张罗睡觉的地方。他探问敌人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个狡猾的家伙，一会说同行的有一百多人，一会又说是十多人。满嘴胡话，真是不打自招。

当黄其元正在拉扯着的时候，他的老母亲已十分警惕地溜出门外，找干部去报告了。一会儿，屋外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这个特工惊慌起来，站起身拔腿就跑。“不准动！”从山上归来的黄其连和民兵陈其光、冯有辉偕同边防战士早已把他团团围住，黄其连眼明手快，一把夺过敌人的卡宾枪。

在强烈的手电筒照射下，这家伙耷拉着胡髭满脸的头，如丧家之犬。这股空降特工的少校副队长兼通讯组长周少茂，就这样乖乖地当了俘虏。这个特务自供是在慌乱中走散了，他满以为像台湾美蒋特务机关所说的，这里是什么“安全地带”，有他们的“游击队”活动，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明白，山区各族人民都跟美蒋有不共戴天之仇，他们只有缴械投降才有“安全”。

胜利的消息频频传来，山上山下士气大振。各族民兵、猎手和边防战士们，组成许多搜索小组，乘胜向敌人躲藏的深山搜索前进。

这里群峰绵互，浓荫蔽日，到处都是七八十度的陡坡。漫山遍野长满了荆棘茅蒿，地上覆盖着枯枝腐叶，完全没有道路，搜山的勇士们只能披荆斩棘，开路前进。他们攀着野藤、矮树，一步一步地向前搜索。那些被誉为“飞行小组”的战士们，更是风里来，雨里去，一把炒米一把水，昼夜兼程。他们衣服给荆棘划破了，小腿给山蚂蝗咬出了血，也毫不在意，一心想着迅速、彻底、干净地消灭敌人。

山下的群众也纷纷烧茶做饭，把粮食、雨具源源送到深山里去。附近公社的党支部书记曾繁植也亲自领着一支运输队上山来。这个四十多岁的共产党员和同行的三个伙伴，都参加过解放初期剿匪的战斗，走山间夜路毫不困难，他们一手摸路，一手扶扁担，踏着怪石嵯峨的山涧溯源而上，绕过水花飞溅的瀑布，在长满青苔的悬崖滑下来，又从黑糊糊的山洞里穿过去，就没有摔过一跤，也没有掉一粒米，给上山的子弟兵，送来了茶饭。

来自公社的青年姑娘郑亚照，干脆把大米、饭锅挑到山上掘坑立灶，办起食堂。突然哗啦啦的来了一场夏季暴雨，她赶忙把身上的雨衣披在灶锅上，全身被雨水淋得湿透，她毫不理会，热情地招呼着路过的战士和民兵。当她看见亲人的主服被荆棘划破了，又赶忙掏出针线包为他们把破洞缝好。

经过围追，剩下的6个敌人已被压缩在一座大山的山腰上，陷入四面包围之中，搜山小组像一把把尖刀似的从四面八方插向敌人的巢穴。

某部5连的上士班长陈培珠领着5个战士爬山越岭，一直插向山腰。搜索间，丛林里一种异样的声响引起他们注意，他们马上分头埋伏，接着发现两个家伙正想到溪涧舀水呢。尽管这些敌人狡猾，但逃不过训练有素的战士的眼睛。陈培珠向战友们使了个眼色，悄悄向敌人逼近。

陈培珠他们从早上开始已搜索了好几个山头，没有碰上敌人，心里早窝了一肚子的火，此刻，敌人就在眼前了，决心抓个活的！他们距离敌人只有二十米了，便大喝一声：

“不准动！”

这两个家伙闻声扭过头来时，陈培珠和战士像猛虎般地扑了过去，两个特工只好颤抖着举手投降。

围歼飞贼的包围圈越来越紧了。从山沟正面往上搜索的是少尉参谋胡光达和列兵刘活成。胡光达曾经在朝鲜战场上和美国鬼子较量过，荣立过三等功；刘活成是入伍不过一年的新战士。他俩一股劲地向前搜索，突然前面传来隐隐约约的脚步声。

“可能是敌人！”胡光达立即和小刘在一块山石后面隐蔽下来。

脚步声越来越近了，果然是一个台特，这个狡猾的家伙一脸惊慌的神色。胡光达一个箭步从山石左侧跃出，跳到敌人面前，喝令敌缴枪，小刘跟着冲上前去，两支枪一齐对准敌人胸口。

这家伙猛一惊，吓得脸色惨白，口颤颤地说：“……不要开枪……”双手已举起一块白手帕，浑身打着哆嗦。

胡光达看到这个台特的狼狈相，不禁又想起在朝鲜战场上美国鬼子投降的狼狈相，真是一模一样。不过，此刻他心里急着抓台特，无心去观赏这家伙的丑相了。他俩把俘虏交给后面赶来的战友，又继续往前冲去。

这一撮残余特务被民兵和战士正追赶得走投无路，刚好就在这一条山沟里和胡光达碰上了。胡光达扬起手枪大喝一声：“缴枪不杀！”话音未落，刘活成已扑到敌人面前，附近的战友也闻声蜂涌而来台特们眼见无法逃脱，只好俯首就擒。其中一个家伙，就是这股空降台特的少校队长邓建华。

至此，这股由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湾的特务机关“海军辅助通讯中心”（N.A.C.C）直接派遣的八名空降武装特务，全部被歼了。缴获手枪、无声手枪、卡宾枪和弹药、伞具、通讯联络器材等军用物资装备一大批。这些罪证，从武器电台到电池、水壶，几乎件件都打上“美国制造”的罪恶标记。

这股全副美式装备的特务自供，他们从选拔、派遣、训练到制定破坏任

务，都是美国驻台湾的特务机关“海军辅助通讯中心”（N.A.C.C）一手经办的。这股号称“海南苗黎族自治区饥民革命行动团”的台特，是阴谋在五指山区建立所谓“游击基地”，进行窃取军事、政治、经济情报的破坏活动，并且作“特种战争”的实验。但是，当他们刚刚着陆不久，就逃不了必然复灭的命运。

当民兵和战士们押着俘虏和战利品下山时，各族人民都纷纷前来观看，小妹村的黎族同胞们更是欢欣雀跃，男女老少争相前来慰问全歼美蒋特务的子弟兵，山上山下响起了胜利的欢呼。

挺进人民罗网的“挺进军”

1963年8月20日凌晨，上弦月躲到云层里去了，四周漆黑。澄海县坝头公社洲畔大队的民兵王良河正在屋里煮饭，准备一早去生产队的田里除草。忽然门外传来了一阵紧一阵的狗吠声。良河想到门外察看究竟，刚踏出门，一枝枪口对准了他的胸口。几个陌生人挟持着他就走。到了堤上，一个家伙问王良河：“你们这里有没有山？”王良河听了，心里好生奇怪：三更半夜，这些人为什么要上山，难道这些人是……。便说道：“我们这里没有山。”走了几步，一个家伙拿出一只金戒指，就往王良河的手指上套。王良河这时心里明白了：这些人的的确确是美蒋武装特务。他不禁把手一甩：“不要你们的金戒指。”那个特务眼看此计不成，又从衣袋里拿出一叠钞票来，在王良河面前晃了晃说道：“金戒指不要，钞票可要？”王良河又答道：“什么东西也不要。”特务们眼看利诱不成，便改用威胁了。他们将王良河的手缚了起来，然后对他说：“老实告诉你，我们是从台湾派来的游击队，我们不安全，你也活不成！你要好好想办法找个地方给我们藏下来。”说完这些话，便推着王良河说：“走！快走！”

特务们挟持王良河来到了一片甘蔗林面前。8月的甘蔗长得比人头还高。王良河被推进了甘蔗园。王良河看着那些用特制的电筒在查看地图的特务们，心理怎么也不能平静，他心里的盘算：我跑出去，要是敌人开枪打死我，敌人会暴露自己；要是打不死我，我报告大队后，敌人就完蛋。最后，他下定决心，找寻逃脱的机会。他暗中慢慢将捆绑着两手的黑绸布解开，同时向特务假意说这块地天明有人来除草，这儿是不能躲藏的。一个特务看见天快亮了，便急了起来，马上要转移。正当特务们从这片甘蔗地转移到另一片甘蔗地时，勇敢、机智的王良河，趁着特务们走得慢，像离弦的箭一样快步飞跑出去，一口气向大队民兵营长王镇田的村里飞奔。三个前来追赶的特务怎么也追不上熟悉地形的王良河，但又不敢开枪追击，让王良河跑掉了。

王良河逃脱以后，敌人眼见情况不妙便慌忙跑出蔗园，急奔外沙河，企图夺船逃命。

四野宁静，蓝天闪烁着点点星光。停泊在外砂河畔、准备天亮返航的饶

平县海山公社隆东大队的一艘船上，睡着庄汉坤、庄汉烈两兄弟。突然，堤岸上传来了低沉的喊声：“渡我们过河。”汉烈往堤上一望，隐隐约约看见有十多个背枪的人，他以为是“大军”，急忙准备起锚。可是，船没走几步，岸上的人已跑到船边，跳上船来了。

汉烈见来势不妙，暗暗想道：这些人这样凶恶，哪像“大军”。正在犹疑不决，那个手持短枪，坐在船头的人叱道：“开船出海，到香港去。”汉烈一听这话，就断定是特务，于是下定决心，就是死，也不能把敌人送走。可是，怎么办？他看了看天色，此刻天快亮了。他想，天一亮，两岸行人多，那时跳水逃脱就容易了，他决定先在船上慢慢消磨时间，伺机逃走。

船傍东岸，慢慢地移动了。惊慌的特务，嫌船走得太慢，用枪逼着汉烈：“起帆。”本来这时正是东北风，既顺风又顺潮，一起帆，船就会像箭一样向出海口飞驰。只见汉烈机警地答道：“风不好，不能扯帆。”那个特务又说：“把船驶到河中间。”汉烈撒谎说：“这条河中间沙滩多，容易搁浅。”这可把敌人吓坏了，敌人再不敢说话了。这时，在船头划桨的汉坤故意把桨停了下来，特务一阵惊叫：“干什么？”汉坤答道：“桨坏了，要修理。”

尽管两兄弟想尽办法拖延时间，可是由于顺风顺流，船还是迅速地流向港口。两兄弟心急如焚。就在这个时候，岸上出现了几个民兵，船旁也正好横着一个浅滩，船慢慢绕过码头。汉烈眼明手快，便将船划到浅滩上，用力把舵往下一插，船唰地一声，碰着沙滩搁浅了。这一停，敌人慌张极了，就在这一刹那，两兄弟一个箭步跳下沙滩逃脱了。“砰！”敌人开枪了，接着岸上的民兵也向敌人开火了。原来，王良河从蔗园里跑出来以后，就立即把美蒋武装特务登陆的情况报告给洲畔大队的民兵营长，很快，公社、县就接到了关于敌情的报告。按照严密的部署，洲畔大队的民兵迅速出动了。

民兵副班长王映藩和民兵王芝聪，这天刚好睡在大队的民兵部。一听说发现了敌情，一骨碌就爬起床来。民兵王厝边、王汉光正在准备吃饭，以便天一亮就下田除草，听到抓特务的消息，就放下碗筷，三步两脚跑到了民兵部。他们四人带着枪，一齐来到和尚围上。复员军人、民兵王细妹，听到有人叫他侄儿去抓特务，也跑来了。在围上，也们看见外砂河面上的一只模模糊糊的船影，他们说道：“快追，不让敌人逃跑。”

外砂河北接韩江，南通大海。河面东西宽约六、七百米，是韩江的支流，是这个地区主要航道。

这时那艘被敌人夺占的船只正傍着河西，顺着退潮的急流，从北往南驶向大海。六个民兵划着小船，斜掠过河面，赶了上来。船上六对锐利的目光，透过朦胧的河面，紧盯着前面那艘船影。

船影越来越清楚了。民兵副班长王映藩命令大家，作好一切战斗准备。后来，王映藩又考虑了一下，觉得我方船小，且众寡悬殊，不如先上河西岸，利用岸上有利地形，缠住特务，待大队民兵上来。

六民兵来到了河西堤岸。岸上是一座蜿蜒曲折的石提，离石提约一丈

远，是一带防风林。王映藩立即下命令：大家利用石堤作掩护，跑步前进，追踪那艘被敌人夺占的船。他们一口气赶了七里多路，到了大新围时，终于赶上了那艘船。

这时候，船搁浅了。船上两名船工逃跑了。惊慌的敌人，失去逃往大海的希望，手忙脚乱，向岸上瞎打枪。民兵们便集中火力射击那艘船，8个敌人被迫离开了船，鬼鬼祟祟地爬上沙滩，逼近堤脚。陡直的高堤，很不利于民兵射击敌人。王映藩就叫王盛界、王细妹先撤下去接走跳船逃走的船工，又命令王汉光、王芝聪、王厝边三人，分散隐蔽在附近的防风林和竹林里窥视敌人的动静，严密监视敌人，自己沿着石堤，继续往南跑，准备把敌人诱过来，迷惑他们的去向，再设法堵死他们的退路，把他们缠死在这里，以待援兵的到来。

爬上岸来的敌人不见王汉光、王芝聪等人，果然都向王映藩追来了。他们相距只有二十来步远。王映藩见敌人被引过来了，一个劲往南跑了好几百米，然后一骨碌钻进了附近的水利管养所。敌人跟上来后，他又从管养所另一道门冲出去。敌人闯进管养所，找不到王映藩，忙乱了一阵，就慌慌张张钻出来。这时，天色已是蒙蒙亮。敌人深怕久留中计，赶忙溜回那艘船去。这时候，王映藩从管养所出来，见敌人不敢追上来，就朝附近村庄的天空鸣了两枪，发出了警报。

当六个民兵英勇阻击台特的时刻，正在河西堤岸上看管水利的新溪公社社员谢阿猪一听见枪声，便拔脚飞跑到驻军某部七连报讯。七连立即派出了几组战士前去追捕。在河的东岸，边防公安部队某部三连接到坝头公社的报告后，也派出5名战士沿着河堤跟踪追击。公社派出的“南港二号”机帆船也迅速出击。在三路包抄下，敌人成了瓮中之鳖。

这天，机帆船上只有一人在守船，但是当抓特务的消息一传开，有着二十多年掌舵经验、曾经参加过解放南澎岛的老舵手王老鹅，他连外衣都没有披，就从另一条船跑到机帆船来帮忙。回家休假的隆都公社的干部林修辉刚从梦中醒来，也主动上船请缨杀敌。接着，基干民兵高耀佳、王河等人迅速赶来集合，几个边防公安战士也闻讯赶来了。一个由民兵、渔民、边防战士组成的战斗小组，就这样迅速在船上组织起来了。

“南港二号”机帆船朝着那艘敌人夺占的船追来了。这时，东岸的三连战士罗启才等5人也一口气跑了5里沙滩，直插南港口。在西岸，新溪公社的基干民兵谢木园正带着某部七连的几个战士，直奔南港口。敌人被团团围住了。

特务们并不死心，企图奔向港口逃命。守在东岸沙滩的某部三连战士罗启才，瞄准敌人连发了几枪，武装特务的第一大队长林石平应声而倒。敌副参谋长兼电台台长梁发有和第二大队长蔡满堂，也先后负伤。船上的敌人看到大势已去，先后有六人跳水上岸投降。可是，一个狡猾的敌人还在船上烧文件，企图毁灭罪证。从西岸插来的某部七连战士丁维铁、叶年德看在眼里，

怒在心头，他们以猛虎扑狼之势，涉水冲过去，喝令敌人住手，这个家伙不听命令，丁维铁便举起冲锋枪，“砰、砰！”两枪，正中敌人左手。丁、叶两人趁势跳上船，一手把敌人抓住。这个国民党老牌特务、中校支队长魏雄文，连同罪证文件，就这样成了年青战士的“猎物”。

正当6个敌人上岸投降的一刹那，敌副支队长林良勇、陈剑鸿，一头钻到水里，向大海的方向游去，妄想逃命。机帆船上的优秀射手陈兆辉看准敌人刚露出头，连发几枪，先后将这两个特务打伤了。特务陈剑鸿摸着自己受伤的头，还想继续逃命，船上的民兵不断叫喊：“缴枪不杀，不举手就打死你！”这时，他只得慌里慌张地举起双手，大叫饶命。于是，民兵高耀佳、王河用一条长竹竿把他拖到船上来了。另一个特务林良能，还不死心，涉水爬上沙滩逃跑，民兵们一心要抓活的，而机帆船这时又靠不了浅滩，怎么办？正好附近有一只小竹排，高耀佳叫声：“我下去！”就勇敢地跳到竹排上，对敌人紧追不舍。小竹排随波逐流，一会儿就驶到浅滩，高耀佳纵身一跳，敌人便俯首就擒了。

一场快速战斗就这样结束了，台湾派遣的所谓“反共挺进军第八十一支队”这股美蒋10个武装特务，无一漏网，他们随身带来的枪支、弹药、电台等美式装备，被我民兵、解放军边防部队和人民群众全部“接收”了。

在清点战利品的时候，人们发现了特务一封没有发出的给肯尼迪的电报底稿：

请立转美国总统甘乃迪（肯尼迪）先生暨联合国主席、秘书长，并转中华民国大总统蒋中正先生钧鉴：我们是中华民国的人民……现在有×千×百余人，集结在××地区，进行武力抗暴，誓与共党匪徒，生死搏斗，特电请赐予支援……。××抗暴军司令、主席、……。1963年×月×日。

这份电报是美蒋特务在登陆前就写好的，他们满以为爬上大陆后会真的有人来“欢迎”他们。没想到这一切竟成画饼，这份电报成了对美蒋特务以及蒋介石、肯尼迪之流的一个绝妙的讽刺。

战后，台特首领、中校支队长发出这样的哀叹：“我们在台湾的时候，以为我们来到大陆，老百姓会来欢迎的，万万没想到一登上大陆以后，老百姓都把我们当成过街老鼠。”

喝令敌特投降记

1963年8月27日黎明前，苍茫的海空只有几点星光。浙江省温岭县莞乔公社乐峰渔业大队第一生产队的一对出海渔船，正行驶到落星岛南边的海面上。老大潘度梅，看见有一只小船在浪里飘荡。“这几天好风好水的，怎么会有船飘到海上来呢？”潘度梅警觉地想了一想，忙把睡在舱里的张正大、

黄定升、潘夏奶、张加忠四个伙伴叫醒了。大家一看也觉得可疑，就决定靠过去盘问一下。潘度梅把舵一转，驶近小船问道：

“你们是哪里的船？做什么的？”

“我们是舂环的船，被风飘出来的。”对方一面回答，一面狡猾地划着桨向渔船靠近。小船擦着渔船，有个人伸手想抓住渔船的船舷，企图爬到渔船上。潘度梅眼尖手快，轻轻把舵一带，渔船避开了小船。并发现这是一只“轮子船”（安机器的小船）。他们想，邻社舂环根本没有这种船，船上的人穿戴也不像舂环人。这五个民兵，越分析越觉得不对头。同时，在另一只渔船上的兵民黄奶儿、潘老五、潘小玉和老渔民黄定寿、黄定忠五人，也已看到了这只可疑的小船。十个人一起商量了一阵，认为这十有八九是只特务船，并决意不放过这只可疑的船。

两只渔船一前一后，又一次驶近小船。潘度梅厉声喊道：“你们到底是哪里来的？”小船上的人知己暴露，想瞒也瞒不住了，被迫自招：“我……我们是台湾来的。”并企图诱骗渔民：“你们要吃东西，到我们船上拿。”

渔民们一听是台湾来的特务，一个个都红了眼。千仇万恨像潮水般的涌上心头。恨不得一下子就把特务捉住。可是，赤手空拳，怎么擒敌呢？经过商量，认为特务的船开不动，大概是没有油了，这样敌人要逃也逃不掉；他们决定留下一只船监视敌人，由另一只船去报告政府。

黄奶儿等驾着渔船，飞也似地向石塘驶去。特务看看情况不妙，拼命地划动四支桨，想甩开监视的渔船。但是，潘度梅巧妙地掌着舵，利用风向，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向后，一会儿向左，一会和向右，紧紧盯住敌船。敌船划近三蒜岛，七个特务像丧家之犬，沉掉船只，爬上了小岛。

三蒜岛，离内陆有十来里路，是一个只有二十来户社员居住的小岛。当时是石塘公社石塘大队的一个生产队。岛上的居民，在旧社会饱尝敌人的百般欺凌，没有过一天安定的日子。解放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发展了生产，改善了生活。有时小岛遭到台风袭击，党和政府就派人到岛上慰问。他们深深感到新社会的温暖。

27日早晨住在半山的叶恩富刚吃过早饭，和八岁的弟弟阿富一起上山割草，他们在山岗上看到隔坑有几个背枪的陌生人。慌里慌张，鬼头鬼脑的在那里东张西望。叶恩富立时起了疑心，停住了脚步。聪明的阿富，连忙跑到家里去告诉母亲郭银珠。不一会，郭银珠赶到山上，母子俩就一齐盘问起可疑的人来了。特务被问得露出了马脚，自知狡辩不过，只好说出是台湾来的，并装出一副可怜相，狡猾地要她母子帮忙。郭银珠一听是台湾来的，什么都明白了，她暗地咬咬牙说：“你们这批强盗，残害人民，无恶不作，今天钻到岛上来，可不能饶过你！”特务见她不响，就摸出一只手表想塞给叶阿富，被阿富拒绝了。郭银珠说：“你们要活命，快向人民政府投降。”她叫阿富远远盯住特务，自己就跑向山脚去告诉社员。可是，这一天山脚只有一些老年男社员和小孩子在家。大家听说有特务，就同仇敌忾，商量对策：

一、马上去报告政府，二、逼特务投降。五十五岁的老社员郭加良刚走到半山，就和特务碰见了。他一面叫特务向人民政府投降，一面把特务引到山下

来。特务战战兢兢的走到山下，就陷入了人民群众的包围之中。十来个男女老社员把特务团团围住，宣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缴枪不杀，只有投降才是出路”。特务面面相觑，像过街老鼠一样感到走投无路。有个特务怯怯懦懦的问了一句：“共产党真的不杀我们吗？”群众中又响起了同样的声音：“只要缴枪投降，保证不杀！”

趁这个机会，郭加良走出后门，翻上山岗，找着了正在番薯地里干活的生产队长金宗德。两个一计议，立即用联络讯号向海上船只和内陆报讯。

在山脚的特务并没有立即投资，偷偷地溜到前面的一座山上去。这时，五十九岁的老社员刘阿亮和女社员陈三姐，刚刚割草回来。他们听说有特务，陈三姐抬头就看到了对山上的特务。但是，只有右眼有几分光的刘阿亮，却无法看见。他急得直搓手，担心地问：“特务会不会逃走？”“逃不了，岛上的船都出去了；我们已有人向政府报讯，解放军快要开过来了。”

听说特务逃不了，刘阿亮心上的那块石头才落地。这个贫苦渔民出身的瞎眼老社员，忘不了过去所遭受的苦难，对敌人恨之入骨。他在心里盘算：这些特务，等会儿一定会被解放军捉住，在解放军来到之前，最好先把敌人的枪缴来。想到这里，他就跟陈三姐一起上山去缴枪。

当我解放军的船只出现在海面时，岙里的老人们，又一次围上来叫特务投降。刘阿亮挤到特务跟前说：“你们只有缴枪投降，才是出路。”

“我们缴了枪，不会将我们割肉割耳朵吗？”有个特务颤抖着声音问。

“哪有这种事？”刘阿亮反问。

“台湾说的。”

“这是造谣。”刘阿亮气愤地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一向宽待缴枪的特务，立功有赏。”他拍拍胸脯说：“我今年快六十了，有儿有女有媳妇，还会说假话？要死要活，由你们自挑！”

“要活命，快缴枪吧！”在旁的老人一齐喊了起来。

敌人自知已堕入人民的罗网，无法逃脱。当场就被群众解除了武装。刘阿亮怕特务身上还藏有武器，特地走上前去，将每个特务从头到脚都摸了一遍。

“解放军来了！”群众兴奋地喊了起来。刘阿亮等抱着缴获的枪支，接来了我边防部队、公安部队和上马、石塘、钓嘴等公社的民兵。

红日当空，海风习习。台“中央情报局”派遣的“浙江反共救国军独立第三十支队”的7名武装特务，到这里就全部投降了。三蒜岛上，响起了一阵阵胜利的欢呼声。

全歼“反共挺进军一四一支队”

1963年10月21日清晨，福建省福清县沿海，朝霞映照下的群山碧海，发出闪闪的亮光，秋风吹拂的晚稻，掀起金色的波浪。山坡上，三五成群的社员正在挥镰收割已经黄熟了的中稻，到处是一派劳动和丰收景象。

新厝公社社长林金凯担任通宵值勤还没有休息。这位三十多岁贫农出身的干部，解放初期当过民兵队长，曾带领民兵抓过十八个台湾特务，十多年来在沿海对敌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早上，正当他在公社听取民兵干部汇报昨夜海防巡逻的情况时，突然破灶大队打来电话，说社员陈玉成天亮上山打柴，拾到了一梭崭新的子弹和一块塑料布。他想，几天来，人民解放军没有在这一带山上演习过，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于是立即警惕起来，马上叫干事蔡文高用自行车把社员陈玉成和他拣到的子弹带到公社，仔细一看，是一梭美造加拿大手枪子弹。他果断地判定：一定是特务偷爬上来的。林金凯立即打电话向上级汇报，并通知附近各大队的民兵出动搜山，捉拿特务。自己带着几个民兵与社员陈玉成一起，赶到发生情况的地方。

林金凯的判断是正确的。昨夜蒋特“反共挺进军141支队”的9名武装特务，在福清县新厝公社后屿村附近偷渡登陆了。这些由美蒋特务机关精心挑选专门训练的武装特务，梦想在大陆上建立所谓“游击走廊”。尽管美蒋特务机关的头目，向他们吹嘘、欺骗的话音犹在耳畔，可是，他们一踏上大陆，就觉得不妙。台特们胆颤心惊地从船上跳下来，有的吓得全身软瘫走不动，有的狂饮烈性酒，借以壮胆。他们在稻田里乱窜一阵后，天渐渐亮了，特务们看到周围都是村庄，炊烟四起，更加慌乱，支队长卢浩，派出两个特务把船只沉入海中，但这两个人却一去不复返。使他们觉得情况不妙，更加着慌，纷纷换上便服，丢下行装、电台，争先恐后地向山里逃窜。

美蒋特务偷爬上来的消息，飞快地传开了。周围山村的群众都行动了起来，这一带地方同蒋军是村村有仇，人人有恨，听说蒋介石又派了特务上来，个个怒火燃烧，磨拳擦掌。“走啊，捉特务啊！”有良好训练的新厝、灶、界下、棉亭以及二三十里外的许多大队的民兵都很快地召集起来。他们首先在海岸、港口、要道、山隘，建立岗哨，封锁了进出路口。愤怒的群众，一听要捉特务，正在割稻的带上镰刀；正在砍柴的挥起柴刀；去挑粪的放下粪桶抄起扁担；去赶墟的也跑回家拿起锄头柄把，一齐向发现特务的山头涌去。一时，田野、路上、山麓到处都是人群。棉亭大队民兵接到通知，一下子就出动了六十多人，分两路，翻过三座山头，把西北山的主峰紧紧锁住了。灶大队老社员陈天金听到召集民兵抓特务，高兴地赶到海边，把正在海滩上捕鱼的儿子、基干民兵陈红团叫回来，父子俩一齐拿着武器直奔山上。正和6个民兵在田里种田豆的郭其兰老大娘，得到消息后，对即将出发的民兵说：“你们放心去吧！田里的活全由我们两个老人包下。一定要抓住这帮狗特务！”在凤迹大队部帮助烧水做饭的五十八岁老大娘翁亚金，接到紧急电话后立刻赶到各处通知，她边走边骂：“蒋匪帮这伙短命鬼，不识好歹，又来

送死。”刚从街上卖柴归来的青年民兵翁建宁等丢下扁担，拿起步枪跟着民兵营长蔡合忠，到山上搜捕去了。

蔡合忠带着六个民兵登上西北山。没有多久，民兵副营长方春光突然发现三百多米外的山沟里，有一个贼头贼脑的家伙，拐着一条瘸腿，摇摇晃晃地跑着。方春光一挥手，翁建宁等马上追上，越过悬崖，从那个特务的侧面扑去；另外几个民兵跃身穿过荆棘丛，从正面紧跟上。他们出现在这个特务的面前时，吓得他呆若木鸡，站立不动，连插在腰带上的手枪都没有来得及拿出来，就乖乖地当了俘虏。原来，他就是“反共挺进军141支队”的支队长卢浩。

蔡合忠和其他民兵押着俘虏，遇到了从山上打柴回来的社员蔡芳永和翁志宗，他们报告说前面发现两个可疑的人。要民兵去追捕，蔡合忠一听，就把俘虏留给民兵蔡清能和社员蔡芳永等三人看管，自己带着其余民兵飞速向山里追去。躲在山坳里的敌特副支队长户广谔和电台副台长泰源，听到民兵的喊声，像受惊的野兔忘了隐蔽，慌慌张张地向大山里乱窜，竟撞到正在山拢里守望稻禾的社员翁进发和妇女翁生仔妹的面前。翁进发大喊：“在这里啦，快来捉活的啊！”这两个特务大吃一惊，扭头就跑。这时跑在后面的蔡合忠和方春光马上朝这两个特务的头上“当当”地打了两枪，吓得那两个特务蜷伏着身子不敢动弹。方春光和民兵们抓住这个机会，向敌人喊话：“你们逃不了啦！快投降吧！”“你们不要为美蒋卖命”、“缴枪不杀，宽大处理！”这两个特务看到无处可躲，浑身发抖，高举双手说：“饶命，饶命，我们投降”。

在另一座山里，新盾公社社长林金凯带领十多个民兵在搜山，他们发现四个背包，却不见台特人影，就向山上篦梳式的搜去。公社武装干事黄兴走在前面，发现小山上有座坟墓，心想，这里没有树，特务是不是躲在坟墓里，就慢慢匍匐前进，倚着墓栏抬头一看，果然，两个特务躲在那里喘息。黄兴一招手，林金凯带了民兵包围上来。这两个特务知道自己被发现了，慌忙打了几枪，丢了个手榴弹，就跳起来溜了。林金凯带了民兵跟踪追击，转过一座小山，特务又不见了，他们继续仔细搜索。这时，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的6个战士也赶来了。张两泉是个老战士，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他发现山边有一座古墓，墓穴正面有几块砖头和石块显然是扒开后又重新垒上的。估计特务可能藏在死人穴里，就对准墓穴，厉声喝道：“你们要不要葬身在坟墓里？”“不愿葬身在墓里就快快缴枪吧！”这两个特务执迷不悟，终于葬身在这坟墓当中。

躲在墓穴里的两个特务被消灭了。但是窜到山上的台特参谋长兼电台台长吕景阳哪里去了？原来这个特务还在山下被迫赶时，脚就发软了，便就势躲在树丛里，企图逃过人们的眼睛，但不料被上街买农具的民兵陈文贤、钱金坤和钱文荣发现。陈文贤看到这个十分狼狈的人，立即上前盘问：“喂！你是哪里的？”那家伙慌张了。就掏出几支香烟请他们抽，陈文贤断定这是

个坏蛋，就向旁边两个同伴使个眼色，示意要共同紧紧缠住他。这时解放军某部边防部队战士林家肺路过这里，发现陈文贤向他打个手势，知道前面的是个坏家伙。几个箭步跑到吕景阳的跟前，连续大喝两声，吕景阳惊魂未定，小战士又敏捷地穿到他的背后，飞身一跃夺过卡宾枪。这个特务便束手就擒了。还有一个特务余永发，偷偷地溜回他的老家去，可是一到家，也就被逮住了。

这股武装特务一共 9 个人，除了被打死和活捉的以外，还有两个却选择了弃暗投明的道路，他们乘特支队长叫他们去沉船的机会，把船驶到我海岸某码头，向当地人民公社投诚，受到当地人民公社负责人的欢迎。

梦想偷渡登陆建立“游击走廊”的这股蒋特“反共挺进军 141 支队”武装特务，就这样在很短时间内全部歼灭了。事后，台特惊魂刚定，就战战兢兢地说：“大陆上真是到处天罗地网，处处出神兵啊！”

宽大释放台武装特务

人民政府没有食言，1963 年 11 月，福建、浙江、江苏三省司法机关对 1963 年以来在福建、浙江、江苏沿海地区偷渡登陆后自动缴械投降的 17 名美蒋武装特务，决定免于刑事处分，予以释放，对其中三名有立功表现的武装特务，并发给了奖金。

被释放的 17 名美蒋武装特务中，有纵队司令、副司令、支队长、副支队长、中队长、电台台长等 6 人，队员 11 人。他们是：受台湾“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派遣，于 1963 年 7 月 24 日在浙江省永嘉县老虎岩偷渡登陆的“反共挺进军第十一支队”中队长南桂芳；受蒋情报局派遣，于 1963 年 8 月 27 日在浙江省温岭县三蒜岛偷渡登陆的“浙江省反共救国军独立第三十支队”支队长高度妹，副支队长林茂新，队员牟德发、卢岩焕、林裕森；受台“情报局”派遣，于 1963 年 10 月 8 日在江苏省射阳县射阳河口地区偷渡登陆的“江苏省反共救国军独立第十八纵队”司令刘直权，副司令俞宝琪，电台台长戴克傅，队员洪庆琢、鲁轶群、赵国清、姚锦兰、刘荫楷；受台“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派遣，于 1963 年 10 月 20 日在福建省福清县后屿村偷渡登陆的“反共挺进军第一四一支队”队员黄亚土、吴士龟；受台“情报局”派遣，于 1963 年 10 月 24 日在福建省莆田县平海湾偷渡登陆的“福建省反共救国军独立第九纵队”队员陈金木。这 17 名武装特务，由于不愿意替他们的主子美蒋集团卖命，在登陆以后，自动向我缴械投降，陈金木、黄亚土、吴士龟等三人并协助当地军民搜捕同他们一起登陆后潜藏起来的其他武装特务。

福建、浙江、江苏三省司法机关鉴于他们能够自动投降，坦白悔罪，根据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的政策，决定对他们免于刑事处分，予以释放，安置他们适当的工作。对于有立功表

现的陈金木、黄亚士、吴士龟三人，决定发给陈金木奖金 2000 元，发给黄亚士、吴士龟奖金各 1000 元。被释放的武装特务，在台湾有家属、本人又愿意回台湾的，人民政府允许他们去台湾与家人团聚。

这 17 名武装特务在得到政府予以释放的通知后，都一再感激人民政府对他们的宽大处理，给了他们以新生之路。他们深深认识到只有抛弃与祖国和人民为敌的立场，投靠祖国和人民，才是唯一的出路。并表示一定要痛改前非，努力工作，以实际行动来报效祖国和人民。

《人民日报》向国民党九大“献礼”

1963 年 11 月 5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祝再次全歼美蒋武装特务的重大胜利》的社论，全文如下：

我沿海地区的英勇军民，最近期间又连续全部歼灭了从海上偷渡和从空中降落的九股美蒋武装特务。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原海宁省和鸿广区的海岸地区偷渡登陆、妄图窜入我广东省西部山区进行骚扰破坏的六股美蒋武装特务，也已被我们兄弟邻邦越南人民、公安人员和民兵全部歼灭。我们热烈祝贺再次全部歼灭美蒋武装特务的重大胜利！我们谨向沿海地区具有高度党性的英勇军民致以亲切的慰问和敬意！我们谨向兄弟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人民、公安人员和民兵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窃据台湾一隅的蒋介石匪帮，在凶恶的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一再动员它的特务机构，拼凑特务武装，和美国驻台湾的特务机构共同策划，从去年 10 月到今年 10 月的一年多时间内，除了派遣六股武装特务，在越南沿海地区偷渡登陆以外，还先后派遣了二十四股武装特务，连续在我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沿海地区偷渡登陆和空中降落。最近，他们竟变本加厉，进一步同南越和南朝鲜的美国傀儡集团互相勾结，利用南越和南朝鲜的岛屿作为跳板，妄图扩大对我沿海地区的小股武装骚扰活动。这是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我国人民的严重挑衅。但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的这一系列罪恶活动，在我强大的英勇军民高度警惕和坚决打击下，都彻底失败了，二十四股武装特务先后被全部歼灭了。他们再一次派遣来的美制 U—2 间谍飞机，窜扰我华东地区上空，也已被我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击落。事实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最近，蒋介石匪帮正在筹开“国民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所谓“反攻复国大计”。为了虚张声势，装饰门面，蒋介石匪帮最近连续派遣小股武装特务，骚扰大陆沿海地区；并且编造了这样那样的所谓“海上渗透”和“内陆抗暴”的“胜利”的鬼话。这些鬼话，无非是心劳日拙、自欺欺人而已。真实的情况是，正当他们大肆吹嘘“胜利”之日，正是特务一一落网

之时。我们为了诱歼继续来犯的敌特，过去没有按时一一公布。现在他们的“九中全会”就要开幕了，我们给他们算一笔账，让他们拿去“献礼”吧！我们在这里再一次警告蒋介石匪帮：你们的武装特务，不管偷渡登陆或者空中降落，不管大股来犯或小股窜扰，不管白天来或者黑夜来，不管来几股来多少，总归要被全部、干净、彻底歼灭的，美的间谍飞机，不管什么型号，不管用什么窜扰方式，都逃脱不了像U—2飞机那样一次又一次被击落的命运。

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美帝国主义从台湾滚出去！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目前，在祖国领土的台湾岛上，广大台湾同胞处在美蒋罪恶统治下，苦难日深，斗争日烈。国民党的公教人员也是生活困难，无路可走，心怀不满。蒋军官兵则是军心涣散，士气低落，弃暗投明的越来越多；偷渡登陆的美蒋武装特务慑于我英勇军民的威力，不愿替美蒋卖命，在爬上大陆以后，就立即缴械投降。今年8月间，在浙江省温岭县三蒜岛偷渡登陆的美蒋武装特务，就有伪支队长等五人向当地人民公社社员投诚。我们再一次向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号召：一切心向祖国的人，不论你们参加爱国行列的先后，不论你们职位的高低，也不论你们过去罪恶的大小，只要你们弃暗投明，起义归来，人民政府仍和过去一样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热诚欢迎，不咎既往，并且按照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和适当安置。台湾是一定要解放的，我们希望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选择自己的光明前途，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建立功勋。我们还要向美蒋武装特务警告：如果你们不甘心替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卖命，一登上祖国大陆就主动缴械投诚，就会受到人民政府的宽待，有功的还将得到奖赏。你们好自抉择吧！

在历次全部、干净、彻底地歼灭美蒋武装特务的斗争中，我沿海地区的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人民公安部队、公安人员、广大民兵和人民群众，表现了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和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尤其是广大民兵和人民群众，在围歼武装特务的斗争中，同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人民公安部队和公安人员密切配合，迅速行动，不让一个特务漏网，充分显示了我国军民的伟大团结的强大威力。我国人民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热爱美好幸福的生活，对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怀有深仇大恨，不管敌人采用任何方式再来侵犯和挑衅，都要给以歼灭性的打击。

现在，决心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还想垂死挣扎，继续搜罗特务武装，加紧训练，准备派来大陆骚扰。我沿海地区的军民，一定要经常保持革命警惕性，继续加强海防边防，加强战斗准备，密切注意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的阴谋破坏活动。如果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不甘心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胆敢继续来犯，那就坚决予以全部、干净、彻底的歼灭！

高墙电网中的“特别大队”

西河，原是赣江入鄱阳湖口的一个小渔村，三面临水，一道土堤，仿佛是一条金项链，系着翡翠般的椭圆形的半岛。绿荫如泼的树林中，洁白的大院宛如是升起的帆，写意、浪漫，其余是栉次鳞比的红砖楼，极像一所学校。倘若，不是围墙上那一排排镶有大号绝缘瓷瓶的高压电网，以及那屋顶是伞型的城堡式的了望塔，还有，夜间那如一道道蓝色闪电的探照灯光，谁也不会料到，这里是戒备森严的监狱。

自五十年代初，台湾当局就不间断地向大陆派遣特务，他们纷纷落网，此时，也作为重点“保护对象”，转移到这里。曾几何时，蒋介石的闹剧破产，转为派小股武装特务登陆，又大部有去无回。于是，新、老台湾派遣特务在鄱阳湖畔的这座监狱中戏剧式地相逢了，并一起编在“特别大队”里。不乏幽默的时光老人，创作了一幕幕令人回味的活剧。

毕竟是曾受过特殊训练的军人，他们依然保留着严格的军事化的习惯。狱中的服饰，只是黑、白两色。床上用品：蚊帐、被子、床单、枕头，全系白色；身上的衣服，除了内衣和夏季用的衬衣，均是黑色。虽然单调，却极为分明。步入他们的房间，纹丝不乱，且如昔日的军营，一切物品，全都排成一条线，给人一种简洁、明快，耳目一新的感觉。较之于由刑事犯组成的第二大队，他们最遵守监规，极少吵架，从不盗窃；但从那一双双的目光中，人们却可以读出更为复杂的内容。

台湾的派遣特务一般也是单线垂直联系的，相互之间，并不了解，是囿于内部的纪律？还是职业上的敏感和戒心？他们之间，相互提防之心一直未灭，难得倾吐真心。

对待这批特殊的犯人，狱中派出了能力最强的干部管理和教育。对他们不打、不骂，不侮辱，并且严格执行一项特殊的命令：进入他们所在的区域，不准带枪，也不带其它戒具。尊重他们的人格，尊重他们特殊的心态、心理，以利于他们的改造。

七十年代前后，中国大陆正值十年浩劫时期，被迫害甚至屈死的干部和普通群众，编织了一部血泪交织的特殊历史。就是在鄱阳湖畔的这座监狱中，也不乏被冤屈的人们，但对这批来自台湾的特务们，从狱中的领导到普通干部，都没有过任何非礼的行为。其时，已处病中的毛泽东，得悉某些地方盛行的“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十分愤怒，亲自下令：“废除任何形式的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允许犯人控告干部，并不得阻拦。”这一命令，同样原原本本地“特别大队”中传达了。传达过后，一片惊讶、不解，继而是沉思：源于炎黄子孙的血缘亲情，难道能超越政治的分歧、隔阂，而填平海峡的鸿沟么？当然，对这一尖锐问题，当时是谁也不能也不敢回答的。

两座烟囱，高达百米，犹如两支巨笔，浓墨重彩地书军着变幻莫测的人生。台湾派遣特务绝大部分都经美国教官训练过，高鼻梁、蓝眼睛的心理战专家曾给这些肩负特殊使命的特工们描绘这样一幅画图：大陆老百姓很穷、

很穷，吃大锅清水汤，几个人合穿一条裤子，你们只要一登陆，就会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继而建设起稳固的游击走廊。但事实截然相反，刚从饥饿的年代中挣扎过来的中国大陆老百姓，一听说当年的国民党“还乡团”回来了，人人喊打，他们一上岸，几乎成了过街老鼠，很快就当了俘虏。

狱中虽然坚持“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方针，但每天八小时的劳动，却是毫不含糊的。这里主要生产砖瓦，两座三十年代设计水平的德式轮转窑，每天要吐出五十多万块的砖瓦，取土，制坯，进窑，出窑，没有一道工序是轻松的。尤其是出窑，隧道式的窑内，温度高达摄氏五、六十度，人只要走进进去，胡子、眉毛、头发全都被烫得卷了起来。古炮式的大型鼓风机，终日吼叫着。这里劳动的人们，一色赤膊，只空一条短裤衩，日夜犹如在火焰山中煎熬。刚入狱时，人人心中暗暗叫苦。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学生出身，还从来没有经受过如此严酷的劳动。

他们得到了优待。当队长把“特别大队”领进崭新的工场时，一片鸦雀无声。一排排闪烁着亮光的缝纫机，默默地仁立着，这是特地为他们新建的被服厂。在大陆的监狱中，一般只有女犯才能享受这样的优惠。这些粗手粗脚的男人，经过了短时期的培训，居然同样踩出了一派如温馨动人的交响诗般的均匀的扎扎声。

有小部分人的工种是纳鞋底。那完全是乡间妇女的活计。每人发一把锋利的锥子，一捆雪白的小麻绳，针针脑脑，虽是轻松，但总有滑稽。最笨的是一个在平潭岛被俘的特工，据说，他是专搞爆破的，上岸时曾化妆为人民解放军战士，开始，谁也没有看出破绽来。结果，在一座凉亭喝茶时，悄悄地问一个老人：“县党部在哪里？”一句话露出了马脚，大陆上从来不称什么“党部”，当场就被茶客们扭送到民兵营营部。有好几回，他锥破了手，在“特别大队”中传为笑话。“你大概是吃多了炸药，心里急毛了吧？”有人这样善意地取笑他。

他姓刘，在“特别大队”中，数得上是资历最老、职务最高的人物。

原来，他是江南某省特务组织的“潜伏组长”。1949年，百万雄师下江南，蒋军如鸟兽散，但大批特务却悄然潜伏了下来。临危受命，他虽然只是一个“组长”，却肩负总指挥要职。尽管宣布了一整套严密的纪律，但当红旗插遍大陆的时候，他像飘零的秋叶，同样被扫进了人民的法网。命运钟情于他，他随机应变，坦白得好，立下功劳，得到了宽大，不仅没有受到惩罚，还安排了工作。他感到幸运至极，其时，正是二十多岁的好年华，他携着娇美的妻子和幼子，憧憬着玫瑰色的梦。

倘若，不是那次香港之行，他的好梦还可以圆下去。人民和政府相信他，为了打破封锁，领导上派他到香港去执行一项重要任务。不幸的是，一到那花花世界，他旧病复发，和台湾特务机关建立了联系，并作为“派遣人员”的身份，在大陆活动。他想利用人民的信任耍小聪明，公正的上帝愤怒了，他很快重落法网，进了这座监狱。

一个美满的小家庭被他自己葬送了。妻子耐不住寂寞，带着他的爱子改嫁给一个剧团的编剧。温文尔雅的剧作家，颇能体谅他的痛苦和处境，允许他的妻子常去狱中探望她的前夫。于是，在冷清悲凉的铁窗生涯中，他是唯一一个常得到女性温存和安慰的人。

虽已改嫁，她的心仍然系着他。这座监狱的接见亭是敞开的，心细的老看守在一旁种了几棵葡萄浓荫遮蔽，一派清凉，逢到葡萄成熟时节，更是满目硕果，盈盈喜人。这个不寻常的女人不避嫌疑，也不在乎旁人异样的目光，每月都来探望，带着孩子，还带着可口的食品，给他送来轻声细语的嘱托，给他送来了无微不至的关切。虽然，狱中不允许有任何过分亲昵的举止，但只要一瞥那含情脉脉的女性的目光，他便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和幸福。

心地善良的剧作家并未能逃脱厄运。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送去劳动教养。接着，是逐步升级，至文化大革命，变成面目全非的“牛鬼蛇神”了。可怜的女人，带着3个儿女（两个是剧作家生的），无依无靠。狱中领导伸出了援助的手，把他们全部接到监狱中来，让孩子上学，而大人，则安排了一项自食其力的工作。在当时，这确实算得上是件撼天动地的举动。

他深深地感动了。凝视着妻子丰韵犹存的面容和天真活泼的孩子们，他才体味到共产党人那宽广的胸襟和善意的心灵。他心悦诚服，积极劳动，并且协助干部做其它人的工作。论资历和辈份，他在“特别大队”中都高人一筹，因此，“队员”们都信他、服他。

狱中首批特赦，这个“潜伏组长”就被释放了。他回到自己的家中，和自己的妻子及儿女团聚。当时，那个不幸的剧作家还没有“解放”。他不负情，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养育剧作家的两个孩子，并且允许自己的妻子常去看望他。

特定时期和特殊环境中形成的家庭关系，耐人品味，更令人思索。

“特别大队”中有一批“水鬼”，他们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武装潜水员，当年，偷偷摸摸地从海底潜入大陆，原以为可以逃脱天罗地网，结果，还是束手就擒，来到这个地方。很可惜，人们都说他们的潜水绝技胜过传说中的“水猴”，但极难得使他们有用武之地。

监狱的西侧是一片大水库。南昌盛夏，酷暑难当，担任警戒任务的武装基干连，除了少数正规的军人，大部分是知识青年，虽然身穿军装，但组织纪律性，总会差一些。这一天，几个武装的战士到水里去洗澡。没有干部带领。真不幸，他们已经洗完了澡，一个战士脚上沾了沙，到大堤旁去冲一下脚，不慎被巨大的漩涡吸了下来，转眼就没有踪影。

“出事了！”凄厉的报警声，几乎击碎了人们的心。水面汪洋，漩涡的上方，只有铜钱般大。即如虎口，吞噬着一个青年战士的生命，他被卷往何方，谁知道？只有让一个水性超群的人从漩涡口下去，才能探到虚实，这无疑让人钻虎口么？

“人们自然想到“特别大队”的“水鬼”们。很快，几个“水鬼”奉命

来到水库的堤岸上。没有潜水衣，也没有氧气泡，大堤上窄下宽，万一被漩涡到堤坝下面的涵洞里，谁能承担责任？

“给我一瓶酒。”一个“水鬼”早已脱去上衣，只穿一条短裤。“我从漩涡口下去试试看。”他征得带队干部同意，咕噜咕噜地喝下了半瓶酒，纵身跳进了漩涡。

水面上只冒出一串细小的水花，瞬间就不见了。

悄然无声，凄凉的风，把人们的心都吹冷了。

一分钟过去了，还不见人冒出来，“水猴，钻到哪里去了呢？”一双目光，搜寻着阴森森水面上的每一道涟漪。

突然，水库大堤下的涵洞口冒出一个人，是他，这位潜水本领过人的“水鬼”告诉人们，他已经摸到那位被卷到水下的战士，但力气不足，一时背不上来。说完，他又咕噜咕噜地喝下半瓶酒，运足气，重新从堤旁的漩涡口纵身跳了下去。

落水的战士终于被背出了水面。他两眼紧团，全身乌紫，溺水时间过长，没有抢救过来。“水鬼”们的奋勇抢救行为，却传为了佳话，按照规定，给他记了一功。

1975年，棉里藏针，柔中有刚的邓小平，被毛泽东请出山，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四人帮”仍然猖獗一时，毛泽东、周恩来身体欠佳，中南海里，如诗如画的浩渺烟波，遮不断箭拔弩张的政治大搏斗。

历时近十年的洗劫，已把大陆的国民经济推到极其危险的总崩溃的边缘。但对台湾的关系，中南海的英明决策者们，却几乎没有分歧。一道特赦令从北京发出了：分批特赦所有在押的原国民党战犯以及各级在押人员，特赦所有在押的原台湾派遣特务。他们中愿意回台湾的，发足路费，提供方便；不愿回台湾，能够工作的，给予安排，不能工作的，由国家养起来。这无异是激动人心的声声春雷。

一个彩色的绣球，由北京抛到台湾海峡的彼岸，一时间，舆论界轰动之声频频传来，有人称颂共产党襟怀坦荡，也有人攻击说：“这是中共的统战策略，用心良苦。”但不管怎样，尝过铁窗滋味的人们从此自由了，他们手持烫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特赦证，脱下了囚服，换上了崭新的蓝卡其布中山装，每人还领了两百元零用钱。望天，天更高；看地，地更绿，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他们的心中，最有数了。

狱中为他们举行盛大的送行宴会。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都派了专人来参加。十多年，甚至是二十多年朝夕相伴的干部，也来为他们获得自由祝酒。从台湾来的人们，大多数要回台湾去了，那里，有他们的亲人。昔日，天各一方，今日，相聚就在眼前了，谁能不怦然心动？

面对丰盛的酒宴，他们中的不少人哭了。男儿有泪不轻弹，但今天的泪，是喜悦的泪。

席间，轻松悦耳的乐曲，如水波荡漾。杯盏交错，消融了一个时代遗留

下来的隔膜。西河，鄱阳湖畔的一片小小的天地，今夜幻出了一道飞虹，无声地越过苍凉的台湾，轻轻地系着那神秘的阿里山、日月潭。

当年的囚犯，神奇地变成了特殊的使者，捎去共产党人冰释前嫌的一番美意，也捎去善良的大陆老百姓渴望早日统一的美丽向往。

漫长而曲折的历史，终于画上了一个沉甸甸的句号。

第四节 首位“黑小姐”殒命内幕

首次夜间击落 B—17 型飞机

为了配合“反攻”，蒋介石不但反复向沿海地区派遣武装特务，还不断派遣美制蒋机飞赴大陆进行高空侦察。

从北京传出讯息是：蒋机不断被人民空军部队、地面部队击落。美国对于蒋介石的空中侦察予以配合，不断派机飞到大陆进行侦察与破坏活动。人民空军予以有力回击，先后击落侵入中国领空的美机 20 余架。与此同时，人民空军还多次击落台湾从美国购进的 U—2 型高空侦察机。

关于台湾如何配置美制 U—2 型飞机，要从 50 年代我军首次夜间击落敌机说起。

1954 年以前，国民党军飞机夜间窜入大陆每年达 100 架次左右。主要使用 B—24、B—25、B—26、C—46 等几种飞机，从事空投特务、散发传单、接济潜伏在大陆的残余势力等破坏活动。

由于受到沉重的打击，1955 年以后，台更换以 B—17 型飞机为主，夜间深入大陆进行电子侦察。这种飞机是美国提供的，其使用权由美国情报机构——“海军辅助联络中心”控制。实质上是美国出飞机、出钱，国民党空军出人，为美国获取中国大陆战略情报的一种特殊形式的间谍活动。

人民空军由于当时用于夜间拦截的作战飞机是米格—15、米格—17 型歼击机，机上没有机载截击雷达，全靠飞行员目光。搜索发现目标。有时飞行员看到了飞机火光，但未等开火，目标便消失了。所以 1955 年空军夜间拦截国民党入窜飞机达 246 架次，均未获战果。

1956 年开始，空军调整了雷达部署，主要作战基地初步形成了引导网，引导成功率有所提高。

6 月 22 日午夜，当人们还在沉沉熟睡的时候，一架国民党“空军总司令部情报署”的美制 B—17 型飞机，从浙江路桥以南窜入大陆，高度约 2000 米。机上人员带有电台、还有大量的造谣诬蔑传单，满以为乘这无光的深夜，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各种罪恶的破坏勾当。可是，这架蒋机刚开始进入祖国大陆上空，就在我防空部队的严密监视之中。

深夜 11 点许，我驻衢州机场的空军航空兵部队接到了来自防空部队观察哨的情报，说有蒋机在附近活动。在辽阔的天空张开罗网的雷达，迅速准确地侦察到一架蒋机正在飞行。指挥员下达了了歼击蒋机的命令。机场和指挥所的战勤人员忙碌起来。

很快地，歼击机满载了炮弹待命起飞。正在雷达站值班的军官包钰桥，全神贯注地操纵着机器，牢牢地监视着蒋机，保持信号的清晰。

在各个高射炮兵阵地上，官兵们也时刻准备着开火。

空军一级战斗英雄航空部第 12 师第 34 团少校团长鲁珉，一接到命令

后，立即驾驶高速度的喷气式米格—17 歼击机，腾空而起。

年青领航员汤志耀，注视着萤光板上蒋机的航迹，精确地计算着高度、速度、方位，把敌情迅速报告指挥员、飞行员，引导着张开巨翼的雄鹰扑向蒋机。

已是深夜 12 点多钟了，群峰和原野的暗影一直延伸到远方，我机雄壮的吼声冲破了大地的寂静，无线电中回响着我空军指挥所引导飞行员前进的声音。

蒋机为了避免被发觉，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南不停地调换着方向。可是不管蒋机怎样狡猾，在我地面指挥所的正确指挥和引导下，我歼敌机距敌机越来越近了。

在离敌机只有 5 公里远的时候，狡猾的蒋机又改向南飞了，我歼敌机很快地跟着改变了方向，并且根据夜间作战的经验，绕到比较容易观察敌机的有利位置。

“蒋机离你 2 公里”，“你和蒋机在一起了”，无线电里不断传来师副参谋长吴云山的声音。

鲁珉少校驾驶的歼击机迅速地追近敌机。他紧紧盯住那蠕动者的黑影。

到了射程之内。瞄准。放。

随着电钮的按动，一连串的炮弹飞向目标。

敌机中弹了，机翼顿时冒起一道火光。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机上人员发了慌。

敌机降低高度企图挣扎着逃跑。

鲁珉沉着地紧跟在敌机的正后方，对好了瞄准器，在距离 270 公尺的时候，又开始第二次猛烈地射击。炮弹的火龙呼啸着在夜空飞过，敌机的左机翼又闪出更大的两团火光，很快又吐出了一道道火舌，像一团火球，划过夜空，坠毁在江西省广丰县岭底乡境内的山沟里。此时是 23 日 1 时 6 分。被山坡撞碎而分成无数片的蒋机残骸，燃烧着两堆熊熊大火，把山坡和小河照射得如同白昼。机上国民党空军少校飞行员叶拯民以下 8 人全部丧命。

这是我军第一次在夜间击落敌机。6 月 29 日，国防部通令嘉奖参战空军和防空军有功人员。嘉奖令说：6 月 23 日凌晨 1 时零 6 分，我空军某部鲁珉少校在有力情报保障和上级正确指挥下，在江西省上饶附近上空击落蒋军轰炸机一架，特予通令嘉奖。并责成空军、防空军首长查明有功人员，晋升一级军衔。希有关单位认真总结此次在夜间无光空域条件下击落蒋机的作战经验，加以推扩，提高各级部队在夜间和复杂气象条件下的作战能力。

此后，夜间空战捷报频传。8 月 23 日夜，航空兵第 2 师第 6 团领航主任张文逸，在浙江舟山击落美军 P4M—1Q 电子侦察机一架。11 月 10 日夜，航空兵第 3 师领航主任张滋，在浙江省肖山地区击落国民党美军 C—46 飞机一架。

击落敌改进后 B—17 型飞机

不到半年时间，国民党空军遭此连续打击，不得不改变方式。1957年后，国民党空军将过去月夜、简单气象的中空活动，改为暗夜、复杂气象低空活动，并使用经过改装的 B—17 型飞机进行电子侦察。

据此，人民空军亦将月夜、中空条件下的战斗，改变为暗夜、低空条件下的战斗。

B—17 型飞机原是美国的活塞式轰炸机，经过改装后作为侦察机使用，低空性能好，续航时间长达 17 小时，机载电子侦察设备可侦察到地面雷达的部署和性能，可窃听到对方的指挥活动。

1957 年 B—17 型飞机夜间低空窜入大陆侦察达 53 架次，人民空军出动 69 架次截击，无一成功。尤其是 11 月 20 日夜，一架 B—17 型飞机飞越大陆 9 个省，接近到北京地区，在大陆上空活动长达 9 个小时，未遭打击。这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深切关注。周恩来总理当晚即指出：“蒋机未能入侵北京上空，是不幸的幸事，我们应用一切方法将蒋机击落”。为加强北京地区的防空，总参谋部向中央军委写了《对蒋机窜扰大陆纵深情况及我采取的措施》的报告。毛泽东主席阅后指示空军：“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

据此，空军对战略工作进行了全面整顿，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使夜间作战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使部队对在夜间低空击落敌机的信心大大提高。

1958 年 4 月 21 日夜间，再次击中改进后的 B—17 型飞机。战况是：

当日夜间，国民党空军出动 B—17 型飞机 1 架，低空窜入江西地区上空，航空兵第 12 师截击机大队飞行员李顺祥，驾驶米格—17 波爱夫型飞机在指挥所的引导下，使用改进过的机上雷达，在约 300 米的同度上，距离 1500 米发现目标，900 米截获，800 米开炮，将 B—17 型飞机击伤。

这次空战后，敌人曾消静了一阵。次年 5 月 29 日 20 时 58 分，一架 B—17 型飞机从雷州半岛上空窜入大陆后，飞至粤桂边界山区，高度约 150—300 米，相当于当地山峰的高度，雷达掌握目标时断时续。驻广州航空兵第 18 师值班指挥员、副师长李宪刚判断，这架飞机很可能进入防区，遂命令指挥中队长蒋哲伦驾驶米格—17 波爱夫型飞机起飞拦截。当时基地云高才 260 米，有小雨，在领航员王金彰、谭流光的引导下，使用机上雷达，在距离 3.2 公里发现目标，2 公里截获，两次开炮，将 B—17 型飞机击落。飞机坠于广东恩平县境内，机上国民党空军少校飞行员胡平山等 15 人全部毙命。

美制新型 RB—57 侦察机殒命

在连续数次击落 B—17 的同时，我军还击落了其他敌机，主要的有 RB—57 侦察机和 F—86 战斗机。

1957 年 12 月 15 日和 1958 年 1 月 7 日，国民党空军两次派遣 RB—57 侦

察机飞临山东半岛上空进行侦察活动，我驻山东半岛的飞行部队两次升空都未能将其击落。1958年1月中旬，海军航空兵某师10团奉命转场至青岛。上级寄希望于10团的英雄们。

1958年2月18日，春节。上午10时52分，我雷达发现敌RB—57侦察机1架，从青岛东南方向400公里处正不断上升高度朝西北方向窜犯。为打击窜犯者，海军航空兵第4师第10团中队长胡春生和飞行员舒积成奉命驾驶歼—5飞机紧急起飞，穿过胶州湾上空轻纱似的薄雾，双机10度爬高，背敌出航，进入同温层待机。

同温层是指12000米以上高空空间层。这个空间层温度长年在零下56℃，通常没有云、雾、雨、雪，飞行员进入这一层空间飞行，呈现在眼帘的天空不再是蔚蓝色，而是深蓝色、紫色乃至近乎黑色。同温层空气稀薄，空气动力减少，飞机反应迟钝，机动性能变差，在世界空战史上，还从未有过在同温层作战的战例。因为在这个高度开炮，炮口喷出的瓦斯进入发动机，容易使发动机停转。每门炮射击时产生的六、七千公斤的后坐力，有可能导致飞机失速，进入螺旋。这是一个空战的危险高度。就是在这样的高度，海军航空兵创造史无前例的作战纪录。

当升到1.5万米时，我方飞行员发现了敌机，胡春生首先发起攻击，由于求胜心切，两次开炮未中。他又第二次进行攻击，在距敌机433米处连续三次开炮，一直打到距敌机75米，使敌机多处中弹坠落。敌机残骸坠毁在千里岛附近海面。

正在朝鲜访问的周恩来总理闻讯后非常高兴，当即打电话向海军祝贺。这架RB—75飞机残骸被捞起后陈列在青岛中山公园。该机驾驶员是国民党空军上校赵广华。他曾获得过国民党的“飞虎”奖章。

击落敌RB—75飞机后，10团威名大震。

地空导弹首次击落敌机

1959年秋，国庆节刚过没几天。

10月7日9时，台湾上尉飞行员王英钦驾驶RB—57D飞机，从浙江温岭窜入大陆，在18000米高空向北京方向飞来，它的目标是到天安门上空侦察骚扰。

台湾国民党空军对大陆的纵深侦察，先后动用RB—57A喷气侦察机、RB—57A型侦察机，都被中国空军航空兵驾机把它敲掉了。于是，美国空军亲自出面，从1958年3月至12月，由美国飞行员直接驾驶U—2型飞机侵入中国境内侦察。中国政府多次提出抗议后，美国便将两架比RB—57A更高级的RB—57D高空侦察机交给台湾当局，由国民党空军驾机到中国大陆侦察。

RB—57D能飞到2万米以上，飞机装有4架航空相机，在高度1.85万米实施航空照相，可摄取长约4000公里、宽70公里地幅的地面目标。当时

人民解放军的装备，休说高射炮对它无能为力，一般歼击机也对它无可奈何，所以台湾驾驶员轻松得简直如同来大陆逗着玩一样，因为他们驾驶的飞机在大陆未遇到过对手。

仅在 1959 年 1 月至 3 月，台湾国民党空军用美国人给它的 RB—57D 高空侦察机对大陆纵深进行战略侦察，该机进入大陆 10 架次，活动地区遍及福建、浙江、江苏、上海、江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贵州、四川、河南、山东等十几个省、市。我空军虽然起飞歼—5、米格—19 型歼击机 109 批、202 架次拦截，其中有 106 架次，我飞行员发现目标，终因飞行高度够不上而无法攻击，只得“望敌兴叹”。终于无可奈何返航着陆。

然而，这次当飞机飞到通县上空，突然有三道火光从地面扑来，王英钦见势不妙，急忙跳伞。可是他那架飞机被火光击中爆炸，碎片切断了伞绳，他从万米高空直坠而下，摔得如粉一般。那架 RB—57D 则拖着熊熊大火，一头扎进通县东南的玉米地里，亦粉身碎骨。

台北震惊！

五角大楼震惊！

莫不是大陆有了导弹？

然也。不过时间确实很短，难怪台湾猝不及防。

地空导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诞生。50 年代初期，一些发达国家的防空部队装备了地空导弹兵器。1956 年，中共中央决定发展尖端武器——原子弹、氢弹和地空导弹；1957 年，苏联派专家帮助中国组建了空军第一个导弹营；1958 年 7 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元帅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以铿锵有力的语调传达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防空部队除继续加强高炮、雷达部队外，还应建立一定数量的防空导弹火箭部队。”

同年 10 月，中国先后从苏联进口 5 套萨姆—2 型地空导弹兵器，导弹 62 发。从 1958 年 10 月—1959 年 1 月，由空军副司令员成钧负责，从空军高炮部队、雷达部队、航空兵机务部队、探照灯部队和场站部队中，挑选精兵强将，先后在华北、华东等地，组建了我军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导弹在当时是绝密的尖端武器，自然要挑选政治思想可靠。文化程度高、专业技术好、责任心强的干部战士掌握。当时这些干部都是高职低配，团长当营长，营长当连长……，“英雄营”营长、空军战斗英雄岳振华就是由一个高炮团的团长调任了这个营的营长的。

萨姆—2 型导弹，它是苏联人在战败的纳粹德国的“瀑布”式导弹基础上研制成功的一种半固定、全天候型防中空、高空导弹武器系统，技术精密、难以掌握。可是，这些精兵强将，在某个偏僻的山沟里，凭着为保卫祖国领空而掌握尖端技术的神圣信念，顶着盛夏烈日，勤学苦练，硬是用 4 个月的时间，熟练掌握了驾驭这条“神龙”的本领。

1959 年 4 月 19 日，第一次地空导弹实验成功。

1959 年 10 月 1 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 周年的庆典活动，届时，

天安门广场将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世界上 60 个共产党、工人党的代表和 87 个国家的贵宾参加这一规模宏大的庆祝活动。

未雨绸缪。为保卫 10 周年国庆，刚刚成立的导弹部队于 9 月上旬奉命进入北京郊区阵地，9 月 21 日正式担任作战值班。雷达转动着天线，似睁开了警惕的千里眼；数十枚导弹翘首挺立，似抽出了银色的利剑。

10 月 1 日，全天无敌情。因庆活动顺利、圆满、成功。

10 月 7 日，星期天。敌机终于露头了。上午 9 时 41 分，远方雷达荧光屏上突然出现一个亮点。雷达兵报出情况：台北市以北 50 公里海面上空，大型机一架，正向大陆飞来。10 时 3 分，雷达部队再报：敌机为 RB—57D 高空侦察机，已从浙江温岭上空窜入大陆，飞行高度 1.8 万米。敌机掠过南京，高度上升到 1.95 万米，凭借升高优势，超过沿途我空军歼击机的层层拦截，以每小时 750 公里的速度，越徐州过济南上空，大摇大摆地北飞。

11 时 22 分，当 RB—570 飞机距离北京东南 480 公里时，部署在北京的地空导弹营进入一等战备，作好战斗准备。11 时 50 分，地空导弹第二营在距离阵地 135 公里处，打开制导雷达天线，在 115 公里处捕捉到目标。

这时，空军指挥所命令第二营：我歼击机已退出战斗，你们要坚决消灭敌机！

100 公里，岳振华营长口令：3 发导弹接电准备！

70 公里，岳振华口令：接通发射架同步！

导弹发射架倏地昂起头来，随着制导雷达天线，对准敌机自动跟踪。

12 时 4 分，敌机飞临距北京 28 公里处时，岳振华口令：发射！随着果断的口令，3 枚导弹腾空而起，飞向目标，一举击中敌机。敌刚还逍遥自在的“RB—57D”，顷刻粉身碎骨，残骸坠落在通县东南 18 公里处河西务村的一片水塘中，国民党空军第五联队上尉飞行员王英钦当即毙命。

首战告捷，首开纪录。自从 1941 年纳粹德国开始研制地空导弹至此时 18 年，尽管美苏等国早就拥有地空导弹武器，但他们只是在靶场上射击。这次战斗，开创了我国空军和世界防空作战史上第一次使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的先例。

全营受国防部通令嘉奖，给营记集体二等功，营长岳振华等人受到晋升军衔的奖励。朱德、李富春、贺龙、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罗瑞卿、蔡畅等领导人亲临该营阵地视察，并向全体指战员致以亲切慰问。

为保密起见，这次战斗未作宣传。当时驻北京的外国记者，对中国以何种手段击落国民党空军高空侦察机，纷纷猜测，但中国新闻机构始终保持缄默，未泄真情。唯有苏联人心里清楚：自己的“学生”竟然先于“老师”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

“黑小姐”首嫁台湾

那架 RB—57D 被击落以后，台美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停止了对大陆纵深的战略侦察。但终究忍耐不住，美国又为台湾提供了两驾更为先进的 U—2 型高空侦察机，并帮助台湾训练了 6 名驾驶员，经过一年半训练，于 1962 年 1 月 30 日开始进入大陆侦察，至 6 月底出动 11 架次，活动范围遍及全国大部分省区。

U—2 是由设计者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总设计师凯莱·约翰逊取名的。约翰逊把他所设计的这种间谍飞机叫做“实利 2 号”(Utility—2)。U 字是实利即 Utility 英文缩写。美国把它的空中飞贼命名为“实利”，说明它是打算利用这种间谍飞机大量窃取他国军事情报，以便在它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大捞一把，谋取“实利”的。它比 RB—57D 更为先进，是专门用来侵入别国领土和进行高空间谍活动的一种飞机。U—2 型飞机没有任何标记，整个机身涂满青黑色的特殊颜料，身上的这层“黑纱”，是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专家们的杰作——一种特殊的涂料，对雷达电波有很强的吸收能力，使它在荧光屏上的回波信号变得很弱，稍不注意就“溜”过去了。高精度的报警器又使它“耳聪目明”，这种反雷达装置，能够探知本身是否已经被地面雷达探测出来。只要你导弹雷达一开机，它转身就跑，根本不进入你导弹的有效射程。这种飞机是一种机翼特别长的喷气飞机，在空中停止发动机以后还能滑翔（即无声飞行）很长时间。它的引擎的力量非常强大，飞行速度一般在每小时 800 公里以上，可以长时间在 2 万米以上高空飞行。最高高度达 22870 米，几乎是珠穆朗玛峰的 3 倍。它装有一种特殊的引擎，可以在飞行时使引擎停止，而且可以从停止状态中突然开足引擎。这样，它在高空可以停止引擎，偷偷摸摸地侵入别国领空，就是一旦被对方地面雷达或警戒机追踪的时候，也有可能迅速溜走。它续航能力强，长达八九个小时，装有用来拍摄地面情况的特殊空中摄影机和小窗户，它可摄取大面积地幅的目标。正由于它有如此“魅力”，所以得了个“黑小姐”的美称。

第一个 U—2 间谍飞机中队设立于 1956 年 1 月，包括 3 架 U—2 飞机，停驻在美国内华达州的一个空军基地上。它对外宣布的名称是“第一临时气象实验中队”，由美国全国航空顾问委员会指挥。

1956 年 5 月，美国航空顾问委员会宣布把它的“气象实验”活动扩大到欧洲，派遣 U—2 飞机入驻在英国拉肯希恩和西德威斯巴登的美国空军基地。

1956 年，一个神秘的分遣队来到了土耳其亚达那附近的空军基地。这个分遣队的驾驶员住在基地上单独的秘密住处。有人问驾驶员他们是什么人，他们答称，他们是洛克希德飞机公司的雇员，为美国全国航空顾问委员会所借用。在名义上，全国航空顾问委员会的 U—2 飞机不分晴雨应该进行气象实验，可是土耳其亚达那居民很快地就发现，这些飞机只有晴天起飞，驾驶员对于他们飞行的目的地、任务守口如瓶。

1959 年 9 月，在东京近郊的一个机场上，日本滑翔俱乐部的一些会员，

忽然发现一架没有标志的黑色喷气机式飞机在他们附近紧急降落。奇怪的是这架飞机的驾驶员不但不肯从座舱里出来，反而把舱盖紧紧地关上。15分钟以后，一架满载美国文职官员的直升飞机在机场降落，这时驾驶员才走出座舱说：“我很好！”滑翔俱乐部的会员们发现驾驶员的制服上什么标志也没有，他的腰间挂着一支手枪。那些美国文职官员团团地把这架神秘的飞机围住，并且用手枪指着滑翔俱乐部的日本会员，命令他们走开。曾有人认为：以日本为基地的U—2飞机共有6架，借口在日本进行“气象实验”，实则它们飞行的范围向北深入鄂霍次克海，向南及于黄海，干的完全是秘密的间谍勾当。

从1956年起，美国就不断派遣U—2间谍飞机偷偷摸摸地侵入苏联进行侦察罪恶活动。

从那时起，美国开始了利用U—2飞机进行全球性的侦察间谍活动。

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供认，美国U—2飞机飞行和用“其他办法”搜集的是关于“飞机场、飞机、导弹、导弹实验和训练、特种武器储藏、潜水艇生产、原子武器生产、飞机调动及其他类似”的情报。

对付U—2，我歼击机更是力不从心，鞭长莫及，重任便又落到了地空导弹部队肩上。为贯彻罗瑞卿提出的海底捞针的指示，为积极寻找战机，空军领率机关作出了一个新颖大胆的决策：将固守北京的地空导弹营拉出去机动设伏。经中央军委批准，使用保卫要地的几个地空导弹营，在U—2飞机活动的航路上实行机动伏击。

一次，4个导弹营斜字摆开，不管“黑小姐”从哪个方向进入，向哪个方向拐弯躲避，都处在我导弹有效射程内。不料，狡猾的“黑小姐”突然飞了一个S形，恰恰从几个导弹营的缝隙中钻了过去。几发导弹放了“空炮”。要知道，当时我们只有那么几十发导弹呀，个个都是宝贝疙瘩。放了“空炮”，可把刘亚楼司令员惹火了，他把几个导弹营长“训”了一顿。

导弹创建营营长岳振华，这位当年在抗美援朝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高炮团团团长，带着他那装成“地质勘探队”的导弹营，登上了南去的列车，到华东省份“设伏”。

6月27日，地空导弹第二营首先转到湖南长沙设伏，将近两个月未遇战机，空军领导机关认真分析了U—2型飞机每次进入大陆的航线，发现它几次进入内地侦查都经过南昌，而且当福建方向有航空兵调动时，通常都要出来侦察。于是决定将地空导弹第二营从长沙转至南昌设伏。为出其不意，该营装车、行车、进入阵地，均在夜间进行。为诱使U—2型飞机出动，9月7日，空军命令驻南京的一个轰炸机大队空中转场到南昌，8日，又从南京出动轰炸机一架，高空飞到南昌地区作佯动。

设下伏兵击落U—2

果然不出所料，9月9日6时许，国民党空军的一架U—2型飞机，由台湾桃园机场起飞，7时22分从平潭岛以2万米的高度进入大陆上空。而后，经福州，沿鹰厦线，过顺昌、光泽向江西境内飞来。

7时37分，U—2距二营500公里，营指挥所进入一级战备。

电话铃响，传来了刘亚楼的声音：“岳振华同志，你看到U—2出来了
吗？”

“报告司令员，看到了！”

“把它揍下来！”

“是！”

7时59分，U—2侧飞近临75公里，二营打开了制导雷达天线，当即抓住了目标。

可是，U—2并不直飞南昌，而是在南昌70公里处向余干、鄱阳湖方向临远飞去，这在二营射击范围之外。而且越飞越远了。

营长下令：关闭制导雷达天线，解除导弹接电准备。目标指示雷达继续跟踪。

U—2飞过鄱阳湖，飞过九江市，突然左转，从黄梅、广济直逼南昌。

目标指示雷达不断报着距离：150公里——120公里——100公里，该开导弹制导雷达了。可是，岳营长脸色铁青，不下命令，他要打一场近战。距离只有几十公里了！

“开机！放！”三枚导弹冲天而起。

几乎就在同时，“黑小姐”的光点在荧光屏上骤然改变了方向，可惜为时已晚，它已被导弹“咬”住了，片刻之后，荧光屏上闪出一片明亮的光晕，那是“黑小姐”被导弹击中爆炸后的回波。

“打中了！打中了！”全营一阵欢呼。

历史真会捉弄人，台湾当局做梦也没想到，1927年8月1日，共产党在南昌打响了反对国民党第一枪之后35年，又在这个地方国民党空军及至美国最先进的U—2，又栽到了共产党军的手里。

岳营长跳出指挥车。这个中年军官，奋力把军帽抛向空中。上次放“空炮”时，他也曾揪掉军帽，气得把头发揪掉一把。

“黑小姐”翻着坠在南昌东南15公里的罗家集附近荒丘上。残骸后来进了北京军事博物馆。飞行员陈怀是国民党空军U—2特别中队少校，曾因多次驾机骚扰大陆，被授予“国军克难英雄”的称号。他跳伞成功，但被碎片斜穿心肺，当降落在一块稻田里时，已经毙命。后来根据中央指示，妥善将他安葬，并给建了一块墓碑。

全世界为这震惊

西方和港台舆论，对大陆打下 U—2 感到震惊，同时他们都有一个难解之谜，所以纷纷猜测：

合众国际社记者盖尔 11 日从台北报道：国民党军事情报专家们在绞尽脑汁、希图弄清楚这架失踪的飞机究竟是是由于机件发生故障呢？还是驾驶员叛变，或高射炮的火力，抑或是从苏联借来的火箭袭击——这仍然是个“谜”。

香港新生晚报干脆宣称中共击落 U—2 是吹牛：中共的公报显然带有吹嘘的性质，新华社强调这架 U—2 机系被中共“空军部队”击落，事实上，即使苏联也无法用战斗机至 60000 英尺以上的高空拦截这种间谍飞机，更何况中共？

台湾的一些专家则认为：是俄国人操纵的地空导弹击落的。台众国际社台北 11 日电：专门研究共产党中国问题的郑学稼教授说，情报消息表明，俄国在撤退大部分军事顾问以后，今天在中国大陆仍然驻有许多战斗单位。除非这架高空侦察机的引擎发生故障而下降到常规高射炮射程以内，否则，它一定是被俄国人操纵的对空导弹击落的。

巴黎战斗报 13 日报道：中国空军对“不速之客”的有效干涉，证明北京目前是拥有高度准确的最新式高空或地空火箭的。它的出现和使用虽不说全面改变了远东力量的平衡，但是改变了那里的战略条件。

《警告美国侵略者》

就在击落 U—2 敌机的第二天，国防部部长林彪颁发嘉奖令，表扬 9 日上午击落美制蒋匪帮 U—2 型高空侦察机一架的空军导弹二营。

嘉奖令说，这一胜利是你们坚持执行上级指示，兢兢业业，常备不懈所取得的成果。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好好总结经验，加强战备，为随时打击来犯敌机，争取新的胜利而努力。

同日，人民日报评论员发表题为《警告美国侵略者》的评论，刊登在当天《人民日报》一版。

评论指出：“美制蒋匪 U—2 飞机侵入我领空，绝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这是最近以来，以日本为主要基地的美国 U—2 型的间谍飞机，加紧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间谍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帝国主义这一新的侵略罪行，发生在美国 U—2 飞机从日本基地侵犯苏联远东国境之后不过 10 天，就是有力的证明。据法新社透露，美国政府最近已进一步扩大利用 U—2 型飞机在全球进行间谍飞行的计划。美国把三架 U—2 飞机派到英国，就是这个计划中的‘大西洋方面’；而在‘太平洋方面’，也在大大加强。据日本广播协会电台引用消息灵通人士的话透露说，‘从远东基地起飞的 U—2 型的主要目的是调查共产党中国的军事力量’。美国 U—2 间谍飞机活动的加紧，正是美帝国主义加剧远东紧张局势，在全世界范围内，加紧新战争准备的一个具体步骤。”

评论说：“自从美帝国主义唆使和鼓励蒋介石匪帮准备向我大陆东南沿

海地区进行军事冒险的阴谋被揭穿之后，美国政府曾一再表示没有以武力进犯中国的意图。可是，现在它却派遣 U—2 飞机侵入我国华东地区进行侦察，这又是什么意图呢？人们都晓得，美国总统军事特别助理，10 月 1 日起即将担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泰勒，9 月 7 日飞到台湾，8 日竟到金门进行军事部署，爬上太武山，窥察大陆，并且巡视了台湾中部的空军基地。美制蒋匪帮的 U—2 飞机窜扰我华东地区，同泰勒的亲自到台湾面授机宜，显然密切相关。”

评论认为：“美国加紧对中国的战争部署和侵略活动，是同美国蓄意在亚洲准备新的侵略战争计划分不开的。美国在日内瓦会议后，不甘心于它在老挝所遭到的失败，不仅在老挝继续捣乱，并且利用泰国等仆从国家威胁柬埔寨的中立，加紧对南越人民的血腥镇压。泰勒这个以主张局部战争和‘特种战争’出名的肯尼迪亲信，这次亲自前来远东，到日本、南朝鲜、台湾、南越、泰国等地进行军事部署，就足以表明美国决心要在远东扩大侵略。”

评论说：“在美帝国主义加紧准备对远东进行军事冒险的同时，美国猖狂地对古巴进行挑衅，公然叫嚣发动对古巴的侵略战争，并且在西柏林制造新的紧张局势。9 月 7 日，肯尼迪要求国会授权在必要时征召 15 万名后备役人员，据白宫发言人塞林格说，‘肯尼迪决定要求授予征召的权力是由于总的国际局势。’值得指出的是，美帝国主义采取这一系列加紧备战和到处挑衅活动的时候，也正是肯尼迪同政府竭力做出各种和平姿态的时候。最近以来，肯尼迪不止一次地表示愿意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愿意同苏联以及一切国家和平相处；并且还在裁军谈判中装模作样，端出两个换汤不换药的停止核试验的方案来，企图要人相信，它是多么希望停止核军备竞赛。但是，美国 U—2 间谍飞机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侵犯，却完全揭穿了它的底细，就像同样的事件在两年前揭穿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底细一样。”

评论最后指出：“现在，人们再一次清楚地看到，口口声声说愿意谋求和平的肯尼迪，实实在在干着的，却是积极准备发动新战争的勾当。人们由此可以明白，肯尼迪政府是一个道地的好战的政府，它的所谓‘和平战略’的那一套，无非是配合和掩盖其黩武战略的一些手法罢了。全世界人民必须保持百倍的警惕，谨防上当，坚持揭露和挫败肯尼迪政府加紧扩军备战的罪恶计划。”

台湾声称有权派机侦察

在 U—2 飞机被击落的当天，台湾“空军总部”发表声明承认，一架 U—2 高空侦察机于 9 日上午在中国大陆“执行例行侦察任务时失踪”

美联社在第二天报道此事时说：

台湾当局发言人沈剑虹在一项简短的声明中说：U—2 高空侦察机是向美

国洛克飞机公司购买的，自从 1960 年 12 月以来，所购买的两架 U—2 机即一直被使用。沈氏声称：

台湾有充分的权力在共产党占据的大陆上空派机飞行，因为那是我们的领土。这是指台北方面所一直坚持的说法，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存在，而此间的中国政府乃系所有中国领土的唯一合法政府。此项声明，其目的之一显系免使美国牵连在此项事件中。

中共在过去曾指称击落中国（台湾）的侦察机，可是这是提到 U—2 机的第一次。

中国（台湾）守军现将特别提高警觉，以防备任何突发事件。

台“行政院新闻局”同一天发表一项声明说，在 1960 年 7 月间向美国洛克希德公司购得 U—2 高空侦察机两架，并于同年 12 月将这两架飞机运回台湾使用。

据美联社消息说，台湾承认美制 U—2 高空侦察机被击落的声明，是在美国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离开台北以后 12 小时发布的。消息说，他在动身前仅仅说了些“不明确表示自己态度的话”，而且不让记者有任何机会提出问题。

合众国际社的记者说，台湾发表的声明是“对在中国大陆被击落的一架美制 U—2 飞机事件承担起全部责任。”

但是，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承认美国通过它给台 U—2 高空侦察机来收集中国的军事情报以后，台湾当局和美国在台湾的占领军对这件事都已噤若寒蝉。

美在混乱中抵赖

台湾美制 U—2 飞机之被击落，使美国政府大为尴尬和丧气。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尼采在一次电视谈话中承认，这件事“使美国感到为难”。他说，“这不是一个令人高兴的事件”。

然而在铁的事实面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不得不承认，美国通过它给予台湾 U—2 高空侦察机来收集中国的军事情报。

在早些时候，为了掩盖美国在这个事件中的干系，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都曾装聋作哑，拒绝就美国是否曾向蒋介石提供 U—2 飞机一事发表意见。而在台北，所谓“美国协防台湾司令部”的一个发言人并且公开抵赖，说什么美国向蒋介石提供 U—2 飞机以及蒋介石使用美制 U—2 飞机对他说来是个“新闻”，他“没有任何有关这一点的消息”。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承认美国供给台湾以 U—2 高空侦察机这一事实时，企图把这件事说成是美国一家飞机公司同台湾之间的商业买卖。这个发言人说，在 1960 年 7 月，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同台湾签订了一项出售 U—

2 飞机的合同，而国务院发给了把这些飞机运到台湾的出口许可证。美国国务院官员还承认，美国政府曾经在美国“训练了一些中国国民党 U—2 飞机驾驶员”。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承认这些事实时，力图造成一种印象，似乎美制 U—2 飞机的窜扰中国大陆，同美国并无关系。但是，他接着不打自招地说，“可以设想，根据美国和它的同盟者通常交换军事情报的做法，国民党中国人所获得的任何情报将向美国国防部提供。”

据英国“卫报”11 日从华盛顿发出的消息报道，美国总统府白宫、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 10 日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击落窜扰中国大陆搜集情报的台湾美制 U—2 飞机的消息“焦急地秘密会谈了五个小时”。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里普 10 日在记者招待会上阻止记者就这件事提出问题，他说，“我们认为再谈论这件事毫无好处”。他企图以沉默来掩盖美国的罪责。

据报道，美国总统肯尼迪在 10 日还同前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会谈，讨论了有关台湾美制 U—2 间谍飞机被中国空军部队击落的问题。

在这同时，美国有关右派报刊叫嚷要继续利用 U—2 飞机和其他手段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

《时代周刊》在最新一期的一篇文章中说，美国“并没有打算完全让 U—2 飞机停在地上不起飞”。美国“也没有保证（U—2 飞机）不在俄国以外的共产党国家——包括共产党中国——上空飞行”。

华盛顿《明星晚报》说，这些高空飞行的飞机可以作为一种手段，以便经常了解一些国家的军事发展情况。这家报纸还叫嚷间谍活动将以更新的技术继续进行。

《纽约先驱论坛报》在 9 月 1 日的一篇报道中说，无论艾森豪威尔或肯尼迪“都没有答应过停止使用 U—2 飞机进行国务院所说的‘广泛的空中监察’。”

美国官方和有关右派报刊继续企图把台湾美制 U—2 飞机窜扰大陆搜集情报一事，说成同美国政府无关。但是，包括美国通讯社在内的一些西方通讯社引用的美国官员私下的谈话，却说明美国无法逃脱它在这件事中的干系，这些官员说：“若没有得到美国的默许，台湾大概不会进行这种飞行”。“可以认为，美国是从台湾在大陆上空进行的视察中得到好处的，因为他们通常是交换军事情报的”。“美国在批准洛克希德买卖（指美国洛克希德公司卖 U—2 飞机给蒋介石）之前，对中国国民党人打算如何使用 U—2 飞机必然有很好的了解”。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里普在为台湾美制 U—2 飞机窜扰大陆搜集情报而被击落的事件进行百般狡辩抵赖之后，9 月 12 日又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什么中国方面所指出的美国在这一事件中的无容逃避的罪责“只不过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宣传”。

但是，美国报刊却透露了美国飞机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国家周围附近和上空进行搜集情报的真象。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发自华盛顿的一篇报道中指出，美国用来“在共产党集团领土上空搜集电子、红外线和摄影情报的工具不仅是U—2飞机。15年来，像B—27、B—52和海洋巡逻飞机等这样一些飞机，都曾在苏联和它的盟国的周围附近和上空进行过搜集情报的飞行。光是在中国和苏联的太平洋沿海，就一直在不断地侦察。”

《华盛顿邮报》11日发表社论指出，这次被中国击落的“那架U—2飞机不是第一架飞入共产党军队所占有的领空的侦查飞机。同样可以保险地说，过去所使用的飞机大概也是美国制造的。”

美联社记者戴维斯在一篇报道中说，美国国务院在“颁发出口许可证允许把U—2飞机出售并运给蒋介石之前，是完全知道国民党中国将怎样使用这种涡轮发动机高空飞机的”，国民党所搜集的情报已经同美国进行交换。现在“没有迹象表明美国或国民党中国已经下令停止对共产党中国的高空侦察飞行。”

强烈的抗议

针对美国当局的百般抵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62年9月14日发表声明，抗议美国U—2飞机侵犯中国，声明指出：

1962年9月9日，美制蒋匪帮U—2型飞机窜扰至我国华东地区上空进行间谍活动，当场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击落。这是美帝国主义猖狂侵略中国的罪恶行为。这是美帝国主义对远东和世界和平的严重挑衅。6亿5千万中国人民在热烈祝贺祖国领空捍卫者的重大胜利的同时，不能不对一贯敌视新中国的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表示强烈的愤慨。

事情发生后，美国政府一方面宣称，这架U—2飞机是蒋介石集团从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购买的，企图以此证明整个事件同美国无关，另一方面又承认，美国从这种间谍飞机的活动中获取情报，这真正是枉费心机、自相矛盾。美国在世界许多地方驻扎U—2飞机。U—2飞机到了什么地方，战争的危險就跟到什么地方。驻有美国U—2飞机的各国人民，都坚决要求美国撤走这种飞机。谁都知道，所有这些U—2飞机，都是由美国自己直接控制的，台湾怎么能够例外？这种飞机的供应、维修、使用、指挥、都操在美国手中。这次U—2飞机侵犯中国，完全是美国主使的。美国政府是这次侵略罪行的元凶。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美国U—2飞机侵犯中国，绝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事件。长期以来，美国的飞机军舰就不断侵犯我国领空领海。不久以前，美国还唆使和鼓励蒋介石匪帮准备冒险窜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在这个阴谋被揭露以后，美国政

府还矢口否认，一再表示没有以武力侵犯中国的意图，并且宣称不允许蒋介石集团窜犯中国大陆。这次 U—2 飞机事件足以证明，所有这些都是骗人的鬼话。而这次事件本身，就是美国政府唆使和鼓励蒋介石匪帮窜犯中国大陆的一个重要步骤。

这次事件是美国在亚洲和全世界加紧侵略和战争部署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亚洲，美国疯狂地镇压南越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继续占领泰国，干涉老挝内政，指使南越和泰国威胁柬埔寨，积极重新武装日本，并且拉拢日本同南朝鲜合作以拼凑“东北亚军事联盟”。美国指使西德复仇主义者在西柏林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日益猖獗的挑衅，同时又公然叫嚣要对古巴发动侵略战争。肯尼迪要求国会授权在必要时征召 15 万名后备兵役人员。不久前，美国政府不顾自己对苏联的庄严保证，又一次派遣 U—2 飞机侵犯苏联领空，进行间谍活动。所有这一切清楚地表明：美国正在世界各地变本加厉地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美国肯尼迪政府上台以后，不断表示愿意和缓国际紧张局势、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停止核试验、禁止核武器、实现普遍裁军、同一切国家和平相处。但是，它的所作所为却完全与此相反。美国真正干的，是进行侵略和准备战争。它装出来的各种爱好和平的姿态，不过是企图蒙蔽世界人民的一个烟幕。这一次的 U—2 飞机事件再一次提醒人们：对于美帝国主义绝不能存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有予侵略者以坚决的回击，才能有效地制止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和战争活动，有效地捍卫各国的独立和世界的和平。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看透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对美国的侵略和挑衅活动，经常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自从 1958 年以来，中国政府对于美国派遣军用飞机和舰艇侵犯中国领空领海的行为，提出了 213 次警告。我们这样做，一方面是给美国记一笔帐，另一方面是为了提醒世界各国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严重注意美帝国主义要把全世界拖进核战争灾难的危险性。中国击落美国间谍飞机，这也不是第一次。1959 年 10 月 7 日我们曾经在华北地区上空击落 RB—57D 飞机一架，1961 年 8 月 2 日在华东地区上空击落 RF—101 型飞机一架，1961 年 11 月 6 日又在东北地区上空击落 P2V 型飞机一架。这次击落 U—2 型飞机，是第 4 次了。一次又一次的事实证明：只要美帝国主义坚持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只要美国还占领着中国领土台湾，中国的安全就得不到保障，远东和世界的紧张局势就不能消除。为了中国的安全，为了远东和世界的和平，美国的武装力量必须从台湾撤走，必须从日本、南朝鲜、南越、老挝、泰国、菲律宾撤走，必须从它在世界上的一切外国军事基地撤走。

15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声讨美国侵略者”的社论，全文如下：

我国空军部队 9 月 9 日击落侵入我国领空的美制蒋匪帮 U—2 飞机一架，

这是中国人民的一个重大胜利，是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一个重大打击。美国 U2 飞机侵犯中国领空进行间谍活动的事实有力地证明，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死敌，是世界和平的死敌。肯尼迪政府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时时刻刻地威胁着远东和平和世界和平。

连日以来，我国各地人民，在热烈庆贺空军部队保卫祖国领空取得胜利的同时，愤怒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揭露肯尼迪政府的反革命两手政策，决心加强自己的一切力量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我国政府 9 月 14 日发表声明，向美国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并且指出，对于美帝国主义绝不能存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有予侵略者以坚决的回击，才能有效地制止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和战争活动，有效地捍卫各国的独立和世界的和平。

世界各国舆论群起抨击美帝国主义对世界和平的挑衅。从河内到地拉那，从哈瓦那到雅加达，在全世界范围，出现了一个声讨美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怒潮。

社会主义各国同仇敌忾。许多兄弟国家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朝鲜《劳动新闻》说：这个事件“完全剥下了美帝国主义头子肯尼迪的假面具”。越南《人民报》评称：“在执行美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和其他爱好和平国家的间谍、挑衅、破坏活动和战争政策中，肯尼迪要比艾森豪威尔表现得更加露骨、猖狂和冒险。”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说：“肯尼迪上台之后这种危险的挑衅政策的规模更大了。”古巴《今日报》指出：这一事件“是美国的挑衅和间谍计划的一部分。”波兰《人民论坛报》认为：“美国这种冒险活动，正在危险地加剧着国际紧张局势。”

美帝国主义这一新的侵略罪行，在亚非各国引起了广泛的谴责。印度尼西亚《人民日报》抨击美国蓄意侵犯中国。缅甸《先锋报》指出：“今天正是美国及其傀儡在点燃战火和破坏世界和平。”阿联《共和国报》说：美制 U—2 型飞机侵入中国领空的行动证明美国支持蒋匪帮想占领中国大陆领土的狂妄企图。伊拉克《自由人之声报》指出，美国是“破坏世界和平的主要祸首。”柬埔寨《祖国报》抨击美国目前执行准备发动世界战争的政策。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书记处和许多非洲国家民族主义政党的代表，认为中国空军部队击落美制蒋匪帮 U—2 飞机，是对美帝国主义战争挑衅的一次严重警告和对保卫世界和平的一个巨大贡献，衷心支持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侵略和保卫祖国的严正立场，号召亚非各国人民加强斗争，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挑衅。日本共产党发言人土岐强指出：“究竟是谁在策划战争，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践踏民族独立，现在很清楚了。”

肯尼迪政府这种肆无忌惮地破坏和平的活动，甚至也引起了西方舆论的不安和不满。英国《泰晤士报》认为，美国通过蒋匪帮进行间谍活动，不是光明正大的主张。《每日先驱报》斥责美国做了蠢事，认为这件事可能在美国的朋友和盟国中引起不快和惊恐。《每日邮报》认为这次美国遭到了“一次可耻的失败”。法国《战斗报》写道：“人们只希望，华盛顿停止再派遣

其它 U—2 飞机。”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美国政府狼狈万状，企图抵赖自己的罪责。然而，美国甚至在抵赖中也承认，蒋匪帮获得的情报直接提供给美国国防部。而且，U—2 飞机所使用的燃料和器材，都直接掌握在美国驻台湾的军事机构手中。U—2 飞机的飞行任务也都是由美国军官直接布置的。可见，没有美国的同意，这架飞机根本飞不起来。同时，谁都知道，美国在世界各地，在日本、土耳其、澳大利亚、西德、英国、阿根廷驻扎的 U—2 飞机，都是由美国自己直接控制的，台湾怎能例外？无怪乎，据路透社电讯透露，华盛顿的“观察家”也认为，“若没有得到美国的默许，台湾（指蒋匪帮）一大概不会进行这种飞行。”英国《每日电讯报》指出：“由于这种飞机是美国供给的，美国并且能够得到侦察的结果，要区别这是台湾的活动还是美国的活动，就是微妙的事了。”其实我们掌握充分的材料证明，U—2 飞机的供应、维修、使用和指挥都掌握在美国人手里，蒋匪帮不过是美帝国主义者们的雇佣军罢了。美国侵略者企图把他那血腥的手掩藏在蒋介石的破口袋里，这是永远办不到的。

美国 U—2 飞机侵犯中国，是美国坚持其敌视中国政策的一个新罪证。不久以前，当我国揭露了美国唆使和鼓励蒋介石匪帮准备冒险窜犯我国沿海地区的阴谋以后，美国政府曾一再表示，没有以武力侵犯中国的意图，并且宣称不允许蒋介石匪帮窜犯中国大陆。现在距离美国政府这些虚伪的“保证”只有两个多月，就发生了美制蒋匪帮 U—2 飞机侵犯我领空，进行战略侦察的新罪行。而这一罪行，又恰恰是发生在即将就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到台湾和金门进行阴谋活动的时候。所有这些，都彻底暴露了美国政府的所谓“保证”完全是骗人的，U—2 飞机事件本身就是美国政府积极准备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步骤。

肯尼迪政府加紧对中国的侵略部署，是它全球范围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肯尼迪政府最近正在玩弄种种“和平”的花招，大肆宣扬说什么愿与一切国家“和平相处”，说什么愿意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停止核试验、禁止核武器、实现普遍裁军。可是就在这些“和平”的伪装掩护之下，肯尼迪政府却加紧推行其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疯狂地准备核战争，到处策划局部战争和“特种战争”，大大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美帝国主义镇压南越人民的战争日益扩大，美国在参予侵略南越的军事人员已达 1 万人。美国对泰国实行了军事占领，并且以泰国为基地，干涉和威胁老挝，策应它在南越进行的“特种战争”。美国指使泰国和南越干涉柬埔寨的中立和独立。美国还加紧拼凑“东北亚军事联盟”，在太平洋建立“北极星”潜艇基地，把新式导弹运进日本。最近美国更加紧了侵犯古巴的战争部署，不断发动军事挑衅，除了利用雇佣军进行疯狂的袭击和破坏活动以外，还大肆叫嚣要对古巴发动直接的军事进攻。同时，美国在西柏林发动了一系列的挑衅，加紧武装西德，已经给西德装备了两个导弹营。美国准备征召 15 万名后备兵

员，并且不顾全世界的反对，宣布要继续在太平洋上进行大气层核试验。不久前，美国 U—2 飞机又侵入苏联领空，进行间谍活动。而且，U—2 飞机的活动，已经扩大到全世界范围，破坏各国的主权，威胁各国的安全。美帝国主义就是这样向全世界表明，它是各国人民和平生活和安全的最大敌人。

美帝国主义的扩军备战和侵略罪行引起世界人民越来越强烈的反抗。英勇的南越人民，不屈不挠，同美美军的“扫荡”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古巴人民在美帝国主义新进攻的威胁面前，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卡斯特罗总理为首的古巴革命政府的周围，全民动员，进行战斗准备，决心消灭敢于进犯的一切敌人。美帝国主义的扩军备战和侵略罪行越来越深刻地教育了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使越来越多的人懂得：对美帝国主义，对肯尼迪政府，不能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必须以坚决的斗争来捍卫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

我国政府声明指出：“只要美帝国主义坚持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只要美国还占领着中国领土台湾，中国的安全就得不到保障，远东和世界的紧张局势就不能消除。为了中国的安全，为了远东和世界的和平，美国武装力量必须从台湾撤走，必须从日本、南朝鲜、南越、老挝、泰国、菲律宾撤走，必须从它在世界上的一切外国军事基地撤走。”这表达了 6 亿 5 千万中国人民坚定不移的意志。中国人民将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努力，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捍卫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全世界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必然被打败，而且是一定能够被打败的！

首都万人集庆声讨

1962 年 9 月 15 日下午，首都各界 1 万多人举行盛大集会，庆祝我军击落 U—2 飞机的重大胜利。

庄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充满了庆祝胜利的洋洋喜气和声讨帝国主义的愤激情绪。会场上，坐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部队各兵种的军官和战士，武装的民兵，以及工人、学生、机关干部、郊区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和首都各阶层人民的代表。在大会的进行过程中，人们不断地举起拳头，强烈地高呼：“粉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计划！”“反对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匪帮窜犯大陆的阴谋！”“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加强国防建设、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各人民团体代表刘宁一，各民主党派代表程潜，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战斗英雄和首都工人、农民、民兵和学生代表，先后在大会上讲话，他们的讲话集中地表达了 6 亿 5 千万中国人民对美国侵略罪行的无比

愤慨和强烈抗议，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的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他们在讲话中一致表示拥护我国政府抗议美国 U—2 飞机侵犯中国的声明，并且严正地警告美国侵略者：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不可侵犯和不可欺侮的。如果敌人胆敢再来窜犯，必将像 U—2 飞机的下场一样，遭到毁灭性的迎头痛击。

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上就座的，还有国务院副总理贺龙、陈毅，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沈钧儒、黄炎培、彭真、陈叔通、赛福鼎、林枫，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李四光、包尔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上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委员苏振华上将，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北京市副市长万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北京部队首长杨勇上将和廖汉生中将。

在主席台上就座的，还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程潜、王绍、季方、陈其尤、许德珩、徐萌山、胡耀邦、刘宁一、蔡畅、老舍、王照华、张寅安等。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首先致开会词。他说，我人民解放军这次击落美蒋 U—2 飞机，是对美帝国主义战争挑衅的一个最坚决最有力的回答。这显示了我军的强大威力和我国人民保卫祖国安全，保卫世界和平的坚强意志。我们衷心地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崇高敬意。我们坚决拥护我国政府就这一事件所发表的声明。

廖承志说，美国 U—2 飞机对中国的战争挑衅，已经激起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公愤。现在一个声讨美帝国主义战争侵略罪行的怒潮，正在形成。我们感谢各国人民对我国的支持和同情。他说，中国人民将永远和世界各国人民站在一起，为反对美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而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我们坚信，只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侵略阴谋，都一定会被粉碎。

郭沫若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开始讲话。他热烈祝贺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击落美制蒋匪帮 U—2 飞机的重大胜利。他说，这是对好战的美帝国主义的一个当头棒喝，是对它的战争政策和侵略计划的一个沉重打击。这是中国人民的一个重大胜利，也是世界人民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一个重大胜利。

郭沫若指出，美国 U—2 飞机侵犯我国是一个性质极为严重的事件。这是美帝国主义唆使和支持蒋匪帮窜犯我国大陆的一个新的严重步骤。这是美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的一种新的战争挑衅。这是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加紧扩军备战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他说，这次事件使中国人民更加看透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看透了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刻骨仇恨。只要美帝国主义还占领着我国的领土台湾，中国的安全和远东的和平就不可能得到保障，中国人民就必须保持高度

的警惕，时刻准备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挑衅。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一切罪行，是一定要清算的。

郭沫若说，现在美帝国主义已经把 U—2 飞机基地扩大到四大洲的 10 个以上地区，这些基地的主要锋芒都针对着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和中国。这又一次说明，美帝国主义企图消灭社会主义阵营的野心是绝对不会改变的。全体社会主义阵营的人民必将进一步提高警惕，加强团结，不断加强自己的经济和国防力量，来粉碎美帝国主义的狂妄计划。

郭沫若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在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战争挑衅的同时，正在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运动进行一系列凶恶的进攻。他说，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所进行的疯狂的扩军备战活动，值得引起各国人民的严重警惕。事实证明，美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而且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最凶恶的敌，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

他强调说，美国总统肯尼迪喋喋不休地表示什么愿意同一切国家和平共处，愿意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愿意裁军，愿意停止核试验等等，这一切的一切都被美帝国主义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只不过是一派欺骗人民的谎话。对于美帝国主义这个凶恶的敌人，决不能存有一丝一毫的幻想。

郭沫若着重地指出，尽管美帝国主义是凶恶的，但是在人民斗争的面前，它又是虚弱的。他说，只要全世界人民加倍警惕，加强团结，同美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就一定能够粉碎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侵略政策，就一定能够保卫住自己的革命成果，保卫住世界和平。

郭沫若说，中国人民一贯遵守毛泽东主席的教导，对于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战争挑衅，始终坚定不移地进行着毫不调和的斗争。对于美帝国主义的一切“和平”花招，从未有过任何幻想。

郭沫若说，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和挑衅是不会从此罢手的。中国人民决心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继续加紧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加强我国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时刻保持警惕，准备粉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和侵略。中国人民一定要加强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一定要积极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同世界各国人民一起把反对美帝国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进行到底。

郭沫若最后说：我们再一次严厉地警告美国侵略者，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的中国人民，是决不容许侵犯和欺侮的。美国强盗从哪里来，中国人民就一定把它消灭在哪里。我们也再一次警告蒋介石匪帮，你们如果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对祖国大陆进行任何袭扰，就一定要得到应得的惩罚。

中国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代表全国人民团体，强烈抗议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挑衅，强烈抗议美帝国主义加剧远东紧张局势、破坏世界和平的阴谋。

刘宁一列举许多事实指出，美帝国主义正在亚洲和全世界加剧紧张局势，准备新的战争冒险。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必须对美帝

国主义的扩军备战的罪恶活动提高警惕，进行坚决的斗争。

他强调说，美帝国主义从来就是全世界人民最好的反面教员。肯尼迪政府上台以来，不断玩弄“和平”、“进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等等骗人的词句，企图麻痹和欺骗各国人民。而在这个幌子的后面，却是加紧准备核战争，加紧准备和发动“有限战争”和“特种战争”，镇压被压迫人民要求独立的运动，推行新殖民主义，同时对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大规模的间谍活动和颠覆活动。肯尼迪的反革命“总战略”的目的就是要把全世界都置于美国的统治和奴役之下，建立美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他指出，肯尼迪政府这种两面手法，决欺骗不了已经觉醒了的人民。

刘宁一正告美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决不是好欺负的。如果敌人胆敢再来窜犯，一定会落得像这次U—2型飞机被击落的同样下场。

刘宁一最后强调说，人民群众是保卫世界和平的决定因素。觉醒起来的人民，是天下无敌的力量。只要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蓬勃发展的亚非拉各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进一步团结起来，结成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提高警惕，坚持斗争，美国侵略者的魔爪必将被各国人民斩断，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战争势力一定会被人民群众的力量彻底击败。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程潜代表各民主党派讲话。他说，这次美制蒋匪帮U—2型飞机被我空军部队击落，再一次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揭露了肯尼迪假和平、真备战的狰狞面目，肯尼迪和艾森豪威尔完全是一丘之貉。他强调说，面对美帝国主义这个十分狡猾而凶恶的敌人，全世界人民必须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提高警惕，互相支援，同它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程潜说，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击落U—2飞机的光辉战绩向全世界表明，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国在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方面，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并且将更为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这个事实也有力地警告美国侵略者，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容侵犯的，不管敌人来自天空，还是来自海洋、陆地，都将被彻底消灭，被打得粉碎。蒋匪帮认贼作父，为虎作伥，也决逃不脱它应得的惩罚。

程潜最后表示，各民主党派全体成员誓与全国人民一道，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周围，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解放台湾、保卫世界和平，贡献出我们的一切知识和力量。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战斗英雄王海走上讲台的时候，会场上掌声雷动，向树立光辉战绩的空军英雄们致敬。王海在讲话中说，全国各地对这次击落U—2飞机的热烈祝贺，给了我军全体指战员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们一定要以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的实际行动，回答全国人民对我们的热望。我们深知，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取得的，是毛主席思想的胜利。

王海说，我们清醒地知道，美帝国主义绝不会甘心于它的失败。我们一

定要戒骄戒躁，再接再厉，继续百倍提高警惕，紧握手中武器，严守战斗岗位，苦练杀敌本领，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道，坚决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为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为解放台湾、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而奋斗。

毛泽东号司机长蔡连兴代表首都工人向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致以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祝贺。他说，我们为有这样一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感到骄傲。蔡连兴说，我们中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这条狼的本性是十分熟悉的。不管这条狼披上多少张羊皮，我们也总会抓出它的狼尾巴来。我们要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起来，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彻底粉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计划。

农民代表、长辛店人民公社副主任郭荣说，社员们听到咱们的空军部队打下来一架美蒋的特务飞机，大伙儿都说：真解气，真解恨，得给他点厉害尝尝，叫他看看中国人民的力量。

郭荣说，美国总统肯尼迪一直装模作样，耍“和平”花招，还说不把特务飞机卖给任何国家，真是“挂羊头，卖狗肉”，假和平，真备战。这一回，不管他怎样花言巧语，也抵赖不了。他说，中国人民可不是好欺侮的。不管美帝蒋匪还想来捣多少次乱，我们前方后方一条心，一股劲，攥成一个铁拳头，准把他们打个头破血流。

民兵代表、北京师范大学民兵师的团参谋长张世嵘在大会上严正地警告美帝国主义和肯尼迪：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们不但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还有千百万的民兵队伍。我们懂得怎样对待帝国主义，我们千百万民兵配合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每一个角落撒下了天罗地网，在祖国的领空、领海筑起了铜墙铁壁，任何敌人敢于侵犯我们一寸土地，管叫它寸步难行。

学生代表、清华大学学生会副主席杨燠华在讲话中说，怒火在我们的心中燃烧，全中国学生都强烈地抗议美国肯尼迪政府的战争挑衅。他说，美帝国主义侵略好战的本性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这次 U—2 飞机事件又一次证明毛主席关于“肯尼迪政府只能比艾森豪威尔政府更坏些，而不是更好些”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狼究竟是狼，我们必须对美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

大会上所有讲话，都在会场上激起雷鸣般的掌声和口号声。讲话结束后，会场上全体起立，台上台下的口号声连成一片，1万多人激愤地高呼：美帝国主义从我国领土台湾滚出去！从日本滚出去！从老挝滚出去！从泰国滚出去！从菲律宾滚出去！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滚出去！从它侵略的一切地方滚出去！

毛泽东喜听汇报

1962年9月21日，中南海怀仁堂小礼堂会客厅中间的一大圈沙发上，

坐满了中央首长：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陈毅、贺龙、聂荣臻、叶剑英……

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带着他的地空导弹二营营长岳振华坐在后排。今天，毛泽东主席将在这里听取他关于击落台湾 U—2 飞机的汇报。

周恩来总理在门厅来回踱着步，不时往走廊看一看。一会儿，他回过头来对大家说：“主席来了！”

毛泽东身着银色中山装走了进来，大家起立，鼓掌。周恩来向刘亚楼、岳振华打了个手势。刘、岳两人急步走到主席面前，敬礼。

周恩来介绍：“这就是岳振华同志。”

毛泽东握住了岳振华的手说：“岳振华同志，打得好哇！”之后，毛泽东转向刘亚楼。刘亚楼打着手势，向毛泽东简洁地汇报了击落 U—2 型飞机的经过。

毛泽东津津有味地听着刘亚楼的汇报，不时插上两句话，时而满意地点点头。

周恩来总理走过来：“主席，代表们（指空军党代会代表）准备好了，去照像吧！”

“好！”毛泽东起身，兴致勃勃地和大家一起向外走去。

第五节 “克难英雄”被俘

王诤部长再设“陷阱”

第一架U—2被击落之后，敌人变得小心起来。后来几次，当U—2飞临我地空导弹阵地附近尚未进入我有效射程就转身溜走了。显然，“黑小姐”的身上已经专门安装了对付我地空导弹的电子设备，只要一收到制导站搜索雷达的电波，它便逃跑。

这引起了具有丰富电子技术经验的老将军——当时四机部部长王诤的深思。他迅速召集有关技术人员和导弹部队进行研究，制定了一个使“黑小姐”落入“陷阱”的周密计划。因为飞机的雷达接收机可以根据它接收到的地面雷达的特点和各种参数判断地面雷达的类别、性能和工作状态。敌人得知了我地空导弹雷达工作的多种参数，所以当收到我地空导弹阵地的电波信号时，就能发现下面是导弹阵地。于是我们便通过更换元件及各种技术手段，改变了地空导弹制导站搜索雷达信号的各种参数，使之酷似一个普通的高炮雷达，这就会使“黑小姐”丧失警惕。这个“陷阱”计划又由岳振华营来完成。

首位“克难英雄”被俘

1963年11月1日上午7时23分，一架U—2高空侦察机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20分钟后，便经温州窜入大陆。

这架飞机的驾驶是国民党空军第五联队少校叶常棣。他的任务是到大陆西北去侦察中共的核基地。执行这种任务，最怕的是和大陆的飞弹“接吻”。他丝毫不敢麻痹，待完成空中照相任务后，赶紧掉头返回。

13时52分，叶常棣飞临江西上饶地区上空。他已经从20500米的高空隐隐约约感觉到远方的海岸线了，不由得心中一阵轻松，满以为此次又平安无事了。它大摇大摆，丝毫没有发现已进入“陷阱”，继续向里钻。14时11分，U—2飞机飞过九江后，进入我地对空导弹第2营的阵地。在距离35公里时，岳营长一声“放”，3发导弹冲天而起。正在操纵飞机准备出海下滑的叶常棣，突然感到“轰”的一声，飞机像一个玻璃瓶被石头击中一样“砰”的解体，自己则像瓶中的一粒小药丸似的被甩出来，失去了知觉。自由落体的刺激，使他在两三分钟后醒来，求生的欲望使他迅速打开降落伞……在空中降落的短暂时间里，这位少校很清醒，自己终于与飞弹“接吻”了！他的驾机成了被我地空导弹部队二营击落的第二架U—2飞机。

叶常棣降落在一个小山丘上。着地后，他企图站起来逃跑，可是动弹不得。他两条腿多处飞进弹片，手臂也受了伤。“完了，真要让共产党剥皮抽筋了”。他瘫在冰冷的地上，他觉得自己干的事情，共产党无论如何也不会

容忍。

叶常棣原籍广东惠阳，生于1933年。对大陆他是“屡次进犯”：1960年第一次驾Rf—101A型飞机侦察大陆；1961年又9次侦察大陆。两次受蒋介石集体点名接见，两年均被选为国军“克难英雄”，这是台湾当局对反共有功的人的最高奖赏。1963年2月派往美国接受驾驶U—2训练，回来后，已驾驶U—2到大陆侦察过两次，获飞虎奖章一枚，蒋经国多次邀他到家里赴宴。就在10月份，还又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可是这次……还没容他再想下去，解放军和民兵便包围上来，他没有反抗。一位军人告诉他：“不要怕，我们不杀你。”他被用担架抬着，送进了当地医院。

他开始非常恐惧，不知什么时候被抽筋剥皮。可是医护人员却和蔼认真地为他治伤。

两天后的一个下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副司令员成钧来到医院，看望了他。两个敌对空军的司令员与飞行员进行了这样的交谈：

刘：“听说你是广东人，多大了？”

叶：“是的。31岁。”

刘：“你放宽心，我们没有必要杀死你。”

叶：“在那边听说被你们抓住了要剥皮。”

刘：“你被击中前，可以看到台湾了？”

叶：“看到海了，眼看就要回家了。”

刘：“被打时，有什么感觉？”

叶：“一震就抛在空中，座舱解体了。”

刘：“飞机有防御武器没有？”

叶：“没有。凭它的高度优势，你们的飞机对它没办法。唯一怕的是飞弹。知道大陆上到处有飞弹阵地，我们的航线想办法避开。”

刘：“你这样年轻，在那个环境里，你不当飞行员，别人也得当，你只能这样做。你现在不可能一下子相信我们的话。你对我们的政策可以一步一步地看。你以后的事，可以商量。要回去，也可以，可能要等到将来……”

台北“中央社”在这架飞机被击落当天则报道：“我空军高空侦察飞机一架于11月1日下午在匪区上空执行例行侦察任务时失事。”对被击落事实采取“不承认主义。”对叶常棣呢？也不承认其存在了。国民党空军在1964年3月29日“青年节”的正式文告中，称叶常棣“壮烈成仁”。而此时他已完全恢复了健康，开始了必要的学习与改造生活。

1969年叶常棣被释放，后来成为华中工学院副教授，还当过钱伟长教授的助手，为钱教授主办的《应用数学和力学》刊物翻译和校对稿件。

1982年8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公布了叶常棣的下落随后批准他回台湾探亲。

导弹第2营因战功卓著，1963年12月26日，岳振华被国防部授予“空军战斗英雄称号”，1964年6月6日，导弹第2营被国防部授予“英雄营”

称号。

三次击落 U—2 飞机

继叶常棣被俘之后，1964 年 7 月 7 日，又一架 U—2 被击落。飞行员李南屏是国民党空军“头号王牌”、“克难英雄”、“飞虎英雄”，他曾 12 次驾机骚扰大陆。可是他哪里想到，这次他的“黑小姐”的骗术失灵了，迎接它的是三枚导弹。当李南屏眼见难以逃脱，在求生的本能驱使下猛力拉下弹射跳伞手柄，可是座椅下方的弹射装置在起飞前已被拆掉，以防他们的“飞虎英雄”被生俘。结果他与“黑小姐”一起在空中粉身碎骨。

3 名飞行员的下场使台湾 U—2 飞行员再也神气不起来了。

1964 年 10 月 16 日，我国在西部地区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台湾极为震惊，又频频出动 U—2 前来侦察我核基地情况。由于这时美国电子专家给 U—2 加装了 13 电子干扰系统，使大陆飞弹屡放空炮，U—2 飞行员又胆壮起来。

再次生俘 U—2 飞行员

到了 1965 年 1 月，轮到了张立义。1 月 9 日下午，台北桃园机场国民党空军第五联队 35 特遣中队少校飞行员张立义，正在打高尔夫球，联队长把他叫过来，说：“张立义，你有任务。”张立义问：“现在？”得到的回答是：“准备一下，明天。”

再过几天就到春节了，去年春节就没在家过。今年张立义想在家好好过个团圆年，并且想好了给妻子买一块衣料。给女儿买一串项链，给儿子买儿挂鞭炮。老实说，他是很不愿意这时候去大陆执行任务的，他怕那个“万一”，但军令如山，又有什么办法呢？

翌日，还在张立义做飞行准备的时候，解放军空军指挥所便向在内蒙古萨拉齐的地空导弹一营，下达了这样的通报：台湾国民党空军 U—2 飞机一架，将于今日 18 时从桃园机场起飞进入大陆侦察。于是这个营的飞弹便张开双臂，准备迎接台湾的“黑小姐”了。

当晚 18 时，张立义驾驶他那 3521 号 U—2 飞机，升入茫茫夜空，向大陆飞来。他这次的任务是对大西北核基地进行夜间红外线照相侦察。

在张立义看来，飞 U—2 到大陆侦察是个苦差事，飞行员按预定航线飞，照下什么东西飞行员也不知道。不过，飞这种飞机一次能得 5000 元台币（约合 500 元人民币）的奖金，还有难得的“荣誉”。他 1964 年 7 月从美国训练归台，就受到蒋介石接见，并站在蒋介石身旁照了相。接着由于在 8 月至 12 月，3 次驾 U—2 到大陆侦察，被评为本年度国军“克难英雄”，又两次受到蒋介石接见。张立义觉得，这是军人最大的荣誉。

他看看仪表，确认 U—2 已从山东半岛进入大陆上空。他再也不敢悠然

遐想，神经立即紧绷。说不定什么时候解放军的飞弹撞上来。

飞机进入内蒙地区上空，他看了一下表，再有一刻钟就可以返航。完成这第4次任务，再完成6次，共完成10次，就可拿到一大笔奖金，离开这令人心惊肉跳的35中队了。

突然，电子预警器的显示器出现了乱糟糟的小亮点。张立义有些疑惑，如果萨姆—1导弹向自己飞来，显示器上应该是一条稳定的亮线。他哪里知道，解放军的“反电子预警2号”已经使他的13系统电子预警器失灵，此刻，3颗导弹正排着纵队向他飞来。

就在张立义犹豫要不要打开13系统电子干扰开关时，一串火球已忽地窜到机翼下，顿时，象被雷击一般，机身剧烈抖动，密封舱一片漆黑。“我被击中了！”在这可怕的一闪念间，他拉下自动弹射手柄，“轰”的一声，他什么也不知道了。降落伞将昏迷的主人投向万丈深渊般的地面。

冷！一阵阵刺骨的北国寒风将张立义吹醒。他发现自己躺在雪地上，奇寒难忍。刚才，他还在保持20度恒温的座舱里，现在被抛在零下26度的雪地里，身上只穿着单薄的高空飞行服，怎么受得了呢？他准备站起来跑步取暖，可一使劲腰部和踝关节彻骨疼痛，才知道受伤了。

他看见远处有汽车灯光，手电筒灯光乱摇，还听得见汽车声和人声。看来是人们都跑去看飞机残骸去了，倒把他这个飞行员扔在了一边。他是多么想让人们俘虏他，不然的话，他很清楚，他会在冰天雪地中冻成僵尸的。

他大声呼喊，使劲摇晃发光的救生设备，可仍然没人理他。他颇有些不平起来。

倒是在美国为期3周的野外生存训练起了作用。他拖着身子，在雪地里开始爬行。从被击落时的10日晚21时15分，一直爬到11日天明，爬了8个小时。

他终于爬到了冒着炊烟的几座土房前，心中一阵大喜。村头第一家，门虚掩着，灶口冒出火光，一位农妇正在做早饭。他扒开房门，想到灶口取取暖。

“谁？你是谁？”农妇大惊。那怪里怪气的飞行头盔、高空飞行服，农村妇女哪里见过？“我冷……让我暖和一下吧。”他央求道。农妇心中已明白了八九分。

“不要烤，冻伤不能烤。”农妇拿出一件大衣给他穿上。又说：“吃的东西在桌上，你自己吃，我出去办点事。”

农妇去了一会儿，把事办成了——带来了几个民兵。这位农妇是大队长董吉召的老婆，这里是内蒙古土默特旗沙海子公社西一间房生产大队。这个农妇又是神气又是同情地向民兵叙说了刚才的一切。

与其说是捉住，还不如说是发现。几个民兵用毛驴车把张立义拉到公社。当解放军赶到时，这位少校飞行员，国军“克难英雄”，已在公社换上了一套崭新棉衣，戴着帽耳有眼儿的棉帽，一副当地人打扮，正坐在炕上吃

鸡蛋面条哩！公社的干部、民兵和前来看热闹的群众还都一个劲儿地劝他“多吃点，多吃点。”这哪里是在对待俘虏，分明象是在招待客人。

正当张立义坐在炕上吃鸡蛋面条的时候，在台湾东港张立义的家里，国民党空军司令徐焕升上将登门“报丧。”1965年1月12日台湾的中央日报是这样报道的：“空军少校张立义不幸于10日夜驾U—2侦察机到大陆执行任务时殉难。空军总司令徐焕升上将特于11日午间专程前来亲向张少校夫人张家淇女士及其子女和岳父母等慰问。”

接下来，张立义与叶常棣一样，开始了必要的学习与改造生活。

转眼到了1969年。张立义和叶常棣一起被释放。

张立义后来成为南京航空学院工厂的工程师。1982年8月26日，他和叶常棣一起被批准回台湾探亲。

五次击落U——2飞机

1965年，中国自制的地空导弹兵器已装备部队。1967年9月8日上午，国民党空军又出动了一架U——2飞机，进入浙江省嘉兴地区侦察，飞行高度2万至2.05万米。设伏在该地区的地空导弹第14营，首次使用国产红旗2号地空导弹兵器，有效地反掉了干扰，又击落U——2飞机一架。

这样，从1962年到1967年，我导弹部队共击落U—2飞机5架。从此，“黑小姐”在大陆上空销声匿迹。在这一时期前后，我军还击落RB—57D飞机1架，击落无人驾驶侦察机3架。统共有9架高空侦察机被我导弹部队击落。

空军导弹部队屡建战功，涌现了不少像岳振华及其导弹营那样的“空军战斗英雄”和“英雄部队”。岳振华营已发展成为一个主力兵团，导弹部队加更强大。

第六节 打击空中间谍

霹雳攻击 P—2V 侦察机

1961年元月25日深夜，天黑风高。在海南岛东北地区上空，一阵刺耳的螺旋桨推进器轰鸣声，由远而近。转眼间，一个巨大的黑影几乎贴着树梢掠过夜空。同时，一件件空投物品纷纷抛下，这些东西有援助所谓“琼崖忠义救国军”的武器，还有大量攻击社会主义新中国，引诱中国军队干部战士携武器“弃暗投明”、卖身求荣的反动传单……这飞来的黑影就是美蒋 P—2V 型电子侦察机。提起它，中国空军将士无不咬牙切齿，却一时拿它毫无办法，眼睁睁看着它频频窜犯大陆，疯狂破坏国家的安全。周恩来总理曾亲自来打击猖狂之敌的中国人民空军某指挥部，熬了整整一通宵。

在台湾的国民党空军中，有一个神秘的“34中队”。它成立于1960年2月，所有飞行员是从国民党空军中经过严格审查挑选出来的，其“入队”条件非常苛刻：要求“思想纯正”，能为“国家”献身；要有2000小时的“飞龄”；在执行任务时，一律不准携带降落伞，绝对服从蒋介石“不成功则成仁”的训示。他们的薪水也远远高于一般飞行员，执行任务时另发奖金，以小时计算，夜行一趟的收入约为2000美元。以当时来讲，这笔钱够他们花天酒地，肆意挥霍的了。

“34中队”名义上直属国民党空军总司令部情报署。实际上，它是被美国情报机构——“海军辅助联络中心”控制，是由美国人出飞机、出钱；国民党出入，替美国卖命，获取中国大陆战略情报的一支空中间谍别动队。

该中队的皇牌武器便是 P—2V 型电子侦察机。它原是美国海上反潜巡逻机，经过改装后，不仅能超低空飞行，还能在黑夜长途奔袭。机上装有先进的电子侦察和干扰设备，配有驾乘人员13至14人，（机长1人，正副驾驶员4人，领航员2人，通讯员兼电子侦察、干扰4人，射击员兼空投特务、物品、传单2人），执行任务时可以分成2个班次，一组干活，一组睡觉。就从这个小细节也能看出，其窜犯大陆时的骄横狂妄。

P—2V 型机从1960年2月至1963年6月入窜大陆的范围是：江西、湖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海南岛、山西、山东、安徽、江苏及东北、京津沪地区。它的任务：

1. 实施电子侦察，获取中国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战略情报。可窃听并录音中国对空指挥的无线电话、电报，破译中国各种密码电报，侦察中国各型雷达的部署、性能。

2. 空投武装特务。可在深山密林或社情复杂的地区一次空投武装特务10余人，配合大陆阶级敌人进行颠覆破坏活动。

3. 散发反动传单。在政治上对中国进行所谓的“心理战”，进行反革命宣传和煽动，妄图策反中国军政要员。

保卫祖国领空是我人民空军的神圣职责，他们为打击 P—2V 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和沉重的代价。

一天夜里，P—2V 又来了。随着一颗红色信号弹的升起，我某部战鹰升空拦截。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里，我飞行员全靠雷达跟踪和地面指挥所的准确指令，紧紧咬住往来犯之敌。

“前方距离敌机 3000 公尺。”

“前方距离敌机 2000 公尺。”

“前方距离敌机 1000 公尺。”

近了，近了，更近了。只见雷达屏幕上一片闪光的亮点，目标混杂其中，顿时真假难分。

怎么办？我战机设备落后，遇到这种情况可以放弃追击。但就这么让敌人逃之夭夭，逍遥溜走吗？不，这是我英雄飞行员的奇耻大辱。我战鹰以无畏的勇气继续追击，在干扰中搜寻目标，终于重新咬住了敌机。这时，P—2V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它往山区逃窜，然后突然减速，并降低高度，在两山之间“捉迷藏”（它的机动性能优越，前方有危险障碍时还能自动规避）。敌人这一招实在狠毒，穷迫不舍的我战鹰速度快，转弯半径大，又是在黑暗中，只见一团火光冲天而起，我飞机撞山爆炸，英勇的飞行员壮烈牺牲……

类似的惨重损失发生了好几起，引起了空军将士的极大悲愤。飞行员更是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恨不得驾机硬撞，也要把 P—2V 给揍下来。可是除了雷达上的光点，我们连敌机的影子都看不到。

P—2V 侦察机的罪恶飞行，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国防建设，造成了政治上的恶劣影响，理所当然地引起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高度重视。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曾亲临我空军某指挥所一个通宵，最后指示：“采用一切方法将敌机击落！”总参谋长罗瑞卿向全军发出指令：“要以海底捞针的决心打下敌机！”一时间，对付 P—2V 成为我军防空作战的中心任务，如何击落 P—2V 成了我军必须解决的难题！

P—2V 活动好像是神出鬼没一般，但我军很快就掌握了它的活动规律：它一般是在无月亮的暗夜入窜大陆，入陆的高度只有 200 至 300 米（目的是尽量避开我雷达探测范围），在大陆活动长达 6 至 8 小时，拂晓返回。它在大陆定点、分段、计时作低空慢速飞行，航线曲折多变，通常在我重要城市、空军基地和高炮火力的边缘通过，这样既可以大量获取情报，又能避免遭我攻击。如果碰上我战鹰拦截，它能迅速施放金属丝干扰和发射隐真示假信号，同时作不规则的航向、高度、速度机动，造成我机上雷达无法分辨目标，更不能瞄准攻击。这就是我战鹰奈何不了它反遭它暗算的原因。另外，每周六晚上，P—2V 都不出动，原因是为了让那些不知哪一天就会见阎王的驾乘人员醉生梦死，寻欢作乐……

海军航空兵某部指战员经过战术研究，认为 P—2V 利用黑夜掩护，是它的主要优势，如果我们能创造条件，使它暴露在明处，它就不堪一击了！这

话在理论上当然是成立的，但有办法变黑夜为白昼吗？

海军北海舰队航空兵副司令员陈士珍，集中群众智慧，经过苦心钻研、反复计算，提出了一个使大家眼睛为之一亮的方案。他提出了用轰炸机在敌机上空投放照明弹，犹如晴空霹雳一般，同时用歼击机攻击。这种多机种协同，立体攻击的方法立即得到上级的支持，并从部队抽调飞机进行了“霹雳攻击”——夜空照明战术的试验，取得了初步经验。1963年11月，经总参谋部批准，在山东流亭机场正式成立了海军航空兵独立第5大队，专门训练“霹雳攻击”战术。此后，各航空兵部队相继成立了夜战独立大队，刻苦演练“照明”与“攻击”协同作战技术，并于当年12月6日起，担负起暗夜打击P—2V的战斗值班任务。

照明攻击战术看似简单，其实非常复杂。它是在两眼一抹黑的夜间低空条件下进行的，我机起飞后要始终保持无线电静默（防止敌机窃听而掌握我机动向），完全依靠雷达提供情报数据，由地面领航员单向引导照明机和攻击机，根据敌方的空中动态（方位、距离、高度、速度、航向），在同一时间引导我机各就各位，占据投照明弹和实施攻击的最佳位置。敌机被照明后，攻击机飞行员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搜索、发现敌机、实施攻击并将其击落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这就要求参战人员个个技术过硬、配合默契，协同一致。如果在行动中出现半点差错的话，其后果不仅仅是前功尽弃，同样也会发生机毁人亡的悲剧。

1961年11月6日18时18分，1架P—2V飞机在黄海上空距辽东半岛200多公里时，被雷达发现，驻城子高射炮兵群（由空军高炮第503团、探照灯兵第402团之七、八连和陆军高炮1个团、6个营组成，指挥员是高炮第101师师长范震江）迅速作好战斗准备，在距阵地40公里时，指示雷达突然开机捕捉目标，探照灯兵大胆将敌机放近至5公里时，才突然开灯，4公里即照中目标，使敌机进入高射炮火力范围，高炮群集中开火，一举将其击落。从探照灯照中目标到飞机坠地，只用了30秒钟，充分显示了“快速近战”战术的威力。总参谋长罗瑞卿亲赴现场向作战部队表示慰问，并指示将P—2V型机组成员13具尸体，就近立碑埋葬，日后便于其亲属认领。这是我军首次击落P—2V型飞机。

该机被击落后，国民党军此种飞机时隔7个多月才恢复活动，其活动地区多在大陆沿海，有时采取直进直出的方法，尽量缩短在大陆的飞行时间。同时，机上又更新了干扰设备。

1963年，空军认真贯彻罗瑞卿提出的“海底捞针”的指示。总结推广作战经验，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于1963年6月20日晨，驻南昌的航空兵第24师副大队长王文礼，又击落1架P—2V飞机。该机坠于临川县大窝坑，机组14人全部毙命。6月28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了王文礼、领航员张健和第24师师长王子祥，表彰了他们的功绩，空军授予王文礼以“夜空猎手”的荣誉称号。

1964年6月11日16时，又一架美蒋P—2V由台湾新竹机场起飞，航向直指我青岛方向。我海航兵各独立大队奉命停止夜航训练，准备迎击入侵之敌。

21时07分，敌机在距青岛70公里处，突然改变航向，掉头向南飞行。21时54分，敌机低空从新海连市丰乐桥窜入大陆后经山东潍坊以北右转，利用大顶山、昆仑山掩护向平度、莱阳方向窜犯。

23时08分，我海航4师参谋长辛英元一声令下，独5大队攻击机陈根发、照明机石振山机组，分别驾驶米格—15和轰5型飞机昂首冲向夜空。

待照明机、攻击机飞至最佳位置时，辛英元立即命令：“照明弹一次投下！”霎时，12枚90公斤照明弹全部照亮，直径1.4万米范围的空域成了白昼，敌机正好在正中，担任攻击的陈根发立即发现目标，即实施攻击，连续3次开炮，3次命中敌机，敌机P—2V顿时冒出一团火光，拖着浓烟坠毁于莱阳以北25公里处，机上13名机组人员全部毙命。从敌机残骸中搜获4枚“响尾蛇”导弹和2部侦察原子试验情况的空气采样器。6月16日，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了陈根发等作战有功人员。

RF—101 空中殒命

RF—101型高空侦察机，是国民党空军的一张王牌，它是美国制造的高空高速侦察机。这种飞机曾有“西方战略眼睛”之称。能高空照相。国民党空军吹嘘此飞机：高炮够不着，飞机追不上，导弹瞄不准。自1961年起，RF—101飞机竟明目张胆地在大白天窜入浙江路桥机场上空侦察，窜扰达数十次。

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毛泽东主席批准海军航空兵第4师派小分队驾驶新中国制造的超音速歼击机歼—6型飞机，由山东空转浙江作战。

1964年12月18日下午2时，警戒雷达连在距路桥150公里处发现RF—101飞机1架低空北上。路桥基地司令员吴长武为迷惑敌人，首先令歼—5双机起飞至大陈、至莞岙一带空域佯动，接着令王鸿喜驾驶歼—6飞机在敌雷达发现不了的空域隐蔽待战。王鸿喜在指挥所引导下迅速发现敌机。这时敌机正在迅速爬高，已窜到王鸿喜的左前方。王鸿喜闪电般追向敌机，快速急转瞄准，待敌机正慢慢减少上升角时，3炮齐发，命中敌机，打得敌机冒着浓烟，栽进大海。该机飞行员谢翔鹤跳伞，被民兵活捉，谢翔鹤曾多次窜入大陆侦察，获得了国民党“飞虎”、“彤弓”、“宣武”、“云龙”4枚奖章，是国民党空军第5联队第4大队少校作战官。他说：完全没有想到这次登陆才3分40秒就当了俘虏。

海峡上空另一场空战

1967年元月13日13时许，我空军飞行员乔田福、叶木佑、胡寿根、陈国良驾驶着4架米格19（歼六型）飞机正在福建漳州、晋江一带上空巡逻。突然，地面指挥所传来一道战斗命：“有空情，准备战斗！”

原来，国民党空军官校26期毕业的宋俊华奉命驾驶RF—104侦察机侦察大陆沿海机场和船舰活动情况。飞机进入福建晋江上空时，高度为1万1千米，时速2千公里。

尽管我军4位飞行员从未直接参加过战斗，接到命令后，他们怀着对美蒋空中敌人的深仇大恨，立即投入了战斗。

当我军飞机追踪台湾侦察机飞至福建晋江、崇武上空时，被台清泉岗地面指挥所发觉，该指挥所立即命令4架潜伏在海面低空飞行的F—104飞机火速前往保驾，这个4人组合的阵容是：

一号机：萧亚民中校，机号4347，空官32期，35岁，山西太原人，已于1970年6月10日因训练任务死亡。

二号机：胡世霖少校，机号4344，空官41期，30岁，湖北黄冈人，已于1990年元月30日病故。

三号机：杨敬宗少校，机号4353，空官36期，35岁，江苏镇江人，当天死亡。

四号机：石贝波上尉，机号4348，空官43期，27岁，江苏吴县人，现任复兴航空公司正驾驶。

这4架F—104飞机获令后，很快跟上我机来，开始的位置在我军飞机的右后方。

根据这一敌情，我机迅速以间隔7公里的距离拉开，分两边迅速掉头，胡寿根驾驶的3号飞机急弯掉头时，就发现了台湾的F—104战斗机，他采取斜对头挡阻射击方式，迅速瞄准，3门炮连发48发炮弹，一举击落了台湾3号F—104战斗机。

胡寿根看到他所击中的F—104战斗机冒着烟坠入云层，即驾机返航。到此时，整个过程仅10秒多钟。返航时，地面指挥所发出呼叫，问他们在不在，他们4人同时回答，人和飞机安然无恙。返回陆地后，胡寿根他们去打捞了这架F—104战斗机。敌机掉在晋江，崇武海边上。飞行员的右臂被打断了。

第七节 孔祥熙重踩故土

蒋介石率众迎接

1962年10月23日，台北松山机场高官云集。蒋介石夫妇、陈诚夫妇、张群、于右任、谢冠生、谷正纲、黄伯度、黄季陆、陈嘉尚等都到机场迎候。

上午11时50分，当孔祥熙所乘的西北班机降落时，蒋经国、李骏耀两人走上飞机，把83岁的孔祥熙扶了下来。当两位少女为孔套上两个花环时，机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蒋介石站在机场贵宾室的门口，脸上一直带着微笑。孔祥熙从欢迎的人群面前走过，一再说着“谢谢”，当他来到蒋介石跟前时，蒋向前走了两步，握住孔的手，向他问好，孔则表示感谢。

接着，孔祥熙发表简短谈话如下：

本人此次返国，得谒见总统及夫人，极为愉快。许多老友老同事亲到机场迎接，因时间关系，未及一一握手致意，甚以为歉。

本人旅居国外多年，此次有机会返国小住，更恭逢总统七秩晋六华诞，得以亲向总统祝嘏，倍感荣幸。尤其能亲眼睹台湾各方面之成就，及军经建设之成果，克遂宿愿，至为欣慰。

多年来许多老友老同事为反攻复国在台湾所作之努力，以及对国家之贡献，本人由衷表示钦佩。深信不久将来，在总统英明领导之下，我人必能早日反攻复国，解救被共匪奴役的同胞。

今日承蒙总统伉俪、副总统伉俪、于右任院长、谢冠生院长、张岳军秘书长以及中央银行俞飞鹏副总裁等亲往机场迎接，顺此敬致谢忱。

从孔祥熙的谈话表示，这次来台是给蒋介石做生日。但台北政界耳语纷传，谓孔氏此次返台，是台湾当局粉饰门面之举，蒋介石为了配合“反攻大陆”需要，意欲给人以国民党“大团结”印象。做为“皇亲国戚”的孔祥熙，应有响应之义务。否则蒋氏已在台湾做了13个生日，他为什么一次都不回来呢？

宋美龄当年催办护照

1947年7月间，孔祥熙处理完在国内的股份和房地产后，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递交一份外交护照，并附亲笔信一封，要求延长该护照的使用时间。

这张护照是1944年签发的，当年出国赴美的名义是国府委员兼行政院副院长，任务是考察中国银行国外业务与洽谈美对华救济事项（孔同时是中国银行的董事长）。而现在，孔既非行政院副院长，又不是国府委员。外交部官员十分为难。不同意，有碍于孔的颜面，尽管他已经下台，然潜力亦殊

不可侮；同意，则与规定不相符。考虑再三，决定以孔氏为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名义另办一张“官员护照”（较外交护照低一级），可承办人指出，中国银行仅能算国营事业，董事长不能算作正式的政府官吏。

正欲再想办法，蒋夫人宋美龄亲自打了一个电话催办。外交部官员因奉此意，灵机一动，给孔祥熙一个外交部顾问的名义，乃填发外交护照。

经过上述的曲折，虽有点委曲这位前首魁，但外交护照，总算到手。

从孔祥熙变为外交部顾问出国，不禁使人联想到三年前这位财神在巴西“养病”时，孔大少爷及孔二小姐赶往“侍奉”的事。孔大少爷出国，普通护照当然不行，官员护照也不乐要，就弄一个外交部的名义领得外交护照。而孔二小姐呢，如果跟着她的父亲走，自然可用眷属名义领得护照，但二小姐不肯托庇尊翁宇下，她外交护照上的身份是蒋夫人的外甥女。这次孔祥熙又要出国了，外交部的官员开玩笑说，假使他的大公子与二小姐也出去的话，不知道护照又该怎么填。

居留美国的政治色彩

1948年以后，孔祥熙作为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的主要董事，和宋霭龄一直在里弗达尔过着流亡生活。孔祥熙每周有两、三天开车去华尔街，余下的时间在家里工作。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是在孔家成为流亡者之后，仍然保持对他们感兴趣的少数几个新闻工作者之一。他称中国银行为“院外援华集团的神经中枢”。皮尔逊提醒他的读者们，通过“院外援华集团”的各办事机构，中华民国政府将数千万美元过户，以支付闪电战式的宣传的费用。

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这样写到：

孔祥熙博士对美国政治熟话的程度不亚于对中国财政的精通。在路易斯·约翰逊参加杜鲁门内阁好早以前，孔就选择约翰逊为他的私人律师。

后来，约翰逊当了国防部长，成为主张美国支持台湾最坚决的倡导者之一。这与他和孔的关系，也可能有关，也可能无关。……孔祥熙博士曾多次拜访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斯泰尔斯·布里奇兹，而这位参议员也一直积极敦促给台湾和蒋介石流亡分子以援助。

1948年，布里奇兹竞选连任时，他的表上登记了纽约的阿尔弗雷德·科尔伯格的2000美元的竞选捐款。科尔伯格，是“院外援华集团”的前台人物，也是孔祥熙博士的朋友。

意味深长的是，布里奇兹参议员不仅投票支持“院外援华集团”的政策，并就此发表演说，而且还为孔——宋王朝帮了一次大忙。……

孔令杰已经成为这个家族中最忙碌的一员，1950年尼克松竞选参议员期间，孔老头子派小儿子去洛杉矶，给这位参议员送去捐款和鼓励。他还劝说加利福尼亚州众多华人选民帮助选举尼克松。孔令杰的援助之手巩固了孔家

与尼克松夫妇之间的交情。此后多年里，尼克松夫妇时常造访里弗达尔孔府。

种种迹象说明，孔祥熙之居留美国，确实负有外交上的特殊使命，仿佛顾维钧是名义上的大使，而幕后活动则多半在于他。这正如他致报社函中云：“熙虽老退，然尚负有政府名义，在美亦为政府有所联系”。在留美的前几年，孔祥熙一直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寄托在老同学杜威身上。但杜威的命运不佳，被民主党的杜鲁门轻易地击败，孔的注下错了。此后他联络共和党的议员，利用杜威的关系，想在华盛顿的国会大厦中发挥一点作用。然而，马歇尔集团以个人恩怨摒弃了国民党，先是艾奇逊发表了对中国的白皮书，华盛顿坐看中国大陆解放，司徒雷登也无能为力。接着，“中国游说者案”被民主党议员提出。老孔只能在纽约闭门不出了，长时期的缄默。直到1952年美国大选，在华尔道夫酒店有会客室的孔祥熙，才又活动起来，艾森豪威尔中选总统，他这一宝是押中了，因为杜威也在幕后支持艾。1957年11月18日，香港《新晚报》刊登一篇题为《孔祥熙在美国干些什么？》的文章，作者不但证实了孔居留美国的政治色彩，同时还披露了他一些鲜为人知的趣闻。摘要如下：

前两天晚上，在朋友某君家里遇到了一个新从纽约来的美国商人。他解放前在上海做进出口生意，和国民党政府的一些达官贵人很有交情，对于这些人的情形也相当熟悉。

我和他俩谈来谈去，忽然扯到了从1944年起便在纽约当“寓公”的孔祥熙。

据这个商人说，孔祥熙目前虽然没有担任国民党政府的任何职务，但却是代表蒋介石和美国参议员诺兰、众议员周以德这些人斟盘打交道的主要角色。此外，他和“中国委员会”的主持人鲁斯也经常来往。

“当然蒋介石得找他帮忙，”我不禁接嘴说“因为他那么有钱，可以掏腰包来垫活动费。”

“你这个假定可完全错了，”这个美国商人哈哈大笑，“H·H·孔在别的事情上可以通融，在钱这一方面可绝对不肯开玩笑。据我所知，他的活动费还是向台北实报实销的。最近，他不像去年那么活跃了，因为蒋介石没有发付足够的活动费给他。一分钱，一分货——这是他一贯的主张。”

接着，他又告诉我，孔祥熙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纽约度过，原因是：他的妻子宋霭龄在那里做股票买卖，已经成为股票市场上的一个第二，三流的大户。而他本人，为了想多活几年，遵照医嘱实行节食，大肚子已经不如从前那么凸出了。

听了这个商人口中的孔祥熙近况，谁又不会很自然地想起他过去在国民党官场中所闹的一些笑话呢？

他是山西太谷人，在美国留学回来后，曾经做过一个时期的青年会工

作。由于把蒋介石和宋美龄撮合起来，他在国民党政府中的地位才开始扶摇直上。他和宋子文虽然都是蒋介石的至亲，可是蒋喜欢他的程度，远过于喜欢宋。理由很简单，他追随蒋介石这么些年，向来没有说过一个“不”字。

抗战初期，他在重庆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时，每逢主持行政院会议，他总得说一两句莫名其妙的话，惹得大家牙都要笑掉了。

记得在某一次行政院会议上，粮食部长徐堪报告了米价上涨的情形，希望行政院能够采取紧急措施，以便平定米价。孔祥熙坐在那里攥紧眉头苦苦思索了半天，与会的部长们谁也没敢出声，静待他的指示。

忽然间，他伸出胖手在会议桌上拍了一下，笑着说：“我可想出了一个办法——准保行得通！”

大家真以为他想到了什么高明的主意，所有的视线都投射在他的身上。

看到大家的神情，孔祥熙更加得意，摇头晃脑地接着说：“行政院可以马上下一道命令，鼓励大后方的人民改吃面包。这么一来，米价自然而然会跌下去。再说，重庆的面包总是做得不好。有了政府的倡议，将来的面包烘制技术一定蒸蒸日上，就可以得到外国朋友们的好评。还有，经过我多年的研究，外国人的身体比中国人好，就是因为他们吃面包，所以为了国民健康，我们也应该用面包来代替大米……”

让他这么一说，所有的部长们面面相觑，谁也不知道应该怎样接岔儿。

也是在那个时期，重庆的各机关工作人员聚赌之风甚盛，财政部直属的关务署尤其厉害，职员们常常在办公室里就打起麻将来。

这个消息传到孔祥熙的耳朵里，他决定以“部长”的身份，前往“训话”一番。关务署人员事先听到风声，大家都捏了一把汗。

在该署的一次纪念周上，孔祥熙果然声色俱厉，把全体人员大骂了一顿，认为他们在办公厅里打麻将过于不成体统。

可是等到话快说完的时候，他却咧开大嘴笑着说：“其实，打麻将可能看得出一个人的性格，输钱不着急的人，涵养一定好，也可以担当比较重要的职务。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将来选用人才，不妨让大家在一起打打麻将，哈，哈哈……”

听到这时，台下的人们也全都纵声大笑。

现在，他在纽约负责和那些“援华派”的美国佬联系，不知道是否仍然利用打麻将，来判断那帮人的能力和品格？

五次成为新闻人物

在美期间，孔祥熙有五次变成新闻人物。

第一次是在1951年6月间，美国国会为了调查麦克阿瑟事件，召魏德迈到场作证。当时魏德迈说，当国共战争发展到最高潮而南京国民政府面临经济崩溃边缘的时候，他曾提给蒋介石一张名单，主张责令当朝权贵要捐献

资产，以裕军费来源，可是蒋一看到孔祥熙名列前茅，就勃然大怒，蒋说名单上所列的都是他多年来的忠实干部，并不如外间所说的那么有钱。翌日美国报纸把魏德迈发言列为头条新闻，轰动全球。

在其后三年，孔氏在长堤所设的别墅，逃出了一个中国厨师，向法庭控告孔祥熙虐待，要求自由，并请美国予以政治庇护，此事也成为一个时候的花边新闻。从此可以发现，孔在多处设有公馆，穷奢极欲之致。但他不是用它来供自己享受的，而是他所负“国民外交”工作应有的安排，当时美国国会盛传有“台湾说客团”之说，与此有其不可分的关系。

同年春，香港出现了一本《孔祥熙传》，同时盛传孔要组党，并准备同陈诚竞选副总统，谣言满天飞，似乎煞有介事。后来事实证明，那是海隅有人想骗他的钱，故意布下这么一个圈套，孔本人绝无此意。他年高八十，饱经忧思，而台湾现状又是那样，试问还有什么好做呢？

1956年11月25日，香港《星岛日报》刊登两篇文章：一篇为社论，标题《维护纪纲、伸张正义、豪门权贵如要回国做官，须先受审判》；另一篇为副刊文章，标题《孔祥熙欲投机乎》。由于两篇文章中出现了“白华”、“天堂遗臭”及“皇亲国戚”等词，使孔祥熙大为震怒，便让其子孔令佩向香港高等法院民庭控告《星岛日报》毁谤，令其名誉受重大损失，要求赔偿不指定数目的损失费。此案开审时，双方俱延聘著名大律师两人出庭致词，原告以毁谤罪起诉，被告律师以原告人不亲自出庭及不在本港居住为词。此社会人士且多以谁方会胜诉为打赌的。由于双方所聘大小律师都为知名之士，故一般人估计，双方讼费可能超过七八万元，如此巨大的开销，使该案成为香港多年来最耸人听闻的一大讼案。1959年2月14日上午，香港高庭审讯后宣判，原告孔祥熙得胜，被告人须付赔偿费一万元并堂费。

到了1960年10月间，孔祥熙在美国的活动揭底了。那时美国进行大选，台湾当局为了个人的政治利益，支持尼克松和肯尼迪竞选总统。肯尼迪的一个亲信华尔脱·品克斯特为此发表了一项长篇报道，说尼克松的竞选费用，都是孔祥熙的一位公子交给周以衡和诺兰的。此事未见台湾当局声明否认。

孔祥熙晚年，并没有忽视他的慈善家形象。一次，他到奥伯林参加奥伯林——山西纪念协会成立五周年的纪念活动，并在学院里设立了奖学金。一位记者问关于他在美国有“5亿多美元”的巨额财产传说。他听后，眼圈都红了，这位老当铺掌柜摇了摇头，面带困惑的神情。他说，国民政府垮台之后，他损失了全部投资，现在靠微薄的存款过日子。这位年轻的记者，信以为真，同情地点点头，并作了记录。

蒋介石亲撰“事略”

1966年，孔祥熙86岁高龄时终于从“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岗位退下来，与宋霭龄一起搬进一所新居，宅址：长岛蝗谷非克斯巷。他的健康迅速恶化，

有严重的心脏病。1967年8月，他被紧急送进纽约的一家医院，8月15日，他死在医院，时年87岁。《纽约时报》本想把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加以评述，但却蹩脚地写了这么一段话：

孔先生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他的一位前下属说：“他是位很难共事的人。他喜欢空论和闲谈，不下达明确的指示。至于他的能力，他和所有那些山西银行家一样，是一位精打细算的人，但他不是具有政治家风度的理财家！”

孔祥熙的葬礼在5号大街的马尔布尔学院教堂里举行。宋美龄携带一支5人锦衣卫队同蒋介石的小儿子蒋纬国从台湾飞来参加葬礼。参加葬礼的有“院外援华集团”的中坚人物，如尼克松、红衣主教斯佩尔曼、参议员埃弗雷特·戴克森、詹姆斯·法利和迈阿密海滨的百万富翁威廉·波利。迈阿密转口公司老板——CAMCO的老板就是这个波利。他是飞虎队的成员，现为驻巴西的大使。巴西是宋氏家族最喜欢的投资国家之一。

宋子文没有参加孔的葬礼。在晚年岁月里，他们之间没有什么感情可言。

9月3日，台北举行了孔祥熙追悼大会，蒋介石亲撰《孔庸之先生事略》，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谷凤翔代为宣读。

宋家王朝的策划者

孔祥熙死后，宋霭龄又活了6年。但她从未回过大陆或台湾。在亚洲，人们不断地谣传，说来氏姐妹每年在香港团聚一次。知情者闻之只是摇头一笑而已。尽管自1949年以来，她一直身患疾病（患的是某种癌症），但是宋霭龄还是活到85岁，于1973年10月21日死在纽约。《纽约时报》只是在一个应付差事的讣告中简单地说了几句悼念她的话。

这个世界上一个比较令人感兴趣的、掠夺成性的居民，就这样在一片缄默的气氛中辞世了。这是一位在金融界颇有成就的妇女，她的财富仅次于她的弟弟宋子文。她也许是前所未有的最富的女人。她的钱财全靠她的狡黠积累起来；宋美龄和蒋介石的婚姻是她从中撮合而成的；她是宋氏传奇的主要设计者，她是宋家王朝在权力上扶摇直上的真正策划者。宋庆龄曾说：“倘若大姐是个男人，委员长恐怕早就死了，她在15年前就会统治中国。”不难想象她的阴险狠辣程度。

孔祥熙官邸秘书夏晋熊日后回忆说：

宋霭龄是个很用心计的女人。待人接物故作矜持，和孔的部下总是有意识地保持一定的距离。对人称呼都有一定分寸：以官衔称呼的如徐次长（徐

堪)、陈副总裁(陈行);以英文名字称呼的如K·K(郭景琨)、亨利(凌宪扬)、P·T·(陈炳章);连名带姓的如陈延祚、高晓楼等。

我刚去范庄,宋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喜欢欧化生活享受的“阔太太”。她一年中有很多时间住在香港,每天要睡到午饭时才起床,晚上爱打桥牌,经常的搭子是徐堪、陈行、郭景琨等,一打就到深宵一二点钟,后来有次我在香港跟她直接接触一件事情,使我感到这个女子除了生活享受之外,很会玩弄政治。

1943年春,“战地钟声”的作者海明威夫妇与宋霭龄联系,要到中国来考察我国战时生活,收集写作材料。宋从香港打电报给孔祥熙派人去港接引,陪往前线庐包等地视察。孔把这任务交给了我。我到香港之后,在等候海明威的过程中,常到浅水湾孔家看宋。一天,她对我说,她很想见到英国“泰晤士报”驻远东的记者麦克唐纳,要我代她联系。麦在当时香港新闻界中颇有声望,可是我跟他素昧平生。宋好像猜透我的心事似的对我说:“你可以利用海明威夫妇到中国的消息作引子,去把这事告诉麦,说海明威是作为我的客人到中国的,接着就可问他愿否跟我见面谈谈。”我照着她的指示找到了麦,麦对我送去这一消息,果然非常欢迎。我跟着就说,孔夫人现在在香港,如果你愿意见见,我可代为安排。麦表示非常高兴。第二天,宋就在家接见了麦。我没有参加他们的会见,不知道他们的谈话内容。但是就在我逗留香港期间,我看到了香港的英文报纸上登载着麦宋会晤的消息,宋大事吹嘘她的丈夫孔祥熙主持中国战时财政工作的功绩。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宋为什么要见麦克唐纳的道理。跟宋接触中,有一件事情使我难以忘怀。1942年,我亲戚过养墨的儿子,在圣约翰大学毕业,从上海来重庆,他已故的母亲是宋霭龄的姨表姐妹,所以来找我引见宋。之后,他又要我找宋谋一工作,目的是想当个美国空军的翻译员。我把他的要求向宋提出时,她带笑说:“怎么,这样起码,只想当个翻译?”接着说:“好吧,你跟周至柔(国民党航空司令)去讲一声,就说这是我们的事情好了。”我跟周一次之后,事情就成功了,这个青年人被派到昆明空军部队里做翻译工作。过了几个月,忽然接到他来电,说因犯了军法,有被处死刑危险,要我设法向宋恳求搭救。我一看这样无头无尾的电报,既不叙明犯罪真象,又是触犯了军法,感到事情棘手。我就把电报给孔的大女儿孔令仪看,请她转给宋,看该怎么办。按孔家的规矩,一般亲戚来往的事情多数大女儿联系。她报告宋霭龄之后,对我说:“夫人讲,孩子的性命是一定要救,否则对不起过去的姨妈,但是这是宋家的事情,所以要告诉蒋夫人以后再决定怎么办。”过了两天,孔令仪对我说:“已同蒋夫人接头过了,你速去告诉周至柔,说是蒋夫人的意思,要他设法把这个孩子释放。”我转告周至柔以后没有多少日子,接到青年人来电感谢搭救之恩,并说他径自回上海去了。他究竟犯的什么军法,周至柔怎样把他放出来的,我至今也不清楚。

宋霭龄对孔祥熙的生活习惯，管理很严，不让他喝酒，中午一定要他睡午觉，晚上不许他办公等等。孔在人面前装得伉俪情深，常常谈起这些事，以示宋对他的体贴关心。有些人信以为真，认为她心地善良。其实她是一切事情的主角。她 1914 年与孔祥熙结婚，次年回国，开始宋霭龄同父母一起住在西摩路 139 号，后来孔祥熙安排她前往山西。他们乘火车去太谷，中途不得不在铁路的终点榆次下车，宋换乘轿子，孔则骑蒙古小马相陪，走完剩余的路程。

宋霭龄对这种不便感到不悦，但当抵达她的新居时，心花怒放。新居外观虽不好，但广厦宽庭，犹如宫殿。周围是美丽的花园。家仆不下 500 人。

1916 年，她在太谷生了第一个孩子，名叫罗莎蒙德（令仪）。然后又在上海生了三个孩子。先是大卫（令侃），第二个是珍妮特（令伟），最后是路易斯（令杰）。他们都像是温室兰花，娇生惯养。

孔大小姐婚姻风波

孔家儿女 4 人中，大姐孔令仪还算安分，只是生活豪华。小弟孔令杰年轻时即已出洋，世人亦无微辞。不过关于令仪的婚姻风波，早年新闻界也有些传说。

宋美龄希望她嫁给胡宗南，还有人代卫立煌做过续弦的媒。李毓万代孔勾结韩复榘部师长孙桐萱时，还替孙的兄弟桐岗作媒，结果惹起二小姐孔令俊的反感，要林春良代李毓万印发喜帖，在南京、上海分发，说某月某日其女（其时尚未成年）与孙桐岗君结婚，下具李夫妇双名，不知内幕的纷纷往李家道贺送礼，弄得李啼笑皆非，向各处收回喜帖，并向孙家道歉。

孔令仪对家庭介绍的对象都一一拒绝，自己选上了孔令侃的同班同学陈继思。陈虽是圣约翰大学毕业，但是他的父亲是上海某舞场的音乐指挥，因此孔夫妇感觉陈出身低微，够不上门当户对，始终不予同意。双方僵持无法解决，她就约陈同往美留学，在纽约结婚，两老只得默认，由空运补送了一份嫁妆，运嫁妆的飞机失事，引起了社会指责。他们婚后就自营商业，始终没有投入统治集团。

孔令侃行为骄横

据西奥多·怀特说，年轻的大卫“行为骄横”。一件有名的宋家轶事说明了这一点。大卫少年时学会开车。一次，大卫在上海公共租界的一个十字路口被一名锡克巡捕拦住。据说巡捕正要训斥他开车冒失，大卫向他挥动手枪。后来的事情便不清楚了：有的说无人受伤，有的说巡捕的拇指被打断了。项美丽也曾这样描述了孔家饭桌上的一段情景：

例如，他们不得不制定一条家规，以解决饭后吃水果的问题，盘子里堆满苹果、梨、桔子等应时水果，顺着桌子传过去。为了避免大家挑最好的水果，孔夫人规定每个孩子只许拿最上面的那个水果，不管是大小。一天，最顶上的水果是个有斑点的梨子，盘子传到大卫的面前。“谢谢，我今天不想吃水果，”这位年轻人不感兴趣地说道。

盘子传到罗莎蒙德面前，她服从家规，拿了那个有斑点的梨，没有抱怨。水果盘子又传了过去，几轮之后，盘子又放在桌子中间，这时顶上是一个无斑的好梨……大卫看了一眼，说道：“我看我还是吃点儿水果吧。”他不慌不忙地拿了个梨，开始削皮。其他的孩子们大声喊叫起来：不公平，不公平，大卫骗人！

大卫一边削梨一边抬头解释道：“这叫作水果策略。”

1932年孔令侃进入圣约翰大学时，才20岁出头的年纪，其父就让他担任了交通银行代表官股的董事，并常让他将财政部及中央银行在上海的一部分公文带到学校里批阅。孔令侃毕业后从政管财，呼朋引类成立了一个名叫“南尖社”的组织。“南尖”音似纳粹，试图仿照希特勒的纳粹党建立自己的政治势力。1936年孔令侃大学毕业后，其父立即任命他担任财政部的“特务秘书”。他的这一官职在历史上没有先例，职权毫无限制，事无大小，无不过问。财政部里自两位次长以下，无不以其马首是瞻。

随着财富与权力的增长，孔令侃越发专横跋扈。对当时中国财政金融界的头面人物，他往往直呼其名，颐指气使，当面训斥。就是对他的舅父宋子文，他也不买帐，总直呼其名，称之为“TV”（宋的英文名字缩写），还曾为争购猪鬃生意两人闹得不可开交。更为荒谬的是，孔令侃指名要讨宋子文妻子张乐怡的小妹为妻，公开宣称：“娘舅归娘舅，讨他的小姨子，我就是他的连襟，与他平起平坐了。”搞得孔、宋家族哭笑不得。后此事未成，孔令侃就与比他大10多岁的盛革臣（清末大官僚盛宣怀的第七子）的妻子秘密姘居，成为轰动一时的丑闻。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执掌国民政府财政金融大权达20年之久的孔祥熙终因劣迹昭著，被蒋介石解除了职务。孔令侃从政当官的路也暂时被堵塞了。他决心另辟蹊径，独自创办公司，成为大财阀。于是，抗战胜利后不久，孔令侃一手创办的扬子公司就在上海举旗开张了。

扬子公司的全名为“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由孔令侃独资经营。公司总部设在上海四川路上的嘉陵大楼内，下设工业部、运输部、会计部等，附设利喊汽车公司、中美州航空公司等企业，在纽约、伦敦等地设有分公司，触角伸入了国民党党政机构所有重要机关与英、美、德等国的各大财团。这样，该公司凭借其强硬的后台、复杂的关系、雄厚的资金，在上海乃至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舞台上，翻云覆雨，八面威风。

扬子公司投机倒卖的具体手法有哪些呢？

第一，利用特权，勾结官方。抗战胜利后，美苏等加强了对中国的贸易，各种货物源源运到中国。国民政府的官僚权势集团为了从中大捞一笔，发布了汽车等重要商品的进口限额分配制度，对于普通正式商行，每一季度进口汽车限额仅有7辆，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因而使得中国市场上进口汽车价格大涨。而孔令侃的扬子公司凭借手中特权，无限额地进口汽车。每辆进口成车约1800余美元，转眼之间到中国市场上却以5000美元高价出售。

在国民政府的“输出入委员会”颁布汽车等商品为限额进口项目之前，孔令侃即通过内线预先得政府的这个绝密的经济情报，马上密令扬子公司的纽约分公司和伦敦分公司赶在法令颁布前，致电中国海关，申报已购大批英美汽车要求进口。由于这些电报的到达日期都赶在实施限额进口的最后一秒钟之前，所以不管真假，都被认为合法有效。其实当时扬子公司的各分公司连一辆汽车也没购到。然而他们却搞到了合法的进口汽车数额，以后再设法购到汽车，堂而皇之地进口，正赶上国内汽车价格猛涨，仅这一次投机交易，扬子公司就发笔大财。

第二，通过种种方法，联络、献媚于英、美、德等西方国家的工商财团，借以保证与垄断进口的货源。如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有一批纳粹德国的战俘，孔令侃见之如获至宝，将其中的几个如毛勒、迈尔柯等人由扬子公司包了过来，待之以国卿之礼，以乃父别墅让他们居住，汽车代步，优礼有加，后正式聘请他们为扬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孔令侃正是通过他们与德国的各大财团挂上钩，从而控制了德国颜料等货物的对华贸易。在扬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中，还有英国商人一名，英国军官一名，美国军官一名，英国勋爵一名，华尔街代理人一名，另有中国财政部与信托局官员8名，军政部军官2人等。孔令侃巧妙地通过这些人与海外各财团及中国各要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第三，巧取豪夺套取巨额官价外汇。当时外汇由政府银行统一管理经营。官价外汇由政府银行发放，每一美元牌价约合法币1.2万元，但常人难以搞到，而黑市外汇价格惊人，每一美元涨到法币4万元以上。孔令侃与其扬子公司是绝不愿吃亏搞黑市外汇的。孔令侃一是通过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乃父孔祥熙及其姨母宋美龄，一举手就购到几百万、几千万的巨额官价外汇；二是贿赂中国银行外汇部的负责人。1947年夏，他一次就送了两辆上好牌照的崭新进口高级轿车给外汇部主任。以后，扬子公司从该银行领取官价外汇就畅通无阻。

第四，堂而皇之地走私进口物资，逃避海关关税。1947年秋末，孔令侃从海外运回近百铁皮箱装的走私货物，报关时声称这是“蒋夫人”行李，要海关免验放行。就凭这么几句话，海关立即大开绿灯，扬子公司派卡车装36次才拉完。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行李”哪能装满近百箱的东西！仅这一次，扬子公司就逃税几十万美元。孔令侃除常用“蒋夫人”名义外，还常用“励志社”、“国防部”、“财政部”等众多名目的证明使海关免验放行。

1948年，国民党政府除在战场上节节失败外，经济也陷入了严重危机之中，通货膨胀，法币贬值，物价飞涨。蒋介石为了挽救危机，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规定了所有商品必须停留在8月19日市价的“限价政策”。但豪门巨商纷纷藏匿黄金、白银与外汇，拒不兑换；商人们纷纷停业、歇业，囤积商品，隐匿货物。为了稳定市场与社会秩序，蒋经国宣布“平抑物价，不准囤积居奇”。派出经济检查大队对上海各工商业户进行全面检查。首先枪决了泄漏经济机密的财政部秘书陶启明，接着又枪决了上海警备司令部经济科长张亚光与大富商王春哲等人。不久又逮捕了申新总经理荣鸿元、永安公司的郭棣活等工商巨头64人，其中还有杜月笙的三少爷杜维屏。杜月笙闻讯，立即向蒋介石提出责问，说：“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尽人皆知是上海首屈一指的，远远超过维屏等各家；泄露经济机密的情状，也远为严重。希望蒋先生一秉至公，派员查封处理。这样才可以使大家心服口服”。此话一出，蒋经国只得派出人马到扬子公司清查，果然与杜月笙等人所说相符，后终因宋美龄庇护而不了了之。

声名狼藉的孔二小姐

在“孔门四杰”中，最为横行不法，声名狼藉的要数次女令俊即孔二小姐。孔令俊所做的事情，如非亲眼目睹，真令人难以置信。她经常穿男装，效法旧社会的男人“讨人纳妾”。夏晋熊曾回忆如下：

提起这位小姐，还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在重庆唯一的特殊毕业生。1942年，该校一个美国教授武道到了重庆，宋霭龄见到他，要他为孔令俊弄一张圣约翰的毕业文凭。这个美国人异想天开，要她就近在重庆找一些老师，算是圣约翰大学的教授，专教她的女儿，读满一定学分以后，就算毕业。宋霭龄照着这个建议，就在孔的部下，挑选有博士衔的几个留学生为她女儿教课，被聘的有哈佛大学毕业的王元照，康乃尔大学毕业的邓辉，我也被聘教法文和经济学，还有武道自己，每次上课，说是一小时，实际上教了十几分钟，就陪学生聊天游玩。这样混了一年，孔令俊的圣约翰文凭就到手了。

孔令俊仗着她父亲的地位，真是无恶不作，为所欲为。有次空袭警报，她亲自驾车向新开市（孔的乡间官邸）驶去。时值夜间，灯火管制，军车不能开灯，必须缓慢行驶，而她仍开足速度，向前疾驶。我们坐在另外一辆车上随行。路上交通警察举手拦路，要她放慢速度，她破口大骂：“去你妈的蛋！”踏足油门向警察身上冲去，这个警察被撞出路外，满地是血。后来车上的副官跳下去，招呼照料，才把警察送到医院。又有一次，范庄一个年轻中士把手枪遗失了，副官报告这位“二小姐”，她不相信，认定他是把手枪卖给人家了。当夜亲自审问，这中士不承认，孔令俊就命人把他吊起来抽打，整整搞了一宵。第二天中午我们看见她眼睛有些肿，她说昨晚审了一宵，还

没下落，下午预备睡午觉，晚上再把这个小家伙吊一宵，看他招不招。以后怎样，就没有人去过问了。

孔家的奴仆也仗势欺人。有个副官的徒弟，在孔家当小司机，有次在重庆南岸，因做衣服跟裁缝争吵，动手打人，被对方揍了几下，回来向副官师傅哭诉。副官带几个人去把铺子全部捣毁，引起四邻公愤，把去的人围打了一顿，一个茶房头的眼睛被打瞎。孔令俊为此事大发雷霆，打电话给警察局把铺子封闭，逮捕肇事人。

孔令俊在官邸秘书处，经常干预公事。秘书陈延祚，对她趋奉最甚，许多送来的公文，先请她过目，特别有关人事的任用、调迁的案件，中央银行人事处长潘益民、财政部人事司长高晓楼跟孔令俊经常有秘密的谈话。公文先呈阅，后呈阅，或暂时压一压，她可以左右一切，甚至在孔祥熙批公文时，她在旁边，指手划脚参加意见，孔也听之任之，有时竟会受她的影响。外边知道向孔有所要求，先通过这一关，事情就好办得多。抗战前夕，中央银行南京分行经理李润生，把自己的南京住宅作价卖给银行。胜利复员时，李为了把这所房屋占为己有，活动恢复南京分行经理原职，他所活动的对象，就是孔令俊。监察院委员李世军对此案还提出过弹劾。孔令俊对做生意发财之道很精明，她经常从香港空运重庆缺乏的商品，出售牟利。她的货物一概由财政部总务司司长边定达出面作为受货人，后来航空检查站也打通了，知道这个底细，就照例放行。

本来“二小姐”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但当年，关于她的“花边新闻”特别多，而正因为她并非什么了不起，却正好从有关她的“新闻”中看出四大家族当年的“了不起”。

“孔门四杰”的故事，可以写一部演义。它的内容将远比《太真外传》、《虢国夫人》更为离奇古怪。从这些轶事、丑闻中，可以如实地揭露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和本质。

第八节 宋子文难展故伎

蒋介石愿望落空

继孔祥熙之后，1963年2月17日，宋子文也接受了蒋介石的访台邀请。

蒋介石逃到台湾，多次邀请宋子文前去担任要职，均遭其婉言谢绝。蒋介石并不死心，他仍希望能利用宋与美国人的渊源，争取到更多的援助。1962年2月，蒋再度电邀宋去台湾，其妹宋美龄亦反复敦促，盛情难却，宋不得不到台北去了一次。但他只在蒋氏夫妇的别墅里小住几日便告辞，动身飞向纽约。据后来美国报界披露：“蒋介石原来想使宋子文在争得美国援助方面，再为蒋出把力，但为宋子文所拒绝。”宋子文由台北动身返美时，宋美龄甚至没有给他送行。她认为，当此孤立无援之际，连亲哥哥都不愿助以一臂之力，未免太“冷酷无情”。

美国最有势力的中国大亨

1949年5月16日下午6时许，香港机场的泛美号飞机已经发动，隆隆的机动声仿佛给冷清的场所奏起一曲悲乐。

五短身材的宋子文，此刻极力想从他那恭喜发财的脸上挤出一些笑相，但他太勉强了，使人感到那是钱币上的头像。当有记者问及他对国民党立法院要求捐款有何感想，他笑而不答。据宋子文上机前告诉记者：“此行系赴巴黎疗养，并非其他行务。”

对于宋子文的这次离国，新闻界曾有许多猜测。

早在一个多月前的3月25日，息影香港成水湾的宋子文突然从“佛山号”轮上走了下来，和寥寥可数的几个欢迎人员握手后就匆匆驱车驰赴广州高级住宅区东山，住进其弟宋子良的私邸。由于路上被人发现，第二天在报纸上就出现了各种各样对宋来穗任务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TV宋来穗是要建立华南集团，帮助华南建军改政，发行地方币，谋求经济独立，促请引退的蒋介石来粤，继续与人民力量作战到底。

第二种说法，履行诺言，帮助国民党广东省主席薛岳解决财政困难，使广东摆脱当时遍及国统区的经济危运。

第三种说法，协助当时新任海南行政长官陈济棠，为当时纷乱不堪的海南岛打出一个新的局面。

第四种说法，TV宋纯为私人利益而来，他将对广东的巨额投资做出处理。

宋子文来穗的次日，孙科也由沪飞穗。这天中午，他们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留穗的国民党委员也分别于25、26两日与宋子文见了面。

27日，宋子文便匆匆离穗飞抵宁波并转往溪口。宋与蒋介石会晤后，于

28日飞返香港，抵港当晚接见法国新闻记者时说：他不久将赴法国疗养，现在已不在政治上活动，外间种种传言都没有依据。此次赴法国疗养，完全是个人行动，并未代表任何人做政治活动。到溪口是为处理与家族有关的私人事务。

然而在同一天，《香港虎报》（胡文虎办的英文报）则做出这样的揭露，宋子文将在短期内赴欧洲为国民党政府购买军火，并将在巴黎与若干方面的代表会谈，商量太平洋公约问题。而《正义》报则说，宋子文赴法“是代表政府洽商将马歇尔计划中之援欧物资的一部分转借援华。”

宋子文在法国逗留了二十多天。6月9日，由巴黎乘机抵达纽约。他在美国的大女儿罗烈特、二女儿玛丽珍、三女儿卡德琳均赴机场迎接。宋在机场对记者说：“这次来美系用普通护照，当然为了私事。”

至于宋子文在法国期间的行踪和赴美国的任务，上海俄文报纸《新生活》这样刊载：

中国前行政院长宋子文，已在法国和西班牙的边境，替政府首要购置很多别墅和邸宅。他们在法国的尼斯、贝维拉斯等地方，已经购买和租定了一百多所别墅。因为害怕法国可能发生政治变化，以至影响其安全，宋子文又派人到佛郎哥统治下的西班牙之巴塞隆那附近，购买和租定了25所别墅。宋氏之去纽约，闻系与宋美龄、孔祥熙商量投资南非洲钻石企业有关。

宋子文是持“旅游”护照出国，也没有在美国申请“永久居留”。1950年初，宋子文和张乐怡刚刚在曼哈顿花园大街1133号的一套豪华的公寓里安顿下来，蒋介石要他回台湾的紧急邀请电就到了。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这样写到：

这很像从意大利黑手党分子发来的一封要他回索伦托（意大利那不勒斯湾南边的一个海港）的邀请信。或者回去看看那不勒斯就死去。

宋子文无心回台，尽管蒋介石坚决要求他这样做，并且威胁说，如果不回去“操持政府公务”，就要把他开除出国民党的核心集团。对这件怪事，《纽约时报》作了如下报道：

国民党说，宋子文这位世界上首富之一，宁愿选择辞职，也不愿回到受共产党威胁的小岛。这个岛屿是蒋委员长从他原有的亿万人口大国所剩下的全部地盘，就只是这块避难所。

宋子文一年前在南京政府迁往广州前不久离开中国。当时，有人提出要宋子文把他的巨额财富的一部分捐献给国民党事业的动议。据说，他的财产分散在法国、南、北美洲，南非以及这条线的一些银行里。

迄今，如此间公众所知，他没有理睬这些请求，匆匆离开广州。

蒋介石邀请宋子文去台湾，首先是考虑到他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其次是冲着他的腰包。不过象宋子文这样在国民党官场里打过滚的人，而且又精通“经济法则”，蚀本的买卖他是不会做的。

宋子文虽然避不回台，将他的大部分精力用于经营他那日益扩大的金融帝国，但是他还是出钱支持“院外援华集团”，因为此举符合他的利益。“院外援华集团”的杠杆能够在四面八方产生影响。

不久，宋子文迁出曼哈顿，在长岛购置了一座宫殿般的豪华住宅。他用别人替他挑选的画装饰自己的住宅。他承认，那些人在艺术上比他懂行。他还收藏大量的中国青铜器皿，他说这些青铜器也是别人替他选择的。他的宅邸戒备森严，并安装了复杂的警报系统。

在美国的华人社区内，有这样的街谈巷议，宋子文在长岛的家里存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宋子文是一个“极端危险”的人物，因为他是在美国的最有势力的中国大亨，许多“坏人”都依赖他。一个被美国中央情报局雇为分析人员的中国学者这样向外披露：“这倒不是说宋子文本人是个危险的人。而是说，只要他轻轻说一句话，对中国人的堂社、辛迪加，中国银行以及一些其他叫不上名的恐怖组织的对象，都会带来可怕的后果。”

宋子文在美国疯狂地从事石油、股票、商品期货和新技术的交易，他拼命追求“世界上最富的人”的名声。

在华盛顿或者哈里曼，宋子文还会常常拜访阿弗雷尔·哈里曼，在沙点的小屋里，跟他谈论中苏争端，试探华盛顿的情绪。对亨利·卢斯，虽然他们有时有书信来往或互致热情的邀请，但他们均未践约。有人说这是因为卢斯夫妇与宋美龄关系密切，因此很难和宋子文会见。宋子文的真正朋友是新加坡、香港、东京和伦敦与他有关系的金融家，以及在他控制下的各个银行的董事们。

突然返港行踪秘密

随着时间的消失，那些憎恨宋子文中饱私 的国民党元老派们，由于自身的不干净也就无法说别人肮脏了，而且他们正在一个个地谢世。战后，戴笠的飞机神不知鬼不觉地失踪了——传说是被暗藏的炸弹炸毁。除了蒋介石以及亲属外，宋子文不共戴天的大敌，就是陈果夫兄弟。陈果夫于1951年死在台北，时年60岁。陈立夫即放弃了掌管台湾秘密警察的差事，在美国当他的农场主。

1958年12月11日居住海外长达9年的宋子文突然返港，这一举动再次引起海内外舆论界的广泛关注。12月18日中午，宋子文在般含道余东璇私邸，以一顿简单的西餐，招待香港20多位记者。《香港新闻天地》这样报道：

他事前发了一张请帖、并论一位和新闻界熟悉的朋友分别打电话通知，可说相当周到。主人宋之外，尚有朱光沐，陆文辉、黎桥三位，在替宋招呼客人。

宋显得苍老而瘦削，发已半白，但精神仍健旺，他这副模样和神态，如果不事先知道他是宋子文，至少得定睛端详，仔细忖量，方能认出。他说，现在的体重已较前减轻 20 磅了。

一个同业说，我们新闻界这次失败了，因为宋子文到了香港后，我们还不知道；另一个同业说，大概因为宋先生瘦了，所以没有被认出来。

席间，同业们提出不少问题询问，他都闪避不作正面答复。他的答复大都是：

“你的意见如何呢？”

“这是所谓 Leading Question，很难答复！”

“我对这方面没有注意！”

“照你的想法，我该怎样！”

“等我将来有了研究再奉告！”

不过，在记者张攻单独访问宋子文时，他做了些答复。

“在美国当然和蒋夫人见面了？”

“是的！”

“她在明年元旦前不会回台北罢！”

“她在美国有很多朋友，也有很多事要做，短期内不会离开美国的。”

“你几时去台湾呢？”

“过了圣诞节，我在这里有很多朋友，广东方面的，上海方面的，来此就是为了看朋友，并在香港度一个圣诞节，别无其他任务。”

宋子文在席间曾站起来发了一次言，大意是谢谢大家光临，离开香港已近十年，特地回来看看，祝诸位健康……等等。有人问宋，返台湾是否有新的政治任务，宋说：我已是望七之人了，和政治生活已隔开得太久了，不准备再搞了。这个午餐招待会非常清淡、宁静，或者说是嚼然无味，许多人不明白宋子文为什么请新闻界吃这顿饭。

在过去的大陆时期，宋子文的记者招待会也没有过成功的先例。他既不善辞令，且傲慢成性。对记者们，似乎先天上憎恶。这一次，虽然傲慢的气质减了不少，但仍然是如从前一样穷于应付。

尽管宋子文曾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将去台湾，但并没有成行，他于 1959 年 1 月 12 日下午 4 时，偕夫人张乐怡乘泛美机赴马尼拉，并取得回美国。香港《华侨晚报》透露：“宋氏此次离港，行踪秘密异常，当日虽其至爱亲信，亦不告知。”香港《自由日报》对宋子文为什么不回台湾做了这样的报道：

原来宋氏此次离美东来，本有意复出为国家效力，最初之洽商是由宋氏

出主救济总会并由宋氏先垫出美金 1 亿元，辅导国家财经建设，并扩大海外救济工作，因年来救总由谷正纲氏主持，外间颇有烦言，若换一个宋子文，自能将工作圆滑推进，因宋氏有的是钱，而救济工作则非钱不行也。

内幕的报道并说，如果此事能顺利进行，则宋氏复出之第一步工作算是完成，而第二步则是宋氏由主持救济事业进而兼涉财经任务。所传宋子安氏赴台为 TV 辅路，即是指此。宋子安赴台后，即分头和若干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接洽，同时并进谒某巨公（蒋介石），试探当局意见。使宋子安氏感到犹如冷水浇背的是，某巨公谈当局对宋子文之复出，如果单是协力于救济总会工作，是无问题的，如果要进一步重登政治舞台，以宋氏过去遭到各方的不良反应来说似乎目前尚非时机。当局之意如此，宋子文氏逐不得不知难而退。

宋美龄借口回避胞兄葬礼

1959 年以后，宋子文的小弟宋子安曾被他的母校哈佛大学列入“失踪者”名单，意在他们已找不到他的下落，实际上，他在旧金山，是那里资金雄厚的广州银行董事长，直到 1969 年 2 月死去。

宋子文的二弟宋子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负责处理租借物资。他的家业在纽约市，后来，他变成一个神秘的人物。华盛顿传出消息说，50 年代，他曾任美国财政部秘密顾问，他具体干些什么，他们不愿说。但财政部的人则宣称，他们的档案中根本没有叫宋子良的人。

1971 年 4 月，宋子文夫妇赴旧金山探望亲友。24 日，原在广东银行的一位老朋友为他们设宴接风。年迈的宋子文闷声不响，只顾埋头吃西餐，不料突然有一块食物卡在喉咙里，上不能上，下不能下，直喘不过气来。宋本来就有心脏病，再加上这么一刺激，竟至于心力衰竭而猝然去世，终年 77 岁。

宋子文死后三日，台湾《中央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宋的遗像，并在第三版刊载《宋子文事略》，略曰：

“宋故院长一生热爱国家，于北伐、抗战与戡乱诸役，或主持政府度支，或折冲于国际坛站，或主持中央与地方政务，皆有重大贡献。……大陆局势逆转后，他出国赴美。在旅美期间，仍时以祖国情况为念。”

4 月 28 日，宋子文的灵柩从旧金山运抵纽约。5 月 1 日，在纽约市中心的一个教堂里举行了追思礼拜，遗孀张乐怡、三个女儿及生前友人等 500 多人参加。宋的好友顾维钧在追思礼拜仪式上致词说：

“宋先生的猝然逝世，我们莫不震惊，因为没有人料到他将如此匆忙的离开这个世界。……不论在国内或国际，宋氏的令誉，将永垂不朽。”

据说，其时在台湾的宋美龄没有去美国参加哥哥的葬礼。国民党官方发言人却作如下解释：宋美龄原定 4 月 30 日上午飞赴美国纽约，参加翌日举行的殡仪，但于“获悉”中共方面可能派宋庆龄赴美时，“立即决定取消此行”，

只是由蒋介石“颁挽”一块题有“勋猷永念”四字的匾额。

亨利·基辛格让尼克松总统给蒋介石和宋美龄发了一封唁电。此举未免失当，或是有意恶作剧。唁电云：

“他报效祖国的光辉一生，特别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我们共同的伟大事业所作的贡献，将永为美国朋友们铭记不忘。和你一样，我们感到他的逝世是一个损失。”

纽约的报纸透露；宋子文的家产仅有“100万美元”。这笔钱将分给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在伦敦、巴黎、莫斯科和东京，在里约热内卢、香港、约翰内斯堡，在马尼拉、台北和北京，许多人对此不禁哑然失笑并摇头否定。

第九节 孙科终命归故土

难离故土归来兮

1965年9月29日正午时分，台湾当局“国防部长”蒋经国处理完公务，按照日程安排驱车急驰台北民航机场。机场内外的军警比往日显然要多，显示出不同寻常的气氛。蒋经国被迎到机场候机室二楼贵宾室，早已云集在那里的台湾政要名流纷纷起身，蒋经国满面春风，同众人握手、寒暄。大家谈笑间不时频频举目向空中遥望。

候机室二楼大厅里，一千多各界人士也在静静地等待着。大家翘首以待的这位神秘人物究竟何许人也，他就是国民党政府崩溃前的“行政院长”，在海外辗转漂泊15年之久的孙科。

1949年是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一个年头，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是民心所向，指日可待，国民党蒋介石独裁统治遭人唾弃，败局已定。这年3月8日，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前夕，孙科在四面楚歌声中辞去国民党行政院院长职务。3月12日，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逝世24周年纪念日。局势已岌岌可危，许多国民党要人已无心纪念国父。但孙中山先生唯一的儿子孙科，还是在清晨就来到南京中山陵拜谒。他忧心忡忡，面对父亲陵墓说不清心中是什么感受。

9点钟，中山陵拱卫处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是找孙科。孙科拿起听筒：“喂，是我，哲生。您好！夫人。”

这是宋庆龄从上海打来的电话，她呼叫着孙科的名字。孙科从不称她为母亲、妈妈之类，历来只称夫人。她知道今天哲生准来中山陵，特意打电话找他。

宋庆龄有很多话要说：“……最近时有不法之徒，威逼我离开大陆，我不得不找一个背静的地方避一避。……哲生，我所以和你亲自通话，是想知道一下，在党国要人们各奔前程的时候，你——打算怎么办？”

孙科惶恐他说：“夫人，哲生涉足宦海太深了，是非有份！最近，中共发言人多次声明中对‘行政院’的先生们，还是很不客气的。”

宋庆龄劝道：“你不是已经辞去了行政院长的职务了吗？”

孙科沉吟道：“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辞职一举，不足以为，孙科正名呀……”

宋庆龄直说了：“哲生！我郑重向你建议，你留下来，留在大陆，你的一切，由我负责向中共交涉，他们是会欢迎你的！”

孙科疑虑重重：“……这个一夫人……事关重大……我想和夫人面谈，您能告诉我您的新住址吗？”

宋庆龄也沉吟起来，看来她不愿向态度不明朗的孙科透露自己的隐身之处，她说：“……哲生，你若留在大陆我才告诉你，否则，你不会知道我在

什么地方！”

这时，手握听筒的孙科凄然泪下，泣声道：“夫人的严厉……我理解，容哲生三思吧……”

宋庆龄挂断了电话。

孙科缓缓放下听筒，拭泪……

可是，这位当过行政院长的孙科，陷入国民党的泥坑不能自拔，“不信苍天信鬼神”，在大陆解放前席卷所有，举家逃往香港。后来孙科又曾到法国寄居，最后才定居于美国西海岸的一个小镇。尽管孙科也尝自诩在异乡心静神怡，以读书为乐事，少了昔日车马之喧嚣，没了官场争斗之烦扰，然而，他内心深处仍难离故土，爱读书更爱为官。经过再三思忖，与台湾各方面多次磋商之后，今天，他就要归来了。

12时10分，一架日航班机徐徐降落在机场上。

蒋经国和众人兴奋地迎上前去。

飞机在停机坪上停稳后，孙科率先走下舷梯。他比原来苍老了，酷似父亲孙中山的圆圆的脸庞上有了些老人斑点，额头上多了几道皱纹，偏分的头发添了几缕花白，15年前的孙科形象已经不再。

孙科的夫人陈淑英、长子孙治平夫妇及一位中国籍医生紧随其身后走下舷梯。

望着迎候的人群，孙科有些激动，这脚下的热土已不再是梦想，归去来兮，他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土。

一个喜欢做官的“太子”

1948年11月，蒋介石统治集团内外交困。为牵制李宗仁桂系势力，蒋介石起用孙科做行政院长。

孙科是被人称为“太子”系的首领，“太子”系由傅秉常、吴经熊、钟天心、梁寒操、刘维炽、邓公玄等国民党内一群文职官僚政客组成，他们在国民党内并无强有力的地位，与蒋介石一向处在依违之间，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

不久，蒋介石在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和国内“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的呼声中下野，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然而，蒋介石依然是国民党总裁，宣布下野只不过是权宜之计，玩的仍是“垂帘听政”的老把戏，他仍然控制、操纵国家机器。

蒋介石下台后，即利用孙科和李宗仁的矛盾，指使孙科于1949年2月初将行政院全部迁往广州，又派陈立夫、朱家骅等“主战”人士到广州支持孙科，形成宁、穗对立的局面，以阻碍李宗仁的“求和”活动。美国对孙科的作法很不满意，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蒋大施压力，迫使蒋不得不叫陈立夫、朱家骅等“缓和将事，不要操之过急”，并表面上继续支持李宗仁。在

国民党当时零落张惶的情势下，孙科受到国民党内部各方面的猛烈攻击，被迫提出辞呈下台。

孙科率家眷逃往香港，住在浅水湾。一个曾在官场上出出进进的活跃人物开始过起了隐居的清静生活。

孙科到香港没多久，“太子”系的主要人物也陆续到了香港，又聚在了一处。

1950年的一天，和台北已久无联系的孙科突然接到台湾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一封信，限他于一定时间内到台北报到，否则以取消党籍论处。看完这封措词严厉的信，孙科非常生气，立刻暴跳起来，“我是总理的儿子，我这个国民党员是天生的，台北这批黄毛小伙子，当年在我革命的时候，还不知他们在哪里？他们今日竟敢取消我的党籍吗？”

孙科自称为天生国民党员，对台北不屑一顾，大有天下舍我其谁的作派，考察其一生的经历和性格，就会觉出孙科如此狂傲，目中无人，并不是在情理之外的。

孙科，字哲生，1891年降生在广东香山县翠亨村，是孙中山与卢慕贞婚后七年所生。孙科幼时就到了美国的檀香山，接受的完全是美国式的教育。他先后获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文学士和哥伦比亚大学理学硕士学位。

孙科是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儿子，又留洋美国，学识渊博，1917年随孙中山回到祖国后，就被安排在广州革命政府任职，开始了其所谓的革命生涯。

孙科一直在美生活、学习，对中文不很熟悉，他批阅公文的签名，大多是用钢笔签上一个SUNFOOL音读（孙福），因为广东人读“科”字音如“福”，所以他的英文名字也是签了“福”的音，天长日久，人们中就流传这样的说法：“顾孟余先生不吃中国饭，孙哲生先生不写中国字”。孙科倒是个刻苦的人，他下了一番功夫学习写中国字，一段时间后，他的字就练习得相当不错，学习父亲签名而写的“孙”字，几乎可以乱真。孙科对中国字的兴趣日益浓厚，后来还常常替人家题字写对联，居然成为一派书法的名家了。

孙科的政治生涯始终是和地位职权联结在一块的。要把他曾担任过的职务一一罗列出来，可真有点令人眼花缭乱了。他先后任过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中央常务委员，青年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长，立法院长等职。无怪乎有人说，孙科是一个“喜欢做官的太子”。

孙科喜欢做官，平时沉默寡言，一度被称为是“不爱开口的政论家”，新闻界流传这样的说法，“胡展堂会客时，只有他说的，没有你说的；×××会客时，见你说多少，他也说多少，只有孙哲生先生冷冷地对着客人，你不说他也不说。”但孙科性情急躁，脾气向来是很大的，有人甚至把“孙大炮”的绰号也传给了他。

1923年，孙科任广州市市长期间，接到代行大元帅职务的胡汉民的手令，要他立即筹款20万元，作为军饷发给滇、桂军，让他们出发攻取惠州，直捣陈炯明的老巢。孙科接到手令，非常生气，“我不会印银钱，哪里有这么多钱？”说罢，随即将手令撕得粉碎，投进废纸篓。

孙中山知道了这件事，气得脸色发紫，半晌说不出话来，立即打电话让孙科赶来。

战战兢兢的孙科来到孙中山跟前。不待他张口解释，孙中山就厉声叱骂他：“军情如此紧急，急需发饷给滇、桂军出发，你怎么能不当回事！你马上拨20万元来，办不到，就不要做市长……”

孙科被斥责得无话可说，便气冲冲地找到胡汉民，说汉民假借命令索钱，挑拨他父子不和。

胡汉民大叫：“这是你父亲叫写的手令，怎么是假借索钱？”盛气凌人的孙科举起手杖就向胡汉民打去，胡汉民没料到孙科会如此蛮横，慌忙闪身躲避，“砰”的一声，手杖重重地落在办公桌的玻璃上，四座皆惊：

孙科常常不分时间场合，目中无人，训斥他人，在新闻界也有所闻。1949年5月18日，孙科在行宪立法院第一会期期间，以立法院院长身分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他说，为了树立民主宪政的规模，立法院尽量给记者以采访的便利，惟请记者基于国家利益，不要登载立法院秘密会议的消息。在场的合众社特派员张国基当即表示异议。孙科没料到外国通讯社的记者到场，更没料到会有人当场反对他的意见，便沉下脸说道：“凡是中国人，都应与中国政府合作，这是国民应尽的义务。你，张先生！目前虽是外国通讯社的工具，但还是黄面孔的中国人，你竟敢于违反国家的利益吗？”

在场的记者听了这一席话，都不禁吓了一跳，这显然说得太过分了。结果，张国基涨红脸孔离开会场，招待会不欢而散。第二天，合众社即向孙科提出强烈抗议。

如今，孙科对台北来信置之不理，表面上仍在香港过着平静的生活。不过，他的内心并不平静。人民解放战争以摧枯拉朽之势迫使蒋介石统治集团在台湾一隅苟延残喘，作为蒋家王朝中的一员，孙科历史上几次反蒋，几次亲蒋，关系微妙而复杂。他明白，再到台湾向蒋介石称臣，也只是受人摆布，而且，中国的未来属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绝不会属于台湾。那么他的出路究竟何在？

香港的一些舆论开始对孙科滞留香港的心思作出猜测。有人传说他曾有北上靠拢中共的意思，只不过是后来既怕不能在北京政府中得到相当重要的位置，又不愿居于民革某些领导人之下而作罢。

据一些知情人士称，孙科“太子”系内部，这时有三派意见：（一）傅秉常、钟天心、卫挺生、邓公玄、吴尚鹰等主张“靠拢”人民，投向大陆；（二）梁寒操、刘维炽、陈庆云、陈伯庄等主张求取美援，另立“第三势力”；（三）孙科本人则主张用所谓“大广东主义”为号召拉上陈济棠、薛岳、余

汉谋等反蒋。传说孙科还曾拟过反蒋计划，唆使陈、薛、余等离蒋“独立”。不料，余汉谋把全部计划向蒋介石告了密，孙科的打算，也就成为泡影。

孙科在香港企图反蒋，这自然惹得蒋介石极为恼怒。1950年4月，国民党常务委员会借故孙科逾期不归，撤销了孙科的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1950年6月，美国悍然发动侵略朝鲜战争，国民党台湾统治集团兴高采烈，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借美国的力量反攻大陆，卷上重来的时机已到。据传，孙科也被这种气氛所感染，以为蒋介石又将东山再起，他便与留港的前国民党政客联名申请赴台，但不料遭到了台湾方面的拒绝。孙科内心懊恼不言而喻。

比克小镇读书养心

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在共产党大陆和国民党台湾关系之间有着特殊的位置。孙科不能投向蒋介石的怀抱，又不能毅然决然地回到大陆，香港这弹丸之地各种政治势力纷杂，自然不是孙科理想中的世外桃源，久居之地。

孙科自幼生长在美国，崇尚美国的文化，熟悉那里的生活，他想去美国度过余生。但不料台湾方面竟不肯发给他去美的护照，对他申请去美之事不予理睬。孙科忿忿之余只好让傅秉常帮忙办这件事。傅秉常活动了一阵，在法国替他办理了入境手续。这样，孙科全家离开香港到了巴黎。

巴黎对孙科来说并不陌生，早在1939年中国抗战期间，他为争取国际间的同情与援助，就以立法院院长及国民政府专使身分到过巴黎。

当时，德国与意大利和日本结盟，撤走了在中国的顾问，英国、美国与日本尚有来往，且存心观望，法国就成了中国政府寻求外交突破、争取的对象之一。

孙科到巴黎后与顾维钧大使会晤，检讨抗战情势及世界局势。孙科想试探法政府对中国的立场及见机请求给予中国友谊援助。顾维钧认为法国面临德国纳粹威胁，正积极备战，自顾不暇，虽然同情中国，但爱莫能助，求援恐无结果。大使馆为孙科安排欢迎宴会及拜访法政要约会。但宴会中的法方来人，大多不是国会及内阁要员，如一般外交应酬，流于形式，无从谈重要问题。孙科对此不感兴趣。

关于拜访政要约会，大使馆按惯例照会法国外交部，由礼宾司代为安排。而法外交部向来保守，礼宾司以圆滑著名，门面话说得好听，却不办实事，公文旅行，拖延时日。驻法其它国家使馆，如英、美、日等，往往不通过法外交部，而直接与国会和内阁首长联系。中国大使馆依赖外交部礼宾司代订约会，如石沉大海，久无音讯。孙科为此十分焦急。

孙科同行的还有其夫人陈淑英及其子女，为节省开支，他们在巴黎市区租下一临时普通公寓。黄天迈时为中国驻巴黎总领事，孙科出访前，外交部

长王亮告诉他说，有事可找黄天迈帮忙。孙科于困顿之中，就几度邀黄天迈会谈，详细询问法国政情和人事关系。黄天迈尽其所知，分析陈述。孙科激动他说：

外交应争取主动，与友邦实际负责人谈问题，直截了当，无需繁文缛节、外交辞令。一般职业外交官墨守成规，不求突破。值非常时期，更不应保持此一陋习。我国抗战，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应尽一切可能，争取外援，要有知其不可为而为的勇气。岂可未打仗即抱必败悲观！

孙科性急，遇事喜欢快刀斩乱麻，言下已对顾维钧大使流露出不满意。

孙科这次来巴黎拜访的主要对象是法国内阁总理兼国防部长达拉迪，达拉迪属激进社会党，自巴黎和会后当选众议院议员，蝉联 20 多年。他 1934、1938 年两次出任内阁总理。1938 年三度组阁，自兼国防部长，时值希特勒称霸欧洲，法国军事、外交吃紧之际。法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倡导和平，与德国和解，疏于武备。各种军事设施及武器生产，皆较德国落后。马奇诺防线已挡不住德军的精锐飞机及坦克。慕尼黑会议英、法出卖了捷克，割地与德国，以求苟安。希特勒气焰万丈，势将吞并波兰，进攻比利时、荷兰，以包围法国。法国国势岌岌可危。达拉迪力图振作，加速军备及防御工事，鼓舞渐低沉的士气，唤醒国民繁华迷梦，一切效法“老虎总理”克雷蒙梭的作风，俨然战时内阁。达拉迪谴责日本侵略，同情中国。孙科希望黄天迈想方设法，直接与达拉迪联系，以求早日会晤。黄天迈答应尽力而为。

黄天迈在驻法使馆服务时，曾兼在巴黎大学法学院上课，结识了同学赫欧女士，她后来进内阁总理办公室工作，为达拉迪总理的机要秘书。黄天迈托她代订约会，希望孙科能早日与总理会晤。赫欧女士三天后来电话说，翌日下午三时达拉迪总理在国防部接见孙科。黄天迈喜不自胜，连忙把这一喜讯报告孙科。

孙科对黄天迈的工作效率十分满意。又和黄天迈商量谈话的重点。最后孙科在纸上记下谈话的重点，大意为：

法国在国际联盟仗义执言，支持我国。1937 年北京九国会议，促使通过谴责日本宣言，我政府及人民对法国真挚友情极为珍视。拟请进一步支援，如（一）售我剩余军火。（二）派遣军事顾问来华。（三）准我战略物资假道安南（今越南）入我国境。法国武器精良，可增加我作战威力。法国军官学验俱属上乘。我国原聘有德国军事顾问，已解聘回国，改聘法国军事顾问，对我军训及作战，必多助益。我国与安南毗邻，唇齿相依，为抵抗日本侵略，两国密切合作实有必要，海防至河内，河内至昆明，铁路运输极为便利。如准我战略物资由海防运输我境内，使我物资充裕，有助长期抗战，两国同蒙

其利。

孙科还让黄天迈将其节略译成法文备用。

到了约会时间，孙科由黄天迈陪同前往法国国防部。在法国国防部办公厅主任德庚将军引见下，孙科在部长办公室与达拉迪总理开始了会谈。达拉迪说话坦诚，不拐弯抹角。他请孙科就座后，孙科就让黄天迈宣读法译谈话节略，以节省时间，达拉迪用心倾听，频频点头。达拉迪作答时，黄天迈随译随记，事后将记录交孙科，据此以电报国内。达拉迪的答词大体有以下内容：

“日本侵华，自陷泥足，中国抗战的英勇事迹，时有所闻。去年东战场大捷（指台儿庄大捷），震动国际。有友邦如此，值得支援。如在平时，军火供应不成问题。法、德战争迫在眉睫，军火虽加紧生产，仍感不足，惜无剩余出售。法、日尚有邦交，派遣军事顾问，须由退役军官以私人受聘方式前往中国服务。法国也顾虑日本会有一天向安南侵略，两国利害一致。中国战略物资假道安南运至中国境内，原则可行，必须严守秘密，以免日本轰炸铁路。殖民部长蒙岱主管安南事务，可与商谈细节。军事顾问事亦交他承办。我即刻通知蒙部长与贵方联系。

会谈结束时，达拉迪总理又问，与蒙岱部长订约后通知何人。孙科因对黄天迈印象颇佳，就随口答道，“通知我驻法总领事即妥。”

过了两天，蒙岱部长来电话，让黄天迈陪孙科前往殖民部会晤。蒙岱前为“老虎总理”得力干部，精明干练，有政坛强人之誉。孙科与他的会谈，彼此掏诚，毫无拘束。蒙岱允为遴选优秀军官应聘。如系现役，要办假退役。关于中国战略物资假道安南一事，蒙岱建议订一密约，由中国军方代表签字，不需经过外交途径，以求保密。

孙科完成了巴黎之行的使命，前往苏联莫斯科，继续奔走呼号，宣讲日寇对华侵略的真象，以争取全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支持。

孙科在巴黎涉及的事务日后因法德战争的爆发，国民党驻法人员内部倾轧拆台而不了了之，这是孙科不曾预料到的事，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几十个春秋过去，人世间斗换星移。今天，孙科又来到这世界的大都会，又站到了高耸入云的艾菲尔铁塔之下。凝视着永远沉默着的铁塔，永远俯视人世间沧桑变故的铁塔，孙科遥忆起那次赴法时的情景，那是在为一个灾难深重而又自强不息的民族来此地呐喊、奔波，而今，失去了昔日的一切，更失去了昔日的壮志雄心，孤家寡人，漂零异乡，旧地重游之时，他又能诉说些什么呢？

在巴黎一晃两年，还是由傅秉常帮忙，1953年，孙科一家终于辗转到了期待已久的居住地美国。

在距离洛杉矶60里路的地方，有个叫比克的小镇，这里靠近海滩，气

候宜人，风光秀丽，孙科颇为满意，就把它作为居住的地方。

在比克镇，孙科静心修养，深居简出，生活颇为刻苦，余暇唯以读书自娱。孙科喜欢读书，虽已届古稀之年，但对读书嗜好并未改变，他对中国古典书籍尤为感兴趣，经常广搜此类书籍，以充实读书内容。一天他偶然在报上看到《清史》在台湾出版，便非常高兴，立即挥函给他从前的幕僚长梁均默，嘱他代购一部寄阅。《清史》编纂者闻知此事，深感难得，决定赠送一部《清史》给孙科，以满足其读书求知的欲望。

蒋家王朝被人民战争埋葬之际，国民党政府中达官贵人挟民脂民膏飞到外国做寓公，终日与醇酒美人为伍者不可计数，无望心态使他们普遍怀着一种没落的情绪，纵情声色终不可自拔。孙科能在大洋彼岸一旖旎小镇以读书为乐，实属国民党政要显贵中的凤毛麟角。说这是有惠于其父孙中山好读书的遗传个性，恐怕还不如说是受益于孙中山早岁对他循循善诱，力促其勤学苦读的一片苦心，更为准确得当。

孙中山一生两大嗜好，唯“革命与读书”而已。孙中山为民族大业劳碌奔波，日理万机，但对子女尤其是孙科的学习仍情系于怀，备加关心。孙科在檀香山读中学期间，孙中山就曾经从英国寄给他一套“人人文库”丛书，这套一百多册的英文文学书籍，都是英美著名大作家撰写的小说、剧本。孙中山在信中还特地告诉孙科，“你要使英文进步，单靠学校的课本是不够的，必须多多阅读文学名著，久而久之，自然会有进步。”

在檀香山完成了中学学业，孙科前往美国深造，正在旧金山筹款的孙中山，到码头去接船。孙中山向儿子介绍读书的方法，在大学念书的头两年，要广泛的读，不要单看文学方面的书，社会科学的书也要看。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孙科奉召回国，1912年2月5日抵达南京，接着，孙科又到上海迎接从南洋归国的母亲和两个妹妹到南京。直到这时候，一家人才有机会在祖国的土地上团聚，同享天伦之乐。这时，孙中山与孙科谈话的一个重要内容，还是议论读书，孙科后来忆起这段事时说：

记得在民国元年前后，我看到一本英文著作《李鸿章日记》，这本书当时曾轰动一时。……有一天，国父问我最近有什么新书看？我说没有，只得一本《李鸿章日记》。他拿去翻翻，就告诉我：“这本书你不要看，内容都是无中生有的。”后来，在加州大学念书时，我发现图书馆里也有这本书，同时有很多人阅读。可是再过一二年，这本书的秘密被揭穿了，而且成为美国文化界的一个大笑话。因为这是一本伪书，作者是一个美国囚犯，在牢里无所事事，异想天开地编写的。因为他曾到中国，对于李鸿章的为人，也略有所闻，在监牢闲得无聊，便替李鸿章写起《日记》来，出版时虽说是从中文翻译的，实则他连中文也不懂。至此我才发现这本书的确不值得看，国父说它“无中生有”，一点也不错！

孙科在美攻读学位期间，孙中山仍不时从各地给他寄去大包大包的书籍。孙中山到南洋一带旅行，就给他寄中国的线装书，到了欧美，就给他寄英文的各种名著。像《通鉴纪事本末》、《读通鉴论》、《进步与贫穷》、《互助论》、《达尔文游记》、《物种由来》、《面包的征服》及《莎士比亚全集》等，都是孙科在那一时期读过的书。

孙科客居异国他乡，能以读书养身为乐，这自然凝聚着孙中山的一片心血。孙科夜半青灯相伴读着中国线装书，总会想起他在大陆生活的光景，曾彼此乐融融的亲明故旧，曾到过的山山水水，见过的名胜古迹，这些都不能不使他掩卷而思，让思绪在历史的长河中翻腾。不过，最使他怀恋的却是他当年在大陆私邸中的一间书房，它幽雅宜人，藏书甚丰，关于国际问题、政党、政治、经济、社会等书应有尽有，孙科精心收藏的书画碑帖也尽在其中。孙科的书房引来同僚的羡慕。吴稚晖特意为其题“不足斋”三字，以示书卷浩瀚如海洋，生有涯而学无涯之意。书房中有一幅对联，写着“养浩然气，读有用书”，这也是孙科自鸣得意的对子。

孙科在美比克小镇读书、养心，然而，他并不曾在内心里真正下决心要从此在政界销声匿迹，曾经有过的辉煌岁月，他血管里奔涌着的从政的血性，这些都常常唤起他东山再起的欲望。他仍然不甘寂寞。但是，孙科在美国并无政治势力，谋求政治出路困难重重，报界披露孙科时常为此“殊为苦闷”。

1953年，蒋介石决定在台召开所谓的“国大”会议，孙科闻讯，即刻放下手中的自诩以为乐事的书籍，到华盛顿、旧金山等地美政界和华侨中活动，期望获得理解、支持。据台湾中国新闻周刊称，孙科的目的是想回台争做“副总统”。这次孙科又未如愿以偿。孙科并未就此善罢甘休，1954年台湾“国大”召开时，他又一次向台湾办理申报手续，但再次遭到拒绝。

这以后的几年里，孙科显得比较平静。他的长子孙治平也在美娶妻生子，孙科同他们一起过着温暖的家庭生活。

1957年11月20日，香港《新民晚报》登出一篇文章，题为《甘心寄人篱下的孙科》，说：

前几天、有些报纸登载了一段关于孙科的消息，说是他以游客的身分在美国居留了五年后，护照已经满期，正在向美国政府申请永久居留，以便在美国度过他的余生。

几遭险阻挫折，阅尽世态炎凉。这篇文章不客气地指出，孙科其志在美甘心充当“高等难民”而已。

孙科几次想返回台湾，都遭致台湾当局的阻拦。台湾的一些朋友为此深感不平。1957年国民党举行八届二中全会，季石曾向“中央”建议，号召旅居海外的显要如孔祥熙、宋子文等回台湾归队，以壮阵容。并代孙科请求一次给予美金20万元，俾壮行色而早作归计。这一请求自然如痴人说梦一般，

当时国民党“中央”正患美援之不足，美金 20 万元，从何而来？孙科夫妇归队之事也就搁浅了。

孙科身居海湾小镇，心系台湾故土，他一直和台湾的亲友故旧保持密切的联系。1961 年 9 月，孙科 70 岁诞辰，台湾的亲友还特为他七秩双庆发起送寿序诗画申贺，这次活动由台湾广播公司董事长梁均默出面筹划。

事实上，台湾当局也并未完全忘记旅居海外的孙科，“国民大会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在台召开期间，“国大”秘书长谷正纲就曾电召“太子妃”——孙科夫人陈淑英回台出席会议。只不过陈淑英回电谓有病不能出席而落空。这件事又被外界认为是“太子迨无意于回台湾了”的证据。

只有孙科最明白自己的心思，蜚居比克小镇，读书养心共享天伦之乐，实出于无奈，他仍然期待着有一天能重返台湾，能重新受到重用，在政治舞台上重温旧梦。1962 年 9 月 28 日，香港《真报》转载了台北一家日报驻美记者访问孙科的报道，披露了孙科的生活情况和对自己去向的打算。摘要如下：

多年以来，因孙先生旅居国外，报纸上已经很少看到有关他的消息了，这次他从美国西海岸特别赶到华府参加第 32 届中美文化基金委员会开会，但也只有两三天的逗留，记者和他交谈了很多问题。

从表面上看来，孙先生是健壮的。

“哲生先生”，记者问：“你在会议中可曾发言？这次会议有什么新的成就么？”

“我们讨论的还是些例行性的问题，然后是选举及决定下次开会的地点。”

“下次开会还在华府吗？”

“不是的，下次开会将在台湾了，我们知道台湾今天的文化水准很高，不过听说学人的生活还是清苦的，比如说一位大学教授，每月的薪水听说是有 50 美元左右（记者按：约合台币 2000 多元），维持四五口之家就比较困难了，可是今天的政府财力有限，如何来改善，倒是一件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对于这方面，孙先生有什么好的意见？”

“这是一个全盘的经济问题，不是一两句话所能解决的”。

“你对国内一般情形都了解么？”

“我目前在美国乡下，离开祖国快十年了，当然谈不到了解太多，不过我每天能看到台湾报纸，也注意国内的一般情形，我知道在台湾，各方面都很安定进步，尤其在农工方面，有值得骄傲的成就。不过，我觉得在经济财政方面，似乎还得更进一步求发展，研究出一个好的方案出来。”

“你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么？”

“当然是一个问题，同时也有很多其他国家的事情值得借鉴，比方说，战后的欧洲各国，在形体上等于已经破产，英、法、西、意诸国，在大战后

呈现出空前未有的萧条，可是大家努力不过十年，一切都改善过来了，就连日本来说，这十五年可有多大变化？……经济是立国之本，人家能够从残破中站起来，必有其因素所在……

“你觉得目前大局如何？”

“在国际方面么，风云变幻，两个不同的阵营问题很多，在国内，我相信十年生聚教训，大家都明白了善恶是非，如不是蒋先生去支撑大局，那中国的前途何甚设想？我个人很遗憾，因为健康关系，没有能多为祖国做些事情。”

“你目前的健康情形如何？”

“现在的情形很好，十年隐居生活，在乡下深居简出，倒免了病痛折磨……”

“你住什么地方，气候可好？”

“我住在距离洛杉矶六十里路一个叫 DgunaBeack 的地方，那儿靠近海滩，气候好，适合养病。”“是和夫人住在一起？”

“是的。”

“听说你办了一个农场？”

“是我的孩子办了一个小型农场。”

“是什么时候到美国来的，还记得么？”

“我是 1951 年秋天，由香港到欧洲检查身体，56 年冬天到美国住了几天医院，然后就定居下来了，时间真快，一晃已经十年多了。”

“国外生活过久了，觉得惯吗？”

“当然不如住在自己的国家好，常常有思乡之感。”“有机会时就到台湾去看看吗？”

“当然，如果健康情形允许，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很想回台湾看看，比如说下次教育文化基金会在台北

召开，我希望能去！”

孙科在谈话中对蒋介石很是谦恭，且不时流露溢美之词，吹捧台湾所谓的建设成就，低毁共产党人民政权，再次暴露其政治投机心态。不过，孙科这次表示回台看看的意愿，很快引起台湾方面的反应。政治上失势、几乎被台湾遗弃的孙科再度成为各界议论的新闻人物。

台湾当局暗送秋波

1962 年 10 月，台湾“立法院”召开的会议上，一位广东籍立委刘崇龄说：

上月中旬孙哲生先生在华盛顿答复记者的谈话中，充分的表示孙先生是

极端的推崇我们的总统的。而且于言词之间也十分的怀念台湾的老朋友，同时表露出常有思乡之感，因此进一步的表示如有机会愿意回台湾看看。……我们知道孙哲生先生是功在国家，过去担任过国民政府的副主席，及行宪以后的立法院长和行政院长。孙先生表示最近如有机会愿意回台湾来看看，当然不是要回来做官，……最近二十多年来孙先生在国外埋头读书，对世界局势有深刻的认识，孙先生之愿意回来，不但是基于思乡怀友之念，相信他一定能够将他二十多年埋头研究的所得，以及复国建国的高见提供总统和副总统参考，这是对反攻大业一定有很大帮助的。因此希望政府当局能够正式的邀请孙先生回来看看，不知政府有无这个准备？

“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代表陈诚答复询问，王云五郑重声明，“政府”对于孙哲生回国表示欢迎。王云五补充说，在将来举行的第三次阳明山政治性会谈中，已将孙氏列为主要邀请的名单。

这一官方明朗的表示没过多久，外电又盛传陈立夫、张君勱、孔祥熙、宋子文等均将于近期内返国观光。

孙科的政治行情一时看涨。香港一家报纸猜测说，台湾当局鉴于陈诚病重，又在有意拉拢、利用孙科，想让他回来任国民党副总裁一职。

孙科归心似箭，台湾方面又对他暗送秋波，一般人都认为，孙科这次去美返台已成定局。1962年10月19日，香港《时报》登出驻台记者采写的文章，冠以标题就是《孙科返国期近》。

外界舆论仍对孙科去美返台意愿作种种猜测。事实上，就在孙科对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愿回台湾看看之前，他的公子孙治平，就已在8月间携眷返台，悄悄地走了一圈了。

孙治平夫妇在台期间，百忙之中抽空前往石门水库参观，他对这一工程称赞不已，认为它正符合国父民生主义建设乡村的理想。他对陪同他参观的人说，71岁高龄的孙科很怀念祖国及祖国的朋友，对台湾建设的飞跃进步及繁荣，感到万分高兴。除此而外，孙治平在台北均受到各方面的热烈欢迎。在他们返美时，还带上了台湾他的老伯的许多礼品，这些礼品都是为孙科准备的。1962年10月16日是孙科71岁生日，同时孙科的夫人陈淑英也正逢70大寿，而且，这年又是他们夫妇的金婚纪念日。各方面的礼品寿轴、寿颂及寿屏寿画等约三四十件，可谓不少，但更引人注目的是，送礼的人包括蒋介石、陈诚、于右任等。孙治平在台湾行色匆匆，只停留了7天，就乘机回到了美国。

孙治平夫妇神秘之行后第三个星期，香港、台湾的报界才披露出这一重大新闻。一时间孙治平竟成为各界瞩目的新闻人物。不过孙治平成为新闻人物，这已是14年来的第二次了。

第一次是在1948年。那年的圣诞节前夕，孙科出任行政院长，以“人才内阁”和“求和内阁”的姿态出现。当阁员名单公布之际，合众社即发表

专电，说孙科已内定他的大公子孙治平为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副秘书长，代行秘书长职务，而二公子孙治强也已内定为行政参事，从此父子共事一堂，定能和衷共济。人们看了这一则专电，都不禁起了会心的微笑，因为孙哲生真要这样内举不避亲，那无疑对所谓“人才内阁”给以尖刻的讽刺。

合众社的报道被各家报纸纷纷转用，孙治平的大名见诸报端，轰动遐迩。在这种尴尬的气氛中。行政院新闻局连忙奉命更正。孙治平也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否认此事，并指出合众社专电纯属造谣中伤。

合众社这次与孙科过不去，让他曝光丢丑，正是合众社特派员张国基所为，张国基此举只不过是为了报上次被孙科在立法院记者招待会上当众训斥之仇罢了。他是有意开孙科的玩笑。但是，经这么一闹腾，孙科本来要起用大公子孙治平的意愿也就告吹了。

孙治平夫妇台湾之行究竟为何？新闻界有人认为，孙治平返台正是孙科返台的前兆，他是替父亲投石问路来的。也有人认为，孙治平返台纯为个人私事，受到的款待纯属礼节性的，孙科并未与台湾方面达成返台默契。

众说纷坛。但大家对孙科的动向都备加关切，拭目以待。

出任“考试院长”

蒋介石统治集团内部派系繁多，相互倾轧，蒋介石对此政治现实唯有认可，他的统治术就是利用派系势力，以派系力量牵制派系力量，为自己的独裁统治服务。

蒋介石偏安台湾一隅，主要依靠蒋经国、陈诚的势力。在这一时期，原控制党权的陈立夫、陈果夫的“CC”系，在“国民党改造方案”实施后，基本瓦解。蒋介石指定16名改造委员成立改造委员会，使蒋经国接收了“CC”系对党的控制权。改造委员名单公布后，陈立夫怅然离台，经香港、欧洲流亡到美国。陈立夫离台前曾往草山去看蒋介石，蒋介石对他说，“祖燕，”我也没有办法，你还是到外国去走一趟吧，如果情形好转，你再回来，好在我已把你几个干部安置了进去。否则你也替我准备一条退路吧。”

此外，蒋经国、陈诚还千方百计压制多少年来一直占据国民党政权要津的政学系，政学系的张群、吴国桢、孙立人等都被削弱实权。这样，盘踞台湾的蒋介石、蒋经国大权在握。孙科能否返台自然也就要看蒋介石的态度怎样了。

历史上，孙科和蒋介石几度反目成仇，又几度携手言欢。

1927年3月，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孙科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当时，他拥护武汉国民政府，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蒋介石搞军事独裁。但没隔几月，1927年7月，孙科又支持汪精卫在武汉“清党”反共，9月，国民党宁、汉、沪（即南京的蒋介石集团、武汉的汪精卫集团和上海的

西山会议派)三方合流,孙科混迹其中,成为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

1931年3月,胡汉民被蒋介石囚禁。孙科和陈友仁等离开南京,经香港到广州,和汪精卫、唐绍仪等联名发表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他们组织“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和广州国民政府,同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相对抗。孙科担任广州国民政府委员。

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团结御侮”的口号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在蔡元培、孙继等奔走调停之下,宁粤双方终于在上海召开和平会议。会议决定双方各自召开“四中全会”,选举中委,然后集中南京开会,产生统一性的中央政府。

广州方面“四中全会”举行以后,由胡汉民领衔发出通电,表示必须蒋介石宣告下野,解除兵权,然后才能和广州合作。蒋介石在此压力下,乃于1932年12月15日通电离职,遑返奉化原籍。临行前发表林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而这两职过去均由蒋介石一人担任。

于是,宁粤双方中委于12月22日在南京举行“四届一中全会”,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府主席以年高德劭者充当,不负实际军政责任,此目的在于预防蒋介石东山再起,运用国家元首的地位来进行独裁。设计不可说不周全,但后来蒋介石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也一样手握党政大权。

12月28日,“一中全会”第四次会议,选出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次日“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孙科内阁名单,计内政部长李文范、外交部长陈友仁、军政部长何应钦、海军部长陈绍宽、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长陈铭枢、教育部长朱家骅、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实业部长陈公博、铁道部长叶公绰、财政部长黄汉梁。

这次孙科内阁特点,为蒋家两个财神——孔祥熙、宋子文均不入阁,宋子文且将原任中央银行总裁一职辞去,以示抵制。孙宋甥舅之亲,未必存心刁难,意者后面有人发表指示,宋子文不能自主,特示以此种不合作的态度。时人以孔宋一去,政府势难取得江浙财团的支持,孙阁前途,大抵凶多吉少。

孙科上台之前,曾闻财部库存有四五百万元,以为可以挹注一时,渡过难关,因敢跳下火坑,不料财长黄汉梁接手之后,打开报告表册一看,不禁吓了一跳,原来部里不仅没有半文库存,而且前任财政部长朱子文还签过二千余万元的支票,发给部队,因而各部队主官已派人来部坐索,声势汹汹,这更使黄财长难上加难,一筹莫展。

1932年1月18日,蒋介石、汪精卫集议杭州,准备携手合作,卷土重来,而孙科独不知底蕴,于21日冒然亲赴杭州面见蒋介石,请其转告孔宋,在财经方面予以支援,蒋态度冷淡,不置可否。孙23日由杭返京,与陈友仁低斟密酌,决定辞职,让位汪上台。24日,孙科和陈友仁联袂赴沪。次日蒋汪携手双双入京,由汪任行政院长,蒋任军委会委员长。虽非往日声势,而政权本质依旧。推算孙科由就职到下台,为时仅24日,为国民政府在历史上最短命的内阁。

1932年1月28日，上海抗战爆发。上海爱国军民面对日寇毫不畏惧，拼死固守。但蒋介石仍对抗战信心不足，仍对日本抱有幻想。3月份，孙科、陈友仁等在上海致电蒋介石、汪精卫，谴责他们不接济英勇抗战的十九路军。12月，孙科又联合李烈钧等中央执行委员，向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提议主张速行宪政，联共抗日。

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孙科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在这次会上，他提出反对“总裁终身制”的提案，主张民主，反对蒋介石搞独裁。这一年的7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进攻中共陕甘宁边区淳化、耀县等地，制造内战，孙科了解到此事后，又一次违反蒋介石的意志，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建立联合政府。”

当然，孙科也曾几度拥戴蒋介石，蒋介石也不失时机地利用孙科。1941年，蒋介石指使顾祝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亲者痛，仇者快，孙科却著文骂共产党，把“破坏统一”的不实之词诬加在新四军身上。

1947年4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及国防最高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副主席兼立法院院长。荣任不久，孙科就四处发表讲话，竭力呼吁美国援助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

1948年3月，孙科和李宗仁进行所谓“中华民国政府副总统”竞选，这是蒋介石和孙科在大陆的最后一次政治联手。蒋介石对桂系李宗仁的实力始终抱有戒心，李宗仁时为北平行辕主任，并不怎么唯命是听。蒋介石想让孙科当副总统，以打击桂系的势力。孙科对蒋介石把他内定为副总统很高兴，并认为能轻易击败竞选对手李宗仁，稳操胜券。但没料到几个回合下来，孙科虽有蒋介石、蒋经国的支持、粤系要员的拥护以及蓝妮的场外活动，还是以1295票败于李宗仁的1438票。这对孙科、对蒋介石都是件伤心的事。为补偿孙科的精神损失，恢复元气，蒋介石特地拨了一笔巨款，在南京中山陵附近替孙科修建了一所豪华异常的“院长官邸”。

多少年过去如弹指一挥间，孙科和蒋介石在政治上的恩恩怨怨也已成历史陈迹。从政的人向来注重的是现实，现实需要就是其选择、行为的最高准则。蒋介石盘踞台湾，需要拢络人心，壮大力量，孙科沦落天涯，虽儿孙绕膝，同享天伦，但经常是梦里家园，思乡心切，他需要的是回到祖国，回到他熟悉的生活氛围中去。因此，孙科返台，蒋介石称许，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不足为怪了。

这一历史性的时刻终于到来了。1965年9月29日，孙科偕夫人、孙治平夫妇乘日航班机飞抵台北，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于是，就有了文章最前面描写的那一幕。

孙科一行在蒋经国等陪同下到候机室二楼大厅与欢迎群众会面，欢迎群众久闻孙科大名，但大多不曾见过其人，都想一睹其风采，一时场面极为拥挤。孙科在人群中行进，面带微笑，频频颌首。今天的热闹场面使他想起多

年来的孤寂生涯，他不胜感慨，“大家这样热烈欢迎我，实不敢当。”

孙科步出机场候机室后，由蒋经国陪同前往阳明山第一宾馆。这是一座日本式的平房公舍，属台湾省政府的财产，与巍峨雄壮的中山楼为邻。后来，这里就一直成为孙科一家借居的住地。在宾馆略事休息，孙科一行又前往台北市心园饭店赴宴。孙科的老朋友马超俊、梁寒操、郑彦 和梅恕会在心园饭店设宴为他洗尘。

参加完宴会，孙科被安排接受台湾《中央日报》社记者采访。这时期，美越之战正酣；苏联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和中共发生重大分歧，矛盾公开化。孙科于是对记者大谈共产暴政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盛赞蒋介石的英明领导，对美发动侵越战争并逐步扩大战争乐不可支，把希望寄托在美国的军事力量上，认为，美国定能打赢越战，扼制并最终扑灭亚洲共产主义力量的日子为期不远。孙科这番讲话，一方面确是他对局势的见解，但另一方面，恐怕这也是他取宠蒋介石，向其略表寸心的见面礼吧。

当天晚上，孙科夫妇还应邀出席了蒋经国夫妇在圆山饭店金碧轩设立的欢宴。出席宴会的还有马超俊夫妇、张群夫妇、郑彦 夫妇及蒋纬国夫妇。

10月30日是蒋介石的寿日，这天，孙科偕孙治平由“国防部长”蒋经国、“司法部长”郑彦 陪同，飞往台南，接受蒋介石的接见。这是他们分别15年后的首次见面，孙科来归，正合蒋介石心愿，蒋介石为此特设午宴款待孙科父子。与此同时，孙科夫人陈淑英在亲友的陪同下游览了台北市。

孙科吃罢午宴，又匆匆飞往台北，出席晚间国民党全体中央常务委员和各单位主管在台北三军军官俱乐部的欢宴。中央秘书长谷凤翔致词，孙科请大家一同举杯为蒋介石祝寿。孙科的长子孙治平夫妇、侄儿孙满、孙乾以及侄孙孙必胜和孙必达，也参加了宴会。宴会后，孙科接受“参谋总长”黎玉玺上将的邀请，参加了在“国军”文艺活动中心举行的三军为蒋介石暖寿晚会，观赏空军大鹏剧团演出的“麻姑献寿”和“木兰从军”等剧。

返台几天来，孙科象一位名星一样被人群簇拥着，到处都是欢迎他的盛宴，到处都是欢迎他的笑脸，30日晚，台湾电视公司应观众请求，播放了孙科接受电视记者采访的录像。这是孙科返台后首次在电视屏幕上与观众见面。孙科在电视采访中说，他这次返台是为参加庆祝国父百年诞辰活动，他对国人热烈筹备这一庆祝活动极为兴奋与感谢。他再一次对美越战事表示乐观。他说，美国对越政策是坚定的，美国自今夏宣布协助越南抗共以后，到现在为止，在越兵力已达15万人，海空人员且不包括在内，美国在越兵员，到明年春夏间将增至30万人。孙科认为，友邦人士现已深深了解，帮助越南抗共，就是为了防止共产党吞并东南亚的威胁。

孙科在电视上纵谈国事、天下事，滔滔不绝，俨然一位政治预言家。在以后的几次宴会和谈话中，孙科也不断阐述他对于时局的见解，11月3日中午两广籍“立监委员”在“立法院”为他举行的酒会上，他甚至预言，下一年他可能要在南京向大家敬酒，最长不过四五年间，最短一二年内，“政府”

就可以反攻大陆。

11月4日下午，“国民大会”代表广东联谊会在台北市中山堂堡堃厅开茶会，欢迎孙科夫妇。孙夫人陈淑英原是“国大代表”，这次回来，也已办好报到手续，茶会由联谊会常务干事李悦义主持。

11月12日上午9时，孙科出席在“总统府”前广场上举行的“全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大会”，大会有50万人参加，规模宏大，庄严隆重。“国父纪念馆”奠基典礼完后，孙科发表讲话，歌颂孙中山的丰功伟绩，他说，在这一百多年间的世界上，国父的降生不仅是中国一件大事，也实在是人类一件大事。他把四千多年君主专制的中国政局改变为民主共和，在亚洲首先创立了民主国。孙科把孙中山比作美国的开国总统林肯。自然，讲话中少不了重谈反共反攻老调，给蒋家王朝打气加油，涂脂抹粉。下午，孙科参加了故宫博物院的落成典礼，并在那里为国父铜像揭幕。

孙科这次返台，自称是为参加国父百年诞辰纪念，并未对外公开要长期定居，所以，11月25日“国大代表全国联谊会”上，张知本代表致词时，还“希望孙科博士和夫人，今后要长住在国内，并与大家一起打回大陆去。”直到“中央”社12月21日发出“‘总统’聘请孙科为‘总统’府资政”消息，内外人士才最终确认，孙科这次回台是要做长期打算了。

1966年6月，经蒋介石提名，孙科任“考试院院长”。这虽非有实权的职务，但比所谓“总统”府资政毕竟略高一筹。

孙科做官，在国民党官场上向来口碑不佳，当年在南京官场上最流行的一句话“谁叫你没有一个好爸爸”，只要听到这句话，准心里都明白指的是什么人。蒋介石让孙科做“考试院院长”，也只是想利用其特殊身分的价值，希望孙科能以其特殊身分为自己内外交困的现实政治服务。

1969年8月13日，孙科应南朝鲜总理丁一权邀请，搭乘中华航空公司班机抵达汉城访问，随行的还有“考试院”秘书长钟天心，公子孙治平和孙儿孙必胜。孙科在南朝鲜期间，先后和南朝鲜总理丁一权、外交部长崔圭夏举行会谈。南朝鲜和台湾同为美国扶植的傀儡，有所谓共同的理想和事业，孙科自然颇受其欢迎。15日上午9时半，孙科及随员参加了南朝鲜“独立”24周年庆祝会，晚上又出席了“总统”朴正熙的“国庆日”酒会。

这一年的12月28日，孙科作为蒋介石指派的特使前往菲律宾，参加马科斯连任第六任总统的就职典礼。菲律宾政府给了他最高礼遇，菲外长罗慕洛、总统府执行秘书麦西达等亲自到机场迎候。孙治平随孙科同行，孙科的一位孙女，稍晚些时候也从香港到了马尼拉。

为“反攻大陆”呐喊助威

孙科在台湾岛内为蒋介石的所谓“反攻大陆”呐喊助威，在国际上四处奔走，为蒋介石联络力量，赢得支援，真可谓奔波忙碌，兢兢业业之至。然

而，毕竟岁数不饶人，他的生命开始受到病魔的威胁了。

1973年8月26日清晨，孙科突感胸痛及呼吸困难，于当天上午住入“荣总”冠状动脉病室，经医师诊断为急性心肌梗塞合并心脏衰竭，并遵医嘱，不见宾客。

经过医师们十多天悉心治疗，略见好转。至9月12日清晨3时20分，病情突转恶化，昏迷不醒，心电图显示心室颤动现象，呼吸心跳突然停止，经急救，虽心跳、血压、呼吸再度恢复，惟神智仍然昏迷，经施药物控制，至20日下午5时20分心室性颤动复发，急救无效，延至5时55分逝世。陈淑英及孙治平夫妇随侍在侧，亲友多人也都在病榻旁边。

孙科病情转剧后，“副总统”严家淦曾到医院探间，“行政院长”蒋经国早上和中午两次到医院探视。“总统府”秘书长郑彦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张宝树、“考试院”副院长杨亮功，秘书长钟天心、东吴大学校长端木恺等，整天都在医院照料。

孙科的遗体，于晚上8点30分，从病房移到荣民总医院灵堂时，蒋经国、郑彦英、张宝树、杨亮功、钟天心，端木恺、薛人仰、陈水逢、胡木兰、刘兆田及亲属等二十多人，均在场恭送。何应钦、钟皎光、马沈慧莲、罗衡、张邦珍等，也在稍后些时间赶到。

孙科病逝的消息传至美国，其次子治强、孙子国雄、女儿穗英、穗华，都急忙赶到台湾奔丧。

蒋介石于9月14日发布“总统令”，说：

考试院院长孙科，乃国父哲嗣，为革命元勋，器量恢宏，才识远大，力行三民主义，学术造诣渊深。历膺重寄，忠实孔服，曾三任广州市长，两任行政院长，两任立法院院长，其间并任国民政府副主席，嘉奖伟绩，宏济艰难，功在国家，声驰环宇。比年更受任考试院院长，时际中兴，人才为本，藉其名德，以重铨衡。方今匡复大计，正赖老成襄迪，遽闻溘逝，震悼殊深。特派严家淦、蒋经国、郑彦、倪文亚、张宝树敬谨治丧，以示优隆，而昭崇报。

孙科去世这一年，享寿83岁。

孙科病逝后，陈淑英仍住在阳明山新园街一号第一宾馆。除视力不佳，心脏较衰弱外，精神与身体都很好。说起来，当年她和孙科结为夫妻还是亲上加亲，因为她是孙中山的堂外甥女，孙科是她的堂表兄。她惯用两个“好”字，代表孙科有两男两女，即长男治平、长女穗英，次子治强、次女穗华。

长男孙治平于1913年生于美加州伯克莱。孙中山以民初百废待举，其名寓有殷望国治民安，天下太平之意。孙治强曾在国民党元老吴稚辉创办的海外预备学校就读。其时，孙中山去世不久，吴稚辉认为北京读书环境良好，深感党国志士子均属革命幼苗，“应予培育”，就在北京城东干面胡同南

小街 92 号创办学校，自己亲自负责。讲授课程包括文、理各科，师资优异，设备完善。1917 年，宁汉分裂，吴稚晖对该校不得已而“愤而解散，诸生遗归”。

抗战前，孙治平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日后赴美深造，获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经济硕士。

孙治平于 1943 年，生一男，名国雄，曾就读美国怀特学院生化系。孙国雄与日裔夫人生二女，长女美玲（1966 年生），次女美兰（1969 年生），都在美国，她们已是孙中山的第五代嫡系后裔。

1983 年孙治平 70 岁，他被聘为台湾蒋经国“总统府”顾问，其时，他还是台湾电视公司副董事长，又是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次男孙治强生于 1914 年，当时，孙中山感于治国之道，先求平安，再求强盛，故取其名。孙治强与其兄长同获美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经济硕士。孙治强在大陆时曾力“中央”信托局秘书，并辅助孙科处理法制工作。

孙治强勇于冒险，1971 年，他隐瞒家人，以生命为赌注，只身前往非洲打猎，竟能猎获五大凶猛野兽——狮、豹、犀牛、野牛、非洲象。1980 年在台北市博物馆展示上述各兽之标本，竟打破了该馆历年来的门票纪录。孙治强奔父丧期间，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温劝他留在台湾，因其寡母年迈，亟需亲人陪侍。宋美龄并为他安排工作，担任“中央”信托局顾问。

孙治强在美育有二女，长女嘉琳（1946 年生），次女嘉榆（1948 年生），都已成家，各有子女。大约在 1976 年，孙治强在台北与林伦可结婚。林伦可为广东客家人，其祖父曾任上将，主持广西省政。她毕业于台北市女师专，曾任国校教师，幼稚园主任。不久，即有两男国元、国升。两男给阳明山上的孙府凭添了许多喜悦与生气。最高兴的自然是在他们的祖母陈淑英了，过去她常向晚辈说：孙家的人口单薄了些，她有生之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多添孙儿，以期后继有人，代代相传。跟许多上了年纪的长者一样，陈淑英“重男”的观念一直未变。全家聚餐时，她经常夹好菜给孙子们吃，而自奉甚俭，惯用残茶剩饭。孙科地下有灵，当感叹他这原配夫人对孙家后代的一片深情了。

第九章

人民海军二战蒋舰，“剑门”、“章江”葬身汪洋。崇武海役，两岸海军三次较量

第一节 香港来客

一幕“毋忘在莒”的闹剧

一次次“反攻”的失败，并未使蒋介石甘心，他为了重新鼓起蒋军官兵“反攻大陆”的勇气，又于1964年12月20日视察金门时，演出了一幕“毋忘在莒”的闹剧，梦想田单复齐故事重演。

何谓“毋忘在莒”呢？蒋介石称：

最近金、马前线官兵，效法2200年前田单在莒县和即墨，纠合军民，忍辱负重，牺牲奋斗，百折不回，卒能驱逐敌人，恢复其齐国的精神，发起了“毋忘在莒”运动。本来在41年（1952年），我为了勉励前线军民，殷忧启，雪耻复国，曾经以“毋忘在莒”四字，题名于金门大武山上，做为将来反攻复国胜利，使我全体战友和人民，毋忘今日在台、澎、金、马的军民，共患难，同生死的千古不磨的纪念。这在今天反攻复国前夕，由前线官兵来推动“毋忘在莒”的民族复兴运动，不仅最足以显示我们前线军民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志节，而且也必能在军中，在学校，在乡村，在社会的每一角落，每一军民，掀起举国一致的心理革新，精神动员，人人走向战斗的新行动和新气象。其实，这亦就是我对大家所常常勉励的“团结奋斗，雪耻复国”八个字的意义。

蒋介石为了将此一运动推展至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明令公布了《毋忘在莒运动实施纲要》。尽管蒋到处演讲、动员，表面上搞得轰轰烈烈，实则无人真正响应，倒是中共和平统一祖国的号召，使许多国民党军政人员纷起响应。

失意之际，蒋介石想起了一个人——曾名噪海外的原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

曹聚仁是何许人？为什么蒋在失意之时会想起他？事情还得从9年前说起。

热心于两岸和平统一的贵宾

1956年7月1日，罗湖桥海关，从香港那边匆匆过来了一个50多岁的

男子，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迎了上去。握手寒暄后，他们上了一辆在那里等候的轿车。这位香港来客，就是集作家、教授、记者于一身的曹聚仁。

专门迎候他的是中联部派来的徐主任。

曹聚仁当时名噪海外，虽说是个做学问的文化人，却因其言其行其与高层人物的特殊关系而被人称之为“谜一样的人物”。他年轻的时候，被称为章太炎大师的高足。他还是鲁迅的朋友，著有《鲁迅评传》、《鲁迅年谱》等书，担任过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蒋经国在赣南，邀他担任《正气日报》主笔，总编辑，与蒋经国关系甚好。

他在广州稍事休息就直飞北京。不知道曹先生为什么选择7月1日这在中国很特殊的一天从香港过来。可是，连日来海外华人各界，无论其政治信仰如何，都为3天前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的演讲激动、兴奋，并生发出很大的期望。

3日之前，也就是6月28日，周恩来在中国人大第一届第三次会议的演讲中，传达出了新的信息——

我国政府曾经再三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毫无疑问，如果台湾能够和平解放，那么，对于我们国家，对于我们全体中国人民，对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都将是最为有利的。……现在，我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正在港澳人士议论纷纷，新闻界视为热点时，曹聚仁又突然北上。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人为的安排？敏感的香港新闻媒体自然注意他的行踪。曹聚仁还未成行前，种种猜测与议论，一时间就充斥于港澳报纸。为此，行前他对友人解释道：“我这次回祖国去，绝无政治上的作用，只是替新加坡《南洋商报》到大陆上作广泛深入的采访工作，同新加坡工商考察团访问北京，社方派我兼任该团记者，这便是我访问祖国的重要任务”。

毛泽东密晤曹聚仁

其实，曹聚仁这次北上，是他离开大陆到香港整整6个年头后第一次回来。他这次回来，早在周恩来“6·28”讲话前，就作了商量与安排。

几乎与此同时，还有一个神秘人物，比曹聚仁早不了多少日子北上。这个神秘人物神秘归来，导致了9年后的国民党2号人物李宗仁的叶落归根。这个神秘人物就是程思远。

程思远和曹聚仁两人北上之行都很突然，都带神秘色彩。

7月16日下午，颐和园里。在一艘普通的游艇上，周恩来和陈毅陪着一位客人划船，游客们玩得太尽兴，竟然没有觉察领袖就在这儿。这位客人就

是曹聚仁。他很高兴。

曹聚仁进入正题，谈起周恩来“6·28”演讲。问道：“你许诺的‘和平解放’的票面里有多少实际价值？”

周恩来答道：“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北伐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有第三次合作呢？”

周恩来又继续说：“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双方完全可以合作……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

此后，曹聚仁风尘仆仆，每年都回大陆两三次。在北京，他除遍访各界人士外，接触最多的是邵力子与中央的高层人物周恩来、陈毅等，特别是他先后得到毛泽东的两次接见。1956年10月3日下午，住在北京新侨饭店的曹聚仁得到通知，毛泽东一会要在中南海怀仁堂里接见他。这天下午，国家好些领导人都要出席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访华的大会。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大会，他要会见曹聚仁。毛泽东与曹聚仁作了长谈。

“你可以多看看，到处走走，看我们这里还存在什么问题，不要有顾虑，给我们指出来。”毛泽东说。

曹坦率他讲了自己的观感。

事后，他告诉四弟曹艺，说：“想不到，我的著作，主席差不多都看过。我说我是自由主义者，我的文章也是‘有话便说，百无禁忌’的，主席认为我有些叙述比较真实，而且态度也公正，又叫我不妨再自由些。”

一年以后，在《北行小语》的一篇文章里曹聚仁谈到这次会见的谈话。文章说：

因为毛氏懂得辩证法。世间的最强者正是最弱者。老子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莫柔于水，至坚强者莫之能胜”。从这一角度看去，毛泽东从蔑视蒋介石的角度转而走向容忍的路的。他们可以容许蒋介石存在，而且也承认蒋介石在现代中国史上有他那一段不可磨灭的功绩的。在党的仇恨情绪尚未完全消逝的今日，毛氏已经冷静下来，准备和自己的政敌握手，这是中国历史又一重大转变呢。

泄露“炮轰全门”内幕

1958年8月23日，中午，12时。厦门前线，万炮齐发。小小的金门岛，短短一小时内，就落下3万颗炮弹。火力的猛烈和炮弹的密集程度使人咋舌。

一位军事家说：“这和二战中盟军攻击柏林的炮火差不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震惊世界的金门炮战是中午12时开始的，奇怪的是在炮战开始前几

小时，新加坡早晨出版的《南洋商报》，就发表了金门即将炮战的消息。

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自然是最高机密，怎会在一张海外报纸上率选曝光呢？

奇怪的还不只此，炮战延续了6周，10月6日，北京突然发表了国防部文告（即《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书》），作出停火7天的决定。此文告是在10月6日发表的，而有关此事的专讯早在10月3日就从香港传到新加坡。10月5日在《南洋商报》发表。

是准一而再地获得机密？

这位“通天”人物就是曹聚仁。这一年，毛泽东第二次接见了曹聚仁。那天，毛泽东还和他共进午餐，江青作陪。曹还是书生本色，说话无顾忌，当着江青的面，他大谈了30年代上海影坛的轶闻与掌故，那是江青最忌讳的。

就是这位热心于两岸和平统一的贵宾曹聚仁，他从最高层预先得到即将炮轰金门的消息，他本是《南洋商报》的记者，记者这职业总是喜欢独家新闻，于是他抢先把这消息捅了出去。就在读者疑信参半拿着当日《南洋商报》时，无数发炮弹正从大陆射向金门。

这就形成一起泄密事件，据说有关部门曾对曹聚仁进行批评。

不过，另外也有不同的说法。

曹聚仁虽是高层隆重接待的贵宾，但毕竟是来自海外的党外人士，他能得到这一机密，绝非平常。金门炮战“属于惩戒性质”，炮击不久，就进入政治斗争、外交斗争为主的阶段。先行示警，也在情理之中。

曹聚仁化名捅消息

炮击进行了6周，金门守军已到了弹尽粮绝之境，此时如果我军发动登陆，金门唾手可得。然而，出乎意外，在国庆节后的第5天，即10月6日北京发表了《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书》（即国防部文告），文告一再阐明炮轰的目的是惩戒性质，要台湾当局接受和平解决两岸争端的建议。文告声明：“从10月6日起，暂以7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果护航，不在此例。”

国防部文告是在10月6日发表的，又是这张《南洋商报》在10月5日发表，发表时署“本报驻香港记者郭宗羲3日专讯”。

《南洋商报》驻香港办事处从何得到这个特大消息。这郭宗羲又是何许人？这一连串谜一样的问题，引起许多人探玄索秘的兴趣。

1994年3月，《中华日报》的记者，几经寻觅找到了《南洋商报》已退休多年的老报人薛残白先生。

薛残白先生已83岁高龄，他是1929年进《南洋商报》的，从事报业已60年以上，对《南洋商报》的情况知之甚详。

50年代，薛残白是《南洋商报》（中外版）主编，据他说，1958年8月，《南洋商报》的特派记者曹聚仁正在北京采访，而且还获得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接见，并与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的访谈，薛先生肯定他说：“能得这样重大的消息，除了曹聚仁，当时的商报是不会有第二人的。”

“那么，为什么这则消息发表时不署曹聚仁的名字，而是署郭宗羲呢？”有人问。

薛先生说：“我只记得那时商报驻香港办事处有个姓郭的办事人员，这位年轻人当时不是写新闻的。按我的推测郭宗羲是个假名，很可能是曹聚仁为了省麻烦而用的化名。”

几位造访者仍流出不满足的神色，于是热情的老先生又建议：找香港的郭先生一问，他一定会告诉你们真相。

经过一番周折，《中华日报》的记者，终于找到了定居香港的郭旭先生，郭先生也有73岁的高龄。

郭先生说：“当年我是商报驻香港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记得当时确有一则大新闻，是曹聚仁从大陆把稿传到香港，再由我传到新加坡。”

郭旭说：“郭宗羲这个名字还是当年商报的总编辑李微尘起的（李微尘后任新加坡政府外交部长）。如果问商报是不是有个驻港记者叫郭宗羲，那当然是没有啦！”

在曹聚仁发了专讯的一周后，毛泽东于1958年10月11日，致函周恩来，谈起曹聚仁：“曹聚仁到，冷他几天，不要立即谈。我是否见他，待酌。”毛泽东冷落曹聚仁，并非是因为过早发了停止炮击的消息，而是给台湾另一边（蒋介石）看的。”

这同样不是空穴来风。毛泽东在《再告台湾同胞书稿》中，曾提到《南洋商报》：“好几个星期以前，我们的方针就告诉你们领导人了。7天为期，6日开始。你们看见10月5日的《南洋商报》吗？人都有新闻观点，早一天露出去，那也没有什么要紧。政策早定，坚决实行，有什么诡计，有什么大打呢？”这份《再告台湾同胞书稿》，原定10月13日发表的。毛泽东临时改变了主意，没有发表。10月13日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从前述未发表的稿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并无责备曹聚仁之意。

拨开迷雾，水落石出，金门炮战的两次提早曝光，原来都与曹聚仁有关。此后，曹聚仁继续热心于两岸和平统一大业。

第二节 “八·六”海战

两艘敌舰隐蔽出航

就在曹聚仁忙于在大陆与台湾之间穿针引线期间，台峡两岸又接连发生了两起震惊世界的大海战。

1965年8月5日拂晓，我海军某部观通站的雷达兵们擦拭完雷达，正在启动机器搜索海面。突然，在萤光屏上发现东南海面上有两个目标，一前一后，鬼鬼祟祟地闯进了东山——南澳渔场。雷达兵们紧紧把它盯住，并立即报告了上级。

这二个目标，为什么一直往渔船里钻呢？这个问号，经过站长和雷达手们集体“会诊”，判明是美制蒋军舰，其型号分别是大型猎潜舰“剑门”号和小型猎潜舰“章江”号。

这两艘国民党海军巡防第二舰队旗舰，于1965年8月5日5时。从台湾左营隐蔽出航，驶向广东沿海。

“剑门”号（编号65）原系美国“海鸦”级舰队扫雷舰（大型，钢壳）、“巨嘴鸟”号（编号MSF387），1965年4月由美国驶抵台湾。这艘军舰排水量为890吨（标准），全载1250吨，航速每小时18节（一节等于一海里），舰上有76.2毫米炮一门，40毫米炮4门，雷达一部。

“章江”号（编号118）原系美国海军猎潜艇PCI232号，1954年6月由美国驶抵台湾。这艘军舰排水量为280吨（标准），全载450吨，最大航速每小时20节，一般航速14节，舰上有76.2毫米炮一门，40毫米炮一门，20毫米炮5门，火箭（组）76.2毫米一座，深水炸弹投射器4座，雷达一部。

这两艘猎潜舰是蒋窜扰我东南沿海的主要舰种之一。经常窜入我渔场，破坏我渔业生产，威胁我渔民安全。我海军担任护渔任务的舰艇部队，为了保护渔民生产，早就准备给予其惩罚。

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获悉“剑门”号编队出航后，立即制订作战方案，确定以护卫艇41大队高速护卫艇4艘，鱼雷快艇11大队鱼雷艇6艘，组成海上突击编队，以161号炮舰和快艇11大队5艘鱼雷艇为支援兵力，并指定汕头水警区副司令员孔照年乘598号护卫艇，负责海上指挥。

作战海区预定在南澳岛以东，东山岛以南，或南澳岛以南，南澎岛以西海域。指挥所决定：先打“剑门”，后打“章江”；隐蔽接敌，靠拢近战；高速护卫艇先开炮，穿插分割，掩护鱼雷艇突击。

“海上先锋艇”负责指挥

担任指挥艇的598号护卫舰，是我15年前在万山海战中，首创以小艇

打败大艇的“先锋号”。

不过，如今的“先锋”号护卫艇，已换成崭新的铁壳艇。这是由我国自己设计，大连造船厂制造的高速护卫艇。新艇装备后，官兵们利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航行1000多海里，从汕头到大连，从大连至汕头，一路上边航行边训练，基本掌握、适应了新艇，人人能独立值更。

两个月前的5月24日，国防部授予“先锋”号以“海上先锋艇”称号。

护卫艇41大队3中队先锋一号艇全体同志，……自1950年参加万山海战，曾首创小艇打大舰，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成功战例之后，多年来在执行战备训练、护渔护航、巡逻警戒、抢险救生等各项任务中，均取得了突出的成绩；部队意志旺盛，不畏强敌，不怕困难，敢于斗争，英勇顽强，保持和发扬了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为此，特授予先锋一号艇以“海上先锋艇”称号，希望全艇同志戒骄戒躁，认真总结经验，不断努力，保持和发扬这一荣誉。目前，美帝国主义正加紧扩大印度支那战争，并屡对我国进行直接的军事挑衅，我海军部队应学习先锋一号艇全体同志的革命精神，百倍警惕，加强战备，苦练过硬的杀敌本领，为加强我海军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随时准备歼灭敢于来犯之敌，争取更大的胜利。

5月27日，《人民海军》报发表了社论《向“海上先锋艇”学习》。

在纪念万山战役胜利15周年的日子里，海军在南海舰队的驻地湛江市，召开了“海上先锋艇”命名大会。会议于1965年6月11日召开，开得相当隆重。海军、中共中央中南局、南海舰队、广州军区、广东省军区和当地党政负责人，以及战斗英雄、模范人物和“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代表出席了大会。

庄严的国歌奏过之后，海军领导人宣读了国防部命令，把国防部颁发的奖状授予“海上先锋艇”艇长石天定。霎时，场内掌声雷动。6月12日，海军南海舰队作出了《关于学习“海上先锋艇”革命先锋精神的决定》，号召全体指战员，学习“海上先锋艇”官兵的革命先锋精神。

当日，《解放军报》发表评论：《革命精神所向无敌》。6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短评：《革命先锋精神威风凛凛》。短评在扼要评述“海上先锋艇”英雄事迹后热烈欢呼：先锋艇革命的先锋精神光芒万丈！

两个月后，海峡战火又将再起。指挥艇就非“先锋艇”莫属了。

编队抵达云澳湾

在敌“剑门”、“章江”号隐蔽出航的当天下午，“海上先锋艇”正停泊在汕头5号码头上。

官兵们出海一个星期，今天放假。

晚饭加菜会餐，补的是4天前的“建军”酒。

大队长请来了水警区副司令孔照年。

大家频频碰碗，以解多日的海上劳顿。孔照年跟官兵们碰了酒碗，看着大家的吃相心里很高兴。

艇长石天定对大家说，“首长发话了，酒随便喝，但不能醉。”饭堂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当官兵们喝酒正在兴头上的时候，一个参谋进来，把孔照年叫走了。

石天定艇长感到挺纳闷。

酒足饭饱之后，石天定溜溜达达走在码头上，望着海湾里的战艇，见有成群的白色海鸥在海湾上空飞来飞去。大队部通信员跑来，喘吁吁向他报告：“作战值班室通知，海上发现可疑目标，让你们艇备航。”

石天定跑到艇上，拉响了警报。

很快，信号兵挂起了黄旗，机电兵启动了主机。全艇人员很快集合在前甲板上，清点人数。按规定，战艇出海，艇员被落在码头上是要挨处分的。

石天定对本艇的官兵还是有数的，官兵们的素质是没说的。大家无不清楚自己是“先锋艇”上的人。

还真缺一名。

是外部来艇实习的往副艇长。

任副艇长酒喝多了点，听到警报就往码头跑，结果摔倒了。他见有几个水兵，也不知哪艇的，忙说：“把我抬……抬到艇上去。”

那几个水兵送他到“先锋艇”时，艇员各就各位了。一辆吉普车开来，嘎然停在码头。

孔照年和4个参谋从车里出来，急忙登上了“先锋艇”。艇长石天定迎上前去。

“有两个目标。”孔照年说，“到南澳岛云澳湾待机。”他们一起登上了指挥台，战艇就起航了。

21时24分，“海上先锋艇”向浩浩淼淼的大海驶去。后面是护卫艇601、558、611。

石天定感到肩上的担子挺重。作为编队指挥艇，一举一动举足轻重，无不影响着编队指挥员的作战指挥，影响着后面3条艇的行动。

这次行动十分仓促，有些事没来得及准备，连战斗动员会都没开成。

石艇长跟指导员徐寿祺在指挥台上交换了下意见，简单分了下工。石艇长操艇不能离开指挥台，有些事只能徐指导员到各舱各战位跑了。

23时，编队抵达云澳湾。

孔照年对石天定和徐寿祺说：“你们现在的任务是，抓紧时间睡觉。”

石天定明白首长的意思。他们的官兵在海上漂泊一个星期，体力的确没恢复过来，不休息好，仗打起来怕顶不住。“我们想抓紧时间动员一下。”

徐寿祺说。

“简短点儿。”孔照年同意了。

一会儿，陈运和副艇长跑上指挥台。

“孔副司令，紧急电报。”陈运和喘息着说，“指挥所命令我们马上出击！”

孔照年看完电报，随命令编队起锚出击。

护卫艇编队在茫茫的夜海上疾驶。

“章江”号首先中弹

“孔副司令，特急电报！”陈运和又跑上指挥台。孔照年接过电报。电报是舰队发来的：

总参谋部批准了舰队的打击方案，并作如下指示：

1. 放进来打，越近越好；
2. 集中优势兵力打；
3. 不要误打自己的渔船和外国商船；
4. 打过之后不要追击太远，以防上当；
5. 争取晚上打，拂晓前撤回。

这时“剑门”号编队由兄弟岛东南海面向西南航行。我军的4艘护卫艇和鱼雷舰编队分别由云澳湾、汕头出航，于6日0时40分护卫艇编队开到了与鱼雷艇编队会合的海域，却与鱼雷艇编队联络不上。

由于岸指引导的误差，鱼雷艇编队偏离了作战海区。孔照年只好率护卫艇编队，向敌舰编队接近。

敌“剑门”、“章江”两舰成单纵队由东北向西南驶来。我护卫艇组成战斗队形迂回接敌。

雷达兵在左舷90度，距离9海里处发现敌舰编队。石艇长想，这样迂回接敌，时间长，航程远，不利于抓住战机。

“孔副司令，我们高速直线追击行吗？”

“可以。”

孔照年果断决定，放弃掩护协同作战计划，命令护卫艇高速追击。

不久，“剑门”号编队依仗火炮程远的优势，先行开炮。解放军护卫艇队冒着密集的炮火，高速接近目标。各艇指战员由于求战心切，将“准备射击”的口令听成“射击”，因而先后向“剑门”号编队的火光方向开炮射击。孔照年及时下令制止了这种无效射击。

敌人的炮火仍在吼响。

过了一会儿，后面的601艇前主炮又打起来，大概是不服敌舰的火力。

后面的三艘炮艇又是一阵乱打，而此时敌舰目标仍在射程之外。

孔照年火了。开始骂娘。

“没有命令不准开炮，这是战场纪律！”孔照年当即宣布了三条规定“没有命令不准打；看不清目标不准打；瞄不准不准打！”

护卫艇编队高速接近了敌舰，敌舰的轮廓越来越清晰了。敌舰的炮火越打越密，我护卫艇只好曲折航行，躲避着敌人的炮弹，往前冲。

敌舰离我越来越近了。

“各艇射击！”孔照年命令道。

“打！”

各艇主炮、辅助炮全吼响了，一串串炮弹披着烈火，扑向敌舰。

敌人的炮弹也在呼啸。

根据穿插分割的作战方案，必须把两敌舰冲散。“先锋艇”冒着敌人的炮火首先向两敌舰中间直插过去，一边猛烈向敌人开火。

后面的艇也高高地昂起艇首，插过来。

敌舰被冲散了，一艘向东，一艘向西。

按作战计划，先打“剑门”，可“剑门”一边打炮，一边东逃了。

孔照年命令咬住“章江”。

护卫艇紧紧咬住“章江”号不放。

临近3时，艇队抵近“章江”号，在距离500米处保持同向运动时实施集火突击，一直打到相距100米以内，使“章江”号连连中弹。10分钟后，“章江”号高速冲向解放军的艇群，企图寻隙逃跑。

611 舰奇迹般返回

我598、601号艇立即加速冲上前去堵击。611号艇一面猛打“章江”号舰，一面穿越其航线，正好处于己方艇队与目标之间。当战斗激烈的紧要关头，611艇左主机意外停车了。机电兵麦贤得立即跑过去启动机器。

突然，一发炮弹打进机舱爆炸，弹片击中了麦贤得的前额，直插到左侧靠近太阳穴的额叶里。

麦贤得脑脊液外流，失去知觉，跌到在地。

当副指导员给他包扎时，他突然苏醒过来，他的嘴里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他要站起来，腿也不听使唤。他急得乱推副指导员，左手指着机器。

另一个机电兵领会了他的意思，启动了机器。

麦贤得以惊人的毅力站了起来，头上缠着绷带，在隆隆的4部上机旁走来走去，不停地检查着机器，保证了机器正常运转。

敌“章江”号被打得起了火。

我护卫艇从500米打到100米距离，冲过了“章江”号，只好再拉开距离打第二个回合。

麦贤得所在的 611 艇却行动迟缓，同已经起火的“章江”舰绞在了一起。

“章江”舰想借 611 作护靶，寻隙逃窜。

孔照年命令各艇打穿甲弹，向“章江”水线以下要害部位射击。

8 月 6 日凌晨 2 点 51 分，敌“章江”接连两次爆炸，至 3 点 33 分，沉没于东山岛东南约 24.7 海里处。我 611 艇当时已 17 处中弹，有 3 个舱室进水，弹药库中弹起火，4 部主机打坏了 3 部，60% 的人员伤亡。611 艇在如此重创的情况下，却奇迹般地自航驶回基地（战后被海军授予“海上英雄艇”称号）。

麦贤得以惊人的毅力坚守在机器旁（战后，他被国防部授予“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错把小岛当敌舰

护卫艇编队围攻“章江”的时候，偏离航向的 6 艘鱼雷艇。在夜色蒙胧的海面上发现了一艘军舰的黑影。

鱼雷艇抓住战机向敌舰发射鱼雷。

“预备——放！”

“嗖——”一枚。

“预备——放！”

“嗖——”又一枚。

10 枚鱼雷发射完毕，敌舰既没起火，也没沉没消失，纹丝不动。

官兵们面面相觑，感到不可思议。

指挥员命令高速接敌。

临一瞅，原来是座小岛。

6 艘鱼雷快艇奉命返航。

“章江”号被击沉后，“剑门”号仍在外围海域徘徊。南海舰队为扩大战果，根据总参谋部的指示，即令在云澳待机的鱼雷快艇第二梯队 119、120、121、122、136 号 5 艘艇投入战斗。

同时，南海舰队命令战场上的 3 艘高速护卫艇和 161 号炮舰，立即追歼“剑门”号。

5 时，护卫艇队追至距“剑门”号 6 海里时，“剑门”号舰上的所有火炮一齐向艇队猛烈急射，曳光炮弹在解放军各艇周围乱窜。

艇队指战员无所畏惧，沉着机智地进行反炮火曲折机动。

围攻敌舰“剑门”号

照明弹划过夜空，照得海面上通明，炮弹拖着长长的火焰，在夜空中穿行，炮弹落处，升起一两丈高的水柱……

“剑门”向我猛烈开火，“先锋艇”中弹3发，炮弹炸断了舷边栏杆。

我601艇紧随“海上先锋艇”，像箭一样径直向敌舰冲去。500米、400米、300米……离敌舰越来越近，可是艇长吴广维还没有下射击命令。他想：要等待指挥舰的命令，要打就打它个稀巴烂。战艇一个劲地向前冲，吴广维也一个劲地给自己下命令：近一点，再近一点！到敌舰跟前打。可是，炮手们的手却痒得难熬了，他们不时地朝艇长那里看，他们是多么急切地盼望艇长下开炮命令啊！眼前这些蒋舰，就是经常闯入我渔区抢劫杀人的海盗，怎么能叫他们在战士们眼前多存在一分钟呢！

水兵们胸中燃烧着怒火，恨不得飞上前去亲手掐死这些敌人，为人民报仇雪恨。

战艇飞快奔驰，离敌舰只有60米了，孔照年下令还击。等待已久的601艇艇长吴广维把手从空中猛往下一劈，高声命令：“打！”“狠狠地打！”只听“咚咚咚”一阵连珠炮响，601艇上的前后炮和机关炮一起开火，一颗颗拖着一道道亮光的炮弹，径直向敌舰轰了过去，炸得敌舰上腾起团团浓烟烈火，敌舰前炮立即被打成哑巴了。

胜利的喜悦鼓舞了水兵，他们受到了首长的嘉奖。

水兵们正准备进行第6次攻击时，就听到从指挥艇上传来首长的声音：“601打得好，你们打得准，打得稳，打得狠，第一个回合就打掉了敌炮，再加把劲，把敌舰打沉！”

把敌舰打沉！这是战斗命令。601战艇上的全体水兵更加集中精力，决心彻底干掉敌舰。当他们转过一个弯又向敌舰冲击时，吴广维头部受伤，但他仍站在指挥台上指挥战斗。

突然一阵海天倾斜，吴广维摔倒在指挥台，嘴里还在下达命令：打！打……

这时，北海舰队来实习的代职副中队长王瑞昌冲上前来，主动站到艇长位置，指挥各炮向“章江”轰击。

王副中队长是一个多月以前来这里跟班见学的，临时在二中队代职副中队长。艇队接到惩罚蒋军的命令，王副中队长积极向领导请求参战，他说：“一个共产党员，只有调换战斗岗位的时候，没有停止战斗的时候，枪声就是命令，敌人来了，就要向前冲。”

领导上答应了他的请求，派他到601艇协助艇长指挥战斗。他一踏上甲板，就把自己看成是艇上的战斗成员，帮助艇长组织大家作好战斗准备。航行中，他和艇长并肩站在指挥台上，组织观察了望，积极提出指挥意见。

发现敌舰了，指挥艇命令他们高速前进。王副中队长对艇长说：“战斗一打响，我包管通信联络和观察敌情，你集中精力指挥作战！”说完，就把敌舰的方位通知雷达兵，要求他紧紧咬住敌人！

当艇队进入射击阵位，火炮顿时轰鸣起来，炮弹像雨点般地倾泻到敌舰上。敌人也拼命挣扎。在第三次冲击敌舰的时候，猛然间，跟王副中队长并

肩站着的艇长突然昏倒了。原来是一块空爆的弹片打伤了艇长的头部。王副中队长把艇长安顿好，立即跨过一步，在弹片纷飞中昂首屹立在艇长的位置上，大声说：“现在我代理艇长，注意我的口令！”他果断地命令各炮向敌舰猛烈轰击。

王瑞昌虽然也担任过艇长，但是因为艇型不同，对这个战艇的性能并不熟悉。但是他坚信勇敢就是胜利，靠近了就能用快、准、猛、狠的火力消灭敌人，于是马上命令各战位：“没有命令不准开炮，靠近了狠打。”

前炮长黄兆良指挥着全体炮手们，对敌舰进行了重新瞄准，不断占据射击有力角度，等待射击命令。

我护卫艇曲折航行一炮不发，回避着敌人的炮火。至距敌舰 5 链时，所有护卫艇的炮弹齐向“剑门”倾泻。

“剑门”号再次中弹起火，主炮也没了回音。

这时，我鱼雷艇编队高速飞来，海面上泛起一片雪白。

护卫艇驶向“剑门”舰首，用小舷角攻击，掩护鱼雷艇占据有利阵位。

自接到出击命令后，副大队长张寿瀛立即率领鱼雷艇队，直奔战区，迎击敌人。

航行中，张副大队长想起自己在淮海战役中初上战场的情景。那时由于心情紧张，错漏了不少战斗动作。这次他是个“老兵”了，本着不打无准备之仗的原则，就提前下达了准备战斗的命令。各艇都认真细致地再次作了检查，使战艇完全处于良好的战备状态。

他注视海面，没有发现敌舰的踪影。但是，张副大队长下定了决心，只要敌人敢来，就坚决消灭它。“前方有闪光！”张副大队长仔细观望，断定这是敌人打炮的火光。

张副大队长立即命令全速冲击！

火光在前，越来越近，观察更清楚了。张副大队长通过报话兵向各艇喊道：“同志们，喷白光的是敌舰，瞅准目标，从弹道下面冲进去，狠打不留情！”说着，他的指挥艇一马当先，像离弦的箭一样射向敌舰。其余各艇寸步不落，保持着严整的战斗队形，奋勇冲杀。

敌舰还在拼命挣扎，慌乱地规避着。这时候，张副大队长根据毛主席关于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教导，集中力量攻击“剑门”号。说时迟，那时快，一声号令，强大的火力射向敌舰，“剑门”号想逃避也来不及了。敌舰弹舱爆炸了，油舱也爆炸了，火光映红了海面，浓烟遮盖了天空，汹涌的海水迅速吞没了成堆的废钢烂铁。

5 点 22 分，“剑门”号沉没于东山岛东南 381 海里处。

天渐渐亮了。

鱼雷艇胜利返航，护卫艇打捞俘虏。

这次海战，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大的一次海上歼灭战，一举击沉国民党海军 2 艘军舰，击毙国民党军少将胡嘉恒以下 170 余人，俘“剑门”号中校舰

长以下 33 人。人民解放军海军在海战中阵亡 4 人，伤 28 人，损伤护卫艇和鱼雷快艇各 2 艘。

雄鹰展翅迎战友

大约 7 时左右，歼灭美制蒋舰的战斗刚刚结束不久，战区上空，立即飞来一批又一批我人民空军的机群，迎接我人民海军的舰艇胜利返航。

飞行员们从高空往下看，只见碧蓝的海面上，一艘艘舰艇，排成雄伟的战斗队形，劈开重重巨浪，全速向着港口飞驶。飞行员们一面警惕注视着海空，严防敌机偷袭我舰艇；一面频频摆动机翼，向胜利归来的海军战友致意。水兵们在海面往空中看，只见一对对矫健的雄鹰，风驰电闪，在舰艇上空巡航，也激动地不住向空中挥手，向掩护自己安全返航的空军战友致谢。

当人民空军接到配合海军战友歼灭骚扰我渔场的美制蒋军舰的命令后，机场上就开始忙碌起来。地勤人员在仔细地检查每一个机件；飞行员们在待命起飞，他们说：“我们要像保护长机一样，保证舰艇安全。”“让海军同志集中力量狠揍海上敌人，空中的敌人我们包下了！”

天刚破晓，海军击沉敌舰的喜讯传来，空军机群也展翅来到了海战地区上空。他们知道，敌人突然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定会出动飞机偷袭我胜利返航的舰艇。因此，尽管乌云翻滚，细雨蒙蒙，雾气腾腾，天气十分恶劣，他们还是穿云破雾，以整齐的战斗队形，在我舰艇上空，组成了一道坚强的空中屏障。

在机群伴随舰艇返航途中，忽然听到耳机里传来地面领航员的声音：“注意，东南方向有敌机。”“好，来多少，打多少！”机群立即以昂扬斗志，加大速度，占领空中有利位置。随时准备痛击胆敢窜来的敌机，继海军海上歼灭战之后，再打一空中漂亮仗。

但是，空战没有发生。

台湾空军出动 4 批 16 架飞机，在我护卫艇编队上空盘旋数圈。但他们一看情势不妙，赶快钻进云雾，向外海逃去。

就这样，我英雄战鹰出色地保卫着海军战友，乘风破浪，胜利归来。

渔民海上捉蒋军

6 日凌晨，正处夏汛生产大忙季节的福建东山渔场，浪涛滚滚，渔火点点，厦门和东山地区的渔船正乘风破浪追捕鱼群。这时，海上传来了隆隆的马达声，由远而近，越来越响。有着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渔民很快就分辨出又是前来进行骚扰的蒋帮舰艇。

渔民们一面警惕地注视着海上的动静，一边坚持进行生产。一转眼，我英勇的“海上轻骑队”飞速追来。距离厦门地区捕渔船队五、六百米的海面

上，突然升起一串串信号弹，紧接着响起一阵阵震撼海空的炮声，弹火把海面照得通明。

渔船上广大渔民们欢腾起来，大声喊道：“打得好！打得好！”厦门地区渔船上有一个年仅21岁青年渔民、基干民兵阮亚空，他的祖父和叔祖父、叔叔都被蒋军捉去。祖父被敌人害死在金门，叔祖父被打死在海上，叔叔至今下落不明。那天，他旧仇新恨一起涌上心头，万分愤怒地对同伴说：“同志们，报仇时候到了，赶紧抓俘虏去，一个也不让它逃掉！”船上的渔民们都齐声喊道：“对，敌人钻到海底，我们也要把它捞上来。”说着，许多渔船上的渔民，拿起渔钩、三角刀、绳子，从四面八方战区冲上去。

经过一阵激烈的海战之后，两艘敌舰被我海军击沉。这时候，渔民们一面向胜利返航的我人民海军舰艇部队招手、欢呼，一面勇猛地追歼跳海的逃敌。厦门地区的一条机帆渔船顶风劈浪，冲在最前头，一个久经对敌斗争锻炼的老渔民，挺立在船头上，用锐利的眼睛观察着海面。一会儿，他突然发现一个黑点在浮动，便断定是企图跳海逃窜的敌人，马上报告姓阮的船老，立即机灵地掌稳着舵，并鼓励轮机手加大马力紧追上去，“抓活的！”船很快靠近了这个黑点，清楚地看到原来正是一群落水蒋军爬挤在一个小救生筏上，妄想逃命。

渔民看到了敌人就放声喊话：“你们逃不了啦，快投降吧！”“缴枪不杀，宽待俘虏！”这时姓阮的渔老和渔民阮亚空马上一个箭步从船上跳到捕鱼用的小竹筏。他们驾驶这个小竹筏破浪前进，真是急如风，猛如虎，首先逼近敌人。龟缩在一起的5个敌人，有的负了伤，血迹满身；有的慌张跳海时跌伤了腿；有的光着半截身子狼狈不堪……。这些蒋军一见渔民冲到前面，吓得浑身打颤，只是哀求说：“长官，饶了我们吧！”另一个一边臂膀负了重伤的蒋军高举着一只手战战兢兢地说：“渴坏了，给我一点水喝吧！”

渔民们根据我军优待俘虏的宽大政策，把他们抓到渔船上送回大陆后，马上给他们吃饭，换上了干净的衣服。负了伤的还送进医院治疗。

海军舰艇部队举行庆功大会

“8·6”海战结束的当天，新华社发表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林彪颁发的嘉奖令，表扬当天凌晨在东南沿海前线连续击沉美制蒋舰两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部队。

嘉奖令说，8月6日凌晨，海军连续击沉了美制蒋帮大型猎潜舰“剑门”号和小型猎潜舰“章江”号。这一仗打得坚决，打得干脆，打得漂亮，是近几年来海上作战最大的一次胜利。你们的胜利，是对蒋帮的一次沉重的打击和有利的惩罚，也是对美帝国主义加紧向我进行军事挑衅和猖狂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行为的严重警告。嘉奖令说，这次胜利，是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中央、军委指示，加强战备，发挥我军近战夜战优良战斗

作风所取得的显著成果。

嘉奖令说，近来，蒋帮配合美帝国主义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活动，加紧了对我东南沿海的袭扰破坏，并且叫嚣要“反攻大陆”。希望你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保持常备不懈的战斗姿态，认真总结经验，切实做好各项战备工作，进一步加强护渔护航，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的胜利。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把来犯之敌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掉》的社论，摘要如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6日凌晨在广东省南澳岛和福建省东山岛附近地面，胜利地击沉了窜扰我东南沿海的美制蒋帮军舰两艘。我们热烈祝贺海军部队取得的这一巨大胜利，并向参加这次战斗的全体指战员表示衷心的慰问和崇高的敬意。

这是一场漂亮的海上歼灭战。捍卫着我国东南海防的海军舰艇部队，说打就打、打得快、打得准、打得狠、打得利落，一个回合就把来犯的敌人连人带舰地打个片甲不留。这个胜利充分显示了我人民海军高度的作战水平和勇猛、果敢、迅速、顽强的战斗作风。这是人民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不断提高全体指战员阶级觉悟的结果；也是我人民解放军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的结果。我们有了这样的人民军队，就一定能够击败一切来犯的敌人，不管他们从空中来，从海上来，还是从陆上来。

我海军部队的这一胜利，是对蒋帮又一次严厉的惩罚。蒋帮不仅一直派遣美制军用飞机窜扰我大陆，而且不断出动美制舰艇对我沿海地区进行骚扰和破坏，危害我渔民生产，威胁海上航运。这种海盗活动最近更是猖獗。我海军部队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和安全，给予蒋帮以狠狠的打击，这是完全应该的。

我海军部队的这一胜利，也是对美帝国主义的一次有力的警告。不用说，蒋帮近来加强对大陆的骚扰和破坏活动，是受美帝国主义唆使的。据美国报刊透露，约翰逊政府打算利用蒋帮窜扰我国大陆来配合它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计划。美国的高级军政官员最近一个时期频繁地到台湾活动。在华盛顿的怂恿下，蒋帮的头目纷纷叫嚷着要“反攻大陆”、“开辟第二战场”。在南越战场被打得焦头烂额的约翰逊政府显然想在蒋帮的身上打主意，用它来作为一枚过河卒子，为美国的扩大战争计划效劳。这表明美帝国主义已到了“病笃乱投医”的地步了。

人们知道，约翰逊政府最近正在侵越战争中加快升级，大量增兵南越，准备打一场朝鲜式的战争。美国的宣传机器公开鼓吹要同中国人民较量一番。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已经不止一次地警告过美国侵略者，我们是作好了准备的，如果美帝国主义低估中国人民的力量和决心，硬要把战争扩大到中国人民的头上，严阵以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奉陪到底。美帝国主义不论是指派它的喽罗上门，还是它亲自出马，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都一定

把来犯之敌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掉！

1965年8月12日，击沉“剑门”、“章江”号的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部队，下午在东南沿海某地隆重举行庆功授奖大会，表扬在战斗中有功单位和有功人员，勉励全军指战员再接再厉，在保卫祖国领海，加强护渔护航的斗争中，为人民创建更大的功勋。

会场布置得庄严隆重，四周悬挂着“向参战有功的同志们致敬”等巨幅标语。墙上张贴着来自各地的贺信和慰问信，充满着胜利的气氛。

参加今天庆功授奖大会的，有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广州部队首长郭成柱、广东省副省长李嘉人，南海舰队首长吴瑞林、方正平，以及驻地陆军、空军的领导干部和当地的党、政负责人等1600多人。在这次海战之后，迅速赶往战区勇敢捕捉逃敌的福建厦门地区的民兵代表，也来到海军驻地参加庆功授奖活动。

会上，李作鹏副司令员宣读了国防部长林彪的嘉奖令。郭成柱代表中共中央中南局致贺词，并代表广州部队领导机关向参战部队授奖旗。

在立功受奖的人员中，有历次战斗中荣立战功的指挥员，有新提拔起来的青年干部；有超期服役的老战士，也有入伍半年多的新水兵，其中有艇长、指导员、炮长、航海兵、机电兵、译电员等各方面的指战员。他们在各个战斗岗位上，为保证战斗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李作鹏副司令员首先在大会上讲话。他代表海军党委，海军首长和海军领导机关向参战的全体指战员，向荣立战功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致亲切的慰问和热烈祝贺。他说，这次胜利是近年来我海上作战的一次最大胜利。这次胜利再一次证明了，只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不怕牺牲，就能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所向无敌。李作鹏强烈谴责了美国在疯狂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同时，加紧对我国进行的军事挑衅。他要求参战的舰艇部队，保持高度的警惕，认真总结战斗经验，把战备工作做得好上加好，随时准备消灭敢于来犯之敌，争取更大的胜利。

广州部队首长郭成柱接着讲话，他向荣立战功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表示热烈祝贺。他说，这次战斗的胜利证明：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不仅在小米加步枪的战争年代里指导我们由胜利走向胜利，在有了现代化装备的今天，更是我们作战行动的指针，只要正确掌握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就不管在陆地，在空中，还是在海上，都可以打胜仗。

广东省副省长李嘉人和来自海防前线各地的代表在会上讲话时，热烈赞扬英雄的海军部队在保卫海防、护渔护航的斗争中取得的重大胜利。他们表示，今后一定同全国人民一道，做解放军的后盾，以加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行动，支援子弟兵，做到要什么支援什么，要多少支援多少。

同这支英雄海军部队并肩守卫在海防线上的陆军部队的代表王淳，空军

部队的代表张磊，在讲话中热烈祝贺海军战友们取得的光辉胜利。他们一致表示，学习海军舰艇部队百倍警惕、常备不懈、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加强战备，随时准备消灭来犯的敌人。

在南海舰队首长吴瑞林讲话之后，立功受奖的单位和指战员的代表在热烈的掌声中开始讲话。荣立一等功的某艇艇长许水江在会上说：这次海战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各级领导正确指挥，地方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大力支持，兄弟部队密切配合的结果。党和人民给了我们很高的荣誉，这是对我们的鼓舞和鞭策。我们一定认真总结战斗经验，进一步发扬我军敢于近战夜战、敢于刺刀见红的革命精神，把各项战备工作做得更加充分，更加扎实，用新的胜利回答党和人民的关怀。

港英当局把 4 名蒋军人员送往台湾

1965 年 8 月 26 日下午，我外交部西欧司副司胡叔度召见英国代办处临时代办卫孚，就香港英国当局把从被我击沉的蒋军舰“剑门”号、“章江”号逃跑的 4 名蒋军事人员送往台湾事，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警告。

胡叔度副司长在谈话中首先指出，8 月 6 日，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的美制军舰两艘，向我广东省和福建省沿海一带窜扰，当即被我海军部队击沉；舰上部分蒋介石集团的军事人员从海上逃跑，其中有 4 名被挪威商船海顺号于 8 月 8 日载至香港，香港英国当局即于当晚把他们送往台湾。

胡叔度副司长接着严正指出：“最近蒋介石集团军舰对我东南沿海进行窜扰，是在美国政府加紧向我国进行军事挑衅和猖狂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情况下进行的。上述 4 名蒋介石集团军事人员，是在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军部队作战时逃跑的。香港英国当局有责任拘留这些被带至香港的蒋介石集团军事人员，并把他们交给中国政府处理。但是，香港英国当局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迫不及待地把他们送交台湾蒋介石集团。这是对美国和蒋介石集团在中国沿海进行骚扰破坏活动的明显支持。我们对此绝对不能容忍。中国政府就此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警告。

社报著文赞功臣

海军舰艇部队举行完庆功大会后，新华社及解放军报等新闻单位，连续介绍了在战斗中立功的官兵们。现摘录其中数篇，以补充展现战斗的实况。

钢铁水兵姜宜资

战斗快打响了。姜宜资接到了开炮的命令，他立刻指挥着艇上的火炮和兄弟舰艇一起开火，霎时间无数的炮弹倾泻到敌艇上，敌舰“章江”号指挥

台被打得冒起了团团烈火。这时敌舰还在垂死挣扎，疯狂向我射击，姜宜资勇敢沉着，在敌人的炮火下，不停地给瞄准手指示目标，指挥射击。并高声命令炮手：“快打呀，快叫这个家伙喂鲨鱼去！”当打得正激烈的时候，左炮弹药不够用了，他一边命令装填手运炮弹，一边跑向左炮接替装填手的岗位。突然飞来块弹片，他的左腿负了伤，感到一阵剧痛。二号炮手李向宏见他身子一歪，连忙问道：“班长，你挂花了吗？”姜宜资忙答道：“没有！”他咬紧牙关，不让战友知道他受了伤，并且一个箭步跳上了左炮的战位，双手一下托起了沉重的弹夹，咔嚓一声，把炮弹装进炮膛，拉大嗓门喊道：“打！”大炮不停地轰击敌舰。姜宜资忍着剧痛；一边装弹，一边观察着敌舰上的弹着点，及时准确地指挥射击。当他连续装了几百发炮弹以后，伤口痛得厉害，觉得左腿越来越吃不住劲。但他暗暗地下定决心：“挺住，一定要挺住！”他把右脚使劲蹬住护板，接着又将身体的重心挪过去，顿时便觉得身子轻了些，手也突然增大了劲，大炮更猛烈地吼叫起来，不一会，敌舰“章江”号便葬身海底。

打沉“章江”号敌舰后，姜宜资又不顾疲劳地作好新的战斗准备。他立即和全班战士一起擦炮，清理炮位上的弹壳，搬运炮弹。他想到敌人的“剑门”号还没有歼灭，一场更激烈的战斗还在后头，一切疼痛都被忍受下来，他一再提醒自己：“坚持！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胜利！”

接着，敌舰“剑门”号又被我军舰艇团团围住，一场更大的歼灭战开始了。在这最后的激战时刻，姜宜资的伤口痛得更加厉害，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忍住阵阵的剧疼，挺立在战位上，沉着准确地指挥着火炮，英勇顽强地消灭敌人。他愈打愈猛，一直坚持到击沉敌舰“剑门”号，这位无坚不摧的钢铁水兵，才离开战位。他怀着无限胜利的喜悦，和英雄的水兵一道凯旋。

炮班班长陈乐华 带领新兵揍“章江”

战艇穿过夜雾，冲破海浪，向敌舰疾驶。炮班班长陈乐华严守在战位上，准备狠狠惩罚胆敢来犯的敌人。

陈乐华看了看身旁的3个伙伴：上艇不到一年的新同志单技存、单国友，6个月前才由距离手改成瞄准手的高长才。这3个小伙子非常机警，看样子准是个海上好猎手。陈乐华满怀信心地鼓励他们说：“我们前两天才学过《为人民服务》，现在正是为人民效力、为祖国立功的时候。只要沉着勇敢，就能消灭敌人，完成任务。”两个新战士在他的热情鼓舞下，向他保证：“我们穿军装时间虽短，勇气可不短，班长挺着胸膛打，我们决不缩着脖子供弹。”

战斗打响，陈乐华打右炮，高长才打左炮。敌人的炮弹从头顶呼啸着掠过，新战士勇敢地完成着供弹任务。这时，高长才还击心切，一脚踩下击发装置，打了好几个连发。炮弹拖着亮尾巴，在敌舰左右前后猛烈的爆炸。陈

乐华马上命令他：“打点射，注意节省弹药。”说话间，战艇绕到敌舰左舷，距离敌舰只有几百米。这是右炮发挥威力的好机会，陈乐华瞄准了一阵猛打，直打得敌舰后甲板起火。敌舰拼命顽抗，一发炮弹在战位上空炸开了花，弹片打得炮位的护板当当直响，陈乐华马上鼓励新同志：“不要怕，压住它，消灭敌人就能保存自己。”

随着话音，他们把更多的炮弹射向敌人。“章江”号中弹燃烧，在剧烈的爆炸声中沉入海底。

战士们欢呼胜利，又驾驭着战艇猛追企图逃遁的“剑门”号。

航海班长余昭玉 掌握航向追敌舰

航海班长余昭玉，劈开两腿站在战艇的操纵台前，两眼紧盯着前方兄弟艇微弱的尾灯灯光，努力保持着编队队形。

余昭玉根据指挥员的口令，根据前面兄弟艇的尾灯，准确地修正着航向。一阵激浪，打得艇首猛然一歪，他赶紧把紧操纵杆，修正航向。当他要检验方向是否正确，想看看舵角指示器时，指针已经死死地停住不动了。小伙子心里有点紧张，想向指挥员报告，但马上又稳下来。心想：不，不能打扰他，可别影响了他的指挥决心。于是，余昭玉开始全凭手上的感觉来操纵。他对于自己的感觉充满了信心，平常夜间训练时，不是专门关掉舵角指示器的照明苦练摸黑操纵吗？现在正用上这手功夫了。

护卫艇很快和美制蒋帮猎潜舰“章江”号打上了。敌人企图逃跑，艇队猛追。不一会，兄弟艇冲到前面去了，他们掉在后面，已经看不到兄弟艇的尾灯。余昭玉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看准艇首上空云缝里露出来的两颗星星，对着它修正航向。护卫艇又很快赶上兄弟艇，投入了激烈的战斗，为人民立下了战功。

报务班班长陈子文 联络畅通立战功

战斗打响了，指挥艇和指挥所的联系越来越频繁。报务班长陈子文戴着耳机，坐在工作台前一份一份地抄收着电报。

艇上实行了灯火管制，舷窗和门都关得严严的，舱室里热得闷人。陈子文的身上、脸上，不停地流着汗水，衣服湿得像刚从水里捞起来一样，但他根本没理会这些。

突然，响起了震耳的炮弹爆炸声。他知道战斗打响了，就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到两个耳朵上，努力从炮弹声和机器轰鸣声中，捕捉那微弱的滴滴……的声音，生怕漏掉一个信号，保证联得上。

战斗越来越激烈，收信机、扩音机和报话机都不能正常工作了。这时，陈子文又要捕捉信号、抄写电码、蹬马达，电压下降的时候，还要换电瓶和给电瓶充电。然而，不管怎样忙，他都不放过一个信号，把信号当作命令。

陈子文就这样冒着高温，在报房里紧张地工作着。从出航护渔到胜利返航，陈子文一直在报房工作了13个多小时，收发报100多份，全无差错，荣立一等功。

舰艇的“眼睛”

在海军某部击沉蒋“剑门”号和“章江”号的庆功会上，有两位远道赶来的客人，水兵们谁也不认识他们。可是，在整个战斗过程中，水兵们都怀着感激的心情，念叨着他们。他们就是在此次战斗中，荣立集体二等功的某观通站的两位代表。

夜雾弥漫的渔场，情况真是瞬息万变。敌舰、我舰、商船、渔船。前前后后，多达几十批、近百艘。船艇穿来穿去，时离时合，时隐时现。只要稍一马虎，把目标弄混了，就会贻误战机，甚至发生意外。

突然，上级查问：××距离、××方位是敌舰还是我舰？这个目标和“章江”号在萤光屏上的回波几乎一模一样，没有一双慧眼是很难分辨清楚的。五好战士、雷达兵王永明根据这个艇的活动规律，毫不迟疑地回答：这是我艇。××方位的目标是“章江”号。在雷达兵的准确引导下，刹时间，我艇和敌舰的回波交织在一起，走马灯似地搏斗起来。在这种复杂情况下，王永明仍然胸有成竹地掌握着敌舰和我艇的情况、方位、距离，及时地向上级报告。

“××方位，××距离，目标消失。”——“章江”号被我打沉了。躲在一旁的“剑门”号，借着夜雾的掩护，拼命向东南方向逃跑。我艇和敌舰的距离开始拉远了。“加速，加速！追上去，追上去！”雷达兵们心里不断为我艇队加油。雷达兵们从萤光屏上看到，我艇队已追上了敌舰，大家格外地高兴：“近了，更近了！”一刹时，又见被我艇队紧紧咬住的那个亮点，突然跳动了几下，就在萤光屏上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剑门”号的复没。

“剑门号、章江号都被我们打沉啦！打沉啦！”这时，指导员徐锡友才发觉，从昨晚到凌晨，他们一连干了10多个小时，汗水淋漓的军装，竟拧得出水来了。

机电班长尤金山 奋不顾身保水源

机舱里响着震耳的马达声，护卫艇矫健地冲破夜雾，劈波破浪，向前疾驰。

机电班长尤金山一刻也没有忘记出航前指导员徐寿祺说的话：“为了替渔民兄弟报仇除害，决不能让敌人逃掉！”尤金山拿着手电筒，揭开一块又一块的地板，钻到一个个角落里，反复检查油量、水量和管路阀门。

突然，艇身剧烈地颤抖了几下，尤金山兴奋地喊叫起来：“开炮啦！”他一边激动地数着发射的炮弹，一边及时地向炮位输送淡水，冷却炮管。忽然，一股热水射到他的腿上，他转身弯腰一看，水管的卡箍震裂了，淡水猛烈地喷出来。他心里一急，若是淡水漏光了，机器和炮管就无法冷却，战艇就要失去战斗力。他用手电筒光在空中划了一个圆圈，向战友们发出信号，接着就毫不犹豫地扑到淡水管上。尽管水温高达80多度，也决不撒手。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拼命也得把淡水保住。”

后机舱里的轮机兵看见信号立即起来，用胶布包住了裂口。尤金山擦了擦汗水，发现手上烫起了好几个大泡，但他仍然坚持检查和维护各个部件。

马达在轰鸣，炮艇在前进。站在驾驶台上的石天定艇长，满意地夸奖轮机班干得十分出色！

被俘蒋军受到宽大待遇

被俘蒋军海军官兵揭露，美国正在加紧武装和控制蒋海军，唆使蒋加紧对我沿海地区进行骚扰破坏活动。

被俘蒋军海军官兵说，美国继1965年4月武装台湾大型猎潜舰“剑门”号之后，又把一艘与“剑门”号同样型号的“居庸”号“送”给台湾当局。“剑门”号在开往台湾之前，美国专门改装了舰上的装备，增加了火炮和其它武器。被俘蒋军海军中校参谋黄致君说，美国武装大型军舰的同时，还把一批可以在浅海活动的小型舰艇“送”给台湾当局，加强对我沿海进行骚扰破坏活动的力量。黄致君说，蒋前海军“总司令”刘广凯曾透露，美还将用一批专门配合这些舰艇在海上活动的飞机武装蒋海军。

美国在武装蒋军舰的同时，加强了对蒋海军人员的训练。被俘蒋军海军官兵说，近年来，蒋海军人员在美国军事学校受训的连续不断，受训时间有的两个月、3个月，有的长达一年、两年。当时单在美国西雅图海军基地受训的就有数十名。不久又有一批蒋海军人员前往美国军事学校受训。据从美国受训回来不久的被俘蒋军“剑门”号下士陈考善说，他1965年第一季度和近百名蒋海军官兵在美国西部太平洋沿岸圣地亚哥海军基地受训时，从衣食住行到训练内容，都是由美国一手安排的。他们先分别在枪炮、鱼雷、反潜艇等专业军事学校进行陆上训练，然后出海进行海上训练，所有训练课目都是在美国军事人员直接指挥下进行的。

被俘蒋军海军人员还谈到美国步步加紧控制蒋海军情况。他们说，目前蒋军海军中美国军事“顾问”五花八门，名目众多，有反潜艇“顾问”、枪炮“顾问”、两栖作战“顾问”、水雷“顾问”、通讯“顾问”、电子“顾

问”、轮机“顾问”、物质“顾问”等，多达十几种。蒋军海军的一切活动，从日常训练、海上演习直到对我大陆沿海地区进行骚扰破坏，都是在美国“顾问”策划和批准下进行的，连舰艇上更换一个机器配件，也都要得到美国“顾问”的允许。有些美国中士、上士“顾问”，连蒋军海军将校级军官都不放在眼里。但是，蒋军士兵和下级军官大都不愿为美蒋卖命，对美国“顾问”的控制十分不满，当面叫“顾问先生”，转身就骂他们“美国佬”，“洋鬼子”。

被我沿海军民捞救俘获台“剑门”、“章江”号官兵，受到宽大待遇，其中负伤人员被立即送到医院抢救和治疗。

在这次海战中，由于敌舰“剑门”号和“章江”号中弹沉没非常迅速，因此，被俘的蒋帮海军官兵弃舰逃生时都非常狼狈。许多蒋帮海军官兵被我沿海军民捞起俘获时，身上仅穿一条裤衩。对于这些身无衣物的被俘蒋军官兵，中国人民解放军及时发给他们衣服和日用品等。担任抢救和治疗蒋军伤病员的医院，根据他们的伤情，分别给他们进行输血、输液、取出弹片、注射抗菌素等各种手术和药物治疗。有一些被俘蒋军海军官兵患有肺结核、胃病、风湿性关节炎等慢性病，在台湾时得不到治疗，被俘后也都受到照顾。一个年青的俘虏看到我军人员给他包扎伤口、发给他衣物时，感动地说：“你们真好。”

当他们谈起遭到我舰艇围攻的情景时，十分庆幸自己跳海逃得快、没有为美蒋白白送命。他们说，解放军舰艇实在来得太突然，太勇猛了，炮火太厉害了。还没有等他们弄清情况，炮弹就劈头盖脑地砸了过来。如果逃跑稍慢一点，早就随舰尸沉海底，葬身鱼腹了。

“章江”号被俘人员说，当他们发现被解放军舰艇包围的时候，指挥台上已弹如雨下，接着，油柜起火，弹舱爆炸，倾刻间舰体就沉没了。“剑门”号被俘海军中士梁可能谈到，在“剑门”号上指挥这次窜扰活动的蒋军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海军少将胡嘉恒，没来得及下令还击，就被一顿炮弹打倒在指挥台上“哎呀哎呀”直嚎。这时，全舰乱了套，人人拼命抢救生器材，各自跳海逃命。梁可能说：“当时，只觉得一切都完啦，没想到还能逃出一条活命，真是万幸！”

当记者告诉他们，现在台湾正在“歌颂”你们在“弹药告罄”的情况下“下令自沉”，两舰官兵已“与舰共存亡”，并吹嘘什么在战斗中击沉了我军军舰5艘，击伤4艘，“取得了巨大胜利”。这些被俘的蒋军人员听后都表现出哭笑不得的神色。有的说，活见鬼，活见鬼，谁“与舰共存亡”？要是“与舰共存亡”，我们还怎么能回到大陆受到宽大待遇呢？有的说，自己被人家消灭了，没有碰伤人家一条舰艇，还说打了胜仗，乱吹牛皮，真是丢人！

一个月后，有关单位还安排他们参观了人民公社和工厂。

参观中，人民公社社员、原蒋军19军45师士兵王克勤告诉被俘蒋军海

军人员，他是 1953 年窜扰东山岛时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的。人民政府宽待被俘人员，根据他的要求，让他回原籍参加生产。几年来，他用劳动所得盖了房子、买了家具，还结了婚，现在有一个孩子，全家生活过得很愉快。因为他劳动积极，还几次受到公社，大队的表扬和奖励。被俘蒋军人员听了都很感动，“剑门”号被俘蒋军士兵李明说，他本来对人民政府宽待俘虏政策还有些怀疑，为自己的前途和出路担忧，听了王克勤的介绍，顾虑打消了，认识到自己只要好好改造，努力生产，为人民服务，前途同样是光明的。

在工厂参观时，被俘蒋军海军人员看到厂里使用的机器都是国产的，产品远销国外十几个国家，都很高兴。他们说，在台湾，重要工业都操纵在美国手中，工厂用的机器几乎全部是外国制造的。解放以来新中国的变化真是太大了。

被俘蒋海军“剑门”号舰长王韬山 11 月 25 日在广州与从南京家乡赶来的老母、妹妹团聚。

母子兄妹叙离情，话家常。71 岁的老母告诉儿子，16 年来祖国和故乡翻天覆地的变化，家里的生活一天好过一天，自己还当了居民委员会的调解委员；老人家再三训诫儿子，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妹妹瑞华告诉哥哥，王家从来没有人上过大学，而在新社会她念完大学，有了工作和两个孩子的美满小家庭。王韬山不胜感慨地说：“我在台湾时听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和各式各样的谣言，担心在大陆的家属会遭到迫害，谁知事实恰恰相反，现在亲人们在祖国大陆生活都很好。我是一个有罪的人，反蒙政府宽待，过去为美蒋反动派卖命是多么可耻！今后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听娘的话，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在广州的这些日子里，母子 3 人畅游羊城，王锡山的老母还跟被俘受到宽大待遇的蒋帮海军“剑门”号、“章江”号官兵会见。

第二舰队部中校作战官黄致君，在被俘 3 个月后给台湾蒋海军老同事写了这样一封信：

国民党海军巡防第二舰队部的老同事们：

我被俘已经 3 个月了，现在跟各位谈谈我这段时间的感受。

8 月 6 日的海战中，“剑门”号和“章江”号被人民解放军击沉后，我在海上被俘了。当时我十分恐惧，我想也许要在“集中营”里度此残生了，这辈子完了。但是，事实证明，我的想法错了。

记得我被俘的时候，我的手表因表带断了，落在甲板上，一位人民海军战士拣起来，交给了我。我说手表不要了，送给你吧。他摇摇头，说解放军宽待俘虏，私人财物是不没收的。当时，我觉得有点奇怪，世界上居然还有不贪财物的人！

我因负伤被送进医院，起初，我的疑惧也是很大的：会不会给我真治疗？是不是要拿我当试验品？事实作了有力的回答。经过医生护士近一个月的医

治护理，我完全复原了。在治伤期间，医护人员诚恳和负责的态度，使人感动万分！

我们到了广州，参观了6个工厂，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流溪河水库、华南植物园、广州动物园、黄花岗72烈士陵园、水上居民新村等，还观看了光辉的国庆典礼。每一次参观，都使我感到非常新奇和惊讶。短短的16年，祖国居然进步这么大，发展这么快。许多事情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我是绝对不相信的。通过参观访问使我对大陆、对祖国开始有了比较多的了解，同时又使我惊奇，是什么力量，使沉睡了长年的中华民族，又重新站立了起来。

过去在台湾，我们都以为留在祖国大陆的家人都过着“悲惨”的生活。可是，事实也完全不是那样。大陆籍的被俘人员已与家庭取得了联络，家属生活都很好，大家都有工作，许多60岁以上的老人都在家乡安度晚年，我的母亲已经70多岁了，住在长沙，身体很健康。我姐姐黄柔济，在湖南安化当小学教员；哥哥黄一君，在湖南武岗当技术员；弟弟黄又谊，在武汉华中工学院当助教；他们并没有因为我当了国民党海军军官受到任何歧视。

时间真快，转眼3个月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以前的顾虑和疑问，也逐渐消除了。现在，我充满了喜悦的心情，准备迎接美好的未来。

最后，祝各位老同事健康快乐！

你们的老同事黄致君

1965年11月30日

1966年春，被我击沉的美制蒋舰“剑门”号和“章江”号上的33名落水被俘的蒋海军人员，被全部释放。

被释放的33名原蒋帮海军人员中，有原“剑门”号中校舰长王韞山，原蒋海军巡防第二舰队中校作战官黄致君，原蒋海军通信研究室少校侦测长柯德辉，原“章江”号中尉轮机官李德纲，以及徐长庚、李荣村等29名“剑门”号和“章江”号的蒋帮海军士兵。

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根据我军一贯宽待俘虏的政策，决定将上述被俘蒋海军人员全部释放，资遣回家，给以生活出路。对于家在台湾省、本人又愿意回去的李德纲、李荣村等11名原蒋海军人员，本着革命人道主义精神，释放他们回台湾与家人团聚。

中央领导接见参战代表

1965年8月17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彭真、贺龙、李先念、谭震林、陈伯达、康生、薄一波、罗瑞卿、杨尚昆等，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海战代表孔照年，徐寿祺等官兵，

并同他们一一握手，合影留念。

同一天，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再次接见了“8·6”海战有功单位、有功人员代表孔照年、徐寿祺等同志。代表们汇报了击沉敌舰的战斗情况。

周恩来听了十分高兴，他向参战人员表示亲切慰问，并赞扬他们说，打得好，打得坚决，发扬了英勇顽强精神，运用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陪同接见的有海军首长张爱萍、徐玄清、萧向荣、王宏坤、张学恩、张秀川等。

下面是谈话记录摘要：

周总理，（问孔照年）你是哪里人？

孔照年：山东平阴人。

周总理，什么时候到海军的？

孔照年：1952年到海军的。

周总理：这次是哪些艇打的？

孔照年：有587艇，598艇……

周总理：你说这些我也记不住，你告诉我什么型号的？

孔照年：高速护卫艇4艘，快艇第一突击群6条，第二突击群是5条。

周总理：第一次虽然没有打上，但给第二次创造了条件，也要表扬。不要打好了仗就表扬，打不好就批评，主要是总结经验。海军获全胜是第一次。第一次没打中，不是打在小岛上了吗？近战、夜战犯点错误是难免的，第二次不是就打好了吗？罗总长：高速炮艇是我们自己造的，吨位小速度快。近海作战，我们以小的、快的，整他的大的，行不行？

孔照年：完全可以。

周总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嘛！我们总是以小的打大的，围住了消灭它。在海南岛打鬼怪式飞机不也是这样吗？

张主任（海军政治部）：那一次如果准许打，能打下一两架。

周总理：它自己把自己的打下来是一样的。

（稍停）

周总理：空军、海军都是这样，开始总是以小的打大的，以弱的打强的。美国这么多兵力放在越南；运输、补给困难，像死的一样。今天《人民日报》登了，你们回去看一看。

罗总长：三军比起来，你们的战机最多，要抓住战机。

周总理：不是每一次来都打，要有理有利。打起来不要急，要近战、夜战、群战，把敌人分隔开，先歼灭弱的，先打小的，后打中的，孤立大的、强的。……

周总理：这次不是有一个轮机兵，头部负了重伤，看不见，还坚持把艇

开回来。现在怎么样啊？

孔照年：还昏迷不醒。

周总理：一定要抢救。你们回去，向伤病员、牺牲的同志的亲属，转达党中央、毛主席对他们的问候。

庆祝我人民海军舰艇部队一举击沉美制蒋“剑门”、“章江”号军舰的活动，八一电影制片厂还拍制了纪录片。

影片以“欢呼海上歼灭战”为题，纪录了我海军舰艇部队在击沉了美制蒋帮猎潜舰“剑门”号和“章江”号以后，全部安全返航，受到东南沿海某地军民热烈欢迎，共同庆祝这一重大胜利的各个场面。影片还纪录了我人民海军部队在庆祝胜利的同时，派出舰艇巡逻在祖国的海疆，保卫渔业生产，准备随时消灭敢于来犯的敌人。

“8·6”海战之后，蒋介石不得不召开特别联席会议，提出了撤销刘广凯“海军总司令”职务的议案。虽有美国军事顾问为刘广凯出面说情，但会议仍以压倒多数通过了议案。

自从万山海战之后，台湾当局的官员们一直认为“海军总司令”是“倒霉的差使”，桂永清易位刘广凯，换来换去，没寻到一个能扭转乾坤之人，连美国军事顾问都不无感慨之词：台湾海军尚未走上鼎盛便开始衰落，目前已不能与大陆海军匹敌。当务之急不是发展舰艇，而是改变策略。

第三节 崇武海战

两艘“永”字号驶出马公岛

1965年11月13日深夜，台湾海峡夜黑天寒，风大浪高。经常伙同蒋其他军舰袭扰我东南沿海渔场的美制蒋护航炮舰“永昌”号和大型猎潜舰“永泰”号，借着夜幕掩护，又偷偷摸摸窜入我福建省崇武以东渔场行凶作恶来了。

“永昌”号护航炮舰（舰号61）原系美国“可钦”级舰队扫雷舰，舰号AM287，1944年下水，1948年由美国交给台湾，改为护航炮舰。舰的标准排水量为650吨，满载945吨，航速10至14.5节（每小时航行的速度单位——一节等于1海里，即1.852公里）。舰上装备有76.2毫米高平两用炮两门，40毫米炮4门，20毫米炮6门。

“永泰”号大型猎潜舰（舰号62）原系美国护航驱潜舰，舰号PCE864，1942年下水，1946年由美国交给台湾，改为大型猎潜舰。舰的标准排水量为640吨，满载903吨，航速12至17节。舰上装备有76.2毫米高平两用炮两门，40毫米炮4门，20毫米炮6门。

这两艘“永”字号舰，属国民党海军南区巡逻支队，是当天下午13点20分从澎湖列岛的“马公”隐蔽起航的。

这次，“永”字号一启航，舰长就命令船上人员把舰上活动的东西固定好。一些有经验的老兵，便知道军舰又要开向大陆沿海了。

自8月6日我人民海军舰艇部队一举击沉美制蒋舰“剑门”号和“章江”号后，在蒋舰艇部队中引起巨大震动，怕死厌战的情绪急剧上升，士气更加低落。每次被派出海袭扰渔场，他们都提心吊胆，唯恐遇到强大的人民海军的打击，使他们落到同“剑门”号、“章江”号一样的下场。

“永”字号出海开向大陆沿海时，“剑门”号、“章江”号覆灭的情形又一次占据了蒋军的脑海。

他们中有的垂头丧气地一声不响：有的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有的用喝酒来壮胆；还有许多人把救生衣放在方便的地方，准备跳海逃命时用起来快一些。一个年仅22岁的台湾省籍的年青蒋帮海军士兵，最近刚刚订婚，心情更是沉重，睡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小声地对睡在他旁边的人说，“这下可要小心啦，要是遇到解放军舰艇打起来，就完了，回不了家啦！”

我舰艇编队星夜出海

“班长，发现两个新目标。”雷达兵孙亦龙报告。

班长茅汉明来到荧光屏前皱眉盯着那亮点，凭他经验判断：是蒋帮的舰艇。通过回波显示分析，他断定是“永”字号舰。“狗日的又来了！这回绝

不能放过它！”

大雾山观通站的敌情报告，很快传到海军东海舰队指挥所。

为打击敌人的袭扰活动，舰队首长经请示决定给予惩罚。

海军福建指挥所紧急会议召开了。

指挥官们对敌情作了分析。按“永泰”号编队的航速，预计23点左右可抵达乌丘。考虑到外海有美国两艘驱逐舰的游弋，而金门、马祖、东引等岛又停泊着国民党海军舰艇，于是将作战海区选在乌丘正南8海里处。决定以护卫艇（炮艇）6艘和鱼雷艇6艘组成突击编队，海坛水警区副司令魏垣武担任编队指挥员。

同时派护卫艇4艘进至崇武东南15海里处担任警戒和海上救援；再派3艘护卫艇至西洋岛以东海域佯动，以钳制东引的敌舰。

为了争取时间，指挥所一面向东海舰队和福州军区上报作战方案，一面果断地完将各参战部队向平潭娘宫集结。编队指挥员魏垣武艇靠艇的办法，召开作战会议，交代任务，进行战斗编组：

指挥艇：573 护卫艇。

第一突击群：573 艇、574 艇、576 艇、579 艇。

任务：攻击敌编队前导舰。

第二突击群：588 艇、589 艇。

任务：牵制敌编队殿后舰。

第三突击群：6 艘鱼雷艇。

任务：在护卫艇攻击之后，实施鱼雷攻击，发展胜利。

战争中关键问题就是时间。时间就是胜利。魏垣武非常清楚这一点。

当总参谋部还没批准作战方案前，一切不能等待。指挥所的指示跟他想法一样，一边航渡，一边等待上级命令。魏垣武登上指挥艇573艇的指挥台，下达了起航的命令。霎时港湾里机器隆隆，海水翻滚。

573艇打头，继而各护卫艇、鱼雷艇——离港，驶向黑沉沉的夜海。编队向东沙屿开去。

周恩来作了五点指示

茫茫的夜海上，两艘“永”字号军舰编队仍鬼鬼祟祟地向乌丘行进。

大雾山的雷达兵时刻盯着他们。每隔几分钟，他们就向指挥所报告海情。目标在我指挥所海图上蠕动。

魏垣武挺立在指挥台的挡风玻璃前，凝视着黑沉沉的海，两手不时下意识地摸摸胸前的望远镜。风呼呼刮着，头顶上的帆布天遮抖动有声，他那灰蓝色的确良军服也唿啦抖动。他的心既平静又不安，沉着又躁动。“要打好，

决不放过敌人。要冷静，沉着……”

他一面观察海面，一面思索青上级的指示和研究过的战斗方案。

他顺着指挥台的水密门而下，走到海图室，与副大队长李金华和业务长一起，对照海图上敌舰标图，进一步研究打法。报务兵不时传来电报。

指挥所命令：位于 576 艇的护卫艇大队长马干、政治委员龚定高为编队预备代理指挥员。第三突击群由鱼雷艇支队副参谋长张逸民指挥。

这种边行动边组织战斗的快速反应，为这次战斗赢得了时间。

战艇开到了东沙岛。

指挥所来电：总参谋部批准作战方案，并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 5 点指示：

要抓住战机，集中兵力先打一条；

要近战，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

组织准备工作要周密一些；

不要误打自己；天亮前撤出战斗。

周恩来的指示，无疑给全体参战官兵以极大的鼓舞。

22 点 16 分，编队由东沙岛出击。

海上猎手的“眼睛”

艇只像条蛟龙，冲破波浪向战区疾进。

雷达班长刘启明两眼闪着怒火，全神贯注地盯着萤光屏，警惕地搜索着目标。刘启明有一双被誉为海上猎手的“眼睛”。

但锐利的刀刃是磨出来的，刘启明的硬功夫是练出来的。雷达兵要完成作战任务，必须熟悉海区特点。为了这，他看呀，画呀，记呀！磨秃了多少支铅笔。海区里每块礁石都深深地刻进了他的脑海。他凭记忆就能迅速地画出一张详细的海区图。

每次出海，不管风浪多大，他都始终坚持苦练。一次炮艇出海训练，连续航行十多个小时，大伙都很疲劳，他一直坚持操作，眼睛盯着萤光屏，两手像个支架，平伸着扭住开关。他逐渐感到头晕脑胀，腰酸背麻，还不断地呕吐。可是他仍然抖擞精神，继续坚持。忽然，萤光屏上像撒了一把炒热的芝麻，黄色的光点闪闪烁烁。这种回波他过去从没发现过，后来弄清原来是一群浮在水面上的海鸥。他高兴极了，满身的疲劳都溜跑了。因为他又懂得了海鸥的回波在萤光屏上的形状。为了掌握回波的特点，训练中每当发现目标，他就跑到甲板上进行观察，在心里“登记”。几年来，这样一次又一次的“登记”，使他具备了判别目标的过硬功夫。现在当萤光屏上出现一条回波，不管是小似芝麻，还是大如蚕豆，他不仅能判定是商船还是礁石，如果是船只，还能告诉你有多大吨位。

有的港口，航道狭窄，暗礁遍布，沙滩多，海底浅，雷达要在这里进行导航，真是一个难攀的险峰。有的人一提这事就摇头，刘启明呢，却不相信有翻不过的高山。他结合训练，反复研究，终于研究出狭窄航道雷达导航的方法。

突然，一个模糊的、淡黄色的光点一闪。他把扫描线往上一压，亮度一增强，看清了两个小毛虫似的光点，一前一后，有节奏地闪动。根据目标的方位和运动规律，他不仅判断出是敌舰，而且识别出了舰型。他迅速地报告：

右舷三十度，××海里，“永字号”两艘。

“好！咬住它！别丢掉。”魏垣武在指挥台上向他喊。

“是！”

魏垣武命令各艇缩短距离，准备战斗。

我指挥艇中弹受伤

信号兵王树生头戴耳机，手持话筒，通过超短波报话机，倾听各艇的请示报告，又及时准确地把编队指挥员的命令传达下去。

舰艇在出击途中，突然遇到了礁石很多的航道。王树生根据指挥员的命令，引导舰艇绕过暗礁，胜利地冲向敌人。他的这手本领，完全是在平时一点一滴磨练出来的。1964年春节，部队执行巡逻任务时，正赶上刮起八级大风，艇只摇摆达到25度。王树生把这种环境当作是锻炼本领的大好机会。艇只在浪峰上颠簸前进，他胃里的饭水都吐尽了。别人劝他休息一下，他说：“平时不在大风浪里锻炼，战时怎能过得硬。”就这样，他利用海上执勤机会，坚持训练了11天，大大提高了适应海上生活的能力。

为了熟练掌握通信技能，王树生不知流了多少辛勤的汗水。他不是指挥员，却对战术原则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是参谋人员，却能快速准确地绘制作战海图。他还把沿海岛屿、港湾、礁石的名称和特点，抄在本子上，刻在脑海里。他认为，这些对完成通信任务，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参战前不久，在全大队考核中，他获得了通信比赛第一名；连续两年被评为一级技术能手。

艇队距敌舰越来越近了。

“护卫艇成右梯队！准备用右舷攻击。”魏垣武果断地命令道。

王树生向各艇复诵着命令。

魏垣武透过挡风玻璃，看到了两个黑乎乎的家伙。他知道，这时指战员们的全部精力集中在一个“打”字上。各艇的每门火炮都压满了炮弹，昂扬的炮管指向了敌舰，无数双仇恨的眼睛盯着迎面而来的魔影。火炮瞄准手已把瞄准镜的十字线对准了魔影，灵活的大脚作好了踏击发器的准备。

只等他魏垣武喊一声“打”字。

现在，他还不想喊。

他想起周恩来总理关于要近战的指示，根据他以往的经验，目前还不到最有效发挥我火炮威力的最佳距离。

还不到完全压倒敌人的有利时机。

他有海战夜战的经验。他曾在惊涛骇浪的黑夜，率领艇队，冒着敌人炮火，一举击沉了美制蒋舰“沧江”号；在祖国人民欢度春节的时候，他又指挥艇队，歼灭了渔民们恨之入骨的蒋炮艇“63号”。他为人民立下了多次战功。

他在战斗中的最大特点，就是沉着勇敢，敢于与敌人近战夜战，敢于与敌人“拼刺刀”。

现在，他沉住气，让战艇继续高速接敌。

此时，风呼海哮，浪花飞溅，官兵的心都如上了膛的炮弹，都在急切地等待着那一个字。

魔影越来越近。

敌我的距离愈来愈小。

他看到了敌舰的舰首，指挥台，炮塔……

他终于喊出了那个字：“打！”

信号兵王树生响亮地复诵了他的命令。

霎时，“轰”“轰”巨响，各艇几乎同时射击，无数条火龙直喷敌舰。

敌旗舰“永泰”号一下子就被打懵了，开始打转转。他们不知共军的战艇从哪里一下子冒出来的。

炮声隆隆，火光闪闪，一组组炸弹在敌舰上开了红花，在黑黑的夜幕下绚丽灿烂。

敌旗舰“永泰”号掉头就跑，直向乌丘方面逃窜。“永昌”号边逃边向我射击，炮弹在我指挥艇附近爆炸，激起一股股高高的水柱。

魏垣武稳立指挥台，聚精会神地指挥，不时下达着命令。王树声复诵着他的命令。

23点30分，敌舰窜到我指挥艇573艇右舷60度，距离5链。

魏垣武察觉情况不妙，指挥艇陷入两敌舰之间，处于被挨打的位置。当即命令指挥艇调整位置，转而向敌殿后舰攻击。中队政委苏同锦处于兴奋状态。在与敌舰交战前的那一刻，他站在指挥台左侧的大器材柜上，半截身子露在挡风玻璃板外面，不时叫道：“同志们沉住气，靠近了再打……”开火之后，他不时高兴得挥臂高呼：“打得好！就这样打！”还不忘提醒舵兵，“小顾把舵操稳，让火炮更好地发挥威力……”正当他兴奋得大叫“打得好！狠狠地打”的时候，一发炮弹呼啸飞来，在指挥台后侧炸响。弹片崩在小伙房的铁烟囱上，发出了一声奇异的怪响。悬在指挥台的雾钟，也响起叮当之声。一块弹片飞来，击中了苏同锦的头部。

他只是感到脑袋被什么撞了一下，一阵发木……

信号兵王树生发现政委从大器材柜上跌到指挥台地板上，赶忙抱起他，给他包扎。

他只说了声，“不要顾我，狠打……”就闭上了眼睛。与此同时，副大队长李金华当即牺牲。

操艇的副艇长尹希龙负伤倒下了……

魏垣武突然感到一股气流猛冲过来，弹片飞进了他的胸部、腹部、右眼……

他双手抓住罗径上的磁铁球，才没有倒下去。看到指挥台上倒下好几个人，操艇的尹希龙也负伤了，魏垣武对参谋刘松涛大声命令道：

“刘松涛，你来操艇！”

刘松涛没有立刻站到操艇位置。

“刘松涛……”魏垣武又叫。

刘松涛此时也受伤了。随着那声炸响，他只觉得头一震，好像头上在流血，他想伸出右手摸一摸，右手臂却不听使唤，怎么也抬不起来。他的右臂骨头都打断了。他用左手往头上一摸，钢盔打坏了，这才知道自己负了重伤。听到魏垣武在叫他，他尽最大努力，顽强地站了起来。

他走到了艇长操艇的位置。“我保证完成任务！”他向魏垣武说。

鱼雷快艇编队出击

海战仍在激烈进行，无数炮弹在两舷的水面上炸响，激起一个个水柱。炮弹的曳光穿行在敌我之间的海空上，飞来飞去，照得夜幕下的大海一片火红。

刘松涛忘记了自己的伤痛，沉着地操纵着战艇前进，攻击敌舰。

一排巨浪扑上指挥台，刘松涛伸出左手去抓挡风玻璃板上的格台时，一下子没抓住，打了个趔趄，就在他身子一晃的功夫，他才察觉右手的食指也被打断了，只连着肉皮，操作不方便。

他忍着疼，拽下了那食指。

这时，身旁的人才发现他负了伤，忙给他包扎。在海图室里搞海图作业的业务长，通过传声筒说：“我上去换你吧？”

“不！”刘松涛说，“我还行。”

这时，魏垣武胸部在流血，鲜血浸透了灰蓝的军装。战斗刚刚开始不久，自己就负了重伤，这是怎么说的。他心里烧着一团火。

“妈的，老子一定要击沉你们！”他心里骂道，“老子只要有一口气，就跟你们干到底！”战斗在紧张地进行。

信号兵报告：“快艇请示行动！”

魏垣武这时伤势已很重了，流血太多，头晕目眩，脚步虚浮。

他还是果断地下达了命令：“命令……快艇攻击！”指挥艇发出两发信

号弹，召唤鱼雷快艇进行攻击。

魏垣武晕倒在指挥台上。

“魏副司令，魏副司令……”信号兵王树生跑过来，扶起他，忙给他包扎。

大家才知道他受了伤，围拢过来。

魏垣武知道自己难以坚持了。

“快，告诉576艇马干、……龚定高，接替指挥……告诉他们，一定击沉敌舰！”

“是。”

王树生立即拿起话筒，呼喊576艇，并通告整个编队各艇。576没回话，他只好连连呼喊。

魏垣武又昏了过去。

当人们将他抬起，准备把他抬下艇长室时，他又醒了。“别把我抬下去，我就在这儿躺着……”他一手抓住了通往中舱的水密门。

人们只好把他放在指挥台上。他就躺在水密门旁。战艇一边吼着炮声，一边追击着敌舰。

鱼雷艇突击群指挥员、鱼雷艇第六支队副参谋长张逸民看到信号弹后，发出了立即命令各艇迅速展开，冲破“永昌”号舰火力网。实施鱼雷攻击。

第二组131、152号艇先后三次展开和进入战斗航向，并于第三次展开时发射鱼雷，由于“永昌”号转向规避而没有命中。张逸民当即改用集群多向的迂回围击战术，指挥4艇同时攻击。

14日0时30分，在第一组两艇佯攻的配合下，第三组145号艇进入战斗航向。

张逸民抓住战机下令：“单艇相继攻击！”。

145号艇冒着密集炮火，沉着地逼近“永昌”号至1.9链处，同时发射两枚鱼雷。“永昌”号尾部被击中一雷，当即失去机动能力，开始缓慢下沉。

鱼雷命中“永昌”号

573艇上的魏垣武从昏迷中醒来，直喊“快艇攻上去没有？指挥关系转移了没有？……”

他发现信号兵王树生也倒在他身旁附近，他就用脚蹬王树生。

王树生立即站起来，继续呼喊576艇。

在刚才一阵纷飞的炮火声中，王树生突然感到身体一震，耳机和话筒被震掉了。用手一摸右腿粘糊糊的，接下来才感到了剧痛。

他想起指挥关系还没转移给576，战时的通讯联络一刻也不能中断，他很快摸到了耳机和送话器，立刻戴上耳机，抓着话筒呼叫。

“576，576——”

在炮火的闪光中，他看见自己右裤管上被鲜血染红了一大片，手上的伤口血流不止，也把话筒染红了。

他忽地把右腿蜷曲起来，并用左腿紧紧压住右腿的伤口，防止流血过多。这时，一个大浪扑上了指挥台，冰冷的海水刺进他的伤口，他一声不吭，咬牙坚持着。

“576，576——”他继续喊叫。

576叫不通，他就叫别的艇，请他们转告576艇，联络总算沟通了。

在573艇和576艇没有转移指挥关系之前，由于指挥艇573艇的罗径损坏，战艇在黑暗中转向形成背敌航行。我军失去了连续攻击的机会。

负伤的“永泰”号旗舰一看有机可乘，便边打边逃，高速向乌丘屿而去。

14日0时40分，573艇上的魏垣武再次从昏迷中醒来，仍问“指挥关系转移了没有？快艇出击了没有。”“打中了，我们的鱼雷打中了！”信号兵洪度才告诉他。“好……”魏垣武脸上浮现出微笑，又昏了过去。中雷的敌舰并没有马上沉下去。敌人的炮火仍在轰鸣，做着垂死挣扎。

“猛虎艇”上的电影工作者

这时候，大队参谋长王克奇率第二突击群588艇、589艇，赶到战区，以猛烈的炮火向“永昌”号射击。加速了“永昌”号的下沉。

被誉为“猛虎艇”的588艇在以往的海战中屡建战功，早在1958年的夏天就已初显神威，和兄弟艇一起击沉了美制蒋舰“沱江”号，创造了小艇打大艇的范例。艇上的水兵个个都是铁打的水兵，他们单艇敢打，单入敢冲，刀山火海也敢闯。在1964年4月9日深夜，他们单艇出击，直插两敌战岛屿之间。狡猾的敌人想利用他们紧靠老窝、有炮火支援的有利条件，妄图乘隙偷袭，588艇急速扑了上去，敌艇一看不妙，慌忙调头转舵，向巢穴逃窜。指挥员一声令下“追击！”战艇像一把飞刀一下子插进敌占岛海湾水道。官兵们沉着勇猛，在“狼窝”里厮杀。前炮瞄准手戴学明、成志仁始终把敌艇套在瞄准镜的十字线上。轰轰轰，一组组炮弹落在敌艇上，敌艇很快着了火，弹药库也爆炸了。敌艇在夜海中沉没。等敌占岛上的敌人打开探照灯，在海面上搜索时，588艇已押着俘虏胜利返航。

今天的588艇更是大显神威，犹如猛虎，一发发炮弹曳光带火冲向敌舰，打得指挥台炮塔上的敌人乱作一团，鬼哭狼嚎。

在588艇上，有两位特殊的人物在为炮手们搬运炮弹。

有两位年轻的电影工作者。他们是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的宋崇和应福康。

宋崇和应福康是这年9月份来到福建前线部队深入生活和拍摄有关解放军生活的艺术性纪录片的。

11月13日晚，宋崇和应福康从外面工作回来，刚到码头，看见海军战

士们在紧张地进行战斗和起航的准备。他们立刻拉住一位战士问：“有什么情况吗？”

“有情况，马上起航！”一个战士回答。

他们二话没说，立即到码头驻地把摄影机、照明灯、电线等摄影工具搬到“猛虎艇”上。在航行中，他们迅速做好拍摄电影的准备。他们看到中队长走过来，就问道：“中队长，今天打仗的希望大不大？”

“你们要做好战斗准备！”中队长坚定地回答。

他们从中队长的语气和严峻的脸上，感到今天与往常不同，肯定要去打击敌人。他们立刻找到指导员秦卫邦，要求分配战斗任务。指导员说：“拍电影就是你们的任务。”应福康再三要求：“我们有两个人，力量有多多的。”指导员说：“战斗打响以后，你们力量有多多的话，宋崇同志就在前甲板搬运炮弹，应福康同志在后甲板搬运炮弹。”接受任务以后，两人立即在甲板上交换了意见。他们认为，拍摄战斗场面平时很难遇到，这次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战斗的真实情景记录下来，这是我们电影工作者的责任，也正是考验共青团员的时刻。应福康严肃地对宋崇说：“如果我牺牲了，你来接替我的工作。”宋崇说：“我一定完成这个任务！”

24岁的宋崇，今天，他第一次想到了生与死的问题。他想到自己的父母都是革命干部，自己是革命的后代，应该听党的话。现在，党要自己到部队来锻炼，在火线上锻炼，自己就应该像革命前辈那样为革命而英勇战斗。这时，应福康问他：“如果你牺牲了，有什么话需要向组织上讲？”宋崇说：“我正在申请入党，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了，希望党委追认我是为一名共产党员。”应福康说：“对，争取入党是我们共同的愿望，让我们好好干吧！”两人紧紧地握了手，分别奔向自己的战位。

海上风浪很大，船摇摆得很厉害，海浪不时地冲上甲板，打得战士们浑身透湿。但是战士们个个坚守战位，一动也不动。瞄准手坐在炮位上，睁大眼睛，警惕地注视着前方的海面。宋崇却吐得很厉害。枪炮班副班长葛毅给他送来两个苹果：“你吃吧，吃了以后可以更好地打击敌人！”宋崇拿到这两个苹果，感到一股深厚的友情。应福康也碰见了葛毅。葛毅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老应，我是跳帮组的组员，船靠近敌人以后，我就要跳到敌人船上去。应福康说：“你跳到哪里，我就拍摄到哪里。”葛毅说：“好，我一定抓几个俘虏给你看看。”解放军战士的这种革命英雄气概，给了两位年轻的电影工作者以极大的教育和鼓舞。

这时，广播器里传来了准备战斗的命令。副指导员戴学明来到宋崇面前，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现在，我们距敌舰只有x海里。在这次战斗中，让我们受到更好的锻炼。”宋崇激动他说：“在后方我是一个民兵，在前线我是一个战士。我一定要和战士们一起坚决消灭敌人。”指导员秦卫邦又来到他们的炮位面前，向他们传达了上级首长对这次战斗的指示，并且说：“我们不能辜负祖国和人民的希望，我们‘猛虎艇’是真是假，就要在战场上看

我们能不能杀出威风来。”接着他又问：“大家有没有消灭敌人的决心？”宋崇、应福康和战士们一起高喊：“有决心！”

炮艇接近敌人以后，敌人向我军开炮了，我方没有立即还击。直到逼近敌舰的时候，“猛虎艇”和其他兄弟艇才用猛烈的炮火向敌舰射击。这时，炮声震天，一片火海，宋崇和战士们一起紧张地在搬运炮弹。宋崇一边运弹，一边放大嗓子对炮手说：“你们狠狠打呀！要多少炮弹，我们就运多少。”这时，船摇晃得更厉害了，人站不住，大家就扑在甲板上传递炮弹。宋崇还不顾炮口喷出的烫人的火星，不顾震耳欲聋的炮声，站在炮身下把空炮弹夹抬起来，传到舱底下再进行装弹。

这时，应福康站在后甲板上，两手高举摄影机，拍摄我战士英勇杀敌、敌舰中弹起火下沉等情景。船摇晃得更凶了，海水把摄影机打湿，摄影机走了电，应福康的手麻得发痛，但他还是挺立在甲板上，坚持把这些海战场面拍了下来。

“永昌”号沉没于乌丘以南海域

敌舰被我战艇团团包围了。

包围圈由大慢慢缩小。

至敌舰 100 米时，不少炮艇向敌舰水线部位射击穿甲弹。

敌舰下沉加速。

敌舰舰尾沉入水中，舰首跷起，像是庞大的怪兽绝望地张着大口仰望夜空。

敌海军官兵纷纷跳水，有的穿救生衣，有的往海里扔救生圈。

14 日 1 时 6 分，敌舰“永昌”号沉没于乌丘以南 15.5 海里处。

我海军官兵停止炮击，开始抓捞俘虏。

这时，在 588 艇上的年轻摄影师应福康，站在后甲板，一面把摄影机抱在怀里，一面握着冲锋枪，搜索海面上的敌人。突然，他发现炮艇的前方，有一个黑忽忽的家伙，他立即用冲锋枪对着海上的俘虏，和大家一起高喊：“蒋军官兵，赶快投降，缴枪不杀！”宋崇也拿着一根长篙打捞俘虏。

战斗结束以后，他们都对记者说，通过这次战斗，在思想感情上和战士们更加接近了，对战士们也了解得更深了。在战斗中，战士们紧紧地握着自己的手，虽然只简短地讲一两句互相激励的话，却好像讲了千言万语一般，觉得自己的心和战士们紧紧地联在一起了。宋崇在返航途中，遏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写了 200 多行的长诗歌颂海军战士英勇杀敌的革命精神。他朗诵给大家听，大家都说很有感情。他很有体会地对记者说，“通过这次战斗，使我进一步深深体会到生活是创作的真正源泉，没有生活，就没有诗歌，不参加战斗，就没有战斗的激情，就不会有好的创作。”

突击编队捕捞 9 名战俘后，于 14 日 3 时 5 分遵令返航。

民兵们投入了细致的搜索

当海战的炮声响起之后，沿作战海域自北往南，长达百里的海岸线上，无数的渔村沸腾起来了！

彻夜守卫海防的民兵们，看到火光，听到炮声，就像接到了战斗动员令。刹那间，我人民海军在海上歼敌的消息传遍了那些渔村，武装民兵和基干民兵们拿起武器，普通民兵拿起斧头，渔民们拿起驶船的“三宝”，似急风如骤雨，朝着集合地点飞跑。

民兵副营长谢吓珠，接到值勤民兵的报告，看到火光，就去集合民兵，还未跨出大门，民兵们已带着各式武器，把大门围住等待接受任务了。

民兵陈仁春近来生病卧床，听到海上炮声，跳下床，跑到集合地点，又随民兵们奔向海边，和大伙一块，不顾寒风袭人海水刺骨，把停在岸上修理的大船抬下海。干部们让他回家休息，他说：“打仗了！病，还能挡住我？”

青年民兵周金龙和他的11个伙伴，半夜里刚把渔具抬到船上，准备趁着潮水出海捕鱼。看到海上火光，马上把渔具又抬回岸上，带着武器跳上船去，把船驶到港口，等命令。

渔民们没有忘记，那130多条载重渔船有的被日本鬼子烧掉，有的被蒋军抢去凿沉，1千多渔民求生无路，掩埋了200多个亲生骨肉，130户逃亡外乡。谁能忘记，蒋军的三次大袭扰，抢烧杀无所不为，炮击海上渔民。

面对东海富饶的渔场，谁不痛恨蒋军。

“快下命令，出海抓俘虏去！”

集合起来的民兵渔民们，纷纷通过电话向上级提出请求。43岁的老渔民高吓龙，永远忘不了解放前夕乌丘屿的蒋军对他施用过木棍碾腿、烧红的铁丝刺身等种种酷刑。他叫上当基干民兵的两个儿子；“走！一道出海去，给你老子报仇！”60多岁的老渔民黄各锥也挤在人群里求战。

临近拂晓，上级从电话里给各地集中待命的民兵送来好消息：窜扰破坏我渔场的美制蒋舰，被我英勇的人民海军打得落花流水，一沉一伤。

同时下达了命令：

“扬帆出海，抓俘虏！”

早已急不可待的民兵们，听到胜利的消息和命令，立刻欢呼着跳上海边的渔船。

民兵船只，升起满帆，一只只像离弦之箭，朝着凌晨战斗火光升起的方向驶去。

刚刚略为平静的大海，这时又掀起了七级风浪。浪头一个接一个压向船头。一股股冰冷的海水泼进船舱。溅到人们身上。船只进入了作战海区，民兵们投入了细致的搜索。海面的每一块浮木，每一只时沉时浮的海猪都逃不过大家的眼。这时，曾被火光映红过的海上战场，已恢复了往常的宁静。“永

泰”号已带伤逃之夭夭。

“永昌”号已被浪涛吞没。

落水逃命的蒋军官兵，有的已被我海军舰艇部队活捉，有的已葬身鱼腹。

看看空荡荡的大海，看看那逐波腾跃的大鲨鱼，民兵们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畅快。

参战艇队返航之后，编队指挥员魏垣武已处于休克状态。体温急剧下降，血压量不出来，伤势严重，生命垂危。敌人的炮弹片严重地损伤了他的身体，上级决定用一切办法抢救他。

海军 411 医院的战地救护组程主任等赶到码头，给他注射了强心剂，进行了输血；同时，福州军区首长也派来了总医院的胸外科的胡主任，骨外科于主任赶到驻地组织抢救。“一定要救活魏垣武！”上级领导命令医生。

当听说魏垣武要输血时，部队和地方的同志踊跃报名，争着为魏垣武输血。

枪炮长阮光明，一人就献了 250 毫升。

魏垣武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他对前来看望他的基地刘政委说：“我没完成好战斗任务！”

“你打得勇敢，打得很好！”刘政委安慰他，“要好好养伤，大家都很关心你。”

入院以后，他的神志好一些，就让护士给他读报，听收音机。

台湾当局正式承认战舰一沉一伤

【美联社台北 1965 年 11 月 14 日电】

台湾国民党“海军”扫雷舰一艘在海战中被中共的炮艇击沉，直至今天傍晚仍未见宣布有任何幸存者被救起。

台湾当局早已经承认一艘扫雷舰被击沉。台湾国民党“海军部”发表的公报说，今天凌晨 0 时 55 分，“该扫雷舰被击中，受了重伤，即下今将该舰放弃。”

在被击沉的扫雷舰上的国民党官兵共约 100 以上。

【美联社台北 1965 年 11 月 13 日电】

台北“国防部”承认损失一艘扫雷艇，据说它是从事交战的 two 艘国民党的军舰之一。“国防部”说，另一艘炮舰业已驶返基地。

台北“国防部”的公报说：“我们的炮舰已平安地驶回乌丘屿，但是，已经受到严重损坏的扫雷艇则已放弃了。”公报说：其他国民党军舰已驶往

作战现场，展开对船员的搜寻，唯失踪人数多少未经陈明。

1965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题为《祝海军再获大捷》的文章，摘要如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担任护渔任务的舰艇部队，又一次痛惩窜入我福建崇武以东海域的美制蒋帮海盗舰只，一举击沉敌舰一艘，击伤另一艘。这是我英勇海军部队继8月6日海战大捷之后，再一次取得的重大胜利。

这一新的胜利，是我海军部队保持常备不懈的战斗姿态，切实做好各项备战工作，高度警惕地护渔护航所取得的显著战果。他们能够在蒋匪舰艇窜入我渔区之后，迅速地打，坚决地打，以勇猛顽强的战斗精神，克敌致胜，正是由于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苦练杀敌本领，充分发挥了我军近战夜战的光荣战斗作风。

蒋帮海盗舰艇不顾我们警告，胆敢继续窜入我渔场进行破坏活动，显然是在美帝国主义指使下进行的。这是美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军事挑衅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8月6日我海军大捷之时，我们曾发出明白的警告：美帝国主义不论是指派它的娄罗上门，还是它亲自出马，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都一定要坚决消灭之。说到做到，充当美帝国主义走卒的蒋帮美制舰艇，又一次遭到了应得的惩罚。

美帝国主义正在疯狂地加紧对亚洲的军事部署，不断叫嚣要把战争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对于美帝国主义这一狂妄的侵略计划，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时刻戒备着。我海军部队的新胜利，表明了中国人民这一坚强的战斗意志。

我们谨向参加这次海上歼敌战的全体指战员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祝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加强战备，戒骄戒躁，再接再厉，随时消灭一切敢于来犯的敌人！祝你们为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而奋斗不懈！

同一天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林彪颁布嘉奖令，表扬14日凌晨一举击沉击伤美制蒋帮军舰各一艘的我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部队。

嘉奖令指出，这一仗打得坚决，打得快，打得好，是继今年8月6日击沉美制蒋舰“剑门”号、“章江”号以后，在海上作战的又一次重大胜利；是对蒋帮配合美帝国主义扩大侵略越南战争，不断对我东南沿海进行袭扰破坏活动的沉重打击和有力惩罚；也是对美帝国主义疯狂扩大侵越战争和加紧向我进行军事挑衅的严重警告。

嘉奖令说，这次胜利，是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执行中央、军委指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紧握手中武器，常备不懈，虚心学习兄弟部队作战经验，大力发挥我军英勇顽强，机动灵活，善于近战夜战等优良战

斗作风所取得的良好成果。

嘉奖令说,在庆祝胜利的时候,希望你们务必要牢牢记住毛主席关于“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教导,更加谦虚谨慎,更加兢兢业业,积极努力,认真总结经验,把工作做得好上加好,为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而奋斗。嘉奖令着重指出,在今后工作中应该特别强调的是:

1. 更加加紧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联系实际,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2. 更加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
3. 领导要深入基层,进行面对面的领导;
4. 大胆地提拔真正优秀的指战员到关键性的负责岗位上;
5. 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战术。

11月17日下午,福建前线军民两万多人,在福州市隆重举行祝捷大会,热烈庆祝我人民海军护渔舰艇部队击沉击伤美制蒋舰各一艘的重大胜利。到会军民一致表示,要向英雄的人民海军学习,军民团结一致,百倍警惕,加强戒备,筑成钢铁般的坚强防线,叫一切胆敢来犯的敌人,有来无回。

盛大的祝捷大会在下午3时开始。当参加击沉击伤美制蒋舰战斗的人民海军护渔舰艇部队代表进入会场时,全场掌声雷动,鞭炮齐鸣,向痛歼海盗、保护渔民的英雄水兵致敬。少先队员将一簇簇鲜花献给了英雄的海军。

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首长韩先楚、叶飞、刘培善,海军副司令员赵启民、海军东海舰队负责人陶勇等出席了大会。

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魏金水等和沿海地区的工人、农民、渔民、学生和民兵代表,以及守卫在福建前线的一部分解放军陆海空军指战员,也参加了大会。

在大会上,魏金水和省委书记处书记伍洪祥,代表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委员会以及全省人民,向这次为保护渔民而英勇作战的海军舰艇部队赠送了锦旗。

魏金水在会上讲话。他代表当地党、政府和人民,向取得这次海上大捷的全体指战员表示热烈祝贺,并号召全省人民,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进一步向英雄海军部队学习,努力搞好生产,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作好民兵工作和支前工作,做到生产建设和战备两不误,保证前线部队需要什么就支援什么,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支援,哪里需要就支援到哪里。

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负责人韩先楚在讲话中说,这一次海战打得坚决,打得快,打得好,这是参战部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落实四好,切实做好各项战备工作,因而一声令下,立时出动,在黑夜大海中顶风劈浪,猛扑敌舰,打得又狠又准。他们在夜战、近战中,发挥了王杰一不怕苦、二

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勇敢沉着，杀出了威风，压倒了敌人。

韩先楚严厉谴责美国疯狂扩大侵略越南战争，并且不断指使蒋帮对我东南沿海进行袭扰破坏活动。他说，伟大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是不可战胜的。不论美帝国主义指使它的走狗来，还是亲自出马；不论从天上来、海上来，还是从地上来，也不论从这个方向来，还是从那个方向来，我们都将给予坚决打击，彻底地消灭。

人民解放军东海舰队负责人陶勇在讲话中，勉励水兵们要牢记毛主席“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教导，认真总结经验，戒骄戒躁，打一仗进一步。

福建前线海军部队代表张朝忠讲话后，战斗英雄张逸民代表参战部队讲话。我们向党保证，只要敌人敢来窜犯，我们保证一声令下，立时出动。党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党叫怎么打，我们就怎么打，不管有什么困难，我们都要战胜它；不论是什么敌人，我们都要压倒它，消灭它。

参加庆祝大会的渔民民兵代表陈仕瑞，也在会上表示，搞好生产，做好民兵工作三落实，紧握枪杆，提高警惕，配合人民解放军保卫海防。

11月21日下午，海军护渔舰艇部队在福州隆重举行庆功授奖大会，表扬在这次战斗中荣立战功的单位和有功人员。

参加庆功授奖大会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韩先楚，福建前线部队负责人刘培善，海军副司令员赵启民，东海舰队负责人陶勇。

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第二书记范式人，书记处书记、福建省省长魏金水也出席了大会。

大会开始，韩先楚代表国防部宣读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林彪给参战部队的嘉奖令。

海军副司令员赵启民在会上讲话。

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在讲话中，热烈赞扬护渔舰艇部队指战员，怀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和热爱，严惩海盗，给福建全省人民带来了鼓舞。

福建前线部队首长刘培善在讲话中号召前线陆海空军指战员，把福建前线所有部队都建设成为党和人民的一把得心应手的革命尖刀。

福建前线空军首长李世安代表前线空军指战员在会上表示，和海军战友并肩作战，消灭一切来犯的空中强盗。

在热烈的掌声中，立功受奖单位和立功人员代表秦伟邦讲话。他说，这次海战的胜利，归功于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归功于上级的正确指挥，归功于当地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支援，归功于兄弟部队的密切协同。

1965年11月26日晚，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接见了14日凌晨击沉击伤美制蒋舰各一艘的我人民海军护渔舰艇部队的代表。

这些代表都是这次作战中的有功人员。接见时，他们向周总理和罗副总理汇报了这次海战的情况。

周恩来总理、罗瑞卿副总理向他们表示亲切慰问，赞扬他们打得坚决、打得快、打得好，是继今年8月6日一举击沉美制蒋舰“剑门”号、“章江”号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胜利。

周恩来、罗瑞卿还勉励他们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认真总结经验，戒骄戒躁，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狠狠打击胆敢来犯的一切敌人，争取更大的胜利。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和勉励，使代表们受到极大的鼓舞。他们表示：决心把国防部在嘉奖令中的5条指示，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今后要更加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特别是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苦练杀敌本领，随时准备消灭一切敢于来犯的敌人。

接见时在座的，有海军东海舰队负责人段德彰、饶守坤、梅嘉生等。

崇武以东海海战，历时1小时33分，击沉国民党“永昌”号，击伤“永泰”号，俘敌9名。我人民海军牺牲两人，伤17人，轻伤护卫艇和鱼雷艇各两艘。

从海战中看出，我人民海军指战员打得顽强勇敢，打了胜仗，但也有一些失误，教训是深刻的，是林彪一伙过分强调突出政治，干扰了军事训练，和战术技术水平的提高。

崇武以东海海战以后，国民党军的海上窜扰活动逐步减少，到70年代就终止了。

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内，解放军舰艇部队常备不懈，英勇作战，经过241次海上战斗，共击沉国民党海军舰艇18艘，击伤49艘；击沉海匪特务船和胶舟53艘，击伤海匪特务船21艘；缴获各种艇船207艘，击毙3491人，俘虏3236人。

第十章

“秋风萧瑟天气凉”，一代大员，落叶思恨。但愿“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第一节 吴稚晖魂落金门

心灵深处的《思乡曲》

1965年7月，李宗仁以“副总统”之尊，捐去前嫌，回归祖国。成行前，他曾向意大利米兰《欧洲周报》的女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讲了下面一番话：

我像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样，是个失败者。唯一区别是，我完全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作为个人来说，我自己无关紧要，我不能妨碍中国的前途和它的进步。

语云：“败莫败于多私”。李宗仁承认“失败”，不“放在心上”，“不妨碍中国的前途和它的进步”，这应该是中国政治家的“职业道德”，愿从政者共勉之。

自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尽管于由错综复杂的主客观原因，直接从台湾返回大陆的要员还不曾有。然而，“秋风萧瑟天气凉”，不管他们的政治观点如何，心灵深处都有一部《思乡曲》。

1953年10月30日，国民党评议委员、老同盟会员、89岁高龄的吴稚晖在台北病故。“死去原知万事空，”只希望与大陆尽可能贴近一些。遵其遗嘱，在金门附近海域举行了海葬。

吴稚晖，又名敬恒，字稚晖。1865年3月25日出生于江苏省南部阳湖县的雪堰桥。这里滨临太湖，风景优美，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吴家世代居住于此地。吴稚晖6岁时母亲去世，随外祖母陈氏回无锡，直到成年。关于这些事，他有一篇自述：

……吾外祖母丧其二子一女，止吾母一人……，吾母25岁生第三女，产后患痢而死，……吾同外祖母同回无锡北门邹氏，邹固北门望族也，外祖母养我至27岁而彼死，其恩至驾。

吴稚晖举人出身，一反其传统的八股头脑，和蔡元培、章太炎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积极排满驱虏，追随孙中山，参与革命，倡导新文学，反对复古派。他坚持“劳动创造了人”的观点。他率领青年留法，提倡勤工俭学，目光向

前。所有这一切，均其一生这莘莘大端。最后把他当作一个逆时代潮流而倒转的反面人物，自有其应取之咎。但如果把他当作是蒋介石身边的“子房”一流，实又不尽然。纵一度担任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可并不像刘邦说的“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那样的赞赏，因之上说未可成立；然则吴稚晖之居蒋幕究属如何角色？说也可怜，只用他那支嬉笑怒骂的笔调，来抨击某一时期的政敌而已。等于一只菜蓝上街挽之腕，菜一买回来，随手一扔，不到用时，不再拎它。他没有得到和陈布雷一样的重视。以其帮闲有余，帮忙不足也。这一点，吴稚晖也并非无自知之明。当他74岁时，自篆一枚“寿逾宣尼，贼讥老而不死”的闲章，铃于书件上，意思是孔子只活到73，他已超过，因此被贼诋以不死。他知道背后有人在这样骂他，故将贼字颠倒过来。人谓刀笔出自绍兴师爷，观此闲章，这位常州师爷也不赖。

信“金陵王气黯然收”

1949年春，距“钟山风雨起苍黄”之日渐近，国民党要人为别谋桃源计，凄凄惶惶，纷纷摒挡行装。

这一天，老报人黄萍荪再次到米家船楼上探望忘年之交的吴稚晖。未入室，见阳台上的煤球炉中非复有瓦罐肉香，而是纸灰烟焰，飘腾屋檐，吸引路人注视。吴见黄进屋，以苦笑相迎，身穿短袄，两手蒙尘，说：“对不起，我已将足下及其他友朋亲属的函札、照片和自己的手稿书件……作了一次干净彻底的火葬！”然神态自若，丝毫未显紧张，似成竹在胸，别有准备。

黄想了想说：“稚者，这又何必呢，难道不信‘长江天堑’吗？”他哈哈大笑后，反显得兴趣盎然地吟起诗来，有节奏地哼出几句刘禹锡《西塞山怀古》：“王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并不断摇首，说：“你说长江是否天堑，吴纵不肖，其后的宋、齐、梁、陈又何尝不蹈吴而灭。天堑也好，地堑也好，王气虽收，我以不变应万变，八秩之人，纵不容于王，死也不算短寿了；再说我一身以外无长物，‘五子登科’（按：日本投降后，发接收财的大员一夜之间房子、条子、车子、女子、面子皆备，故曰‘五子登科’）无份，‘故垒萧萧’，一把老骨头与短榻共命运，你还年轻……”黄领会他的意思：年轻，不妨别谋他途。

黄回答他：“年轻更不怕，何况我又不是名流，这边不会迫我迁地；那边也不会杀我的头。”

吴听后莞尔：“好，心有数就好！来日如能屈驾，我们同坐阳台，边赏苏州河南北的硝烟爆竹，边炖肉骨头油面筋，另加鸡鸭血豆腐汤一锅如何”黄说：“一定奉陪！”吴高兴地扶黄之背，又紧握黄之手，说：“臭味相投，臭味相投！”当黄走至米家船人行道时，他还站在阳台招手示意，再次曰：“臭味相投！”

上海解放后一星期，黄四往米家船。还未上楼，原先照顾老人的那个叫作阿兴的小童拦住了黄，哭丧着脸：“老先生十余天前深夜，被不知姓名的四个陌生人请上汽车，一直到今天没有回来。老板当夜到卢湾警察局报告三次，回答是三个‘不知道’！”

吴稚晖被绑匪架走了吗？于情不合。数月后据台湾《中央社》广播，谓“党国元老已自上海脱险抵台……”云云。

1949年春节期间，吴稚晖到过溪口，据说“退隐”的蒋“总统”问计吴。吴说：“能屈，方能伸。譬之举鼎使劲上逆，过顶不难，此所谓一鼓足气也；放则艰于举，盖气往下沉，若丹田不济，易丧气也，伤气则坠于足。然能者无所不能，举放自如。此辩证之理，千古不易！”蒋介石笑而送之。然未能任其逍遥于短榻之上，迫其乘桴浮海，幽于草山。

魂落金门

在台湾他起初住在台北，1950年夏游阿里山因劳累闹了一场大病。事后蒋介石将他从台北接到阳明山，养病避暑，安度了一个夏天。1951年夏，他再度上阳明山避暑，住在一栋日式平房里，房子居于浓林深处，傍溪构造，风景十分优美。吴稚晖每天一般在林中溪边或坐或遥，与来访者谈谈话，或者自己看点书。每天吃饭以馒头，青菜、豆腐、鸡蛋、牛奶类为主，生硬油腻的食物早已多年不敢沾口了。

这年9月，吴稚晖发小便闭塞症。10日返台北，不久治好了。1952年4月，又因前列腺肿大，小便时有不通，到6月25日晚，小便猝然不通，尿毒微侵两肾，第二天转到台北大学附属医院治疗，10月小便才通。

1953年春留住医院，病势渐轻，5月吴稚晖妻子去世。9月吴稚晖尿毒侵两肾，心脏转趋衰弱，饮食锐减。10月19日，因肠出血输血，21日9个名医会诊，决定开刀，由膀胱中取出结石，大小16颗，用皮管导尿，经过良好。27日猝起寒热，时有升降，29日晨肠出血，急又输血，但热度过度，肠血不止。延到30日下午12时28分死去，享年89岁。

11月3日，以蒋经国为首的治丧委员会按吴稚晖遗嘱，将其遗体火化，12月1日在金门岛海葬。

赢得一座铜像陪祀

台北市中心区有一圆形广场，花木扶疏中掩映着两尊铜像，一是蒋介石，一是吴稚晖（敬恒）。市政当局为疏导人流车辆的拥挤，取消广场后即将这两尊铜像迁往他处，台湾给蒋介石树像，自有其至理；以吴稚晖陪祀，颇费猜测。盖跟随蒋介石南征北战，东荡西杀，覆雨翻云，沥尽脑汁的“功臣”大有人在，何摒何应钦、张群、陈诚……而选中这位被称为“刘姥姥”

的人？仔细一想，选者的苦心孤诣也确是不凡。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对蒋介石来说，吴稚晖应居“首功”，陪祀，当之无愧。

赢得一座铜像陪祀，算是对吴稚晖一生在政治活动上的唯一代价。但未可抹杀他在教育、学术、思想、书法上的造诣和贡献。台湾出版了《吴稚晖先生文集》，大陆对吴氏的思想体系也作二分法批判。经常晤谈，且不断有书信往来的曹聚仁先生对其作如评价：

稚老是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可是他心目中的大同世界，并不是在清风明月之下，结起了茅屋，耕田凿井，做着羡慕皇上人之梦的。他认为必须重视物质文明。他所理想的大同世界，凡是劳动都归诸机器，要求人工的部分极少，每人每日只要工作二小时，便已各尽所能。

他和我在上海西门一家茶楼上见面以后，成为忘年的师友，书信往来，我有所问，他一定诚诚恳恳地回答，尤其关于语言文字学的问题。独有国共分家的当儿，我接连寄了三封信给他，问他为什么要反共？他就只字不回答我，我相信他的心里也是十分矛盾的。

有人替吴稚老作传记，有一段说到稚老的文体“有其独到的创见，超物的风格……”《新世纪》里若干论著，嬉笑怒骂，雄健犀利，不同凡响。当时士大夫们看了《新世纪》的文章，并不顺眼，先生曾就此有所声明。他说，本报同人因文笔稚弱，庄言之易涉迂晦，不如诡言之稍醒眉目，故欲拉拉杂杂，自成为一种白话。马迁有言：文不雅驯，绅先生难言之，本报同人极恶旧世界所谓绅先生，故矫在不免过正。稚老原是提倡白话文的急先锋……他说他的文体乃是以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的精神行之的……他的笔法，乃是揉合俗语与经典，村言与辞赋为一炉的创格，其中有雌鬼与雄鬼睡在一枕，上一句是“肉面贴着肉面”，十分村俗，下一句是“风光摇曳，别有不同”，却又十分典雅。吴氏自己所谓“放屁文学”，就是敢于运用最村俗的粗话，而又“六经皆我注脚”的新文体。

第二节 阎锡山万变不离其宗

逃离山西

1960年5月23日，阎锡山病逝台北台大医院。这个在台北被人遗忘多年的“总统府资政”，报纸上终于又有了他的新闻。台湾报纸说：

阎氏晚年“生活恬淡，而埋首于读书与著作”，在他病逝的前一天，医师前往阎氏居所为其诊治时，阎氏“床边尚留有若干书籍，最近且计划重读二十四史，且已向人洽借，但不幸尚未将书取来，而人已遽捐馆舍。”

一度有“山西土皇帝”之称的阎锡山晚景如此“恬淡”；一生争强好胜，前呼后拥，轰轰烈烈，到头来如此冷寂——逝世时，仅夫人徐友梅女士陪侍在侧……

1948年。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山西，眼看要被解放军分而治之，战略据点运城被占，阎锡山心里总有些不是滋味。不过，阎锡山仍有他自己的算盘：运城据点虽然落入解放军手里，但总算达到了拖延徐向前兵团进攻晋中腹地的时间。使他获得加固临汾城防工事，增派守城部队的机会。徐向前指挥的“土八路”，有本事炸开10米厚的运城城墙，绝对炸不开临汾30米卧牛式的厚城墙。再说，有临汾古城的几道防线和工事，加上强大的火力配备，徐向前的几万兵，攻不到城墙根，也都得倒在阵地上，让你损兵折将，象历史上的李自成一样自动撤走。

徐向前兵团打罢运城，接着便要打临汾，在这一点上，阎锡山的判断还是准确的。但他对徐向前打运城为的是锻炼部队，学会攻坚战进而打临汾；打临汾又是“战场练兵”为的是拿下山西省城太原这个深远的作战计划，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1948年3月7日，徐向前指挥人民解放军第8、13纵队及太岳吕梁军区部队，发动了对临汾的进攻。经过激烈战斗，于4月11日攻占东关。此后，用了27昼夜时间秘密完成两条各长110米的破城坑道。5月17日开始攻城，先对城墙进行坑道爆破，炸开缺口，接着，展开猛攻，于当天深夜攻克临汾。

阎锡山往往错误地估计形势。临汾一战，双方激战72天，解放军消灭了守城敌军2.5万，而自己也伤亡1.7万。当然，阎锡山说的更离谱，说是“共军伤亡至少5万”。因此，他估计，徐向前兵团决不会打下临汾不休整而北上攻晋中。便安安稳稳地部署晋中的抢粮和抓丁，以扩军备战守太原。

然而，徐向前部北上晋中的军事行动，打破了阎锡山的美梦。1948年6月11日，吕梁部队47个团6万余人围攻山西孝义的高阳镇，阎锡山调动驻平遥、介休等地的5个师兵力西援。18日，太岳部队乘虚向平遥、介休地区出击，占领灵石，徐向前部主力由东西突破，打进了介休、平遥、祁县间。

阎锡山又调主力回返向南来了，在平、介以南地区遭我军伏击，被歼灭一个整师、一个炮兵团，还有一个师的大部。

这一棒把阎锡山打痛了，也打懵了，想收兵不战。可是，蒋介石发来了急电，给阎锡山打气，与损耗大而又疲惫不堪的共军决战，必胜无疑。阎锡山在犹豫中又征求日本军事顾问团的意见，顾问团拿出了决策性的作战方案：

共军因已进入了反攻阶段，所以主动寻找国民党军的主力部队进行决战。在山西活动的徐向前部队也不象过去那样只是捉迷藏似的等待时机，或者只是保护农民收获粮食，而是亲自寻找并歼灭作为山西防卫支柱的山西野战军的主力。其目标，我们只能认定是企图控制整个山西。我们认为祁县县城的前哨战，就是一个证据。

基于这样的判断，留守太原只能是坐以待毙。道路只有一条，即我们也只有寻找徐向前的主力，进行决战，并歼灭之。假如取胜，其他兵团到达，还需要相当长时间；如被打败，道路也只有一条，即太原被围。这是今村（阎军第十总队司令，改名晋树德）、原泉（阎野战军副总司令原泉福）等人在祁县讨论时得出的判断，我们以这一仗为赌注，命令所有留下的日军主力也都出动。同时，还命令在榆次附近佯动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等五个团，以工兵、通信、司令部和第八、第九总队的全部兵力，急迷向祁县进军。这样，在此后的三个月时间里，各自都开始在自己占优势的时候，打击对方，并且是真真假假的十几万人大军的运动战。其间，时而前进，时而后退，时而迂回，时而正面进攻；一边观察对方的企图，一边等待时机，投入全军，发动大会战。

阎锡山依仗着积蓄下来的十几万军队，又听了日本军事顾问团的意见，觉得蒋介石讲的有道理，与其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出击。决心一下，即命令以赵承绶为总司令，原泉福为副总司令的山西野战军，以祁县以北为战场，与徐向前进行一个大会战。又授意，打运动战，能打则打，不能打则跑。叫做“一跑万有，一跑万胜”。

徐向前已经选定了太谷、榆次、徐沟间，这个离铁路较远、战场较宽广、敌人守备又空虚的犄角地区为歼灭阎锡山野战军的战场，等待着大决战的开始。

6月28日，阎锡山野战军总部率33军和平遥的34军南北对进会合了，摆开了决战的架势。

这时，徐向前命令太岳部队昼夜急行军，插入太谷、榆次间，配合肖文玖集团，展开大规模的破袭战，炸毁了铁路桥，切断敌人北逃退路，在沿线各地、要点，连夜构筑工事，设置了阻击防线。命令8纵队攻下祁县，消灭守城敌军，消除围歼战的后顾之忧。

阎锡山的部将赵承绶发现了徐向前兵团堵歼战意图，见北逃退路断绝，后退祁县无着，只有集中兵力、火力轮番猛攻，杀开一条血路向太原回撤。天上有飞机轰炸助战，地面 70 余门重炮轰击，9 个主力团的兵力轮番攻击，赵承绶和他的 3.3 军军长沈瑞亲自上阵督战，连战三天三夜，终未突破我军防线。连坐镇指挥的阎锡山也无不为之吃惊：想不到“土八路”竟如此顽强应战。阎锡山在报话机里大骂赵承绶：“你真是老糊涂蛋，徐沟这边不是还有公路大道可走吗？”

赵承绶、原泉福指挥的出城来大会战的野战军主力，钻进了徐向前预设的战场。

徐兵团以 13 纵队加 8 纵一个旅，前堵后截，终将赵承绶、阎锡山苦心经营多年的精锐之师三万余众团团包围，来了个分割围歼战的“大会餐”。这便是阎锡山听了日本人的、听了蒋介石的，举行晋中大会战的结局。阎野战军的主力，包括几千日本兵在内的 10 总队，就这样被徐向前指挥的解放军所吞殁，这时候，晋中其它县城的守军，也都弃城纷纷逃命溃散。

晋中一战，阎锡山损兵折将，计有：一个集团军总部、5 个军部、9 个整师、两个总队，共计 10 万余人。徐向前部连克县城 14 座。将战线推进到太原城下。至此，晋中战役结束，除太原城外，晋中全被我军解放。

7 月 21 日，解放军完成了对太原的包围，被围困在太原的阎锡山，如同乘坐一条漂摇在孤海里的船，是应东风，还是应西风？定不了航向。又是蒋介石出面为阎定计了。在阎锡山晋中会战大败的时候，蒋先派了国防部长白崇禧飞来，要求阎锡山守在太原。阎锡山有联共抗日之前嫌，为此，蒋介石只担心阎锡山脚踏两只船之际，投靠共产党。白崇禧回到南京只一周，徐向前指挥的晋中战役结束的第二天，7 月 22 日，蒋介石亲自飞来太原。为了拉住阎锡山不使他倒向共产党一边，且看蒋随身带的是些什么人吧！他带来的有，现任蒋政府的陆军大学校长徐永昌。徐永昌是早年投奔阎锡山的老将，曾经为阎锡山巩固山西军政权出生入死卖命，深得阎的信任。后来，徐并不支持阎锡山参与军阀混战，而又坚决反共，尔后，徐思想上与阎发生矛盾，担心落得个温寿泉、黄国梁的下场，便暗中托人向蒋说情。蒋甚喜，以政府任命形式，调徐到南京任事，脱离了阎锡山。抗战期间，徐永昌在国民政府担任军令部部长，阎利用徐的政府任职，从政府多报多领许多编制名额的亏空。蒋介石知道徐永昌反共坚决，又与阎没撕破过脸皮，所以，当阎锡山骑墙倒向哪一边的时候，便把徐永昌带来陪伴见阎，不也很有意味的吗？

蒋介石的第二名随员贾景德，也曾是阎锡山的人，现任国民党政府铨叙部部长。贾最早是阎的机要处长，后一直任阎锡山的秘书长，军阀混战时期，阎另立“王朝”，北平国民党部扩大会议期间，贾出面替阎联络各方军阀势力，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这时候，蒋介石选定贾景德作陪伴随员前来太原见阎，其用意也就不言自明了。

蒋介石飞来太原这天，下着雨；由于太原处于被解放军围困之中，城南

的大机场已经在人民解放军火炮射程之内，蒋介石的专机只得在城北小飞机场降落。蒋介石走下飞机，前来迎接的阎锡山哭丧着脸向蒋介石说：“总统阁下，只好请多多包涵啦！”

阎显得非常激动，象有多大委屈憋在肚里要吐出来似的。他认为这时候蒋介石来访太原，等于从绞刑架上把他救了下来。有点感恩戴德的味道，所以他和他的高级将领，都冒雨来机场迎接。

尽管如此，机场再无以前那样的欢迎人群，仅有的军界将领中，还少一位老将赵承绶。如今他这个太原绥署中将副主任兼保安副司令、野战军总司令，成了徐向前的战俘。

这天，太原市实际处于戒严状态，从绥靖公署到城北飞机场，沿途街禁，连机关人员也限制不准出门，绥署院里的工作人员不准出房门。蒋介石、阎锡山同坐的一辆车，飞速开进绥署大院，下了车，直奔正楼二层会议室密谈。

阎方参加会谈的除阎以外，只有孙楚、王靖国，这二人现已是阎锡山的左右手。两小时的密谈，好象暗地里达成什么协议。只见阎锡山走出会议室的时候，不再阴沉锁眉。大概阎锡山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和蒋介石合流反共到底。

果然，阎锡山把蒋介石引进了高级将领暨省参议会负责人参加的大会议厅。在这里，蒋介石露了面，发表了演说：

……太原伪局势不要紧，我一定尽最大力量援救太原，希望大家拿出最大的奋斗精神，服从阎主任的统一领导，与共产党拼斗到底。

太原的局势比山东的济南和东北的沈阳、长春要好得多，保险得多，现在的东面还很有办法，太原一定更有办法了。

临上飞机前，蒋介石还装模作样地到城墙一角阵地上“视察”一番，给守城的阎军打气。

雨停了，蒋介石的专机起飞了。阎锡山独自坐在绥靖公署办公室里不出来，阎的堂五妹子特地为他准备了可口的五台山药蛋、白菜、粉条、豆腐、白肉片大碗熬菜和小米饭、蒸馍、面条，端上桌的饭菜快凉了，还不见他回来，阎慧卿急了，迈着快步来到阎锡山的办公处。

已有运城、临汾失守的失败，又有了晋中大会战听从了蒋介石、日本军事顾问拨弄的失策，阎锡山也知道太原城尽管修筑各种形状的洋灰碉，集团工事成千上万，也难以抵挡住徐向前兵团的围攻聚歼。于是当运城、临汾失守，晋中大会战失败，太原被围形成孤海、危在旦夕之时，阎锡山把其家眷和继母陈秀卿、大老婆徐竹青偕二媳及孙儿、孙女，还有四儿子阎志敏一家、五儿子阎志惠一家，都先迁移上海，后来又转移至台湾和美国，在太原也只留下五妹子鲜子（阎慧卿）照料他的生活。所以，阎锡山把蒋介石打发走以后，一直没有回到公馆住处，阎锡山身边唯一可亲可信的鲜子，便找到阎

的办公处来了！请看这对兄妹的一段对话：

“我说哥呀，你这又何苦呢？蒋介石不是满口答应了吗？”

“我正是为这个犯愁呢！蒋介石才不是东西哩，他的话一句也不能信，常常弃信忘义。冯玉祥上过他多少次的当，我阎百川也吃过他不少的亏。他说是从陕北调一个师的部队来守太原，又答应给晋绥军全部的供给，这些都是空话，即使调运一个师的部队来，究竟是用来守城，还是控制我阎百川？再说给的粮食、物资、弹药，从帐面看，数字不少，可如今太原是个孤海，火车路不通，光靠几架飞机又能运多少？”

“哥呀，这些事，日后再说吧，先回屋里吃饭吧！”

蒋介石对阎锡山是有提防的，既防备张学良、杨虎诚“西安事变”的重演，也防备阎锡山的暗算。这次蒋介石一走进太原绥靖公署正楼二层会议室，他的随即便对绥署上校接待科长李寿山打招呼说：“委员长自带有厨师和水，不用准备吃喝。”蒋介石在太原逗留四五个小时，没喝山西的水，也没有吃阎为他准备的饭。

蒋介石认为来太原冒这一次险是值得的。他在回返的飞机上对徐永昌、贾景德说：“阎百川终于和我蒋介石又在一条战线上了！”

这次蒋介石没有撒谎，他为拉拢阎锡山，果然从陕北战场调来了蒋军第30师（后改为军）两个旅来太原参加防守，阎锡山又和美国人陈纳德民航队达成协议，帮助往太原运送蒋介石增援的物资、弹药和粮食，这样一来，阎锡山便部署和进行“太原保卫战”总动员，决心和蒋介石、傅作义一起为巩固华北地盘而与共产党决一死战。

太原战役发起前，徐向前曾亲笔写信给阎锡山，希望他能以太原数十万人民的利益为重，坐下来谈判，和平解决，不再动用武力，而阎锡山执迷不悟，杀了送信的80岁老翁，还把徐向前给他的亲笔信件，转送南京蒋介石政府，以表示他“死守太原”的决心。

阎锡山要顽固到底，人民解放军只好用枪炮攻打坚固设防的太原了。

1948年10月，徐向前亲赴前线统一指挥发起了太原战役。一气攻占东山，又经过一番艰苦的阵地战，占领了城东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四大要塞”一线阵地，并将前沿阵地推进到城东外壕一线。驻这里的是原西北军旧部、现任蒋军30军军长黄樵松，他派人出城来接洽起义，徐向前派部属8纵参谋处长晋夫人城协助，哪知，由于30军27师师长戴炳南出卖，黄樵松等被阎锡山诱捕，送往南京，被蒋介石处决。阎锡山又一次表示了与蒋合流到底的决心。

从1948年6月13日开始，阎锡山就开始了艰难的“太原保卫战”。从那时起，阎锡山就抱定“牺牲在太原”的决心。1949年1月，傅作义起义是对阎锡山心灵上一次很重的打击。傅作义将军是阎锡山从排长一手提拔起来

的干部，所以阎锡山的难过，更是一般人所想象不到的。这时，阎锡山原来的同僚、在上海的田象奎、朱点，在北平的赵丞廉、温寿泉、郭宗汾等，都来函来电劝告阎锡山，希望太原仿照北平方式，和平解决。阎锡山不仅置之不理，还特别召集了一次军政各部门重要干部数百人参加的会议，在这次营长以上军官会议上，阎锡山坚定“死守太原”的决心，对军官们说：“大丈夫应当马革裹尸，岂可面颜事敌”，并大骂了一通傅作义。

1949年1月底，平津战役结束。华北地区基本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阎锡山的太原据点彻底孤立。阎锡山看出了共产党是不会放弃太原的。于是，他把梁化之、孙楚（绥署副主任）、王靖国（建军会总负责人、太原守备总司令）、赵世铃（绥署参谋长）、吴绍之（秘书长）等五人，另外附加了五鲜子阎慧卿，留守太原，他自己耍了个花招，让他安排在南京政府里的贾景德等人，求代总统李宗仁发来个邀请电。阎锡山在临时召集的军事、行政、经济和组织等方面高级负责人会上，宣读了这封给阎的邀请电：“张治中、邵力子等组成的和平代表团日内要赴北平，进行和平谈判，请速来南京洋谈一切。”

这便是阎锡山施出的脱身保命计。他念完电报还假装正经地问：“你们大家对此有甚意见，随便说说，做我的参政。”临末，阎锡山站起来要走了，还假情假意地说了句：“你们大家都不要送我，飞机场里不断落炮弹！”

1949年3月23日下午，几辆汽车急驶入太原西门外红沟机场，车尚未停稳，一军官轻轻搀下一位老人，他就是山西“土皇帝”阎锡山，此刻，他正准备离开太原逃到南京。

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

这天早晨，阎锡山在他上海的公馆，接到了陪伴奉侍他生活多年的五鲜子阎慧卿的绝命电。内称：

……连日炮声如雷，震耳欲聋，弹飞似雨，骇魂惊心，屋外烟焰弥漫，一片火海，室内昏黑死寂，万念俱灰，大势已去，巷战不支。……今生已矣，一别永诀，来生再见，愿非虚幻，妹今发电之刻尚在人间，大哥至阅电之时，已成隔世。

至此，阎锡山苦心经营了38年的山西换了天地，阎锡山军阀统治的山西政权就此完结。阎锡山离开了30年命运与共的山西，成了无巢的孤雁，政治斗争中再也没有可依靠的实力了。

出任行政院长

阎锡山逃离山西后，住在南京宁海路一座小洋房里。一天，一位新闻记者在阎锡山的住所找到他，要求采访。阎锡山欣然接待。阎氏坐下来谈了一

个多小时，还是了无倦意。倒是那位新闻记者因为还要到别处去采访，不得不告辞。当天晚上，这位记者回到报社，打算好好写一篇访问阎锡山的新闻稿。但他把白天听阎所讲的话细细回味一番，无论如何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香烟抽了大半盒，桌上还是一张白纸。于是他掷笔喟然长叹曰：“干了这些年的记者，今天总算遇到了一只老狐狸精！”这位记者对人谈起采访生活时说，在他多年的记者生涯中，遇到过不少狡猾的采访对象，但是，不论他们多么狡猾，多么会躲闪问题，只要找着了他们，有办法使他们坐下来谈，即使他们是吹牛也好，发牢骚也好，他们在有意无意间总会透露一点新闻。唯有这一次采访阎锡山这个老狐狸精，竟落得“身入宝山，空手而回。”这时正是蒋介石下野之时。

1948年底，蒋介石的“戡乱”政策在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遭到彻底失败。美国和桂系的倒蒋活动也日益明显。国民党内一些上层军政要员亦纷纷发出呼吁，提出和谈主张，要求蒋介石下野。

1948年年底到1949年初，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国民党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乘蒋介石处于内外交困之际，以倡议和平为手段，发起逼蒋下野，以图取而代之的活动。1948年12月22日，坐镇汉口的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扣留蒋介石运送军械南下的船只。并反对从汉口地区抽调兵力增援徐州。同时白崇禧还派邓汉翔赴南京，要蒋介石从速下野。12月24日和30日，白崇禧两度电蒋，表示军心、民心均不欲再战，要求国共军队就此停止军事行动，请美、英、苏三国共同斡旋谈和，同民意机关向国共双方呼吁和平，要蒋“速谋决定”，“趁早英断”。12月26日，李宗仁提出和谈五条要求：

- 蒋介石下野；
- 释放政治犯；
- 言论集会自由；
- 国共军队各自撤退三十里；

划上海为自由市，政府撤退军队，任命各党派人士组织上海市联合政府，政府与中共代表在上海举行和谈。

同时，在桂系的授意下，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程潜，河南省主席兼第五绥靖区司令官张轸，湘、鄂、豫、桂四省参议会议长先后发表通电，倡议和谈，要求蒋介石下野。

在内外交困之下，蒋介石于1949年元旦发表文告，表示愿与中共“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但却提出保留伪宪法、伪法统和国民党军队的谈判条件。1月8日，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希望四国政府促成国共和谈，但均遭拒绝。

蒋介石元旦“求和”声明发表后，桂系亦更加紧其倒蒋活动。白崇禧上

书蒋介石，要他利用第三方面人士和中共和谈。李宗仁、白崇禧之间信使往返，谋划逼蒋对策。白崇禧派黄绍 赴香港与中共联系。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在桂系的威逼之下，1月21日，蒋介石在作了一系列经济、人事和军事部署后，发表文告，宣称：

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决定身先引退。

当日下午，蒋介石悄然离南京往杭州飞回溪口。阎锡山特地赶到奉化，探访蒋介石。蒋介石颇为感动，盛情邀劝阎锡山暂住奉化。

这时，李宗仁“和平”攻势濒临破产。南京形势吃紧。阎锡山小住奉化后，即赴上海公馆。不久，蒋介石去了台湾。徐永昌到上海见阎锡山，相告“大势去也”。阎锡山在徐永昌面前，老泪纵横。4月24日，当阎锡山在上海公馆接到其堂妹阎慧卿的绝命电时，知悉梁化之、孙楚诸老部下悉数成仁，集体自杀后，当即涕泪滂沱，悲痛不已。

蒋介石下野后，孙科内阁与代总统李宗仁不和，于1949年3月8日辞职。3月12日，组成了以何应钦为行政院长的内阁。何应钦内阁也未能挽救国民党政府在大陆覆亡的命运。这时，南京国民政府已“迁地办公”，到广州办公。徐永昌在上海见阎锡山后，即乘飞机抵广州，又飞往台湾，去见第三次下野后去了台湾的蒋介石。蒋介石要徐永昌转告阎锡山，希望他能出面组阁，以挽危局。

尽管李宗仁“代总统”另有组阁意图，不过，蒋介石要让阎锡山组阁，李宗仁不得不提请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1949年6月3日，阎锡山经出席立法委员超过五分之四的投票同意，而出任“行政院长”，据当时国民党中央社广州6月7日电称：阎锡山获得的同意票数，开创南京国民政府行宪以来历次阁揆的新纪录。可见，当时国民政府对阎锡山的厚望。

6月12日，阎锡山组阁完毕，内阁阵容如下：“副院长”朱家骅；“内政部长”李汉魂；“外交部长”叶公超；“国防部长”阎锡山（兼）；“财政部长”关吉玉；“经济部长”刘航琛；“教育部长”杭立武；“交通部长”陈良；“司法行政部长”张知本；“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戴愧生；张群、吴铁城、陈立夫、徐永昌、黄少谷、万鸿图（青年党）、王师尊（民社党）为“不管部”政务委员，“秘书长”贾景德。

阎锡山组阁后，企图利用蒋介石与李宗仁之间的矛盾独树一帜，主张“国防部部长”职权要等于作战最高统帅，以便自己成为政治与军事的实际领导者，并企图收揽被蒋介石所排斥的官僚政客，作为政治资本，遭到了蒋介石、李宗仁的反对。在蒋李斗争中，阎锡山两方不讨好，蒋系人骂阎是“无能的白日梦者”，李系人骂阎是蒋介石的“走狗”。

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并兼“国防部长”，真可谓临危而出，他以“战

斗内阁”自矢，但毕竟为时已晚，已无法挽回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命运了。

虽然是蒋介石在幕后一手支持阎锡山的，但在战略思想方面，阎锡山却是批评蒋介石最激烈的一个。

1949年秋天，广州闷热得令人难耐。东山梅花村32号的会议厅里，国民党的要人们正在意兴阑珊地倾听着阎锡山关于“扭转时局案”的报告。阎认为：

国民党失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政策、领导、人事、心理都有关系。但在军事方面沦于今日土崩瓦解的状况，则蒋介石的战略思想不能不负其最大的责任。

蒋介石的战略思想基本上是守势作战。如在国共作战中，蒋在东北华北固守若干孤立据点，正好被共军各个击破，逐点消灭。及国共沿江对峙，蒋又坚持死守上海，而置长江沿线于不顾。其后和谈破裂，中共大军渡江南下，蒋又将主力撤守沿海若干据点，而使浙赣沿线变成了真空地带。凡此均足以证明，蒋介石的作战指导原则实有其一贯的传统。

阎锡山进一步加以分析：

当兹原子世纪，兵器空前进步，守势作战之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已无可疑。至于吾人对方，纯重攻势作战。他们全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以歼灭我方有生力量为其作战的基本任务。比如延安之役，我方沾沾自喜，以为最后总算粉碎了他们发号施令的基地，孰知他们事先已作出有计划的撤退，使我们扑了一个空，迄无所获。等到他们全力反扑，我们深入敌后的主力便全被歼灭了。这就是攻守利弊的具体证明。

最后，阎锡山提出了改变战略思想的方针，他主张不守点，不守线，而采取全面攻势作战，以期扭转劣势，挽回危局。

当时，吴铁城质问说：当抗战胜利之时，我们有大军500万，对方只有50万人，现在对方有300万，我们只有几十万人，如此优劣之势已成，怎能进行全面攻势作战？！

阎锡山被问得哑口无言。但会议终于作出决定，由阎锡山就其发言内容，写成书面意见，另外附加建议，请蒋介石将撤到粤闽海岸线的部队，调来大庾岭一线集中，使与华中南下的部队紧密联系，配合作战。这一建议由吴铁城路过台北时面交蒋介石。但蒋介石对其建议未表示采纳，阎锡山不禁感慨地说：“蒋先生的战略思想是落后的，不合时代的，但蒋先生也有长处，就是以不变应万变。”

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江西直捣广东韶关。6日，韶关解放，广州告急。10月10日，解放军逼近新街。由南京迁到广州办公不到8个月

的国民政府被迫宣布再迁重庆。10月14日，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乘飞机往桂林抵重庆。即日，广州解放。广州的“政府”迁至重庆办公。“代总统”李宗仁借口治病，弃职逃到美国。阎锡山代理中枢政务。阎锡山连电蒋介石来重庆“共挽危局”。11月，人民解放军进军四川、贵州，威逼重庆。29日，“行政院”再迁所在地至成都。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乘“中美号”专机逃往成都。人民解放军乘胜追击，对成都形成南北夹击之势。12月8日，蒋介石、阎锡山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政府”撤离大陆，迁往台北，并在西昌设立总指挥部。随之，“行政院长”阎锡山飞赴台北。

1950年1月，阎锡山卸去“国防部长”兼职，交徐永昌担任。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复任“总统”，阎锡山因与李宗仁的颇多合作，已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蒋介石要他把“行政院”交出来，阎氏即交上了辞呈。这样，阎锡山把当了不到9个月的“行政院长”交给了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任“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行政院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革命实践研究院”院务委员等职。至此，阎锡山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和军事生涯，转入退休养老之年。

出国不成

阎锡山在台湾，开始住在台北市中山北路1段105巷16号，后移住丽水街8号，独处一楼。辞去“行政院长”职不久，又移居台北阳明山公馆里九邻81号青山草庐隐居，平时人迹罕至。在台北，阎锡山成了被大家遗忘的人。国民党政权的任何场合固然看不到他的踪迹，连报纸上也很少提到他的名字。阎锡山自己呢，倒也“自得其乐”，整天躲在私宅里埋首读书，勤奋写作。据说，阎锡山平日不常下山，只是遇以“国庆大典”及蒋介石生日则必亲往参加，对机关学校邀其演讲，莫不有求必应。与他同住的仅有贾景德、张锦富等数人。

阎锡山到台湾后不久，看到局势不妙，便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要求准许到日本“从事著作”。他知道，自己的烦闷，只要蒋介石仍然占据着台湾，就无法消除。几十年的交往，阎锡山对蒋的为人很是了解，不过，阎锡山也一向自大。他常说，自民国以来的大总统、总统、国民政府主席及大小军阀，他佩服和尊敬的是孙中山，他生平所畏惧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袁世凯。

民国元年（公历1912年）他第一次到北平谒见袁世凯，不觉汗流浹背，俯伏在地，行了跪拜大礼。至于后来接任袁世凯的黎元洪，他根本不放在眼里。袁世凯死了以后，副总统黎元洪接任总统，电邀他进京。阎锡山到总统府见了黎元洪回来，哈哈大笑，说：“黎元洪那个神气，望之不似人君，简直是个窝囊废。难怪辛亥革命时，他藏在床底下，人家把他拖出来，硬把个都督加在他头上，他还不敢干，深怕犯了灭门大罪呢！”

对于蒋介石，阎锡山的政策是，对我有利，我服从，但他时时怀恨蒋介石

石，暗存倒蒋之心。阎锡山在山西执政，对蒋介石中央政府的法令，始终于表面服从，实际上自行其是，另搞一套。抗战期间，阎锡山无时不防范蒋介石对他的排挤、吞并，以及蒋介石的嫡系陈诚、胡宗南、卫立煌等对他可能发动的袭击、围攻。当时，他对重庆蒋政府也是持以蔑视。他自负地用旁观者的态度，多次说到蒋介石无能，很难应付这种复杂纷坛的局面，认为自己比蒋有办法。他曾说：

重庆政局是个大杂烩，当权者东一头，西一把，缺少一个总主意，无法支配这种局面。

抗战胜利以后，阎锡山之所以投身蒋介石打内战的行列，也是为的自身利益，痴心企图保住他统治了近40年的山西地盘，为实现孙中山要他“替国民革命保持着北方这个基地”的嘱咐。

阎锡山逃离山西后，在蒋介石支持下，出任“行政院长”，自然还想着打回山西去的，同时他又与“代总统”李宗仁有颇多合作，并批评蒋介石的战略思想，蒋介石的不满可想而知。

现在，到了台湾，阎锡山失去了山西这块基地，也没有了大陆战局的危急可以作个缓解阀，加上蒋介石的独裁日盛，心里烦闷日增，自然想到出国“从事著作”了。

蒋介石对阎锡山的那封信始终不加理睬。阎锡山实在忍耐不住，私下里托蒋介石的一个亲信打听究竟。过了一些日子，这个人很坦白地对他说：

如果阎先生一定要去东京小住，总统也没法强留。不过，目前政府的经济情形相当困难，总统认为，要是阎先生肯把在日本的存款调拨一半回来，那么日本之行绝对不成问题！

阎锡山听了这话，当然拼命否认他在日本拥有大量存款的事实，同时也只好打消了去日本的念头。

凡是稍微留心时事的人，都知道在解放之前，阎锡山的名字是和山西分不开的。“山西离不开我，我离不开山西”，这是阎锡山当时常说的话。其实，山西离不开阎锡山是假，而阎锡山离不开山西倒是真。阎锡山一离开山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从1913年起，他一直在山西闭关固守，过着“土皇帝”的痛。为了不让别人的势力侵入山西，他在修建同蒲铁路时，故意把路轨修得特别窄，使得其他铁路上的车辆，无法在这条线上行驶。这种小铁路有一个最大的特点，火车头和车厢的轮子能调宽窄，它可以在宽轨铁路上跑，而宽轨铁路上的火车则不能在窄轨铁路上跑。这就不难看出阎锡山的真实用意了。修成窄轨铁路，遇有外来攻击战事，有利时可运兵出击，不利时则将火车头、机车全

部拉回，而使敌方不能利用。大概受到从前山西人的传统影响，他对于黄金美钞都不怎么感到兴趣，却一贯地把他的财产变成了黑白二物——大量的烟土和银元。究竟阎锡山有多少财产，大概没有多少人知道。山西的公有资产，在大陆解放前即已被阎锡山盗出甚多，移往台湾、香港、日本及美国等地。据 1957 年 6 月 10 日中国新闻周刊称：

其山西贸易公司迁台后更名为玉华公司，专营对日贸易，登记资金为 40 万美元，在日本设有联号东亚株式会社，公司董事由其四子阎志敏、五子阎志慧（在日本）及其私人驻日本代表徐士珙（字宏玉，为阎锡山妻侄）三人担任，东亚株式会社社长为阎志慧。其另一专营国外贸易的公司为同纪公司，最初和德国人合作经营，资金甚大，获利亦多，将资金迁台后，传已大部转到美国，由在美的阎志敏全权负责。其山西实业公司运台的一部分工作母机已先后分批卖出。此外，在陈纳德的民航公司中尚有一部分股份。在台所设兴中百货行和台兴印刷等小企业，因经营不善亏蚀，有歇业讯。

部分在台山西人因不甘阎锡山独吞山西公有资产，1950 年即酝酿清算，1951 年 5 月，曾由乔义生领衔发起清算。阎锡山对其旧部要求经济上帮助者，大都加以拒绝。这次，蒋介石要他交出在日财产为条件，让他去日本，当然阎锡山不敢再有去日本的念头了。

阎锡山辞去“行政院长”职后，迁居阳明山隐居之前，贾景德及青年党之刘东岩、曾琦等曾策划，要阎锡山出面搞“第三势力”，以争取美国垂青，但阎锡山犹豫不决。1952 年 10 月列为退役将军。

这次，阎锡山去日不成，便想去美国，避开蒋。便要王怀明在美国向“世界重振道德委员会”活动，邀请阎锡山以中国代表身份去美国参加会议。蒋介石已吃过放冯玉祥去美国后“胡说八道”的苦头，则不准阎锡山出国，而改派何应钦去参加了会议。从此，阎锡山知道蒋介石这位盟弟对他的意向，便不再有任何非份之想，而潜心于草庐隐居、读书、写作了。

写作不得

1958 年初，香港一家报纸传出消息说，阎锡山在台北整天躲在私人住宅里写书。当时那本书的书名虽然还没有定好，不过据他本人告诉人家说，“是一本反共的哲学理论基础。等到这本书出版后，国民党全体党员就不会象现在这样的毫无精神寄托了。”

其实，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倒真是替自己找个精神寄托。他的烦闷，只要蒋介石仍然活着，占据着台湾，就无法消除。到台湾不久，阎锡山看局势不妙，曾借口出国，在老蒋那儿讨了没趣，只有转向“内省”了。写自传不得，写时政文章也不得，于是便只有写写阎、蒋共同感兴趣的东西——反共

到底。

阎锡山逃台湾后 1951 年 3 月，蒋介石在台湾又重新上台，再度行使“总统”职权。蒋介石为其长子蒋经国当政继续开道，曾委蒋经国“国防部政治部”主任，后又升二级上将，直至“行政院长”。蒋介石“家天下”的意图昭然世间。

阎锡山针对蒋介石的“传子”大发议论，著书立说，宣扬“传贤不传子”：“中国数千年来政治经济上的病根，在家天下政权私有，废井田土地私有……自传贤的制度传子之后，将增进人类幸福的政治设施，变为人类悲惨的表演。”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宣传他的主张。

蒋介石听了之后，极为不快，授意山西籍人士贾景德、徐永昌转告阎锡山：“少发些空泛议论。”阎锡山不仅受到蒋介石的严厉警告，还受到了暗中监视。日子自然过得更不舒心。

回想自己的经历，阎锡山便决计整理《自传》。他在晚年自述说：

我的家是个农商家世。初是个佃雇农，继而成自耕农。自我曾祖变农为商。我祖父时，即成一个小的地位，但一半自种，一半雇工帮助，亦可谓一个半帮工的自耕农。我父亲经营商业。

阎锡山的父亲叫阎书堂（字子明）。阎书堂念过私塾，后来弃学经商，在五台县城开钱铺。名“吉庆昌”。娶本村——五台县河边村小堡曲成义（字在左）之女曲月清为妻。清光绪九年，农历 9 月 8 日（公历 1883 年 10 月 8 日）生了阎锡山。阎锡山长到 6 岁，生母去世。阎书堂继娶定襄县陈家营的陈秀卿。过门时，陈秀卿曾提出不养前妻遗子为前提条件。6 岁的阎锡山由外祖父领走抚养到 16 岁。阎锡山的童年、少年是在他外祖父、外祖母家度过的。

阎锡山从小不爱读书，淘气得没有边际，但他的性情却喜欢经营商业。16 岁时，父亲阎书堂便把他从外祖母家接回，与比他大 3 岁的徐竹青（字友梅）完婚。之后，便跟父亲来五台县城经营起“吉庆昌”钱铺了。生意一时兴隆。然而，好景不长，阎氏父子野心勃勃，想发大财，一次在金融市场上“打虎”失败。由于押的赌注太大，又没摸准行情，一家伙来了个大跌，负债累累。父子俩一合计，便逃出了河边村，到太原做起事来。

别看阎锡山当时只有十七八岁，但他从小没有母爱，成熟较早，而从商后走五台，闯忻州、窜太原，有了一定的社会阅历，学会了一套社交办法，能说会道。在太原做事几个月，便与旅居“四海店”的黄国梁、张瑜拜为换帖三兄弟，患难与共。不久，三人同考山西武备学堂学习军事，又同去日本留学。阎锡山在东京专修军事期间，常出入旅居日本的孙中山的横滨住处。他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便和瑜等人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成为该会第一批会员。

阎锡山最早树立民主、民族思想，以至参与推翻清王朝的义举，都来自孙中山。回顾青年时期日本就学时，与孙中山的相处，阎锡山晚年在台湾对人说：

“当时我与孙中山先生谈过许多次话，即认为中国这个革命是需要的，遂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

“铁血丈夫团”是我提议发起的。因为同盟会中文人居多数，但同盟会中的一部分军人认为革命的实施须靠军人，于是成立一个“铁血丈夫团”。而这二十八名军人，即为宣统三年（辛亥年）中国革命的中坚人物，各省的起义都督，大部为“铁血丈夫团”的骨干。当时，曾向孙中山宣誓，不惜牺牲，回国从事策动军事起义。”

阎锡山在日本求学时期，曾奉孙中山先生的嘱咐，布置华北革命，于光绪 33 年（公历 1907 年）与盟友赵戴文不畏生命危险由东京携带炸弹回山西。因此，孙中山与阎锡山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

清宣统元年（公历 1909 年）3 月，阎锡山等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这年，他 27 岁。阎锡山回到山西任清军标统（相当于团长）。当时，军队腐败，视命令如同儿戏，已经习以为常。有次在操场出操，营长玩忽阎锡山的口令，阎随即拔刀砍他，治军之严，从此可见一斑了。阎一面练兵，一面策划山西的革命工作。当时山西巡抚陆钟琦的儿子，和阎氏是同校同学，一面劝他防止革命党的活动，一面对他严密监视，最后又向他表示说：你如果革命，我父亲可以和平让位。这是陆巡抚教他儿子刺探他的心里，种种复杂环境，阎氏都一一妥善地应付过去。这时，武昌起义，阎氏便积极布置山西的革命行动，密定辛亥年 10 月 29 日在太原起事。

正在布置当中，陆巡抚命令他领发子弹准备开往临汾，以施其调虎离山之计。10 月 28 日夜，山西巡抚衙门电话通知布政使等，说武昌大局转危为安。阎锡山听到这个消息，恐怕革命同志精神动摇，便毅然决定于 29 日拂晓从太原南门攻入城内，包围巡抚衙门，打死陆巡抚，占据太原。有力地振奋了武昌起义者的精神，支援了革命。阎锡山在被推为山西都督大会上说：

今虽不崇朝而据有太原，大家不可认为成功。……今天才是革命工作的开始，原与孙（中山）先生约定，河南、陕西动后，山西再动，今不得已而为之，与全局的好处固多，而我们的困难甚大，愿与诸同志以革命的精神，与清军作战，先求固守。

回首往事，阎锡山很激动，他曾说：

起义成功，我被公推为山西都督，此为宣统三年九月初八日，即 1911

年 10 月 29 日，亦是我 29 岁的时候，是日又是我的生辰。

1912 年 4 月，孙中山卸去了临时大总统职务，但阎锡山主动致电孙中山，敦请早日赴晋；又特派代表邢殿元赴京劝孙中山赴晋；旋即派温寿泉、召恩慎、南桂馨三人赴京迎接。在阎锡山如此盛情相迎情势下，孙中山于 9 月 18 日到了山西太原。

孙中山莅临太原，一再表彰阎锡山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前在日本之时，当与现任都督阎君谋划，令阎君于南部各省起义时，以晋省遥应。……武昌起义，山西首先响应，共和成立，须首推山西阎都督之力为最。

去岁武昌起义，不到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百川之功。不惟山西人当感戴阎君，即十八省亦当致谢。

孙氏还为阎锡山写了“博爱”手书，并一再叮嘱阎锡山说：

北方环境与南方不同，你要想方设法，保住山西这一块革命基地。

在袁世凯时期，孙中山曾派人密告阎锡山说：

你要善于应付环境，保存山西实力，等待革命时机到来，再行出力。

阎锡山接受了这个指示，从此以为借口，当他的“土皇帝”。直到逃离山西之前，阎锡山在任何环境下都是以“不离开山西”为指导原则的。

在民国时期，阎锡山为山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诸方面的建设，曾制定出一系列的建设计划并努力实施，使山西获得了国民政府“模范省”的称号。而响应北伐、抗御日寇等等，也为他日后所津津乐道。

阎锡山整理《自传》，当他写到“中原大战”时，谈到下野，曾在《答客问的自述》一文中说，“那是一段难堪的日子”。但在谁胜谁败的问题上，阎锡山并不认输，“中原大战”由阎锡山下野而结束，但蒋介石也因“中原大战”而下野。蒋、阎争论不休，蒋介石硬说他是胜利者。阎锡山在与蒋介石几次直接交锋、生死搏斗之后，充分认识到蒋介石的为人：阴谋比任何人都多、野心比任何人都大、手段比任何人都毒辣、作风比任何人都独裁。此后，阎锡山也就不再谈写《自传》了。

阎锡山在草庐隐居，深居简出，埋首读书，确有其难言的苦衷和不胜的烦闷。曾有外国出版商，愿以美金二万元请阎锡山写回忆录，阎锡山以“我不往后看，我只向前看”为托词，而予婉拒。他晚年所作，也只是做些乌托邦式的梦想了：《共产主义的批判》、《现社会病及其治法》、《反共为什

么？凭什么反共？》、《大同之路》、《未来三百年之中国》等。《未来三百年之中国》是阎锡山最后一部著作，就其理想，为未来中国绘下一美丽的蓝图。1959年，当他正从事此一著作时，即曾患病，痊愈后自谓体力日差，恐难完成，故有暇即日夜执笔，而于1960年初完成，大为快慰。阎锡山也只有靠这个为自己的晚年找精神寄托罢了。

在台湾，阎锡山念念不忘反攻大陆，他抱定反共必胜信念，妄图再回大陆做他昔日的“山西土皇帝”。他曾对香港《真报》记者谈重返大陆问题：“一旦反攻号响，看吧，我还要请求率领健儿们再打几个胜仗给国人看看，我有信心；生从太原来，我这把老骨头仍将活着回太原去。”可见这位反共老人万变不离其宗。

可是终于看不到生他、养他的故乡了。

病逝台北

1960年5月23日下午1时30分，国民党“总统府资政”、中央评议委员阎锡山病逝，享寿78岁。

据称：阎锡山原患有严重的糖尿病，且因此影响血管而导。致心脏病，曾先后于1952年、1955年、1957年住台大医院治疗，痊愈后出院，雇有特别护士，在私邸长期疗养，体力日渐康复，精神殊佳。1960年5月18日，阎氏忽感不适，初为轻微之感冒，至21日病况忽然转剧，全身发高烧，乃延请陆军总医院医师诊治，诊断系属感冒，处方服药后，至22日，体温即见降低，病况一度好转。到夜间10时，病情渐趋恶化，突发生气喘现象，深夜12时后哮喘甚剧，至23日上午，贾景德氏闻讯，立即赶到阳明山探病，决定延请经常为阎锡山诊治之台大医院内科主任蔡锡琴医师诊治。上午9时许派员赶赴台大医院，10点偕蔡医师上门，10点半抵寓诊治，认为阎氏病况已转为肺炎，而且相当严重，主张立即送医院急救并住院治疗，或尚有望。先注射强心剂两针后，即车送台北，在途中又为阎氏注射强心剂两针，于11时许抵达台大医院，住特二号病房，并立即注射强心剂及输送氧气急救，不料病情已入膏肓，医药无效，延至下午1时30分，溘然长逝。下午5时成立了以何应钦为主任的治丧委员会，贾景德及阎氏家属为其选择墓地。5月29日，阎大殓。蒋介石亲往致祭，送了“怆怀耆勋”匾额。阎锡山遗体葬于阳明山之七星山。

阎锡山病逝后，家属遵照阎的遗嘱，将阎生前写的自挽联分贴其指示处。第一副贴灵前：

上联是：避避避，断断断，化化化，是三步功夫

下联是：勉勉勉，续续续，通通通，为一等事功

横联为：朽嗔化欲

第二副贴楹柱前：

上联是：摆脱开，摆脱开，沾染上洗干净很不易

下联是：持得住，持得住，掉下去爬上来甚为难。

这大概是阎锡山晚年读书静悟对其一生的终极体会吧。

第三节 胡适不默而终

溘然长逝

1961年初，胡适大病一场。从此深居简出，不外出、不会客，过起接近隐匿的生活。他每天严格按“作息时间表”生活，早八时起床，在绿草如茵的庭院中作上点轻微运动，作深呼吸，早餐后开始看书；他开始听从医生的劝告，对秘书和护士小姐的安排更是言听计从，晚上从不熬夜。他静养得精气神足，有人问他：“为什么现在不去学校讲课了？”他笑笑说：“年纪大了，应该让年轻人了。”

12月17日，是胡适70岁生日，胡适在台大医院的待一号病房里度过了他的七十寿辰。胡太太江冬秀女士特地亲手做了一些寿桃、寿面送到病房，“副总统”陈诚派人送了一大篮鲜红的玫瑰花。胡适谢绝了任何祝寿仪式，但前往医院祝寿的人仍络绎不绝。亲友在门口挡驾，但进入病房的人并不少，门口所列的两大册签名簿，填满了政府首脑及学术界人士的名字。胡适披着一件紫红色睡衣，坐在床上捧着于右任老先生亲笔题赠的《右任诗存》细心欣赏。有记者请他发表一点“七十感言”什么的，他笑着说了两个字：“老了！”胡适看了签名簿上的寿序，其中书法家毛子水写道：“胡适之先生四十五年来对祖国文化和教育的努力，是没有前例的。”胡适又笑着说：“每篇寿序都使我看了脸红。”

1962年2月24日上午，胡适到南港“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馆主持第五次院士会，王大中、吴大猷、吴健雄，袁家骅等院士，由国外赶来参加，胡适感到格外高兴。会上选举了七位院士：任之恭、梅贻琦、程毓淮、柏实义、李景均、陈、何廉。其中有五个是住在国外，在台湾的只有两人；而当天出席会议的只有陈，梅贻琦因病未到。翌日下午举行酒会，共一百余人出席。胡适首先致词说，这次院士会议是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海外四位院士回来参加更令人高兴。接着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的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验证“对等律之不可靠”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又说：“中午聚餐时，吴健雄还对吴大猷说，我高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他讲完后，李济接着发言，大意是，科学不能在台湾生根，他对此感到忧虑。接着吴大猷代表海外来的发言。他的发言回答了李济提的问题，他说，不能生根的原因主要是缺乏适宜的环境。胡适表示赞成吴的发言，接着便发起了牢骚：“我去年说了25分钟的话（指在“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的讲演），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

迎之至。”讲这些话时，胡适显得非常激动。他说不生气，大概是不能自抑了。又说了几句，声音很大，突然把话煞住说，“好了，好了，今天我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吧，谢谢大家。”这时正是六点半，人们开始散了。胡适站起来送客，一转身，忽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脑袋碰在桌边，再摔到磨石地上。经紧急抢救无效，心脏停止了跳动后将遗体抬上床时，可能是移动了身子的关系，只听得胡适叹了一口气，就这样与世长辞了。

潜心治学

1948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国民党政府面临崩溃。蒋介石欲改组政府以收揽人心，于是在南京召开“国大”。美国人此时想借机将亲美的胡适扶上“总统”宝座，老奸巨猾的蒋介石为讨美国人欢心，亦假意装出让贤姿态，请胡适出任“总统”。此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博士一度凡心旌动，欲就政坛高位，转而看出蒋介石不过口头说说，表表姿态而已，并无真心让位之意，乃婉言辞谢。

至11月，蒋介石派陶希圣赴京，与胡适多次会晤。12月，陶希圣奉命再邀胡适到南京任行政院院长，全权组阁。一个风霜之夜，陶希圣到东厂胡同胡适的住宅，在胡的书房里作了一次长谈。胡适此时已觉国民党大势已去，无心再搅和进去，便推说有心脏病，不能胜任这种繁重的职务，却推荐傅斯年等人阁。陶说：“你何不选他为副院长，将日常的院务交给他做？”胡适正色道：“我不担任这一职务则已，担任了就要负责任，不能推。”

此时，杜鲁门压倒杜威再度连任美国总统，胡适所希冀的美国的强有力的支持已成梦想，遂觉大局已定，开始整理行装。随时准备南撤，书房里一片狼藉，一百多箱书根本不可能带走。胡适嗜书如命，却又无可奈何。他托陶希圣将其父的遗稿及自己的《水经注》稿带往南京，交傅斯年保存。他对陶说：“我不打算收拾书籍，就这样散在那里。我决意不先走。我一动学校就散了。”

此时北大已人心惶惶。常有人来问胡适对时局的看法及他本人是否有离北平及迁校的打算，他总是苦笑着说，他是支持傅作义的，如果这时候谈迁校，对北方的民心影响太大。

12月13日，胡适为北大50周年校庆特刊撰写了《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文，回顾了北大发展的历史，结尾处说：“现在我们又在很危险很艰苦的环境里给北大做五十岁的生日，我用沉重的心情叙述他多灾多难的历史，祝福他长寿康健，祝他能安全度过眼前的危难，正如同他度过五十年中许多次危难一样。”

12月15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派飞机到北京接胡适等人。胡适临行前一宿不曾睡，只是看着他多年购置的一百多箱书发呆。最后决定只带一部二十

六回本的《石头记》抄本走，他说“这是我的宝贝”。当天夜里10点钟抵达南京。

胡适此时心灰意冷，对国民党不再抱甚希望，决意潜心学问。1949年初，胡适在南京中央研究院举办的蔡元培先生纪念会上讲《整理四百年来的水经注成绩小史》，报告他研究《水经注》的心得。这是他准备终身从事的学问之一。之后移住上海霞飞路，继续潜心治学。2月作成《齐白石年谱序》，并联系出版了此书。这是他在大陆出版的最后一部书。

在上海的这一段日子里，胡适很是很难堪。一个丢了地盘的空头大学校长，又值江河日下，不甘冷遇的他提出“和比战难，苦撑待变”的口号，遭到一片热骂冷讽，所谓一介文人书生，坐着说话不嫌腰疼。精神上痛苦、晦暗之时，私下里和一些好友商量，筹组《自由中国日报》在上海出版，还预备着呕心沥血“以言论救中国”。不料上海的局势也渐渐不稳起来，遂准备日后到台湾去出版。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4月上旬，胡适受国民党政府委托，以私人身份悄然去美，乞求美国政府援助。赴美途中，胡适在船上替《自由中国半月刊》拟定了四条宗旨，又为早年好友陈独秀死前遗留下来的论文及书信的一本小册子写下《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序言》一文。

这时国内“国共和谈”破裂，人民解放军已经打过长江。5月，胡适先后三次去华盛顿访问许多同情国民党政府的美国人，都说是一筹莫展，有心无力。他看到这班老朋友如此灰心丧气的失败心理，“感到不是私间的谈话所能转移的。16日通知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其后，避居纽约，美国许多大学来聘请他，都拒绝了。据说美国有位曾经做财政部长的资本家特在匹兹堡大学捐设一年俸万余的讲座，并新建住房，供他终身使用，结果也被他拒绝了。表明他是不愿入美国籍的。1950年在他花甲之年，国民党台湾当局曾送给他6万美元的所谓宣传费，也被他全数退回。仍与其老妻江冬秀过着异乡生活。后来他回忆说，“在外国，什么都要自己动手做的，哪有人来帮助我？”为了生计，这年他接受了普林斯登大学之聘，任该校东方图书馆馆长，为期两年。期满后仍任荣誉主持人。胡适除做好本职工作外，全部精力几乎都用在《水经注》的考证上。关于《水经注》的真伪问题，他从1943年开始重审此案，前后用了将近二十年的功夫，对于所谓“戴（震）偷赵（一清），赵戴皆偷全（祖望）之说”，进行了全面的考证。此案一百多年来几乎已成定案。现在他用千百个证据，把这个诬告案子昭雪了。他认为戴并没有抄袭赵的书，也没有抄袭全的书，而是赵家的人抄袭戴的书；全的书，有部分是自己的，其中一部分是托先世的，胡适说他不老实，“英雄欺人”。又说：他自己开始审这个案子是打抱不平，要为同乡戴震申冤。这桩学术公案经过胡适的长期考证后，使全祖望、赵一清、戴震都有了一个公平的评价，这对后人的研究颇有帮助，在学术史上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胡适在美国的日子过得并不富裕，他与夫人住在纽约一家公寓，进门就是一小客厅。有客人来，由胡夫人亲自斟茶。

1951年12月17日，这天是胡适的生日，天气很冷，大雪纷飞。他在普林斯登大学讲学回家的车上，暗自思量：今年已是61岁了，所得的心脏病，连人寿保险公司都拒绝保险，他常带着药瓶走路，生命可能忽然结束，所以下决心，无论如何，应在有生之年，还清一生中所欠的债务。于是定下“生日决议案”：第一笔债是完成下卷《中国思想史》；第二笔债完成下部分《中国白话文学史》；第三笔债《水经注》的考证也应该判决了；第四是如果国家有事，只要力所能及，无论为团结自由力量，为“自由中国”说话，都愿尽力而为。由此可看出，胡适客居外域，晚景并不乐观，其中苦楚凄凉、思念故园之情，跃然纸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第二年他应台湾大学与台湾师范学院讲学之聘，由美第一次回台湾。在台大他以“治学方法”为题，连续作了三次学术报告。讲的内容，多是过去的老话，他说：方法是什么呢？我曾经有许多时候，想用文字做一个公式或一个口号、一个标语把方法扼要他说出来，但没有一个满意的表达方式。现在我想起二三十年前的那两句话，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治学方法的一种很简单扼要的话。

胡适此时拿出了他早年留美时练就的看家本领——演讲。他口才极好，思路敏捷，表达准确，语调铿锵有力，抑扬顿挫，加之潇洒有力的手势，很能鼓动人。这几年他对治学方法颇有心得，古今中外，信手拈来，旁征博引，妙语迭出，很受青年人的欢迎。这似给他并不年轻的身体打了强心针，重又活跃起来。

第二次讲治学时，他告诫青年人要养成“勤、谨、和、缓”的良好习惯。所谓勤，就是不偷懒，举他考证《水经注》上天下地去找材料经验为例。谨，是苟且，不潦草，不拆滥污。孔子说的“执事敬”，就是小心求证的“小心”两个字。和，是虚心、不武断，不固执成见，不动人气。他说：“动了肝火，是非就看不清楚”，“谦虚的跟着事实走，不管它带你到什么危险的境地去”。这就是和。缓，是不要着急，不要轻易发表，不要轻易下结论。在证据不充分或不满意的时候，姑且悬而不断。悬不是不管，而是去找新材料，等到找了更好的证据，再来审判这案子。他认为这点很重要，“如果不能缓，也就不肯谨、不肯勤、不肯和了”。最后他说，有好习惯当然就有好的方法，好的结果。第三次讲方法与材料，大意是说：材料可以帮助方法；材料不够，可以限制做学问的方法；而且材料的不同，又可使做学问的结果与成绩不同。他说，做研究工作要得以好的成绩，需要三个条件，（一）直接的研究材料；（二）能够随时地扩大材料；（三）能够扩充研究时所用的工具。他举《红楼梦》的研究为例，说：因为所用方法比较严谨，比较肯去上天下地动手动脚找材料，所以我们研究工作才能有点成绩。这点是他感到可以自慰的。

胡适早年师从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攻读博士学位，他一生对杜威的实证

主义哲学推崇备至。他曾在台湾师范学院讲《杜威哲学》两次，又应社会各界之聘，作了多次演讲。有一次，在新闻界的欢迎会上谈他治学的经验，其中特别强调要“小题大做，不要大题小做”。他说，“我教书教了三十多年，都是拿极小的题目，各方面研究周到。否则便毫无用处”。“能够这样研究下去，一定有成。”并引佛语“功不唐捐”来加以说明，努力是不会白费的。此外，他在台东曾与中学生讲《中学生的修养与择业》问题。关于修养，他说应该注意两点：（一）是工具的求得，不论就业或升学，语言文字是最需要的工具；其次是基本的科学知识，在学校里读书，应该把它当作求知知识、做学问、做人的工具。他说，拿工具的观念看功课，功课便是活的，这也可以说它是中学生治学的方法。（二）要养成良好的习惯。他说中学生是定型的阶段，与其注重治学的方法，倒不如提高良好的习惯的养成。有了良好习惯，无论做人做事做学问，将来都会有成就的。至于择业，他主张应该根据个人的兴趣、性格、天才，看适于那一行、能干什么，就去干什么；不可赶时髦，求好的待遇。选择学业也如此，应该根据自己的性情、天才来决定，不可勉强从事。

胡适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加之留美多年，学贯中西，天资聪颖，兴趣广泛；兴之所致，均有所获。在大陆时，他已奠定了在哲学、文学领域的泰斗地位。离开大陆之后，他亦广泛涉猎于文学、哲学、考证、历史、教育之间，虽不深入，然见解独到，笔锋犀利，有专致于某一领域者不及处。他不是个甘于寂寞的文人，喜名喜利，喜夸夸其谈，亦常有哗众取宠之举，故亦处处招人嘲讽与非议。然胡氏不怕人骂，我行我素，特立独行，自得其乐。

胡适不是个成功的政治家，却不失为一个成就卓然的文人。他以一腔书生气、满腹经论翩然穿行于美台之间和学术与政治之间，为传统型学者不耻，为职业政治家们所嫉。他正应了现代文人徐卓呆的名言：“为人之道，须如豆腐，方正洁白，可荤可素。”他一生功名成千书卷气，却终为书卷气所累。

观中国历史，觉中国文人不仅与中国老百姓隔了一层，与中国之政治亦终格格不入。其实对读书人之重视，中国举世无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那书读好了就可去当官，治国平天下。然文人当官者终难以为久，不是被杀了头，就是“归去来兮”，文人们非不能为之，即不屑为之，总觉得读书人之本份在著书立说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所谓“文章千古事”，官场如烟云。胡适幼即熟读经史，自然得“学而优则仕”其意，却终脱不掉文人清高的架子，故当不了合格的政治家，只能为一文人。有言毕加索之成功在于将艺术与金钱结合之成功，套之，则胡适为文人的成功在于将学问与政治的结合的成功。

人生哲学

胡适幼年丧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日子并不宽裕。但其母教子极严，

虽未学孟母三迁，仍留下师训子的佳话。胡适幼时即熟读经史子集，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后留美多年，接触了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回国后挥舞新文学运动的大旗，在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和左冲右突中逐渐形成了他具有独特色彩的生命哲学与人生观。

在人们的印象中，胡适是一个极具中国传统型文人学者风范的大学者。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流布深广。他一生专治的学问，为《水经注》研究、《中国哲学史纲》等，考证色彩很浓。但他毕竟不是传统的书斋型文人，他博览古今，学贯中西，兼涉政治，爱出风头，以至身后多年仍被众说纷坛。

观胡氏一生，仍是被深深烙上“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学说的烙印。以此观胡适，便不难理解他周旋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并几度沉浮的一生。他把介入政事作“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遇挫折则回到书斋，专心治学以独善其身。他的一生都在这种人生理想与现实社会的矛盾冲突中观望徘徊。他的被人骂为“老油条”也不外因乎此。

1959年1月7日晚，胡适应台湾大学华侨同学会邀请，作了题为“一个人的人生观”的演说。在这篇演说中，胡适以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为起点，谈到知识的快乐，谈宗教问题。从这篇演说中，可集中看出胡适的人生哲学。

胡适认为，人生观是一个人对于人生的态度，每个人都有个人自己的人生观。他说，他在年龄上多活了几年，他要将他生活和经验中得到的一些体会，给年轻人作为确立自己人生观时的参考。

其主要内容可分为这样几个方面。

健全的个人主义 胡适认为，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是平凡的，也是不令人骇怕的。现在有许多人认为个人主义是洪水猛兽，可怕万分，事实上并不这样，真正健全的个人主义的出发点，并无一点可怕成分。在中国的思想史上，就有一个很健全的个人主义思想，那就是大政治家王安石。王安石一生克己刻苦，在衣食住行方面从不讲究，并且一生为国，谋福谋利，看起来似乎不是个人主义，但在其诗文中可以看出，他的人生观是“为己，为我”。王安石有一篇文章叫《杨墨》，“杨”是杨朱，“墨”是墨翟。杨朱主张为己，墨翟主张为人。王安石在这篇文章中，非常赞赏杨朱，他说：“杨朱为己，学者之本；墨翟为人，学者之末。”象王安石这样一个不为己的人，却看中了杨朱的“为己”，为什么？胡适说，王安石当时还有一句话说：“为己学者之本，为人学者之末；学者治事，必先为己，其为己有余，则天下事可以为人，不可不为人。”意思是说，一个人在最初的时候应该为自己，在有余的时刻，就该为别人，而且不可不为别人。

胡适还举了易卜生为例。易卜生晚年曾经给一年轻朋友写信说：“最期望于你的只有一句话，希望你能做到真实的、纯粹的为我主义；你要有时觉得天下事只有自己最重要，别人的不足想；你要想有益于社会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你这块材料铸成器。”胡适说，易卜生这段话，就是最健全的个人主义。

人主义，一个人应该把自己培养成器，使自己有了足够的知识、能力与情感之后，才能再去为别人。

修己以安人 胡适先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子路有一次问孔子说，怎样才能做一个君子；孔子回答说：“修己以敬”。这句话的意思是要将自己慎重地培养、训练好。子路问，这样够了吗？孔子说：“修己以安人。”意思是自己培养、训练好了，再去为别人。子路问，这样够了吗？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意思是修养好了自己，再去为百姓，就是圣人如尧舜也很不容易做到。孔子这一席话，也是以个人主义为起点的。由此可见，从19世纪到现在，从现在到孔子时代，差不多都是以修身为本。因此个人主义并不是可怕的，尤其是年轻人确立自己的人生观，更是需要慎重地把自己这块材料培养训练教育成器。

知识的快乐 胡适说，他现在已经68岁，转眼即将70岁。他的人生中，认为最值得与年轻人谈的，就是知识的快乐。一个人怎样才能使生活快乐？人生就是为追求幸福与快乐的。美国独立宣言中曾提及三种东西，那就是：

生命，自由，追求幸福。但是人类要追求的快乐范围很广，例如财富、婚姻、事业、工作等等。但一个人的快乐是有粗有细的。胡适说，他在幼年的时候不用说，从他有知以来，他就认为，人生的快乐就是知识的快乐，做研究的快乐，找真理的快乐，求证据的快乐。从求知的欲望与方法中深深地体会到人生是有限的，知识是无穷的，以有限的人生，去探求无限知识，实在是非常快乐的。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胡适从这样一则故事讲起。有人问子路，你的老师孔子是一个怎样的人。子路不答。后来孔子知道了说，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你的老师“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胡适认为，从孔子这句话里，可以体会到知识的乐趣。还有一则故事，古希腊有一位数学家阿基米德，一天他被国王请去计算金制成的王冠有没有掺进银或铜。他没法计算，一天到晚苦苦思索。几天后，他到澡堂洗澡，当他跳下水中，水就溢了出来。他顿悟所以，高兴异常，赤身露体地从澡他跳了起来，沿街跑去，嘴里叫着“我找到了！我找到了。”这说明了知识的快乐，一旦发现了证据或真理时的难以言喻的快乐。

追求新知识的精神 胡适分析说，英国大诗人勃朗宁新著的一首诗《一个古语法学者的葬礼》；另一位诗人丁尼生写的一首关于古代希腊大英雄尤里希斯不愿做小岛的国王，而要继续冒险的诗，都体现着十九世纪冒险的、追求新的知识的精神。尤其是丁尼生诗中说的“过去的是过去了，现在我们还是我们；过去惊天动地的事是消逝了，但现在的我们还是我们。虽然时间与命运使我们渐趋衰老，然而我们的意志仍然坚强；我们要永远去发现，永远不停步。”

三“立”与三“W” 胡适谈到宗教问题时说，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不信灵魂与鬼神；但他认为一个人总是有一种制约的力量。相信上帝的人，

上帝是他的制约的力量；我们古代讲孝，于是孝便成了宗教，成为一种制约。现在台湾宗教很盛，有人信最高的神，有人信很多的神，尤其是现在处在这动乱的时期中，许多人为了寻求精神上的慰藉都走上宗教的道路。他所说的宗教，乃是一种说法。中国古代亦有此种观念。当孔子四五岁时，有位圣人即讲过人生有三种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立德”是讲人格与道德，“立功”就是建功，“立言”就是思想语言。在国外也有三个W之说，就是Worth, Work, Words。这三个不朽，没有上帝，也没有灵魂，却不十分民主。一个人要立德、立功、立言到什么程度，胡适认为范围必须扩大，因为人的行为无论为善为恶都是不朽的，我国古语云“留芳百世，遗臭万年”，便是这个意思。

言行对社会负责 胡适把两千五百年前释迦牟尼的故事，孔子所解释的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以及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从社会影响的角度作了比较。他说，一个老乞丐的死，使释迦牟尼创造了佛教，希特勒的那本书制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牺牲了数百万生命，这都是不朽的。他用痰和细菌来说明这不朽的道理。他说，一个人在社会上，他个人的为人，他个人所做的事，有渺小的也有伟大的，这渺小与伟大的事均会在某一时间，某一一人、某一场合有其善的影响，亦或恶的影响。因此，我们的一言一行，均应对社会负责，这便是社会的宗教、社会的不朽。一个人对人的善恶好坏，以及他的人格、行动、思想、文章、说话真正对社会有影响。我们千万不能让我们的言行在社会上发生坏的影响，因为即使有朝一日我们死了，我们的留下的影响仍永久存在。我们要一出言不敢忘社会的影响，一举步不敢忘社会的影响。即使我们不能使我们在社会上留一白点，也绝不能在社会上留一污点。社会即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制约者。

孝子婚恋 胡适与夫人江冬秀从一而终的婚姻家庭生活，乃文坛佳话，往往成为青年人对婚姻爱情的楷模。胡适毕生挥舞思想解放、反封建的大旗，却对这桩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从一而终，看似不可思议，实与他的忠孝古训的熏陶及温良性格与主张关联密切。

胡适的母亲冯顺弟在结婚后三年，丈夫就过世了。冯老太太年轻守寡，把胡适抚养成人，并使其受到系统的良好的教育。这些慈祥节义艰苦卓绝的精神在胡适幼小稚嫩的心灵里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饮水思源，崇恩报德，自幼就决定殚精竭虑来对母亲尽孝，即使牺牲其个人的某些幸福亦在所不辞。

1904年，胡适14岁时，冯老太太按家乡的风俗习惯，与他说了一门亲事，对方是旌德县江村人，与他家相距40里，名江冬秀，比他大几个月。胡适为迁就母亲，不忍违其愿，与这位自幼缠足、目不识丁的旧式女子换了生庚八字。胡适后来考取清华庚款留学名额，将赴美前，冯老太太召胡适回乡订婚。胡适既誓言对母亲尽孝，当然不敢说个不字，只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须等他学成归国后方能完婚，二是这位未曾谋面的未婚妻必须读书。两家

都乐于同意，于是江冬秀小姐开始受文化教育。

当胡适在中国公学任教期间，曾为“私塾女弟子”陈衡哲单恋有年。陈在上海号称“沙菲女士”，有殊色，美闻天下。胡适第一次见到她就心旌飘摇，不能自己；陈对胡适亦是情有独钟。但胡适格于母训，婚姻不能自主，所以对“沙菲女士”所表露的情意，采取了若即若离、不即不离的态度，虚与委蛇，并无坦然接纳和单刀直入的勇气，就这样相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终于陈衡哲等得不耐烦了，就明确问他对婚姻的态度如何。胡适答以慈训森严，不能自由。陈斥曰：“时人有谓‘不自由，毋宁死’，你为何竟甘受这不公平的约束？”胡适忸怩地回答：“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沙菲女士”不能明白胡适的这个“哲理”，当场为之气结。胡适辜负了一个摩登女子的一腔衷情，郁郁远涉重洋去了。

1914年，胡适花了一番功夫，策动旧情人陈衡哲也到美国留学。这时，四川任叔永和江西杨杏佛因参与辛亥革命有功，奖励赴美深造。他俩都是胡适在中国公学时的学生，正好在赴美途中与陈衡哲凑巧同船。以此他们到美国后过从甚密，深谈款洽。胡适原对陈衡哲负有一担子的感情债，觉得有替她找一个合适对象的义务，因而趁势替陈与任叔永做媒，并促其早日成婚，使他得以早日解除包袱，了结一场鸳梦。陈任结婚之日，胡适特题“佳人难再，国土无双”以赠，对陈衡哲未了之情，跃然纸上。胡适去国十年，一回来就同江冬秀结了婚，因江后来已经等得不耐烦，她曾这样说：“嫁妆绣剪已生锈了。”胡感其用情之专，一度倒是非常恩爱的样子。但据知情人透露，胡适在上海时表面上道貌岸然，背着人却逛窑子，玩长衫姑娘。一次胡适同郭夏初夫人、李孤帆夫妇及郭太太的妹妹等在汉口“武鸣园”吃饭，忽然对面阳台上出现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子，胡适看得目不转睛，旋即奉杯相敬：“请！请！”这倒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但以他当时的身份和地位，总非所宜。据此，有人分析说，胡适不过假装正人君子，实以强力抑制他的潜意识而已。更有人作如下判断，认为胡适对婚姻和恋爱都不敢违背与反抗现实，实乃他后来成为一个改良主义者而不是激进的革命分子的主要因素。

文人议政

胡适早年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俨然的“君子不党”古训真传，给人印象似乎他是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了。其实不然。胡适对王安石的“为己学者之本，为人学者之末；学者治事，必先为己，为己有余，则天下事则可以为人，不可不为人”甚为推崇。自然，他是以治学为“为己”，以议政、参政为“为人”的。胡适对范仲淹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也极赞赏，认为可与“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媲美，其书生气赫然。胡适早年留美的教师，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就是对政治极感兴趣的学者，他对当时美国各政党被企业财团控制的状况深为不满，曾企图组织一第三政党与之抗

衡。胡适在他的《留美日记》中提到杜威处，讨论时局的时候远比讨论哲学为多。他在1917年5月30日归国前夕的日记上这样记载着：“昨往见杜威先生辞行，先生言其关心于国际政局之问题乃过于他事。嘱适有关于远东局势之言论，若寄彼处，当代为觅善地发表之。”有这样的教师，自然会有关心政事之学生了。

胡适留美时，学习了演讲技巧。离开大陆后，他往来于美台之间，主要以演讲的形式宣扬他的政治观点。与林语堂对西方人讲中国文化、对中国人卖西方文化一样，胡适在台湾的多次演讲与谈话，均为“借美喻华”，在台湾的青年人中宣传美国的所谓科学、民主、自由；这在崇美倾向风行的台湾青年中，是很受欢迎的。

反共之心不改 1952年11月30日，胡适第一次赴台，即应一些团体之邀，在三军球场作了题为《国际形势与中国前途》的讲演，宣扬他的“自由世界”全球五点计划，强调“解放苏俄”，是一切战略的根本，如果不能解放苏俄，那么，保卫自由欧洲，保卫自由亚洲，解放被征服的亚洲和被征服的东欧、中欧的其余四点计划，必将至于落空。

胡适认为，鉴于世界范围赤色势力的泛滥与猖獗，应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结束。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自由世界所犯的三大错误。第一，“全面援助苏俄”，使苏俄变成了欧洲的第一强国；第二，由于雅尔达密约，把苏俄请回了远东，使之获得无比的利益，让它又变成了亚洲第一强国；第三，由于美国军队的有声有色、乱哄哄的复员，自己解除了自己的武装，造成了第三个错误，更进一步地使苏俄成为了世界第一军事强国。

但胡适还是乐观的，他把“反共复国”的希望押在了美国的军事支持上。美国在各地的军事扩张，尤其是大举侵朝，更是使他兴奋不已。所以他在谈到“中国的前途”时说：“我们的前途，当然是联系在自由世界的前途上。自由世界有前途，我们也有前途；自由世界有力量，我们也有力量。以过去的三大错误证明，自由世界软弱时，我们就吃苦头。今后，我们命运的好转，也将系于自由世界的好转。不过，我并不是希望二次大战复活，我们便可回到大陆；而是说，在自由世界与共产世界战斗中，我们仍然应该有所努力。我们一定要回大陆去的，但这一天，我常说它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胡适说：“虽然我们的命运系于自由世界的命运，但是我们仍然得打最不如意的算盘。我们希望的是自己如何去解放大陆，而不是我们如何回到大陆。我们的努力是要使四亿五千万大陆同胞的庞大人力，不能为共产党所利用，而变成自由世界的重大威胁。”

胡适说自己并非战略专家，但经过慎密思考，提出下面五点全球性战略计划：一、保卫自由欧洲，这项已经在北大西洋公约下开始实施；第二，保卫自由亚洲，和自由的太平洋，日本、菲律宾、台湾、澳洲、新西兰等地，签订协议形成防守线；三，解放被征服的亚洲，包括北韩及中国大陆在内；四、解放被征服的欧洲，包括中欧、东欧在内；五，最重要的，就是要解放

苏俄；这也是做到前四项的保证。胡适认为，无论美国或英国统帅部来计划战略，也应该如此考虑。

胡适在结束时，振臂高呼，呼吁大家在自由世界全球性战略中，站在自己应有的地位上，尽其应有的努力，跟定自由世界，拼力向前，这样做去，前途是会光明的。

胡适这篇闭门造车、纸上谈兵的演讲，本不足道，但对惶惶不可终日的刚逃离大陆、喘息未定的一些人，自有其鼓动力量。演讲不时为震耳欲聋的掌声淹没。随着演讲结束，大群听众冲过警卫，紧紧包围胡适，本来演讲已很感吃力的胡适不由得出了一身大汗；直到他在一群人的簇拥下挤出重围，登上汽车时，仍然排满了以一瞻胡博士风采为快的人。

1958年4月，胡适应蒋介石之邀，回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此时的胡适仍反共之心未减，只是不再似1952年回台时那样锋芒毕露；既任“院长”，乃以一种“学者”的姿态和口吻，极尽贬嘲共产党之能事。6月13日，胡适在“国立”政治大学发表题为《从中国思想史上谈反共运动》的演讲。胡博士对当时有些许自命为“中国通”的外国人认为“中国大陆为共匪窃据”之说不以为然，他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了解。这些人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一面主张“均田”，一方面又拥护君主专制，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反对独裁与极权统治。胡适指责共产党是一种专制独裁，而这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的。他说，中国传统文化是顺乎人性的，而共产党是背逆人性的。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思想，是建立在乎平常的人性和人情之上的；老子和孔子都不主张极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与基督教的“己所欲，施与人”，二者其义虽然相似，但比较起来，还是我们的老祖宗更近人情。

胡适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很好笑，来源自一篇小说。他说，共产党是不是讲人性、重人情呢？他看过一篇小说，是一位名叫姜贵的青年作家写的，名《今 机传》，内容述及共产党在山东时的一段历史，其中一个人对一位老共产党员说：“你老人家干共产党，是离开现实的，你所凭的只是一种永远不能实现的理想，象修仙的人，学着打坐、辟谷一样……”。

胡适说，共产党用暴力来维持它的政权，用一种“永远不能实现的理想”来统治，这都是我国古代根本没有的，既不通人性，也不通人情；孔子曾说过：“其父攘羊，而子证之，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是表示人性与人情。在文明国家所制定的法律内，皆有自己的亲属不能作证人的规定，也就是顺乎人情；而在共产党的社会里，却叫人父控其子，子控其父，将人情完全抹煞。

胡适对私有制社会吹捧备至，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是人人自食其力的社会，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的理想化社会，也就是私有财产的社会。以此攻击共产党的公有制不合人性。

胡适说，中国不仅是农业国，也是个商业国家，我们的老祖宗并不反对

做买卖；农工商人士人人平等，人人可享受自由，人人都应该有财产；可是共产党却不许人做买卖，想出“公私合营”的办法，来吞并人民的财产，拿别人的本钱来做了自己的生意。

胡适以老子及孔子的“无为政治”来说明古代的自由思想。他说：“再看看大陆上的共产党，不但处处干涉，并且干涉到别人的家庭，使每个家庭毫无隐蔽，象这种政治，是否符合中国的思想呢？……共产党竟然不尊重人格，不尊重真理，而抹煞了人的自由。我们反共，也就是为了这些理由。”

胡适说，他个人一直是反对共产党的，共产党也反对他；共产党为了“清算胡适”刊行了一部分书籍，其中《胡适思想批判》就有八大章，共三百万字；这些书倒是印得好，布面精装；此外还有一套《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也有七八十万字。胡适说：“我从未批判过马克思主义，他们竟认为我是马克思的死对头，认为我的一生全是为了反对马克思，其实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共产党的眼睛倒是很亮，居然看出来了。”

胡适最后说：“其实，揭穿开说，他们清算胡适，就因为胡适要求证；不管任何主义，都应该尊重个人自由。我在《胡适文存》里曾以红楼梦小说人物考证，并不是叫你们看小说，我是叫你们获得一种方法，叫你们不受欺骗，一切都要拿证据来。我曾说过，让孔夫子孟夫子牵着鼻子走，不算好汉，给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也不算好汉。”

胡适的这篇演讲，貌似学者姿态，书卷味十足，其实连外行也能看出来漏洞百出，完全立不住脚。胡博士早年的“多研究些问题”的实证主义荡然无存。不说人生之价值、信仰并非“不被人牵着鼻子走”这类书生气十足的方法论的问题，即便如此，被美国人牵着鼻子走，是否就算作好汉？

当年胡适逃离北平，有人问他的儿子（胡思杜）是否一同来了南京，胡博士似笑非笑地说：“他没有来。我也不勉强他和我一同南下；因为我觉得，年轻人接受新事物和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比我们要强得多。再说，谁也不能主观地断定共产党不会把中国弄得好好的。”

看来胡博士早年对共产党并无多大介意，而晚年的高喊反共，及殚精竭虑出谋划策，要么是为了讨蒋氏欢心，要么是为了显示自己信仰之不变，抑或文人之哗众取宠、出风头的劣根性使然。

科学救国 1910年，胡适考取留美官费生，入纽约州康乃尔大学，在选择专业时，他很犹豫了一阵。他二哥曾劝他学工矿，以便将来回国时好谋事，而他对这个实在是没有兴趣，考虑再三，来了个折中，选学农科；其中原因还有农科不收学费，他可将官费节约下来，寄回贴补家用。但农科亦终非兴趣所在，后终转文科。

1958年12月8日，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到台中一游，应“中国农学会联合会”之邀，对该会千余会员演讲，题目是《基本科学研究与农业》。

胡适首先自称是“农学的逃兵”。“不过，提高农业技术水准就要在科

学、理论方面有进一步的研究”。胡适对农业，自然如他自己所称，是“门外汉”，不过这天他精神格外好，于是用讲故事的口吻，谈台湾农业进步的一些事实，举出台糖公司采用南非 0310 甘蔗种改良台湾品种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尝试”，所获得的惊人成果完全是“道地的基本科学研究的结果”。

胡适凭直觉认为发展农业科学必须从充实农业基本科学开始，也就是从植物学、动物学、微生物学、遗传学、化学、生物化学、物理学、数学等做基本研究与实验，只是台湾现在尚无完备的基本研究所和实验室。他泛泛地强调了一番基本科学研究的迫切性与重要性，并勉励大家做基本研究的学人。

和许多的知识分子一样，胡适对“科学救国”有一种直觉的敏感。他举例说新蔗种的故事就是“科学救国”的最好、最美的故事。“研究愈达基本，则将来在实用上迟早更显光明。”

胡适最后以他“昨夜所作的三个很甜、很美的梦”结束演讲。

第一个梦是“农复会”包办了台大农学院的“土壤、农业、化学、植物、病理与昆虫学”三个研究所，办成了三个第一流的科学研究机构。

第二个梦是台糖分公司包办了“中央研究院”的植物研究所，办成了一个第一流的植物学基本研究机构。

第三个梦是烟酒公卖局包办了“中央研究院”的化学研究所，也办成了一个第一流的化学基本研究机构。

胡适说：“我相信这三个甜美的梦，都是不难实现的。”“无论如何，很甜美的梦总是值得做的。”

胡适对教育也有一种职业性的敏感。有一点他是很清楚的，发展科学必须首先发展教育。胡适有一次对来访的记者谈他对台湾教育的看法。他称赞台湾的教育的普及，是大陆任何省份所没有的。他不讳言这些基础设施是日治时代就打下基础的。他象一位教育主管前来对付质询的议员似的，搬出一些比较数字，恳切地说明台湾大学数字的增加，其中侨生所占比率之大，可看出现在成绩比原有基础有了惊人的发展。他强调说，今天能把教育工作做好，也就是反攻复国有了重要的根本。

不过，胡适也提到一点尚难以尽如人意的地方。他从科学人才的缺乏，谈到出国留学生不愿回国的的问题。他说，一百个出国的留学生中，竟难得有十个学成归国。他认为，这不单纯是这些人回国后的安插和待遇的问题，还包含着台湾的学术空气的问题。因为，这些人回国后，不但要工作，还得继续学习；他们必须在一种科学的与自由的学术空气中继续有所长进。

鼓吹“民主”“自由” 胡适是“全盘西化”论者。他周旋于美台之间且深得台湾文化界欢迎的资本，就是他对美式“民主”、“自由”的鼓吹与宣扬，在各种场合与当局针锋相对而又颇具策略的斗争，当然只是在口头上。

1958年5月27日，胡适应《自由中国》杂志社负责人雷震的邀请，在

台北南阳街“中日文化经济协会”大礼堂，与 50 多位《自由中国》杂志的作者、朋友及台北市若干位民营报社的社长们聚餐。席上，胡适发表演说，先指出台湾确已较以往有更多的言论，是一件很值得兴奋的事。他说，《自由中国》杂志社在这方面所起的领导作用，以及各民营报业同仁所作的努力奋斗，都是使他敬仰钦佩的。新闻言论自由是靠人去争取来的，只要大家锲而不舍地去争取，力量是不会白费的。他推崇《自由中国》杂志社负责人雷震，在争取言论自由方面所作的贡献极大，实在有资格让文化界人士塑造铜像来纪念他。

谈到因当局修正出版法所引起的风波，他认为实在不了解当局为什么要在此时有修正出版法之举。他说，也许当局以为争自由争民主的人太多了，风气太盛了，想以修正出版法来抵制。“其实，无论是旧的或新的出版法，都不可能达到限制人民争取言论自由的目的。”

这年 12 月 22 日，胡适在《民主潮》半月刊社的聚餐会上又发表演说，谈及言论自由。他说：言论自由诚如胡秋原先生在《民主潮》所发表的一篇《论中国历史上的自由传统》文章中引用严复所说的：“言论自由只是平实他说实话。求其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55 年前严复的话，至今还是不变的真理，也是言论自由最好的注脚。胡适说，言论自由也是一种习惯，在社会上培养起容忍批评、接受辩论的习惯，言论自由的尺度自然就慢慢宽起来。怕讲民主自由的人主要是因为没有养成习惯，所以总怀疑人家的批评不存善意。

1960 年 9 月 4 日，“雷震案”发。国民党当局终于开刀，雷震等人以涉嫌叛乱条例而被捕，《自由中国》杂志被封停刊。胡适此时正在纽约，得知消息后，即打电报给“副总统”陈诚说：“鄙意政府此举不甚明智，其不良影响……恐将腾笑世界。”胡适建议将此案交司法审判，一切侦审及审判皆予公开。随后再电陈诚：“万望我公戒军法机关不得用刑审，不得妄造更大罪名，以毁坏政府的名誉。”在回答美国记者问题时，他说：“这个杂志一直是台湾新闻自由的象征。”“我诚挚希望雷震案件由普通法院审理，而不付诸军事审判。”

胡适的谈话在台湾引起了极大反响，但雷震仍被台湾军事法庭判处 10 年徒刑。10 月 22 日，胡适自美返台，当晚即声称，他个人认为，对雷震所判 10 年徒刑“太严厉而且是不公正的”。值军事上诉法庭正在重审雷案，胡适表示，他愿意在军事上诉法庭作为雷震的一个证人。他说：“我仍然相信雷震是一个爱国反共人士。”他在接见“英文中国日报”记者时的另一次谈话中说，雷震案件“在自由国家的心目中大大损害了国民党的事业，因为它牵涉到出版自由这个根本问题。”

尽管如此，胡适的奔走呼吁仍无济于事。最后，他只是无可奈何地说：“一种杂志为了争取言论自由而停刊，也不失为光荣的下场。”

胡适以自我解嘲给自己下了台阶。

此次事件后，胡适只能是在南湾（台北与基隆之间）的“中央研究院”坐冷衙门，往往通宵失眠，并患了便秘，久治不愈。一向乐观的胡适，这时见了熟人也不免唉声叹气不已。

这当口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不能不提。台中农学院院长王志鹤，是一个“党性”很强的人物，把所有主张自由民主的学者，都看成是共产党，乱抛帽子，在此之前因为省政府有将农学院改为大学之议，他为了争取校长的地位，向该院学生发表演说，主张派一架飞机将鼓吹自由民主的胡适等人空投到大陆去。此言一出，令人莫名其妙；舆论大哗，胡适自己也哭笑不得。幸而蒋介石毕竟心里有底，听到该农学院长的“妙论”，觉得此人拍马屁未免拍过了火，立即下令将此人撤了职。

非暴力、非对抗 胡适的和平的改良主义主张倒是自始至终的。早年的成名作《文学改良刍议》，即以反对文学革命，而只进行温和缓慢的改良而独树一帜。

1939年在南京和上海，胡适高唱“抗战必败”论；对内力主“和战”，主张向日本投降，对外则向日本人献计献策，言日本征服中国之唯一办法，是征服中华民族的心。其卖国贼嘴脸暴露无遗，遭全国人民唾弃。

胡适自有其书生气十足的理由，以后他亦多次阐述他的“温和缓慢”的观点。在台湾打了一场不大不小官司的《胡适与国运》事件，书之作者殷海光，这样理解和表述了胡适的思路：“如果中国几十年来居于创导地位的知识分子没有患幼稚的躁进妄想狂，而是照着严复所说的原则去做，或顾到‘可运作的程序之先后陈列’，或考虑到任何大变革之‘技术的可能性’及其结果，那么中国人民近50年来白白遭受的冤枉痛苦和惨重牺牲不仅可以避免，而且以中国潜力之雄厚，经过几十年来的现代化建构工作，那么中国不仅不会乱出一个‘秧歌王朝’，而且人民会享有和美国相差无几的自由和康乐。”

1958年12月22日，在《民主潮》半月刊社的晚餐会上的演说中，胡适谈到“中美联合公报”中的“不凭借武力光复大陆”一点，他说，这是一个“新时代起点”；光复大陆要靠实行三民主义，靠自由中国政府维系人心，这是任何人不能不接受的结论。他说，他6年前第一次回国在三军球场演讲《国际形势与中国前途》时，就从未提到过靠武力打回大陆的话。

胡适对台湾当局反共反赤的一些方式颇有微词。他认为，“以主义对主义”、“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以党对党”如此种种，问题愈弄愈糟，纠结愈弄愈乱；以此难以吸引西方人士“隔海同唱”。他对蒋家王朝的独裁、专制深为不满，但在他的非对抗主义的思路下，除了呼吁言论自由的几声呐喊外，别无良策。

1958年5月27日，在《自由中国》杂志的聚餐会上，胡适提到“反对党”的问题，婉转地说：“‘反对党’三个字，让执政党人看起来，总不免感觉刺目不愉快，甚至惶惶不安，以为一切都要遭遇反对，怀疑对方善意的动机。所以似乎叫‘在野党’三个字比较妥当。在野党的成员及其领导人，

则以文化学术界的人士以及有朝气、有热诚的青年知识分子为理想。因为，这种结构的在野党，将能以匡正时弊、改革政治为职志，而不以夺取政权为目的。”

胡适博士不想造反。

当年已被赶下台的儿皇帝溥仪，一个玩笑电话把这位在文坛叱咤风云的胡博士召进了宫，据说博士还坚持行了跪拜礼，以示君臣之别。

这年6月30日，《自由中国》主持人雷震与夏涛声走访胡适，谈他们9月份要组织一个“在野党”，请胡适做他们的领袖。胡适当场拒绝：“如果你们将来组织一个象样的反对党，我可以正式公开地赞成，但我决不参加你们的组织。”并声称：“我不赞成你们拿我来作武器。”

7月上旬，胡适赴美，遇台湾记者采访，问起政治问题，他一脸不高兴：“下半年我们没有半个字提到目前的政治情况，如今碰到你这位新闻记者，一开口便是一连串的政治性问题，真令人吃勿消……”问及民主国家的两党政治，和台湾的在野党或反对党问题，胡适摇摇手不耐烦地说：“不谈了！不谈了！”“我告诉过你无数次，我不是一个搞党的人；我的书斋都整理不干净，如何能组党？”

9月初，雷震等人因组党被捕。10月23日胡适返台，一下子成了新闻采访的中心。晚上，胡适在他的住宅对记者们说，“我很希望有一个有力量的、象样子的反对党”，但他强调他个人“决不领导任何反对党”。他说：“10多年前，我曾劝过国民党的领袖，最好是从中国国民党自由地分化出来，根据各人的政见演变成两个大党。从蒋先生以下，我都和他们说过。”

有记者问胡适博士是否有意领导一个反对党，他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胡适之要领导一个反对党。我要干政治，决不到70岁时再干。”并一再说：“我决不领导反对党。”

胡适说希望别人组织个在野党：“你们组织个在野党给我看看，如果好，我可以公开表示赞成；如果不好，我可以保留我不说话的自由和不批评的自由。”他解释说：“我说在野党是因为有些人听了反对党这个词会感到有点害怕。”

记者问外传有人请他做反对党的赞助委员，胡适严正声明：“没有这个事。”

关于现在有人组织反对党一事，胡适不愿表示他的意见。他说：“这个问题现在不谈。”

胡适博士技仅于此，他鼓励雷震与暴力对抗，雷震被暴力扔进了牢房；胡博士不耻于下三滥的“对抗”，所以仍逍遥自在。

天真的政治家 大政治家自然应是知识分子出身，但条件是只能把到此为止的学问作一从政的基础，或当敲门砖，从此弃却书生气，满腹世故，方为老练。胡适不然，他总是在治学与从政之间犹豫不决，患得患失，左顾右盼。所以他的政治言行总带有些学究气，显些天真。正应了中国俗话：“秀

才造反，三年不成”。

早在 1947 年，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制宪国民大会”，胡适被延揽其中。此时他意气风发，曾表示：“做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意思是既然已经下海，就没有自拔的份儿了。

1948 年 3 月，蒋介石召开“行宪国大”，胡适风尘仆仆地从北平赶到南京。蒋介石自然一心一意地想当“总统”，但为了表示一下“民主”和讨好美国人，曾一度示意胡适出任“总统”，胡适倒没有傻到不明白老蒋的真正意图，自然诚惶诚恐地辞谢了。蒋自任“总统”后，又有意让胡适出任“行政院长”，胡适想了想，还是不肯干。但事后与傅斯年谈起此事，胡适却懊悔起来，说是“行政院长”得处理实际政治，不是容易当的；早知如此，还不如接受蒋介石让他当“总统”的建议。胡适自然知道这“总统”不过是蒋介石的傀儡，他的理由是，不管有没有实权，“总统”毕竟是一国的元首，“行政院长”才不过等于一个首相或总理。傅斯年事后对人说：“据我看来，胡博士的凡心动了，他早晚是要卷入政治漩涡的。”

胡适 1952 年在台湾作的《国际形势与中国前途》的演讲，其提出的所谓全球性五点战略计划，亦是书生气十足，天真之态可鞠。“保卫自由欧洲，保卫自由亚洲，解放被征服的亚洲和被征服的东欧、中欧，解放苏俄”，这个战线，那个联盟，纸上谈兵，全不顾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局势的变化与发展，并声称无论美英，都得沿着他的这个思路；如此只能供人一笑。

1958 年 12 月胡适在《半月刊》杂志社的演讲中说，他对台各方喧嚷已久的“反共救国会议”的召开原则上很赞同，但不希望召开一个人数在千人以上或几百人的大会议，因为那样是讨论不出什么结果来的。他举 1787 年美国费城举行的“制宪会议”为例，说这个奠定美国百余年来永恒的安定与繁荣基础、历时 4 个月的制宪会议，只有 39 人签字。他决不相信一个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会议能替国家议出好的政策，或解决重大的问题。他并且主张救国会议应该采用商量的方式，而不是表决的方式。

胡适此说一出，得罪了不少人，许多人跳出来骂他，当局也不以为然，胡适却仍数次阐述他的这一想法，举行“小型的国是会议”，不让新闻记者参加，甚至不作记录，以使与会者在毫无顾忌的情况下发表国是意见。他一再声称：人数多的会议，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胡适此说不假，但颇天真，当局要的不过是一场气氛与声势，具体解决什么问题呢？

胡适谈治学的科学态度时曾说：“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又说：“科学的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问题是胡适将这种“科学方法”及由此形成的思维模式不仅用来治学，而且用于认识社会，认识政治，并且用来议论政事。这种“科学方法”用来做考证还可以，用来对付现代复杂多变的政事，就显得捉襟见肘了。有人甚至讥讽胡适治学其实是“小心的假设，大胆的求证”，并

一时传为笑谈。

由于胡适书生气地乱发议论，使当局及各派各别的人对他均心存芥蒂。对胡适的攻击一直未有中断，只是碍于他在学界的威望及他与蒋介石交情，未有大动干戈。终于，在 1958 年，台大教授徐子明等人匿名出版了《胡适与国运》一书，对胡适的方方面面兜了个老底，极尽挖苦嘲讽之能事，闹出了一场风波。

书中一章是《胡适的领袖欲》，从胡适的著作《胡适论学近著》中，“总结”出了胡适的一个论断：

- 一、元首一定要大学出身。
- 二、军人不足担任国家重任。
- 三、国内大学绝不能产生领袖人才。
- 四、驱逐教育界的“虎狼”，为产生领袖必经阶段。
- 五、全国会胡说的“领袖”，只好被一班“浑人”把国家带入地狱。

作者还在结论中，极尽调侃地列出了关于胡适的公式：

理想的胡说领袖 = 无知 + 无能 + 无为 + 外国大学生 = 胡适。

书中还对胡适的“反孔”、“无为”、翻译水平及“卫道精神”举例分析，一一批判。

最后，“转载”了社会公论的给胡适的“寿联”，其中有：

胡为乎来？赤地商风何太厉；
适可而止，苍生元气已无多！

胡说公行，国破庶民遭浩劫；
适逢其会，时来竖子盗虚名。

胡昧于敌破臣亡？倒孔虽卖力十分；
然非远引高飞，开路先锋终授首！

适走到精疲力竭，结局却输棋一着；
尚可例行前进，过河卒子必回头。

胡闹胡为，山河未复胡尘暗！
骗愚骗稚，民族遭殃骗子骄！

蒋氏诤友

胡适与蒋介石的私交，是许多人津津乐道的话题。1938 年，胡适出任驻美大使，1948 年蒋示意胡当“总统”，后又力邀胡返台任“中央研究院”院

长。尽管其中的互相利用、敷衍不言而喻，但仍显出交情非同寻常。个中原因，恐不只是因为蒋介石礼贤下士、重视人才。

蒋介石是何时开始赏识胡适的呢？

1932年，若干文化界进步人士组织成立了“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任主席，蔡元培任副主席，杨杏佛任总干事。鲁迅、邹韬奋、胡愈之、沈钧儒等人亦为该盟主要成员。当时胡适也曾参加，并任该同盟的北平分会主席。但不久，胡适就露出了马脚。1933年的2月间，胡适发表了一篇题为《民权的保障》的文章，反对释放政治犯的要求，并提出了他的四个原则。那四个原则是与民权保障同盟的宗旨、宣言和会章完全相背的。杨杏佛曾为此投函上海的英文报纸加以驳斥。宋庆龄、蔡元培等以胡适身为民权保障同盟的会员，竟屡次发表与同盟的宗旨和意见相反的文字和谈话，曾经电询真相，胡适竟置之不答。为了该同盟的纯正和前途，同盟议决开除胡适的会籍，并随即执行决议。胡适此举，帮了蒋介石大忙，自然深得蒋介石欢心，从这时起，开始对胡适极为赏识。

1948年冬、1949年春，蒋介石南京政府摇摇欲坠，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潮流势不可挡。国民党内部此时已人心惶惶，许多人主张与中共讲和；这在蒋介石看来，讲和与投降无异。胡适这时“挺身而出”，振臂高呼“和比战难，苦撑待变”，主张“与其向共产党屈膝，不如和共产党苦战到底”。此言一出，举国上下一片嘲骂声。胡适在此种情况下觉得去台湾也没多大意思，所以在上海解放前夕悄悄到美国去了。虽然胡适此举碰了一鼻子灰，落得里外不是人，但在蒋介石心目中，无疑是引之为知己的。在反共的旗帜下，蒋胡二人心照不宣地其实已结成了盟友。

胡适留美多年，在美国政界、文化界结交了不少朋友；因为他对美国式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及“民主”、“自由”推崇备至，回国后时时不忘宣传、处处贩卖，甚得美国一些人的欢迎。蒋介石对付共产党必须依赖美国的大力支持，他除了展开宋美龄的“夫人外交”，另一招就是看中了胡适，他要借助胡适的文化影响及与美国人的联系。1938年，他请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而胡适确也替他争得了不少“美援”。

胡适自然对蒋介石的良苦用心看得真切，这“友情”也就打了不少折扣。胡适在政治手腕上无疑逊蒋一筹，自知难以取而代之，乐得利用与蒋的关系抬高抬高身价；如此彼此心照不宣。但胡适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一直是不满的，因为这与他理想中的“民主”、“自由”的治国方针相去甚远，所以离开大陆后多年一直与台湾保持一种若即若离、不即不离的微妙关系。他知道自己一介书生，是绝计斗不过蒋介石的，所以对所谓“反对党”、“在野党”的事讳莫如深，以致于别人提到“反对党”这个词，他浑身不自在，深恐当局不高兴，而一再让人以“在野党”词代之，更不敢出面领导一个什么反对党了。

在蒋介石面前，胡适给自己设计了一种角色，那就是“谏者形象”。胡

适对范仲淹的“宁鸣而终，不默而生”的精神极为崇拜，认为可与“不自由，毋宁死”媲美。胡适一直是以“民主斗士”的形象著称的，美国人欣赏的是这点，在台湾受推崇也是因为这一点，胡适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他必须维持自己的形象。但怎样在鼓吹民主、自由与同蒋合作两方面取得平衡，胡适煞费心机，几年中似走钢丝般战兢不已。

1952年、1954年胡两次赴台，四处演说，口口声声不离政治，言必称“反共救国”，虽然漏洞百出，贻笑大方，但在声势上确造成了一种热闹气氛，这正是蒋介石所需要的，而且这时候蒋也正需要美国人的支持；故胡适在台湾受到极高的待遇。

1958年，蒋介石再三邀请胡适回台定居，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先是拒绝，后又推说生病，待进一步检查，搪塞了一气。后终于答应下来，却特地说明，只打算在台北住个把月，然后再回美国，进一步治病休养，还有，胡太太不同行，留在美国等他。

胡适面对蒋介石的如此“倚重”，却怀着一肚子鬼胎，他不敢肯定蒋介石是否会耍花招。如果不步步为营，等到掉进圈套，到时就晚了。因胡适在美国一直与李惟果、顾孟余、张君勱等“自由中国”人士来往密切，而且对台北雷震等人的《自由中国》杂志支持颇多，而这个杂志是专揭蒋介石疮疤的。如此内外夹攻，使台湾一帮人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美国人的信任；当局有人认为，一段时间内“美援”的削减与此多少有关。胡适知道蒋介石对他心有不满，但躲在美国，又有美国人撑腰，蒋鞭长莫及。如今蒋以“院长”相诱，只等胡到了台湾，就可以不让他再去美国。在美的“自由中国派”少了这张招牌，就不会再闹得那样起劲了。蒋介石的釜底抽薪计，胡适心里完全有数。问题是他一向以“学者”自居，如果硬是回绝“振兴学术”的重任，面子上太说不过去。胡适只有“拖”。但蒋介石一点不肯放松，不断地打电报和派人催促他早日返台上任。同时，蒋又向美国人示意，希望能够劝胡适走一趟，因为这样既可替台湾打打气，也提高一下台湾的学术水准。

再说美国人支持“自由中国”运动本来不是公开的事情，不好意思做得过分露骨。况且，把蒋介石和胡适放在天平上称一称，毕竟蒋的份量重一截。既然美国人也觉得胡适该回台湾一趟，胡适就无法可想了，只得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胡适明白此去一如“过河卒子”，为了保险起见，他把老伴留在美国，好作为将来离开台湾的借口之一；同时一再言称自己的病需要休养，留下最后一条退路。

胡适知道这一趟凶多吉少，奉行的是“光棍不吃眼前亏”的原则。他的返台，在台湾引起很大反响，一些报纸刊文说，胡适博士至今仍拳拳国是，不忘社稷，回到祖国履行他的“安危共仗，甘苦备尝”的诺言来了。一下飞机，就有记者叩以时局感想，胡适装聋作哑，三缄其口，冒出一句：“这个时候多说话是不聪明的。”

舆论界对胡适的躲躲闪闪大为不满，认为胡适一向是蒋介石的诤友，过去，所有满朝文武，在蒋面前只知唯唯诺诺，足恭听训，无人敢作折槛之争，只有胡适先生一介书生，以超然姿态相机进言，而往往言必有中。1957年逢蒋70寿辰，胡适先生写一短文，劝蒋试试古代哲人所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话说的相当婉转，蒋介石当时“婉辞祝庆，虚怀纳言”，并不以为忤。人们对胡适的归来寄予极大的希望，而他却如此扭扭怩怩，岂非“老油条”一个？

其实胡适何尝不想保持自己“民主斗士”的形象，只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站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大学者胡适对明哲保身的道理素来力行不懈，他只能挑些蒋介石爱听的话说，虚与委蛇。此后，台湾的民主运动兴起一个高潮，胡适一段时间较为活跃，四处演讲，批评政府不该修正出版法，对雷震等人主持的《自由中国》杂志大加赞赏。及至蒋介石大开杀戒，雷震等人琅入狱，胡适无可奈何，并无任何动作，苦笑了之。当反对党有意组党，请他出任领袖；在这群情激愤之际，他却大泼冷水，断然拒绝，温柔敦厚地考虑的是“反对党”三个字对当局会有刺激。

蒋介石的“胡适牌”打的恰是时候。

胡适的好友程天放后来有这样一段话评论胡适：“他对国民党有不满意的地方，对政府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可是他只是向党的负责人或政府负责人当面直言，而决不任意公开批评，尤其不肯在外国人面前讲本国政治上的缺点，来削弱政府的威信。这和有些自命民主人士比较，专门在美国人面前骂政府，企图以美国的力量来推翻政府，让他们掌握政权，人格的高低真是不可以道里计了！近年来，凡是想利用他的声望，来做反政府反国民党的幌子的，都为他所拒绝。这说明他是国民党和政府的一个诤友，他的批评完全出于爱国家、爱民族的动机。他个人丝毫没有政治野心，也丝毫没有权位观念。”

这段话，正是胡适要表现给公众评价的理想形象。说他完全没有政治野心也未必，但他不是个不顾一切的人。他时时给自己留有一条或几条退路。他的返台，不能说全无政治目的；虽然他曾预料过蒋介石的态度，但没想到蒋介石翻脸如此之快。胡适有郁郁不得志之感。1958年6月16日，胡适即以接老伴来台为由返美，在机场发表谈话，流露出对蒋介石当局的不满情绪。他说，“此次回国仍然看的时候少，说的时间多”，对“访问日程”安排有不便之感；还埋怨“中央研究院”的“经费及设备尚须从长计议”，弦外之音明显流露出蒋介石对他这位院长先生并没有“鼎力支持”。

7月，胡适在美国对台湾记者说，在台湾，他谒见了蒋总统好几次，但都没有长谈，更没有谈到建立“中华民国”的两党政治和民主体系，原因是“总统”太忙，到台湾不久，土耳其总理访台；土耳其总理走后，伊朗国王又接着访台。“总统”忙了一阵以后，到南部休息去了，以后就只能待10月携眷归去之时再说了。他重复表示，他本人对政治绝无兴趣，更不愿意领导组党。他的兴趣始终在学术文化界，以后更绝不离开这个岗位半步。

后来胡适果然再无兴趣于政事，专心于治学、疗养。但他对蒋介石的不满仍时有表露。1960年3月19日，选举“总统”的前一天，胡适突然称病住进了中央大学医院。一些政治观察家认为，胡适在“总统”选举日前夕突然患病，理由是心脏衰弱，但显然是避免出席第二天的“总统”选举。胡适是“国大”代表，如不患病，是不能不出席的。

台湾当局隆重治丧

胡适死后，“中央研究院”院士会继续进行，趁有关人士都在，旋即成立治丧委员会，推定“副总统”陈诚为主任委员，张群、王云五、王世杰、朱家骅、蒋梦麟、黄季陆为副主任委员，委员有于右任、谢冠生、吴健雄等数十人。

陈诚闻悉胡适去世，即于晚八时半往“中央研究院”，向胡适遗体致吊，向胡适遗属致唁；并指示治丧事宜后，方始离去。

当晚，胡适生前的王秘书向治丧委员会报告，胡适曾交给他一个小箱子，说是里面有他很珍视的东西。在委员们监证下打开，里面是一些已完成的文稿，还有一封胡适1957年用英文书写的遗嘱。遗嘱是1957年6月4日胡适在纽约一场重病之后写的，在上面签字的有胡适生前友好四人。经钱思亮翻译，并当委员和记者们宣读。遗嘱共有六条：

一、身后愿火葬，骨灰则由治丧的友人们执行处理。

二、离开北平时，有102箱书留在北京大学，希望光复大陆后，北大又恢复自由大学的生命时，把那些书全部捐给北大。

三、我的画像（一位美国人画的）送给中央研究院。

四、家中一切文稿、论文和存书，全部捐赠台湾大学。尚未出版的文稿，请由毛子水先生和在哈佛大学教书的杨联升整理，编辑或作出版上的安排。

五、个人如有遗产，如果我过世时，江冬秀女士尚健在，则全部给江冬秀；如我过世时，冬秀已先我而去，则归祖望兄弟二人；如届时祖望兄弟中有人先我而亡，则给孙子们平分。

六、遗产处理由四位证人代为见证处理。

2月25日，治丧委员会开会决定，3月2日举行大殓公祭，3月1日民众瞻仰遗容。在会上，有人发言认为胡适遗嘱中并未坚决强调火葬，于是主张能用棺葬，以留下这一代伟人的骨骼，不要化为灰烬；但也有人主张尊重胡适遗嘱；相持不下，最后决定由江冬秀女士自己决定。江同意棺葬，会议还通过要在“中央研究院”觅地建墓的决议，并运金门的花岗石作材料。

3月1日中午，蒋介石冒着细雨，来到台北极乐殡仪馆，与胡适遗体告别。这时馆里已聚集了许多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蒋介石步入灵堂，对

着静静地躺在鲜花丛中的胡适遗体 and 遗像三鞠躬。然后，他沿着红色丝绒带子围起来的走道，走到前面隔着的白色的纱罩前，瞻仰遗容，后安慰胡祖望不要过分悲痛，并让其转达让江冬秀女士节哀。

3月2日，胡适遗体举行大殓。各单位公祭自上午八时半起。首先由“总统府秘书长”张群代表“总统”致祭；然后是事先登记的近百个单位，包括“总统府”、“国民大会”、“立法院”、“教育部”、“外交部”、“外交使节团”，各大专院校以及教育学术机关团体等。到下午二时结束时，致祭人数近两万人。上午九时半，“副总统”陈诚率胡适治丧委员会公祭胡适。陈诚亲自主祭。祭文如下：

维中华民国51年3月2日，中央研究院故院长胡适之先生治丧委员会全体同仁，谨以鲜花清酌之仪，致祭于先生之灵曰：

呜呼！何国运之先蹇，乃遽损我哲人，忆昔日之色笑，疑噩梦而非真。溯先生之壮年，早蜚声于寰宇，既闾中肆外，爰掌教于上庠。导士林以先路，振文风之颓唐，著说论以牖民，倡自由与民主，阐科学之真谛，作中流之砥柱。观先生之治学，维实证之是求。理虽赜而必探，事无微而不搜。当国步之艰难，历聘向乎欧美，宣正义于殊方，扬国威乎遐迩。迨日德之煽乱，烽火遍乎寰瀛，乃衔命而出使，国是赖以权衡。迨胜利之来临，爰归国而长大学，遇匪乱而赴美，作反共之先觉。及既返乎台员，为群彦之祭酒，多士荷其裁成，国人仰为泰斗。维先生之议政，言无隐而必诚，作政府之诤友，息反侧之纷争。维先生之持躬，允克忠而克恕，若霁月与光风，故不忧亦不惧。维先生之接物，咸蔼然而情亲，人无分乎中外，位无别乎尊卑。方幸国有老成，为万方之矜式。何期天不愍遗，意怛化于瞬息。呜呼！天惨惨而色暗，风萧萧而声悲。叹招魂之无处，对遗写而泪渐。呜呼哀哉，尚飨。

公祭结束后，即举行家祭。江冬秀女士几度痛苦昏厥。家祭后，二时半举行大殓，随即出发，自极乐殡仪馆，经南京东路，转敦化路，由中正路至南港“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李济于院门口迎灵，并敬献花圈致祭后，将灵柩迎往会议室；孝子胡祖望捧胡适的灵位，安放在灵台上。灵堂布置得极其简单肃穆。门首高悬白布横联，上书“胡适之先生灵堂”，堂内布幔上悬“总统”所颁“智德兼隆”挽额，挽额下置胡适69岁生日时的放大照片，照片下一张长桌，桌上四色水果，一双白烛，一束白花。胡适的灵柩上面，覆盖上了一面北大校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出殡路上，至少有5万人送殡。沿途参加者云集，经过路上人山人海。乘车的、骑车的、步行的，长达数里；孝子胡祖望曾出面谢客，但没有人离去。灵车经过处，许多机关团体及商店住户自动设有路祭。特别是在南港，几乎家家户户门首均设祭台，上置鲜花美肴，燃放鞭炮致哀，男女老幼都立正敬礼静静地目送胡适灵柩缓缓驶过。

美国国务卿鲁斯克代表美朝野唁电台湾“外交部”，对胡适逝世表示深

切哀悼，电文中说：

“胡博士之逝世，美国政府与人民深为哀悼。胡先生乃一学者与外交家，兼为良师益友，与美国人民关系特别亲密。彼具有勇气与智慧，领导世人为反抗压制人类精神者而奋斗，实为本世纪不朽伟人之一。”

大殓事后，“总统”蒋介石发表明令褒扬胡适，全文如下：

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沉潜道义，浚沦新知，学识宏通，令闻卓著。首倡国语文学，对于普及教育，发扬民智，收效甚宏。嗣讲学于寇急患深之地，团结学人，危身明志，正气凛然。抗战军兴，特膺驻美大使之命，竭虑殫精，折冲坛坫，勋犹懋著，诚信孔昭。胜利还都以后，仍以治学育才为职志，并膺选国民大会代表，弼成宪政，献替良多。近年受命出长中央研究院，鞠躬尽瘁，罔自顾惜。遽闻溘逝，震悼殊深！综其生平，忠以谋国，孝以事亲，恕以待人，严以律己，诚以治学，恺悌荣谦，贞坚不拔，洵为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之师表。应予明令褒扬，用示政府笃念耆硕之至意。此令。

胡适大殓后，其南港住所奉“总统”令辟作纪念馆。内部布置由江冬秀女士全权决定。

1962年10月，胡适墓建成。10月15日，“副总统”陈诚、政界人士及学术界人士两千余人在冷雨中前往“中央研究院”胡适灵堂行礼，然后举行了安葬仪式。

胡适墓在“中央研究院”大门前的小山上，坐东朝西。墓周由水泥和巨石砌筑，从山脚往上共40级台阶。墓碑系于右任先生题：“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先生墓”。蒋介石所题：“适之先生，智德兼隆。蒋中正”用花岗石横镶在墓的正上方。棺木靠头一端的正后方，镶了一块60公分宽、80公分长的观音石，上刻毛子水先生用恭楷题写的墓志铭，其中写道：“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的这位哲人所给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在办胡适的丧事中，各方送来的挽联，数以千计。兹录一些如下：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蒋中正

科学民主是复兴国家不二法门，愿后死得实现此一理想言论自由为促成进步必须手段，望大家莫忘记这句名言

——文星杂志社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红楼文学叹胡适涉外有名，慎内无据，申江韵事
笑徐来

——陈眉峰

您活着，有些人张牙舞爪！
您死了，有些人猫哭老鼠！

——张健生

张耕阳

讲方法，求实证，开辟了学术界新境界捐己见，重公理，树立了民主的
好规模

——赵文艺

一代仰宗师，自由、科学、民主
千秋钦大哲，谦冲、渊博、仁慈

——史次耕

与先生见过几面，觉得您和易近人，平凡不失伟大
教后辈遇事求证，不管他权位齐天，信赖要靠证据

——邓道淮

文言白话可能异曲同工，改革未完成，先生哪里去了
古典红帮发动围攻清算，毫毛无所损，他们何苦来哉

——夏鼎文

存疑、假设、求证，教我们科学方法，只有先生自由、容忍、渐进，播
种了民主思想，启发世人

——于民、何光寰等八人学界失了所敬佩的导师

政府少去肯直言的好友

——台大理学院动物学系同仁

第四节 于右任哀歌吐心曲

临终写下三章哀歌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一)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多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二)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三)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近代革命先驱、诗人、书法大师于右任先生，于1964年11月10日临终前写下的这三章哀歌，声声悲切、字字沉痛，表达了诗人对祖国大陆和故乡亲人的眷恋之情。

于右任，1879年4月11日，生于陕西省三原县城东关河道巷的一户农家。因生于农历申时，故乳名申生，入学塾后取名伯循，字诱人，取《论语·子罕》“夫人循循善诱人”之意。

青少年时期申生因才华超群，被陕西学政誉为“西北奇材”。受老师朱光照影响，他常倡谈新学，激扬文字，随写随录结集出版了《半哭半笑楼诗草》，自号“半哭半笑楼主”。因摄得一帧披发握刀照片，题联云：“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陕西巡抚升允获得密奏后上告北京清廷，以钦犯严令缉捕。当时于诱人正在开封参加清朝的最后一次会试。他父亲与学友闻讯后大惊，情急之下写了一封只有他能看得懂的12字密函：“哭笑楼，将上墙；虽未详，祸已藏”，派了一个叫做“飞毛腿”的信差日夜兼程送往开封，方才救了于诱人性命。

亡命于上海的于诱人，为防清朝官府的耳目，化名刘学裕，取“流（亡）学（生）于（伯循）”之谐音，免费就读于近代教育家马相伯自办的震旦学院，与同窗邵子力结为莫逆之交。

1905年，《新民丛报》第18号登载了一篇题为《中国地理大势论》的长篇文章，蓄意挑拨南北人民之间的感情，于诱人遂撰文旁征博引，予以驳斥，署名“于右任”，一方面取“诱人”之谐音，一方面暗喻“右衽”之意，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服饰前襟多为“左向”称“左衽”，与中原汉族的右向正好相反。这一署名暗含不接受满清统治之意。此文受到《新民丛报》主笔梁启超的极力赞叹，函邀东渡扶桑一晤，成就于氏首次日本之行。从此

以后，“右任”之名遂大噪文坛，其真名反掩而不彰了。

1906年11月13日，到日本筹集办报经费的于右任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宣誓加入中国同盟会，并接受了孙中山授予的“长江大都督”之职。旅日期间，于氏先后写了《马关》、《秋夜神户车中作》等一系列诗文，其所用笔名有“剥果”、“关西余子”和“神州旧主”等。

1907年至1910年，于氏在上海相继创办了《神州日报》和《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称“竖三民”，成为名振神州的著名报人，他先后以“函三”、“蹈海子”、“海”、“骚心”、“骚”、“大风”等笔名撰写文章，为辛亥革命制造舆论，因此，被后人尊为国民党的“元老记者”。

1911年2月，宋教仁以“桃源渔父”、“渔父”诸笔名为《民立报》撰写政治时评，深受读者喜爱。同年春，宋氏潜回南方，在广州发动起义。为了掩护宋教仁之行踪，于氏遂代笔宋教仁继续以“渔父”笔名在《民立报》发表文章。后来宋氏遇刺，临终前郑重“托孤”于于右任。

于右任青年时期即有蓄胡子的癖好，被朋友们称为“美髯公”，“髯翁”，老年更有“于大胡子”的绰号。他的诗文也以“髯翁诗”久传人间。

作为一位杰出的书法大家，其碑帖遗墨的落款闲章也保留了一些名、字、号。

童年丧失双亲

于右任两岁半时，母亲赵太夫人便因病去世，继而又不幸丧父。当时，他的伯母房太夫人寡居无子，便将他收养在膝下，视同己出。

房太夫人常带于右任住在娘家（陕西省泾阳县杨府村），其兄房宗海对于右任亦爱护备至，稍长，即送往本村农神庙上学，及至12岁，又让他赴三原读书。其时房太夫人也一同前往三原，以便照料侄儿，费用仍由房宗海供给。后来，于曾多次作诗怀念房氏舅家。此处略举三首：

无母无家两岁儿，十年留养报无期；
伤心诸舅坟前泪，风雨牛车送我时。

记得场南折杏花，西郊枣熟射林鸦；
天荒地变孤儿老，雪涕归来省外家。

愁里残阳更乱蝉，遗山南寺感当年；
颓垣荒草衣神庙，过我书堂一泫然。

于右任住在房氏舅家时，常在读书之余同表兄弟一起放羊、割草。一天，忽有野狼袭来。叼走了一只跛羊，他立即举棍追赶，终于在众乡亲围捕下夺

回羊只。房太夫人闻知，惊慌若狂地爬到山上，一见侄儿即紧抱怀中，视其未伤才破涕为笑。于右任后来忆及这些往事，曾作诗云：

桑拓依依不忍离，田家乐趣更今思；
放青霜降迎神后，拾麦农忙放学时。

袖中书本袋中糖，入学相携未敢忘；
痛绝当年亡命日，弥留犹唤申还乡。

呼鹰结客

于右任青少年时代，即喜交友结客，如陕西的李仪祉、井勿幕、茹欲立、李元鼎、张季鸾、胡景翼、杨虎城等。他们和于右任志同道合，紧密合作。如于到开封赴试，商州中学的校务，即请李仪祉和茹欲立代理。井勿幕是同盟会员，胡景翼、杨虎城则是靖国军时代同生死、共战斗的袍泽。

于右任吊井勿幕的诗篇不少，有“桴彭经年空涕泪，河山四战一徘徊。东征大业凭谁共，唤得英灵去复来”；“秋兴诗存难和韵，南仁村远莫招魂”。可见他们交谊之深。

于右任广结天下之客，则是流亡到上海之后。首先结识的，是后来享寿百岁以上、当时称之为“天下之大老”的马相伯先生（当时比于大30多岁）。由于马老之照顾，于右任得以在上海立足，并入震旦学校就读。后来，于右任与教育界发生了关系，如协助马老创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以及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参加创建上海大学（这是后话）。这都是先生初到上海结识马老所打下的基础。

为了革命活动，于右任相继结交了章太炎、宋教仁、马君武、邵力子、叶楚伦、李烈钧、李根源、康心孚、陈英士、胡汉民等。于右任与宋教仁友情甚笃，吊宋之诗文亦多，1914年《题宋墓前曰呜呼宋教仁先生之墓》及《宋教仁先生石像后题语》为其中两篇，前诗曰：

当时诅楚祀巫咸，此日怀殷吊比干。
片石争传终古恨，大书留与后人看。
杀身翻道成名易，谋国救全世谅难。
如斗余杭渔父篆，坟前和泪为君刊。

后者云：

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呜呼！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

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

四次办报纸仗义执言

20世纪初叶，上海除《申》、《新》两个大报外，还有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改良主义的）和邹容、章太炎主笔的《苏报》（革命的）。“苏报案”发生，邹、章入狱。于右任于1907年创办了《神州日报》，该报积极宣传反清的民族革命思想。它的出版发行，被世人称之为“炸弹”，然而，报纸出版未及一年，报馆就在一个夜晚突然失火，焚烧而光，只得停刊。这场火灾，使于右任失去了一块战斗阵地，有如失去爱子，心里非常痛苦。他曾取“神州旧主”的笔名以表永远纪念。时隔50年之后，于右任还作诗写道：

一夜惊心眠不得，神州旧主哭神州。
神州旧主哭神州，君子东行何所求？
但望于思能革命，再来作弹震寰球。

1909年5月15日，于右任又创办了《民呼日报》。创刊之日，于右任给好友谈善吾先生（后曾主该报笔政）写了一首诗相示：

大陆沉沉亦可怜，众生无语哭苍天；
今番只合殉名死，半壁江山一墓田。

诗表达了他甘愿为民族众生而献身的坚强决心。《民呼日报》以“实行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为宗旨，揭露和讽刺清朝反动统治的腐朽和黑暗。反动政府对该报疯狂地进行阻挠破坏，扬言要挖掉该报负责人于右任的双眼，以昭炯戒。结果，《民呼日报》只出版了93天，就被清政府关禁查封。于右任和谈善吾等人在这年10月创办了《民吁日报》取名“民吁”含有两种意思“一是取“民不敢声，惟有吁也”之意；二是改“呼”为“吁”，少掉了两点，象征已去双眼，而表示即使挖掉了双眼，亦无所畏惧。其实，报纸也仅是换了名而已，其执笔人多系《民呼日报》的原有人员。该报曾刊有《论中国之危机》、《锦齐铁道及远东和平》等文章，激烈抨击清政府，同时也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中国东北的阴谋。《民吁日报》仗义执言，素为人称道。这年10月26日，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因反对日本强占朝鲜，在哈尔滨火车站击毙日本驻朝鲜的统监（总督）伊藤博文（亦即强我签订《马关条约》主谋者）。当时，国内报纸慑于日本的压力，不敢对此作任何的报道，而《民吁日报》则大肆宣传，并痛骂伊藤博文。因此，报馆被日本驻沪总领事函请上海苏松太道查封。《民吁日报》存在时间比《民呼日报》更短。出刊只有48天。

在第三次被迫停刊的情况下，于右任一度处于无可奈何、极端无聊之中。在沈漫云、王步瀛、王一亭、张静江等人的积极支援资助下，他在1910年10月创办了以提倡国民的独立精神为宗旨的《民立报》，自任社长。创刊之日，正逢重阳佳节，发刊词很有特色。这是于右任的力作：

秋高马肥；记者将整顿全神以为国民效驰驱，使吾国民之义声，驰于列国；使吾国民之愁声，达于政府；使吾国民之亲爱声，相接相近于散漫之同胞……

这几个段落，于右任都以屈原《离骚》中的警名为引语，结语用了“余因知謇謇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是一篇向反对派进攻的宣言书，充分表现了勇于抨击时政、不畏强暴的革命精神。《民立报》每日出三大张，激烈攻击清政府，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报道各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情况，尤加重视政论宣传。1911年1月以后，宋教仁先生被聘担任主笔，以“渔父”的笔名撰写了许多有关外交、边患及分析国际政治等时论、评论，深受读者喜爱。《民立报》是于右任创办的4种报纸中影响最大、时间最长的一种，它共出1036号，于1913年9月4日被袁世凯查封。于右任先生被通缉，只得逃亡到日本。

积极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以后，袁世凯及北洋军阀先后窃得其革命果实，使“民国”二字徒有虚名。军阀割据混战，政治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孙中山先生虽然坚持斗争，却屡遭失败。就在这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他产生了新的希望。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毅然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

于右任完全赞同和支持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决策。他曾在1924年1月10日出版的《东方杂志》20周年纪念专号上发表署名文章，强调指出，国民党与共产党以“今日之事，合则两益，离则两损”。同月20日，体现国共两党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正式召开。于右任也参加了这次大会，被选为改组后的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

1922年10月，在一批上海进步学生的恳请下，于右任出任新成立的上海大学的校长。开办之初，百废待兴。恰好次年年初李大钊受中国共产党派遣到沪，进行与国民党人建立关系的工作，于右任闻讯后立即邀李晤谈，共同商讨上海大学的教务问题。他热切地希望能够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李大钊从中国革命的需要出发，指出首先应该开设并办好社会学系，培养革命的人才，并当即推荐邓安石（中夏）任上海大学总务长。于右任接受了这些

意见。这次商谈，遂成为国共两党合作办学的开始。

此后，瞿秋白也受中国共产党派遣入校，任了社会学系系主任。蔡和森、安体诚、恽代英、张大雷等著名共产党人和一些进步学者陆续进校任职任教。李大钊还应邀到该校作了《社会主义释疑》等讲演，宣扬十月革命，传播社会主义思想。这所弄堂大学当时被人誉为“东方红色大学”。

虽然于右任在该校任职时间并不长，但他和中国共产党员合作得很好。由于上海大学创办于国共两党酝酿合作的初期，又是在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旗帜下蓬勃发展起来的，可以说她是首先实行国共合作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

于右任对上海大学是很有感情的。1925年“五卅”运动中该校一度被租界当局查封，于右任闻讯后还特地从河南赶回上海，支持师生们的反帝斗争。他对该校师生发表讲话，说：“我将努力参加此项反抗运动，不但救援本校被捕学生，且将援助市民的斗争。”并且说：“反对帝国主义及取消不平等条约之口号，中国人人均当赞成。吾人当广为宣传，使一般民众咸能努力参加运动，达到解放全中国之目的。”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于右任回到上海，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并担任了该部的工人农民部部长。当时，毛泽东、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向警予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受党派遣，都参加了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于右任主持的工人农民部，积极贯彻执行革命的三大政策，调查工农状况，开展各种活动。如上海样经丝厂焚毙女工事件发生后，该部就曾向社会发出呼吁，并联合各团体援助工人，争取工人应得的权利。

1924年冬，孙中山先生抱病北上，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国事。于右任也随之北上，参加了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以及后来的国民党北京政治委员会的工作。当时，北京执行部在李大钊等人的主持下，工作异常活跃，北方革命群众运动生气勃勃。于右任也投身于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运动中。如1925年1月，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组织讲演大会，“十七、十八两日，分别在师大，美专举行。在师大讲演者为李守常（大钊）先生，讲题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之国民运动。在美专讲演者为于右任先生，讲题为真正国民会议之产生难。两先生讲演皆受听众欢迎”。在“五卅”反帝风暴中，北京地区人民大力声援上海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6月30日，由“北京各界对英、日帝国主义雪耻大会”发起，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大会，宋庆龄、于右任等分别担任五座主席台的主席。大会通过了要求严惩制造沙面惨案的凶手、收回香港与英法租界地等九项决议案，表达了我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反帝的决心。1926年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于右任非常痛心，并慨然捐款帮助安置死难及受伤的爱国学生。

当时，国共两党还对冯玉祥、胡景翼和孙岳领导的国民军做了大量的工作。1925年4月，李大钊应于右任的邀请亲赴河南，向国民军二军解释和宣传反帝反军阀的政治主张。于右任也在开封对国民军二军官兵发表长篇讲话

指出：“中国现在的国民革命，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两重压迫。”“在现在的时候，要打倒一切反革命派，只有联合一切革命派。凡是革命的，都是我们的朋友；越是革命，越是我们的好朋友。”

国民军在北方失利后，于右任也因被奉军严令通缉而转入地下。1926年春，李大钊秘密会晤于右任，请他去苏联做冯玉祥将军的工作。于右任欣然同意。在李大钊的直接安排和资助下，他在6月间途经上海由海道赴苏。苏联之行，于右任写下许多热情的诗篇，讴歌列宁和十月革命的胜利。他在莫斯科会见了苏联和共产国家的领导人，并和冯玉祥将军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冯将军完全接受了李大钊的建议，确定了“进军西北，解西安围，出兵潼关，侧应北伐”的战略方针。这时李大钊又从国内发来急电：察绥战局恶化，西安救援急如星火。于、冯等立即分批起程归国。9月17日，冯玉祥率部在五原誓师，于右任代表国民党授旗。大军经由宁夏、甘肃，直抵西安。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对此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刘伯坚、邓希贤（小平）等一批中共党员和乌斯曼诺夫等苏联顾问直接参加了冯部的工作。

西安解围后，于右任正式就任了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之职。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行使着省政府的职权，实际上，它是实行国共两党合作的革命政权。于右任真心实意地和中共陕西党组织合作共事。魏野畴、李子洲、史可轩、刘含初、王授金、杨明轩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许多进步人士都参加了这个革命政权，并担任了各种重要的领导职务。陕西的工、农、兵、学、妇等群众运动如火如荼，迅速高涨。轰轰烈烈的陕西大革命蓬勃发展，使陕西成为全国大革命运动中比较突出的省份之一。于右任还仿效莫斯科的红场，把西安城内的皇城改名为“红城”，表达了他当时联俄联共的政治倾向和积极的态度。

真心赞同国共二度合作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共同努力促成的。当时，身为国民党南京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出于民族大义和爱国赤诚，真心赞同国共两党再度实行合作，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于右任一直密切注视着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的侵华活动，深为中华民族的命运而忧虑。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称《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于右任后来看到这份重要文件，内心很是激动。他曾和何香凝、柳亚子等交换意见，都衷心赞同中共《八一宣言》里所提出的各项主张，深感中国有了出路。他也十分赞赏杨虎城将军的抗日救国思想。某次，杨将军到了上海，想深入了解国内外的形势，于先生就特意做出安排，使他秘密会晤了坚决主张抗日的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将军在南京反被扣押。由于一切消息都被严密封锁，南京无人能得知西安的实情。杨虎城将军便派人到南京去见于先生，并秘密将一份铅印的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四项声明》转交给他。于先生见到这张传单后，十分激动地说：“我明白了，共产党真的要抗日哩！”他彻夜未眠，终于想出了一个把这项消息传播开的巧妙办法。第二天，他在南京政府的“总理纪念周”会上把传单交给了张继，假称是一名陕西商人在农村墙壁上揭下带到南京来的，由于在场的人们都争着要看，张继于是就在会上全文宣读了。就这样，中国共产党的《四项声明》通过于右任之手，在南京迅速传播开了，使国民党上层官员的思想受到极大的震动，广大人民群众更是深受鼓舞。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于右任曾对人说：“这次国共合作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不一样。第一次国共合作，西山会议派等年老人反对的多。这次国民党元老多拥护。国难当头，年老人读书多，经历深，他们知道亡国之苦。”

在八年抗战期间，于右任一再大声疾呼：“祖国危急诚万万”，“民族生命争一线”！“中华民族齐心进”，“神圣战争当共负”！写出了一篇又一篇激昂的抗战诗文。他对外呼吁“全世界人士应为正义人道而动员”，对内主张国共坚持合作，团结抗日。他赞同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到底的主张，坚决反对妥协投降卖国。周恩来在武汉和重庆曾多次和于先生恳切交谈，而且还通过王炳南、屈武等人经常与他保持联系。这些都对于先生的思想产生很好的影响。抗战初期，于右任曾为中共中央在汉口创刊、后迁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题写了报头。汪精卫当了汉奸之后，他曾发表《以胜利击破汪倭毒谋》等广播讲话和文章，义正辞严，申张了民族的正气。

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确定了反共第一的方针，相继颁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文件。同年夏至次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又掀起了分裂倒退的反共恶浪。于右任对此痛心疾首。后来当他得知“皖南事变”的真相后，异常气愤，手拍桌子厉斥说：“这样破坏两党的合作，简直就是破坏抗战！”他曾当面对周恩来表示，要反对内战，反对投降。他还对周围的人说：“日本帝国主义者疯狂侵略中国，大敌当前，我们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同心同德，团结一致，集中力量，共御外侮，方能取得胜利；绝不能存党派之见，制造分裂，导致亡国之恨，做民族的罪人！”

悲离大陆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期间，曾在周恩来副主席的陪同下登门拜访于右任。后来，于先生也设宴款待毛主席，并表示反对内战，赞成和平，支持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和平建国。可是，国共两党签订的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反动派就再次挑起了内战。1947年2月，国共谈判完全破裂，中共代表团被迫从南京等地撤退。于右任此时心情

十分沉重。他忧愤国事，往往夜不能寐，深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忧虑。

1948年冬，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急速发展。于右任和不少国民党人士都力主和谈。在蒋介石宣布“引退”的前夕，于右任还当面敦请蒋把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军释放出来。后来，南京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拟派他到北平代表南京政府协助和平谈判，他当时连行李都准备好了，打算一去而不返，可惜因故未能如愿。后来屈武回到南京，给他捎来了周恩来副主席的话，说：“我们欢迎于先生来北平。如果将来决裂了，那就请他留在这里。既然他不能来平，那就希望于先生在南京不要动。到时候我们会派飞机接他来北平，将来同张澜、李济深和沈钧儒等先生一道，组织新政协，我们一同合作。”然而于右任在南京早就被人严密监视，已经身不由己了。

1949年4月21日早晨，一名身着国民党高级军官制服的不速之客突然闯进了于公馆：“报告院长，战事情况非常紧急，共军已经突破了江防，请院长即刻离开南京……飞机已经准备好了。”于右任面带不悦之色：“现在我身体不好，等一等再说好了。”那人听了，立即用威胁的口吻嚷道：“院长必须马上离开南京！”没等老人穿好衣服，就强迫上车直驰飞机场。仓促间，于右任提出要先到上海去。在上海仅停留了三四天，于氏便在有关方面的紧紧催逼下又匆匆飞往广州。5月间，残缺不全的监察院又在广州开了一次院会，于氏再次提出辞职。可是，仍有许多人反对，甚至有人追到于氏的住处以是哀求。这时，他既有意冲破自己周围的藩篱，又害怕遭到特务们的血腥暗杀。直到最后去了香港，也依然如此。10月9日，即广州解放（14日）的前夕，于又被人拉上了飞机，运载赴台。到了台湾后，他仍一再请求去趟重庆（当时未解放），亲自安排一下发妻高仲林和长女于芝秀。但是，得不到任何明确的答复。直到10月30日，方突然被通知有飞机去香港。他当机立断，抛下一切即仓促登机。11月26日，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诺兰乘专机经由香港去渝晤蒋。于氏借机同行，才得重返大陆。于右任飞抵风声鹤唳的山城，才获知高仲林母女刚刚在两天以前去了成都。友人问他，何不早来数日？沮丧的老人苦笑着说：“老实说，我也不知自己什么时候来重庆啊！”他与发妻爱女生前在大陆见面的最后机会，就这样一错而过。

于右任这次在重庆，仅仅停留了一天两夜。11月29日蒋派的专机，载着于氏等人径直向台湾飞去了。这位71岁的古稀老人，从此远离生他育他的大陆故土。

于右任晚年思乡心切

长期以来，台湾大陆的亲友天各一方，互不来往，他们怎能不相思？1958年，于右任先生的长子在台北友人家中，发现有他父亲题句的“岁寒三友图”中堂一帧，乃将其携归，交于右任先生欣赏。这帧“岁寒三友图”是30年前，何香凝因对现实不满，寄情诗画，与经亨颐、陈树人合作而成，右任先生为

之题句。于先生在欣赏之余，缅怀往事，思念旧友，感慨万端，他提笔在“岁寒三友图”画中，补上了当年题句时漏写的一个字，又增题诗两首。其中一首如下：

二十余年补一字，完成题画岁寒诗。
相逢回念寒三友，泉下经陈知不知？

这首深切怀念大陆旧友的诗，《人民日报》曾加以转载。当时人大副委员长何香凝尚健在世，她见了于先生的诗，也深有同感，以“遥寄台湾”为题赋诗三首，答于右任先生，有“追怀往事念同游”，“数十年来如一日”之句。

于右任先生晚年，在政治上颇不得志，时时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对前途的悲观，曾几次想辞职，他因沦落天涯，困居孤岛，山河割裂，统一难期，欲返大陆故乡的夙愿难偿而内心抑郁，苦闷不堪。反映他这种心情的诗词不乏其例，如“忧愁风雨，迷离云树，流不尽艰难路”，“如何久滞天涯”等等，真是言为心声，情见乎词。

岁月催人老。当于右任先生身体日衰，自感于世无几时，思乡之心更切。他为自己的后事安排时，也念念不忘大陆故乡，他说：“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旁注：山要最高者，树要大者）。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

于右任病逝

87岁的于先生于1964年8月12日因感冒及眼部浮肿等症，住进了台北“荣民总医院”疗治，病情曾一度好转，后来又发现有肝硬化症，病势转趋恶化。11月10日晨呼吸突然急促，血压迅速下降，曾一度进入弥留状态。经过医师注射血压升高剂急救，心脏跳动始回复规则。但终因年事过高，延至晚间8时08分而溘然长逝。

国共两党能够再度合作，实现祖国的统一和富强，一直是于右任先生晚年的心愿。台湾和大陆，台则国家兴，分则民族损。现在，中国共产党发出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的倡议，犹如春风吹拂着海峡两岸，全球爱国的炎黄子孙无不竭诚拥护。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们可以深信，在大陆和台湾同胞以及海外侨胞的共同努力促进下，于右任先生生前的宿愿——祖国的统一，一定能够实现。

第五节 陈诚遗嘱未提“反攻大陆”

临终留下三点遗嘱

1965年2月27日，台湾“中央社”公布一则陈诚病情，全文如下：

陈诚副总统曾因十二指肠溃疡，而于民国37年于上海施行手术，在手术时发现肝脏有中等度硬化现象。54年8月，副总统食量突呈异常之增加，同年9月发生持续性病变，疲乏以及出汗诸症状，但尚无肝病之症状，惟在10月间肝脏发现肿大，此后数日连续之检查，发现肝脏增殖甚速，由于此项肝脏之增殖，癌症之诊断已明显，经施行肝脏穿刺术，获得小片肝组织作显微镜检查，其结果仍支持肝癌之诊断。

奉总统指示，组织医师诊疗小组为副总统诊治，并立即寻求海内外对此症有名望之专家对于治疗上之意见。数位专家曾延聘会诊，经会商结果，一致认为目前对肝癌一症，尚未实验上之治愈方法，因此，医师诊疗小组及各顾问医师决定治疗之准则及主要任务，均为安排如何使副总统获得安适，所有治疗之方法均循此原则。副总统于数月来历经克服几次濒危之病况，在忍受最少之痛苦下，度过近似常人之生活。

1965年3月3日上午，陈感重病不起，命29岁的长子陈履安取来纸张笔墨，想亲自写下遗嘱，无奈腕力不济，便口授由陈履安笔记：

- 一、希望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之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
- 二、不要消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国军民，共此患难。
- 三、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

3月5日下午7时零5分，陈诚在台北官邸病死。

由于他的遗嘱没有提到“反攻大陆”，台湾当局要修改发表。陈的夫人说：“要就不发表，要发表必须原文。”

6日，台《中央日报》照登了陈的遗嘱，但未加论评。同一天，台湾的各报纸都用大量篇幅刊出了对陈一生的评论及陈为蒋所做的各种各样功德。

《中央日报》评道：

陈副总裁的信条至为简明。守原则，没有例外。定政策，必求其贯彻。为此曾得罪于人，而人亦无可怨怒。为此曾遭受挫折，而任何挫折皆不足以摇撼其决心。

《联合报》说：

关于陈副总统毕生伟大的事迹与丰硕的功勋，自当宣付国史，彪炳史册，非本文所能及。而我们对于陈副总统最为感戴永志不忘者，乃以台湾作为三民主义模范者也罢，作为反攻复国根据地也罢，其能有如今日之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政治的进步，军事的壮大……固由于蒋总统的英明领导以及全体军民的共同努力，然躬与其事，直接主持此一艰苦奋斗历程、转危为安、扶危定倾、励精图治、惨淡经营者，当推陈副总统为第一人。

《征信新闻报》则称：

陈副总统服务党国 40 年期间，是现代中国由混乱而统一；再国外寇而由统一趋于分崩；最后复由分崩离析重归入坚强团结局面的时候。陈副总统在这个期间内，除了表现出他坚毅勇气和卓越的军事、政治两方面才能以外，还表现了他永久不渝的对国家对领袖的忠诚。现代中国政治圈内，陈副总统是一位特殊人物，他的不阿众苟同的性格，使他在早年革命时期便赢得了刚愎的批评。然而，这也正显出他的坚定勇敢性格的一面。而这种坚定勇敢能够在众人指为不当，只要他问心应该如此，还是毅然独行其事。我们感觉，在今天这泄沓成风的环境中，他的坚强自是的性格与忠于自己良心的勇气，是一剂矫时良药，可惜我们已失去了他。

夺台沧桑

新闻媒体的评价，自然是歌功颂德。但做为蒋介石的重臣，陈诚为建立台湾这个“小朝廷”，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5 年是台湾历史的转折期。8 月 15 日日本总督安藤利吉对台湾的日本军民宣布天皇“终战治勒”后，拥有 10 个师 17 万精锐部队的日军台湾司令部内存在着不同的见解：一派主张接受诏令等待盟军接收；而以少壮军人为主的另一派则认为在台湾的日本军队丝毫未损，岂可不战而降？

这些争议，迫使安藤总督不得不出面劝告少壮军人不得轻举妄动。但是一部分少壮军人仍不死心，遂有计划联合台湾士绅，在盟军未到前，宣告台湾独立。

这些少壮军人透过“嘱托”（顾问）许坤泉联络台湾全岛知名人物——林献堂、林熊征、许丙、简即山（四人 1945 年 4 月被选为贵族院议员），及辜振甫，会集于草山（阳明山）的日本少壮军人指挥部，商议有关“台湾独立”的事项，除林献堂虚与委蛇不置可否外，其余人则紧密与这些少壮军人联系。

安藤总督坚持不可轻举妄动，迫使这些顽固的少壮军人计划流产。

9月1日国民党政府公布“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任命陈仪为长官，筹组长官公署的人事。

陈仪筹组的长官公署成员，以他福建省主席（1934——1942）任内所识拔的浙江、江苏、福建人士为主，再点缀几个他比较熟悉的台湾籍中下级行政、军事官僚。内地成员是秘书处处长夏涛声、民政处处长周一鹗、财政处处长张延哲、教育处处长赵乃传、农林处处长赵连芳；工矿处处长包可永、交通处处长严家涂、警务处处长胡福相、会计处处长王肇嘉。台湾籍人士则有财政部特派员游弥坚、外交部特派员黄朝琴、台北州接管主任连震东、高雄州接管主任谢东闵；两位台籍将领则是出任台湾警备司令部第一处处长苏绍文（上将）、副官处处长王民宁……。

这些台籍人物便是所谓的“半山”，他们的共同特征都是离开台湾一二十年以上，有一个外省籍的夫人，在国民党政府担任中级职位的行政、军事干部。

陈仪的接收部队进入台湾后，了解到这段演变后，立即以“叛乱”罪嫌将许丙、简即山、辜振甫、许坤泉逮捕入狱。他们的禁闭，提供了“半山”发展的机会。

国民党接收部队象蝗虫一样，啃光日本人所遗留的一切，首先是囤积在各码头、车站仓库，足供20万大军生活两年的大量粮食，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被报销殆尽。接着的，是饥渴地填补任何一个日本人所留下的职位，甚至扩充编制。因此，日本人仅用18300人能运转的行政工作，陈仪长官公署最少估计也使用43000人以上，每个处长、局长、科长级人物，都有个人的部下和一大群亲戚朋友在支领薪水。

日本50年殖民统治所留下的数万幢的房屋，40万亩土地，及银行、工厂、戏院等账面价值156亿日元（20亿美元）以上的庞大公私资产，更是各方争夺的目标。由陈仪的九大处共同控制、指挥的“日产处理委员会”，便集体处理这庞大资产，来满足各方的需要。

当年的台湾，在国民党当局看来，实是东海中的金银岛，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几十亿（美元）可用来复原、重建的资金、资源消耗殆尽，台湾的工厂停工，商店关门，物价更是节节高涨。

衣锦还乡的“半山”人物在陈仪的任用下，黄朝琴出任台北市长，刘启光任新竹县长，谢东闵任高雄县长。他们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便成为地方举足轻重的人物。

1946年4月的省议员选举，当选的“半山”议员仅有黄朝琴、李万居、刘兼善、郑品聪四人。但是黄朝琴在陈仪的支持下，逼退了最有声望的林献堂而当选议长。李万居则同时当选副议长，加上连震东担任参议会秘书长，省参议会的议事可以说落入“半山”的掌握。

同年8月的国民党参政员选举，“半山”的林忠以最高票当选，林献堂则落为最后一名。11月的“制宪国民大会”代表选举，11名区域代表中，“半

山”也取得黄国书、李万居、郑品聪、连震东四席。

接着台湾的三大民间银行彰化、商工、华南改组。中部资本的彰化银行由林献堂任筹备处主任，南部资本的商工（改名第一）银行则由黄朝琴任筹备主任，北部资本的华南银行最初由板桥林家的林熊征任筹备主任，后因林病故改由刘启光出任。

因此，借着长官公署的支持，“半山”的势力隐然开始掌握台湾的政治、经济资源，而成为台湾新兴的集团势力。

1947年5月魏道明上任后，陈仪的旧部大批返回大陆，只剩下财政处长严家淦出任省财政厅长。魏道明的16个省府委员中，引进了8名台湾籍人士，他们是：丘念台（兼民政厅长）、游弥坚（兼台北市长）、李连春（兼粮食局长）、林献堂（兼通志馆及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南志信（山胞）、陈启清、杜聪明、刘兼善。其中，丘念台、游弥坚、刘兼善是“半山”人物。

魏道明上任的第二天（1947年5月17日）立即宣布解除戒严，但是，警备司令彭孟缉仍以寻求安定为目的，经常以发布有关学生阴谋组织、地下组织、共产党组织等事件，继续执行有计划的搜捕行动，使得台湾的政治气氛还是属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半山”集团对国民党当局的忠贞受到一致肯定，于是便更积极参与政治权益的竞争。1947年12月的第一届“国大”，区域代表19席中，王民宁、林忠、谢掙强、李清波、苏绍文，连震东等“半山”便取得6席，加上工会的陈绍平、教育集团的游弥坚便有8席。1948年1月的监察委员选举，“半山”的陈岚峰、丘念台取得5个席位中的2个；立法委员区域8席中，黄国书、郭天乙、郑品聪则为“半山”。

就在“半山”在台逐渐发家的时候，海峡彼岸的国民党军队却节节败退。1948年10月，国民党原参谋总长陈诚，以“上海烦嚣多扰，医嘱易地静养”为名，携眷到了台湾，驻进了草山海峡空军招待所。12月29日，陈突然接到蒋介石的电令，要他准备接任台湾省主席。当夜，魏道明访陈，两人进行了长久的密谈后，陈便在第二天电复蒋介石，以“时因病体未复，决难担此重任”为由，建议仍由魏道明担任主席，但未能得到蒋的许可。

蒋介石深知，国民党军队在大陆的彻底崩溃已势所难免，台湾孤悬于东南海上，与大陆的距离，最近也约80海里，凭地理位置和海空军的优势，退守台湾，还能有喘息图存的机会。这最后一点本钱，当然要由忠实可靠的人来掌管。

陈诚字辞修，浙江青田高市人，1898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1月4日生。高市距青田城西70华里，位于瓯江南岸，距石门洞5华里，与芝溪斗隔江相望。高市分里村和外村，陈诚的家在外村，坐南朝北，类似北方的四合院，前排5大间，后屋5大间，东、西厢房各三间，陈诚原住东厢房。

陈诚的父亲陈应麟，字希文，逊清秀才，又在浙江省两级师范学堂初级

班毕业。陈诚的五叔祖陈一鹏，是前清廪生，希文依靠一鹏的提携，曾任青田县城敬业高等小学校长 10 余年，服务教育事业，以终其身。

陈诚有兄弟三人，他居长。

次弟陈愿，字正修，留学法国，学化学。1932 年回国，在国民政府兵工署兵工研究委员会任少将研究委员。1936 年在广州珠江南岸任四十二兵工厂厂长。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该厂内迁广西柳州，改为防毒面具厂，1939 年又迁到贵州遵义四面山，正修一直担任厂长。1948 年当选为立法委员。

三弟陈敏，字勉修，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留学英国，习经济。1941 年回国，在重庆担任中国农民银行重庆分行经理。抗战胜利后回南京，担任中国农民银行南京分行经理。1948 年与无锡秦汾（财政部司长）之女结婚。同年 11 月去台湾。

陈氏三兄弟的面貌都酷肖其母洪氏，身材都很矮小，像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陈诚还有一姐姐，叫陈锦花，嫁在青田高市里村，不曾生育，领徐松如为养子（徐现为青田县政协委员）。

陈诚幼年争强好斗。他家里的房屋，窗棂都是纸糊的，同村的儿童常来吐口沫，把他家的纸窗戳穿，陈诚很恼火，在纸窗上写上“男盗女娼”。陈诚的父亲看到斥责说：“你骂的是谁？”陈诚为此挨打，就泄恨于村上儿童，经常殴斗不懈。

青田城里当时只有一所高等小学，陈诚的父亲便是这所小学的校长，教学极为严格。

1907 年陈诚 9 岁时，入学读书，1912 年小学毕业。他的两个弟弟以后也在这所小学读书。

1913 年 2 月，陈诚到了丽水，考入省立十一中学。后来他的二弟正修也考入十一中。当时中学读书是自费的，兄弟两人都要缴学费，家庭不堪负担，陈诚中途改读处州省立十一师范，因为师范是公费。十一师范在丽水城内太保庙背后莲城书院旧址，学制预科一年，本科四年。当时和陈诚同班同学有李（青田人）、杜芳（缙云人）、邱学银（宣平人）、陶（缙云人）、阙维熙（丽水碧湖人）等。校氏华国，字郁文，临海人；体育教员程孟渊（温州人）。陈诚对功课不甚用功，经常和校长的侄儿华文宽（任该校会计）一起打球，感情很好。他爱好体育，平台、铁杠、木马、跳远、跳高、样样参加，也爱好骑马。十一师范开第一次运动会，陈诚得了个人总分第一。

学校有个乐队，指挥曹竞，大鼓何鹏，小鼓潘焕钧、郭耀奎，马号杨达、陈诚，小号叶碧炎、阙仲瑶。每逢参加社会活动，或者远足旅行，乐队走在前列。陈诚身材矮小，他吹着马号，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前列。

陈诚在校读书时，一度染上赌博恶习，几次输了钱，还不起，同学叶光多次替他归还赌债，劝他不要再赌。学校当局发觉后，要开除学籍，唯校长华国不同意。陈诚怀着对校长的感激，从此戒赌。陈诚得势后，思念叶光的旧情，邀叶光担任经理处长。

1917年12月，陈诚在十一师范毕业，回青田高市，就和吴子漪的妹妹吴舜莲结婚。婚后跟他父亲到青田城内敬业小学，恰巧校内缺少一名体育教员，校内有老师建议，留陈诚担任体育教育。陈诚的父亲说：“现在青田一批士绅正在找我的缺点，我若用自己的儿子，正好授人以柄。”坚决不同意。后经陈诚的同学曾志超（宣平人）介绍去宣平农村任小学教员，薪给菲薄，仅能糊口。陈诚的父亲在高市开设一家中药铺，要陈诚辞退小教员，回家经营药铺，他不干。

1918年暑假，陈诚到杭州，考入南星桥一所体育专门学校。他的妻子吴舜莲拿出陪嫁钱供他的读书费用。

1919年冬，陈诚在杭州体专毕业后，准备回青田，恰巧杜志远来到了杭州。

杜志远，青田北山人，南京江南陆军学堂毕业，和陈诚的父亲陈希文是逊清同科秀才。杜志远在段祺瑞麾下当过营长、团长，升任师长。当时皖系实力只有三个师、一个旅，在段祺瑞执政时期，杜志远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

杜志远的专车抵达杭州时，陈诚和当时在杭的青田同乡一道，前往车站迎接。杜志远离杭时，陈诚又跟着同乡到车站欢送。陈诚上了专车，和杜志远的卫队（都是青田人）攀谈得很起劲，火车开动也没有发觉，稀里糊涂地同车到了北京。杜志远问了情由，才知道陈诚是青田同乡，又是同科秀才陈希文的儿子，便留陈诚住在北京处州会馆，和缙云同乡王惟才住在一起。

1920年，经杜志远向保定军校校长曲同丰（与杜同属皖系）保送，陈诚投考该校八期炮科。由于陈诚身材矮小，考试成绩又差，未被录取。再经杜向主考官魏宗翰（北洋政府陆军部军学司司长）疏通，才以备取资格入学，当时杜志远还保送青田九都人高文同时考入保定军校，高文以后曾任汤恩伯的参谋长。

陈诚在保定军校时，与罗卓英、邓鸣汉（都是广东人）是同学。他们三人身材都较矮，出操排队，都站在排尾。陈诚和邓鸣汉私交弥笃，结拜为兄弟，订生死交。当时邓演达任保定军校分队长。

陈诚进入保定军校，是他投身军界的起点。

陈诚于1922年在保定军校毕业，经杜志远写信给他的儿子杜伟（那时杜伟在绍兴浙军第二师第三旅当少校副官）、安排陈诚在浙军第二师（张载阳任师长）第三旅（盛开第任旅长）六团三营当见习官（连长为樊崧甫）。当时周至柔、周搏风、李进德同为见习官。1923年，陈诚升任少尉排长。

这时，夏超（字定侯，浙江青田万阜乡九都人，前清武备学堂毕业）在杭州当浙江警务处长，正在积极扩充部队。陈诚的父亲陈希文与夏超有旧交，托人向夏超求情，要求夏超提携陈诚。夏超召见时，问陈诚在保定军校学什么？陈诚回答：“学炮科。”夏超出了几道题当面测验，陈诚尚能解答。但夏超认为陈诚初出校门，没有实际军事经验，便介绍他到宁波。当时杜伟已从绍兴调到宁波当警察所长，陈在杜手下工作，月薪几十块钱，也就暂时安

顿下来。

这时，陈诚的保定军校同学邓鸣汉（广东客家人）已在广东粤军当连长，写信给陈诚，邀他去当排长。因陈诚与邓是拜把兄弟，便欣然到了广东，在邓鸣汉连当第一排排长（据《民国人物传·陈诚传记》载，1922年，陈到上海投靠粤军，随同邓演达南下。邓演达任粤军第一师三团团团长，陈诚任三连连长）。

1923年5月，陈诚参与讨伐沈鸿英，在肇庆与冯葆初部作战，与连长邓鸣汉在同一战壕内指挥战斗，一颗子弹穿入邓鸣汉的胸膛，邓鸣汉当即阵亡。陈诚也受了轻伤，包扎医治后，不久痊愈，陈诚递升为连长。邓死后，邓母十分悲伤，陈诚安慰邓母，并由他赡养。当时连部有个排长，是广东人，他弟弟担任事务长，管理军需伙食。兄弟俩因赌博亏款，把领到的全排军饷拐带潜逃。出事后，陈诚急得直跺脚，计无所出。这时陈诚的妻舅吴子漪（又名蕴玉，浙江青田人），任连部军需，对陈诚说：“我去抓他们回来。”吴子漪由广州出发，到了韶关，刚下火车，不料就在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门口碰见了他们兄弟俩，把他们逮住，送往当地警察局，押解回部队，陈诚处分了这两兄弟。

1924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委派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这时邓演达任粤军第1师团长，兼任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又兼入伍生总队长。陈诚因邓的关系，进入黄埔军校，担任上尉教育副官。

黄埔岛距广州市40华里，通小火轮。有一天，陈诚到了广州市区玩耍，第二天清早就乘头班轮船回到黄埔军校，到操场上翻铁杠。恰巧这天蒋介石也很早到校巡视。蒋走到陈诚面前，看到铁杠旁放着衣帽和书本，陈诚向蒋立正敬礼。蒋问：“看什么书？”陈诚把书奉上，一看是《三民主义》。蒋随手翻阅，见书上圈圈点点，写满小字，蒋连连夸奖其阅读认真，渴求上进，留下了好印象。

1925年，陈炯明叛乱，蒋介石率领黄埔学生军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黄埔军校教导一、二两个团，协同粤军为右翼。陈诚在右翼军任炮兵营第一连上尉连长。2月15日攻打淡水之役，陈炯明部被围困在淡水城内，由于城墙坚固，一时攻不下。陈诚指挥的炮兵，因炮打久了，炮膛发热，不能继续发炮。蒋介石十分着急，一面命令教导1团团团长何应钦坚持攻击，一面对陈诚说：“几门炮都打不响吗？”陈诚一急，亲自去点炮，由于已停放了一段时间，一炮打响，全连火炮也打响了，军威大震，把城墙东北角打陷了一个缺口，围城部队架起云梯，蜂涌入城，攻占了淡水城。陈炯明残部败退棉湖，陈诚指挥炮兵阻击敌军。在棉湖战役，陈诚指挥之炮兵发挥了威力，使战局转危为安，克敌制胜。蒋介石称此战役“万一惨败，不惟总理手创之党军尽歼，广东策源地亦不保”。何应钦事后称赞陈诚：“不论步兵前进有多迅速，总使炮兵能够配合得上，每次都达到任务，实在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何应钦：《陈副总统的勋业与道德》1965年）。

6月，东征军回师广东，讨伐杨希闵、刘震寰部。这时，赵成梁师由韶关调驻广九铁路布防，滇军第三军旅长胡思舜率部赶来广州市白云山支援杨、刘，又把驻东江的曾万钟旅调回广州阻止东征军前进。

东征军进入石牌车站，占据石牌车站的敌军在构筑工事。陈诚的炮兵连，在苏联顾问指挥下，向石牌车站炮轰，正中赵成梁的指挥部。赵成梁正在床上吸大烟，恰巧一炮命中。敌师长被击毙，敌军纷纷向瘦狗岭逃窜，东征军刀不血刃，占领了石牌车站。东征军在白云山展开激战，敌军被打得落花流水。12日，在北校场会师。杨希闵部向观音山反扑，也被消灭。

不到两天，全部消灭杨、刘主力，广东趋于统一。

9月，第二次东征，攻打惠州城。敌杨坤如军坚守惠州城。围攻两天，攻城军伤亡惨重，第四团团长刘尧宸阵亡。东征军组织敢死队，陈诚督炮兵连夜架炮，仰射惠州城墙上的敌军机炮阵地。在炮火压制下，七团党代表蒋先云、八团党代表张际春、九团党代表傅维钰、补充团党代表王逸常等，带头率领敢死队爬城，一拥而上，攻克了惠州城，拔了洪兆麟、林虎的老巢，杨坤如残部向闽赣边境逃窜。攻克惠州城后，蒋介石给广东国民政府告捷电称：“惠城夙称天险，有宋以来，从未攻下，……今为我革命军一鼓攻克。”（见民国14年10月《政府公报》12号）。在两次东征中，陈诚立了战功，受到蒋介石的嘉许，提升为炮兵第二营营长。

1924年5月，陈诚的父亲陈希文在青田城内敬业小学逝世。陈诚在广州，回家奔丧。陈诚抵达温州，寓西门西阁檐同兴客栈（青田人开的）、随即到了青田，随灵柩归葬，回到高市。父柩安葬在高市村后黄山岭。（注：“文化大革命”墓被毁，现经政府拨款修复。）墓碑为严立三题，碑文：“陈希文先生墓”。

陈诚回到家中，独自睡在楼上。陈诚的妻子吴舜莲感到夫妻分离多年，竟不同房，如此冷淡，一时想不开，便拿了一把剪刀，猛刺自己的喉管，鲜血直流。陈诚的母亲见此惊慌万状，急忙叫人杀了活鸡，用鸡毛包扎媳妇的喉管，幸而气管没有割断，经送往温州医院抢救治愈。村上把这件事当作新闻，不胫而走，到处传开了。陈诚感到很烦恼，在家中只逗留了三宿，匆匆办完丧事，就回青田城里，写了一封信给杜伟，信中说：“此番回家奔丧，不幸家中出了事故，万分烦恼，灰心丧志，不想再回广州。”杜伟到收信后，力加劝慰，并汇了一笔钱，劝陈诚返粤。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陈诚调总司令部任中校参谋，随军出发。不久，升任预备第一师第三团上校团长，周至柔任团参谋长。

11月，部队经韶关到赣州，预备第一师改编为二十一师，严重为师长，陈诚的第三团改为六十三团，仍任上校团长。

严重，湖北麻城人，保定军校五期工兵科毕业。他每天写日记，当时他日记中写道：“陈诚来谒，畅谈二小时，……将来救中国，必此人也。”足

见严重对他的器重。严重死后，陈诚在湖北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时，曾把严重这段日记向其部属公开，以示严重“慧眼识英雄”。

1927年1月15日，二十一师抵浙江衢州、龙游、兰溪一带，与孙传芳部卢香亭的部队遭遇，展开激烈战斗，2月1日攻占兰溪，歼敌2000，继续进军桐庐。2月11日，孙传芳纠集了三个师反攻桐庐，被刘峙的第二师击退。但过了浮桥，刘峙师已不能支。陈诚率领六十三团在桐庐西北浪石埠架桥过江，与敌三师背水激战终日，伤亡甚众，营长赵敬统阵亡，宋希濂、王敬久负伤。陈诚率部连夜袭击敌司令部，敌仓惶退却，二十一师乘胜追击。2月15日，攻克新登，19日占领杭州。陈诚擢升为二十一师副师长，仍兼六十三团团长（师长仍为严重）。

二十一师抵达杭州，何应钦的东路军亦由闽抵达杭州，浙江成立军政府。不久，二十一师开拔，进驻苏州。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邓演达愤而出国；严重辞职，隐居庐山犁头尖，筑平房三间，深居简出。

蒋介石召见陈诚，向其阐述国内形势。陈诚表示绝对服从总司令，蒋大为赞赏，遂委派陈诚接替严重，担任二十一师师长，以罗卓英为参谋长。

5月，陈诚率领二十一师由苏州进军蚌埠。8月，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在江北集结重兵，反扑南京。

1927年8月，孙传芳军直扑南京，在龙潭展开激战。陈诚率领二十一师投入战斗，双方相争极为激烈。时值暑夏，陈诚胃病严重，坐轿指挥作战，晕倒在地，经卫士石心志（河南人）负走20余里，始脱险境。事后有人说：“陈诚在龙潭战役中不死，幸亏有‘吉利星’才化险为夷。”从此，陈诚用石心志为随身侍卫，不离左右。

龙潭战役，孙传芳10万大军，在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夹击下，全军覆灭，孙传芳只身逃往扬州。

陈诚在龙潭战役中坐轿指挥，事后被何应钦知道，免除其师长职务。陈诚受处分后，愤愤不平满腹牢骚，认为自己抱病上阵，几乎丧命，不但无功，反而受过，深怪何应钦偏信，失之公允，从此产生不可解的嫌隙。

陈诚怀着委屈忧郁的心情，离开二十一师，赴沪养病。这时严重又出任军委会军政厅厅长，陈诚由严重保荐为该厅副厅长，兼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严重辞职后，陈诚代理厅长，并兼军委会教育处处长。

1927年11月，宁汉分裂，蒋介石受桂系李、白的胁迫，宣布下野，由南京回奉化溪口，出国日本，陈诚表示同进退，辞去职务，偕同秘书张琢卿（青田人），到了上海闸北青云路信达利汇兑庄，会见赵志尧（字淳如，浙江青田小阮村人，与陈诚系处州中学同学），商谈今后出处，赵劝他静观时局变化。

1928年1月，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通电“拥蒋”，蒋介石东山再起，由日本回国，恢复国民军总司令职务。

蒋介石重新上台后，任命陈诚为南京总司令部警卫司令。4月5日，蒋赴徐州，重新部署兵力，继续北伐，攻打张作霖，以参谋总长何应钦留守南京，任命陈诚为前线炮兵指挥，南京警卫司令职由参谋长应三山代理。

1929年春，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十一师师长（十一师是蒋的一支主力部队）。

1930年，谭延闿患脑溢血病故，蒋为之营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东侧，称为谭墓。

谭延闿，字组庵，湖南茶陵人。其父谭曙卿是逊清湖广总督。谭延闿也是清末翰林，民国初年曾任湖南督军，后来追随孙中山，参加民主革命，当过广东和武汉国民政府主席，北伐中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国民党奠都南京后，谭延闿是国民政府的第一任行政院长。

谭延闿的母亲是丫环纳妾，每餐侍立桌旁，为全家人添饭，不能同桌吃饭。死后灵柩不能出正门，只能从旁门抬出，谭延闿以长子身份，伏在灵柩上，才从正门出葬。谭延闿深恶封建门阀等级观念，誓不纳妾，生一子三女。长女才学并茂，精明强干，嫁与唐某（据杜伟遗稿是袁某），唐亦湘人，曾任青岛海关监督，其妻襄助，里里外外，井井有条；儿子谭伯羽，留学德国，曾任上海暨南大学教授，抗战时当过交通部长；次女嫁给华侨冯某，冯当过招商局广州经理；三女谭祥，字曼怡，上海爱国女子学校（一说上海务本女校）毕业，擅长书法，在南京陆军子弟学校当过教员，与宋美龄在美国留学时同学。

谭延闿任行政院长时，与蒋介石为腻友，经常到蒋官邸漫谈，每来必须携曼怡同行。曼怡口极甜蜜，称蒋为爸爸，称宋美龄为妈妈。蒋氏夫妇极为钟爱，视为己出。

谭死后，曼怡经常在蒋氏跟前。蒋氏夫妇自然要为干女儿选择“成龙快婿”。决定在年轻将领中，以胡宗南，陈诚两人择一而配。最后商量决定嫁给陈诚（这是曼怡自己嫁后语人）。

尽管胡宗南的年龄比陈诚大，但没有结婚，又是黄埔军校的一期学生，是“天子门生”，对蒋忠诚不贰，可以放心。陈诚年较小，但已结过婚，蒋考虑到陈诚早期与邓演达关系极深，以后才投靠自己，为了笼络，因此决定许配给陈诚。

蒋氏夫妇商量内定后，征询曼怡本人意见。谭问“现居何职？”宋美龄回答：“军长。”其实当时陈诚只是11师师长。谭又问：“是哪一军？”蒋介石在旁补充一句：“18军。”谭俯首无语。蒋事后擢升陈诚为十军军长，宣布陈诚因讨伐阎、冯有功晋级。

尽管一切都很顺利，陈诚与谭祥还是于1932年1月1日在上海举行婚礼，证婚人为蒋介石。男方由杜志远主婚，女方由谭泽主婚，婚礼极为简朴，不登报，不发贴，不请客，不收礼，不铺张，只是举行仪式。来宾以谭宅方面者为多。新婚之夜，乃兄谭伯羽与宋子良（宋子文的弟弟）酒后兴浓，

要闹洞房，深夜不离，陈诚请杜伟打圆场，说好第二天再闹，才罢休。

曼怡性格温存，磊磊大方，生活简朴，婚后夫妻感情弥笃。

陈诚与谭祥结婚之前，与上海劳动大学一个女学生陈德懿感情极好，来往已经四年。为与谭祥结婚，陈诚给她一笔钱，送她到美国读书，从此分手。

在婚前，谭祥知道陈诚已有原配，对陈诚说：“你和她总得有个手续吧，可否给我看看。没有这个手续，我们的婚期只好推迟，再等一等吧。”几句轻言细语，急得陈诚急忙打电报，叫吴子漪星夜赶回青田，陈诚的原配吴舜莲大哭一场，死也不同意，可急坏了乃兄吴子漪，请来杜伟的父亲杜志远，再三劝导，才取得同意，但提出一个条件：“生不能同衾，死必须同穴。”经陈诚同意接受。吴舜莲不识字，吴子漪代笔签名盖章，办了协议离婚手续。

吴舜莲被离异后，陈诚汇给她一笔款，作为生活费用，仍住在高市陈家，还是以陈家媳妇身份侍奉婆婆，婆媳相处和睦。1948年岁末，陈诚将吴舜莲接到台湾，并负责其生活费用，陈病故后，谭祥也一如既往照顾“吴姐”，直到她于1978年离开人世。从某种意义上讲，陈诚夫妇总算没有失信于这个可怜的女人。

陈诚和谭祥结婚后，其同学、十八军驻南京办事处主任赵志尧和他的妻子叶耐秋，也是青田高市人，与谭祥关系搞得很亲热。谭祥经常到叶耐秋家，爱吃青田家乡口味的菜。赵志尧夫妇也经常到谭祥家里作客。谭祥屡次问及陈诚高市老家的情况，显然对吴舜莲仍以陈家媳妇的名份在陈家，心里总有点不踏实。谭一再在陈诚面前提出要一道回家看看婆婆，陈诚无奈，乃于1934年秋，陪同爱妻谭祥，一道回青田高市探望母亲。

谭祥一进门，便见到吴舜莲，连唤“姐姐”，倒使吴舜莲倨促不安，相对无言。谭祥雍容华贵纡尊降贵，对吴舜莲宽慰有加。乡亲们夸谭：“倒是书香门第出身，通情达理。”

陈诚夫妇回南京后，陈诚又汇了一笔钱，在青田城里新寺巷盖了一座楼房，让吴舜莲迁居城内，不再住高市陈家。

蒋介石和陈诚建立“翁婿关系”后，对陈诚更为宠信。

1947年，国民党东北大将熊式辉在东北节节败退，时任参谋总长的陈诚自告奋勇上前线，声称“九个月内肃清东北共军”。蒋介石便外放他当“东北九省军政长官。”但陈上任不到数月，进一步奠定了国民党在东北的败局，他看到大势已去，就以“胃病大发”的借口，静悄悄地飞回南京，不管什么人看他，他一律来个闭门不纳。不久，就神秘地去了台湾。

陈诚就任台湾省主席后，为了争取民心，稳定局势，他一方面打出“人民至上，民主第一”的口号；另一方面重用“半山”官员。台湾回归祖国后，国民党当局为了支援其在大陆发动内战，不但没有尽快医治殖民统治和战后的创伤，反而加紧对台湾人民的掠夺，使当地民众对国民党人恨之入骨，省籍矛盾也相当尖锐。陈的聪明之处，是在于他巧妙地利用了“半山”这座桥梁，一方面压制异己，一方面扩张自己的势力，以达到他有效控制台湾为蒋

介石准备后路的根本目的。

主台一年

一般认为，陈诚在台湾省主席任内，成功地控制了台湾。1956年台湾《中央日报》社长胡建中访问陈诚，要求他以“我与台湾”为题写一篇文章，陈在该文中回忆了他主台一年的情况，其中难免有失实和诬蔑之处，但个别地方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现将一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当时台湾的情况，可以用两个字来说明，一是“乱”，一是“危”，这种乱与危的现象可以归纳为以下几项，扼要说明：

<一>人心方面——当时由于大陆局势恶化，所以台湾人心也随着动摇悲观，大家终日惶惶不晓得共匪几时来攻，也不晓得台湾能守多久。稍有办法的人，不是近走香港、东京，便是远走美洲，而不走的人，则认为已如釜底之鱼，只有等待末日的来临了。当时很少有人相信，我们能够在台湾有所作为。

<二>社会方面——因为人心动摇悲观，于是匪谍乘机活动，造谣惑众，聚众滋事；并以学校为中心，开始制造暴乱，煽动学生罢课游行。其目的显在打击政府威信，破坏社会秩序，使人民不能生活下去，使政府不能治理下去。

<三>政治方面——政治方面的最后危机，就是匪谍勾结少数野心分子，运用政治的分化，企图颠覆政府。同时，匪谍更由香港与大陆源源而来，向政治军事与社会经济方面渗透。此外，当时中央在台湾的军政和经济的单位很多，中央与地方的权利划分不明，系统也非常庞杂甚至形成了一种可怕的纷乱现象。

<四>经济方面——台湾经济过去依赖日本，光复后则与大陆联系，因此，大陆局势恶化，台湾经济在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尤其台市与大陆上金圆券相联，所以大陆上金融的混乱，使台湾的金融也不能安定。当时我们每天要开会决定台币与金圆券的比率。同时，好商囤积居奇，买卖黑市金钞，致使物价波动不已，人民生活朝不保夕。

<五>军事方面——当时在台湾的部队，只有两个不健全的师，根本不足以抵抗共匪来攻，同时，撤退来台的部队，既复杂而又残破，官兵虽报国有心，但作战乏力，尤其是加深内部隐忧。

<六>国际方面——当时美国对中国援助，实际上已经停止，美国白皮书的发表，等于宣告中华民国政府的死亡。同时，他们还运用各种方法来打击我们。很显然的，他们希望中华民国政府赶快死亡；而后来事实证明，他们这种做法是受了共产分子的操纵和利用。至于好心肠的外国友人当时所思考的，是如何使这批反共人士免于共匪的屠杀，因为在他们看来，台湾之陷匪，

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在那种危机的情况之下，我第一个想法，认为要确保台湾，并使台湾成为反攻的基地，必须将政权真正建立在民众之间，使政府与人民完全打成一片。决不可再蹈过去的覆辙，使政府离开人民，成为建筑在沙滩上的一座高楼。一次，我与梁寒操先生谈到这个问题，他便提出“人民至上，民主第一”的口号，我认为这与我的想法完全吻合，所以后来就拿这两句话作为施政的最高准则。

怎么做法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当时情况危急，我们一方面不能不作应变的准备，另一方面又不能不作久远的打算，根据这两方面的考虑，我们又决定一个原则，即从进步中求安定。因为如果不实行改革，造成进步，决不可能求得安定。

民国 38 年 1 月 5 日，我接篆视事之后，对于省政府人事，可以说全部未动。这有几个原因。第一，当时情况危急，行政不容停顿。第二，我们要革除“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恶习，要求树立良好的风气与制度。第三，当时各部门的负责人员，大部分都很健全，实际上没有变动的必要。

这里所要说的，只是几项具有重大深远影响的施政。

<一>肃清内部匪谍，实施出入境限制——当时我们实行这一措施，是基于两种事实的需要。一是我们不能让匪谍自由进出，否则，便无法保障我们内部的安定。二是台湾的经济能力有限，如果不对人口移入作合理而必要的限制，则一时人口增加太多，连吃饭都要发生问题。由此可知，当时限制出入境，实在是保卫台湾所必须采取的一项措施。后来我们对于此一措施，不断修正放宽，当时全省人民全力支持此一措施，但各方仍多反对之声。所幸当时大家都能明辨大利大害，此一措施乃能顺利推行。

<二>建立独立自给的经济——当时台湾经济与大陆联系，大局恶化以后，我们要考虑如何使台湾经济能够独立自给、不因大陆丧失而使台湾经济发生不可解决的困难。本此认识，我们一方面决定以增加粮食生产为中心，先解决吃饭问题。因为当时粮食产量只有 100 万吨，而台湾人口则不断增加，如果不全力增加粮食生产，则军粮民食随时均将发生问题。另一方面，则设立生产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台湾区的国营事业，国省合营事业及省营事业，有计划的发展工矿生产，并确定以下四项原则：

配合粮食增产计划，扩建化肥工业与水利建设。

扩充电力建设，以为发展工业之基础。

增加外销产品的生产，以争取外汇。

增加省内必需品的生产，以节省外汇。

不过，当时我们统一公营事业的管理与革除公营事业的积弊，曾遭遇不少困难。

<三>实行三七五减租——土地问题本是中国民生问题的中心环节，当时台湾的情形与大陆各省大同小异，所以我们要社会进步与人民的生活改善，

便不能不从解决土地问题做起。然而，解决土地问题，谈何容易，尤其在那种危急情况之下，阻力之大，可想而知。但是，经过多方面的思考，我终于下了最大决心来做，采用和平渐进的原则，先实行三七五减租。当时我们做这件事，是只许成功，不容失败的。如果失败了，我们便要整个失败，彻底失败。结果，由于各方面的配合努力，这个政策得到空前未有的成功。

三七五减租政策的成功，其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在社会方面，增加了人民的向心力与社会的安定力。在政治方面，改变了人民对政府的观念，同时也提高了政府的信用。在经济方面，改善了多数人的生活，增加了粮食及副业生产，促进了社会经济繁荣。在文化教育方面，增加农村儿童青年就学与升学的比率，提高了农村社会的文化水准。在土地政策方面，替后来实行耕者有其田政策，打下了基础，铺平了道路。

<四>改革币制——当时因台币与金圆券相联，所以大陆的币制愈恶化，台湾的金融愈混乱。同时，中央在台之军公费用与公营事业资金，多由省府垫借，台湾财政不堪负荷。面对这些危险的情况，要稳定台湾的金融，必须改革币制。然而，要想币制改革成功，必须做到： 财政收支平衡。 物资供需平衡。 贸易收支平衡。 充足的准备。 其他有关政策与币制改革相配合，尤其是政府自身的信用。民国 38 年 1 月至 3 月，两度飞京商洽，均未获解决办法。5 月间再赴广州，始获得如下结果：

关于军公垫款，允以中央存台物资折算归垫。

中央在台生产事业，全部交由余指挥监督。进出口贸易及外汇管理，亦由省统筹调度。

中央拨借黄金 80 万两作为改币基金。

至此，币制改革乃于民国 38 年 6 月 15 日付诸实行。同时并实行以下各项措施：

修正黄金储蓄办法，加强管理黄金储蓄，缩短兑现金期限，扩大办理黄金储蓄地区。

切实增进各种赋税及公卖收入，并督促公营事业所得盈余依限解库。

交通等公用事业之费率，按照成本及杂持费调整提高，以期自给自足，免由公家贴补。

各级政府机关实行裁并机构，淘汰冗员，撙节开支。

由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统筹管理国营、省营、国省合营之各种生产事业，使其合理配合，以谋发展。

由金融机关对于生产事业，尤其输出品生产方面，充分贷款扶助，并减低贷款利息。

调整外汇价格，促进输出贸易。

提倡消费节约，对于奢侈品消费，赋课重税，以资限制。

取缔地下钱庄，抑制游资活动，停止商业银行发行本票，防止银根泛滥。

举办大专学校毕业生就业活动，人尽其才，学尽其用，乃是国父与总统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近十年来，教育与社会脱节，所学与所用脱节，也是我们失败的一个重大原因。

社会政治的进步，要依靠人事上的新陈代谢。如果陈旧的血液不能排除，新鲜的血液又不能注入，那个社会与政治当然要落后，要发生问题。

当时台湾的情形较大陆有过之无不及，青年受到匪谍的蛊惑，不愿安心求学。政治力量虽可制止学生罢课游行，但要造成良好的风气，使青年自觉自发的求上进，就必须实际替他们解决问题，而最重要的就是学校毕业后的就业问题。

基于以上的理想和理由，所以当时我们决定举办大专学校毕业生就业活动。这个办法实行以后，对于鼓励青年上进，造成良好学风，以及安定社会人心，无形中收到很大效果，但因社会与政治各方面，人事新陈代谢的风气与制度，尚未能形成；同时，社会经济与学校教育的发展，彼此也尚未能达到理想的配合，所以这个办法的继续推行，便发生许多困难。今后这个问题的解决，显然仍要从发展社会的建设，加强教育与社会的配合，以及促进人事的新陈代谢各方面继续努力。

<六>准备实施地方自治——国父早就告诉我们，地方自治是民主政治的基石。好比造屋，地方自治是筑基的工作，基础筑得坚实，房子便不会倒塌了。当时台湾情势虽属岌岌可危，但我们想到国家的久远前途，所以决心准备实施县、市地方自治。

实施地方自治，我国尚乏先例，各种法规更付阙如。同时，地方自治之成败，则关系国家前途之命运，所以我们要做好这件重大的工作，必须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为策划准备这件工作，民国 38 年 8 月 15 日正式成立“地方自治研究委员会”，研订了各种有关法规与调整行政区域方案，并确定实施的步骤。

对于这件大事，我只做了一点开路的工作。现在台湾实施县、市地方自治已有三年，在此三年中，我们发现不少缺点，亦改正不少缺点。今后只要大家有远见，有信心，我们必可在这个基础上得到更大的成就，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

<七>整编来台部队——当时台湾的最大隐忧之一，就是一部分撤退来台的部队，溃不成军，即余前面所说的报国有心，作战乏力，因此部队愈多，隐忧愈大。其时，我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有保卫地方安全的责任。在那种危急的情况下，我只有采取非常手段，一方面加重整编训练，另一方面则安顿他们的生活。当时这件事所遭遇的困难与危险，非身临其境，不能想象。所幸各方面都能体念时限，推诚合作，使我们消除了一种非常严重的隐忧。

民国 38 年初，我以带病之身，出主台政，原属见危授命。是年 12 月 21 日，得卸仔肩，自属心安理得。但一般认为，当时政府改组，未免事出突然，甚至至今还认为是一个没有揭开的迷。当然，现在知道这事内幕的人还不多，

此时我只能告诉大家，那仍是苏俄在国际间与其在各国的同路人，利用我国一般人迫切冀望援助的心理，多方布置而成的一个政治陷阱。其目的就是要从我们内部打垮中华民国政府。

即使不能达到此目的，至少也可分化我们的团结，分散我们的力量，破坏我们的反攻准备。我虽不能说，当时吴国桢是布置那个政治陷阱的一分子，但后来吴的叛国行为，至少可以证明他是共产国际所选择利用的一个适当人物。

从上述回忆可以看出，陈诚对自己主台一年所取得的成绩颇为自信，也为后来的免职耿耿于怀。他把自己的免职说成是共产国际的布置，这当然十分荒唐，实际上是蒋介石逃到台湾后为了在绝望中乞求美援才免去陈诚台湾省主席的兼职，而安插亲美派吴国桢。据说蒋的这项安排事先没有告诉陈，所以陈事后曾一度表示消极，向人抱怨过去蒋经国、宋美龄在蒋介石面前破坏他，并挑拨“半山”派倒吴。

据说陈诚是1950年美国向蒋介石提出不得任用的二十余人之一，不得美国军事顾问团团团长蔡斯的喜欢。为此，陈曾对美国作了些谄媚。1951年曾由蒋梦麟等人从中奔走，并托胡适在美国活动，为此把台湾大学校长一职给予蒋梦麟、胡适的亲信钱思亮。此后陈与美国的关系有些好转，如美国报刊对陈倡导的“三七五减租”运动曾予捧场。蔡斯和陈也取得一些谅解。

同室操戈

1949年12月21日，陈诚被免去台湾省主席后，并没有被蒋介石所冷落。次年3月蒋介石“复职”后，他又受命担任“行政院长”。此后，蒋便大力扶植陈诚、蒋经国的势力，排除异己，以巩固其独裁统治的地位。其办法是：通过军事整编，改组政府机构，兼并非陈诚嫡系的部队，打击与排斥政学系、CC系在政权上的势力，以加强陈诚在军政方面的控制；通过“改革”国民党，强化特工，以培植蒋经国在党特方面的势力。在大陆时，陈诚是蒋介石嫡系中“实力派”领袖，握有相当大的兵权，拥有部分保定军校和黄埔军校少壮军人的支持，与王东原、郭忏、周岩、霍揆彰、万耀煌、罗卓英、朱怀冰、何联奎、周致柔等自成一系，并与其亲信方天、刘云瀚、胡璉等共同组织过封建法西斯团体“干域社”。

大陆解放，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和非嫡系的各地方派系的杂牌军队大都在解放战争中被我歼灭，最后能逃到台湾的不是很多。但因蒋预先在东南沿海地区和台湾保留了陈诚的部队，所以当蒋逃往台湾之后，便利用陈诚所拥有的残余兵力为资本，整编其他非嫡系的残余部队和孙立人原在台湾编训的“新军”，拼凑起约40万的兵力。据当时资料显示，蒋军整编前的陆军12个军、2个独立师中，属于孙立人系的部队只有第80军和第167军（原何应钦系）

2个军，而属于陈诚系的则有第5、6、18、19、54、75、87等7个军；此外，为其他蒋嫡系的有第50军及第52军（原关麟征）部队；派系关系不详的有第45军、独立13师、独立32师。

在蒋军的整编过程中，非蒋嫡系的许多军事首脑人物首先被削去了兵权。如白崇禧、李品仙、陈济棠、余汉谋、薛岳等对军事再无插手或发言的余地，处在被软禁的境遇中，云南败将余程万被扣押。只有孙立人因为是美国所扶植并且是蒋军中最能取得美国信任的军人，蒋要利用他做争取美援的工具，不得不给他一定的军事上的职位。但蒋对孙一向嫉视，又一面指使陈诚等极力地防备和排挤孙。这也是陈诚与孙立人一向就不相容的根本原因。

除了非蒋嫡系的军人遭到排挤外，其他非陈系的蒋介石嫡系军人逃台后亦都失势，何应钦到台湾后一直失意，仅保留了“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的空衔，终日不得不以打牌、打猎、打球以自娱，甚至有传说何受到监视。何的嫡系人物如顾祝同、韩德勤等在台也均失意。据说，因何之佳、何绍国等在港搞“第三势力”，何曾受到蒋介石的痛斥。据1951年的材料，何之亲信刘汉珍、牟廷芳等在港人物，曾纵恿何接受前日本战犯冈村宁次等的“拥戴”排陈倒蒋。

原装甲兵司令徐庭瑶，与陈诚的矛盾甚深，也不得蒋介石的信任，到了台湾后，陈恐怕徐尾大不掉，将装甲兵司令部撤销，成立装甲旅，借口徐的资望高不能屈居旅长，免去徐职，而任蒋纬国为装甲旅司令。当时徐极不满，徐的部下前各装甲团团团长曾鼓动徐实行反陈兵谏，徐未敢接受。据说徐当时曾愤恨地称：“如果不是因为我与中共有血债，我真要投向人民政府。”

陈诚排挤其他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手段极为毒辣。如1950年蒋的嫡系刘安滇的50军在基隆上岸时曾受到陈的阻挠，引起该部士兵群情激愤，陈即借口该部两士兵与私娼通奸而予以枪杀，以镇压这种情绪，该部登陆后不但待遇很差，而且与另一黄埔系李延年部96军同被陈“整训”。李延年与另一黄埔系的李天霞逃台后被以“未奉命即擅自撤出阵地”的罪名判处徒刑12年。另一黄埔系32军军长李玉堂则以“匪谍”被处死刑。据美联社香港1950年4月1日消息，3月22日夜以“匪谍”罪名被枪毙的人之中仅中将就有6人，少将有13人。

1954年5月间，陈诚为保存自己的实力，将原关麟征亲信刘玉章调到金门去任金门防卫部司令，而将自己的亲信胡璉及其部队一并调回台湾。刘对此甚为不满，认为调他和52军接替胡璉是有意消灭“杂牌军队”的手段，乃表现消极，在金门和香港间做走私生意，希望多搞些钱。

为了安插被排挤掉的军队中各派系将领，蒋介石“复职”后，乃将他们收容在所谓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中，被任为战略顾问的就有桂系的白崇禧（副主任）、李品仙，晋系的杨爱源，川系的杨森、孙震，粤系的余汉谋，西北军系的秦德纯、孙连仲、冯治安、熊斌，东北军系的邹作华；属蒋嫡系

的是：何应钦（主任）、顾祝同（副主任）、汤恩伯、朱绍良、蒋鼎文、钱大钧、韩德勤、徐庭瑶，并包括薛岳、王懋功、刘茂恩等等。

1952年，蒋介石趁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蔡斯提出“部分老将应该退伍”的建议，将非陈系的老军人大部分列入退役名单中，而陈系只有极少数。如中将以上的退役名单中，包括晋系阎锡山、杨爱源，川系杨森，湘系何键，桂系李品仙、刘士毅，粤系黄质文、陈骥，东北军系的邹作华，西北军系秦德纯、熊斌，蒋嫡系的朱绍良、钱大钧、俞济时、徐永昌、谷正伦、徐庭瑶、陈继承、韩德勤、贺国光；而属陈诚系的只有罗卓英、万耀煌、林蔚、周岩等。凡担任“战略顾问”而这次列入退役的人，均被免去了“战略顾问”的职务。

1954年5月“政府”改组后，陈诚进一步把持了集中军政最高权力的“国防会议”，蒋介石与他分别担任该会议主席、副主席，周至柔任秘书长；掌握三军实权的“参谋总长”为蒋与陈诚极为亲近的桂永清。桂于8月间死后，由原属何应钦系后改投陈诚而成为陈手下“四狗之一”的彭孟緝以副参谋总长身份兼代。10月间，又将12个军整编为8个军，所设两个军团统辖之。两个军团司令胡璉与石党（原为汤恩伯系，后投陈）也都是陈的喽罗。向与陈诚矛盾根深的前“陆军总司令”孙立人这次也被排斥，除去为了敷衍美国而任命孙立人系的余伯泉为“副参谋总长”及“只能管管行政”的“国防部长”俞大维（与陈诚亦有私谊）等几个亲美分子而外，所有军事指挥权几乎绝大部分是以陈诚为首的小圈子势力所掌握。

在政治上，陈诚过去就已经掌握了大批复兴社和三青团的干部。逃到台湾后，极力扩展自己的势力，同蒋经国一起在两三年之间就大大削弱了过去与他对峙的政学系和CC系两派势力。

曾占据国民党政权要津20多年的政学系随着蒋介石军事力量的崩溃，也发生了很大的分化。以吴鼎昌、张嘉璈为代表的财政巨头，在大陆解放后，逃到香港、澳洲等地做了白华。熊式辉却在香港、曼谷等地经营投机生意（1954年7月赴台）。钱昌照等则投向人民，翁文灏到西欧转了一圈以后也返回大陆。附蒋逃台的有张群、吴铁城、王世杰、王宠惠、郑道儒、胡家凤（1950年冬由港去台）等人；以及被蒋押解到台湾的陈仪。

政学系随蒋到台湾以后，其一部分人物即和亲美派相互勾结起来，在蒋政内部结成一种混合势力。

王世杰、孙立人、吴国桢等是蒋为争取美援的工具；张群、吴铁城等则在蒋勾结日本当局等方面有其作用。他们都以美国的宠信为资本，和陈诚、蒋经国的势力对立，进行争权夺利的争吵。

远在1947年4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改组，张群入主行政院，政学系的一些人物占据其他政府部门时，司徒雷登即在致马歇尔报告中，就CC势力的削弱和政学系的得势表示“令人兴奋”，誉张群、翁文灏、王宠惠、王世杰等为最能干的人物。吴国桢是美国前国务院顾问耶塞普的同学，吴在任武

汉、重庆及上海等地市长时。就见重于宋子文、宋美龄，为蒋宋家族的幸臣，并与美国朝野关系密切。

1950年3月陈诚“组阁”后，便开始清除“行政院”中的政学分子，仅留政学系的郑道儒担任“经济部长”，但使其没有实际权力，而在1952年终被免职。叶公超是政学系分子，与陈还能相处，所以也被留任“外交部部长”。被押到台湾的陈仪于1950年6月被加上以策动“叛变”的罪名而处死。同年，吴铁城积极钻营谋任驻泰大使，陈诚则提出罗卓英来，造成吴、罗之间激烈的争夺，结果以双方均放弃该职而作罢。吴铁城到1953年11月死去为止一直失意。王宠惠任“司法院院长”，胡家凤任“总统府国策顾问”，起不了多大作用。在国民党内除与政学系混在一起的吴国桢为中央委员外，张群、王世杰、吴铁城、王宠惠都只挂一个中央评议委员的名誉。张群除挂“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设计委员会委员及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等空衔外，也只处于为蒋从旁“献策”的地位，没有实权。美国所器重的胡适和蒋廷黻只是被利用，来破坏李宗仁等“第三势力”的工具，蒋对他们也存在疑忌。

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国民党反共死硬派CC系，是蒋介石20多年来独裁专制的一大支柱，长期把持国民党自中央至地方的各级组织，进行党务、特工、教育、文化各方面的反动活动，残害人民。在抗战期间因其积年恶势力与美国对华的侵略措施有所抵触，一向不得美国主子的欢心。自1947年以后，美国就不断要求蒋介石实行所谓“改革”，以“使自由主义分子处于领导地位，削弱反动集团（指CC系）的势力”，司徒雷登曾当面向蒋介石说：“我建议第一步应先解散CC派。”

CC系与其他派系一样，当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彻底垮台后也起了分化，潘公展等流亡美国做白华，程沧波（后赴台）、刘百闵、彭昭贤（后依附张厉生赴日）、李微尘、罗梦册、许孝炎等留香港搞“第三势力”活动，陈果夫、陈立夫则逃到台湾。陈诚、蒋经国借口蒋政内部普遍要求追究所谓“大陆失败的责任”，多方排挤CC势力。政学系、亲美派与CC一向为死对头；蒋介石在众叛亲离的打击下，亦就扶植陈诚、蒋经国的势力来代替CC系为其独裁统治的死党。这样，CC系在国民党内成为众矢之的；以削弱CC系势力为目的国民党的“改造运动”便由此开始。

自1949年底起，蒋介石父子与陈诚及其亲近人物张其昀、郑彦、陶希圣、黄少谷、王世杰等经多次商讨，于1950年7月22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所谓“改革方案”。同月26日，蒋以总裁名义指定了16名改造委员，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以代替国民党旧的中央执、监委会行使职权。蒋又另指定了29人为所谓中央评议委员，以保留一部分旧中央执、监委员在党内的地位。改造委员会在蒋经国的把持下，以“肃清失败主义”、“扫除派系倾轧”、“大团结”等为口号，接收了CC系对党的控制权。在改造委员会中CC分子的比重很小，虽然还保留有属CC系的谷正纲、张道藩、胡健中等人，但是，这几个人也都和陈诚、蒋经国有直接勾结。陈果夫、

陈立夫均被排除在外。改造委员会下设的 7 个组和 5 个委员会的负责人，多数属蒋经国和陈诚的人。陈果夫只在中央评议委员中有个名字，CC 系控制了 20 多年的党权，就此转入了陈诚和蒋经国之手。

在改造委员名单公布之前，CC 系与陈诚、蒋经国等争吵不休。当时，CC 系的意见是：国民党可以“改造”，但不能离开“法统”，因此“改造”工作应仍由六届中央执、监委员负责，不必另派改革委员；而陈诚、蒋经国则坚持：两年来“党的失败的惨痛，六届中央执、监委员不能不负责任，六届执、监委员如不停止行使职权，则党的改造必不能发挥其政治革命性的效能”。蒋介石曾对合众社记者说“改造工作及挽救国民党将较挽救死硬派的面子更为重要”以示其“改造”之“决心”。当改造委员名单宣布后，陈立夫便怅怅地离开台湾去香港、欧洲、流亡美国。据传：陈立夫在离台前曾往草山去看蒋，蒋对陈说：“祖燕，我也没有办法，你还是到外国去走一趟吧，如果情形好转，你再回来，好在我已把你几个干部安置了进去。再则你也替我准备一条退路。”而陈果夫那时却在台湾病倒奄奄一息。

1952 年 10 月，改造委员会不顾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等的反对，召开了国民党第七届代表大会。在新中央委员会中，原属 CC 系的只有张道藩、谷正纲、李永新、陈逸云、孔佳籍等人；10 名中央常务委员中，几乎全部是陈诚和蒋经国的人。中央常务委员会下新设的 6 个组和 5 个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没有一个是 CC 分子。

在政权方面，CC 系也逐步地受到陈诚与蒋经国的排挤。1950 年蒋介石复位时，陈诚与陈立夫均积极活动任“行政院长”，结果是陈诚获蒋提名。陈立夫大为不满，指使 CC 分子及立法委员谷正鼎等对蒋表示反对，提出质问：“为什么总统提名只提陈诚一个名字，为什么不提两个名字让我们选择？”但遭到蒋的痛斥。1950 年 3 月陈诚组阁时，CC 系尚保有三个部长席位——“内政部长”兼“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余井塘、“教育部长”程天放，“教育部常务次长”高信。其后余井塘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职改由与 CC 系有关系的田炯锦担任，1952 年，余的“内政部部长”又被免职。至 1954 年俞鸿钧任“行政院长”后，在 8 名部长中 CC 系一个部长职位也没得到。在两个委员会委员长中，“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改由前接近 CC 系的蒙古人刘廉克担任。香港《中声晚报》评这次改组为：“CC 分子一概摒诸阁外，此在 20 年来历届阁接中实属罕见之现象。”

在争夺“立法院院长”的权位上，陈诚曾与 CC 系有过紧张的厮斗。“立法院”迁到台湾后，其委员人数已大为减少，但是，CC 分子仍控制着多数席位。原“立法院院长”童冠贤在大陆解放时逃往香港，一直由陈诚系的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的刘健群以副院长资格代理院长，CC 系的立法委员不与刘“合作”，并借其多数势力曾否决过陈诚要求授权“行政院”便宜行事的法案。1950 年 8 月“立法院”开会之前，陈立夫离台时，表示“立法院院长”只有他本人和 CC 分子程天放或张道藩才有资格做，表现出 CC 系要最后以“立

法院”为地盘保留其残余的势力和地位。同年9月间，原有“立法院院长”任期届满开始筹备改选新的“立法院院长”时，“立法院”中的CC分子与刘健群一派三青团分子互相争抢，各不相让。到9月18日蒋介石以“总裁”资格指定刘健群为院长候选人，台湾“半山”派重要人物黄国书为副院长候选人，12月正式选举后，刘健群仍为“立法院院长”。CC系的不满使“立法院”的暗斗更加激烈。1951年，据说因陈果夫死去，CC分子亟谋将刘健群赶走而使陈立夫回台任“立院院长”以继续领导CC系的活动，对刘健群提出“浪费公款案”，攻击刘对“院务人事经费处理”“诸多失当”；并组织了所谓院务调查委员会，提出了长达4万言的“调查报告”，揭发刘利用职权化公为私的劣绩。刘被迫辞去了“立法院院长”职务。蒋介石为了缓和CC系与陈诚系的矛盾，就采取了折衷的办法，使既是CC分子又与陈诚、蒋经国有勾结的张道藩继任了刘健群的位置。

CC系的失势，使该系的许多人物改变了主从关系，其中大部分成了陈诚、蒋经国的喽罗。据当时的材料显示，投靠陈诚的主要有：已经自成一系的张厉生，成为官邪人物的黄少谷以及原来与CC系关系不太深的黄季陆等；投靠蒋经国的主要有：王德溥、张道藩、谷正纲、胡健中、王星舟等人。当然这些人与CC系的传统关系还是保持着的。

从高峰摔到谷底

陈诚的一生可看成是喜剧与悲剧的综合体。在蒋介石“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运用下，陈诚曾经享受到无比的崇隆待遇，但在他的晚年也经历了从高峰摔到谷底的惨淡岁月。

1954年3月，台湾“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台北市举行，蒋介石继续被国民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后，选举陈诚为竞选搭档。3月24日，陈诚以1417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二任副总统”。

当年的陈诚可谓是功高震主，红透半边天。国民党一直自吹自擂的“耕者有其田”、“公地放领”政策就是在陈诚手下完成的。土改的成功，给陈诚带来了一批“农复会”为主的人马；随后陈诚担任“行政院长”，又建立了以伊仲容、李国鼎等人为主的财经官僚班底。在“立法院”中，最大的派系“座谈会派”则奉陈诚为宗主，在320余名“立委”中，“座谈会派”拥有140多名成员。陈诚的势力也进入了全盛时期。

蒋介石当年为什么容许陈诚如此嚣张，台湾《民进周刊》1988年第15期刊登一篇文章《蒋氏父子联手斗垮陈诚内幕》，曾提出以下四个现实的考虑：

陈诚是最早来台湾的军政要员，“二·二八事件”后，台湾军政大局不稳；陈诚入主后，大致让台籍半山与军方维持一定和谐，蒋介石要在台湾

复出，势必要依靠陈诚。

美国自 1949 年 8 月 5 日，发表厚达 1054 页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例举军援及国民党在大陆的腐败颓废，一度使美国杜鲁门和蒋介石的关系破灭。韩战军兴，美国对台湾的态度又大变，并以军援、经援，顾问团等干预台湾内政、经济、国防，蒋介石面对此种态势，只得找陈诚作中间人，缓和美方干预压力。

为了扳倒美方对台湾军队的干预力量，第一个要斗倒的人便是孙立人，而为了斗倒孙立人，则须借重陈诚在军中的影响力。后来陈诚负责监察院孙主人案九人调查小组的调查工作，报告公布后，孙立人亦开始长年被软禁的生涯。

国民党迁台后十年，中共不断发动军事行动，蒋介石命陈诚组战斗内阁，动员全国资源进行备战，在当时的国民党文官武将中，唯有陈诚能达蒋氏的期望。

蒋介石对陈诚重用的另一个原因是，陈诚对蒋没有“谋反”的记录。当年随国民党来台的党政官员中，几乎个个都有和老蒋不合，甚至“打过架”的记录，比如阎锡山、何应钦、白崇禧等。蒋介石认为国军三大战役后的失败，在于降共将领太多。因为这些谋反人物都未获重用，权力真空下的陈诚因此才得以大展所长。

不过，陈诚势力的膨胀，亦严重威胁到了蒋介石传子蒋经国的接班计划。陈诚当选为“副总统”，为外界公认是蒋介石的继承人了。实际上，陈诚的成功希望非常渺茫。一为年龄的悬殊，陈诚 57 岁，蒋经国 45 岁，相差 12 岁，时间对陈不利；二为陈诚的健康，患有严重胃炎早不堪繁剧。相对地，蒋经国精力过人，在生命的接力赛中，冠军操在小蒋的手里。应该说陈诚是最了解蒋介石的，知道如何迎合蒋介石，所以才能爬到今天这个位置。陈诚清楚地了解蒋介石最后剩下的这点儿江山，是一定要传给儿子的。但陈诚有野心，早在 1927 年，国民党刚在南京建都时，陈诚就曾对知心密友说：“我明明是一只老虎，也要装成狗的模样，等到了有了权力以后，再恢复老虎的本性来办大事啊！”

在蒋经国看来，陈诚是自己的父执辈，对他并不轻易就范。依国民党政府当时的“宪法”规定，“总统”不得连任，如果蒋介石不连任“总统”，那么依照经历和名望，陈诚出任第三任“总统”将成定局。再者，如果蒋介石突然归天，陈也会依“宪法”规定递补。

以往，陈诚与蒋经国在排挤其他派系推行小圈子控制上虽然是一致的，但为了争做蒋介石的“继承人”彼此妒嫉，常有摩擦。

1949 年春，蒋经国与陈诚同时被派到台湾，但上任不久的蒋就辞去省党部主任委员职务，据说是因为两人的“情绪不一致”。陈任“东南军政长官”期间，两人因青年军人的人事关系也发生过摩擦。国民党政府逃踞台湾后，

陈诚对蒋经国的扩展权势暗中戒备，表面上则采取敷衍态度。1950年3月，陈任“行政院长”时、在“行政院秘书长”或“内政部部长”的入选上都提过蒋经国的名字，但蒋经国（一说蒋介石）不肯，乃于4月间将“国防部政工局”扩大为“总政治部”以安抚他。蒋经国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后，通过政工特务控制了军队，常不通过陈诚自行派遣及撤换军官。如1950年夏，蒋经国派出四个省“游击司令”，而身兼“国防部长”的陈诚竟毫无所悉，陈曾因此深表不满。在国民党军队中，蒋经国的政工人员与陈诚的军事指挥人员间的矛盾亦极尖锐。据吴国桢于1954年6月29日在美国发表文章称，某些中级军官甚至说：“如果有一天我们必须打仗的话，我们将不得不首先打死政治工作人员”。在1950年时，陈诚曾发牢骚称，在台湾第一是蒋经国，第二是宋美龄，第三是吴国桢，他自己才算第四。并一度不到“行政院”办公，招致蒋介石的不满。在政府部门中两人也有矛盾，1951年初蒋经国曾欲以其手下“第一红人”郑彦，打入“行政院”任“侨务委员会委员长”，但遭陈拒绝，到1953年2月郑才始出任该职。

蒋经国亦常借代蒋介石批阅公文的机会，对陈的公文予以批驳，使陈颇为不快。1952年8月陈曾因不甘接受蒋经国的威胁一度提出辞职。同年10月问国民党七全大会开会之前又因同样原因表示“辞职养病”，后又抱病参加。据1954年2月27日、28日香港《中声晚报》报道，第二任“副总统”入选所以迟至2月16日“国大”召开前3天才作最后决定，是因为蒋经国不同意由陈诚出任。小蒋的理由是：“副总统”并非要职，主张以“元老”充数即可，而属意王宠惠。于是同拥陈方面的人员发生了争执，最后终于因陈握有军权而被蒋介石确定。但在国民党中常会表决时，蒋经国仍未投陈诚的票。其后蒋经国又积极反对陈企图以“副总统”兼任“行政院长”，主张提拔“青年干部”主持台湾行政。当时接近蒋经国的台北英文《中国新闻》和《民主晚报》均发表评论认为“副总统”不应该兼任“行政院长”。1953年2月25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台北电称：“谁将接替蒋介石为国民党中国的领袖，是国民党中两个最有力的分子中间极激烈的暗斗的问题。”

在陈诚和蒋经国矛盾上，蒋介石常偏袒其子而抑制陈。这一点从蒋经国的势力发展上即可以看得出来，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的排名上本来蒋经国一直追随陈诚，但到后来却一度超过陈诚。陈诚在行政系统中虽然有不少势力，但蒋却在军队、特工、党务、青年四大部门扎根结果。到了1961年左右，小蒋的势力已经超过了陈诚。虽然蒋介石在1957年10月23日的国民党八全会中提名陈诚担任副总裁，但这其实是宣告陈诚的提早“出局”罢了。

1959年，“行宪”第二任“总统”蒋介石任期行将届满，为了连任，蒋介石父子动员了官邸派和有关亲信，在“国会”和报纸上制造“修宪”的舆论，此举引起了陈诚系统人马和清议知识分子的不满，导致了一场大辩论。

当年反对“修宪”最卖力的，就属雷震为首的《自由中国》，在其杂志上著文反对“修宪”的，还包括以胡适为首的知识分子。

不过，这场大辩论在蒋氏父子“贿赂”“国民大会”以及雷震被宣判叛国罪而告落幕。蒋介石也在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修宪”后，被赋予无限期连任的机会。

蒋介石连任“总统”后，陈诚心灰意冷，虽然被蒋介石再次授命组阁，随即于1963年因病请辞“行政院长”。台湾“中央社”1963年12月6日发表一则陈诚声称他对蒋介石“准他辞职的德意深表感谢”的消息。他说：

“近半年来，本人健康不佳，时感疲乏，迭向总统请辞。这并非逃避责任，而是恐怕有疏职守。但屡次均蒙恳切慰留，给假休养。9月初，适逢葛乐礼风灾发生深感救灾善后责任重大，故提前销假。近两月来，健康尚未恢复，医嘱仍须休养，因又请求辞职，始蒙批准。本人感谢总统德意，实非吾语可以形容。希望在健康之后，能继续以有生之年，全力报效国家。”

陈诚为何辞去“行政院长”兼职，海外新闻界见解不同，香港的国民党报纸说他是因为“劳瘁”而坚辞；美联社的电讯则说他的下台实际上有政治原因。1964年4月22日，香港《联合评论》刊载一篇署名效微写的题为《陈诚被迫辞职的经过补述》的文章，分析比较全面，现摘要如下：

如所周知，陈诚是蒋介石最亲信的人，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可以说，也是蒋一手扶植的。可是，自蒋经国的势力逐渐扩张后，陈诚的地位就开始动摇了。尤其是三任总统非法连任以后蒋介石对陈诚也颇疑忌。

虽然陈诚被迫辞职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与蒋经国的利害冲突；但导致了蒋介石断然准许他辞职，也有若干近因的。首先是，去年有一架飞机飞往大陆投向中共，美国人曾有责难。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常会席上提出此事，参谋总长彭孟緝认为是由于军队的待遇太过菲薄所致，蒋即指示应增加军人待遇。陈诚则说，一旦增加军人待遇，则文官的待遇势必随之增加，政府实无此财力。张其昀、谷正纲亦主张增加军人待遇，陈诚很不高兴，认为他们有意和他为难，反问他们从何处筹钱，并斥责他们说话“不負責任”。蒋即拂袖而退，陈也声言将辞职不干，这一次的中央常会也就不欢而散。稍后，蒋为了要任命蒋经国的人做国防后勤部长，准备将原任部长石党调任交通部长，陈诚认为观任交通部长沈怡的政声甚佳，不宜更动，表示坚拒。蒋乃将石改派为考试院铨叙部长，但对陈如此不服从指示，深致不满。

美国总统肯尼迪安葬，蒋廷黻曾来急电询问是否将派大员前往送葬。沈昌焕得电后，立即直接向蒋介石请示，结果决定只派蒋廷黻就近代表，陈诚始终未闻其事，后来美国輿情大表不满，留美华侨更为愤怒，蒋介石也觉得过意不去。陈诚曾在行政院会议席上对沈昌焕大加指责。接着行政院酝酿局部改组，陈诚拟以张厉生为副院长，陈雪屏为教育部长，并准备将沈昌焕及司法行政部长郑彦、经济部长杨继增免职。蒋经国即欲以邓傳楷为教育部

长，并维护郑彦，蒋介石和宋美龄也维护沈昌焕，陈诚则认为沈非去不可，又在行政院会议席上，对沈大加指责，沈自恃能兼得蒋家父子主妇三人的宠信，竟亦反唇相讥，陈诚一怒而离席。行政院那次的会议几乎无法结束，还是政务委员余井塘以和事佬的姿态出来打圆场，才草草了事。

陈诚离开行政院后，余怒未息，即向蒋当面报告经过，并表示辞职不干。他也许以为可以迫使蒋同意将沈昌焕撤换，却不料蒋顺势说道“你太辛苦了，休息一下也好。”随即把此前陈诚因病请辞的一件旧呈文取出，在上面批了“准予辞职”四个字，用总统府的正式公文发回“行政院”，于是，陈诚不得不辞职了。

蒋介石迫陈诚辞职后，为了安抚后者，又嘱他推荐继任的人，陈乃推荐严家涂并建议以余井塘为“副院长”，蒋表示接受。但余井塘初不允就。陈认为如余不就，势必被蒋经国或属于他的人所夺去，乃亲往劝驾。为了防止蒋经国的人乘机渗入，其他各部会官员，陈也要求一律不动。

由于陈诚的个性倔强，平素不大买“立法委员”的账，他此次被迫辞职，许多原属 CC 系的“立法委员”都引以为快。严家涂被提名为“行政院长”后，虽得 CC 系的元老余井塘为“副院长”，但 CC 系的若干立委仍表示决不听余井塘的话，迫得严分别登门造访，他们始允支持，结果严获得的同意票，还比陈诚当年所得的为多，人们最初以为这是严谦恭为怀的收获。但事后的事实，证明实别有原因。在严阁组成不久后，“立法委员”即每人获得向“国家银行”借款 6 万元，分 10 年偿还的优惠待遇，蛛丝马迹，使人不能不怀疑这是他们投同意票的交换条件。此事本属秘密进行，不料被“国大代表”得悉，即发动签署运动，要求“总统”召开“国大”临时会议，“蒋总统”深知代表们用心所在，一面宣布即将召开临时“国大”，一面指示“行政院”，应即依照“立委”先例给予“国大代表”以长期借款。但因人数太多，每人减为 4 万元。代表们凭空得了这笔巨款后，也就不再坚持召集临时“国大”了。不过因此一来“国库”即无端损失约一亿元之巨。

陈诚被迫辞职之初，尚随时向人表示，他并没有病，他的辞职，完全是被迫的。事闻于蒋经国立向乃父报告，于是“蒋总统”又频发一道命令，说陈诚的病虽因免去“行政院长”的烦劳而日渐康复，但仍不宜操持“副总统”及“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准其离开台北，择地静养，俾得早日复元。陈诚奉此一命令后，虽然仍在台北，但只得在家闭门静养，拒见外客了。

人情冷暖

尽管陈诚与蒋经国之争喧腾已久，但陈诚病死之日，蒋经国立即表现出“沉痛哀感”，表情十分精彩，据当时台湾报纸报道，蒋经国大清早就到陈

诚住所，“没有吃中饭，也没有吃晚饭，站了一天”，直到黄昏陈诚死去，还随车送到殡仪馆。并向记者发表讲话，说是痛失“追随了近30年的导师”，说他多次晋见陈诚时陈曾紧握其手，勉励有加。言外之意，自不可提“子承父业”，即继承此政敌“导师之业”，亦有“遗言”可按。《中央日报》还煞费苦心在登载“蒋经国悼念副总统”的新闻旁边，特意刊出“俞大维闭门嚎陶大哭”的消息来烘托，以示“蒋族亲家”亦对小蒋的“对头”同表哀悼。

陈诚死后，台湾当局为了掩饰内部倾轧大办丧事。例如宣布下半旗10天，设置有10个组的庞大治丧会，所有官报报头、文字、广告均不套红，60万蒋军一律缀佩丧章等，用民众财产来寄“哀思”。

尽管是大办丧事“哀恸逾常”，台湾《联合报》仍在字里行间作了暗示。这家报纸在报道陈诚断气时屋外两景，标题是“如泣如诉一窗雨”，“泣”字自为“酬世”之文，“诉”字则颇堪玩味，道出国民党明争暗斗的内幕。

《联合报》还报道陈诚在死前一日向他的家人说：“别人要来看我，你们不必再阻止他们，让他们进来，见我一面。”这说明陈诚死到临头，还不甘心，还要看看蒋帮小朝廷内的人情冷暖。

陈诚之灵柩于8月30日安葬于台北县泰山乡荣村墓园。

1965年7月18日，周恩来总理到上海欢迎李宗仁回归大陆。在虹桥机场候机厅里，聚集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陈毅、叶剑英、陈丕显、曹获秋，陈东生等。还有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共50余人。在谈到台湾问题时，周恩来说：“……陈辞修是爱国的人，他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可惜他的身体不好……他临终时留有遗嘱，台湾当局要修改发表，他夫人反对，说要就不发表，要发表必须原文发表。看来他的主张不受台湾当局欢迎……。”

1988年4月5日，大陆《团结报》刊登了周祖羲、徐济德的署名文章《陈诚和他的遗嘱》，对如何评价陈诚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现将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陈诚，字辞修，浙江青田人。1919年，陈诚心怀救国之志，考入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班，投身军旅。后来，他仰慕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进入黄埔军校当军佐。陈诚参加了东征和北伐，屡立战功，从连长升到师长。北伐成功后，陈诚积极参加了蒋介石对李宗仁、唐生智的战争以及蒋冯阎的“中原大战”，蒋介石曾通令嘉奖他，赏奖金20万。

抗日战争爆发，陈诚受蒋介石之命，拟定长期抗战全国动员方案。他主张扩大湘沪战争，诱敌到上海，牵制华北日军沿平汉线南下武汉。蒋介石采纳了这个意见，使海陆空联合作战的日军付出伤亡10万人的代价，国民政府得时间撤退几百个工矿企业和几十所大专院校，还奠定了沿长江节节抵抗的长期抗战局面。其后，陈诚和李宗仁指挥百万大军，进行武汉保卫战，日军伤10万。1940年6月，日军攻占宜昌威胁重庆，陈诚出长第六战区，保卫

战争的陪都。1943年2月，陈诚任中国远征司令长官。5月，陈诚奉命回恩施，指挥打退自宜昌、石首、监利西犯的日军，保卫了重庆。1944年，日军集重兵40万，发动一号作战，陈诚出任第一战区司令官兼冀察战区司令，指挥北线作战。

但是，陈诚反共也是不遗余力的。在第二次国内战争围剿苏区红军，陈诚所部是主力。第三次围剿时，他任第二路军总指挥，侵入黎川、广昌、于都等大片苏区。第四次围剿，他先任北路军第三路军总指挥，后为“赣闽边区剿共”中路军总指挥。辖三个纵队，12个师，猖狂向广昌进攻。1933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办军官训练团，自任团长，陈诚为副团长，训练围剿红军的排以上军官3200多人。第五次围剿陈诚接受过去失败的教训，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建筑碉堡，步步为营。这时的红军，在左倾冒险主义的指挥下，导致了历史性的错误，被迫长征，陈诚遂得立下汗马功劳。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当上了总参谋长的陈诚，高喊“三个月内消灭共军”。他调兵遣将，并到各地督战，眼看东北大势不妙的他兼任“国民政府东北行辕主任”，接替熊式辉主持东北战争。虽然增加了5个军和坦克、炮兵、汽车部队，但还是损兵折将，丢城失地。1948年12月29日，陈诚出长台湾省军政长官，后来，陈诚出任“副总统”、“副总裁”，成为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美国乘朝鲜战争之机，要求取得台湾军队的指挥权，遭到蒋介石和陈诚的抵制，他们坚持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个部分的原则。

与陈诚在黄埔军校同为特别军佐的季方在怀念黄埔的老同学、老同事时，不无感慨他说：“他们大多还是爱祖国、要统一的，不过所走的道路不同罢了，最后也许都要‘殊途同归’。可惜辞修已经不在，我听说他不同意把反攻大陆写进遗嘱，反对同胞自相残杀。”

第六节 白崇禧暴死之谜

原军统特务的惊人披露

1966年12月1日，国民党四星上将白崇禧死在台北松山路寓所的地板上。第二天上午尸体被发现时，已周身发绿，睡衣和床单都被撕得稀烂，可见他死前十分痛苦。他的床头柜上还有半杯酒，有人说他的酒还没有喝完。这一年他74岁。

国民党当局称白崇禧是患冠状动脉梗塞症而死，而很多人对此有怀疑。20多年后，台湾军统特务重要头目谷正文在新加坡《联合晚报》上撰文，对白氏的暴死，做了惊人的披露。

蒋介石在淮海战役失利后，声望大跌，白要求蒋下野，自己带60万大军转入海南岛。蒋不愿见到台湾以外存在一个将来可能比自己强大的势力，于是派人以到台湾组阁为诱饵，诱骗白于1949年12月30日，从海口飞到台湾，从此白再也不能离开台湾一步了。

不久，又有人向蒋报告：“白意图发展客家组织，再造势力，联络地点是一客家人在台北市郑州路经营的一家渔猎用具店。”蒋立即电召保密局长毛人凤查办。毛把任务传达给谷正文，经暗访，从邻居口中得知，白常去一家渔具店，店老板叫李赖。于是谷正文派一部侦防车埋伏在李赖经常出入的街口守候。李否认店是政治活动基地。侦办结果通过毛人凤向蒋呈报，蒋指责谷正文办事不力，向毛加压：“事情岂有这样简单，况且他是一个历史罪人。”蒋正式命令毛对白采取制裁行动。

谷正文积极筹划暗杀，收买了白身边的杨副官。杨报：“白先生将去花莲县寿丰山打猎。”勘查后发现狩猎区有小型山间铁轨，可使用人力轨道台车登山。白已65岁，不会步行上山，而一上轨道车，就难逃一死。经过三次演练，终于掌握螺丝松脱法，将不留痕迹地使轨道台车“发生意外”。行动当天，白一行人通过预定谋杀的桥面后，谷等迅速爬到桥下，将支撑桥面木墩的螺丝一一松开，然后躲入不远处树丛静待白下山。午后，两辆台车从高山背面滑出，二车相距约20米。林意如父子乘前车，白与副官乘后车。“如前车坠落，后车刹住……”话声未落，前车已坠入谷底，副官见状，急踩刹车无效，在千钧一发之际，他用力将白推出车外，自己则随车跌入谷底。白从地上爬起，望着谷底的尸体，心里已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后来，谷正文调离另职，但从同事口中得知蒋仍不肯放过白。一次，同事给谷打电话：“白上中医协会理事长赖少魂处买药。”谷正文认识赖，便打电话给他。赖听后心知不可瞒骗，只好托出实情：“白将军不是病，他须补……”谷正文说：“不管是什么，你要发挥专长，蒋总统要你多多‘照顾’将军，重病得下猛药。”谷正文暗示赖在剂量上使手脚，使垂危老矣的白不胜药力，一补不起。赖连说：“明白，明白。”于是他重给白开了一帖很强

的药方，电请白立即更换。白不疑有异，依方到中药店买了两大包回家泡酒。数月后，白似乎从药酒中得力，与热恋的护士频繁往来。1966年12月1日，护士再度去白宅夜宿。第二天副官在白室外连唤数声不见动静，推开房门，发现护士早已离去，白赤身趴在床上，伸手一摸，才知已经身亡。

至此，蒋介石与白崇禧之间长达数十年的恩怨总算告一段落。

白先勇的异议

1993年12月8日下午，白崇禧之子白先勇接受了阔别已久的老朋友东方白的采访。

在那西式客厅，东方白发现：除了那套绒布沙发，一切都是中式摆设，四角是乌木桌几，上面有盆栽与瓷雕；四壁是中国字画，其中有一副左宗棠的行书对联，另有四卷岳飞的草书，抄的是诸葛亮的“前出师表”……

“白先勇，白先勇，你知不知道台南‘延平郡王祠’里的石柱上刻有你父亲的一副对联？这次回台湾，陈烨载我们游台南的时候，我无意中发现的。”东方白突然兴奋地叫了起来。

“我知道，那对联最下面的对子是‘留取汗青垂宇宙；莫将成败论英雄’。”白先勇毫不费力地顺口背出，令东方白微微感到有点失望，不过他立即就恢复过来，把话题稍稍转了一个方向，说：

“有一句话想问问你，你父亲到台湾之后，为什么一直没有受到重用？”

听了东方白的话，白先勇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意味深长他说：

“蒋介石这个人，只可共‘忧患’，不可共‘安乐’。他看我父亲有军事才能，需要他时，就命他做参谋长，用完之，就请他辞职，前后一共三次——第一次是北伐，第二次剿匪，第三抗是抗日……记得抗战胜利后，有一天，我家突然被我父亲的部将包围，好在我父亲机敏，全家才终于安全逃脱，事后据说是蒋介石指示的。”

“不知在那里看到一篇文章，提到你父亲突然暴毙，死后全身发紫，便有人猜测是蒋介石派人毒死，这可是真的？”

“我想倒未必如此。因为他在台湾一直是在野身份，手里没有军权，蒋介石大可不必谋害他，他死后全身发紫，主要原因恐怕是心脏病暴发，血管淤血的关系。”

“对了，我在陈烨家里看到一本程什么的《白崇禧传》，你知道吗？”

白先勇笑了起来，说。

“那是她来访问我时我送给她参考用的，作者是‘程思远’，他从前是我父亲的机要秘书，后来投共，所以全书都是用共产党的观点写的，只是与事实不大有出入。”

困居台北

1952年的夏天，国民党召开“七全”大会，所有年高有功的中委，均被派为中央评议员，唯白崇禧独付阙如，座中无席。于是元老们推请于右任见蒋介石求情，深望能有些补救。于右任说明来意，蒋介石截住他道：“白健生，我知道，这件事等我考虑考虑，我们改天再谈吧，”却始终没有下文。

还是这一年，由蒋经国任局长的“国家安全局”派人去查抄了白崇禧和薛岳的家，连地板都挖开搜查。白很生气，当即打电话责问蒋经国，蒋经国回答说：“健公，这并不是我的意思，你不信，打电话去问总统好了。”白又打电话给蒋介石。蒋回答说：“我知道这件事，不仅对你们俩如此，人人都应该这样来一次。”事后了解，只是对白、薛两家如此，一次，白的夫人马佩璋去香港，刚到机场，检查人员对马说：“你的皮包里如果有信件，应该交出来由我们代你寄出，不应该由你带去。”马佩璋只好从皮包中取出一封信，随手撕毁，说没有什么要事，不必交出邮寄了。

自从1949年底，白崇禧被蒋介石“劝”到台湾以后，他的处境一直十分悲凉，正如台湾报纸所说：“白氏目前的情况和张汉卿比较，也不过是五十步同百步而已”。

面对这一切，白崇禧也只好独对青灯，仰天长叹。内心阵阵酸楚的他，一遍又一遍地质问自己——怎么能忘了老朋友的劝告呢？

那是1949年6月的一天，在广州中华北路的李宗仁官邸。李宗仁、白崇禧、刘斐等国民党桂系巨头见面。过去，每逢此景他们总要寒暄一番，此次却是例外。握了握手，便开门见山地谈起来。

屋里的气氛紧张而凝重，他们三人在一起谈了一整天，又谈到深夜。

刘斐向李、白二人介绍了自己作为南京政府的和平谈判代表在北平的所见所闻，并告诉他们：现在是胜败的大势已定，无可改移了！最后刘斐劝白崇禧率领湘、桂两省军政人员和部队局部起义，这样尚可挽救多年来追随他们的部下。

白崇禧大声说：“失败就失败，算了！投降起义我不来！”

刘斐见状只得说：“好罢！士各有志，你既宁愿失败，我也不能勉强。不过我最后要向老朋友进一忠告，你们如果失败了，千万不能再到台湾去呀！”这时，李宗仁在桌上一捶，说：“哪个王八蛋还到台湾！”白崇禧默不作声。他们的谈话就在这样的沉默中结束了。

李宗仁没有忘记自己的誓言，于1949年底飞到美国。而白崇禧却“在沉默中死亡”了，他置老朋友的劝告于不顾，被蒋介石“诱”到台湾。

1949年秋，蒋介石由重庆飞到广州，立即召白崇禧至黄埔军校。他深知白崇禧最喜欢奉承，因而态度颇为诚恳，且勉励有加地对他说：“自北伐以至抗战，我们两人有两度合作。两次合作都非常完满，因而奠定了北伐成功和抗战胜利的基础。今局势困难与日俱增，深望仍本过去合作精神，团结奋

斗，深信必能完成吾党所负的历史任务。”白崇禧唯唯是诺。待他在广西战败，蒋介石派人接迎，并言将授予组阁新任，自就乖乖地飞到了台湾。白崇禧到台湾时，表面上尚受尊敬。蒋介石亲自在草山设宴欢迎，并在台北松山路为他置了一幢十分豪华的寓所，实际上周围密布特务。蒋介石只任命白为“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挂个空名，而其“组阁”及“委以重任”之说却变得无影无踪。

白崇禧除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外，还是台湾“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他到台后的主要工作内容大概就是从宗教活动，因而其在穆斯林界的声望颇高。但他的一举一动却均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一年，约旦国王胡辛到台湾初访，指名要见白崇禧。但有关方面却告之，白崇禧正在患病，不能见客。胡辛为之怅然。其实白崇禧身体非常健康。马来西亚独立时，当地的回教团体曾邀请白崇禧前往参加独立典礼，但始终未能成行。1955年8月1日，在日本东京举行世界宗教会议，大会曾向白崇禧发出请柬。但得到的回答却是白崇禧公务繁忙，谢绝出席会议。

也许为了略舒心中之闷气，白崇禧曾屡次向陈诚表示要出国一行，并要陈代为向蒋转达此意。蒋介石在阳明山与白崇禧面谈，却要他趁这个时期“做一件有意义的事”，从事《回忆革命军的战史》的撰写等等。白崇禧则以自己不是文人，平素也甚少执笔为文作理由推却了。

此情此景，白崇禧尤如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在他多半生的戎马生涯中，有两个最大的敌人，一个是能与其明火执仗的共产党，另一个就是暗中勾心斗角而总想置其于死地的蒋介石。

白崇禧的一生给终是站在蒋介石的对立面，而蒋介石对他亦是恨之入骨，俩人真象是生就的一对冤家。

1934年11月21日，白崇禧在广西桂北龙虎关视察。这次为了对付蒋介石和即将逼近的红军，白崇禧真是绞尽了脑汁。离开桂林之前，他以李宗仁的名义直接发电给蒋介石，略谓：“据迭报，匪主力由临武分经嘉禾、蓝山西窜，龙虎关、富川、贺县同时吃紧。仁部原在龙虎关以北防堵，故拟即将仁部主力，移赴恭城附近，策应富、贺、兴、灌。但兴安、灌阳以北仅能留一部，诚恐力量单薄，请转饬何总司令部，向江华、贺县推进，以期周密。”这封电报，是白崇禧所施“金蝉脱壳”计，以达到将桂系两个军的主力全部集结于龙虎关与恭城一带，严防红军、蒋军进入广西腹地的目的。该电既向蒋介石打招呼要将军南撤，又将责任推诿给湘军何键。在发此电的同时，白崇禧已令在湘江至灌阳驻防的第15军做好南撤恭城的准备。

当晚，白崇禧视察龙虎关回到平乐。为保证两个军的人马在恭城一带驻防，白崇禧在联防会议上宣布：“龙虎关到平乐一带，民食一律供给军用，由县府发给粮票，以后给钱。如有藏匿不缴者，以有意留给共产党论罪。”当晚，他接到了第7军的侦察报告，“红军已经进攻道县。”他感到红军过境已经势在必行。在面临要和红军决战的重要关头，本着事前的既定方针，

白崇禧认为：给朱毛红军让路时机已到。他在当晚深夜，下达了转移大军于龙虎关的命令：在全州、兴安、灌阳布防的第15军撤往恭城，仅在全州留第72军团的两个营干训队；兴安留一个团，灌阳留一个团，灌阳全县完全开放，第7军集结恭城机动使用。

如果说蒋介石在政治上老谋深算的话，这一回军事上却算不过白崇禧。蒋介石接到李宗仁20日的电报后，不知是计，遂复电同意。桂军按白崇禧变更的部署，撤离了湘江防线。红军向西长驱直进，攻克道县，其前锋抵达湘桂边境的永安关时，从全州至兴安60公里的湘江，已无兵防守，湘江防线，完全向红军敞开了！

桂军从湘江南撤的第二天，湘军刘建绪部得知湘江无兵防守，立即报告何键。何键极为恼火，即令刘建绪部四个师立即南下全州，令各路追击部队加紧追击，企图拖住红军，以便刘建绪部赶到全州，抢占湘江沿线渡口，仍想实现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东岸的计划。

蒋介石从何键“追剿总部”的报告中，才得知湘江无兵防守的情报，对桂系的做法大为震怒，于是严斥桂军放弃职责，严令桂、湘两军按原定计划，对红军已过河的先头部队夹击，对未过河的部队堵击，仍然妄图将红军主力歼灭于湘水之东。

坐镇在桂林指挥的白崇禧，对于蒋介石驰电严斥，并不在意，仍按桂系的既定方针：“打尾不打头”。白崇禧没有执行蒋介石的训令，让主力前出兴安，沿江北上，夺回渡口，与刘建绪部衔接成堵截线；他只以一个师驰援兴安，以防红军南下，而令已从恭城返回灌阳的15军，全力向红军后续部队发起攻击。15军在夏威指挥下，从湘、桂边界的灌阳新圩地区发起攻击，既不会冒红军回头打击的风险，又可以向蒋介石交差，更重要的是可以防止追在红军后面的蒋军周浑元部入桂。夏威的部队，除了俘获红军的一些掉队的伤病员及群众，还将追入广西境内的蒋军万耀煌师和周浑元师的各一个连加以缴械。他们将红军的伤病号，解送蒋介石处报功，而周、万两师的被缴械者，则一经说明不再进入广西境内的，就退还武器，送出边界。

红军突破了湘江的封锁线，终于跳出了蒋介石的重围。

在南昌行营的一栋楼房内，蒋介石心神焦虑，他几乎将全副精力都投到这场已经打响的湘江战役里了。他期望着这几天能“吃掉”西进的红军，下个月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就可以开成一个震惊中外的庆功祝捷大会，然后，他再回头收拾两广头目。他还对宋美龄说，12月1日是他们结婚七周年纪念，要是在这一天能够得到“全歼匪部于湘水之东”的捷报，那将是部将们送给他们结婚纪念日的最好礼物。但他从得到的战报分析，红军主力似乎已经渡过了湘江。姓白的这个狡猾的东西可憎的广西佬，没有堵截红军，给红军以迎头痛击，反而来电虚报战果，称“俘敌七千”。他和陈诚都判断顶多三千，估计大都是红军掉队的伤病员与那些扛辎重的民夫。事后他得到的情报表明，李、白、黄拍了一部纪录片《七千俘虏》，到处放映，到

处吹嘘，而镜头中好些“被俘红军”是让广西民团扮演的。他既不敢责备，又不愿嘉奖。薛岳等曾向他表示对桂系的不满，他只好发电责问：“共匪势蹇力竭，行将就歼，贵部违令开放通黔川要道，无异纵虎归山；数年努力，功败垂成。设竟因此而死灰复燃，永为党国祸害，甚至遗毒子孙；千秋万世，公论这谓何？中正之外，其谁信兄等与匪无私交耶？”

第二天，接白崇禧复电驳斥说：“职部仅兵力十八九个团，而指定担任之防线达千余公里，实已超过职等负荷能力。孙子曰：‘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备前则后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竭十八九个团全力，不足当彭匪德怀狼奔象突之势也。钧座手握百万之众，保持重点于新宁、永安，不趁其疲敝未及喘息之际，一举而围歼于宁远、道县之间，反迟迟不前，抑又何意？得毋以桂为壑耶？虽然职部龙虎、永安一战，俘获七千余人，比较钧座竭全国赋税资源，带甲百万，旷时数年，又曾歼敌几许？但此不是与中央社同争短长也。据中央社露布，某日歼匪数千，某次捕匪盈万，试加统计：朱毛应无子遗，何以通过湘桂边境尚不下20万众，岂朱毛谪妖术，所谓撒豆成兵乎？职实惶惑难解。”

白崇禧的电报言辞之间，讥讽挖苦，刻薄尖酸，气得蒋介石在办公室里大发脾气，脑门上粗筋鼓突，连上海滩骂人的脏话也冲出来。

1935年1月，进入贵州省的红军主力击破黔军，强渡乌江，占领遵义，蒋介石在贵阳已陷入危境，坐卧不宁，十分恐慌。据当时担任贵阳警备司令的王天锡回忆，他动员了400个消防队员、宪兵和警察去城墙边赶修工事。蒋介石和宋美龄去看了，觉得不顶用。蒋介石急忙嘱咐王天锡准备飞机，这时又得到报告，机场附近发现红军便衣队。蒋介石急得来回徘徊，只好吩咐王天锡：“你给我找20名可靠的向导，弄些壮实的高头大马和两顶好轿子，越快越好。”蒋介石和宋美龄准备随时逃走。蒋介石觉得廖磊的第7军在独山、都匀离贵阳不远，又急电廖磊星夜兼程前进“救驾”。廖磊复电称：“容请示白副总司令允许，才能前进。”蒋介石又气又恨，骂道：“这简直是外国的军队了！”

幸得云南的龙云所部前来“救驾”，否则蒋介石性命危矣！

1935年，广西曾成立过一个反蒋的秘密组织，叫“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李宗仁担任会长，白崇禧亲任副会长。

为了反蒋、逼蒋下台，白崇禧从不放弃任何机会，1948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淮海战役，国民党军节节惨败，黄伯韬兵团在碾庄被歼，黄举枪自杀；黄维兵团也在双堆集被围。蒋介石急电“华中剿总”白崇禧部调兵驰援。白崇禧则对调兵援徐竭力反对，他认为逼蒋下台时机已到！

在此之前的10月30日晚，白崇禧曾到李宗仁官邸与其密谈。李宗仁对他说：“健生，司徒雷登大使已经告诉我了，他已向马歇尔国务卿提出了要老蒋下台的建议，由我们跟共产党重开谈判。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可不能把自己的部队投向徐州战场为他（指老蒋）卖命呀！”

白崇禧听了真是喜出望外。现在，面对蒋介石的急电，他颇感得意。勉强让第20军东调以后，就再也不让第2军等部队调走了。国防部的电报、参谋总长顾祝同的电话，都被白崇禧硬邦邦的顶了回去。这可急坏了蒋介石，便亲自从南京打电话到汉口，找白崇禧讲话。开头双方的态度还好，以礼相称，“总统”“健生兄”称得颇热。说来说去，双方态度急剧变坏，声调越来越高，互不相让。蒋说：“我是总统，调2军是军令，你是军人，应该懂得服从命令。”白崇禧此时毫不示弱，说：“合理的命令我服从，不合理的命令我不能接受。如你认为我不听命令，你撤我的职好了。”双方交锋了几十个回合，一个电话打了半个多钟头。蒋介石气得把电话都甩了。白崇禧放下电话后也一不做二不休，下了紧急命令不准集结在沙市的第2军东调，还命令到了汉口的第9师开回沙市去。

当时的蒋介石真是内外交困，平津、淮海战场上，惨败的局面不可收拾，又干预美国大选，支持纽约州长杜威竞选总统，与杜鲁门唱对台戏。11月间大选揭晓，还是在任总统杜鲁门当选。蒋介石派夫人宋美龄飞去美国请求援助，遭到杜鲁门拒绝。此时，蒋介石除了下野之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12月17日，蒋介石正式派张群、张治中、吴忠信三人到傅厚岗副总统官邸拜访李宗仁，告以蒋介石有意下野，由李出来主持和谈。李宗仁让程思远把这消息打电话到汉口通知白崇禧。白崇禧高兴的不得了。

岂不知中国有句古话，叫作“谁笑在最后谁最美”，白崇禧笑得的确早了点。他似乎忘记了蒋介石是自己的生死对头，是个城府极深的阴谋家，竟被几句一文不值的许诺冲昏了头，以致误入歧途。如今他在台湾仰老蒋之鼻息，无异于笼中鸟、网中鱼，任其摆布，过着幽禁般的生活，每当忆及往事，不知该作何感想？而李宗仁的“皇帝梦”却也很快地惊醒了。

良禽择木而栖？

李宗仁到美国之后，于1955年提出了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几点建议，在海内外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应，但却遭到了台湾当局激烈反对，他们严厉地谴责李宗仁是“为席卷大陆的共匪张目”、“年岁高而糊涂了”。

白崇禧到台湾后有着多重“身分”，其中之一便是充当蒋介石的“打手”，而被“打”的对象则是李宗仁，李宗仁一有风吹草动，白崇禧便会奉命出来讲话，或是发电报写信，对李发出一番责难。

1955年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了举世瞩目的亚非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作为代表在会议上作了精彩发言，并为中国人赢得了声誉。李宗仁看了甚为兴奋，他认为周恩来的声明为解决台湾问题指出了正确途径，因而他很快就提出了《对台湾问题的建议》，主要内容如下：

今后解决台湾问题之道，在我看来，可有甲、乙两案可循。

甲案：恢复国共和谈，中国人解决中国事，可能得一和平折衷方案。

乙案，美国承认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但目前暂划为自治区，双方宣布不设防，美国撤退第七舰队，使成为纯粹的中国内政问题，如此战争危机可免。时日推移，大陆和台湾内部彼此敌视的态度减轻，则真正解决便可实现了。

蒋先生已年逾七十高年，生年饱经忧患，如果他能毫无个人成见地以苍生为念，毋使内战重起于中国，他会同意我的意见的。

我以过去亲身的经验，观察今日之变局，自信颇为冷静而客观，个人恩怨，早已置之度外。惟愿中国日臻富强，世界永保和平，也就别无所求了。

这无异于一枚重型炮弹在海峡两岸炸响，而最直接的“受害”者却是白崇禧，在发表了一番攻击之词后，蒋对他的管束亦更加严厉。白崇禧的攻击虽言不由衷，但“身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

由于白崇禧和李宗仁的特殊关系，使蒋介石对白崇禧始终存有戒备之心。白崇禧是广西桂林人，与李宗仁是同乡。在统一广西与建设广西期间，人们皆以李、白、黄（黄绍竑）并称。1923年，白崇禧任广西全权代表，前往广州土敏土工厂晋见孙中山大元帅，请求广西加入广东革命阵营。孙中山对此举极表欢迎，甚是欣喜。即秘密委任黄绍竑为广西讨贼第一军总指挥。白崇禧为总参谋长，潜回梧州缴沈鸿英之械，然后进兵桂平至南宁。当时李宗仁任陆荣廷部下之旅长，驻守琼州。当陆、沈争夺桂林时，讨贼军乘机发难攻取南宁。白崇禧联络李宗仁共襄盛举。最初李宗仁未表赞成，但经白崇禧剖析时局，晓以利害，李终应允参加。但李宗仁不用讨贼军名义，改称为“定桂军”。攻占南宁后，改组成立了讨贼联军，公推李宗仁为联军总司令，黄绍竑为副总司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兼参谋长。人事安排就绪，遂开始统一事业。因有此故，白崇禧与李宗仁之关系显得特别密切。其后多年中，他们经常是“联袂”而出，密切配合，这一点亦为众人所知。蒋介石自然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蒋介石不会忘记，在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而欲与其一试高低的较量中，白崇禧是立了汗马功劳的。

1948年5月，国民党当局在南京召开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实施宪政，选举总统、副总统。按一般政党的政治惯例，总统由政党内部推出参加竞选并由竞选总统提出副总统候选人，以收辅助之功。

4月，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蒋介石竞选第一届行宪总统，竟获一致通过。当时竞选副总统的提名者有四人：孙科、于右任、程潜、李宗仁。按惯例，副总统之提名应由总统提出，交全会票选，倘超过半数即为副总统候选人。但当时参加提名竞选诸人竞争激烈，不得已改为自由竞赛选，各派间即展开了实力较量。

1947年冬季，李宗仁担任北平行辕主任，指挥冀、察、热等省军事，并负责支援东北军事，任务十分重大。当时李宗仁曾打电报给白崇禧，表示将

出面竞选副总统，并要白崇禧将此转告蒋介石，以探其口气。听白崇禧转告后，蒋介石当面训示了两点，“一、北平行营剿共任务重要，不可脱离；二、我为军人，李某亦为军人，两位军人参加竞选不妥。”蒋要白崇禧据此转告。白崇禧照此电复李宗仁，要其中止竞选之念，不可南来。此电一去，即来再接李宗仁复电。

一日，李宗仁忽至南京，并前往看望白崇禧，他说：“北平有许多事情办不通，此行除述职外，并将晋见委座，说明竞选之决心。若竞选成功，即不回北平，若竞选失败，亦不返北平。”说毕，即动身前往见蒋。待回来时，他说：“委员长之意仍希望我回北平。”

参加竞选副总统的四位要员中，孙科的呼声较高，因他是孙中山之子，深获国民党政府及广东各界人士之支持；于右任为国民党元老，为西北人士所支持；程潜任武汉行营主任，为两湖所支持；高下难分。许多人认为孙科定可当选，但天下事却出人意料者多，李宗仁竟脱颖而出，登上了副总统的宝座。

大选之前，李宗仁、黄绍、李品仙诸人暨广西国大代表、立监委等一致要白崇禧助李宗仁竞选。开始白崇禧并未答应为李助选，但他又以为这事于公于私实情面难却，终于答应。当时白崇禧任国防部长，更加其在国民党中之广泛影响，乃助选之最有利条件。北伐期间，白崇禧所经省份较多，认识结交之人亦不少，再加上在中央服务多年，与各方面往来频繁，交往甚广。同时，他信奉伊斯兰教，西北陕、甘、宁、青、新等省信徒甚多，尤以宁、青，新三省为基本选票所在。他是广西人，广西自成基本票。且于安徽抗战八年，亦有基本票。在白崇禧的运作之下，再加上东北、华北、西南、东南等为数不少的同情票，使李宗仁一跃而占压倒多数之优势，成为副总统。当时南京各报大作渲染，称李宗仁当选，白崇禧立功最大。而白崇禧未曾料到，他从此在政治纠纷的漩涡中却越陷越深。

当竞选之时，为争取选票，李宗仁与孙科双方不免动以情感，致两方关系受到影响。李宗仁的出现，使国民党中央政府出现了许多隔阂，凡此种种，实为白崇禧始料不及。

最令白崇禧担忧的是，他与蒋介石共事多年，深知蒋的为人，老蒋岂肯放过他？一位从南京赶来祝贺李宗仁当选副总统的官员告诉白崇禧说：

那天最后投票时，蒋在官邸内静听电台报告投票情况，当播音员播出李的票数已经过半依法当选时，蒋盛怒之下，一脚踢翻收音机，脸白如纸，拿起手杖和披风，立刻命令侍从备车。上车之后，侍从忙问：“委员长，开到哪里去？”蒋一言不发。司机因为蒋烦闷时总喜欢到陵园去，仍向中山陵开去。刚刚驶进陵园道上，蒋忽高叫：“掉转头，掉转头！”司机乃开回官邸。蒋才下车，又上车，再吩咐开出去，随从侍卫见蒋如发疯一般，恐怕他自杀，乃加派车辆随行。蒋的车刚进陵园，他又吩咐掉转车头。转回之后，又令司机开向汤山去，急惶惶有如丧家之犬。

白崇禧听了，更为忧虑。果然没出他之所料，多天后，5月20日，总统与副总统宣誓就职。这是国民政府成立后第一任正副总统的就职典礼，南京城里张灯结彩，十分隆重。与会的文武百官及各国驻华使节均穿鲜明整齐的礼服。白崇禧发觉蒋介石穿着长袍马褂，旁若无人地站在台上，而李宗仁一身军便服，仁立其后。在当时的气氛中看去，李宗仁不象参加宣誓的副总统，倒象随侍总统的马弁。会后问起，才知李宗仁本来就找上海有名的西服店赶制了一套高冠硬领的燕尾服，谁知就职前夕，侍从室传出蒋介石的手谕说，穿军便服。白崇禧听后顿生一股寒意，这是蒋介石开始报复的讯号，往后还有更好受的呐。

果然，5天以后，5月25日，蒋介石请白崇禧到黄埔路官邸谈话。蒋介石知道白崇禧喜欢戴高帽，就和颜悦色地给他讲了一番恭维话，还说华中地区的战略地位如何如何重要，对今后局势举足轻重；又称赞他去年主持九江指挥所如何用兵得当，将中共刘伯承、邓小平的部队“逐出”大别山，立了战功。然后，进入实质问题，蒋说，“健身兄，你是我国有数的军事家，我想请你出任华中剿匪总司令部的总司令，驻节武汉，指挥华中军事，你看如何？”

又过了5天，6月1日，蒋介石在白崇禧并未表态的情况下突然任命何应钦为国防部长，顾祝同为参谋总长，而任命白崇禧为华中剿匪总司令部的总司令。白崇禧感到，蒋介石报复的利刃已经向他刺来。他气急败坏，坐卧不宁。夫人马佩璋也忿忿有气地说：“我本来就劝你不要帮助德公竞选，你硬是不听。这次自找苦吃，人家当了副总统，要你交出国防部长的乌纱帽作价。”

本来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让他出任国防部长就没有给他实权，而让陈诚担任参谋总长，兵权在参谋总长手里，国防部只是个办事机关。白崇禧对蒋介石不重用自己，虽有怨气，却说不出口，只好出任这个空头国防部长。这次为了协助李宗仁竞选，连这个空头职务也丢了。当时，他正好在上海虹口刚买了一幢敌伪高级官员住的房子，一气之下，便与马佩璋跑到上海去住下，以示不能从命。

其实，蒋介石对白崇禧之怨恨并非始于“人之初”，他们二人曾经有过一次难得的“合璧”机缘，遗憾的是，这“机缘”稍纵即逝了。

1926年，北伐战争时期，李宗仁约同李济深，推举蒋介石为总司令，并由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蒋介石被任为总司令后，一日他就军队参谋长的人选问题征求李宗仁的意见。李宗仁说：“钮惕生先生应当最适当了，按资历，钮老是革命元勋，总理的老友。论才干，钮老在护国、护法各役中都任要职，以干练闻名。他在各界人士中德高望重，北伐军参谋长一职，非他莫属。”

蒋介石闻言后告诉李宗仁，钮惕生先生另有借重。李宗仁又问：“你心目中何人最合适呢？”

蒋介石道：“我看白崇禧比较适宜。”

李却认为白崇禧资历太浅，年纪太轻，恐不能担此重任。而蒋介石却十分坚决地表示：“我看还是他好，还是他好！”

后来蒋介石正式邀请白崇禧担任参谋长之职。白崇禧即前往征求李宗仁的意见。李宗仁说：“我怕你干不了。”见李宗仁未表支持，白崇禧亦不能自决，遂对蒋介石的邀请婉谢不就。

谁也说不清，究竟是李宗仁不愿意放白崇禧，还是白崇禧出于情之故不愿意离开李宗仁。如果白崇禧对蒋介石的邀请一诺无辞，那么，日后他很可能成为蒋介石最得力、最信任的助手和军师。

难道白崇禧不知道“良禽择木而栖？”当时的蒋介石表面上继承了孙中山的衣钵，已成为实际上的领袖人物，前途未可限量。难道白崇禧宁愿屈居于李宗仁甚至黄绍竑之下？抑或这就是白崇禧之人生哲学——“士为知己者死？”

不管结果如何，这件事却在蒋介石的心中投下了抹不去的阴影。最起码他已明白，他不会拥有这位心腹了。但蒋介石当初无论如何也不曾料到，这位没能成为他心腹的“干将”却成了他的劲敌。

1949年，白崇禧与李宗仁趁蒋介石内外交困之际逼其下野。而作为立杆见影的“回报”，1950年蒋介石以肃清间谍为由实行大批逮捕，在被捕的200名主犯及4000名从犯中，广西籍的军人和官吏最多。而白崇禧因和李宗仁解不开的渊源所得到的“回报”则伴随着他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虎”威犹存

白崇禧虽困居台北，但这位有“小诸葛”美誉、能征善战而又机敏过人的国民党干将，还经常成为新闻焦点，每当国民党当局有重大的人事安排时，都使很多人想到了他。俞鸿钧出任“行政院长”组阁时，“国防部长”的三位人选，是俞大维、薛岳和白崇禧；在确立驻沙特阿拉伯大使的人选时，香港及台北的舆论，都认为白崇禧最为恰当；及至俞内阁改组，一些人仍把白崇禧列进内阁范围。有关人士评论说，在桂系的主力人物中，白崇禧与李宗仁、黄旭初三人比较起来，无论在哪方面，白崇禧的确能干得多。过去人们提起桂系将领来，总是爱将他们三人比成“龙、虎、狗”。李宗仁是“龙”，因为他始终是桂系的首脑人物；黄旭初是“狗”，因为他经常是留在“家中”坐镇；而白崇禧则被人们公认为是“虎”。在许多事情中，白崇禧总是充当冲锋陷阵的角色，因为他的眼光和手段以及其为人处事等等均使桂系名人心悦诚服。

当孙中山在广州担任临时大总统时，白崇禧曾与蒋介石、何应钦和李宗仁并被称为“黄埔四杰”，为国民政府立下汗马功劳。

北伐战争开始时，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任委员长，白崇禧则

在经过一番曲折后，被蒋介石从李宗仁处借至军事委员会任军委参谋长。虽身为参谋长，但白崇禧却常常被遣往前线，或冒着炮火硝烟视察战事，或被委任为临时战区指挥官，甚至代替蒋介石行使指挥权，颇受重用。这使“小诸葛”的指挥才能得以充分发挥。

在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与孙传芳的一次战役中，军事委员会决定由何应钦任东路军总指挥，命其由广东之东江、潮梅，经福建至浙江，从而消灭浙江的孙传芳部队。何应钦率第10军之第3师、14师以及福建张贞之部进攻福建周荫人部，由潮梅转战松口大埔，一时不能至浙江，使进入浙江的东路军刘峙等部被孟昭月指挥的孙传芳驻浙江部队击败。

蒋介石接此情报，非常焦急，考虑再三，即将白崇禧召至跟前说：“何将军在福建对周荫人部，以判断作战情况非半月后不能调入浙江，东路军在浙江已遭受失败，势不能久等，浙江战事不利，不仅江西大本营根据地受影响，且使江右军也受威胁。东路军非兵力不足，乃系指挥官指挥不当，你我两人应前去一人。”

白崇禧深知蒋介石之用意，立即回答道：“总司令是全军之统帅，岂可往局部指挥，如总司令不以我才能浅薄，我愿前往东路服务。”

蒋介石闻言异常高兴，命白崇禧3日之内成立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并任其为总指挥，调总部参谋处长张定矫为参谋长，总部机要秘书潘宜之为政治部主任。因东路军已有总指挥，故新成立的指挥部只得以总指挥部下之前敌指挥部名义行使名指挥权。为此，蒋介石征求白崇禧的意见。白崇禧道：“为了革命，任何名义我在所不计”。蒋介石深以为是。

蒋介石亲自公布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即开赴前线。临行时，朱培德、唐生智、邓演达等主要将领聚集一起在南昌为白崇禧饯行。白崇禧向来不饮酒，一则为信奉伊斯兰教之故，二则因其8岁那年，在私塾读书时，因孔子圣诞，同学们饮酒庆祝，欢庆之间白崇禧喝得酩酊大醉，一夜毫无知觉。事后，母亲对他严厉告诫，从此他再不言酒。此次南昌饯行，众将官热烈招待，盛情难却，更因大丈夫将赴沙场，“壮怀激烈”，他首次破戒，开怀畅饮，竟将一瓶白兰地喝得干干净净，令在座众人大大为惊奇。

不日，白崇禧接到消息，言其夫人马佩璋将由武汉动身前来南昌。然前线情势紧急，他不敢久等，即于第四日开赴前线。待夫人抵南昌时，他已在途中。为消减敌方锐气，白崇禧故意虚张声势，未至浙江常山时，他沿途不断拍电报至常山，下令常山县政府封两万人的船以备军用，并暗示大军不日将到达。待他到达常山时，县长亲自出外封船未归，县府秘书千秋鉴出迎并殷勤招待。千秋鉴凑到白崇禧面前颇为神秘地对他说：“您此行一定打胜仗！”

白崇禧问：“何以见得？”

千秋鉴答道：“前夜扶乩得诗一首云：‘百万雄兵胸中罗，大东来喜气多，天意也知归党国，皇图一片白山河’”。

千秋鉴认为这是得了神谕，一定能打胜仗，并告诉白崇禧，浙江最近风

传，说是杭州西湖镇压白蛇精之雷峰塔倒了，白蛇出现了，这是祥兆云云。

闻此言，白崇禧不禁心中一动：时值隆冬季节，连日大雪，大地一片银装素裹，“白山河”可作此解，但我姓白，亦可以指我。白崇禧并不迷信，但他却巧借谣传，将此事在军中大肆宣扬，以此鼓舞士气。

在常山休息一晚，第二日攻衢州，白崇禧立即召集团级以上干部训话，勉励他们努力作战，待21师到来，他将21师及原先退下的部队由江的左岸调至右岸，故意在白天行军，让孟昭月的谍报人员知道，以为其重点在右岸。孟昭月的队伍果然向右岸移动。行至兰溪，白崇禧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夜将右岸队伍秘密调回左岸，右岸仅留少许部队，并命令他们若敌人来攻，务必死守，以牵制敌军。其余大军即向桐庐、浪石铺敌前渡河，用强行军的速度连夜经凤山庙进入新登。待孟昭月得知白崇禧重点转移，为时已晚，其总部在新登连夜撤至杭州。白崇禧在新登俘虏孟的一位副官，令其持自己的名片前往见孟。孟昭月知杭州断难再守，遂撤至上海。仅此一战，杭州即被白崇禧占领。

当白崇禧攻衢州时，何应钦曾电令其退守仙霞岭之常山、江山，待何部解决周荫人后，再会师进攻，以免被敌人各个击破。白崇禧接电后犹豫不定，因为南方部队宜攻不宜守。攻则气盛，守则气馁。他立即请示蒋介石，蒋电告：“衢州为战略要点，战守由兄自决，中不遥制。”白崇禧仔细分析战况，经慎重考虑后，决定不退不守，采取攻势。结果杭州顺利克复。占领杭州半月余，何应钦才由福建赶至杭州。从此，“小诸葛”的雅号便广为流传。

白崇禧14岁考入由蔡锷任总办的陆军小学校。16岁考入广西初级师范。后人武昌陆军预备学校，学习3年。毕业半年后即往保定军官学校学习，2年后毕业。在学校受业期间，亦因成绩优秀，聪颖仁德颇受同学爱戴和师长喜爱。当17岁时，辛亥革命爆发，他与许多进步的军校同学一道加入了广西北伐学生敢死队。家中长辈闻讯纷纷反对，但他深晓民族革命大义，毅然随队北伐。家中即派人至桂林北门城口把守，欲强迫其回家。此事为白崇禧所知，他便私将武器袋具交与同学，自己穿便衣由西门出城，绕至北门外与队伍会合。学生时代的略施小计，由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军旅生涯占去了白崇禧的大半生，其所兼之职亦多与“参谋”一称有关，这大概也是“小诸葛”雅号由来的原因之一。

保定陆军学校毕业后，他即回广西从军。对于广西及两广的统一事业，白崇禧的功劳可谓首屈一指。广西统一时，众推李宗仁为定桂讨贼军总指挥，黄绍竑为副总指挥，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兼参谋长。李宗仁当时曾表示如白崇禧不做参谋长，他也不做总指挥。此推举得到了孙中山大元帅府的承认。人事安排既定，李宗仁的部下俞作柏曾怂恿黄绍竑以武力解决李宗仁部队，从而取而代之。白崇禧极力反对，并说：“若以占领南宁即起内江，我不欲见失败之日，愿先卸职他去”，幸得白崇禧晓以利害，而黄绍竑也深明大义，不为小人所间，否则广西统一事业将毁于一旦。

两广统一后，广西加入国民革命军，国民政府任李宗仁为国民革命军第7军军长，黄绍 为党代表，白崇禧为参谋长。两广统一为北伐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北伐战争是中国革命史上重要而辉煌的一页。这也是白崇禧一生中参加的主要战争之一。在北伐战争中，他第一次与蒋介石合作，并参与了战争的始末，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龙潭战役是北伐战争中的关键一仗。当时的形势是，战役只能胜利，不能失败。只有北伐军胜利了，国民政府才可迁都南京，稳定国内政治局面，使一些徘徊观望者，如阎锡山等加入行列。否则，不但江、浙、闽、赣、皖五省重归孙传芳之手，其它军阀势力势必再度膨胀，则全国之军阀割据局面必将继续。故龙潭战役对北伐战争的成败事关重大。

为此，北伐军成立了三路大军。第一路军总指挥是何应钦，第二路军总指挥是蒋介石但由白崇禧代理，第三路军总指挥是李宗仁。战役即将开始时，蒋介石偏偏提出辞去总司令职务，回到了老家浙江奉化。其后，军事上的调遣由军委会即是由三路大军的总指挥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3人组成，一切命令由他们部署发布。蒋介石下野后，除了指挥权要重新归属外，军饷便成了最重大问题。广东路途遥远，短间接济不上，财政部只得向上海银行界借大洋一百万。当时上海的银行以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两家最大，但是这两家银行均不愿将钱借出。他们的位置又在租界内，财政部对其无可奈何。然粮草未动，大军岂可先行？何、白、李三人就此进行了紧急磋商。何、李二人一致推举白崇禧到上海代财政部与银行界交涉。他们之所以要白崇禧去，是因白崇禧曾当过上海警备区司令。过去凡上海警备司令，只要不认真查禁烟、赌，就会有好商按月送去相当贿赂分给驻沪的陆海军。但白崇禧负责上海警备时，不许陆军接受贿赂，不许军队坐霸王船，不许部队利用商船携带私货。故此上海商界人士对他很是感激。当白崇禧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时，在衢州军饷一时不能拨到之际，他与衢州商会商量，用其官章发行50万大洋票。后来他接到军饷，立即不折不扣地将军票赎回。这使他在上海商界赢得了较好的声誉。此次他去上海，正值上海人心惶惶，民众对战局心中无数，多数人家准备了五色旗以欢迎孙传芳。但念及旧情，经白崇禧再三交涉，上海银行团居然借给他60万元，真可谓雪中送炭。

龙潭一战打得十分艰苦、惨烈，双方死伤均很重，尸横遍野。据说半年之内，火车经过龙潭，尸臭仍然逼人。北伐军大获全胜，其实说来没什么了不起的战略战术，全是打硬仗。几位指挥官以后每谈及龙潭之战，皆认为完全是精诚团结、共同作战之结果。而孙传芳之失败，一不为指挥有误，二不为战斗力不强，其原因除何、白、李三人协同作战的默契配合外，重要的在于孙传芳部渡江后，渡口被抄袭，后援中继，加以海军反孙态度明朗，孙部之补给可说完全断绝。在势均力敌的硬仗中，有无补给自然成为决定胜负之重要因素。

战斗结束后，行政院长谭祖庵在南京设宴慰劳作战将领，席间亲笔写了一副对联送给白崇禧，对联是“指挥能事回天地，学语小儿知姓名”，对白崇禧大加赞赏。

“西安事变”，蒋介石迫于各界压力，决心抗日。8月2日即召白崇禧至南京共商大计。其时，白崇禧于广西主政，他与李宗仁、黄绍 等人商量此事时，众人皆反对其进京。而他则认为“抗日是两广索来主张，也是国民一致之要求，于今，抗日时机成熟，正是吾人报效国家之时，如自己不到南京，不但辜负蒋之情意，则往昔揭示抗日口号乃成自欺欺人，必将为国民所唾弃。”他抱定“军人守土有责”之意，毅然北上。由此，他与蒋介石开始了第二次合作。

蒋介石亲派由法籍驾驶员驾驶的飞机抵桂林，接白崇禧至南京。白崇禧抵京第二日，日本报纸报道其入京消息，并冠以大标题为：“战神到了南京，中日战争终不可避免”！蒋介石即宣布白崇禧为副参谋总长。

抗战期间，白崇禧虽为副参谋总长，但在实际作战时，他却时常象救火队般地行使着万能作战指挥者的功能。

台湾朝野人士之所以希望“小诸葛”能东山再起，并不仅仅因其战绩，白崇禧在为政方面也是颇为出色的，中国已故总理周恩来曾对白有过一段颇含趣味的评价。

1938年武汉会战结束，白崇禧送蒋介石离开武汉机场后，自己也准备撤离此地，并到鄂北钟祥和李宗仁会晤。当时他乘的是德国造的吉普车。车至十里铺附近，机件突然发生故障，不能继续前行。他不得已下车等待司机修理。一会儿，周恩来乘车由后赶到。他一见白崇禧，立即下车当面告诉他：“敌人骑兵先头部队已离我等所在地不远！”讲明情况后，坚决邀请白崇禧与他同车共行至长沙。情况十分紧急，白崇禧考虑再三，见周恩来十分诚恳，而汽车何时修好毫无把握，便上车与周恩来同行。沿途时间漫长，周恩来与白崇禧相谈颇多，十分融洽。周恩来从自己早年在南开念书，到法国留学经过，谈到国共合作，抗日战争等等诸多内容。他的丰富知识，及健硕谈吐，颇得白崇禧好感。当时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部长为陈诚）。白崇禧就共产党的一些问题笑对周恩来道：“你们共产党未到我们广西，我很感激！”周恩来回答说：“你们广西的做法，象民众组织，苦干穷于之精神，都是我们同意的，所以我们用不着去”。这一段对话意味深长，内涵丰富。但周恩来对广西的政绩持肯定无疑是无疑的。

虽然他的政绩不凡且仍有许多人希望白崇禧能重现往日雄风，但人们竟不知，白崇禧从政的呼声愈高，则实现的希望就愈渺茫。他的“回教协会理事长”一职，就是在这种呼声中，在有关方面的竭力围攻下，于1958年2月23日被“罢免”了。

国民党当局对白崇禧所领导的“回教协会”一直采取分化战略，计出多端。白崇禧出于无奈，多次提出“辞呈”，要求辞掉理事长一职。但均为正

直的协会理事们所不准。为了白崇禧的辞职事件，每半月一次的“回教协会”常务理事会，因多数常务理事不理上方的手段及压力，常以请假表示抗议。但白崇禧最终并未逃脱厄运。在第89次常务理事会议中，辞职书被通过了。据一位常务理事透露说，参加会议的理事，除了极个别的以外，大家都很难过，有几位的眼眶都红了。一位女理事不停地用手帕擦眼睛。

白崇禧虽已辞职了，但其信仰难改。1961年，国民党“监察委员”唐玉书在“监察院”总检讨会上说：“我是回教徒，知道回教协会的情形，理事长白崇禧因内在外在的原因，一再请辞。他辞职之后，仍从旁替宗教出力，如新生南路的清真寺，如果不是他幕后支持，到今天也建不起来”。

在白崇禧身无一职的落难之时，仍有许多人为他打抱不平，这在凄凉的残年岁月中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巧得“善缘”

1955到1965年间，人们常常能在瑞芳一带的高山峻岭中，发现白崇禧在持枪追逐野兽。打猎是他晚年生活中最喜欢做的事，与他相伴的，是台湾早期煤业界巨子李建兴、李建和两兄弟。当年白崇禧奉命到台湾“宣慰”，镇压“二·二八事件”时，与李氏兄弟及其母亲相识。李母姓白，自崇禧认其作了“干妈”，从此李、白两家攀上了亲戚，彼此往来，俨如世交。李建兴特意为白崇禧开辟了一幢休闲别墅，经常来此打猎聚首，消磨时光。

到台湾后，虽然蒋介石将白崇禧视为阶下之囚，但国民党朝野上下，包括一些元老人士仍能善待其人。多年之中，白崇禧在政界、军界及至一般百姓特别是伊斯兰教徒中的威望始终不减，颇得“善缘”。其实他的“善缘”正是他一生善于为人处事的回报。

1938年徐州会战之前，蒋介石鉴于韩复榘之不听指挥，公然反抗政府命令，以致使军中命令不能下达贯彻，特在开封召集军事会议，欲在会议期间将其拿办。出席会议者为第一、五两战区军长以上人员。

会议之前，蒋介石由武汉飞往开封，并命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与白崇禧一同前往。至武汉机场时，蒋介石对白崇禧说：“最好二人各乘一机。”白崇禧深知蒋介石恐遭敌机袭击之虑，便自愿乘机先行。于是，他乘坐C46运输机先行抵开封机场上空。当时河南省主席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闻知蒋介石将至开封主持军事会议，特意坐镇开封指挥布置。他为蒋介石的安全起见，通知防空司令部发放警报。城内外居民闻警报纷纷躲避，道路自然清除，但刘峙却忘记了通知机场高射炮部队。高射炮部队闻警报不知是为戒严而发，他们整装待命，进入了紧急射击状态。恰在此时，白崇禧座机飞临机场上空。高射炮部队以为是敌机临空，立即发炮射击。白崇禧在机中犹懵然不知。待飞机徐徐降落时，高炮部队忽见机身上涂有国民党的国徽，连忙停止射击。白崇禧疑惑地走下飞机，不知出了何事。刘峙于慌忙之中趋前欢迎，惊恐万

状，道歉不已，并请求白崇禧切勿报告蒋介石。白崇禧听了刘的诉说，十分谅解道：“幸而高射炮兵训练不精，不然命中机身矣，若是命中，我不能向委员长报告，既未命中，我无报告之必要。”历经数年，白崇禧为遵守诺言，从未轻对人言，为此，刘峙十分感激。天晓得，若当时蒋介石得知此事，刘峙的下场将如何？

其实，白崇禧之善待于人，是十分有原则的。他曾言道：一切均应以大局为重。

无独有偶，抗战第一期，当时中方空军使用的是俄式E—15、E—16驱逐机，性能较日本零式驱逐机大逊一筹。故国民党航空委员会下令采取避战之战略，以保存实力。一次，适遇敌机来袭，成都地区司令官张有谷即命驻成都空军大队长吕天龙率领飞机16架，前往西北天水方面避战。是时，吕天龙卧病在床，不能执行任务，乃由副大队长余平享率领，机群飞至天水上空。因所带油料有限，乃按照预定计划拟降落天水机场加油。而机场亦铺设白布板，表示可安全降落。就在机群下降时，敌机忽由云层中穿出，突行奇袭。他们毫无准备，遭此偷袭，几近全军覆没。

蒋介石据报，即令将司令官张有谷、正副大队长吕天龙、余平享速解重庆枪决。时任参谋总长的何应钦出面替他们三人讲情，但无效。后又以吴敬恒等国民党元老讲情，仍然未获批准。众军官便想到了“小诸葛”白崇禧。当时，白崇禧正在桂林行营指挥作战，一日，忽接何应钦打来电话，要他速来重庆，因有急事电话中不便细讲。白崇禧不知变故，急忙飞至重庆。何应钦讲述了事情原委后，让白崇禧出面讲情。白崇禧左右为难，说：“你已讲情在先，又有党国元老说情于后，两次都未准，我何能为力？”

何应钦说：“你是最后的希望，不妨试试。”

白崇禧思索片刻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他们都是空军优秀人员。等我考虑一晚，明早再复你。”

经一夜思索，白崇禧终于有了妙招。翌晨，他对何应钦说：“张有谷是地区司令，要枪毙，必须经过军事审判，你可提我做审判长”。何应钦照他所言向蒋介石建议，得到蒋介石的批准。白崇禧便拿了这张批条，对蒋说：“军法审判必得其平，始可信服部属，若当毙而不毙，则我不做；若不当毙而毙，我亦不能做”。蒋介石说：“一切依法审判就是。”白崇禧要的就是他这句话。

审判结果，张有谷按上级命令，作避战之处置，何罪可言？吕天龙卧病在床，当然无罪。余平享率队前往天水，机场发安全降落信号，其处理亦无过错，至多仅负降落时疏于警戒之责。若凭此而判，张、吕二人可得无罪，余至多处以几年徒刑。当时的军法总监何成浚听了白崇禧的审判结果后，对他说：“你的意思是救他们？”停了一会儿，他继续说：“如果审判结果与委座的原意相差太远，恐招致不美。倘第三次他仍坚持枪决，恐怕就无救了。”

白崇禧征求他的意见，他说：“每人给他几年徒刑，关若干时间后，再

申请将功折罪，放他们出来。如此既可救他们一命，亦可与原批出入不大，岂不两全其美？”

白崇禧依其所言。审判结果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

此案之判断，使空军官兵尽皆欢天喜地。张等坐监不久，即被保出仍在空军服役。这对张等三人真乃是再造之恩。

白崇禧为坚持其做人之原则，亦曾与蒋介石发生过冲突。

北伐战争初期，一次，孙传芳部之三个军，因前去无路，后有追兵，乃派一军使前往白崇禧处投降。白崇禧有如初生牛犊，无所惧怕，即由军使陪同，亲至敌人阵地视察。敌方三个军长王良田、李彦青、杨赓和见白突然而至，不胜惊诧。他们要求白崇禧不缴枪械。白崇禧对他们讲清当时之形势后，准许三人携带少量枪支由南浔路回孙传芳处，其部队由自己指挥。三位军长依言而行。待三位军长行至九江时，白崇禧电话告蒋介石处理经过。蒋介石却极不赞成他的处理方式，并责备他之“行为无异资敌”，因为孙传芳仍是其劲敌。蒋介石令白崇禧将其三人捕捉送到汉口政治部。当时蒋介石谍报人员金佛庄被派至南京工作，被孙传芳的情报人员识破而枪毙。蒋介石闻知气愤不已。一面打电报给邓演达，让他在三个军长中间任挑选两个枪毙，一面打电报给孙传芳：“我已枪毙你两个军长，如你尚残酷待我工作人员，你还有数万军队在我手中。”白崇禧至九江，还不知蒋介石如此动怒。待得知蒋介石的决定后，立即前往谒见并申述自己的意见：“革命军以收揽人心为目的，务使敌人感恩怀德。孙传芳杀金佛庄，因为他是谍报人员；我们杀孙之俘虏，难免遭受‘白起坑卒’之批评。”但蒋介石却不以为然，说电报早已发出。白崇禧见事已至此，无可挽回，即不再言语。

邓演达接到电报，按指示枪毙了王良田、杨赓和，而李彦青则幸免于难。多年后，白崇禧在陈调元处偶遇李彦青。李彦青见白，突然下跪，并感谢其救命之恩。白崇禧则心中不免黯然。或许他忆及自己确曾为保其性命据理力争，竭尽全力，亦可稍得安慰。

白崇禧幼年教育始于私塾，受中国传统文化之仁爱、忠信等思想影响甚深，从军后，更加其救黎民于水火、光复河山之凌云志为精神力量，使他无论为常人或为官长均能得人信赖。

北伐军克复上海后，蒋介石曾任命白崇禧兼任上海警备司令。当时上海是全国商业和经济中心，世界列强于上海多有租界，更加其它一些复杂原因，上海治安就显得相当麻烦。白崇禧上任后，在军中发布了两项特别规定：一、严禁赌博，二、不准携带便衣。因为携带便衣，既增加了行军之困难，于战斗激烈时官兵又容易换便服逃跑。然而当时的租界当局也有特别的规定：凡携带枪支，着军服进入租界者，一律禁止，且遭扣留。部队刚至上海，对此规定并不熟悉，因而有不少人被租界当局逮捕。白崇禧作为司令长官前往交涉，但均告无效。气愤之下，白崇禧即下令驻守租界边界之中国士兵，凡外籍人士入中国地区者，一律扣留，以作报复。租界地当局没料到中方如此强

硬，无可奈何之下与白崇德进行协调，最后定为，只要中方人员不携带枪支，无论着何种服装，一律准许进入租界。

白崇禧不许部下穿便服，自己当然也不穿便服。当时还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各国驻上海领事知道白崇禧是新任警备司令，便纷纷前往拜会。当时的白崇禧只有 32 岁，穿的是灰色军服，曾被领事们误以为是下级军官。一次他对法国领事说：“我是中华民国之军人，必须穿中华民国之军装。我平日出入都有卫兵保护，入法租界亦当如此，如勉强我及我的卫兵遵守租界之规定，我绝不赴宴。”

当时上海是黑社会活动最为猖獗的地区，许多地方长官对黑社会不敢得罪，有的甚至暗中勾结，为虎作伥，鱼肉民众，从而使黑社会的势力更加强大。白崇禧深知黑社会势力可怕，但他绝不理会，并明令禁止，不许陆军接受黑钱。上海黑社会的首要人物之一杜月笙至龙华欲拜见白崇禧，白崇禧拒不接见。有人曾暗示白崇禧，杜月笙捐献大洋 48000 元，对革命军有功。言下之意是希望白崇禧能给予一官半职。但白崇禧毫不客气地回绝道：“杜月笙捐了 48000 元，革命军可以还他 50000，但名气不以滥假，官职岂可随便送人？”

其实对于白崇禧一生的居官为人，国民党当局在 1966 年 12 月 2 日，白崇禧猝死之后，曾有过这样的评价：“为人公私分明，守正不阿，且秉性刚毅，精娴韬略。”评价之高，实属难得。这也算是为白崇禧辉煌而又凄凉的一生作了比较公正的评价。

不白而死

1965 年 7 月，李宗仁从海外回到祖国，7 月 19 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在上海文化俱乐部接见李宗仁时说：白崇禧颇自负，其实政治上并无远见，他竟相信蒋介石的话，被骗到台湾去了，我很为他的安全担心。

正在海峡对岸聊度残生的白崇禧，可曾料到还有一位共产党的领袖也是他的旧相识正在为他的安危担心呢？白崇禧的悲剧正象周恩来总理所言，是政治上缺乏远见所致，他既与蒋介石对立，又与共产党为敌。多年来他苦心经营，就是想不择手段地置蒋介石于死地，从而与共产党划江而治，建立起自己一统天下的独立王国。

1949 年 1 月，国民党军队在徐州会战中全线崩溃，一败涂地。蒋介石试图挽回颓势的计划即成泡影，被迫于 28 日宣布“引退”。这时，白崇禧即与李宗仁商量，觉得有与共产党划江分治的可能。到了 3 月，有一个和白崇禧相熟的民主人士，从香港悄悄北上到汉口，劝白崇禧趁此时机赶快起义，以了倒蒋之夙愿。并为此提出了可靠的保证，白崇禧把这个人留在汉口住了一个星期，同时暗地派人到南京征求李宗仁的意见。不知何故，他最终还是拒绝了这位民主人士的建议，不过仍派人将其送至香港。

1949年4月，李宗仁代表南京政府派代表北上北平，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谈判代表刘仲容回到南京后单独去见李宗仁，将代表毛泽东意见的中共报纸转给他。

李宗仁接过扫了几眼，上面赫然写着文字下面，有一段用红笔画了道道，文曰：

……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并正告南京政府：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向前进的。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一点游移的余地也没有了。

李宗仁读罢，脸色骤然变得十分苍白，半天不作表示。不日，白崇禧专程从汉口飞到南京听报和谈消息，刘仲容对白崇禧说：“健公，你给毛先生和周先生的信我都当面转交了。你要我向中共方面提出的‘划江而治’，‘政治可以过江，军事不要过江’的建议，我已经当面向毛先生和周先生谈过了。中共方面态度很坚决，毛先生说，政治要过江，军事也要过江，而且很快就要过江。”

白崇禧忿忿地说：“他们一定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下去不可了，这还谈什么？他们还有什么别的意见？”

刘仲容在白崇禧身边工作了多年，也深知白崇禧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他 very 希望能通过自己耐心做工作，使白的态度能有转变，而把白争取过来。他把毛主席所说的原话，毫无保留地告诉了白崇禧，还特别强调说：“毛先生说，你很能带兵，将来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人尽其才，请你指挥国防军。”

白崇禧对这番话却听不进去，对他说：“个人出处，现在不是我考虑的时候，目前要紧的是共产党如果有和平诚意，就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不要过江。能让步的我们尽量让步，不能让步的绝对不让，过江问题为一切问题的前提。中共如在目前‘战斗过江’和谈的决裂，那就不可避免。”

第二天，白崇禧又对刘仲容说：“我们又不是不能打了，除了几十万陆军沿江布防和完整的海、空军配合，还有一条长江天险。再说，美国方面已经答应支持德公，有十多艘军舰已经启运，打起来，美国插手进来，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和谈，只有在中共不渡江的条件下，才能达成协议。”

刘仲容觉得已经不好再谈下去了，该说的话已经都说了。他联想起这两天曾听白崇禧身边的参谋人员说，蒋介石已经指令财政部从上海拨给“华中长官”白崇禧一批黄金。他觉得眼下再多说也没用了。

……

和平谈判终于“流产”了。

1949年10月1日，在广州的李宗仁官邸的办公室里，一架收音机正播放着新中国成立的庆典实况，屋内李宗仁、白崇禧、程思远和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都坐着沉默不言。

广播结束后，他们讨论着自己的去向。广州已不是长久立足之地，他们将何去何从？留在此处，去当中共政府的子民？还是去蒋介石已经经营布置好的台湾岛呢？白崇禧因为最近已被蒋介石拉了一把，灌了甜言蜜语，就对李宗仁说：“德公，去台湾怎么样？”

李宗仁十分清楚，失去了与中共讲和的宝贵时机，己是大错，再去台湾，无异于自投罗网，必成为“张汉卿第二”，这是错上加错，他毅然飞往海外。

而白崇禧却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地被骗到台湾，而他的结局却也被周恩来总理而言中。

白先慧女士“冒险”之行

时光到了1986年。

一直生活在台湾的白崇禧女儿白先慧女士，听说大陆正在拍摄故事片《血战台儿庄》，久埋在心底的一个愿望又涌了出来：“回家乡桂林看看。”她把把这个想法向亲友们讲了之后，得到的却是一个又一个的劝告：“阿慧，你大陆之行的念头万万使不得，只要你的脚一踏上大陆，共产党就会立即把你抓起来。不要忘了你父亲是共产党的对头！”“你父亲是甲级战犯，共产党怎么会放过你？”但白先慧女士对故乡的怀念太强烈了，说什么也要回去看看。临行时她说：“这次回故乡看看，就是被抓起来，死了也值得！”

白先慧女士“冒险”来到桂林，不敢住高级宾馆，悄悄地在李宗仁元配夫人李秀文家里住了下来。李夫人从1949年开始，曾先后在香港、古巴和美国住了24年，1973年从美国回到祖国，在家乡桂林定居。她住在40年代曾经住过的叠彩山旁景色宜人的那幢两层楼房里，政府已把房屋修缮一新。白先慧女士住下之后，再三叮嘱李夫人及她家人说：“我这次来桂林谁也不见，万万不可走露消息。”她的心一刻也不踏实，害怕有人会认出她来找麻烦。李夫人看出了她的心绪，劝她打消顾虑，到大街上去走走看看。夜里，她终于走上了大街，像普通游客一样东看看西望望，观赏着美丽的夜景，并没有受到谁的干涉。于是，翌日她大着胆子在桂林的大街小巷串了起来，童年的旧居，读书的学校，亲友们的私邸，她都寻找到了，唤起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白先慧女士在桂林各地转了几天，没发现有人盯梢，于是放心许多。她也像那些游客一样，脖子上挂着照相机，这里拍，那里照，她想把桂林统统装进相机带回去，让亲友饱赏一下家乡美丽的风光。

在桂林的最后几天，她索性搬到饭店住下来，看看又该怎么样？她在饭店受到了热情周到的接待和服务。她该返程了，来到饭店服务台结帐，女服

务员十分和蔼地对她说：“经理已经关照过了，不收您的费用，今后欢迎您和家人常回来旅游和长住。”

白女士的心在“咚咚”的跳着，试探道：“你和经理知道我是谁？”

“知道，您是白崇禧将军的女儿。白将军是抗日名将，又有‘小诸葛’之称，谁不知道呢？当然，他也打过内战，不过这一切都是历史了。可惜白将军没有回家乡来看看，就客死他乡了！”女服务员对白将军的死流露出这般的挽念之情，使得白女士心里发热，泪如泉涌，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一把抓住服务员的双手。父亲于1966年在台湾病逝，白女士万万没有想到祖国的亲人是这样理解他，又是这样宽待自己，暗笑自己回来时还有害怕被抓起来的念头，把一个堂堂正正的回乡探望搞成跟“冒险”行动一样。

白女士办完手续，急忙奔向飞机场，飞机快要起飞了，她急着从车上搬下来一袋沉重的行李，机场过磅员问：“里面装的是什么？”这时她已没有半点来时的精神负担了，对过磅员深情地说：“是桂林的土，还有桂林山上的和漓江里的石头。”过磅员信任地微笑着对她说，“好吧，是纪念礼物，那就免费了。”白女士又是一阵激动，泪水扑籁蔽地掉了下来。

快到飞机舷梯了，白女士又回过头来，恋恋不舍地望着候机大楼，又望着机场周围远远的山峦，她对机场人员说：“可以在这里照一张相吗？”“可以。”机场人员完全理解同胞的赤子之情，接过她手中的相机，让她自由选择好候机大楼为背景，还有那画一般多姿的远山，“咔嚓”一声，拍摄了她桂林“冒险”之行的最后一张彩照，这也是一个历史性的镜头。

白先慧女士依依不舍地走了。但是她的此次“冒险”之行，不但对于她自己，而且对于大陆亲友，都是难以忘记的。直到1987年2月17日，有人在《人民政协报》发表了一首诗《有赠白先慧女士》：

玉宇琼楼绝胜前，榕湖两岸绿笼烟
异乡梦远八千里，故土情深三十年。
隔海不知云外路，到家真入日边天。
煌煌舜世春风面，泪串珍珠化作泉。

第七节 何应钦凄凉凋谢

天字第一号闲人

1987年10月21日上午7时30分，何应钦因心肺衰竭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去世。他的一生，从外表上看轰轰烈烈，骨子里却是凄凄凉凉。他虽享年97岁，但仍未能看到祖国统一。

1958年1月1日，香港《新晚报》首次向读者披露了这则惊人内幕：

在台北那些要员中，恐怕没有像何应钦那样郁郁不得志了。

该报进而说明，要是别人这样说还可以不相信，但是这话是出自一个一度当过国民党“特任官”的人士之口，我们就没有理由怀疑这句话的真实性了。

当时何应钦的正式官衔是“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但实际上什么工作也没有。这个“委员会”顾名思义，负责战略的策划和设计。可是，那几年台北官场一切都听命于美国人，“战略”当然也不是例外。在这种情形下，“战略顾问委员会”一年到头，难得开一两次会，“主任委员”因而成了天字第一号的闲员。

有好几次，他很想上美国走走，始终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其实，他离开台北的目的倒是很简单，只是打算到纽约当“寓公”而已，因为1947年他任联合国参谋长会议的“国民党政权首席代表”时，在纽约近郊买了一所相当华丽的房子，并且在美国银行存下了一笔巨款。

照道理说，他和蒋介石从“黄埔军校”时期起，便一起共事，蒋对他似乎应该深信不疑才是，为什么一定不让他离开台北呢？熟悉国民党内幕的人们都知道，蒋介石一直对他怀着芥蒂之心。

何应钦系贵州兴义人，家祖是牛贩子，后发了家，何的父亲是县自卫团的成员。

1901年，何到贵阳，进黔军陆军小学。毕业后，赴武昌在第三军中学学习。1908年，到日本先后入神武学校和士官学校。并在日本加入同盟会。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由日本回国，加入上海陈其美部。1913年，任赣军第一师步兵营长。同年8月，他赴日完成学业。1916年回国，任黔军第四团团长兼贵州讲武学校校长。1919年，任黔军第二混合旅旅长。1920年，在贵州军警界任职。1921年，任黔军参谋长。

1924年1月，赴广州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军事参谋。6月在黄埔军校任少将衔战术总教官，教导第一团团团长，10月13日，任黄埔军校军训部代理主任。

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

1926年1月，继蒋介石任一军军长。4月中山舰事件后，任黄埔军校教务长。

1926年7月，开始北伐战争，何任粤东潮州——梅县战区警备司令。

1927年4月，蒋介石与武汉当局分裂，在南京另立反对派政府。决定分三路继续北进，分别由蒋、何、李宗仁指挥。8月蒋介石辞职前往日本。蒋隐退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改编为军事委员会，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组成常务委员会。11月24日，国民党包括何在内的派系成员在蒋介石上海官邸聚会，讨论国民党的统一问题，12月何应钦率领一军北进以对付孙传芳的威胁，占领徐州后，何及其他国民党将领发表宣言，实际是拥护蒋介石的声明。1928年1月，蒋重新掌握军政大权后，何任浙江省主席。二月中，何任第一集团军参谋长。

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何任国务委员。11月，任军训部部长。1929年，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何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并任“中政会”委员。同年被任命为海陆空三军参谋长。1929至1930年，历任开封、广州、郑州及武汉战区司令。1930年10月，任国防部长。

何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是在农村消灭共产党势力。被任命为所谓国民党的“剿匪”军司令。1930年12月，第一次进攻失败，1931年2月，任南昌行辕主任，指挥赣、湘的部队与共产党作战。6月，何围剿战役失败，蒋亲自任指挥，何任“剿匪”野战军司令。他对江西的共产党部队进行了一系列激烈但又毫无结果的战斗。

1932年，为“中政会”特别事务委员会委员。1933年3月12日，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主任。与黄郛合作企图通过政治协商阻止日军前进。1933年5月31日，签订了塘沽协定。

许多老百姓抵制签订这个协定，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出卖中华民族的利益。冯玉祥也动员组织了抗日联军来表现群众的愤慨。

1933年11月，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交给何及黄郛一项叫做振兴华北的临时计划。后来的谈判导致华北及满州傀儡国之间铁路交通、邮电的恢复。

1935年，日本要搞华北五省自治，同年6月10日，何与日本驻华北警备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了所谓“何梅协定”。

在北平，何除了担任国防部长及“军委会”北平分会主任外，还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他在国民政府中，是制定对日政策的制订人，成为人们仇恨的主要目标。“何梅协定”虽是秘密协定，但不可避免地为人所知。1935年秋，学生、群众反对华北自治，游行、示威愈演愈烈。

从上述简历可知，何应钦在国民党位高望重，但蒋介石用人首重浙江老乡，其次是黄埔生，再次才是他旧日的密友如张群等人。陈诚在北伐时只是一名团长，胡宗南在北伐时才当上营长，这两人受蒋青睐，以后扶摇直上。胡宗南成了“西北王”。陈诚呢？始终未脱离过直接带兵的部队，抗战前期

任“军委会”政治部长，兼任九、六战区司令长官等职；蒋还把陈安置在何应钦的禁区——军政部兼政务次长，到抗战后期，索性就让陈兼任军政部长，一脚把何踢开，何虽然还有大本营参谋总长、陆军总司令等头衔，实际上却被架空了。

为什么如此？其一，何应钦不是浙江人，虽有多年辅佐之劳，蒋在权衡利害时，仍不能不加以抑制。

其二，何应钦是国民党军队元老，他与元老军人间的关系是微妙的。国民党老一辈的带兵人如李宗仁、程潜、唐生智以及白崇禧、顾祝同、刘峙等人，对陈诚以后的飞扬跋扈、把持一切着实不满，他们处于兔死狐悲之境，常常互寄同情，互相默契，联合拥何（应钦）反陈（诚）。1949年李宗仁当代总统，便请何应钦当行政院长，并支持顾祝同当参谋总长，虽然内里有多种因素，也是李宗仁对付蒋介石的一着。蒋对此感到憎厌与不安。

其三，最使蒋难忘的，还是1936年的“双十二”事变后他陷在西安的经历。当时，黄埔系的激进派与国民党人中的保守派，力主讨伐张（学良）杨（虎城），拥何当“讨逆”总司令，何也飘飘然，动员、指挥军队沿陇海路向西安挺进，并派飞机往西安一带轰炸。道路传闻，据说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想趁机把蒋炸死，以便何自己取而代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回南京后获悉此事，对何又不便率尔行事，只好把贺衷寒（军委会政训处长）、曾扩情（专管军队党务）大骂一顿，将他们撤职放逐出国。蒋、何关系上从此也蒙上一层阴影。由于这些原因，1949年何应钦到台湾后，便退居第二线，落得个被冷落的可悲下场。

这段时间，“健康常乐”和“择善固执”成了他的座右铭。1971年10月4日，《亚中时报》曾有如下报道：

栽植兰花，观赏兰艺，占据了何老将近三年来大部分的闲暇，三年的时间，他对“兰艺”由陌生到登堂入室，也花费了不少心思去“钻研”，现在，只要他见到了“外行”总会亲切和蔼的拉到一旁，上一课速成的“兰花经”。

何老将军爱上兰花是非常偶然的，三年前，一位日籍友人为了向这位老将的“八十大寿”祝福，老远送来一盆“芙蓉殿”，何老将并不在意这盆看似平常的花草，就搁置在门口，两三天后那位日本朋友登门道贺，惊异于他的“外行”和“不惜花”，原来这竟是一盆价值廿五万元日币的名贵品种，喜爱国艺的何老将，从此引发了兴趣，在庭院中加盖了三间兰屋，取名为“常乐轩”，从此，鱼池中的廿四条华贵“金鱼”，又增加了一位美丽的朋友。

何应钦将军所栽培的兰花将近两百盆，每天清晨六时他就起床亲自照料这些娇脆的生命，他拥有的“名花”非常的多，象目前身价颇高的“鹤之华”、“太阳”、“瑞宝”、“墨兰”等，及台湾少见的中国春兰“汪字”、“大富贵”、“余蝴蝶”、“翠一品”、“宋梅”、“集圆”、“如意素”，他都有栽藏，其中，“汪字”和“宋梅”在台湾仅有两盆，另一盆是栽培在总

统官邸。

用“白手成家”来形容何将军的“产业”——兰花，该是最恰当的，他虽然有各品种的兰，却绝大部分是朋友送的，他说：“养兰必须要投下大资本，我自己是买不起的”。

国兰原产于我国，与我国的历史、文化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早在二千四百年前国人即知道兰花的欣赏栽培，由于兰的高尚雅洁，自古以来一直为骚人墨客所吟咏，入清以后，兰艺更是盛行一时，江浙一带书香人家几无一户没有兰花。

八十高龄的何将军有一根细致的拐杖，但是他只有在赏兰时才用，每当他见到一株亲手培养的兰花发了新芽或是有演变成第二代的趋向时，他就会兴奋的举起拐杖频频指点说：“有希望！有希望！”。

也许是何将军认真、勤恳的精神感动了一盆“瑞玉”兰，在短短的三年内，竟由八英寸长长到二英尺大，这在兰艺界是很少见的，何老将在看到了他在兰花上可观的成绩，就如同他过去那些彪炳、煌耀的战绩般令他激动，他说“这就是变不可能为可能”。

何将军的特从参谋魏中校说：“大家都尊敬他、爱戴他，他就象我们的老师，没有距离，部属们都敬佩他的‘大公无私’。

何将军的个性平和，他能和各阶层各年龄的朋友愉快相处，尤其是他轻松、幽默的谈吐，更使年青人如沐春风，敬而不畏。

他从不象别人一样责备今日的年轻人狂妄、无知、享乐、好逸恶劳，他认为一个时代的青年有一个时代的任务，他总是以长者之风勉励青年人“勤能补拙”，做人做事要认真、负责，对于国家、民族要忠贞不二，在这些方面，他确实是元时无刻不在身体力行。

年轻时的何将军，虽然戎马倥偬，却也度过了一段今天年轻人所最向往的岁月，他精于骑、猎，在他的“摩登”时代，他还记得他的坐骑是一匹黄色的壮马，“我的骑术不错”，他的口气中透着些自豪。

打猎也是个热门的玩意，惊险、刺激，及足够的机智，何应钦将军的足迹遍及大陆各省，来台后，也曾带着猎狗在高雄、嘉义、宜兰等地射猎山猪、野兔，他说：“打猎是猎狗第一，猎枪第二，技术第三”，自从前年他到屏东打了最后一次猎后，将近两年之久，没有再玩过枪了。

何将军同时也是位桥牌高手，台湾的桥牌盛行也是他一手提倡的，曾经是桥社名誉社长的何将军，如今因为“年纪大了”，只偶而在家中自己玩玩。

有人玩笑性的向何将军说：“您是很现代，很时髦的吧……”，何将军也不置可否，他的高尔夫球技硬是不弱，走上两圈都不会气喘，这就是他的健康之道了，所有的运动都是他维护健康的方法。

将届八四高龄的何应钦将军，确实懂得“健康而后常乐”的道理，他从不轻易发怒，看看他聪敏的双眼、双耳，和数得出的儿丝皱纹，他真不像一位八十几的老人，更不像一位曾经百战、驰骋沙场的老将，倒像一位哲人令

人景慕。

南京受降出尽风头

纵观何应钦一生，最风光的时刻莫过于主持中国战区日本投降典礼了。

1945年8月，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经过八年的含辛茹苦、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停战昭书”，正式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

根据盟军太平洋战区最高统帅部划分的受降分工，中国战区的受降范围是北纬16度以北地区，包括中国大陆、越南北部、台湾、香港和海南岛等岛屿。后来因香港原为英国殖民地，临时又通知划归英军受降。

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被中国政府任命为中国战区的受降主官。因此，何应钦领导并主持了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的整个活动，尤其是亲自主持了南京的接受日军投降典礼。侵华日军在中国的投降过程，是按三个步骤进行的。一是芷江洽降；二是南京投降；三是全国按十六个受降区分别投降。芷江是湖南西部的一个军事重镇，是中国陆军第四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也是距日本侵略军最近的前线指挥所之一。这里设有较好的机场和通讯设备，是中美空军的重要基地，因此被选中作为与侵华日军洽降的地点。8月20日前，何应钦与陆军参谋长肖毅肃，以及各地受降主官汤恩伯、张发奎、卢汉、王耀武等陆续抵达芷江，数十名中外记者亦云集这个湘西小山城。

8月21日，根据中国政府的指令，日军中国派遣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受司令官冈村宁次派遣，乘日军用飞机一架，到芷江洽谈投降事宜。中国空军派出六架P—51战斗机，在指定日军飞机飞行路线上空，来回巡逻，负责监视和指导洽降日机的飞行。中午12时，机尾挂有我方指定红布标志的日机，在中国战斗机监护下抵达芷江机场上空，随即绕场飞行一周，以示向中国军民致礼。飞机降落后今井武夫等由中方联络官引导，乘坐两辆悬挂白旗的吉普车离开机场。在机场数千名中外军民欢呼胜利声中，今井武夫一伙脸色惨白，汗流如注。很多美军官兵激动得撕下日机机尾所挂标志布条，珍藏起来留作胜利纪念。

次日，中国陆军参谋长肖毅肃及美军代表麦克鲁准将接受日军代表的洽降。日军洽降代表呈递了日军在华驻军有关资料，中方代表宣读了何应钦致冈村宁次备忘录。

蒋介石、何应钦等为了独占抗战胜利果实，在致冈村宁次的备忘录中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是除蒋、何指定的受降主官外，日本陆海空军不得向其他部队缴械投降。同时授权日军如遇八路军、新四军前来接受投降，可以加以拒绝，甚至进行抵抗。二是按照日本政府原来的规定，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只能指挥驻中国的陆军，而对驻东北、台湾、越南的日军及驻华的海军均无指挥权。何应钦决定统一上述日军的指挥，授权冈村宁次统一“联

络”，负责指挥上述日军投降事宜。

8月27日，中国陆军副参谋长冷欣奉何应钦之命，率部分人员至南京设立前进指挥部，具体指挥中国军队进驻南京和筹划受降大典。

9月8日中午12时，何应钦所乘专机，在数十架战斗机护卫下，由蓝江抵达南京，以盟军与中国政府受降主官的名义，参加中国战区接受日军投降的典礼。

受降大典特别选定了9月9日上午9时，即所谓“三九良辰”，地点在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南京黄埔路原中央军校礼堂）。是日，军校门口高竖松柏扎的大牌坊，牌坊顶端有一英文“V”字，两边中美英苏四面国旗迎风飘扬，下面横幅写着“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12个大字。进入礼堂，会场布置成一个正方形，四周墙上环以白绸，悬挂着中美英苏四大国的国旗，正中饰以英文“V”字和中文“和平”两字。座北朝南设受降代表席，置长形宽条桌案，后置皮垫靠椅5把；面对受降代表席置一窄小长案，木椅数把，为投降代表席。

8时56分，受降主官入座。带头的是中国受降最高长官——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他身着军礼服，肩挎武装带，左佩短剑，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地进入会场。这是他一生中最光彩的时刻。依次是受降官陆军上将顾祝同，海军上将陈绍宽，陆军参谋长肖毅肃，空军代表张廷孟。其左侧为中国高级将领和记者席，右侧为盟国军官及外国记者席。

受降仪式由陆军参谋长肖毅肃主持。接近9时，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率正副参谋长等投降代表，乘坐汽车，由中国武装士兵押送，穿过扎有“和平永奠”、“胜利和平”等金色标语的牌楼，来到受降会场。车到大门口，冈村宁次等依令下车，顺从地解下所佩军刀，以示解除了武装，一个个用手端着军帽，低垂着头走进会场。依次是：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官福田良三中将，日军驻台湾第十方面军参谋长谏山春树中将，日军驻印度支那第三十八军参谋长三泽吕雄大佐，以及中国派遣军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和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冈村宁次进入会场时虽然低垂着头，两眼却频频偷看何应钦，无法掩饰内心的不安。

日军投降代表进入会场后，由中方联络官引导，一字排开站在投降席前，立正敬礼，然后在木椅上坐下。

仪式开始，冈村宁次起立，出示受权投降的证明书，降书内容九点，内称：“自此以后，日本陆、海、空军当即服从蒋委员长之节制，并接受蒋委员长及其代表何应钦上将所颁发之命令。”降书由冈村宁次的参谋长小林浅三郎连同日军的编制、人数、武器装备、驻地分布等情册，一并双手捧给何的参谋长肖毅肃中将。肖用一只手接过，交何应钦审阅。审阅毕证明后，肖毅肃即取出投降书两册，小林浅三郎急趋前敬礼，领取后交由冈村宁次用毛笔签了字并盖了章，向前数步，两腿立正，弯着腰，低着头，双手将降书捧送何应钦。何应钦微带笑容，起立用双手接过降书，随即命令冈村宁次按规

定将日军集中，分别向盟国驻军办理投降手续。冈村宁次回答：“我完全接受这个命令。”受降仪式结束，又按入场时的顺序将冈村宁次等降将押走。根据何应钦在南京接受日军投降仪式上给冈村宁次的第一号命令，全国划分成 15 个受降区，加上越南北部，共 16 个受降区分别接受日军投降。

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接收越南北纬 16 度以北地区（越南北部地区）；日军投降代表第三十八军军长土桥勇逸。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接收广州、雷州半岛、海南岛（广州海南地区）；日军投降代表第二十三军田中久一。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接受曲江、潮州（潮汕地区）；日军投降代表第二十三军田中久一（兼）。

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接收长沙、衡阳、岳阳（长衡地区）；日军投降代表第二十军坂西一郎。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接收南昌、九江（南得地区）；日军投降代表第十一军笠原幸雄。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接收嘉兴、金华、杭州、宁波、厦门（杭州厦门地区）；日军投降代表第十三军松井太久郎。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接收南京、上海（京沪地区）；日军投降代表第六军十川次郎。

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接收武汉、沙市，宜昌（武汉地区）；日军投降代表第六方面军冈部道三郎。

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接收徐州、安庆、蚌埠、海州（徐海地区）；日军投降代表第六军十川次郎（兼）。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接收天津、北平、保定、石家庄（平津地区）日军投降代表华北第一方面军根本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接收山西地区；日军投降代表第一军澄田 四郎。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接收洛阳；日军投降代表第十二军鹰森孝。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接收郑州、开封、新乡、南阳、襄阳、樊城（郾城地区）；日军投降代表第十二军鹰森孝（兼）。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接收青岛、济南、德州（青岛济南地区）；日军投降代表第四十三军细川忠康。

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接收察哈尔、绥远、热河三省（包绥地区）；日军投降代表根本博（兼）。

台湾行政长官陈仪，接收台湾省；日军投降代表第十方面军安藤利吉。

侵华日军投降兵力共有方面军 3 个，军团 10 个，师团 36 个，独立旅团 41 个，独立警（守）备队及支队 20 个，特种兵队 6 个，海陆空军官兵共 1,283,200 人，加上日本当时在华的侨民共 2,129,826 人。因此，日本投降后的遣俘、遣侨工作任务十分繁重。

国民党政府分别将日俘和日侨集中在中国大陆沿海及台湾、海南岛和越南北部，然后分批经塘沽、青岛、连云港、上海、厦门、汕头、广州、海口、三亚、海防、基隆、高雄等 12 个港口，海运遣送回国。直到 1946 年 6 月，才将日俘、日侨基本遣送完毕。

被解除军政要职

1945年5月5日，国民党政府还迁南京，举行还都大典，向全国发表广播消息；6月1日，军事委员会撤销，成立国防部，由白崇德任部长，陈诚任参谋总长，何应钦被解除参谋总长及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职务。7日，国民党政府明令特派何应钦为联合国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及中国驻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出国在即，又受特令表彰。全文如下：

军事委员会业经改组为国防部，原任该会参谋总长兼中国陆军总司令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已特派为出席联合国理事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该员历年内长军枢，外总师干，忠勤精一，卓著懋勋。其在军政部任内，对于建军大计，襄赞擘划，不遗余力。抗战军兴，兼任参谋总长，献替帷幄，制取疆场，长算远略，深资倚仗，旋以参谋总长兼任中国陆军总司令，训军简士，策划反攻；泊乎敌寇崩溃，受降收土，安辑流亡，尤极辛勤。兹因联合国军事参谋团之设立，旨在建立国际武力，保障世界和平，任务至为重要，该员以抗战元功，戎旅宿将，代表我国，前往出席，允为无上之选。当兹出国在即，合行特令表彰，用壮新命而纪前勋。此令。

假戏真演，紧锣密鼓。但明细的观众心里清楚，蒋介石在报西安事变时何应钦企图“借刀杀人”的一箭之仇。

7月4日何应钦由京飞沪，准备出国，曾向新闻记者称：“全世界人士，现在渴望实现永久和平，中国为爱好和平之国家，极愿与美、英、苏、法诸国，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而努力。人之心理既无战争准备，战争自无由发生，故余对国际局势，甚感乐观。”又说：“建设现代化之国家，必须有现代化之军队，现代化之军事教育，并需要与工业、交通各方面建设配合发展，所谓富国强兵而后始能国富兵强。”

从表面上看，被解除军政要职的何应钦心境还算愉快，但暗中的不得意则可想而知。

7月12日晨9时，在二百余人欢送之下，何告别了上海。当天下午2时半，飞抵东京厚木机场。在日本曾作短时间的逗留，和盟军驻日统帅麦克阿瑟会晤，又特往横滨视察停泊贺须港的中国舰队之后，才继续他的征程。

17日抵旧金山，曾发表谈话称：“华北时断时续之战事并不严重，中国政府决以政治方法解决政治问题。马歇尔特使在华斡旋和平，中国政府以国内和平与远东和平及世界和平息息相关，自当全力赞助马使。”复在招待记者席上，代表中国政府对美国人民在战时所予道义及物质上之援助，表示谢意。

20日飞抵华盛顿，曾受美国政府的隆重欢迎。何氏逗留华盛顿仅仅4日，

分别向杜鲁门总统及美国其他高级官员访晤，并传递蒋介石之函件后，即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军事参谋团会议。

从 1947 年 3 月开始，国民党一方面宣布国共和谈破裂，一方面集中优势兵力对陕甘宁和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其战略意图：从解放区的东西两翼与解放军主力决战，并将解放军堵在黄河以北，然后调兵进攻华北。

经过一年多的较量，战争形势巨变。初期，蒋军得地失人，我军失地得人；中期，蒋军失地而不得人，我军得人又不失地；后期，蒋军人地尽失，我军人地两得。一年的作战，我军歼敌 112 万人，蒋军总兵力减为 370 万人，解放军总兵力增至 195 万人。这个伟大的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基础，引起了敌人营垒中极其浓厚的失败情绪。

美国总统杜鲁门鉴于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形势的恶化，于 1947 年 7 月中旬派魏德迈使团来华，目的是要密谋挽救国民党危局的办法。魏德迈作了四十多天“考察”离华时发表讲话和声明，承认形势比他预料的还坏，国民党的军事地位已严重恶化，训斥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中国的复兴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他给杜鲁门的长达十余万字的报告中说：“一个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对美国的利益是有害的”。建议美国实行一个广泛的援华计划，但所有美援的运用都必须放在美国顾问的监督和控制之下。

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权，在 1948 年 3 月 29 日至 5 月 1 日，召开所谓“行宪国大”选举总统和副总统。美国政府为实现上述计划，虽然把蒋介石扶上总统宝座，但却公开支持“反蒋”的李宗仁当选副总统，以便必要时取蒋而代之。

东山再起出任“行政院长”

1948 年 3 月 31 日，在新大陆逍遥二年的何应钦终于返国，沪市各界同欢送他出国时一样，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而在这个欢迎会上，何氏虽然还是当年的何氏，但其心情环境，却与当初出国时大不相同了，一般人的看法，是何氏这番的回国是东山再起的先声。

为了推卸军事败绩的责任，蒋介石先是同意参谋总长陈诚的辞职，跟着就电召何氏返国，这足见何陈间正在表演走马换将，同时也表示了何系势力即将抬头。当年何氏在国内外情势下，不得不出国一行，何系人物，也多不得意。何系的大将卫立煌，也只得出国考察，直到 1947 年，国内的政治舞台上又渐起了变化，卫立煌返国东山再起，何系势力渐渐获抬头，至于今日何氏返国，陈诚辞职，可说是整个何系势力，已代替了陈系。至于在政治上、军事上，也占有相当势力的桂系军政集团，对何氏也表示欢迎，因何氏与桂系的关系较为密切，国防部长白崇禧是桂系的人物，白何间的关系，过去曾合作得很好，抗战末期，何任参谋总长，白氏是副参谋总长兼军事训练部长，经常辅助何氏，故这回何氏返国，其在国内政治舞台上的基础是相当稳固的。

在何系的中阶干部方面，就是国民党军队的中坚集团黄埔系，何氏当年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黄埔系的领导权一向是握在何氏的手里。1946年何氏出国后，黄埔系曾为陈诚掌握过，但黄埔干部的关系还是与何氏为深，此番何东山再起后，则黄埔系的领导权，当然又会落到何氏手中。

果不出所料，6月1日，就任总统刚10天的蒋介石，在白崇禧并未表态的情况下，突然任命何应钦为国防部长，顾祝同为参谋总长，而任命白崇禧为“华中剿匪总司令部”的总司令。国防部长，有职无权，何应钦感到蒋介石报复的利刃并未完全收敛。

东山再起的何应钦当然无法挽救国民党军事上的败局。此时蒋军虽然还有365万人，但第一线主力只有170余万人，而且大部分受到解放军的歼灭性打击，军心动摇，官兵厌战。已被我军分割、牵制的蒋军5个战略集团，被迫进行所谓“重点防御”，企图以精锐部队为核心，兵力靠拢，猖集一团，困守战略点线，使解放军“吃不掉、啃不烂”。然而，9月16日，我华东野战军首先发动济南战役，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蒋介石赖以维护反动统治的军事主力基本上归于消灭，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

1949年初，代总统李宗仁在南京发动“和谈”，把何应钦拉出来当行政院长。李和何的私人交情不错，又明白他和蒋介石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坚实，就同他商定了摆脱蒋的控制的计策。他们两人都认为，如果中共肯接受他们所提出的“和平条件”，那么他们就可以实现“划江分治”的美梦，把蒋介石甩到一边去。这件事情固然没有实现，可是蒋介石耳目众多，完全知道了他们两人对付他的计划。但，鉴于“国民党政权”全面崩溃的事实，蒋并不会采取报复的手段。可是，前账未清，再加上一笔新欠，蒋介石心头上的疙瘩是永远解不开的。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何应钦本来打算直接跑到美国去。后来，据他的左右说，因为出国的手续来不及办，并且收到了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就去了台北。他满心以为，到了台北之后，随时都可以离开那里。这种想法没有多久便让现实给粉碎了。

蒋经国发布崇褒“总统”令

何应钦去世的当天，蒋经国发布“总统”令：

总统府战略顾问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少慕戎轩，长娴兵略。鼎革檄传，及锋小试；讨袁护法，执爰前驱。遂以英特之材，上膺于城之选。自此股肱元首，羽翼中枢。出掌戎机，入参朝议。乃至长纓系敌，奏凯受降，实极殊荣，都无遗算。而于赤日深之际，出任行政院院长，渊谟默运，靖献尤多。方期寿迈期颐，亲观复旦，以主义统一中国，以道德重振人心。忽闻殒谢，

幹悼良深。特派李登辉、薛岳、谷正纲、俞国华、沈昌焕、李焕敬谨治丧。饰终之典，务从隆厚，以示崇褒。

何应钦去世不久，台湾《传记文学》（51卷）刊登了一篇关国焯的署名文章，题为《何应钦上将文韬武略的一生》，对其去台后的情况，勾描如下：

民国40年1月，陪夫人至东京割治癌症，以私人身份访问日本，尝应邀出席“日本战友会”副会长冈村宁次主持之感谢会，又在“东京新闻”发表“寄语日本有识之士”，呼吁日本人士及早加强中日合作，致力国民外交；7月，偕夫人返抵台北。41年2月，在交通部交通人员讲习班讲述“总统行谊”，同月以副会长身份主持“中国童子军总会”银禧纪念大会并致词；7月，当选为新成立之“中日文化经济协会”常务理事（会长张群，9月，撰汝卓中译本“昭和之动乱”（日本前外相重光葵著）序；10月，任中国国民党第七届中央评议委员。42年6月，奉总统命前往苗栗，主持“昭忠塔”落成典礼，塔内安厝台湾革命先烈罗福星（东亚）等数十人之忠骸；9月，赴菲律宾治疗眼疾；10月，返回台北；11月19日，吴铁城病逝台北，任治丧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张群）。43年2月，出席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10月，任“中日文化经济协会”会长。44年7月，陪夫人至日本复诊。45年3月，返回台北；7月，率领中国出席“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大会”代表团前往瑞士柯峰，出席者四十三国；8月，在大会上发表演说；10月，一行经菲律宾返台，此行遍历欧、亚18国；11月，连任“中日文化经济协会”会长；12月，在“自由谈”杂志发表“欧游杂记”一文。46年1月，撰“中日文化经济协会”会刊“中国与日本”发刊词；3月，率领中国代表团赴菲，出席“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亚洲区域会议，在会议上公开呼吁中菲加强合作，同月返台；7月，应聘为“中日合作策进委员会”顾问，同月率团赴美，出席“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会议，卜克曼博士拟邀台湾派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简称救国团，主任蒋经国）团员一百人，组团赴美，以加强国际反共宣传；8月，救国团一百青年访问团由新闻局局长沈（春丞）率领赴美，抵密歇根州麦金诺岛后，除接受道德重整训练、编演一表达“世界道德重整运动”思想之话剧外，计在麦岛演出国乐及舞蹈三次，其后复由何应钦领导至华府、纽约、旧金山、洛杉矶、檀香山等处先后公演九场；10月，率领代表团、青年团返抵台北。47年3月，率团至菲律宾碧瑶，出席“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亚洲区域会议，同月返台；5月，率团前往美国麦金诺岛，出席“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会议；6月4日，值“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创始人卜克曼博士八十寿辰，撰“我与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一文为寿（后收入“何应钦将军五年来道德重整言论选辑”）；7月，经日返台。48年5月，率团出席在日本京都举行之“世界道德重整运动”第三届亚洲区域会议，同月返台。49年2月，出席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当选为主席团主席；6月1日，俞鸿钧病

逝台北，任治丧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张道藩）；9月，前往瑞士柯峰，出席“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举行之全球性反共思想策略会议；10月，经法、日返台。

50年6月，率团前往瑞士柯峰，出席“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大会，同月返台；7月，偕董显光率中国青年参加“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工作服务团”（团长胡轨）前往柯峰，抵步后建议编一反共话剧“答案”（上演后易名为“龙”），揭发共党暴行；8月7日，卜克曼博士在西德福祿登斯塔城病逝，8日，在柯峰大会上发表悼词，10日，作“卜克曼博士纪念歌”，11日，率团飞赴西德福祿登斯塔城瞻仰遗容，并参加追思礼拜；17日，至美国宾洲爱伦城，参加卜克曼博士葬礼，并在追思礼拜上致词，24日，飞返瑞士柯峰；9月，率“龙”剧团团员至瑞士、西德、瑞典、挪威、丹麦各地演出，大获好评；11月，应邀前往英国伦敦一行，旋返回欧陆，51年2月，返抵台北；3月，偕夫人离台飞美，领导“龙”剧在美国各地演出；6月，“文星书店”出版吴相湘主编之《中国现代史料丛书》第二辑《对日抗战》收何应钦《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一册，抗战期内军事方面官方资料，以斯为最备，附表近70页；7月，经日返台，夫人留纽约治病；8月，率领特使团前往汉城，参加南韩第十七届国庆纪念大典，向朴正熙大总统呈递国书，南韩政府授予文化勋章，同月返台；9月，“龙”剧在台北“中山堂”首演，致介绍词，同月启程赴美；10月，偕夫人经欧陆前往日本小田原，出席“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大会，同月返台；是年在美国接受基督教洗礼。52年1月3日，朱家骅病逝台北，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5月，当选为“中华民国联合国同志会”会长，同月偕顾祝同等一行访问金门。53年11月10日，于右任病逝台北，敬挽以联云：“八六龄革命元勋，柱石翊中兴，儒雅提倡真有进；五十年同舟报国，精诚相许，与山邱绝枪平生。”54年3月5日，副总统陈诚去世，任治丧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张群），并挽以联云：“革命励精诚，当年患难同舟，志略非常，夙深钦重；中兴膺大任，何意沉疴不起，邦国殄瘁，弥悼英灵。”；9月，在《传记文学》第七卷第三期发表《对日受降签字二十周年感言》10月，任“中山学术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长王云五）技术发明奖助审议委员会筹备人；11月12日，值国父百年诞辰，以“国父的军事思想”为题发表广播讲词，又在《中国与日本》杂志发表《国父与日本》一文；12月，前往东京出席“中日合作策进委员会”第十次全体委员会议开幕礼，同月日皇裕仁授子一等旭日大绶勋章。日本大学赠子名誉博士学位。55年2月，出席第一届国民大会临时会，任主席团主席。56年8月，建议中央改建台北圆山“忠烈祠”案，经奉总统核定施行，并奉派为改建委员会主任委员；10月，前往日本出席“中日合作策进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委员会议。58年，年80；3月，连任“中日文化经济协会”理事长，同月主持圆山“忠烈祠”竣工典礼，出版“八年抗战与台湾光复”（何应钦讲）；4月，任中国国民党第十届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在十届中央评议委员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整

理简笔字提案（案：24年10月5日，国府令飭各机关公牒布告，得采用简体字）；10月，率团前往日本大阪，参加“徐福祠”落成典礼。59年7月，前往东京出席“中日合作策进委员会”第十五次全体委员会议，同月返台。

61年2月，出席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五次会议，当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3月，出版《近十余年来对台湾建设之建议案汇编》一书；4月，任“国父纪念馆”管理指导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孙科）；6月，应聘为台湾日资太阳诱电股份有限公司“交通事故救济奖学金董事会”董事长；7月，“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裁撤，改任“总统”府陆军一级上将战略顾问；10月，出版《日匪关系与中共阴谋》一书。62年4月，与顾祝同等访问金门、澎湖，同月发表《对加强国际宣传及促请政府实施反共精神教育之建议》；7月6日，于“卢沟桥事变”36周年纪念前夕发表谈话，力斥共党篡改抗战史实；9月9日，“中日文化经济协会”为纪念抗战胜利28周年，特编印《何应钦上将对中国关系言论选集》一书，全书共十八篇，中、日文对照，分赠日本友人；12月，接受“亚洲中小企业联盟”日本分会献赠半身铜像。63年6月16日，至凤山参加陆军军官学校50周年校庆典礼，并发表校庆献词；10月31日，出版《中国与世界前途》一书，为“总统”蒋公八秩晋八华诞寿；11月，出席总理建党革命80周年纪念大会暨中国国民党十届五中全会；12月，率领国家重要建设考察团前往各地，考察十项重要建设工程，同月任“中华民国各界表扬好人好事大会”主席。64年3月，为日本山田纯三郎撰书墓碑（山田纯三郎乃山田良政之弟，民国2年2月27日国父亲书“山田良政先生墓碑”）；4月5日，“总统”蒋公去世，奉派与张群、田炯锦（青云）、薛岳（伯陵）等敬谨治丧，15日，发表“追思故‘总统’蒋公——永远不能忘怀的几件事”为悼（后收入同年5月“中央日报”编印之《领袖精神万古常新——“总统”蒋公哀思实录》）；10月，应聘为日本“亚东亲善协会”名誉顾问（会长千叶三郎）。65年4月，主持高雄澄清湖先“总统”蒋公铜像揭幕典礼；6月，为黄埔一期毕业生邓文仪（雪冰）《黄埔精神》撰序；8月，为“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中华民国联谊会”编印之《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和龙剧》一书作弁言；9月，率领国军一级上将省政建设考察团至台中等县市考察地方建设，并访问农村，团员有顾祝同、周至柔（百福）、黄杰（达云）、王叔铭、彭孟缉（明熙）、刘玉章（麟生）、刘安祺（寿如）等十余人；11月，任中国国民党十一届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66年4月，任“国父纪念馆”管理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4月27日，与夫人结缡60载，举行“钻石婚”纪念茶会，“总统”严家淦（静波）、“行政院”院长蒋经国等亲往祝贺；10月31日，发表《“总统”蒋公九秩晋一诞辰献词》；12月，发表《河北事件中绝无所谓“何梅协定”，请史学家及出版界重视历史的真实性》一文（《传记文学》第31卷第二期予以转载：谣传24年6月4日何氏与日本华北驻军司令梅津美治郎举行秘密会谈，签订“何梅协定”，全部承认日本之无理要求），由“中日文化经济协会”印行。67年2月，出席第一届国

民大会第六次会议，当选为主席国主席；3月，任国大劳军团团长，率团分赴各地，代表全国同胞慰劳三军；4月3日，应日本“产经新闻社”社长鹿内信隆之邀，前往箱根出席“中正堂”落成揭幕典礼，23日，夫人王文湘因癌病在台北去世，年82岁（1897——1978），29日，举行追思礼拜；9月9日，由参谋总长宋长志陪同，前往圆山“忠烈祠”致祭革命先烈，同日在台北市“国军文艺活动中心”讲《粉碎中共诬蔑抗战史实的阴谋》（同月香港“阿尔泰出版社”将讲词印行单行本，并易名为《中国抗日战争究竟是谁打的？》），18日，与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张宝树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日本，参加日本故首相吉田茂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同月返台；10月，“国父纪念馆”印行《中华伟人画像续辑》一书，由何应钦题端；11月，应“行政院”院长孙运璿之邀，率领国军一级上将国家十项建设参观团，参观桃园国际机场、核能厂等十项建设，团员有顾祝同、黄杰、刘安祺、高魁元（煜辰）等九人。68年3月11日（农历2月13日），值90寿辰，蒋经国“总统”在总统府授予国光勋章，复在祝寿茶会赠予“松柏不调于岁寒”寿屏，《中日文化经济协会》为之编印《云龙契合集》分赠亲友，是书选辑将军珍藏之书信、文件、图片、书画串连而成（书名取自监察院院长子右任“蒋总裁38年3月10日与何应钦书”跋语：“观此一函，益信云龙契合，事非偶然！”）。何氏又以近年所发表之文字、讲词及建议等十数篇，辑印为《岁寒松柏集》（语出蒋经国“总统”寿屏），并赠亲友，18日，“中华战略学会”成立（由陶希圣（汇曾）任理事长），应聘为名誉副会长（名誉会长前“总统”严家淦）；5月，与顾祝同、刘安祺等一行由陆军总司令郝柏村陪同，访问金门、澎湖；8月，以会长身份率领“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中华民国联谊会”代表前往瑞士柯峰，参加1979年“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大会，在大会上以“一个公正无私的世界——孔子大同世界的理想”为题，发表演说，会后访问日内瓦、洛桑、西柏林、汉堡、维也纳、巴黎、伦敦、哥本哈根等城市；9月，离欧返台，返台后鉴于在欧期间我留学生、华侨与中共留学生或代表间有往来，而苦无简本三民主义宣传资料，特将45年讲词《三民主义与育乐两篇补述浅说》印成单行本，分送欧洲华侨社团；12月，出版《整理简笔字提案的回顾与前瞻》一书；10月，奉委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69年1月15日，正式接任，主持“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理事会会议，会议通过救助中南半岛难民，列为今后主要工作，30日，葬夫人于台北县三芝乡北海墓地何氏墓园；10月，陪同日本前首相岸信介前往高雄参观；11月24日，由女丽珠、驻南非大使杨西昆（宿佛）等陪同，前往非洲南非共和国访问10日；12月6日，返回台北。

70年3月，任中国国民党十二届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4月，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贯彻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5月，与顾祝同、彭孟缉、王叔铭、黎玉玺等由参谋总长宋长志陪同访问金门、澎湖；6月，赴美访问考察；8月，离美返台；9月，日本井野株式会社董事长井野健在三

重县上野市捐建“何应钦上将纪念馆”，举行落成及将军半身铜像揭幕典礼，由女丽珠代表参加，并致谢词；10月，印行《八年抗战与台湾光复》第六版，并作自序，同月与李璜（幼樵）、萨孟武（本炎）等对中共五届“人大”委员长叶剑英（沧白）重弹和平滥调（叶公开提出九项“具体政策”俗称“叶九条”），严加驳斥；11月，在台北主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研讨会”，决定建议设立专案小组会同有关单位，策进建立“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以加速完成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工作。71年6月，由刘安祺陪同，飞往澎湖参观防区军经建设；10月13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获“内政部”核准成立，22日主持成立大会，当选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常务委员；11月12日，主持由“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发起，在台北市“国父纪念馆”前广场举行之万民升旗典礼。72年2月，向大陆同胞作春节广播，号召响应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运动，同月至台中主持癸亥春节联合祭祖大典；3月，中国文化大学（创办人张其昀）赠予名誉哲学博士学位，同月主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推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并在会中致词及说明盟歌歌词之意义（盟歌由何应钦作词，李中和作曲，歌词如下：“三民主义，平等自由，耕者有其田，政治民主，民生均富，制度最进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中华民族，团结奋斗。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中华民族，永享自由。”）；10月22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成立一周年，主持大同盟推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指出一年来大同盟发展将近60个海外组织，近400个大陆地区秘密组织及两个洲际组织；11月，前日本首相岸信介米寿，率祝寿庆贺团赴日参加庆贺，团员有谷正纲（叔常）、辜振甫（公亮）、陈履安（陈诚长子）等人，同月返台。73年元旦，在中央广播电台向大陆同胞发表广播祝词，号召：“我大陆十亿同胞，一致参加‘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的行列，就地反抗，就地起义，趁着中共整党斗争之际，掌握大好时机，就掀起全面反共革命推翻中共暴政，以三民主义统一我们的国家！”4月，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编辑委员会”编印《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下册（“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列为《何应钦上将九五寿诞丛书》之一），扉页题“谨以木书恭祝何上将敬公九十晋五华诞。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编辑委员会敬献”；10月，连任“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第二届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74年9月3日，主持在“国父纪念馆”举行之“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对日抗战胜利40周年大会”，出席者有副总统李登辉暨各界人士2000余人。75年4月，突感不适，入院治疗，断为轻微中风，自此缠绵病榻，间有重要典礼，仍抱病出席，自言：“余生平行事，不矜不伐，无愧无怍，但知服膺领袖，忠党爱国，以尽我革命军人之天职，其他非余所计也！”其养生之道为：“食不求饱，起居有节，不过分运动，不过分疏懒，最重要的是心志澹泊，知足常乐，行事要无愧于心。”

第八节 百岁老人的遗憾

生命之钟停止摆动

1990年12月14日，张群走了101年的生命之钟停止了。或许像张群先前自己说的，到了这个年纪，他把死已看得很淡了。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把这把老骨头埋在故乡的土地上。

1889年，张群出生在四川华阳县。而后出了三峡，在天南海北闯天下，有“军人政治家”之誉。

当年张群出蜀，先是在保定上了陆军速成学校。那时候还是清朝天下，新式军校培养出来的青年军人，一反清廷办校的初衷，倒过来成了反清的枪手。张群从陆军速成学校毕业后，由该校考送到日本留学，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在东京的日子，与许多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一样，张群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同盟会，开始反清活动。

张群在日本的几年深造没有白费，动荡的局势很快为这位年轻的军校生提供了机会。

1910年，张群从日本学成归来，正是反清风潮涌动的时刻。张群随即参加了陈英士的沪军都督府暨23师，担任参谋，后任第89团团团长等职，亲历了上海革命。

辛亥革命之后的几年，中国政局反复无常，革命者命运也随之波动。辛亥革命转瞬之间便被袁世凯窃取了，民国形存实亡，上海都督府也很快消失了。张群本已被送往英国留学，却终于半途而废，再度回国参加反袁革命。然而由革命党人发起的讨袁“二次革命”，终于未能恢复共和，袁世凯轻而易举便击败了共和军，大批革命党人被捕被杀，幸存势力被迫流亡国外。张群参加了江苏讨袁军起义，失败后再渡重洋，流亡日本。很快又转赴南洋，在爪哇岛国做教师谋生。

1915年，张群返回上海，参与浙江独立运动。逐渐在军界崭露头角。1917年，张群就任广东大元帅府参军，并任军政府副官长。随后几年，张群往来南北，活跃于军警界，先是担任四川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后来又在河南任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

那些个动乱的年代里，似乎特别钟情于军人出身而又有政治家风范的人。张群在这个背景下步步登高。

北伐军兴，张群做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暨军事委员会委员。1927年，北伐军攻占上海，随军而行的张群被任命为上海特别市市长。待到北伐成功，张群更是官位压身。蒋介石在南京立都后，张群担任了中央政治会议外交委员会委员；随后又任军政部第一任政务次长，兼兵工署署长，并兼同济大学校长。这一年，张群在国民党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随又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在地方事务中开始发挥作用。仅从职位上看，张群已显

出军人政治家的形象。

1933年，张群被任命为湖北省政府主席。

此后，张群又出现在外交界。

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日本在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后，又蚕食华北，接连挑起事端，局势一触即发，异常危急。对日外交遂变得非常令人注目。张群在这一年调任外交部长，更加为国内外瞩目。张群在外交界的作为，尤其是与日本人的交往，为其一生埋下伏笔，此是后话，暂且不说。但直至抗战爆发，张群以外交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兼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身份，在对日决策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地域说，四川这地方对张群来说有特殊的缘份。抗战爆发，可以说是一个契机。

1937年“七七事变”起，日本对中国展开全面侵略，国民党军队大规模溃退，大片国土沦丧，蒋介石政府被迫迁往重庆。

张群先以行政院副院长兼军事委员会行辕主任的身份入川，筹办西迁事宜。从这时直到抗战结束，国民党政治中心就在四川，张群则扮演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角色，地位日益重要。

在这里他曾先后担任、兼任过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兼中央设计局秘书长，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秘书长等职。1940年，任军事委员会成都行辕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广泛参与蒋介石政府的战时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等决策，抗战数年，四川局势的变化对全国影响甚深，其中张群算是可以载入史书的人物。对于他自己来说，四川这一段是在家乡的得意之处。

重庆这一处，对张群来说，是很难忘的，尤其是与共产党打交道的经过。

1945年，中国人民在经过八年苦战之后，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国内局势的变化又成为焦点所在。国共两党面临着新的抉择，这也是全中国人的命运所系。这一年8月，重庆依旧是阴雨绵绵天气，恰如张群的心境。原先国民党政府以为毛泽东不会来重庆，所以在日本投降后的几天内接连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不料毛泽东来了。作为国民党政府一方的谈判代表，张群坐在谈判桌前，颇觉尴尬。他望着对面的周恩来，只得说老实话：“我方在党内并未就谈判做任何讨论，也未准备任何方案与中共谈判。”

重庆谈判，以“双十协定”签订结束，然而张群的谈判还在继续。原来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又在各处对共产党解放区发动了进攻。1945年年底，中共提出停战协定，蒋介石请来了美国特使马歇尔参加谈判。这一回，与张群对面而坐的仍是周恩来。

双方争执激烈，张群强调以恢复铁路交通为先决条件，以便迅速往北方运送国民党军队；周恩来则主张在铁路线上任何一方不运兵，不驻兵。

步出谈判室，众记者蜂涌而上，中央社记者问张群：“先生与中共谈判，可比与日本谈判更难？”

张群丝毫不带刚刚还在进行争论的激烈情绪，平缓地说：“与日谈判，

面对是敌人；如今与周先生，都是自家人，有什么话都好说。”

此次谈判，重庆报界对双方代表反应强烈，认为是国共两方极具魅力的军人政治家的交手。有人对张群说他是军人政治家，张群说，“周恩来先生也是军人出身的政治家。”

双方的谈判到1946年初有了结果。1月5日，双方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5天后，张群和周恩来又在同一份文件上签名，即《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宣布张群、周恩来、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领导军事调处工作，负责调处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监督双方执行停战的情况。然而这个虚幻的调解只是蒋介石的缓兵之计，全面冲突终于不可避免。

不久，忽然报界传闻，张群病重，将赴美就医。

很快，张群被送往上海，几天内又由美国军用专机送往纽约就医。

口称身患癌症的张群，在纽约医院住下后，仍不停留地奔波于上层社会，谒见美国要员，活跃非常。以至后来有人竟猜测他赴美并不是真为了治病，而是另有重任。

张群自己始料不及的是，此一去，在老家的辉煌日子便跟着去了。

1946年年底，张群自感身体复原，原先传说的癌症被美国医生确认为误诊，如此便不用在美国耽误了。随即飞回上海。但此时要入川已是很难了，一方面四川要职已有人接任，蒋介石对张群也另有安排。

1947年，张群被委任行政院院长要职，达到仕途之顶。要说张群，数十年间在军政界担任的要职可谓一打接一打，就是没有当过行政院长，这一回可真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风云人物。张群自己也雄心勃勃，谋图振奋民国。但毕竟蒋家天下已近末日，张群之力岂能挽住历史巨轮？局势每况愈下，国民党内部纷争日益激烈，张群满脑子都是发愁的事。这一年夏天，张群到台湾呆了一段时光，为台湾光复二周年而四处巡视演讲。或许这时他便预感到后半生的归宿了。

行政院长实在难当，张群晋见蒋介石，想回四川去，重温旧日之梦。却被蒋介石斥责了一通。但很快蒋介石自己也保不稳了，随着战局的逆转，地方势力逐渐起来占据上风，发起倒蒋运动，蒋介石几经努力无法挽回败局，只得再次告退政界，回家“养老”。临走，又在各处理下钉子，以确保地位不受冲击。

狼狈出西南

张群被委派回川，做了大权在握的西南军政长官。

站在嘉陵江边，看着滚滚江水哗然而去，他竟找不回几年前叱咤风云时的感觉，此时的四川已由四川省主席邓锡侯把持了，就西南论，西康还有刘文辉，云南则是卢汉，都不是好惹的主。虽说贵州还由谷正纲兄弟掌握，但对西南政局无大影响，因此危局难握啊。

但事已至此，张群也只有勉力而为了。

很快，战场形势便完全转向了中国共产党一方。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突破长江天险，攻克国民政府首都所在地南京，一种末日的感觉很快笼罩了蒋介石政府的上上下下。

22日，蒋介石召集李宗仁、何应钦、张群等在杭州举行秘密会议，决计负隅抵抗。云、贵、川、康等地的国民党残部由西南行政公署长官张群和国防部西北指挥所主任胡宗南负责指挥，谋图再次将西南作为战略大后方，重演抗战时的一幕。

但时光不会流转了。

解放军从四面八方进逼四川，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

1949年的秋天，五星红旗已在天安门上飘扬了，蒋介石仍在西南一隅做最后的顽抗。也许西南对他在心理上是个寄托吧，毕竟在这里与日本人较量了8年呀。

12月8日，蒋介石在成都召开“行政院”紧急会议，部署逃往台湾事宜，同时命令在西昌设立总指挥部，与解放军继续周旋。

在同一时刻，被指派坐镇云南的张群却已成为无用之人。蒋介石对云南省主席卢汉一直放心不下，此时局势危急，自然更得从严掌握，便让老将张群前往，试图对卢汉有所牵制。不料卢汉已决意起义，张群遂被扣留。

12月9日，西南联片起义，卢汉在昆明、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在彭县、西南军政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在雅安，同时宣布滇、康和平解放。卢汉致电刘文辉，要其将蒋介石扣留。电文被蒋介石截获。

10日，蒋介石仓惶乘机逃离成都，往台湾去了。

之后不久，张群也被送往香港，张群在西南的最后惨然一幕，似可看做蒋家王朝的缩影。

蒋介石的影子

说张群是蒋介石的影子，是相当贴切的。

这不，蒋介石刚到台湾落下脚，张群也跟着来了。此时的张群已年过花甲，但在蒋介石的心里，他依然是最有力的帮手。

张群跟着蒋介石在台湾孤岛上尽全力苦心经营着，并时时做反攻大陆、重现当年风光的梦。

1949年的冬天，张群从香港辗转来到台湾，蒋介石正期待他一起共事。在最初的二、三年里，张群先后担任过“总统府资政”、国民党改造委员会中央评议委员、国民党中央设计委员等职。

1953年，是张群重振雄风的日子。是年7月，张群调任由蒋介石兼院长、以训练“反攻”干部为任务的“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到年底，又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长”，终日伴蒋左右，为之出谋划策。

这样的相随，对于蒋介石和张群来说，都已是习惯中的事了。从头说起，可以追溯到清宣统年间。

那还是在日本。

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里，两人便结下了同窗之谊。只是蒋介石未能读完学业便离开了，张群则正经拿了毕业文凭。之后二人在数十年的交往中，张群与蒋介石结下性命之交。

当年武昌起义时，张群和蒋介石同时效力于上海都督陈英士部下。那个冬天，对于二人来说都是难忘的。

一天夜里，张群敲开了蒋介石的办公室，因一项重要机密与蒋商谈，二人久议不决，只是凝神沉思。北风刺骨、寒湿异常，蒋、张竟浑然不觉，一直到东方发白，蒋介石一言不答，张群也不再问，竟是呆坐了一夜。

之后，凡是蒋介石遇有危难时，必有张群相伴左右。

1927年秋天，在各路力量压迫之下，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

10月，蒋介石满脸阴郁来到日本，同行的是张群。经由张群牵线，蒋介石在日本受到黑社会领袖头山满的热情款待，头山满还特地向工业巨头川野长成借了一幢大房子，以供蒋介石使用。

这以后，每当蒋家王朝处于危急时刻，张群总是被委以重任。

比方说1948年的“行宪国大”。当时国统区和国民党内部非常混乱，蒋介石在行宪大会上遭受了大的失败。由于先期召开的“制宪大会”规定，总统的权力要受到立法院的严格限制，这样总统便只是名义上的国家之首。这样蒋介石声言决不竞选总统，而愿意担任正副总统之外的其他任何职责，也就是说要当实权在握的行政院院长。

张群对此一目了然，毕竟是数十年交情呀。张群首倡，拉来721人签名，向大会提出了《请制定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案》，主张“总统在动乱时期，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得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为紧急处分，不受宪法第39条或43条所规定程序之限制。”这个提案帮了蒋介石的大忙，因此在此案通过之后，蒋介石也欣然食言，竞选总统，并以2430票对269票击败陪选的国民党元老居正。能有这个结果，张群之功是不可没的。

这一年年底，蒋介石的位子又不稳了。辽沈、平津、淮海战役对蒋介石次次沉重打击，蒋军嫡系主力部队损失惨重，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势力联合其他反蒋力量，迫蒋引退。

12月31日，旧年的最后一天，蒋介石官邸集聚了众多的国民党要员，李宗仁、孙科等俱在。蒋介石阴沉着脸，向在坐40多位大员征询对自己下野的意见，或许他指望在年末的最后一瞬挽回局面，好有个吉利的来年，结果却令他大失所望，众人多表示蒋介石应离职。不得已，在第二天的元旦文告中，蒋介石只好说“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公意是从。”

话虽这么说，真要离去，终归有些不舍。

新年过后，蒋介石又招来主要谋士张群、孙科、张治中诸人，商议对策。完后张群再次出马，飞往汉口、长沙，与此次倒蒋的头面人物白崇禧、程潜会谈，传出蒋的口风“余欲引退，必由自我主动。”也就是说，引退与否由自己做主，而不是白、程之人所能逼迫的。

张群后来做了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和西南军政长官，也是为蒋介石引退而走的一步棋，直到后来在云南被卢汉扣留，在大陆的影子历史才算完结。

到台湾的头几年，张群似较闲散。但蒋介石对张群一直用心颇重。张群以谋士身份出入左右，成为蒋介石的幕僚长。

台对日交涉的主角

1952年秋天，蒋介石与日本签订了《中日和平条约》，此事对于身处孤岛的蒋介石来说，可谓头等大事了。8月2日，就在条约签订的当天，张群以蒋介石私人秘书的身份飞赴日本。在日本期间，他与日本战后杰出首相吉田茂作了3个小时的长谈，完成了两件事，一是为董显光出任驻日大使铺平了道路，二是将比本原定的首任驻台大使太田一郎改为芳泽芳吉，芳泽芳吉是张群的老朋友。

那时的日本舆论，对条约及张群访日的反应都很是冷淡，但张群作此次重要访问，对蒋介石和他本人来说都是不寻常的，后来张群曾长期主持对日外交，俨然是“日本通”。如果上溯几十年，三十年代与日谈判时或者就已奠定了地位。

张群在日本呆了三个月之久，与日、美外交人士接触广泛，对日台贸易大加鼓动，一面又大力阻止日本与大陆的经济往来。这时在台湾成立了“中日文化经济协会”，张群出任会长。10月份，日本外务省及通商产业省主持的“远东经济研究所”，在香港拉起了“日华经济协会”，张群起了幕后策划作用。

现在当了“总统府”的秘书长，于张群谋士的天性似更合适些。

到五十年代中期，又逢国民党台湾当局大选，以张群的资历与威望，当选“副总统”应在预料之中，一时朝野舆论皆看好张群，然而张群终究没有参加竞选，仍做他的秘书长。个中缘由，现在已难以断定了，但有两点传闻说得有些道理。一是蒋介石原是有心要提张群上来的，后来权衡再三，从提携后进和来日江山考虑，才决定由他人替代了张群。再有原因就涉及到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到台湾以后，张群与同样亲美的王世杰、吴国桢关系甚密，这样便在对美问题上与陈诚、蒋经国等人发生矛盾。后来王世杰被从“总统府秘书长”的位子上拉下来，张群很为他不平，曾在宋美龄面前为王世杰申辩，但未有结果。当时的美国驻台湾大使兰金也支持张群反对蒋经国。蒋介石面对这重重矛盾，思虑再三，指使原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对吴国桢大加攻击，以示对张群等人的警告。此举引起张群不满，因而退出了原定参加的“副

总统”选举。

不管怎么说，这一阵躁动已足以说明张群在台湾的地位了。这以后。有一阵子传闻张群要做“行政院长”了，也未能成为事实。这时的张群已是古稀老人了，年龄因素影响了张群的仕途，但作为蒋介石最重要的谋士，张群一直发挥着别人难以起到的作用。

他在外交界的影响尤其大，被舆论界称为“台湾对外政策的监护人”。

比较起来，张群对日态度一直影响着蒋介石的决策，与日交往的重大活动，大抵都由张群出马。1962年，“世界道德重整亚洲大会中心”揭幕典礼在日本举行，张群以“台湾道德重整分会”代表的身份率团参加，而他此时仍是“总统府秘书长”，规格之高是明见的，去日本的目的其实是在于劝导日本政府不要对中国大陆存有幻想，以继续全力支持台湾当局为是。但效果不大，日中往来已成为广泛的呼声，张群及台湾当局的影响已难以发挥作用。

这以后，台湾与日本的关系愈益走向低潮。但由于蒋介石与张群的坚持，日台关系一直维系下来。

张群对台湾外交的决策延续了约30年，一直到1975年蒋介石死去，方告一段落。

这一年蒋家王朝实行换班制，由蒋介石的长公子蒋经国担当“总统”职位。到这时，担任“总统府秘书长”达30年之久的张群才解除了职务，这一年他已经是83岁的老人了，按理说，到了这把年纪，该是归家养老的时候了，张群却不大甘于寂寞。

在这一年之前，日本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张群一直揪心的日台关系发生了重大转折。此时日台外交情形已非常黯淡，朝野分歧很大。蒋经国在这一年下决心走出父亲的阴影，断绝与日交往。张群象过去一样竭力对台湾当局“外交”施加影响，坚决反对中断日台交往。但这一次蒋经国去意已决，况且张群的话对蒋经国原本就没多大影响，日台交往最终结束了。

虽说蒋介石已去，但他在台湾政坛的余荫仍在发挥作用，张群或可视为蒋介石活着的影子。在辞去“总统府秘书长”之后，张群仍在台湾外交界举足轻重，他以最老资格的“资政”身份，对任“外交部长”的门徒沈昌焕施加影响，这种日子一直到沈昌焕1979年下台为止。

这以后，张群高寿已逾90了，一种恬淡的心境笼罩了他。

百年人生

南国的3月，已遍染春色。

张群心境很好，他在院子里走走停停，触摸这些久违的花朵草木。这么多年，张群在院子里日行，3000步，健朗如故，近来却显然觉着有些疲倦了，去年（1986年）患白内障，动了两次手术，将息了差不多一年，终于可以下地走走了。走累了，他想要在路边的小凳上歇歇脚，不料坐歪了，跌了下来，

顿时宅子里一阵忙乱。急急忙忙送往医院，透视检查，折腾许久，医生说：坐骨受伤，幸未骨折，尚需留院治疗。这样许多人悬起的心才算落了下來，毕竟张群已是近百岁的人了。

依照旧历的算法，到1987年，他该是99岁的人了。这天是3月11日，距张群5月9日的生日不到两个月，平安的消息使许多预备祝寿的人高兴。

这天精神稍好，已将近生日了，张群坐在“荣民总医院”病房宽大的靠椅上，面对台北《中央时报》记者，依然如当年一样从容，“我是主张不做寿、也不避寿的。今年，我还是不避寿，但是，却不能象往年那样坐在家里接待祝寿的客人，恐怕要‘避’在医院里过寿了，不过，我不是来医院避寿的，的确是在调养。”

寿典在紧锣密鼓筹备着……

张群却总有一种落寞。

他还记得30年前，夫妻同庆70寿诞的情景。那种温馨是永不再有了。那时蒋介石还亲撰了“松柏同春”寿屏一幅相赠，“副总统”陈诚也题词祝贺。张群夫妇只接了这份礼，其他一概挡驾，他写了谢帖，“惠而好我，已详稠叠之云情，德以爱人，尚冀高明之曲谅，谨铭厚谊，秦壁嘉珍，肃罄谢忱。”这年的生日，过得有些清冷。张群的寓所和秘书长办公室都没有祝寿的人去，这点正合了张群夫妇的清雅。

张群夫妇是国民党政界要员中惹人敬慕的。

张群始终怀念共度大半生的夫人马育英。

那是在兵荒马乱的上海，张群刚从日本归来，便与同龄人马育英走到了一起。说起来，张夫人还年长四个月，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娴雅端庄。张群相貌英俊，是公认的美男子，风度潇洒，所看中夫人的便是她非凡的美德。

许多年后，张群在追述夫人时说：“结婚以后，相励于艰苦之际，相慰于忧患之时，余从政数十年中，如随在任所，除操作家务，暨努力于宗教事之外，对用人行政，从不过问。然于操身处世、存心立命之本，则规诫时加，不徒为贤妻，实亦为诤友。”

伴随张群左右的许多人都记得张群夫妇的准则。张夫人自幼在教会学校读书，后又留学美、日，知识渊博，在与张群相伴的60多年中，尽管张群长期居于要位，她却从不过问政治，朋友来了，也只闲话家常，一说到政事，必定回避。

台北新闻界甚至将张群的姻缘视作一种典范。张群是四川人，夫人是江苏人，一个说四川话，一个讲上海话，往日在家里，各人讲自己的方言，互相都听得懂，却几十年不肯改变乡音。还说张家的餐桌也有别于他人，比方四川人喜欢吃辣椒，张群也是，夫人却是沪上口味，与辣绝缘，这样他家的餐桌上常常出现一半辣、一半不辣的菜。

张群曾愉快地谈起过自己63年的婚姻生活，他说从初恋到结婚是恋爱；有了孩子，夫妻间除了爱，又增添了恩情，这时是恩爱；待孩子抚养成人，

各自独立而去，老夫老妻彼此怜惜，可说是怜爱。

张群刚结婚时，长年存外征战，夫妻间自然是别离多于团聚，忧患多于安乐。待到晚年，张群格外珍惜这份恩爱。那时张夫人身体欠安，经常病卧在床。那些时间里，张群虽然公务缠身，却总是推脱掉晚间应酬，以腾出时间陪伴病卧的老伴。每天，张群必定详问夫人病情，闲时总见他陪夫人坐着，聊些家常或是相对祈祷。见到两位老人洋溢着祥和怜爱的笑脸，使人感到由衷的钦羨。

张群一生的婚恋应该说比较专一，寻花拈草之事并非很多。值得一提的是，张曾与当时中国银行的“行花”张肖梅有过暧昧关系。张肖梅与张嘉之弟张嘉铸结婚后，双方搭成默契，谁也不干涉对方的婚外恋，各自可以勾搭朋友。据说，张肖梅与其夫之哥张嘉也有过婚外恋，张群的下属也曾提及张群与张肖梅有所来往。抗战初期，张群住在重庆德安里，家里没有随同。而张肖梅则住在楼下，张肖梅的丈夫也长期不在家。张群与张肖梅也就经常在一块过起夫妻般的生活来。每当张群下楼去轻敲张肖梅的房门时，副官们都马上避开，深怕遭到张群的训斥。后来，张群的家属来到重庆。四川省建设厅长何北衡为博取张群的欢心，为张肖梅弄了房子，住在张群住宅的对面，为他们提供方便。张肖梅与张群勾搭，仅仅是权贵结合而已。蒋介石对此事也有所闻，因对张群的器重，一直装作不知。

张群夫妇生有子女4人，两男两女。长女小咪（小名），天资聪明，十多岁时患伤寒病死于上海，次女张兰，从小就入教会学校就读。1932年以家庭无温暖为由，突然间离家出走。走时留下书信一封，信中提及不愿再住在奴隶式的家庭。一个人去了香港。几个月后，张群通过朋友关系才将女儿从香港劝说回来，张兰在香港时，结识了广东华侨刘毓棠，两人相恋进而结为夫妻。抗战结束后，刘以裙带关系，一度当过行政院参事。张兰曾经留学美国学习音乐。刘毓棠是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系博士，曾是首任台湾驻新西兰大使，现在美国麦金诺大学任政治系主任兼教授。

张群的长子张继正。抗战开始时，张群为其安全送他去欧洲留学，后来因欧战爆发，又去美国康奈尔大学。继正原打算留学学机械，因父亲认为50年内中国机械科学不可能发达，于是改学建筑，获美国工程学博士。归国后在四川大学当过教授；抗战后期，响应国民政府的号召，毅然从军入伍。抗战后，汉口市府曾想通过张群秘书长关系，任命张继正为汉口市工务局长，目的是为讨好时任行政院长的张群。张群为了在蒋介石面前标明“清流”，没有同意此事。到了台湾后，张继正任过台湾美援运用委员会处长，助理秘书长及秘书长，1965年任台湾“经济部次长”。次子张继忠，因家人反对其恋爱，被家人送往澳大利亚雪梨大学留学，攻读电机工程，获得学士学位，回台湾原任电力公司工程师，后改学神学，改任浸礼会牧师。

在1971年，张群夫妇刚度过钻石婚，有友人问及他夫妻相处的秘诀，张群稍加考虑，道出了四条：敬、爱、谅、助。

那些个离别的日子，对年迈的张群真是个难关。1974年的夏天，张群爱子张继忠因病住进医院，张夫人得知后急火攻心，病情陡然加重，立即被送往医院，却总挂念着刚做手术的儿子。7月7日，张继忠坐在轮椅里来看望母亲，张夫人见了儿子，情绪很好，对儿子叮嘱再三。

下午，两位老人在病榻上相对祈祷，平静得很。张夫人在夫婿陪伴下含笑而终。

张群从此凭添了许多的孤寂，那份美满、幸福的婚姻如今总使他倍感依恋。

时光又过了13个寒暑，张群已要走进百岁了。每年的生日，他总要被人问起长寿的事，这时张群也总有妙言相答。1990年他还写了四句话：“有容量乃大，无病健而康，报国当尽瘁，敬神日月长。”

说起来，张群的豁达常为人所称道。当年在上海任市长时，曾有小报说张群被人暗杀，立即有大报为其正名，说他一生“至公至诚，从不雇佣保镖”。相传张群刚到上海任职时，借居吕班路一小屋，友人郑某劝其乔迁，张群告以薪俸太低，无力置宅。郑某遂将自己在亚尔培路的房屋出让，议定给价二万元，不料时隔三月，张群仍是两袖清风，无力付款，后来只好改为分期偿清，才勉强了结了此事。刚到台湾时，张群公事较少，却依然平心静气做些自述，忆起戎马和宦宦生涯，自乐其生。

有关长寿之道，张群自有主张。他曾写了《不老歌》，述其长寿之道：“起行早，睡得好，七分饱，常跑跑，多笑笑，莫烦恼，永不老。”

张群还提倡所谓“五养箴”的养生之道。“五养”是：保持规律生活，愉快心情和勤劳习惯的“养身”；培养虔诚信仰、淡泊胸怀、坚毅意志和永恒热忱的“养心”；冷静头脑、客观态度、求知精神和实践力行的“养慧”；谦抑应世、宽恕待人、忍耐自制、协和各众的“养量”；忠诚负责、服务牺牲的“养望”。

张群有严格的生活习惯，每日按时起居，从不紊乱；一日两餐，以新鲜蔬菜、水果为主食；坚持每天在居所的院子里作3000步散步。

张群的百龄大寿在海峡两岸引起许多人的关心。

1987年5月9日这天，张群收到许多感人的贺电。早年张群曾在上海协办职业教育，这一日，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胡厥文，副理事长王良仲经中国驻美使馆致电张群：“欣逢期颐大庆，缅怀昔年公与任老协力兴办职业教育，工商专校桃李满天下，弥增景仰，敬电祝贺。”

民革中央主席屈武，副主席朱学范、斐昌会、钱昌照、郑洞国当年都是张群的老友，此日也隔海遥祝。电文有：“敬贺百岁大庆，更祈康泰长寿”等。

在台北，张群“百龄大庆”的寿堂设在三军军官俱乐部，由谢东闽主持。以“行政院长”俞国华为首的头面人物都送来了寿屏；国民党中央送来了一本祝寿画册，画册是由台湾12位大画家合作挥毫完成的。

过了百岁大寿，张群依然健康。他甚至想着要达到“双甲子”，但同时他的许多爱好都淡了。张群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平生所嗜好的便是书画，但现在他将多年来所收集的名画好书，都捐给了台湾故宫博物院。

过了百岁的老人，可以说四处都会招来敬爱之情，数十年活跃于政坛的张群，到了这个岁数更是引人瞩目，况且直到最后时日，他仍然有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影响力。这样，往后的生日，他便愈受到更多的庆贺。台湾和大陆的舆论每到这时，总会有张群的消息传来。

1988年5月9日，张群在台北过了99岁的生日，按照农历的算法是真正100岁了。台湾要员李登辉、倪文亚、孔德承等人到张群寓所专程庆贺。这一天，张群的老朋友，九旬老人张学良也前往祝贺，两位久经历史风云的老人聚首一处，其感慨怕是常人难以理解的。

看上去张群已老态龙钟了，昔日美男子的风采已难再寻，他已经无力像年前那样穿过花园小径，只是坐在轮椅上，在阳光下看看报纸或是散淡地注视着面前的绿色。

14日上午，正在高雄地区巡视的台湾“总统”李登辉闻讯张群去世，立即致电致哀，台湾上层头面人物大多参加了张群的葬礼。

台湾中央社电：

今天上午逝世的总统府资政张群，在政治哲学方面，是国父信徒；在人生哲学方面，则为基督教信徒；政治理论，兼采中国儒、法两家宗旨，虽出身军事学校，然精勤学问，文武兼长，对于中国历代之治乱得失，了如指掌；并参证欧美现代政治理论及实绩，体察中国国情，融会贯通，而不囿于偏局之见；显示识见高远，襟怀恢宏，具有政治家风范。

在岛外，张群的死依然引起了人们的关心。或许出于他过去曾做的一切，或是他仍然存留的影响力，也许只因他是个百龄老人。

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专门致电哀悼。法新社电：“台湾对外政策监护者去世。”

第十一章

华盛顿、莫斯科暗中“调牌”，危疑孤岛出现“新机”。蒋介石拍板定案，台湾、苏联密谋“反攻大陆”

第一节 孤岛“新机”

蒋介石再提“反攻大陆”

1967年，“文革”正值高潮，整个大陆陷于无政府状态。台湾当局又以为碰到了反攻机会。于是又提出建立“讨毛救国联合阵线”。蒋介石认为自“8·23”炮战以来，敌我形势发生根本变化，中共党内“对共产主义丧失了信心”，对毛泽东思想“由失望而怀疑”，“更由分歧而反抗”。“在共产主义破产的过程中，毛泽东思想首先堕入了幻灭的绝境”，毛政权也发生了“根本动摇”。因此，蒋介石发出叫嚣：

一切反毛的力量，在三民主义的思想与信仰之下联合起来。

1967年3月29日，蒋介石向青年发出“训示”：成立“讨毛救国联合阵线”。

蒋介石还要求大陆“反毛”力量组成“讨毛救国联军”，扩大“讨毛救国的青年运动”，并保持与台湾国民党的“密切联系”，“齐集于国父三民主义青天白日满天红国旗之下，同仇敌忾，消灭毛泽东”。

上述言论不过是蒋介石的梦呓而已，不仅大陆没有“反毛”力量的响应，就连台湾的青年人也无人问津此“反攻”机构。蒋介石不管这些，他认真地在台大直战争学院召集了三次军事会议，听取各方报告。

来自各方的情报，使蒋介石感到失望，他最后还是以不变应万变，军事行动不了了之。据当时参加会议的一位台湾高级将领说，蒋介石打消军事反攻念头有三：一是大陆已于1964年10月试爆原子弹成功；二是“文革”虽导致全国大乱，但人民解放军并无素乱的迹象；三是约翰逊政府还是根本上不支持台湾的反攻计划。上述三点，蒋介石最为介意的是中共试爆原子弹成功。据悉，蒋介石在最后一次军事会议结束时，长长地叹一口气：“完了！我们反攻大陆已没希望了。”

东京“使馆”急电台北

绝望中的蒋介石又面临着一种新的“机遇”。这种“机遇”如此唐突，就连日夜企望“反攻大陆”的蒋介石也左右为难。1968年10月11日，东京

的夜空阴气沉沉。

随着暮色的加深，位于市区的东京外籍记者俱乐部也渐渐地热闹了起来。

来自世界各地的“无冕之王”，云集在这块纯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尽情地放松、潇洒。

大约 10 时许，正在和路透社驻东京记者卡夫聊天的台湾驻日本“大使馆”新闻参事卢为，发现一位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的西方记者挽着一位金发女郎径直向他走来。

经来者自我介绍，卢为得知他是英国《伦敦晚报》记者，名叫维克托·路易斯，身旁的女士是他的夫人珍妮佛。几句闲话后，路易斯便开门见山地表示要访问台湾。

进一步深谈，卢为知道来者持的是苏联护照。他告诉路易斯，因为他的身份敏感，必需报告台北。

卢为常到外籍记者俱乐部，每次都有很多外国记者找他聊天，包括苏联塔斯社和真理报记者在内。路易斯以记者身分出现找他，卢为并不意外，这很有可能就是苏联驻东京记者提供的消息。

卢为离开记者俱乐部后，立即通过有关途径打听路易斯的来路。获得的消息表明，他的背景和苏联克格勃（KGB）有关，并有直通苏联高层的关系。

当时，台湾的外交处境已出现警讯。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办事处在东京设有联络事务所，日本最具规模的报纸《朝日》和《读卖新闻》常常刊登廖承志的消息，并呼吁日中关系正常化。卢为认为，路易斯的出现，或许可以给困境中的台湾外交带来某种转机，于是向台驻日“大使”陈之迈积极进言，希望促成当局同意路易斯的要求。

12 日，陈之迈通过台“外交部”拍电给台“新闻局长”魏景蒙说，伦敦晚报记者维克托·路易斯（即魏日后公开日记中代号为“王平”的人），目前正在东京进行访问，希望有机会访问台湾，就各项问题交换意见。

电报还称“外交部长”魏道明同意访问，并以便条向蒋经国的幕僚黄少谷提及此事。目前还无法与“国安局长”周中峰联络上。

与时台湾高层对路易斯了解的情况大概如下：

路易斯，英籍妻子。

莫斯科语文学院法律系学生，曾任职巴西、新西兰驻莫斯科大使馆，因政治理由受劳改 9 年，1956 年获释离开反斯大林监狱。担任 NBC 及纽约时报记者，以及伦敦晚报记者。

认识杰克·安德森，并由其介绍进入 HHH。

与赫鲁晓夫不和，抢到赫鲁晓夫下台的新闻。

访问台北后他将前往柬埔寨，并赴缅甸、达兰沙拉、坦桑尼亚、肯尼亚及其他国家，然后返回莫斯科。

健谈、机警、常识丰富。

他曾说，莫斯科共党干部曾听他谈话，对他的看法表示同感，认为台湾应与莫斯科接触。

他希望知道台湾对另一边（大陆）的情势有何看法，尤其对打倒毛泽东的看法，并希望知道台湾对与莫斯科的关系有何建议。

北京曾两度拒绝发给他签证，现在大陆欢迎美国人的程度甚于欢迎苏联人。希望能见到经国先生或总统，讨论这些政策。

9月号的新闻周刊《潜望镜》专栏中提到路易斯的名字，说他提早一天以上抢到苏联入侵捷克的新闻。可以猜测，路易斯想证明他在苏联官员面前很吃得开。

路易斯说，第三国际已经行不通，共产主义就像基督教一样，会分裂成很多流派。现在每个共产国家或各个国家的共产党都有各自的想法。例如在英国，共产党就认为不必推翻女皇。

路易斯进行这次访问的目的，从表面上是想利用此行为《伦敦晚报》写稿和用机密方式向苏联党政官员提出某些看法。

但他真正的想法是要“探明台湾对毛泽东之后的中国情势有何看法，并探明是否可能与苏联重修旧好，如果可以，如何修好？”

接到电报后，魏景蒙觉得当时有几个难题要解决，一是怎么和美国人说这件事。依当时国情又如何说得清楚？会不会引起猜疑？二是蒋经国的夫人蒋方良是俄国人，会不会因为有这层来往，转过来影响到蒋经国仕途和当局政策，于公于私都难办。

蒋氏父子重托魏景蒙

魏景蒙与蒋经国几十年相处，关系与感情都很特殊。魏的女儿魏小蒙在日后披露其父记载路易斯访台全部经过的日记《王平档案》时，曾有如下说明：

从家父的日记和过去多年来得诸家父的警，我看到家父和经国先生间有各式各样的来往，可以感觉到他们两人的感情非常深厚。有很多小故事我可以叙述一下。比方说，家父在中央社社长任年曾因公到印尼去，在那里得了副伤寒。回来后住进荣总治病，经国先生得知消息，立刻赶到医院看望家父，还殷殷探问病情。据我了解，经国先生虽然很关怀属下，但专程到医院探望部下的例子还不多。

有一次我陪家父到欧洲旅行。在罗马许愿池前，家父丢了一枚硬币许愿，当时家父没告诉我他许了什么愿。也是看到日记才知道当时经国先生眼疾开刀，家父不但心急，还为经国先生能够早日康复许愿。这才想起，家父

在那些日子里几乎每天都打长途电话回台北，探问经国先生的病情。

在两人交往过程中，有好长一段日子，差不多每个周末，家父都陪着经国先生到各处视察。接着更有一段日子，前后大概有两三年，经国先生常常邀家父前去谈话，为此，家父得随身佩着一个呼叫器，随时待命。

经国先生晚年有失眠的毛病，睡不着的时候就想到找家父聊天，因此，两人也就无所不谈。从家父的日记里也可印证家父对经国先生了解很深，包括家事和国事，而家父对经国先生的关心更情见乎辞，很怜惜经国先生的治国之苦。父亲还常常说，经国先生做这个总统是没办法不干，苦得不得了。

经国先生唯一的女公子蒋孝章住在旧金山，最得经国先生疼爱，但是孝章很少回来。我记得有一次家父出国，还特别到旧金山跑一趟，代经国先生传话给蒋孝章，要她抽空回去看看父亲。从这件事上，我觉得，经国先生满孤独的。

家父与经国先生几十年相处，关系与感情都很特殊。是君臣亦是密友。以家父传统式读书人的风格，他忠心耿耿、任劳任怨的为总统服务；更以诚恳爱护的态度对待密友。他两位的友谊情操，恐怕不是外人能体会的。

汪道渊先生当时和沈之岳先生与家父三人，是国策顾问中必须每周有一天在“总统府”上班的人。汪先生曾告诉我，家父过世后，有好一阵子没人敢在经国先生跟前提魏景蒙的名字，因为那就会见到经国先生满眼含泪，使人心痛。

有很多人认为魏景蒙性情开朗，是一位喜欢开玩笑甚至“大而化之”的人。但魏小蒙却认为“从他留下来长达20年日记可以看出，家父其实是一位做事相当严谨的人，他写字本来就很讲究，并以书法知名。日记里的字亦复如此，小而有体，记事则要言不繁。日记本有点像今天的小记事本，活页装订，每个月订成一本，取其随手方便，且随时可记。”

至于魏景蒙对蒋家的忠诚，魏小蒙有如下披露：

我觉得家父最了不起的一点就是他能够化敌为友。在他的记者生涯当中，特别是抗战在重庆负责新闻检查工作期间，家父一度是外国记者最恨的人。整天叫他们不要登这个不要登那个。许多国际知名的记者包括白修德等，先是和家父争吵不休，到最后都受到家父与人为善的诚意和工作原则感动，都成为他的好朋友。他们发稿时，家父认为，那个不能登，就是不能登；改了能登的，也都依着家父的意思。应付这些大牌记者，很不容易，但家父做到了。不但改善了政府的公共关系，也维护了国家形象。

这批在重庆结识的记者几十年来还是念念不忘吉米·魏——家父的英文名字，只要到台湾采访一定先找到他叙旧。家父到台湾后和新闻工作一直有缘，外国记者来得更多，从帮忙安排采访“总统”到陪他们吃碗牛肉面，不一而足。有关家父的口碑，在国际新闻圈更是口耳相传，无形中又为国家做

了不少工作。

韩战时，家父奉派到美方的共军战俘营采访，并伺机策应开导战俘。但那时在战俘营里情势混乱，许多战俘在恐惧中不敢表态，有的反过来会因此杀人，随时都可能发生不测。但家父毫不畏惧，干得有声有色。

还有就是家父以一介记者开辟了我和马来西亚的实际关系。早年马来西亚对我们很不友善，政府有心改善但找不到管道接触。后来想到家父，他就以记者身分申请采访总理东姑拉曼。记得当时家父先到新加坡等消息，大概拖了两三个月，终于见到了东姑拉曼，打开了我国和马来西亚高层接触的管道。东姑拉曼从总理任上下来，还来过台湾访问。

这趟由于等得太久，家父为了节省开销，不得不省吃俭用，还在旅馆里自己洗内衣内裤，这是他平常在家里不会做的。

这些事情，一方面是家父的爱国的情操支持他，一方面也是老“总统”和蒋经国信任他。

在魏景蒙从政生涯中，最得蒋氏父子信任的还是这次秘密接触路易斯，这是一件极敏感的工作，不是一般人的能耐所能济事，非但要能全面掌握情况，更要能恰如其分，准确地传达来往讯息。若非绝对信任，岂能托付？

蒋介石要求专人接待

路易斯来台之前，国际间对他就有很多传言。美国和英国当局都认为他是苏联间谍，可他娶的却是英国太太，他不但在英国有产业，而且和美国电视公司有生意来往。对于一个一时连身分都无法证实的苏联人，台湾如果准其访问，事后将如何向美国解说？又该由谁出面来说？

经过反复考虑，蒋介石拿定主意，同意路易斯来访。于是蒋经国告知魏景蒙最高当局的决定，并要魏找一个可靠的人接待。他们两位讲话时“行政院新闻局”联络室副主任罗启就在旁边，魏景蒙就向蒋经国推荐由罗启来负责。

蒋经国特别交代，有关事宜绝不能走漏风声。魏景蒙建议，既让对方以记者身分入境，就应该让人到处走走，参观、采访，在接待上要有相应的配合，不留痕迹。

10月21日，魏景蒙接到卢为来电，说路易斯将在第二天搭乘华航班机来台，11时45分抵达。卢还说，路易斯对“中苏”关系有“偏见”，他曾送他一本《苏俄在中国》让他仔细阅读，这次路易斯提出要看“故宫博物院、农经、匪情”。

魏立即将此事告知蒋经国、周中峰以及“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叶翔之。当天下午，魏告诉卢，当局不会让路易斯参观军事，也不会让他观光。叶翔之在必要时会派“专家”在国际问题研究所与他会谈。在这次通话中，卢为

说他晚上将在东京与路易斯晤谈，并建议第二天与路易斯一起回台，魏对后者给予回绝。

第二天上午，卢为再次来电报告：路易斯认为台湾应派代表到莫斯科，此事他可以帮忙。看了《苏俄在中国》后，路易斯认为书中对苏联不公平，他称自己绝对未在苏联受迫害，他希望澄清。

路易斯在台大发名片

10月22日，罗启准时到机场迎接路易斯。初次见面，这位“密使”给罗的印象很好。路易斯高约5 10时，45岁以下，长得不错，戴眼镜，从外形看来有点像大学教授，很斯文。以苏联人而言，英语流利。他说，他的英国太太目前在东京，将比他先回到莫斯科。他将前往东亚旅行。

路易斯来台前，卢为从东京传话曾说，路易斯希望在台湾不要太曝光。但没有想到他一到旅馆逢人就大发名片，自我介绍说他是莫斯科来的。

尽管台湾做了若干安排，但他们不急着把日程表拿出来，想看看路易斯会提出什么要求，到底是什么路数，有什么能耐。

用毕午饭，罗启用征询的口气说：“下午就可以安排和魏局长见面。”

路易斯问：“卢为告诉我，魏局长很资深，和高层关系很深？”

罗启答：“魏局长可以参加内阁会谈。他也是从事新闻工作出身的。”

问：“魏局长每天都能见到蒋介石？”

答：“我不能确定，你有什么事吗？”

魏景蒙首会路易斯

22日下午3点半，魏景蒙和路易斯首次会晤。

路易斯性子有很急，初坐定木就急着想见人。两人寒暄不到一分钟，路易斯又开始沉不住气了，说要见蒋介石和蒋经国，并且声明要谈的话题很严肃。魏景蒙不立即作出结论，只说一定会为他转报、代他联系。

魏在会晤中说：“我们过去与苏联合作有过惨痛经验。我们不想把我们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他国。也不想其他国家把他们的意以形态强加于我们。”

路易斯说：“那是过去的老政权。苏联现在是个新而年轻的国家，台湾应该忘掉过去那些不好的事情。在莫斯科，仍然有人认为，毛泽东可以救得起来，但其他人不作此想。”

路易斯还说，虽然他不是苏联政府派来的，但至少他可以传话，以发展成大使对大使级的会谈，例如说在南美。或者台湾可以开始在莫斯科派驻贸易代表或新闻记者，台湾甚或可以开始运送许多珍宝到莫斯科展览。

接着，路易斯再次强调能与蒋经国晤谈几分钟，并希望能与蒋合拍几张照片，以在返回莫斯科时证明自己的权威。

路易斯还问：“两个中国政策能否使台湾高兴。”

魏答：“不行。因为中国人不希望中国长久分裂。”

魏的感觉是，苏联有个计划，“希望在毛泽东覆亡后有一个由他们操纵的中国，另一个中国由国民政府统治。”

路易斯认为美国和苏联有能力占领中国大陆，也许还有日本？但最合理的是以前与苏联有过关系的“中华民国”。他认为，当此苏联明确改变对北京的政策时，苏联与“中华民国”良好相处是合理的。他以捷克事件为例说，此事显示苏联真正的本质。他说，这都是苏联大使之过，因为他对捷克情势做了不完整的报告。他企图让魏景蒙相信，“苏联对盟邦非常宽大，这就是毛泽东和捷克能够不听命于莫斯科之故。”

路易斯还透露，他与苏联高层很熟，当他不在国内时，他的话当局更听得进。

魏问：“北京与莫斯科决裂的原因是什么？”

路攻击说：“赫鲁晓夫在北京一处海滩和毛会晤时，毛泽东问赫，苏联是否敢与美国开战（他猜毛泽东所指的是联合国），而这就是双方决裂的开始，因为对莫斯科而言，这种想法太牵强了，毕竟苏联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背景仍属于欧洲，而毛泽东的则太过于自我色彩或太具中国色彩。

“苏联不会开战，对赫鲁晓夫来说，战争是个无法想象的困难字眼。

“中华民国没有理由担心与苏联合作，毕竟这样对国民党不会有任何伤害。”

魏景蒙把“自由中国人民”对苏联的感觉告诉了路易斯，并说，双方有加强了解的必要。魏表达了台湾“解救同胞”的决心，并告诉他，国民党在大陆内部有自己的人。他似乎表示，台湾不是非信任他和苏联不可，但双方之间若有较佳关系，对世界有关各方面都有益。路易斯谈到两个中国时，魏想起了 ott Neuden，认为苏联将在西伯利亚附近制造一个傀儡中国，“自由中国”则由南方回到大陆。

会晤至 5 点半结束。从讲话内容研判，魏景蒙感到，路易斯应有管道直通苏联高层，而且有意拉拢台湾和莫斯科接触。

晚上，罗启再和路易斯吃饭，他问罗是不是国民党员，吃饭谁付帐，是不是蒋介石？后来，路易斯没事就拿这种问题开个玩笑。接着，他又提了两个让罗启难答的问题：一是国民党当初为什么要放弃长江以南，二是为什么放弃海南岛？这是战略上的大败笔。罗启打定主意不做政治回应。他以海军出身的理解回答说，当时放弃海南岛主要是基于海上补给困难的考虑。路易斯接着问，你们是不是非常相信美国，相信美国永远不会变？“今天在台湾相信美国的人要比相信俄国的人多”，罗启这么回答，“美国人会不会变是一回事，但是从中俄尼布楚条约以来，中国人多不相信俄国人是事实。”

听了这些话，路易斯只说，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

蒋介石说，先让他忙几天

10月23日上午，台“新闻局”安排路易斯去故宫博物院。借此机会，魏景蒙用电话把昨天与路易斯会晤的情况向蒋经国报告，并把路易斯的希望告诉了他：

1. 在其他国家建立大使级接触。
2. 派新闻、商务或其他民间代表到莫斯科。
3. 提出两个中国的想法。
4. 让他在机场拍照。

蒋经国听完后，说了以下意见：

1. 须先向“总统”报告。
2. 无论如何安排叶翔之见他。

同一天，罗启也向上反映了路易斯的要求：

1. 要求见蒋经国。
2. 希望向南非及英国、菲律宾领事馆申请签证，因为他的签证是在东京申请的。
3. 希望南下高雄加工区等。

在魏景蒙汇报后的不久，蒋经国给他打来电话，内容如下：

1. 申请签证已获准。
2. 我们会接待他，并让他到南部等地。如果有人问起，我们只说路易斯是代表英国报纸的记者。
3. 已向总统报告，他裁定，在决定是否与他会面之前，我们应让他忙几天。

这一天，路易斯除参观故宫博物院外，下午6点在台“经济部长”陶声洋的办公室拜会了陶。事先，陶不知道路易斯的具体情况，在他的要求下，魏景蒙在“新闻局”向他做简报。

会谈中，路易斯要求立即与莫斯科展开贸易。陶声洋说，台湾的经济与苏联的制度不同，能否立刻达成协议，要由上层决定。路易斯回答：“我会立刻打电报回莫斯科。”

晚上，在与魏景蒙晚餐后，路易斯谈到了中苏边界事件，他进一步攻击

称：

可能不是真的，但毛泽东驱使妇女、儿童进入与新疆及东北接壤的苏联领土，如贝加尔湖、海参威等等，间谍也混杂其中。利用库伦妇女和儿童收集苏联情报。这些事件多数都是这类渗透所造成。

莫斯科有游行活动：莫斯科警方抓了几个人并无意义，但当学生前往北京时，他却被五花大绑。

利用外国报纸指控苏联犯下暴行，并使苏联政府难堪。我认为他们是（流氓）。意识形态：我们不同意毛泽东、斯大林及列宁的“仇恨主义”。

这些人天生具有罪犯性格，一旦掌握权力，便传统任意滥用，并且紧抱不放。

路易斯把蒋介石比作沙皇，魏表示反对说：“我们是革命政党，推翻了满清政府。我们之所以失去大陆，基本上是因为两个理由：1．战争使人民疲惫不堪；2．忽略了共产党。”与魏分手后，路易斯与罗启在街上闲逛。路说，台湾“对以色列的成功过于着迷。”他所以会有这种印象是由于与魏的谈话的结果。魏曾告诉他，由历史看来，世界犹太人对我们并不太好。路易斯还说：“斯大林以担任美国间谍的罪名把他判刑 25 年，服刑 9 年后获释。”他“毕业于莫斯科语文学院，第一份工作是‘LOOK’（展望）杂志，后又任职于 BBC、新闻周刊、纽约邮报，现为自由撰稿作家及伦敦晚报代表，其妻任职 BBC、时代杂志。”

路易斯的签证只有 10 天，台湾方面根据蒋介石“先让他忙几天”指令，安排他先到中南部参观加工出口区和土地改革。

蒋经国获准接见路易斯

10 月 24 日，魏景蒙从长途电话里得知，为了见路易斯，蒋经国在南部会很快赶回。

蒋经国对魏说，为让路易斯有处在一个“自由、开放国家”的感受，上午罗启不必陪他。

当魏景蒙再次向蒋经国完整报告路易斯是怎样的人以及与他交谈的内容时。蒋经国让魏告诉路易斯，指定魏景蒙与他打交道。

关于自己是否与他会面，蒋经国说，同意打交道，但应向当时任“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严家淦简略报告。关于会晤地点，蒋经国说，他可能在南部见他，并设法以非正式的方式进行（不在办公室谈）。如此，魏将陪路易斯到南部。同一天，魏景蒙在参加“行政院”院会时，蒋经国又打电话给他。说他已向蒋介石报告，并决定：

1. 在 10 月 29 日下午 5 时以会见伦敦晚报记者的名义接见路易斯。
2. “总统”警告说，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应加以考虑。他说，美国一直都与台湾正常接触，不管谁担任美国下任总统，都会继续与中共交往，因为美国不想打仗，必须维持此地和平，而办法就是与共党谈判。

为了减少影响，蒋经国那几天多会见新闻界人物。当天下午会见两位美联社记者，第二天上午 10 点半还在部里接见 Russell House of Foreign World Features 人员。

路易斯与叶翔之会晤

“情报局局长”叶翔之于 10 月 25 日上午 10 时到“新闻局”，在魏景蒙陪同下和路易斯会晤。

会谈前，魏景蒙明白表示，这次会谈内容不会见诸文字。

双方坐定后，叶翔之问路易斯：“对中国大陆有何看法？”

答：“独裁的时代已经过去，斯大林死了，毛泽东会接班，接着他也会疯狂。”

问：“对台湾有何观感？”答：“仍在发展中，但胜过日本。他在这里比在日本更自在。你们这里的中国人较好，你们聪明、有礼、机灵。”

这次会晤，路易斯提出以下问题：

1. 我们能展开大使级之类的接触吗？
2. 你们反攻大陆后，能容忍亲莫斯科的共产党员以政党身分存在吗？
3. 如果你们反攻大陆，苏联保持中立有所帮助吗？
4. 苏联不会喜欢具有敌意的国民党作邻居。
5. 希望知道台湾愿意以那个大使馆与莫斯科接触。
6. 离开台湾后，应与谁谈？
7. 莫斯科愿与台湾交换纯属中苏问题的情报，例如妇女及儿童渗透到与中国接壤的西伯利亚边界等。

叶翔之答复的重点如下：

1. 如果苏联保持中立，我们会很高兴，但真正的中立是不存在的，只是宣传词令而已。
2. 能以前那样与苏联合作。
3. 我们能容忍共产党（条件是他们不能有军队）。
4. 我们希望苏联真心展开工作。
5. 我们在中共军队、党内及其他地方都有自己人。

6. 我们也保持党的中立。
7. 如果苏联保持中立，没有美国帮助我们也能回去。
8. 在展开大使级接触后，我们可以考虑运送文物等到莫斯科展出。
9. 如果苏联承认国民政府，我们能否会接受，这点可以考虑，但我们双方必须对诸如目的等事宜要有更充分的了解。

叶翔之离去后，魏景蒙对路易斯说：“中共使我们以身为中国人耻。”

路易斯则表示，当苏联人被指为野蛮、落后时，他也有同感。

根据罗启的报告，这一天上午，路易斯曾寄信到莫斯科。当他前往英国领事馆时，领事馆人员劝他尽快离开。菲律宾领事也大为震惊。

蒋经国为会晤定调

10月26日，蒋经国召叶翔之、魏景蒙研究会晤路易斯之事。

蒋经国说：“中苏关系历史悠久，交恶是错在斯大林。二次大战使我们再度携手合作。但后来苏联支持毛，我们处于不利地位。《中苏条约》是我们想与苏俄维持长久和平的证明。双方关系不好是因为我们过于信任《中苏条约》，加以苏俄在东北扶助毛泽东，违背了条约。”

叶翔之说：“据路易斯的口气，当毛泽东的威胁解除时，美国对苏联的威胁也不再存在，因为毛泽东统治的大陆太接近苏联，而历史上只有亚洲人（蒙古人）征服过苏联，所以苏联的威胁是毛泽东，并非欧洲和美国。由于内在和外在的因素，做360度的转变对我们而言是很困难的，所以得悄悄进行。”

蒋经国说：“我们现在退守海岛，来自中共的威胁十分严重，此事悠关我们的生死。因为我们都想看到毛泽东的覆亡，所以我们能够谈判。”

叶说：“无论如何，美国这些年来一直与中共接触。美国不希望我们反攻大陆，而希望我们与中共谈判。”

蒋经国：“应该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立场。如果我们回到大陆，边境问题不会成为苏俄的问题。过去我们曾从以下几点显示了诚意：1. 蒙古自治；2. 雅尔达会谈；3. 东北（旅顺、大连）的权利。但因苏联违反《中苏条约》，以致造成今天的问题。我们主张三民主义，不侵略他国。越战，美国希望我们参战，但我们拒绝了，我们不想加入国际战争。中共是我们内部的问题，所以我们很关切。总统的三民主义即总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孙总理订下的政策是中苏关系有如美加关系。”

蒋经国让魏景蒙向路易斯约定，会晤时，两人不得使用俄语，要通过翻译交谈，避开密谈的印象。其次，路易斯不能拍照。而这都是对美国人预留地步，免得将来解释不清。届时，由蒋经国告诉路易斯：

1. 在未先获苏联谅解前，台湾不会反攻大陆。
2. 台湾会像以往那样与苏联合作。
3. 乐见直接接触，但在何地接触？

蒋经国交待，跟路易斯谈过后，要马上技巧的告知美国人。魏景蒙说：“对这项交易我们必须慎重，不然台湾会面临与当年印度及巴基斯坦一样的情势。”

当天晚上，路易斯打电话找到罗启，告诉他：

1. 务必在星期一上午 11 时前返回；
2. 希望和叶翔之与魏景蒙午餐。

罗启在汇报路易斯的要求时还说，路易斯在高雄有一个女人。

叶翔之二晤路易斯

10月28日，路易斯偕罗启返回台北。途中，他告诉罗启：苏联和中国大陆是没有希望复和的，不论是政党或人民皆然。改变中国大陆目前的状况，有以下几种可能：

第一，日本有能力采取行动，但日本不干……。第二，美国又不敢采取行动。

第三，中共内部的新势力，但他们的机会不大！因此，从上述推断或可能性来看，唯一能够采取行动的，就是“中华民国”。

上次路易斯跟魏景蒙谈时，说过苏联和印度的关系很理想，换言之，苏联会希望“中华民国”比照印度的路线走。他相信，在今后3年之内，“中华民国”回大陆的机会是这20年来中最高，不过，最好也有用的因素，就是苏联保持中立。但是，台湾必须让克里姆林宫相信，在光复大陆后，中国不会成为美国的一个军事基地。所以魏景蒙曾向上反映，台湾需要向苏联证明，他们未来会和苏联保持良好的关系。路易斯还认为，苏联必须在中国两大政党——中国共产党或国民党——之中做一选择，而他个人认为国民党要好得多。中午12时，路易斯、叶翔之在叶处会面。路易斯说：“何不在海外华人地区建立一个反毛的中国共产党，可以和苏联驻日本大使（他认为是位又好又有影响力的苏联外交官）一谈，要求莫斯科协助和合作，并且让这个反毛共产党公开表明他们在政治上支持国民党。”

叶翔之问：“为什么不跟我们合作，而要去建立一支亲莫斯科的共产党？”

路易斯说：“这很难改变，因为我们曾经合作过……。”叶说：“当我们收复三分之二的中国时，莫斯科曾乐意合作并且承认我们，但是后来我们失败了，莫斯科又和我们作对，跑去帮毛泽东，因为担心美国会在中国建立基地。”路易斯表示，他深信在中苏过去的合作史上，国民党并没有“黑记

录”。台湾收复大陆的最佳时机是在未来3年。魏景蒙说：“这主要得看苏联的态度。”同时，他提出几点请路易斯向莫斯科报告：

1. 我们愿在实际行动之前先和莫斯科磋商（光复）大陆的行动。
2. 请严守中立，或者索性帮助我们。
3. 联络的管道（东京大使馆不错）。
4. 废除中苏条约（有助鼓舞我国民心）。
8. 没有必要建立亲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
9. 两个中国绝对不可能，而且行不通。
10. 美国、苏联、日本都不能有效的解决中国大陆，唯一合理的政权就是台湾。

路易斯表示，他相信台湾有能力而且可以有效采取行动，这个信念是在苏联即有——不是到台湾之后才产生的。当叶翔之间路易斯对下列安排认为那一种较符合苏联的安全利益：

美国——国民党

美国——毛泽东

他的答案是前者。他认为，在毛泽东之下，中共没有一个人可以信得过担任亲苏共产党的领导人。所以国民党介入是合理的，但是也不能相信国民党，因为它与老美关系密切。

会谈中，路易斯还说，如果台湾同意的话，愿意在英国报纸写点文章。英国领事馆反正已经知道他这次来访了。

下午16时，会议结束。魏景蒙向蒋经国报告路易斯和叶翔之的谈话内容。并认为：

1. 毛泽东是共同敌人，所以（中苏）应该合作。
2. 把会谈管道延到后天（10月30日）实施，好让他知道这是经过最高当局批准的。
3. 可以拍照片，可找新闻局的摄影师来拍。
4. 要求路易斯不要报道。
5. 他只是个“传话人”，因此需要照片证明。
6. 我们在土耳其大使馆酒会时告诉老美，只说我们和伦敦晚报的苏联人路易斯有过有趣的谈话，（话题是赫鲁晓夫在海滨和毛泽东的谈话内容）。
7. 由魏景蒙对外说，路易斯来撰写有趣的东西，已经见过了蒋经国。
8. 英国、南非和菲律宾都没给他签证。这可能意味，他们都在看他这次来访的结果。他在南台湾有好几个女人，都是在短短时间就搭上的。

蒋经国会晤路易斯

10月29日，蒋经国会晤了路易斯为了妥当考量，蒋经国上下午都约见了来台湾采访的外籍记者，路易斯只是其中之一，给人以只是接见记者而已的感觉。

双方先以英语短暂会谈，但仍对路易斯提供口头传译。

路易斯首先谈了他见蒋经国的主题：“希望和台湾建立直接联系，并把联系位阶提高到‘大使级’的层次。建议台北和莫斯科互设新闻处。希望看到台湾在短期内能对大陆采取行动，苏联会在这件事上保持中立态势，不会帮中共。”

此外，路易斯还谈到：

国民党必须说明将如何对待苏联和部分中国共产党，因为苏联人在道义上较同情他们，而且关切他们的福祉。

交换情报对双方都有价值（例如沿中苏边界的平民活动和人海战术——尤其是海参威和贝加尔湖等中共宣称属于中国领土的那一带地区）。

莫斯科现在或许会容许亲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并透过他们提供协助，但是莫斯科绝不会重蹈扶植毛泽东的事。（魏说，您要怎么样让人相信你说的话）。

或者在新加坡或其他地方成立，来和苏联接触。

莫斯科的党性极强，所以要让那些人改变想法，国民党必须提出许多保证。

赫鲁晓夫在北京和毛泽东就“立刻消灭老美”打交道的经验，毛拒绝对莫斯科……这就是双方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

我以莫斯科来人的身分讲话，而不是以国民党的苏联顾问身分。我不希望台湾引述我的话。对台湾强调这里的一切谈话都是“不列入记录”的，我同意！

蒋经国说：

当今中国大陆没有人可以继承毛，毛的接班人没有一个胆敢不反苏。毛泽东垮台后唯一能够治中国的，就是国民党。

现在，重点是，苏联当局要我们容忍一支在中国的亲莫斯科共产党，而且不去整肃苏联在中国的朋友。果如此，当我们在大陆采取军事行动时，莫斯科就会保守中立。

我们的看法是，既然国民党是社会主义党，毛泽东下台后，苏联干嘛不和我们合作。

路易斯说：“莫斯科宁愿透过亲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来和中华民国共

事，那个党也会和国民党合作。莫斯科宁愿和国民党直接打交道，而不要透过第三国。国民党是一群讲理的人，是苏联可以共事的，这次来访证实了这点。”

蒋经国：“外交上的考虑是个大问题。”

最后，路易斯提到了今后连络接触的问题，蒋经国说：“这个问题明天答复。”

会晤结束后，路易斯要罗启告诉魏景蒙，在他来访后，可能会有其他苏联记者申请来访。他建议“如果我是魏景蒙，我不会给他们签证，因为他们不怀好心。”

这一天，路易斯打过电话给伦敦他的岳母，请她转告他的妻子他在台湾平安。他也接到家中报平安的复电。

10月30日上午，蒋经国告诉路易斯，他已向“总统”报告，关于联络问题意见如下：

1. 魏景蒙会安排建立联络系统的计划。
2. 卢为将担任“信差”，希望莫斯科能任命一名东京的联络人和卢接头，必要时，卢可以回台报告。
3. 希望莫斯科稍后派一人前来台北。
4. 只有蒋介石、蒋经国、和魏景蒙知道这件事，其他人都不知。（叶翔之现在已在局外）。当时双方约定，“收到维克托的问候”为识别身分的用语。

这一天，蒋经国参加一个酒会，当大家的面，很轻松地告诉美国中情局驻台代表，“昨天接见了一位俄国籍记者的访问。”

老美知道蒋经国见了路易斯之后，反应很大。美国大使马康卫、美国在台湾情报单位 NACC 夜以继日打听，穷追不放。美国国务院则透过台湾驻美“大使”周书楷打听。一直过了好久，美国才没再追问。

这一天，蒋经国还要魏景蒙告诉路易斯，有人问到他这个人。并告诉路易斯，他已安排“R”（代号）见蒋经国。为了避免让毛泽东的情报人员探听，“R”不愿在台湾谈话，“R”很怕大陆，认为在一个敌对“国家”工作不安全，尤其是高级官员。

蒋经国问：“如果苏联要我们的人在其他有苏联大使馆的地方会谈，能同意吗？”

魏说：“这是可以考虑的。”

蒋经国说：“会派你去。”

接着，他又让魏问路易斯，苏联卖武器给台湾的佣金问题。魏不知蒋经国为何了解这事。路易斯于10月31日离台，乘坐的是直飞金边的航班，因为香港、菲律宾、南非没有给签证。临行前，路易斯希望再见蒋经国一次，蒋经国基于各种考虑没有答应。

蒋介石“关心特使”

11月1日，魏景蒙向蒋经国报告他和路易斯最后一次谈话的内容。

蒋经国对路易斯提出的“佣金”要求甚感困惑。

魏又说：“有人会在东京和我们联络。”

蒋经国又把叶翔之叫来，强调此事保密的重要。魏指出，“在路易斯来访之后，不管发生什么，都不会太坏，尽管台湾和美国的关系并不坏，但这些年，美国都在华沙和毛泽东会谈，即使尼克松获胜，他也会加倍努力去和北京谈，不会帮助我们回老家，如果打仗了，也不会提供我们援助。所以，我们为什么不与苏联谈打倒共同敌人的事！”

蒋经国：“这个行动会有很大的后果。”

当天晚上，蒋经国又打电话告诉魏，要卢为回来一趟。

在路易斯来台期间，蒋介石始终没有考虑接见他。但对他在台一言一行的关切，可用“矩细靡遗”来形容。除了书面报告，要仔仔细细看，蒋介石还特别召见罗启两次，任何小处都不放过。

路易斯见蒋经国，不是蒋经国自己决定的，而是蒋介石考虑两三天之后才点头。这也是先让路易斯到中南部参观的原因。

路易斯主动“泄密”

11月2日，魏景蒙打电话给卢为。命他返国述职。并透过蒋经国办公室主任于振宇向蒋经国报告此事。11月4日，周中峰告诉魏景蒙，美国当局有人和他接触，询问有关路易斯来访的事，他希望多知道一点。

魏告诉他，自己会处理罗启和他助手之间的事。

同一天，华盛顿邮报在“瀛海珍闻”栏中报道：

俄记者出现台北

10月底，苏联记者路易斯曾去台湾4天。

路易斯为斯大林之女所写回忆录的穿线人，系在东京取得中华民国签证。除了台北以外，并访问了金边。路易斯离台时，拟顺道进入香港，但为港府所拒绝，理由是香港不欢迎任何苏联记者。

邮报这条消息，未注明来源。据猜测，一系来自东京，一系美国国务院所授意，但美国国务院对此拒绝评论。11月5日，美国有关方面向台“新闻局副局长”叶梅生打听有关路易斯的事，并说他们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是：VTAUYEYVGBNYEVICHLOUI（维塔利·叶夫根尼耶维奇），说他曾在赫鲁晓夫访问美国时，安排赫上NBC电视接受访问。

魏景蒙告诉他，这个人从日本来，台湾是以他的伦敦晚报记者身分给他签证，到最后一刻才发现他是苏联人。他曾和魏景蒙谈过莫斯科——北京的关系，认为双方纷争的根源，是核子冲突，以及利用人海战术夺取西伯利亚，还有赫鲁晓夫在海滨与毛泽东的谈话等等。

11月6日，蒋经国要知道华盛顿邮报对路易斯的访台做了那些报道。

谈到有人了解路易斯来访之事，蒋经国说照这样答复：

路易斯是从东京来，代表伦敦晚报来采访，要求看我们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活动。我们让他看了土地改革计划、加工出口区和博物馆之后，他就走了。

蒋介石听取会晤经过

11月7日，蒋经国告诉魏景蒙，“总统”可能召他去报告路易斯的事。

这一天，捷克及南斯拉夫籍的“美国世界新闻班”人员与“国际研究所”的15人访问团一起来台，台老特工徐开远也与该团体同行。魏景蒙叫罗启亲自向“国防部长”蒋经国报告此事。

接着，魏景蒙去向蒋介石报告路易斯来访经过，以及来访期间的谈话内容，还有路易斯本人及其家庭、生活等方面的事。

关于路易斯来访前的联系经过，魏景蒙告诉蒋介石，他打的电报是答复驻美大使周书楷，他没有打电报给日本使馆，因为有关此事的电报打得愈少愈好。他还提到，卢为很快就要回去。

魏景蒙报告了一个多小时。蒋介石听后就表示支持蒋经国和魏在与路易斯会谈时所说的一切。

在魏景蒙的报告里，特别注意到过去有关双方合作之事，“我们在华南掩护他们的人员，他们在华北掩护我方人员”。

蒋介石问魏景蒙，是否曾向蒋经国报告此事。魏说有。魏景蒙离开后与蒋经国联络，他承认自己忘了向蒋介石报告这点。

魏还报告：

1. 需要派人到非共产党国家以色列。
2. 明年派新闻代表到以色列。
3. 根据徐开远的建议，同意明年让捷克及南斯拉夫人员与美国的15人代表团一起访问台湾。

对第二条，蒋经国要他按兵不动，也不要答复。

11月18日，魏景蒙为蒋介石和蒋经国翻译9月号时代杂志那篇杰佛利·波卡所写的文章，题为“你会买一把这个人用过的旧剑吗？”他本人来台访问时，已把文章内容的多数重点告诉台湾当局。文章说路易斯是苏联特务机构克格勃（KGB）的特务，在莫斯科郊区过着豪华生活。

11月20日，台驻美“大使”周书楷来电，报告一则有关路易斯来访的新闻报道，之前还有一则消息说，美国与苏联将在东南亚合作对抗毛泽东。

因为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全会后，力量可能更强大，所以美国和苏联会更害怕中共的侵略性。

蒋经国希望魏景蒙在数日内写好一份有关魏景蒙、叶翔之以及他本人与路易斯会谈情形的报告，以供新闻界发稿。魏景蒙要写的 3 份报告是：

1. 魏景蒙与路易斯的会谈。
2. 叶翔之和魏景蒙与路易斯的会谈。
3. 蒋经国与路易斯的会谈。

外电暗示中苏将有接触

11月29日，台“外交部”报告：史丹利·卡诺在11月18日发表了一篇有关路易斯来访的报道，其中有很多推测之词，暗示台湾与苏联将在最近数月于外交、政治圈展开接触。

魏景蒙做了简单报告：

11月30日上午10时见华盛顿邮报记者史丹利·卡诺，如谈话中问及路易斯时，应作下列答复：

路易斯在东京台湾“使馆”以伦敦晚报记者之证明书请求来台采访经济、土地、故宫消息，“使馆”转新闻局，本局照准。及签证时始知其为苏联籍，彼云并非共产党党员而在斯大林政权下被放逐西伯利亚10年之久，领馆如此报告本局后，魏景蒙即决定准其来台。理由：此人可能来台要求政府庇护，但一面通知治安当局注意其行动，好在台湾并无不可见人告人之事。

路易斯于10月22日抵台，31日离台，在台寓第一饭店，曾见魏景蒙，23日见陶声洋，观光及逛博物馆，24日赴乌来，下晚看电影。

25日：孔庙、“匪”情。

26日：中非农事会、赴高雄加工区、澄清湖。

27日：日月潭。

28日晚：回北市。

29日：蒋经国谈话魏景蒙在场；在阳明山及附近郊游。

30日：魏景蒙见他。

本地无记者知之故无报道。

对于22日谈话内容，魏景蒙向“外交部”透露：

“新闻局”告其核准来访是为其英国记者身分，如有意要求庇护，台湾欢迎。蒋“总统”宽大为怀，故有甚多“匪”党来归。蒋“总统”召示云“不是敌人就是友人”，而此地为自由之上，有言论自由，有探访自由。当我们

提到自由中国人不信任苏联时，他回答：斯大林下台了，新一代在苏联掌权。因苏联共产党不守条约之信用。对其来台的活动我告诉他，“你要看的经、农、古物方面，本局已有接洽准备，你为苏联公民，我有两问题请问，如不方便可以不必答复，此地有言论自由，亦有不言之自由。

问一：莫斯科、北京两政权都是一类，为何火并以至如此？

问二：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之报道究竟正确如何？

曾告路易斯一切谈话皆为“不列入记录”，我们不便说话太多。

答一：毛泽东要共党国家之霸权。

答二：一部分西伯利亚之土地中共欲“收回移民”，并无大冲突。

魏景蒙答美国记者问

11月30日，魏景蒙告诉史丹利·卡诺，路易斯访台是为了看土地改革、经济和博物馆。

以记者身分见蒋经国。魏景蒙担任译员。

蒋经国希望知道英国对毛泽东的态度。但他知道的不多。

路易斯想知道大陆及毛泽东的最新状况，以及台湾对中国大陆及毛泽东的看法。

路易斯对台湾印象深刻。

魏说，据他看来，“路易斯并不怎么危险。”

卡诺：“那只是外表。”

魏景蒙告诉卡诺，自由中国人民并不信任苏联，魏也告诉路易斯这点。

卡诺认为，路易斯绝对是个危险人物。他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的一家旅馆见过路易斯，所以知道他曾来台北。他对自己是19年来第一位访问台湾的苏联人十分自豪。路易斯希望卡诺不要利用他透露的东西写新闻。

卡诺说，路易斯来台是为苏联探路，因为苏联目前正在亚洲加强公关工作。有资料显示：苏联正在向马来西亚、新加坡、柬埔寨、巴基斯坦、泰国等国示好，以对抗中共。他们甚至帮印尼训练部队以对付印尼境内亲中共的共产党势力。中共驻河内大使馆人员对苏联人表现出公开的敌意，在馆内殴打苏联人。

苏联也在争取美国，因为苏联认为中共正在讨好美国。卡诺建议台“新闻局”把苏联驻金边大使馆人员拉希德·卡马丹放在台湾的公开资料中，并看看会有何反应。有关卡马丹的资料可能从香港寄出。

此外，卡诺仍希望见蒋经国，如能获安排，他愿停留到星期一。

12月1日魏景蒙把与卡诺会谈的情形告诉蒋经国。

新华社揭露苏蒋勾结

对于苏蒋之间的罪恶勾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是视而不见。1969年3月5日，新华通讯社专就此事发电揭露。电文如下：

苏修叛徒集团同七亿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匪帮正在加紧进行反革命勾结。不久以前，苏修叛徒集团派出一名“记者”到蒋匪帮窃踞的我国领土台湾省，登门朝拜，阴谋策划反对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罪恶勾当。这是苏修社会帝国主席对中国人民的无耻挑衅。

据西方报刊和通讯社透露，一个化名维克托·路易斯的苏联人（他的真名叫维塔利·叶夫根尼耶维奇），在苏修叛徒集团的授意下，于去年10月下旬以记者的身份去台湾省进行秘密活动。他在台北活动期间，同蒋匪帮“国防部长”蒋经国“举行了会见”，并就阴谋反对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勾当“交换了意见”。路易斯还代表苏修叛徒集团“非正式地邀请”蒋匪帮派遣“记者”去苏联“访问”。美联社发自莫斯科的一则消息透露，路易斯在回到莫斯科后并发表谈话，无耻吹捧什么蒋匪帮的“积极的方面”竭力美化蒋匪帮对台湾省的罪恶统治。

与此同时，西方和日本资产阶级通讯社还纷纷报道，在华盛顿、东京、渥太华等许多地方，苏修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同蒋匪帮的“外交人员”和记者进行“非正式接触的事已显著地增多起来”。蒋匪帮也在“鼓励”它的“外交人员”和记者同苏修的外交人员和记者“搞在一起”。这些事实表明苏修叛徒集团伙同美帝勾结蒋匪帮恶毒反对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罪恶行径已经达到何等卑鄙的地步。

苏修叛徒集团同蒋匪帮进行的新的反革命勾结，绝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长期以来它们就同蒋匪帮勾勾搭搭，积极为美帝妄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效劳。1963年，它们公然让蒋匪帮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臭名昭著的所谓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它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报刊上把蒋匪帮窃踞的我国领土台湾省称作“国家”，把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称为“总统”。它们多次在刊物上刊印蒋匪帮的旗子。它们还无数次同蒋匪帮的“代表”坐在一条板凳上开各种国际会议。现在苏修叛徒集团竟然派人到台湾省同蒋匪帮勾结，这是它们反华阴谋活动的一个新的罪证。

苏修叛徒集团加紧勾结蒋匪帮猖狂反华，充分暴露了它们虚弱本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变得更加坚强的社会主义中国，是苏修叛徒集团勾结美帝、妄图重新瓜分世界的最大障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强盗行径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强烈谴责和反对，苏修叛徒集团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像一根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绞索，越拉越紧。苏联人民反对苏修法西斯统治的斗争，也日益加强。苏修叛徒集团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在这种情况下，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勾结美帝和各国反动派反华，甚至饥不择食地把蒋匪帮这具早已腐烂发臭的政治僵尸也当作宝贝来利用。这是它们内外交困、走投无路，妄图进行垂死挣扎的一种表现。

但是，不管苏修、美帝拼凑一些什么垃圾，组织反华、反革命的“神圣同盟”，都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加速自己的灭亡。

第二节 西方对华态度的转变

法国率先打开缺口

60年代正是美苏两大阵营争夺世界主导权的较量日趋激烈的时期，而在这两大阵营中，都有主张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国家，那就是在西方阵营里的法国和在东方阵营里的中国。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与毛泽东握手，但两位从未谋面的伟人却“所见略同”：国家利益应该超出意识形态之上。中法两国建交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的。

法国在60年代初面临着与美国发生一系列摩擦的外交局面：法美在北约问题上话不投机，在核武器问题上各执己见，在对付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策略和方针上也是貌合神离。因此在寻求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的过程中，戴高乐将军的法国发现了中国。中国与法国一样，并不甘于成为其他国家的附庸，双方在很多问题上有着共同点，如两国都拒绝在美苏一统之下的防止核扩散条约上签字。于是共同的外交原则和相互吻合的国家利益，使两国开始走到了一起。

1963年，戴高乐认为建立中法正式外交关系已经成熟，遂派老牌政治家富尔作为他的代表，到中国进行谈判。

曾两度出任法国总理的富尔，与戴高乐关系密切。他虽反共，但对中国尚称友好。为了申请到中国访问，1963年8月和9月，富尔两次到瑞士，同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会晤。富尔说，他奉戴高乐之命并携有戴高乐给他的亲笔信，到北京去和中国领导人就目前国际局势及改善两国关系问题交换意见。但是为了避免外界注意和猜测，对外只称是私人旅行。法国前总理富尔向我国提出访华的要求，经周总理同意后，李清泉代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向富尔发出了邀请，并商谈了富尔访华的一些具体细节。1963年10月22日，富尔偕夫人到达北京。这是富尔1957年第一次访华6年之后的重访。

为避免外界注意，富尔公开宣称他此次访华纯系私人访问，没有任何官方使命。但实际上他是奉戴高乐之命，专门来我国面谈法，中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可能性的。

富尔于1957年首次访华之后，由于亲眼看到新中国的实际情况，并对我国的内外政策作了某些了解和研究，曾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说：“法国没有理由奉行‘两个中国’的政策，除非断绝与台湾的关系，否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是一种无用的行动，而且实质上是一种不友好的姿态。”富尔曾将他的看法向戴高乐作过陈述，戴高乐及其周围的一些决策人物在不同程度上也同意富尔的看法。正是由于这一原因，1960年戴高乐曾赋予富尔探听中国政府对法国政府未来的外交承认兴趣如何的任务。1963年当戴高乐决定进一步采取建

立法，中正常外交关系的试探行动时，戴高乐很自然地决定选派富尔作为他的代表到中国进行谈判。

富尔抵华后，立即向我国政府提交了法方拟订的法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三个方案。在这些方案中，有积极的和正视现实的方面，如富尔一再表示，戴高乐总统希望法国和中国之间立即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绝不仿效英国拖泥带水的半建交做法，并对英国的不智之举加以嘲讽。但也有消极的方面，如提出法国和中国建交后，法国政府希望在台湾保留一名低级职别的人员等。在这个问题上，富尔也自知理亏，虽一再企图辩解，但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一会儿说这是戴高乐的希望，一会儿说这是法国政府处理外交事务的传统，一会儿说这是纯技术问题，绝不涉及“两个中国”，一会儿说这是人之常情，法国政府没有理由赶走已在法国的蒋帮人员。但是富尔不管怎样罗织理由，也无法自圆其说。

戴高乐的对华建交三方案的具体内容是：

1. 无条件承认方案。法国政府正式宣布承认中国，中国表示同意。
2. 有条件承认方案，法国政府表示愿承认中国，中国提出接受承认的条件。
3. 近期承认方案。法国政府对中国先不作政治上的承认，但两国间形成特殊关系的局面。

富尔对这三个方案解释说，戴高乐希望能争取立即实现第一个方案。至于对第三个方案，法国政府只是把它当作备用方案，根本无意采取。从富尔的解释中不难看出，一方面法国政府对同我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要求是急迫的，但另一方面它又设法避开正式公开声明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而想以法国政府自以为冠冕堂皇的无条件承认方式绕开这个矛盾。法国政府这样做的意图是，既可取得同我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实际结果；又可对法国统治集团内的反华势力和亲蒋分子作点妥协，并给台湾一些安抚；此外在对美、英关系方面也留下一点适当的回旋余地。富尔一再以戴高乐的口气强调实现第一方案的重要性，反复声称法国政府绝不是以此办法搞“两个中国”，而是法国政府认为法、中两国无条件建交就意味着和等于法国政府断绝了和台湾的外交关系。同时又说，戴高乐在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方面绝无任何顾虑，法国是自主的，不需要顾及与别国的关系，也没有必要看美国的眼色行事。富尔的这些解释恰恰从另一个方面暴露了法国政府的内心所想。但富尔也知道我国政府绝不会拿原则做交易，所以又准备了第二方案，留下可进可退的机动余地。

从表面看，中、法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谈判在形式上是平和的，气氛也是比较轻松的，最后达成协议的时间也是迅速的。但是，在谈判桌上我国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斗争是很尖锐的。同时根据法国的特定情况，我们在

斗争策略的运用上，又采取了有别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若干灵活措施，以利于收到最大限度的良好效果。

中共中央一直重视戴高乐采取的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独立自主政策，和这种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政策在今后国际政治力量组合变化中可能产生的影响。因为它反映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分裂的趋势正在深化，我们需要根据不同对象，区别对待。我们认为，戴高乐要求同我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主动行动，对于我们利用法、美矛盾，打开我国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枢纽，对于我国反对美国封锁和苏联控制是有利的，因而表示欢迎和鼓励。但对法国政府和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玩弄“两个中国”阴谋必须采取措施。即使法国政府由于内外原因和某些困难，一时难以就中、法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达成最后协议。这样做可以引导中、法两国的关系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并为尽快建立两国的正常外交关系打下比较良好的基础。

本此精神，在富尔访华期间，我们给予最高规格的礼遇。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主席分别接见了。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单独或共同和他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会谈了6次。在谈论国际局势问题时，周总理指出，戴高乐在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方面采取了勇敢的步骤。当谈到戴高乐对莫斯科三国核协定采取的态度时，周总理说，我们两国对这个问题表现的行动是一致的。在谈及对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的关系时，周总理对法国政府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所采取的态度予以肯定。这些会谈表明中、法两国政府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基本一致或比较接近，双方有着较多的共同语言。

对中、法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问题，针对法国政府提出的三个方案和其中存在的问题，周总理在详细地阐述了我国政府的立场后，提出了积极的有步骤的直接建交方案。中、法两国政府建交声明的内容有三点：

1. 法国政府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立即建交，互换大使。
2. 中国政府复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欢迎法国政府的来照，愿立即建立外交关系，互换大使。
3. 双方同时发表上述照会，立即建馆，互派大使。

我国政府提出的建交方案非常合情合理，其中所以使用了内部默契部分，主要是照顾戴高乐和法国政府处境的一些困难。这一高度原则性和灵活性密切结合的高超的斗争艺术，巧妙地排除了来自法国方面的不合理的要求，成功地解决了谈判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为开启中、法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之门铺平了道路。

对于这样一个合情合理的建交方案，就连能言善辩的富尔也觉得提不出任何异议，只是说，由于他未被授权签署正式协议，他将携此方案返法向戴高乐复命后，立即答复我方。中、法两国两国政府关于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

初步的但又是实质性的的重要谈判至此告一段落。

富尔返法后，将中、法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谈判事宜交给法国政府外交部办理。经过双方协商，法国政府外交部指派官员和我国指定的驻瑞士大使李清泉继续进行接触。经过几番磋商后，中、法两国政府于1964年1月18日达成协议，决定于1月27日双方同时发表建交公报，并于3个月内交换大使。但在继续磋商的过程中，富尔却于1月11日以他个人的名义在法国报刊上发表了一篇重弹“两个中国”滥调的文章。文章说什么法国不承担澈消对蒋帮承认的义务，法国在台湾设立领事官已纯属法国之事，甚至还谈台湾一旦独立，法国仍可对其承认等。针对这些谬论，我国政府决定于两国建交公报发表的次日，即1月28日以我外交部发言人声明的形式表明我严正立场。声明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国政府谈判并且达成两国建交协议的。按照国际惯例，承认一个国家的新政府，不言而喻地意味着不再承认被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推翻的旧的统治集团。因此这个国家的旧的统治集团的代表不能继续被看作是这个国家的代表，同这个国家的新政府的代表同时存在于同一个国家里或者同一个国际组织中。中国政府是根据这样的理解，同法国政府达成中、法建交和互换大使的协议的。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重

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任何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割裂出去或者其他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的。

我国政府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义正辞严，实际是法国政府已经同意的双方达成的默契内容用另一种形式的再现。中、法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谈判就是经过这样几个回合的斗争之后，在迎接1964年新春之际，按照我国政府提出的直接建交方案胜利实现。它是在国际形势更加有利于我的情况下发生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打击了美国，加深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挫败了帝国主义和国际反华势力妄图孤立包围反对我国的阴谋，在我国对外关系史和当代国际关系史上写下了举世瞩目的一页。

美国的视线在移动

中法正式建交，台湾曾向法国提出强烈抗议，声称反攻大陆，反对任何“两个中国”的概念，同年2月，台湾宣布与法国“断交”。5月12日，蒋介石对美国记者说：“法承认伪政权极不智，对中国前途无影响”。但这声音很微弱。

缺口既开，一发不可收拾了。随着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美国的望远镜也在悄悄地挪动了。国与国之间虽长期敌视，彼此都是害多利少。半

年后，宋美龄告美国新闻界，主张借用美国力量“摧毁匪核子设备”。美国当权者怎敢引火烧身。

1965年7月，约翰逊政府国务卿腊斯克访问台湾，当记者问道：“美国仍认为中国国民党政府是全国的唯一和合法政府吗？”

答：“我们承认中华民国作为中国政府”。“唯一”一词悄悄地消失了。

对于这样一个异常敏感的问题，台湾当局立即给予抨击。陶希圣称腊斯克外交政策“是美国绥靖风潮给约翰逊政府巨大压力而产生的一个幻想”。

尼克松的新理念

1968年8月初，尼克松在竞选演说中谈到，不管谁是今后4年或8年的美国总统，都必须从这样一个假设出发，到头来必须同下一个超级大国共产党中国的领导人谈判。8月9日，尼克松在与记者的谈话中表示，“将会访问中国，如果中国发给我签证的话。我认为我们今后8年内将看到和中国的对话。在今后8年内，中国问题一定得解决，不然它将成为悬在头上的剑。”

尼克松在其政治生涯中，以反共而著称。1946年，33岁的尼克松当选为美国国会议员，他支持杜鲁门一系列重大的反苏反共措施。他是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成员，曾积极参加所谓“揭露共产党人渗透和颠覆阴谋”活动。他和其他人一道谴责杜鲁门政府1949年“丢掉了中国”。50年代他任参议员期间，曾积极支持麦卡锡，大力推行迫害运动。1953年到1961年，他在担任副总统期间，是美国全球战略的积极推行者。对于中国表示很大敌视。他曾对《纽约每日新闻》发表谈话说：“我愿非常明确地表明，我反对给共产党中国以外交承认，我同样反对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

但是，从1967年起，尼克松对改善中美关系开始表现出浓厚兴趣。1967年，他作了一次环球旅行，他了解到许多外国领导的看法：他们都认为，中美两国之间建立某种新的、直接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10月23日，他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越南战争以后的亚洲》一文，说：“从长远来说，我们根本经不起把中国永远排除在国际大家庭之外。”“美国对于亚洲的任何政策，都必须紧紧地抓住中国这个现实，”在中国问题上尼克松表现出清醒的态度。

中美复交的秘密引线人

这是在“文革”时的一桩很秘密的事情。邓山理那时还作为一个“五七战士”下放在四川农村放猪，忽然有一天，他被召问到北京，并且还没等回到那个离开了7个多月的家，就把他接上了一辆小汽车，送进了中南海。

他非常吃惊地看见向他走来的周恩来总理。

总理笑咪咪地对他说，“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叫来吗？因为你是跟美国方

面有着比较多的联系的。作为这方面的专家，对美国的情况也比较了解，所以想请你起草一份对美国的分析文章。不过这件事，你绝对不要跟任何人说。”

邓山理虽然心里还在嘀咕这个工作任务的突然性，但他对周总理分配的任务从来是不打一点折扣的。

他回家后，收拾自己离家后7个多月积下的那一大堆信。其中的一封是从加利福尼亚来的。汤姆森博士是邓山理年轻时候的天津读书时情同手足的好朋友。他在给邓山理的信中这样写道：

亲爱的邓山理：

我有一个儿子，名叫马修，最近刚刚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他在纽约的一家很大的律师事务所里找了个饭碗。这所老板是我过去的一个学生，前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先生。

据说，尼克松先生有可能再次作为总统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他在早期的民意测验中占了约翰逊上风，我记得尼克松是个颇为内向、害羞的学生，但他好胜心很强，头脑也挺灵，很难想像这个孩子将会成为美国总统。

尼克松为马修找工作帮了很大的忙，我真希望尼克松别把他拉入政治。

我十分关心中国，有关中国的报刊文章我都要读。我希望你平安地度过这些动乱的岁月。愿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帮助你。

你的忠实的埃兹拉

1966年圣诞节

邓山理这时才有些明白了周总理的意思。

过了些日子，他把周总理交办的事做好了。文章送上后不久，周总理又把他接去了。

这次他又见到了宋庆龄。她还记得他们很久以前在日本相处在一起的事，都很高兴地谈了起来。周恩来说：“今天请老邓来，主要是想让他谈谈对尼克松的看法的。他的对美国情况的文章写得很有趣，我都读过了，现在还想听他说说。”

邓山理就把自己对尼克松其人的情况说了一些，然后说：“我认为他很可能一心一意献身于自己的政治生涯。他是一位雄心勃勃的政治活动家。”

“假如尼克松赢了这次选举，我们必须影响他的思想，使他变得对我们有利。他真的会放弃他的老朋友，转而对我国友好吗？很难说吧？”

“是的，不过我有个在尼克松身边工作的年轻朋友。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他是谁？”

“他叫马修·汤姆森，在纽约的尼克松办公室工作。我和他父亲关系很密切，从小就是好朋友。我可以从他那里了解到更多的情况。”

不久，一个名叫洪伟良的先生约马修·汤姆森这个年轻有为的律师到香港去办一件事务，但是他很快就发觉，他真正的见面人却是他父亲的一个老朋友，从北京来的邓山理先生。

邓先生对他说：“你父亲在圣诞节前给我来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对我说，你在一家实力雄厚的律师事务所工作。”

“是的，我在处理国际问题的部门工作。这正是我的专业特长。”

邓山理说了一句有意味的话：“很好，也许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能帮助中国人民。你知道我们在美国没有大使馆和领事馆。中美两国之间如此疏远，实在是没有道理。”

马修点点头，“是的，这很不正常。”

邓山理接着说：“你们的杜勒斯在日内瓦拒绝了同周恩来总理握手，照常理说中国领导人是不会再向他们伸手了，除非看到美国领导人先伸出手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马修说明白，这是一种常理：“那么怎么才会有这个开端呢？”

“那就需要有一个有胆识有远见的美国政治领导人才行。”

马修看出父亲的这个老朋友跟他谈话的真正用意了，“那你认为尼克松先生是这样的领导人吗？可是说不定他赢不了明年11月的选举呢。”

邓山理笑着说：“在这些候选人中，你那位老板是最佳人选。”

“看来你是把赌注下在尼克松身上了？”

“你认为他对中国会感兴趣吗？”

“肯定感兴趣。”

“你估计他会听你谈谈中国问题吗？”

“他说要我回去汇报对香港的印象。我相信，对我回去要讲的话，他还是要听的。”

邓山理诚恳地对年轻的美国律师说：“我不能肯定我们会成功，但我觉得这是对中美两国都有好处的事，值得试一试。请你帮助我。”

马修说：“只要你不让我干谍报工作，我愿意尽力而为。”邓山理笑呵呵地点头：“当然不会让你当间谍的。我们只是想找个能在尼克松身边传话的人。”

几天后，回到美国纽约的马修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见尼克松。他先从香港的事慢慢地引到了他想要说的事上。

“我有幸遇上了家父昔日的好朋友。他们曾经在天津一起读书，是同窗好友。是个共产党人，是外交部的官员。他对我谈了中国对外界要建立联系的想法。”

“中国领导人会同意他的看法吗？”尼克松沉思着。

“是的，我特别问了有关台湾的问题，因为这是美中两国在和平解决问

题上不可逾越的障碍。可邓先生说只要化时间谈判，双方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的。”

尼克松两眼凝视着马修，“我真怀疑他的那些领导人会同意这种观点。不过我们也确实应该调整策略，改善与大陆中国的关系了。”

马修点点头。他想这是个很重要的讯息，足以写信告诉邓山理了。尼克松是开明的政治家，比其他任何人都站得高，看得远。

“这是我们当前外交事务所面临的一大课题。中国是一只潜在的巨大奖杯，有远见卓识的美国人应该赢得它。”尼克松慢慢走到办公桌前，拿起一个文件夹。“这里有一篇有关亚洲的文章，你想读一读吗？”

“好的，先生。我一定好好拜读。”

马修接过文件，认真地对尼克松说，“你如果觉得我对你有用的话，我愿意在你的竞选活动中效劳。”

两天后，马修在写给邓山理的信中说：“我已成为总统候选人的私人助理。”

不久，马修接到香港方面的电话，是洪先生的。但是马修听出意思来了，是邓山理的事。他很快脱身去了香港。不过这次他没把此行告诉尼克松。他想要在事情未有眉目前，不能说得太早。

马修才走下飞机，就看见邓山理站在舷梯下等着了。

“欢迎你到北京去做两天客人。我们就上飞机吧。”

于是才下飞机，就又上了天。飞机到了马修从未去过的那个神秘的大陆。当天晚上，马修被一辆小车送进了一个安静的小庭院。一位年轻的中国姑娘站在门口迎候着他。

“欢迎你，汤姆森先生。我叫王莉芳，担任今天的翻译。请进。”

起居室尽头较暗的灯光下面，坐着一男一女。那个看去有点面熟的男人站起来，笑着向他迎过来。那姑娘对他说：“这是周总理。”

周恩来对另一年老的女士说：“孙夫人，我可以向你介绍美国来的汤姆森先生吗？”

宋庆龄从那椅子上伸出手，“你好，汤姆森先生，你来我家作客，我很高兴。”

“谢谢您，孙夫人。”马修这才知道这原来是孙中山夫人的私人住处。

晚宴结束后，周恩来把马修单独留下谈话。两人谈了美国选举的情况。马修认为尼克松选上的可能性较大。

第二天早上，马修被邓山理从被窝里叫醒，告诉他一个大新闻：约翰逊宣布退出竞选了。马修觉得这是个好消息，尼克松获得提名的可能性更大了。

周恩来又一次接见了马修，听他谈了尼克松与其他两个党内的竞选对手里根和汉弗莱的优劣对比。马修认为他们两人都不如尼克松取胜的把握大。

事实证明，马修的分析判断是对的，尼克松果然连连战胜对手，当上了美国总统。

美国新政权“第一项政策声明”

1968年11月5日，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以微弱的多数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赫伯特·汉弗莱，竞选获胜，担任美国第37届总统，1969年1月上台。

1969年2月1日，尼克松就职后12天，便向基辛格表示：“应竭力鼓励政府探索同中国人改善关系的可能性。”之后，3月7日，国务卿罗杰斯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谈到美对华政策时说：“中国人口众多，有着极大的潜在力量和不断发展的核能力”，“我们继续期待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在进行有益的对话方面取得进展，以缓和紧张关系，解决我们的分歧，并着手建立一种比较富有建设性的关系，为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将欢迎恢复我们同中国人之间的会谈。”罗杰斯的谈话，被称为尼克松政府“第一项政策声明”。看来，尼克松政府将把探索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作为它的一项重要的外交政策。

历史何以会出现这样的转机？尼克松所以热心和中国改善关系，有诸多因素。

尼克松上台之后，美国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全球扩张和称霸的一贯战略已经维持不下去。从国内看，二次大战后，美国经济处于鼎盛时期，到了70年代，美国经济已出现衰退的端倪，经济增长速度减慢，巨额的战争费用开支，大大地增加了财政负担，使美国的财政出现了巨额赤字；美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大大减弱，使美国国际收支状况不断恶化。正如毛泽东所预言，美国在经济上的“喜马拉雅山”正在倾倒，这不能不使美国政府的当权者们忧虑万分。从国际看，美国的全球战略到处碰壁，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但是由于它的遏制政策和霸权政策，使它的脚陷在了亚洲。朝鲜战争使美国在历史上第一次遭到战争失败，使其国际地位明显削弱。在越南战争中，随着战争的升级，美国在越南和印支的泥淖里越陷越深，军费开支浩大，士兵反战情绪越来越强烈，因为反战浪潮席卷，使广大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迅速增长。美国在日本的情况也每况愈下，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成为与美国竞争的强劲对手。西欧对美国越来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美苏之间的核竞赛愈演愈烈；中东国家反美情绪高涨。美国在国际范围内，已失去了控制能力，争霸全球战略的方针越来越不灵了。这种内外情况，迫使尼克松不得不对它的外交政策进行调整。

尼克松调整对华政策

尼克松在调整外交关系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是他重点之一。在尼克松的战略考虑中，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的必要性在于：

首先，尼克松认识到，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继续把它排斥在国

际大家庭之外，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不可能的。美国对中国进行了长期封锁和遏制，但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巨大成就，国力日益增强；中国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用，其国际威望越来越高；世界上许多国家对美国奉行的孤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越来越不满；甚至西欧国家也认为美国的这种政策是愚蠢的作法。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果仍然无视于中国和世界的变化，一意孤行，继续孤立和不承认中国，到头来只有使自己处于尴尬境地。尼克松较清醒地看到这一点，他不得不认识到：美国是改变对中国敌视政策的时候了。2月18日，尼克松在对外政策报告中说：“中国人是一个伟大的生气勃勃的民族，不应该继续孤立在国际大家庭之外，从长远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拥有七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量，要建立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

其次，美国需要在与苏联的抗衡中，减轻压力和负担。美国与苏联的争霸愈演愈烈，双方不仅进行着大规模的军备竞赛，而且在全球各个地区进行角逐。这两个超级大国和中国都保持着敌对状态。苏联把和中国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为国家关系上的分歧，并且用霸权主义威胁中国。在中国北部边疆陈兵百万，造成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在美苏争霸中，中国成为一个制衡力量，中国任何一方和解，都会使这个世界性的三角发生倾斜。尼克松认为，中国北部边境的紧张状态，是中国人可能倾向于和美国和解的重要动因，同时美国和中国的和解将有利于美国和苏联的抗衡。尼克松说：“我相信历史会表明，如果在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方面不迈出这样第一步，在同苏联的实力对比上，我们现在似乎一定会处于面临危及生存的不利情况。”尼克松认为，实现三角外交具有可能性也具有重要性。他感到向中国打开大门不会危及反而会促进美苏关系。尼克松还意识到，对中国采取主动会给他政治上带来好处；选择最佳时机访问北京将使美国的自由派感到震惊，打乱他们的阵脚，从而保证他再度当选。如果他能闯入这个拥有地球四分之一人口国家的大门，那么他的形象就会骤然“高大”起来，压倒所有那些呆在国内无所作为的民主党的反对派。基辛格也指出，我们受到警告说，打开中国的口子会使美苏关系倒退，事实上，打开这个口子在几个对苏关系的问题上反而会打破僵局。

最后，尼克松政府认为，在美国经济衰退，竞争能力减弱的情况下，改善和中国的关系有利于发展和中国的经济关系，中国广大而潜在的市场将会对美国产生很大的吸引力和好处。在未来的亚洲竞争中，美苏日中四国将成为互相竞争，制约的力量，从而造成亚洲的均势，保持亚洲力量的平衡和稳定。

尼克松从美国新的全球战略计划出发，把改善和中国的关系纳入了美国新的全球战略计划之中，承认中国将是他任期内期望达到的重要目标之一。他向其阁僚们解释：“我们与中国的疏远，尽管从纯粹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是不无道理的，但是，无论是我们还是他们，都再也承担不起意识形态这个

奢侈品了。”

第三节 台苏“特使”再会维也纳

路易斯再次提约

1969年5月1日清晨5时，路易斯从罗马打电话来，要求从台湾驻罗马“大使馆”取得去台的签证，并说由于签证的关系，他在罗马不能住得太久。

魏景蒙告诉他，台北和东京一样糟，到处都是新闻记者。要他到曼谷或新加坡去。

他说，他没法去新加坡，去曼谷也只能停留24小时。在罗马没人注意他，因此最好是从罗马直接来台北。

魏要他在罗马等，5小时后给他答复。

路易斯给魏景蒙留了他的地址和电话：伊登旅馆215房；旅馆总机：480551。

上午8时5分，魏在台“国防部”打电话给路易斯：

“我准备于一周或10天后启程经香港赴曼谷，途中还要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停留，预计要在5月18日或19日抵达目的地。如果没有意外，可望在5月20日在曼谷和你见面。至于为何要迟延那么久，等见面时再告诉你。这段时间，请你和台湾驻曼谷新闻参事屠益箴联系，屠的办公室电话：58053；住宅：91449。魏说，我会随时让屠益箴知道自己的行程。

路易斯说：“签证有问题，我只能拿到曼谷的过境签证。请选一周以内的任何时间见面。”

魏说：“可我不能在5月20日以前到曼谷。请你作些调整，并让我知道。”

路：“确实有困难，请你重新考虑提前在一周内动身，并打电话给我。”

魏：“等请示后回答。”

当魏去向在“立法院”的蒋经国报告时，蒋说：“不可以。如果路易斯今晚没打电话来，就去电告诉他，不能在5月20日以前见面。”

后来蒋经国又打电话告诉魏：“不必给他打电话，请立即到我处来。”当魏来到他长安东路的官邸时，蒋经国告诉魏：

“最好不要在20日去曼谷见他。如果他再打电话来，并坚持要在一周或10天内见面，就告诉在罗马或维也纳见他。如果没电话，还是在20日以前去曼谷，等几天。”

5月4日10时30分，路易斯打电话到魏家，魏不在。下午2时5分，魏打电话给路易斯，4时才接通（经过美国）。此时，他已改住维也纳的劳顿旅馆（HOTELSCHLOSSLAUDON）电话：842430。他希望6月和魏见面，或者马上在维也纳见。魏回答：“可以在5月12日至14日在维也纳见。”

通话后，魏马上联系蒋经国。因他去庆生旅行，至下午6时，才接通电话，魏景蒙向蒋经国报告通话之事，蒋说：“考虑后再答复。”魏说：“我

必须打电话把决定告诉路易斯。”5月5日，蒋经国再次来电，首先向魏景蒙通报了西德人克拉索夫斯基获自法新社驻莫斯科记者3月26日的报告：

谢里宾、贝里舍等主张与台接近。近日会议中有5项基本问题之建议，并获得上级有条件支持：

A. 毛政权有崩溃及内战可能，（苏联）可能与台合作且极有希望。

B. 中苏合作基础，可用有条件或密约规定之。双方协议在毛崩溃后，成立一个国民党与新组织之共产党合作之联合政府。

C. 新的中国国家制度，不一定要使用共产党名称，但须符合社会经济之进步条件。故在相当期间内，容许一个两党之“人民民主国家制度”。

D. 国共联合政府仅属过渡性质，苏联对于联合政府之援助，不仅于新中国共产党；惟因该新中国共产党需要相当长时间始能在社会、政治方面发展成一个具有力量之亲苏党派，故苏联必须先与中国国民党合作。

E. 美国的远东政策，为莫斯科与台北接近之最大障碍。

蒋说，“研究后以为，贝里舍不致与谢里宾同流，前者为元老派，而谢则为少壮派。”

5月6日上午10时30分，蒋经国约见魏景蒙，将魏的行程改为：香港——新加坡——吉隆坡——曼谷——维也纳——罗马——曼谷——香港。

蒋要魏轻松的进行这次旅行，届时向岛内媒体发布魏出国的新闻，但魏在国外与台联络时勿用“路易斯”的名字。

下午3时15分，魏再见蒋经国。讨论将来以何种方法联络。在这次会晤中，蒋经国说：“最好把比利时列入行程，而且国家愈多愈好。已告诉“总统”，你会在香港停留一天。”

魏说：“取得欧洲签证，需要在香港待两天。”

蒋介石审定会谈原则

下午4时，魏陪同蒋经国赴士林官邸见蒋介石。蒋介石对魏景蒙之行有关细节作出安排，魏记录如下：

一、行程增列西班牙、比利时、荷兰、丹麦。

二、将向路易斯宣读由蒋经国和魏所写，并由蒋介石亲自改正及批准的要点。向他读过文件后即予销毁。魏不携带中文原件。

三、若路易斯问起以下问题时，魏应以口头回答。

1. 问魏从台北带来什么条件或文字？

答：因为是他要求魏来的，便没有什么好说。

2. 台湾需要何种武器和装备？

答：你对我们台湾的装备情形很清楚，你应该可以提出一份清单。

四、下次会谈应在台北进行，因为必须由蒋介石或蒋经国来做决定，而他们几乎无法悄悄不为人知地离开台湾。

五、如果下一次会谈是不须请示的事务性协商，则在维也纳或其他任何地方都可以。

（魏这次最重要的任务，是使他们以具体措词谈如何合作，以及应采取何种步骤推翻毛政权。）

对蒋介石批示的 5 点原则，魏记：

一、中国大陆毛政权仍然存在已经危害了甲乙双方的基本利益（甲：中国，乙：苏联），如再令其继续发展必成更恶劣的后果，此点即为甲乙双方合作之基础。

二、有关合作之办法，首先应以双方如何共同推翻毛政权，以及推翻后甲乙双方应采取之政策为先决条件，故商讨各种办法之前必先决定政策。

三、甲方与乙方共同合作推翻毛政权，可得到国内的朝野及大陆人民之谅解。但决不能采取在历史上已经失败并因此而造成甲乙双方极大的祸患，即所谓国共合作之政策。

任何以共产党名义号召之举，不独遭到中国人民之恐惧、痛恨，就是毛共组织内之反毛分子亦将起而抵抗，此对乙方亦为绝对有害而不利的。

当年乙方如能遵照中苏友好条约，支持蒋委员长领导之国民政府谋得统一，则决不致形成如今日对甲乙双方共同之祸患。

四、甲方为吸收毛政权内各部门之反毛分子之政策，在政治上以中华民国政府领导之下采取反毛救国联合战线，其在全国各党派中成员之一参加共同讨毛复国之战争。

五、至于甲乙双方之基本问题如边疆、经济、外交等，应作为今后商谈之主要课题。

5 月 7 日，蒋经国再次指示魏景蒙：

1. 出国之事不发布新闻。
2. 可能不会谈到 5 点原则。
3. 在出国期间完全不和他直接联络。

莫斯科对台保证

1969 年 7 日下午，魏景蒙抵港。按计划，一路顺利：9 日晚抵新加坡、10 日抵吉隆坡、12 日夜飞罗马、13 日抵西德、14 日晚抵维也纳。

在约定地点进晚餐时，魏景蒙见到了路易斯，但有一人与他同桌，其身后还有一人。魏没有和他招呼。11 时半，路来电话约魏在宾馆外散步。魏安时来到了约定地，在马路上，路易斯说：“返国后，当局还有对中共姑息者，至珍宝岛事发生后始有行动，此事曾一再搁置。4 月去电话时，莫斯科已有大使阶之人在东京等候。在罗马再去电话，东京之人已回莫斯科。当初急欲去台之意是让东京之人速与台湾搭线。”

魏告其：“将来重要之接谈必须在台湾。”

路回答：“主持政策者无法更名改姓，而又绝对不愿外间知道赴台之事。故今后联络问题，大家再想想。”接着，他转换了话题：“在罗马时曾到中华民国驻教廷大使馆申请入境不成，又到驻意大使馆又不成。曾打电话到台北魏家中及罗启，方知魏已离台。由欧赴台经马尼拉仍可守密。”（路易斯行动不能改姓名）

对上次在台北会晤时的重点之一，路易斯说这次有了正式之答复。莫斯科认为中国大陆有背弃条约之信义，故有以下对台之保证，其英译汉如次：

不论由台湾或任何中国之一部发生任何形式之争执，苏联认为是纯为中国之内政，与苏联无关，如形成内战时，苏联决不支持毛泽东，以上文字请勿予外人道及。如有愿告美国者，希望先商苏联。

路易斯问台方有无话要说，以便其上呈，魏告之有几点意见要苏联考虑之，遂约其次晨 9 时来室一谈，并将蒋介石所批 5 点原则中的重点略述之，如政策问题：不能以另立共产党来号召大陆人民；各党派可纳入国民党领导下之反毛联盟组织。路说将加密发莫斯科。

关于上次所谈军火问题，路易斯还是要由台方提出并开列清单及交货地点。

交换情报，路易斯说：“希望即刻开始，开始时可重量不重质，譬如关于大陆军队之布置（对苏联有关之资料）、九全分析等。但每页须以打字抄件送交，视合作交换情形如何再加质量。”路强调：“此点是本人意见，算中间人对台着想者。因莫斯科有人亦重量者。如今后往来方便，重要问题可赴莫斯科交换意见。”

在这次见面中，路易斯急于下次之会谈，使魏感到严重之事可随时发生。

魏说：“如有必要，下次再谈可在维也纳，而该旅馆极静。罗马不可。”

路易斯说，他仍须去台，魏复以回台后研究之。

路易斯说：“最好台方商务人员持新加坡或其他中立国之护照者，时常赴莫斯科做生意。保证其有利之营业并资联系。”（路易斯的夫人为美国某大厂之驻苏代理）

魏问：“如合作成功后亲莫（斯科）华人（在莫、在外国者）是否嘱其

来归？”

彼答：“此类事当不成问题。”

对这次会晤，魏记录如下：

1. 中国内乱于苏联无关。
2. 高级人员曾到日等候（大使级的）。
3. 密码附加通知（TANALIN）（魏景蒙）不可由莫拍发，地址柏林。
4. 明晨先到我室来写带来之 5 点。
5. 情报关于共军布置、九全秘件即可交换，军火需要我们开单“地点、交货”，如有大事发生于大陆，如何支援我们？如何利用俄基地等军事行动。
6. 他们高级人来，现在不可能几小时内可以接济等。不能用伪护照。故地点最好设在公海或中立地如 code（密码）。
7. 将 5 点加密电莫斯科听其回音，有文字的更改。
8. 在 WIEN（维也纳）一谈，然后希望在莫一谈后方能彼来台之议，柏林（已告其非来台不可理由）。
9. 如何可使其来台？以后之 SAS 可停台？
10. 亲莫华人可使其来归，我们的建议。
11. 星华人持星护照者前赴莫做生意，即可开始（其夫人为美国某厂代理）。

魏景蒙传达“蒋五点”

15 日晨 9 时半，路易斯来到了魏的房间。魏估计他是将头天所商谈的各点与其同伴商议后再来的。

魏景蒙照文慢读，路易斯认真抄录，将 5 点读记完后，双方进行复读校对。

确认无误，路易斯收起记录说：“5 点似嫌空洞，台湾最好先提出如何解决毛为第一。”

魏告以：“不谈政策，走到那里算那里是不妥的。如一旦大陆发生大变，或台登陆大陆等等，苏联如何支持我们须事先有所计划。关于利用苏联基地、我方需要军火接济之各点、情报交换等等。5 点有回音后，下次会谈各点可望加入程序。

接着，双方协商“高级会议”之地点。路易斯说：“莫斯科希望在公海。”魏说：“高级谈话必须在台举行。”并强调了台方的理由。

路认为，如有必要仍愿来台，希望魏回台后考虑之。接着，又提出以下问题：

1. 在欧洲，台湾有何人可代转函电，可准其接头（不谈事务）？

2. 台方之大陆资料如经其他路线送苏者，可减少或停止，专用此线交换之。

3. 将来如台动手时，苏联不怕制造边疆之事件以应合之。

4. 商务人赴莫斯科前，须有可贸易之货单，以便即可开始通商，望两个月内可成行。

15日下午4时半，路易斯又来到魏室。谓台5点中有的文字译成俄文后辞句太凶，故须略润饰之，其各处改动点如下：

开头语改为“如果苏联过去之领袖们能对国民政府关系有弹性之处理，如1945年之中苏友好条约，而协助蒋委员长领导之政策……”

（第三点）“定不可再用过去已失败之政策如国共合作者”，改为“不论任何政策，类如过去之国共合作者，皆不能期有成功。”

（第五点）“至于两国间之基本问题如望不致有何解决之困难，类如边疆、经济及外交等。”……（可留在以后作商讨之课题）改为“吾人希望不致有何解决之困难，类如：边疆、经济及外交等。”

这次会晤双方约定，如下次仍在维也纳会谈，路易斯将由苏联以外之欧洲国家电魏如下：

CHINANEWSTAIPEI（台北英文中国日报）

INFORMTANALIN（通知魏景蒙）

MALLDICKARTICLE（维也纳报社）（日期）

CONFIRMDEADLINE（确定限期）

如电魏景蒙家中者则有商业语气：

约瑟夫——台北贝蒂——金厦沙

约翰——曼谷南西——吉隆坡

克利斯——东京贝丝——新加坡

珍——罗马彼得——马尼拉

安——塞浦路斯狄克——WIEN.S.L（维也纳）

玛丽——哥本哈根景蒙——CMW

WL——王平（路易斯代号）JOESmith

双方协商派“贸易商”

15日夜10时30分，路约魏散步。期间，魏询路易斯对下次会谈之课题有无增减或修改。

答：“没有。如有，可以后联络。但广泛交换情报即可开始，以满足如

何对付毛泽东和双方军事之需要。最好有专人写稿，开始重量不必重质，如人事资料可长可短。希望派一位贸易人才来莫时带来。此人不心常时驻莫。但可常来。有若干事可告彼转达你方。此人定可赚钱，再希有若干地点如领事等可传递信件或言语。”

问：“同来几人？系何种人？”

答：“二人，一是不公开之同僚，一是保镖者。同僚应是可商量问题之人。”

问：“何时对我方 5 点有答复。”

答：“恐稍须时日，看来可同意。”

问：“新疆骚动是怎么回事？”

答：“两星期前中共在边境派大批牛群入苏境之卡吉克。不料牛群中隐藏军队，现已挖好壕阵。苏联已决心将其撵出。可能有一场战争。牛群为常有之事。”

问：“下次会谈之程序？”

答：“下次可广泛交换情报，以如何对付双方之需要。”

问：“下面的日程？”

答：“拟两日后即去奥赴莫再往加拿大。”

16 日晨，魏景蒙通过台驻柏林联络人宋风恩，将与路易斯会晤情况报蒋经国。除上述情况，魏还汇报：

莫斯科将召开国际共产国家会议。不参加者，到现在有毛泽东、阿尔巴尼亚、北朝鲜、北越、（捷克）南斯拉夫、古巴。苏联驻维也纳之外交官近以间谍罪被奥政府驱逐出境。但非严重。故将来再来维也纳会谈不妨也。加拿大靠拢美国不能在加会谈。比利时一时不会承认中共，因又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大本营。

中苏边境苏有重兵，如海参威发生成协，俄会全面作战。

何人在欧洲如柏林他们可以接头？或转电或转言者在欧洲。

上午 9 时，路易斯再来。称：11 时离 SCHLOSSLAUTON 旅馆。下午 1 时 15 分飞往罗马。两天后回莫斯科，然后再赴加拿大打某报纸之毁谤官司（或可得美金 5 万元）。路还说：“商务人员最好由柏林进入”。

晚上，魏对此次会谈经过做如下记录：

1. 路易斯带来之苏方正式答复；
2. 彼抄 5 点但不太准确；
3. 关于下次地点；
4. 下次谈话程序；
5. 在台举行高层次会议之铺路；

6. 军事合作之基础；
7. 情报交换；
8. 高级会晤之地点：原地或塞浦路斯岛（我有大使馆）；
9. 情报即可交换。商务代表应于两个月间派往，经东柏林进入莫斯科（或由罗马尼亚、捷克等地进入亦可）；
10. 情报交换开始时重量，渐而重质为妥。中文即可。最新消息重写过再送苏。亦可经常由商务代表转。（其夫人为美国某大厂之代理）；
11. 再要求在欧洲之我方可靠人士为转达电信名单地址以便传递；
12. 再谈军事合作，基地，同时响应边境事件，中共亲俄党人之归顺（不成问题）（实在可怕，彼辈太现实也）；
13. 总统号召几小时内军援之，会同后当更好点；
14. 如能先在莫斯科一谈，则再来台谈可能性或大一点，表示非来台不可；
15. 莫斯科内中国人多，反苏者已无有已，故来一商务代表不妨也。

外界试探会谈消息

5月24日下午3时30分，魏景蒙离开香港，4时30分抵台北。即直接赴蒋经国办公室，报告维也纳之行。

5月25日（周日）上午8时30分赴长安东路官邸，再向蒋经国报告。

蒋重复确认路易斯从卡布里和罗马对魏说的话，似乎很重视那个没能在东京见到台方人员的人，认为那人可能有许多路易斯不知道的事要告诉台湾当局。

接着蒋问：“你对此行的印象如何？”

魏答：“彼方似乎比我方要急。”

蒋经国也对军事合作很感兴趣，关于“贸易商”的角色，蒋问：“朱新民担任好不好？”

魏未置可否。

蒋经国交待，如果蒋介石要见他，可如此报告“接触经过”，魏对此记录如下：

路易斯在卡布里时，来电表示想于4月底以前在欧洲或者在东京和我见面，当时他只在卡布里停留一天，然后就到罗马，他要我们答复，但我们未回答。5月1日清晨5时，路易斯又从罗马打电话来，要求我们准他来台湾，被拒。由于东京媒体警觉性高，他没去成东京。后来，路易斯提到可在曼谷或新加坡见面，我同意在曼谷见，但要延到5月20日之后。经过商量后，蒋经国决定改在维也纳见。

5月4日，他打电话来，我回电打到维也纳劳顿旅馆，我们约定于5月

12日至14日之间在劳顿旅馆见面。

蒋经国认为，下一次见面地点在塞浦路斯较好。届时也许还是派我去，叫我写信给路易斯约下次见面之事，但他要先请示。

告诉魏部长，路易斯没到维也纳（可见当时的外交部长魏道明被蒙在鼓里）。

5月27日上午10时，蒋经国召见魏景蒙，告之“下午4时总统茶宴狮子山总理后，于5时在中山楼召见你。”魏根据蒋经国指示，对蒋介石说了以下几点：

1. 他们急于举行高层会谈。
2. 认为我们的5点内容空洞。
3. 下次见面的重点，要谈情报交换、高层会谈方式、5点回音。至于见面地点，将等其来电时约定。
4. 军火之事，他们提出的方式、地点、种类。
5. 商务代表、两个月派联络员。
6. 苏之回音。

蒋介石决定等路易斯来电之后，再决定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并会考虑派人到莫斯科。

魏又向蒋汇报：“日前曾遇日本新闻专员山本，当其说有谣传我见过路易斯了，我大笑以对。”

蒋说：“曾想向魏道明提你和路易斯见面的事，但怕他感到尴尬所以没告之。下次见他时会告诉他，以为补偿。”

魏又向蒋提到：“澳洲大使26日在酒会中问我，‘你的莫斯科之行满意吗？’CIA的塞佛斯想跟我一谈，还有山本告诉我王惕吾和韦永成立委说我见过路易斯。”

蒋介石听完笑了笑说：“大家对你此行猜测，是想当然尔。”

对魏景蒙这次执行任务的情况，蒋介石十分满意。

5月29日，有消息传来，路易斯已取得南韩签证。路易斯这次并未在东京出现，故有人怀疑路可能到南韩了，并认为南韩可能想知道路上次到台北时，谈了些什么。

第四节 毒剑与橄揽枝

毛泽东强调“西北可能出问题”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疆军区司令部。

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睡了个很惬意的午觉，此刻刚懒洋洋地走进办公室，便看到了办公桌上置放在醒目位置的6月10日的情况报告。

“又是边境事件。”

龙书金不耐烦地将报告浏览了一遍。因为死了人，他不得不稍为认真地多看了两眼。

“越界……开枪……这可能吗？”……

进入6月以来，这类有关苏军越境入侵的报告显著增多。按照惯例，有关外交的纠纷一旦发生，不管事件的大小，管辖哨所必须一式三份，用电报直发军分区、军区和北京外交部。而且做为军区司令员的他，亦必须一一圈阅。据说这一规定是周恩来亲自制定的。龙书金由广州军区副司令调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后，也不得不遵守这一规定。

龙书金对这些多如牛毛的外交纠纷报告早就腻烦透顶。今天是一头羊、明天是一头牛、要么是你打了我一枪，我射了你一弹。在自己的辖区内，中苏边界线长达7000多公里，谁知道一天要发生多少事？而这些事件又有多少是真实的呢？

“假报军情？……！”

龙书金将报告漫不经心地抛在桌面上，起身缓缓踱到窗前。

新疆的6月，窗外炽热如火，花园里的花草绿木，在骄阳的暴晒下蔫搭着头，好似脱了水分，划一根火柴就可点着。

“这个鬼地方。”

龙书金愤愤地咒骂了一句，又回至刚才的思路上去。

有些哨所的军官，为了引起上级的重视，得到更充实的供应，故意夸大事实。有时屁大一点事也来报告。这虽然算不上邀功争宠，却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边界如此漫长，很多地方又没有边界标志，谁侵犯了谁，有什么根据？再说放牧牛羊跑单的事时有发生，难道这也报告，这也需要我军区司令圈阅？

说实话，珍宝岛事件发生后，龙书金的确紧张过一阵子。“九大”期间龙书金赴京与会时，秘密会见过林彪，林彪认为：中苏之间的矛盾完全是因为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引起的，即使有一些边境摩擦，尚不至于酿成大战。另外，从苏军的兵力部署上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林彪最后诡秘地说：还是有一点边境纠纷好，可以提高军队的威信，加重几个军区司令员在中央领导层的分量。

林彪的弦外之音，龙书金自然心领神会。

4月，中央军委发来了电报，报文中特别说明，毛泽东最近指示：“西北可能要出问题。”要龙书金早做部署。由于林彪的交底，龙书金对这份电报只是付之一笑，草签了个名字，便封进了文件柜，拒未对下传达。

进入6月，关于外交纠纷的报告沓至纷来，有时一天多达20余份。龙书金觉得实在乏味，便擅自下了一道命令：“此后一般性的外交纠纷，可逐级报告，本级能处理的，可不必报告上级。”

果然，此类报告顿时骤减下来，龙书金自觉清心了不少。他不懂得：外交无小事，一粒火星，都可触发两国交兵的连绵战火。尤其是在中苏两国大战一触即发的危急时刻。

龙书金立刻得到了血腥的教训。

戈壁滩上的38具中国官兵的尸体

1969年8月10日，北疆军区副司令员任书田到塔城军分区检查工作，塔城军分区政委王新光汇报工作时谈到最近对面苏军调动频繁，夜间可听到坦克的轰鸣声，苏军是否有什么阴谋？任书田副司令员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新疆军区司令部。

8月11日，中国军队在两国边防军经常会晤的巴克图哨所悬挂起红旗，这是邀请对方司令官进行会谈的信号。然而，红旗悬挂了一天，苏军的赫尔丘上校、安泽菲洛夫中校、巴什捷夫中校，谁也没有露面。

8月12日，新疆军区作战部部长孟魁武接到塔城军分区再次来电，认为苏军行动反常，马上报告了龙书金。龙书金弃置一旁，没有答复。

当晚，王新光政委又电话直要新疆军区作战值班室，报告对面苏军可能有重大的行动。请示明天的例行巡逻可否取消。

值班参谋回答：军区首长已接到你们的报告，但对取消例行巡逻一事没有明确指示。

8月13日上午8时，按照规定，副连长杨政林率领三排37名官兵，执行例行巡逻任务。

王新光政委仁立在一个高地上，目送巡逻队消融入茫茫的戈壁滩。虽然这天的阳光格外明媚，王新光的心头却笼罩着驱之不散的浓厚的阴云。

巡逻队的官兵对即将发生的凶险茫然不知，他们沿着例行的巡逻道路，透迤着向前走去。由于是在荒无人迹的戈壁滩上巡逻，所以队形并不很严整。几个刚到边防的新兵，围着杨政林听他讲惊心动魄的边防斗争故事。还有的将路旁的沙枣棵、骆驼草折断，编成圈帽戴在头顶，以遮挡骄热的太阳。

突然，杨政林停住了脚步，他似乎感到周围的地形有些陌生。这条路他走过上百遍。沿途的一草一木、山丘、沟壑，他熟悉得如同自己的指掌。

他仔细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地形地貌，说不出哪里感到别扭。

一望无际的戈壁，犹如一个正在酣睡的莽汉，毫无知觉地袒露着胸腹。

杨政林正要命令巡逻队继续前进，一发炮弹挟着尖厉的呼啸落在队伍的中间。

“轰”的一声巨响，五六名战士炸得四散飞迸。

“卧倒，”杨政林吼叫着发出了命令。

6辆苏军坦克犹如从地狱里钻出来，出现在杨政林的视野里，它们巨兽般摇晃着抖掉身上的浮土、草棵，成扇形从三面包围上来。三百多名苏军官兵，也从土堆里爬出来，尾随坦克开始冲击。

杨政林这才意识到，这是苏军周密计划，蓄谋已久的行动。巡逻队被四面包围，已经没有生还的退路了。

此刻，杨政林已抱定必死的决心。抵抗，无异鸡蛋往石头上碰，可即便头破血流，也要溅它一身黄了。

望着呐喊冲来的苏军士兵，杨政林对身旁的机枪手狠狠挥动了一下手臂，“打！”

机枪手也意识到处境的险恶，紧抱着机枪，将一串串子弹，刮风般扫向扑来的敌人。

巡逻队的战士，虽然伏在地上，但无可依托的地物，且被苏军的密集炮火打得抬不起头来，间或用冲锋枪还击一下，子弹打在坦克的甲板上，只是迸发出几粒火星，对敌军根本构不成威胁。

此时杨政林的左臂已经被子弹射了个洞，他无暇包扎，不断涌出的血水染红了半边军衣。

现在，他知道自己应该先做些什么了。他将报话机从已牺牲的报话员的身上解下来，大声呼叫：“塔城、塔城，我是杨政林，我们在铁里克提东10公里处遭敌伏击，苏军坦克6辆，步兵300余人……”

这时，空中传来“嗡嗡”的轰鸣声，杨政林抬头，看到两架直升机，在头顶盘旋两圈，然后向北飞去。

杨政林报告完敌情，最后沉重地说：“请党相信我们。我们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粒子弹，决不会出现一个俘虏……”

杨政林扔下话筒，用冲锋枪扫倒几个苏军士兵。正想转身射击，这才发现右腿被炸断了，早已失去了知觉，血水浸透了身下的岩石。

苏军似乎知道了这一队中国士兵目前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马上改变了战术，不再用坦克导引步兵冲击，而是将中国士兵团团围住，用准确的炮火逐个进行打靶式的射击。

巡逻队马上陷入了拼杀不能，抵抗无望的境地。

空旷的戈壁变成了血腥的屠场。

有的中国士兵早已死去，仍然成为苏军射击的目标，尸体上冒着一缕缕中弹后的青烟。

中国士兵抱定必死的决心，依然顽强地抵抗着。

突然，两颗汽油燃烧弹在中国阵地中间炸裂开来，随着四散喷溅的黑色

液油，大火如噬人的野兽张开了血红的嘴巴。

火海里，中国士兵在翻滚、扑跌。一阵阵凄厉的惨叫声，伴着血肉被烧焦的腥臭味，在苍茫的戈壁滩上飘散，回旋……。

仅存的两名伤兵爬到了杨政林身边。7班长胡宝杨右眼被击穿，血浆糊了一脸。新战士小王第一次参加执勤，连枪都不会使，手里紧握着一颗未开盖的手榴弹，稚气的脸庞上挂着横七竖八的黑红的血污。他的腿、腹、胸先后中了4弹，军衣与皮肉烧结在一起连扔手榴弹的力气都没有了。

杨政林悲叹了一声，回身望了一眼祖国的土地，缓缓旋下小王手中的手榴弹底盖，攥住弦扣。

一声巨响过后，阵地上旋即沉静下来。

只有滚滚的黑烟，还在升腾、膨胀，远远望去，如一只狰狞可怖的恶鬼。

等到中国陆军第八师的一个团携带轻重武器，从60公里外的巴克图据点赶来时，战斗早已结束了。

38具尸体弃置一地，有的面目全非，变成了黑炭。方圆几百米的戈壁，仿佛被炽热的烈火焚烧过，变得漆黑一片。

大漠孤烟，夕阳惨照，天将倾，地欲堕，黄昏血色，血色黄昏。

半个月之后，为了弄清事件真相，中央军委调查组来到了乌鲁木齐，先后调查了司令员龙书金、政委王恩茂、副司令员赛福鼎以下近百人。

塔城军分区政委王新光、参谋长南仲周认为，事件发生前，苏军调动频繁，情况异常，这些情况多次向军区司令部值班室汇报过，现有电话记录可以做证，汇报中曾多次要求暂停巡逻，但上级都没有答复。北疆军区副司令员任书田说：“接到塔城军分区的报告后，我们是慎重研究过的，并且有情况不明暂不巡逻的决定，但上报军区后，一直未接到批复，不得已只好让值勤分队继续巡逻。为了此事，赵副司令员曾亲自打电话找到龙书金，并且吵骂了一通。”

新疆军区作战部科长官为友、政治部保卫科科长岳耀礼说：塔城上报的情况我们都已知道，作为参谋人员，我们也同意暂停巡逻，但是给领导汇报后，确没人理睬。

新疆军区作战部部长孟魁武说：“为此事我曾专门请示过龙书金司令员，司令员让我报告北京外交部，止他们拿意见。由于事关重大，在外交部没有明确答复前，我不敢擅自下令停止巡逻。”

关于一个边防哨所是否巡逻的问题，居然要由远隔万里之外的北京外交部负责。这实在有点滑稽。再查北京外交部，外交部答复值班人员已回电，关于边防部队的巡逻间隔，巡逻路线，可由新疆军区自行确定。

从北京到新疆，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究竟谁应该为“8·13”事件负责呢？鬼知道！

直到1971年“9·13”事件发生后，这些纠缠不清的失误才一古脑儿落到林彪死党龙书金的头上。龙书金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苏联欲对中国实施核打击

美国，联合国总部大厦。

“苏中再度发生流血冲突，苏军歼敌 30 多人。”

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利克的办公桌上，放着这样一份简报。

马利克像一条抢到了一条骨头的狗，兴奋异常，在办公室里从这头走向那头，又从那头走向这头。

“这些可恶的中国人，决不能让他们得逞！想和伟大的苏联开战，也不掂掂自己的份量！”他举起双拳咆哮着：“这些黄种的混蛋，统统都得干掉！”

他拿起电话，向苏联驻美大使馆询问苏联领导人有什么反应。

烟雾缭绕的会议室里，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正在商议是否对中国进行更大规模的武装行动。

葛罗米柯气呼呼地首先发言：“我刚刚听说，昨天格列奇科同志命令军方擅自动手，在新疆消灭了中国一支 30 多人的边防巡逻队，我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意思！难道是因为在达曼斯基岛我们吃了亏就在新疆反咬一口吗？这种做法，未免太短视，太小家子气了！这与我们国家的伟大形象相符吗？”

柯西金马上帮腔说：“如果是为了教训中国，这种隔靴搔痒的做法有什么用呢？去年我们的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已经让我们国家的形象蒙受了重大损害。要知道，我们正在推进的亚洲安全体系很可能因格列奇科同志的这一顿枪炮而破产！这划得来吗？”

勃列日涅夫轻声说了句：“不至于这么严重吧！”

葛罗米柯从公事包里抽出几张纸来，往勃列日涅夫面前一扔：“请你看吧！这是 20 多个使馆今天打来的电报。如果说达曼斯基岛发生冲突时，世界还弄不清是哪一个首先挑起战火的话，那这次可就昭然若揭了。不会有一个国家不认为我们是战争的挑起者。”

勃列日涅夫沉吟了一会儿说：“我看，现在还是让我们商量一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吧！”

在旁边一直闷头吸烟的格列奇科终于坐不住了：“我坚持我的意见，在中国狂人面前，我们的态度必须强硬些！如果想惩治他们而又避免我们的损失过重，那么就应该让我们的原子弹显显威风。要根除中国的威胁，就必须用几百万吨级当量的核武器，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劳永逸的打击。只有通过这样的外科手术，才能摘取亚洲的毒瘤！”

苏军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嘟囔了一句：“那不引起世界大战才怪呢！”

柯西金站了起来：“格列奇科同志，你想过吗？对付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动用几颗原子弹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况且，中国人手中也有核按钮，一旦到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时候，他们肯定会不计后果进行反击的，到那时候，恐怕不仅仅是爆发第三次大战的问题了，我看世界

的末日也该到了！”

葛罗米柯紧接着柯西金的话说：“中国什么资源最丰富？人！请你试想一下，中国军队越过国境冲进苏联，完全可以几百万人甚至是上千万人蜂拥而入，我们的武装再精良，也难保一定打得过他们呀！”奥加尔科夫补充说：“谁都知道，中国人是最擅长打游击战的！他们可以一直打下去，那样的话我们就会像美国在越南一样陷进战争的泥淖里。”

反格列奇科派似乎占了上风。

勃列日涅夫总结说：“刚才大家各抒己见，我相信大家都是在严肃地对待我们国家和中国的冲突。既然这件事非同小可，我建议大家回去后再认真思考一下，然后我们再作出决定。”

其实，勃列日涅夫还是倾向于格列奇科的意见的。会后，他召集格列奇科等人在苏军总部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

接着，苏军大本营的首脑采取了一系列准备活动：任命战略火箭军副司令托卢勃科上将为远东军区司令，以加强核打击行动中指挥力量；命令在远东的苏军战略导弹队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等候发射命令。

8月28日深夜，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接到了勃列日涅夫的密令：“为了我国和美国共同的战略利益，我军大本营准备对中国的重要军事目标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解除中国的核武器，请你秘密地征询一下美国当政者的意见，最好能和尼克松总统或基辛格博士个别面谈。我们只攻击军事目标，不会伤及无辜生命，而且我们释放的当量会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不会造成环球大气污染，也不会对地球的生态平衡有很大的破坏。”

放下热线电话后，多勃雷宁立即摸起另一部电话，打通了基辛格的号码。

基辛格最后的答复是：“请耐心等待，我们需要慎重研究。”

尼克松技巧“泄密”

尼克松听说苏联要对中国动用核武器的消息后，立即意识到，西方国家最大的威胁是来自苏联，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中国没有过扩张的野心和行为。一个强大中国存在是附合西方的战略利益的。

尼克松在同他的高级内阁成员紧急磋商后，取得了这样几点共识：

首先，如果美国坚决反对，苏联一般不会敢于轻易动用核武器，因为这既不符合国际宪章，也违反美苏间的协定。

其次，美国反对的理由，最好只强调美国的利益，而不涉及中国。因为过多的涉及，一方面会把美苏关系搞僵，使缓和的局面彻底毁掉；另一方面，也会伤害中国的尊严。

第三，应该设法将苏联的意图尽快通知中国，使他们有所准备，制定必要的应变措施。

前两点还好办，这最后一条可把基辛格给难住了。美国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双方积怨很深，直接告诉中国，一来缺少合适的渠道，二来也可能会引起中国领导人的误解，以为美国在耍什么花招。

尼克松出了一个主意：把消息透露给某家报纸的记者，让他们捅出去。这样即使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他也只能干瞪眼。美国无秘密嘛！

8月28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则震动世界的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巡航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顿时整个世界凝固了，窒息了，人们那惊恐的目光，聚焦在中苏边界两端的导弹发射架上。

正在克里姆林宫焦急等待回音的勃列日涅夫，等来的是他那份阴谋的公开曝光。

他被美国人出卖了，愚弄了。

除了暴跳和怒骂，勃列日涅夫还能有别的办法撒气吗？

10月15日，基辛格向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正式阐明了美国政府对此事的立场：

中国的利益同美国的利益是密切相关的，对于苏联的行动，美国不能坐视不管。战争一旦爆发，美国会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将对苏联采取同样的行动。

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将招致中国方面的报复，核战争所产生的污染会直接威胁到美国在亚洲驻扎的数十万军人的安危，并会使全球的生态平衡受到破坏，这是美国不能容忍的。

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立即与几个老师开会分析这则消息的可靠性并商议对策。

几位老师都认为，苏联要打核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因为他们的常规武器用于和中国打进攻战，力量还远远不够。

聂荣臻分析说，所谓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无非是指对我国部分重要目标进行毁灭性或摘除性的打击，而这些目标很可能是中国的核导弹基地和北京及东北的一些重要工业基地。

因此，聂帅建议，城市应该以疏散、隐蔽和防护为主。现在应该马上行动起来，让这些城市迅速挖掘防空掩体，同时在全民中广泛进行防止光辐射、核污染的应急练习。

